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一篇

全一册

水 陆 洲 著

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胜利万岁！

2011 年 6 月发布

2011 年 7 月制作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概述·简论 第一篇

编写 水陆洲

发表时间：2011.06.22

编辑 红石头

目 录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封 面

概 述-----4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8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9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24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48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63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87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180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181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205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223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273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327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348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349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383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423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435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436

| | |
|----------------------------------|------------|
|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 464 |
|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 476 |
|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 484 |
|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 491 |
|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 499 |
|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 513 |
|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 536 |
|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 547 |
|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 555 |
|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 580 |
|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 589 |
|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 596 |
|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 608 |
|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 620 |
|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 扼杀新中国 | 621 |
|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 651 |
|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 674 |
| 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 678 |
|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 689 |

第一篇 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中国共产党的实际

概述

议论文化大革命，人们往往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文化大革命的来由

文化大革命是由执政的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袖毛泽东亲自领导和发动的。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发动这么一个震撼中国和世界的运动呢？指导这个运动的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正确吗？党和毛泽东对当时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它的领导层、尤其是中央领导层的实际情况，认识是正确的吗？

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

反右派斗争被严重地扩大化了，把一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内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造成了不幸的后果。

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在这次会议前后，全党同志和全国各族人民在生产建设中发挥了高度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是，由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同志、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同志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急于求成，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 and 试点，就在总路线提出后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从一九五八年底到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央政治局庐山会议前期，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曾经努力领导全党纠正已经觉察到的错误。但是，庐山会议后期，毛泽东同志错误地发动了对彭德怀同志的批判，进而在全党错误地开展了“反右倾”斗争。

左倾错误在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并未得到彻底纠正，而在政治和思想文化

方面还有发展。在一九六二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同志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观点，进一步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五年间，在部份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由于把这些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在一九六四年下半年使不少基层干部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在一九六五年初又错误地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意识形态领域，也对一些文艺作品、学术观点和文艺界学术界的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错误的、过火的政治批判，在对待知识分子问题、教育科学文化问题上发生了愈来愈严重的左的偏差，并且在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

从此，一锤定音，在中国就只能发出这一种声音了。

接着上场的是理论精英，按着已经定下的调子吹喇叭：

一九八八年出版的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说：文化大革命的前十年，“毛泽东犯了三个重大错误：一是关于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二是在建设社会主义上的错误，三是个人专断。

一九九一年出版的由胡绳主编的《中国共产党七十年》说：

一九九五年出版的席宣、金春明著《文化大革命简史》进一步“加深”了王年一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背景与起因是：“左”倾理论和“左”倾实践的交互作用；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交互作用；国际反修和国内反修的交互作用。在这三个交互作用的恶性循环中走向极端。”

他们还只把毛泽东的“错误”理论和实践追溯到一九五六年，

二〇〇三年出版的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传 1949-1976》说：

还有的人认为，毛泽东在一九五三年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进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就是错误的。是搞空想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平均主义。

为了回答人们提出的问题，有必要回顾一下建国以来，主要是一九五三年以来，毛泽东同志有关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实践。

一九五三年至一九六六年，毛泽东同志的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可以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这是在各条战线开展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这个阶段，首先是要解决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即过渡时期总路线中提出的“三改”（改造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同时，强调仅有经济路线上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还必须进行政治思想路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意识形态各个领域中的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党内整风、反击右派进攻、全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等等。

第二个阶段：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二年，这是在各条路线上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提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在各条路线开展了大跃进运动，并在农业合作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人民公社这样一种新的组织形式。

第三个阶段：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五年，这是在各条路线，首先是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年代。这个阶段，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提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防止和平演变、防止中央出修正主义、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等等。并试图通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清政治、清经济、清思想、清组织）的形式加以解决。

正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步形成了后来称之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社会主义时期的基本路线），是在广大革命群众的斗争实践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党内的各种错误倾向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是在同国际上的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包围的斗争中以及同国际共运中苏联修正主义、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经过一九五三年到一九六五年的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由于我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间不长，积累的经验不多，对规律性的东西认识不深，具体的体制、方针和政策等等需要逐步完善，对干部的教育没有紧紧跟上实践前进的步伐，特别是在党内高层中存在着“左”和右的倾向的干扰，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出现过一些错误

和偏差。) 经过一九六六至一九七六年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也证明了是正确的。再经过一九七六年至今的实践，从反面证明了是正确的。

毛泽东同志提出的这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和三条路线，都是在党的有关会议上通过集体讨论一致通过的。以后才知道，有的人当时内心并不同意，却装出一副衷心拥护的样子。他们却说：这些都是毛泽东的个人专断，而与他们的“集体领导”是相对立的。党的历史能够如此地任意编造吗？

近三十年的情况恰好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在文化大革命前，对党内情况的分析是完全正确的：在党的县委以上的领导干部中出现了一个脱离群众的“官僚阶层”、“官僚主义阶级”、“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党中央出现了修正主义，存在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存在一个资产阶级司令部。

正是根据这种情况，经过深思熟虑，毛泽东在周恩来等等（包括当时的林彪、康生、陈伯达）的支持下，经过党中央集体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

2006年5月17日初稿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第一章 1949—1957 年开展各条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第一节 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毛泽东开始提出过渡时期论，这既有实践的需要——即将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展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又有实践的可能——一九五二年下半年，我国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得到恢复，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三反五反三大革命运动取得了伟大胜利，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同时，三年恢复时期，还积累了大量的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经验。这就迫切需要提出党在整个新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否则就不能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制定正确的政策和策略

一、一九五二年上半年以前，党的高层在如何看待新民主主义社会问题上的分歧

然而，恰恰在这个关系到社会发展的前途和命运的重大问题上，在党内，特别是党中央的领导层中，思想上并不一致。当然，首先应该指出，经过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实践和理论总结，大家对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认识是一致的。比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前途是社会主义，而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革命必须分做两步走，第一步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第二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五种经济成分构成，应该使他们各得其所，共同繁荣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实现由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那么，新民主主义社会究竟是一个过渡性质的社会，还是一个相对稳定、相对独立的社会呢？从毛泽东在一九五二年以前的大量言论来看，在他的思想中隐含的是前者。而另一些领导人，如刘少奇，则偏向于后者。这个问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还没有直接的现实意义。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就成为直接涉及到各项工作的一个根本指导思想问题。

一九五一年三月，刘少奇在为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准备的报告提纲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新民主主义革命一般地不破坏私有财产的制度，

但社会主义就首先要工业中然后在农业中破坏私有制。”

这里有两个问题：

（1）所谓“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是不是就意味着对私有制不能进行社会主义改造？

（2）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除了建国初期要完成一部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遗留任务外，我们所要进行的革命仍然还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吗？

正是从这个思想出发，刘少奇在一系列问题上与毛泽东产生了分歧。

在对待私营工商业问题上，毛泽东在强调要利用的同时，比较突出强调节制资本，限制和反限制的一面；刘少奇则在赞成限制的同时，更强调发展和利用的一面。正因为如此，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五月的天津讲话中，到处歌颂资产阶级“剥削有功”。

在农民问题上，毛泽东强调组织起来，走合作化道路；刘少奇则认为不能过早轻易动摇农民的私有制。

一九五零年一月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与安子文等人谈及他对东北农村土改后出现新富农等时说：“东北土改后农村经济开始向上发展了。有三匹马一幅犁一挂大车的农民，不是富农，而是中农。今天东北的变工互助是建筑在破产、贫苦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这是一个不好的基础。将来70%的农民有了三匹马，互助组就会缩小，因为中农更多了，他能够单干了。这是好现象。现在的变工互助能否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不能把新民主主义阶段同社会主义阶段混为一谈。由个体生产到集体农庄，这是生产方式上的革命。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现在对富农雇人买马不要限制，三、五年之后再限制，用国家颁布劳动法，把雇农组织起来，提高雇农的待遇，征土地税，多累进一些，多加公粮等办法予以限制。党员成为富农其党籍怎么办？这个问题提得过早了。有剥削也还是可以做社会主义者的，圣西门是个资本家，但他也是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当时是空想的。现在是私有制社会。党员生产发家了，要将财产交公也交不出去，将来在实行集体（化）时，将自己的财产交公，这种富农党员也是好党员。因此，即使东北将来有一万富农党员也不可怕，因为过几年，东北可能会有一百万党员，这一万人若都不好，被开除也不要紧。认为（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一种教条主义。”这一段话确

实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政策问题：（1）新民主主义社会与社会主义社会不能混为一谈，但是，它们能够截然分开吗？能够说“现在”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是私有制社会”吗？（2）没有机器工具的集体农庄是巩固不了的，但是，没有机器工具是不是就根本不能搞互助合作？现在的变工互助为什么就不能发展成为将来的“集体农庄”？（3）圣西门是一个资本家，也是一个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但是，世界上有没有一个人既是资本家，又是科学社会主义者？（4）当党员便不能有剥削，是不是一种“教条主义”？共产党里面能够容许“富农党员”存在吗？如果共产党里面有成千上万的党员都是资本家、富农，难道一点也不影响共产党的性质吗？这就难怪当时毛泽东看到刘少奇的谈话纪录后，“不满形于颜色”。

一九五一年七月三日刘少奇在批转山西省委一个报告的批语中指出：“在土地改革以后的农村中，在经济发展中，农民的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已开始表现出来了。党内已经有一些同志对这种自发势力和阶级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图去加以阻止和避免。他们幻想用劳动互助组和供销合作社的办法去达到阻止和避免此种趋势的目的。已有人提出了这样的意见：应该逐步地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七月五日刘少奇在给马列学院学生讲课的讲稿中又指出：“企图在互助组内逐步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制走上农业集体化。这是完全的空想。”这种想法“在目前是冒险的，‘左’的，带破坏性的，在将来是右的，改良主义的。”“目前的互助组或供销社都不能逐步提高到集体农场。集体农庄是另外一回事，要另外来组织，而不能‘由互助组发展到’，也不能由供销社发展到。”

诚如毛泽东当时指出的：既然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有一个工场手工业阶段，即尚未采用蒸汽动力机械、而依靠工场分工以形成新生产力的阶段，则中国的合作社，依靠统一经营形成新生产力，去动摇私有基础，也是可行的。同时也还可以指出，农业合作组织为什么就不能如后来的实践所证明的那样，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过程呢？

二、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开始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从一九五二年九月初步提出总路线，经过书记处反复讨

论，直到一九五三年六月才向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提出，直到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才大张旗鼓地向全党、全国进行宣传。

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这种情况的要求，一九五二年九月二十四日，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在听取了周恩来总理关于“一五”计划轮廓问题和苏联商谈情况的汇报后，毛泽东谈到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设想，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开始用十年到十五年的时间基本上完成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而不是十年或者以后才开始过渡。”“七届二中全会提出限制与反限制的斗争问题，现在这个内容就更丰富了。工业中，私营占 32.7%，国营占 67.3%，是三七开；商业零售是倒四六开。再发展五年，私营比例会更小，但绝对数字会有些发展，这还不是社会主义。五年以后如此，十年以后会怎么样，十五年以后又怎么样，要想一想。到那时私营工商业的性质也变了，是新式的资本主义，公私合营、加工订货、工人监督、资本公开、技术公开、财务公开，他们已经挂在共产党的车头上，离不开共产党了。‘空前绝后’，他们的子女们也将接近共产党了。农村也要向合作互助发展，前五年不准地主、富农参加，后五年可以让他们参加。”

在以后的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又多次讲了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三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要消灭资产阶级，消灭资本主义工商业；但要分步骤，一是要消灭，一是还要扶持一下。”[7]

一九五三年一月三十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指出：“对资产阶级，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彻底解决。一是税收，二是劳资，三是商业调整，四是资金短缺，这些要解决。”

一九五三年二月一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表示不同意一个文件上所写的我国“社会经济结构已经大规模地改组”的提法。他指出：“现在只是国营工业、运输业、批发业已经改组了，其他像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工业才刚开始改组。国营商业零售面有待逐步扩大。从农业上看，农民从地主方面拿到土地，从封建所有制变为个人所有制是改组，但从个体所有制变为小集体所有制，则正在开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在书记处会议上，毛泽东讲了在湖北视察时同孝感地委负责同志谈话的内容。他说：“什么叫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步骤是走向社会主义。我给他们用扳指头的办法解释，类似过桥，走一步算是过渡一年，两步

两年，三步三年，十年到十五年走完。我让他们把这话传到县委书记、县长。在十年到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及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要水到渠成，防止急躁情绪。”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拟定了《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提纲》，指出：“总路线是照耀一切工作的灯塔。有所不同和一视同仁，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前者管着后者。几点错误观点：（一）确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秩序；（二）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三）确保私有财产。党的任务是在十年至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所谓社会主义改造的部分：（一）农业；（二）手工业；（三）资本主义企业。对于将资本主义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的认识——社会主义成分是可以逐年增长的，资产阶级的基本部分是可教育的。”

在这一天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在讲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时间内，基本上完成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不要脱离这条总路线，脱离了就要发生‘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有人认为过渡时期太长了，发生急躁情绪。这就要犯‘左’倾的错误。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以后，仍然停留在原来的地方。他们没有懂得革命性质的转变，还在继续搞他们的‘新民主主义’，不去搞社会主义改造。这就要犯右倾的错误。就农业来说，社会主义道路是我国农业唯一的道路。发展互助合作运动，不断地提高农业生产力，这是党在农村中工作的中心。右倾的表现有这样三句话：‘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这种提法是有害的。过渡时期每天都在变动，每天都在发生社会主义因素。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怎样‘确立’？要‘确立’是很难的哩！比如私营工商业，正在改造，今年下半年要‘立’一种秩序，明年就不‘确’了。农业互助合作也年年在变。过渡时期充满着矛盾和斗争。我们现在的革命斗争，甚至比过去的武装革命斗争还要深刻。这是要把资本主义制度和一切剥削制度彻底埋葬的一场革命。‘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斗争情况的，是妨碍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的。‘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种提法不明确。走向而已，年年走向，一直到十五年还叫走向？走向就是没有达到。这种提法，看起来可以，过细分析，是不妥当的。‘确保私有财产’。

因为中农怕‘冒尖’，怕‘共产’，就有人提出这一口号去安定他们。其实这是不对的。我们提出逐步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比较好。所谓逐步者，共分十五年，一年又有十二个月。走得太快，‘左’了；不走，太右了。要反‘左’反右，逐步过渡，最后全部过渡完。”

这就第一次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的内容作了比较完整的表述。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主席团时的谈话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要经过三个五年计划，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在这个讲话中突出了（1）三个五年；（2）社会主义工业化；（3）基本上完成不等于全部完成。

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审阅周恩来一九五三年八月十一日在全国财经工作会议的结论时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一九四九年三月的党的二中全会的决议里就已提出，并已作了原则性的解决。”

这是经毛泽东审改过的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第一次正式的文字表述。这里强调了（1）过渡时期是指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一段时间；（2）一个相当长的时期，不具体说十年或十五年；（3）国家工业化；（4）总路线的许多方针政策在党的二中全会就已提出并原则解决。

一九五三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在他写的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谈话的要点《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之路》中指出：“至于完成整个过渡时期，即包括基本上完成国家的工业化，基本上完成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则不是三五年所能办到的，而需要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在这个问题上既要反对遥遥无期的思想，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的思想。”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强调“整个过渡时期”包括两个“基本上完成”。如果只是一个“基本上完成”那就只能说是部分过渡时期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关于召开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同陈伯达、廖鲁言的谈话》中指出：“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国有制

扩大——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私人所有制有两种，劳动人民的和资产阶级的，改变为集体所有制和国营（经过公私合营，统一于社会主义），这样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生产力发展了，才能解决供求的矛盾。”

为什么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呢？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国有制的扩大，就意味着国营企业的新建、改建、扩建，也就是国家工业发展了，生产力发展了；二是，私人所有制改变为公有制，才能提高生产力，完成国家工业化。并不是说，总路线就是一个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与计划供应的决议》稿中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即是要在大约三个五年计划内，或者说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将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使我国由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

很明显，这里所谓“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是指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也就是说，总任务完成了，过渡时期结束了，我国也就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了，我们的国家也就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了。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对刘少奇等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领导小组会上的讲话稿的修改中指出：“现在是全党团结起来认真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时候，我们要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改变为一个工业国，我们要对现存的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我们要在大约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基本上完成这个伟大的任务，”“目前在全党执行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即变农业国为社会主义工业国、改造各种非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成分这样一个历史的时机”。这里除了反复强调总路线包括的两个方面的内容，还提出了社会主义工业国、历史的时机的问题。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七日、十三日毛泽东在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提纲的修改中指出：“我们说标志着革命性质的转变、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基本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开始的东西是政权的转变，是国民党反革命政权的灭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

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

这是毛泽东最后确定的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表述与一九五三年八月毛泽东在修改周恩来在全国财经会议的结论中的表述，在文字上略有差别。这里说明：

（1）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的结束和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部分地区（解放区）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到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2）过渡时期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开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结束；（3）总路线和总任务一定要“逐步实现”；（4）要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

经过这样一段时间中央领导集体的酝酿讨论以及全党的宣传学习，一九五四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党中央政治局提出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一九五四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把这条总路线的基本思想，作为国家在过渡时期的总任务载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

三、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相结合的路线，即（1）“一化三改”，主翼同时并进。（2）“三大改造”，逐步和平过渡。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革命转变的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解决了中国革命的转变问题，既成功地实现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转变，又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转变理论：（1）科学地分析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关系，独创了中国的革命转变理论；（2）科学地解决了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转变时期的一系列重大问题：（1）由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在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完成新民主主义建设之后，而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全国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国进入新民主主义社会之后，就开始了；也就是说，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革命的进行，是同时并举的；（2）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是一次单纯地突变过程，而是通过逐步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由部分质变最后完成根本质变，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过程；（3）这一个过程，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大约是

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才能完成。

我国几十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并且对我国当前和今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极其现实的重大指导作用。当然，无庸讳言，这些观点在实践的过程中也遇到不少新情况和新问题：

（1）在时间问题上，“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的提法是比较谨慎，也比较灵活的。当然，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有一个具体的时间概念，这就是他多次强调过的：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长一些。虽然这个时间概念固定了一点，但也仍有一定的灵活性。问题在于，在实践过程中这个时间概念，不是向“更长一些”的方向发展，而是向加速、提前的方向发展，以至只用了几年时间（到一九五六年），就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过渡时期已经基本结束。

（2）在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对现有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全行业的公私合营，对个体农业实行了按村组成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对手工业大部分实行了按行业组成手工业合作社，是不是社会主义改造就“已经基本完成”了呢？抓住有利的历史时机，在私有部门中迅速搭起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但是，搭起架子以后，要建立公有制的新的体制，则是一个更加艰巨、更加漫长的过程。当这个适合的新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以前，已经搭起来的“公有制的架子”不仅是空的，而且是非常不稳固的。在这种情况下，立即宣布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显然过于性急了。

（3）在过渡时期问题上，一个关键问题是什么时候结束的问题。过渡时期的总任务是“一化三改”，按照这个要求，过渡时期的结束应当是在“一化三改”实现之后。然而，总路线的规定中又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似乎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至于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是否实现，则可以忽略不计。这又与总任务相矛盾。如果进一步考察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性质并反作用于生产力。“一化三改”的任务必须、也只能同时实现、同时完成。如果社会主义改造真的基本完成了，那必然也就意味着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基本实现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只要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也就结束了。反过来说，如果国家的社

会主义工业化还没有实现，那必然也就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还没有完成。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如果只有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了，过渡时期就还没有结束。

贰、本节简论

一九七六年以后，围绕过渡时期总路线问题又发生了新的争论。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的关系，比作“主体和两翼”。“主体”和“两翼”是密不可分、互为前提的。实现国家工业化，即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同实现社会主义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这个历史过程的两个方面。在一方面，他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另一方面，他又始终强调社会主义工业化在转变为社会主义中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

“国家工业化正是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奋斗目标。”“毛泽东关于国家工业化的思想，是从总结中国近代历史经验中产生的，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上的。他同“实业救国”论划清了界限，又同民粹主义划清了界限。”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始终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反复思考实现国家工业化的具体步骤。他提出的“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构想，就是指导经济工作和工业建设的行动纲领。为筹划国家工业化，还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毛泽东就指导制定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这是使国家工业化从百年梦想变为现实的第一步，也是具有重大意义的关键一步。”

这些论述非常有力的批驳了一些人长期以来散布的种种错误论调：什么毛泽东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啦，什么以前的社会主义都不懂得发展生产力才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啦，什么毛泽东是民粹主义、离开发展生产力去不断地改变生产关系啦，等等。

社会主义三大改造是由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基础、实质，因此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总路线也可以说就是解决所有制的问题”。

这里有一个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基础问题、所有制的结构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

毛泽东审阅的提纲中有这样一句话：“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一个重要理论观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流行而并不确切的观点。这句话不是毛泽东写的，但他赞成，还作了发挥。在这句话之后，他加写了一段文字：“我们所以必须这样做，是因为只有完成了由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到社会主义所有制的过渡，才利于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向前发展，才利于在技术上起一个革命，把在我国绝大部分社会经济中使用简单的落后的工具农具去工作的情况，改变为使用各类机器直至最先进的机器去工作的情况，借以达到大规模地出产各种工业和农业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着的需要，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确有把握地增强国防力量，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以及最后地巩固人民政权，防止反革命复辟这些目的。”

“这个理论观点，代表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当时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对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所达到的认识水平。根本出发点是为了迅速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了巩固人民政权。但是，认定只有使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即公有制)成为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才能做到这一切，是不符合实际的，尤其不符合中国这个经济十分落后的国家的实际。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

以上的说法，把复杂的理论问题简单化、片面化了。

首先，关于“经济基础”这个概念，在当时的理解是不一致的。一般认为，一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就是指在这个社会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其他不占统治地位的生产关系都不能算作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单一基础”论。另一种意见认为，一个社会存在的所有生产关系都是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这种观点有人称之为“综合基础”论。所以，强调“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并不意味着当时就已经不存在或者不应该有其他的生产关系。

其次，要区别结果和过程。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

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这是就总路线的目标、结果来说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和结果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过程。毛泽东反复强调，一九五六年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只是基本完成了，并没有全部完成。也就是说，除了社会主义公有制以外，还存在私有制的残余部分。毛泽东还特别注意区分“建立社会主义社会”和“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在基本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之后，要建成社会主义社会，除了要实现工业、农业、科技、国防现代化，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外，还需要彻底完成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

再次，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所有制结构的理解，很快就明确起来。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可以允许一定范围的个体的、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存在，并不要求完全“把资本家从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中排挤出去”。

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中，毛泽东就曾提出，应该容许某些领域有个体经济存在。

一九五六年三月，他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撤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曾经设想，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容许一定的私营经济、甚至外资经济的存在。

一九五六年，他在接见工商界代表时指出：要使地下工厂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现在做衣服要三个月，合作工厂作的衣服一长一短，扣子没有扣眼，质量差。最好开私营工厂，同地上的作对，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只搞两年退却就转为进攻，到现在物资还不足。现在国营、合营企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如果有原料，国家投资困难，社会有需要，私人可以开厂。还可以考虑，只要社会需要，地下工厂还可以增加。可以开私人大厂，订条约，十年、二十年不没收。华侨投资的二十年、一百年不要没收。可以搞国营，也可以搞私营。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

一九六四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听取工业交通会议汇报时指出：“在一定的時候，可以让日本人来中国办工厂、开矿，向他们学习技术。”

毛泽东为什么这样讲？

首先，他分析了私营经济存在的几个条件：（1）社会有需要；（2）生产有原料；（3）国家有困难；（4）内外有资金。只要有这些经济条件存在，资本主义经济就会产生，即使政策不允许，它也会利用种种不合法的办法在“地下”产生。

其次，他借鉴了苏联的经验。正如他指出的，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只搞了两年，结束得早了，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根本不容许个体经济、资本主义经济的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可能也是到五十年代，苏联的消费资料仍然严重不足的原因之一。

再次，关键是要打破社会主义社会不容许存在资本主义经济的观念。正如他反复强调指出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的统一，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面，有些现象在一个时期是不可避免的，等它出来以后就有办法了，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有益；究竟它站得住脚还是站不住脚，让实践来判断，不忙去禁止，封锁起来反而危险。当然，最重要的是，像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原来都非常落后的国家，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而发展又极不平衡。容许本国的、华侨的、甚至外国的资本主义的某种存在，对生产力的发展是有益的。

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现阶段，在八十年代以前，全民所有制企业有相对的独立性；人民公社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很不巩固；还存在一定范围内的个体所有制经济。在这种条件下，尽管当时在政策上不允许资本主义性质的私营企业合法存在，可是，它总是非法的、“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

由此可见，说“这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以及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些根本问题上的认识，还很不成熟，还缺乏甚至没有实践经验。这个理论观点作为中国共产党在以后几十年间建设社会主义的一个指导思想，对于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产生了过于求“纯”的消极影响。”是没有根据的、脱离实际的。

问题的关键在于，“可以消灭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这是有条件、有

限制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首要的任务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要地位、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的前提下，在一定范围内允许私有制经济有适当的发展。允许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和发展，其最终目的是利用它们，以便更好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私有制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以后，不仅会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造成一定的冲击，而且对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也会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由于资本主义残余的存在，由于允许私有制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这就有了新的资产阶级产生的一个主要的经济条件。如果允许无限制地发展私有制经济，那么新的资产阶级就会迅猛形成和发展起来。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的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今天中国的实际情况如何？人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不仅出现了百万富翁，而且出现了一大批千万富翁、亿万富翁，形成了一个富翁阶层。社会导致两极分化，就是说，导致了富的越富，贫的越贫。而解决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的生活富裕，则成了一个遥遥无期的问题。至于中国是不是已经产生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则成了某些人极力回避的问题。

更荒谬的是有人至今仍然坚持反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反对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在新中国继续维持“新民主主义制度”。

辛子陵在他的《毛泽东全传》新版序言——《中国的改革开放姓“新”》中说：“人民最大的遗憾是，以一九五三年十二月毛泽东提出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为标志，他抛弃了新民主主义建国理论……急于向社会主义穷过渡。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经济基础。”

“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虽有个别看似正确的语句和观点，但综合起来考察，是一个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其根本错误是严重脱离实际，违背经济规律，主观上想加速生产力的发展，实际上阻碍窒息了生产力的发展，破坏和毁了大批生产力。用人为的制造阶级斗争，不断地变动生产关系（即法律上的财产关系）的办法，对有限的社会财富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所谓‘贫穷社会主义’就是这样造成的。邓小平说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连什么是‘社会主义’都没有搞清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

“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雨后春笋般的私营企业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从这一点来说，《毛泽东传（1949-1976）》对这种错误观点给予了较好的批判。

2011年3月10日修改

第二节 围绕高饶联盟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1953 年发生的高岗事件，是中国共产党在全国执政以后，在党内高层发生的一次严重思想斗争和权力斗争。从 1952 年 8 月 1953 年初，西南局第一书记邓小平，东北局书记高岗，华东局第一书记饶漱石，中南局第三书记邓子恢，西北局第二书记习仲勋先后奉调进京担任党和国家机关的领导职务。其中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高岗为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饶漱石为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邓子恢为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习仲勋为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当时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政务院平行，直属中央人民政府领导，有“经济内阁”之称。因此，高岗的地位和权力之显赫，均在其他几位之上。一时有“五马进京，一马当先”之说。

一、高岗对刘少奇的的批评

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始于建国前夕。

一九四九年四、五月间，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鼓吹“剥削有功”等等，高岗认为这种种非常不恰当。加之，同年五月二十日，原任东北局社会部部长的邹大鹏在听了刘少奇四五月间天津讲话的传达后，给刘少奇写了一封信。大意是说，在东北城市工作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和劳资关系问题上，也如同天津一样存在着“左”的倾向。刘少奇接到信后，于五月三十一日为中央草拟了一个电文，指出：最近邹大鹏有一封信给少奇同志，说我们党在东北对私人资本主义及民族资产阶级的政策，虽然经过长期争论，至今未能正确解决。我们认为这一个问题事关涉党的总路线中十分重要的问题，必须完全正确地迅速地解决。指示强调，在对待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路线，和党的方针政策是在根本上相违反的。据说在东北城市工作中也有这种倾向，望东北局立即加以检讨并纠正。这个电报，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并起草了一个给各中央局的通知，发给了东北局和各中央局。六月二十八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召开的干部大会上再次讲了纠正在对民族资产阶级政策上的“左”倾错误的重要性。这些更加引起了高岗对刘少奇的批评。

与城市资产阶级问题相关联的是农村富农问题。由于东北土改完成较早，农村经济恢复也比较快，于是出现中农尤其是富裕中农不愿继续变工互助，希望单干致富；党员对是否可以雇工单干更是矛盾重重。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东北局和东北人民政府召开有县以上干部参加的农村工作会议，高岗在会上作总结发言，着重强调了搞互助合作，明确指出党员不允许雇工剥削，党员不参加变工组是不对的。会后，东北局组织部就党员是否允许雇工问题向中央组织部请示。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央组织部对东北局关于党员雇工问题的请示作了答复，明确指出：“党员雇工与否，参加变工与否，应有完全的自由，党组织不得强制，其党籍亦不得因此停止或开除。”“在今天农村个体经济基础上，农村资本主义的一定程度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党员向富农发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党员变成富农怎么办的提法，是过早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刘少奇在批发中组部这个答复的同一天晚上，还同安子文等作了谈话。高岗对刘少奇的谈话及中央组织部的答复持批评态度。当年二月，高岗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将他收到的刘少奇谈话记录送交毛泽东。毛泽东将此件批给陈伯达看，明显对刘少奇谈话不满。

关于农村的互助合作问题。高岗起草的《关于东北农村的生产合作互助运动的报告》于一九五一年十月十四日上报中央。高岗在报告中强调，随着中农已成为农村中的多数和农民自发倾向的发展，指导互助合作工作中，反对和防止的主要偏向已不是侵犯中农，而是农民的自发倾向；农民的主要顾虑也不是“怕发展”、“怕归大堆”，而是要求迅速扩大再生产。他提出，对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指导的方针，应该是根据群众的自愿与需要，加以积极扶助与发展，并逐步由低级引向较高级的形式。毛泽东 17 日看了高岗的报告后，十分赞赏，当即批示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伯达、胡乔木，杨尚昆。并指示杨尚昆印成一个小册子，分送各中央分局、各省市区党委，同时发给中央各部门，中央政府各党组，此次到中央会议各同志及到全国委员会的各共产党员。当日，毛泽东还代中央起草了一个转发东北农村生产合作互助运动报告的批语，高度评价了高岗的报告，其中说：“中央认为高岗同志在这个报告中所提出的方针是正确的。一切已经完成了土地改革任务的地区的党委都应研究这个问题，领导农民群众逐步地组成和发展各种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组织”。

高岗在东北局会议上说：他在对待资产阶级政策、农村互助合

作、富农党员等问题上与刘少奇的看法不一致，认为刘少奇的看法是不对的；说他到北京曾和毛主席谈了两个钟头，在他详细陈述了自己的看法以后，毛主席同意了看法，并要他同少奇当面谈一下。

二、高岗在财经会议上批评薄一波 一九五二年下半年，为简化税制，保证说收，经过各大区财政部长会议和第四次全国税务会议的讨论，财政部提出了修正税制的具体方案。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税制若干修正及实行日期的通告》，并配发了题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税制》的社论，阐明了“公私纳税一律平等”的原则。

一九五三年新年刚过，市场出现的剧烈波动和社会上引起的强烈反映，各地省市纷纷向党中央报告情况。一月九日，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向明等人联名写信给党中央，反映执行新税制引起了物价波动、抢购商品、私商观望、思想混乱等情况。一月十一日，北京市委也写信给党中央反映了类似情况。各大区、各省市财委也纷纷写信、打电报给中财委，反映在执行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周恩来、邓小平、陈云、薄一波，指出：“新税制事，中央既未讨论，对各中央局、分局、省市亦未下达通知，匆率发表，毫无准备。此事似已在全国引起波动，不但上海、北京两处而已，究应如何处理，请你们研究告我。此事我看报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无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税制与旧税制比较利害如何？何以因税制而引起物价如此波动？请令主管机关条举告我。”

二月间，在向中央政治局汇报税制修正问题的会上，毛泽东尖锐地批评说：“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修正税制事先没有报告中央，可是找资本家商量了，把资本家看得比党中央还重；这个新税制得到资本家叫好，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

六月，党中央召集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六月十三日，会议正式开始。除听取高岗关于编制五年计划的意见、李富春关于同苏联商谈五年计划体会的报告外，主要是分组进行讨论。

财经会议开过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后，高岗请陶铸到他家吃饭，在饭桌上高岗对他说，这次会议的方针就是要重重地整一下薄一波，“希望大家能勇敢发言”，并要陶铸放头炮。陶铸没有答应。

高岗在与会干部中说，这次财经工作会议不仅要解决财经工作中的路线问题，而且要反对薄一波的“圈圈”。

高岗说：“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他还说：刘少奇在七大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看不起东北的经验，等等。

高岗说：刘少奇在许多重大政策上有偏差，组织上有“圈圈”，说他被调离东北，是刘少奇“调虎离山”，为的是要让刘圈里的人负责东北工作。

高岗说：毛泽东很信任他，仍要他兼东北局书记，并说将来召开党的八大，仍由他兼东北代表团团长。

高岗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有一个圈圈，周恩来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

会上各地方的干部对新税制的批评很多，有人说：新税制错误，是路线性质的错误，中财委存在两条路线斗争，等等。七月十一日，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会议进行的情况。鉴于一个月来一些与会者对新税制意见比较多等原因，毛泽东提议举行领导小组扩大会议，让薄一波在会上作公开检讨，以便大家把意见拿到桌面上来说。

七月十二日晚，周恩来写信给薄一波说：昨夜向主席汇报开会情形，他指示领导小组会议应该扩大举行，使各方面有关同志都能听到你的发言，同时要展开桌面上的斗争，解决问题，不要采取庸俗态度，当面不说背后说，不直说而绕弯子说，不指名说而暗示式说，都是不对的。各方面的批评既然集中在财委的领导和你，你应该更深一层进行检讨自己。

七月十三日下午，举行扩大的第 15 次领导小组会议，周恩来首先指出前一段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说，虽然我们一开始就强调了对人要治病救人，对事要纠正错误，解决问题；但正如毛主席前天所指出的，我们会议中还有一些庸俗化，即对人批评不当面说，而是背后说，不是直说而是绕着弯子说。

随后，薄一波在会上作第一次检讨。

高岗在领导小组扩大会上作了长篇发言。高岗说：薄一波，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抵制党中央和毛主席历来主张的“由个体逐步地向着集体方向发展”的方针，

认为互助合作运动是一种“空想”，他把农村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指望于富农经济的发展。高岗拿出薄一波 1951 年纪念党三十周年发表的《关于加强农村政治思想工作》的文章，针对薄一波说的没有拖拉机，不能搞合作化的观点，指出：那么农民在推翻地主以后，实行集体化以前究竟走什么道路呢？农民把地主斗倒了，取得了土地以后，是有冒尖思想的，几千年的个体经济是农民走的老路。我们能不能引导农民经过互助合作的道路而达到集体化呢？是不是一定要富农雇工呢？农民就是知道“谷物满仓，牛羊满圈，黄金万两”。他们总是想由贫农变成中农，由中农变成富农。他们不知道有新的方向，而我们则应该引导他们向这个新道路上走。 八月三日，邓小平在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发言，他说：大家批评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我赞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我自己就有不少错误，在座的其他同志也不能说没有错误。薄一波同志的错误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两斤，而是一吨两吨。但是，他犯的错误再多，也不能说成是路线错误。把这几年在工作中的这样那样过错说成是路线错误是不对的，我不赞成。

八月六日，在举行的第 29 次扩大的领导小组扩大会议上，陈云说：新税制有两个错误：一是变更了纳税环节，有利于批发商；二是“公私一律平等纳税的”口号，不合适。陈云还说：中财委内部不存在两条路线的问题。

八月十一日晚，周恩来作结论报告。这个报告是经过毛泽东修改和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过的。 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到会讲话：

他再次严厉批评了“公私一律平等”，说新税制发展下去，势必离开马克思列宁主义，离开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向资本主义发展。“薄一波的错误，是资产阶级思想的反映。它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和半社会主义，违背了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

他说：关于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实行合作化的问题，七届二中全会已有决议，但是相当多的同志不注意。薄一波的《加强党在农村中的政治工作》的文章，是违反党的决议的。

他强调：为了保证社会主义事业的成功，必须在中央、大区和省市这三级党政军民领导机关中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倾向，即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必须实行集体领导，反对分散主义。他还特别指：，三月十日中央关于加强政府工作领导的决定，就是为了避免政府各部门脱离党中央领导的危险。全国很多人是靠

无政府状态吃饭。薄一波就是这样的人。他在政治上思想上有些腐化，批评他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性结论，支持了高岗在政治上对薄一波提出的批评。

三、高岗四处游说 虽然，高岗当时批评刘少奇、薄一波是正确的，但是，他也夹带了私心，把财经会议看成自己的胜利。

一九五三年十月，高岗认为形势对自己有利，于是为谋取党中央副主席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进行积极活动。他以休假为名，亲自南下游说。他先到杭州，后到广州。

在杭州，高岗见了林彪。

高岗说：“最近这段时间，北京那边很不平静。刚刚结束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就开得狼烟四起，炮声隆隆。会议狠狠整了一下薄一波，薄一波的新税制有利于资本主义，不利于社会主义。虽然毛主席不让说薄一波犯了路线错误，其实不是路线错误是什么！给他留点面子就是了。可是，薄一波的问题却远不是他薄某一个人的问题，牵扯面很广，他有后台……”

林彪问：“后台是哪个？”

高岗说：“刘少奇！”

林彪又问：“可有根据？”

“当然有！”高岗说，“薄一波的思想，来自少奇。少奇的右，已经不是一次两次，而是一贯如此，屡教不改了。像抗战一结束提出‘和平民主新阶段’呀，像批评东北不该同资产阶级斗争，说有几万‘富农党员’也不怕呀，像批评山西省委不该搞农业生产合作社呀，像跑到天津说资本家‘剥削有功’呀，还有，提出‘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呀，等等，多啦！少奇也有‘左’的时候，像土改提出‘村村点火，处处冒烟’。但他以右为主。总之，他不稳，他是忽‘左’忽右，歪歪扭扭。他在七大上被抬得太高了，几年来的实践证明他并不成熟。他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军事工作和根据地建设的经验，只依靠华北的经验指导全面工作，而看不起东北的经验。你说，他这么个水平，能领导得好吗？”

“我说薄一波的后台是少奇，还有一条根据，”高岗继续说，“他们是一个山头，一个圈圈里的。少奇、彭真、薄一波、林枫、安子文、刘澜涛，他们这些人都是原北方局的，都是搞白区工作的。他们思想上一致，感情上接近，组织上是一条线。所以，我在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的意思。我这个人你了解，就这个脾气，我不讲话则已，要讲就要挖少奇的老底。”

“林总啊，党内现在有严重的斗争。我看最大的一个问题，是党史上的路线、是非没弄清。党内对党史有‘二元

论’，即所谓毛泽东同志代表红区，刘少奇同志代表白区。天无二日嘛。毛泽东同志就不能代表白区啦？白区就不是执行的毛泽东同志的正确路线啦？这不是公然***，抬高刘少奇吗？编党史，要对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加以修改，决议中关于刘少奇是党的正确路线在白区工作中的代表的提法不对头，需要重下定论。白区算什么？不就是在大城市搞搞工运，撒撒传单，贴贴标语，组织组织上街游行和飞行集会吗？靠这个能打败日本鬼子，打败蒋介石？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林总，你我都是搞军队、搞根据地出身。你说，根据地和白区，拿枪杆子冲锋陷阵和搞地下工作，哪个分量重，哪个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大？还不是军队嘛，还不是打仗嘛。这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的嘛。说一千道一万，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军队的党是党的主体。这个，是事实，不服不行！”

林彪说：“有道理，有道理。”

高岗说：“我看，我们党是一分为二的，有红区的党，有白区的党。红区的党也就是军队的党。干部也是一分为二的，有红区的干部，有白区的干部。毛主席是代表红区的，刘少奇是代表白区的。现在党和国家领导机关的权力掌握在‘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白区干部要篡夺党了！……这还了得！所以，党和国家应当彻底改组！”

高岗拿出安子文私拟的政治局委员名单给林彪看，并说：“这份名单，是刘少奇授意安子文搞的。没有你林总，却有薄一波。”

林彪说：“狗胆包天！他们要干什么？！”

“有没有我林彪无所谓，但谁给他们权力这么瞎搞？看来他们真要篡夺党！”

高岗说：“刘少奇长期搞白区，周恩来也在白区搞了很长一段时间。他们一个有圈圈，一个有摊摊。孔夫子说过：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要讲名分，要讲正统的话，中国革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刘少奇、周恩来不是搞圈圈摊摊吗，那好，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朱老总也有这么个意思。毛主席，你林总，还有彭总，我高岗，都是这个大圈圈里的，都是这个正统里的。那就和他们较量较量，看看谁斗得过谁，看看谁笑到最后！”

林彪问“毛主席的态度呢？”

高岗说：“毛主席对刘少奇、周恩来很不满意，他们已经失去主席的信任了。年初主席私下找我谈过两次话，我看得出来。不是自吹，毛主席真正器重和信任的，还是我高岗。当然喽，林总也是主席的一员爱将嘛。财经会议后，中央提出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要改变。具体设想，最高国家行政机关是否采取苏联的部长会议的形式，

党中央是否增设副主席或总书记。另外，主席也在酝酿中央分一线、二线，他想退居二线。斯大林逝世对他刺激很大，他看到马林科夫掌权后撑不起来，每次开会就是敬酒。这都是因为斯大林在世时他没有掌权，没有经受锻炼，一下子接班显得吃力。毛主席高明啊。如果按照毛主席的设想，中央的人事变动可就大啦！”

“毛主席的意思是……”林彪问。高岗说：“毛主席打算让刘少奇搞议会，在外国是议会，在我国准备叫全国人大常委会。让周恩来当部长会议主席，其实也就是现在的政务院总理，政务院有可能改为国务院。而由我来搞政治局。”

高岗又说：“林总，我主张由你来搞政治局，我的水平比你差远了！”林彪轻轻摇头。高岗说：“那，我主张你来搞部长会议。”林彪又轻轻摇头。

高岗说：“林总究竟有何高见呢？”林彪说：“我同意你对形势的分析。无论如何，不能让刘少奇他们掌大权。我对谁都不抱成见，但是非、爱憎还是分明的。彭真、林枫、吕正操，桃园三结义，他们在东北是反对我的。他们背后是刘少奇。”林彪说：“我劝你三点：第一，快刀下面无硬木。既然决定斗，就要下大决心，下狠决心。《红楼梦》上说得好，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绝对没有调和的余地。第二，好把式难唱独角戏。光你一个人蹦跳不行，要注意团结人，找同盟军。第三，也是最重要、最关键的一条，是取得毛主席的支持。常言道，不怕没有理，就怕问官偏哪！要是毛不支持，你还有成功的希望吗？”

林彪又说：“一群牛进院子，总有个带头的。老高啊，现在是你带头，我坚决支持你，做你的后盾。财经会议后形势对你有利，得风便扯篷，要抓紧出击。不是要开八大么，八大军队代表团的组成，我会动点脑子的，保证选票攥在咱们自己人手里，这一点请你放心。”高岗说：“军队进中委的人选，请林总也要关注一下。要不，他们又要乱插手了。”林彪说：“你有没有考虑？我看，你先拿个方案，咱们两个再碰一下。”高岗说：“太好了！就照林总说的办。”“有林总的支持，我心里就有底了。我从杭州还要到广州去，一路上我再吹吹风，造造舆论。”林彪说：“枪杆子，嘴巴子，缺一不可。”高岗说：“对！”

在杭州高岗对陈正人说：毛主席说过“林不如高”，按地位排列，过去是“林高”，现在应该是“高林”了。

还向别人说，中央准备要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要补选一批中央委员，他认为中央应多吸收井冈山和陕北两个地区的干部。

又说毛主席要退居二线，中央将实行几个副主席制，不实行总书记制；说刘少奇不懂经济，说毛对刘不满，不支持刘，毛在财经问题上全靠他高岗，毛准备按排刘少奇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当时苏联的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相当于中国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还说，他在莫斯科时，斯大林就说过，周恩来不会办事，中国这么多人，竟无人可当总理，难道你高岗不能当总理吗？

又说，他去毛主席那里，毛问他谁当部长会议主席合适，他写了一个“林”字（意即林彪），但毛给他写了一个“高”字（意即高岗）。

又说，他向毛主席建议由林彪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但主席不同意。

还说，中央正在开组织工作会议，毛主席对组织部的工作很不满意，他认为应该让某某人去当中央组织部的副部长；

又说，中央准备修党史，他坚决反对党史上的二元论的看法，即：苏区是毛主席领导的，白区是刘少奇领导的。

十一月，高岗到彭德怀的住处，向彭德怀提起刘少奇。

高岗说：“刘少奇的问题，要害是他有个‘摊摊’。这个话我在财经会议时跟有些同志说过。财经会议他支持薄一波，前不久组织工作会议他又死保安子文，就看得更清楚了。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在‘七大’时，刘的‘摊摊’就定了。说刘是白区的代表，这就是说毛主席只是苏区、红军的代表，这还像话吗？他要拿白区和苏区分庭抗礼呢！重庆谈判的时候，毛主席在虎穴 43 天，回延安后身体很不好，不能工作了，那个时候真是危险。” 彭德怀反问一句：“危险什么？” 高岗说：“刘要篡党啊！你还记得不？毛主席临走前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刘代理中共中央主席职务，还决定毛主席为中央军委主席，朱老总、刘、周恩来、你彭总为副主席，刘兼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和中央城市工作部部长，他是大权在握了。一到时候，他就会篡党，取毛而代之。” 彭德怀不同意：“刘对毛是忠诚的。张国焘反毛，王明反毛，刘都坚定地站在毛一边。刘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在‘七大’上对毛的称颂、评价甚高，怎么会取代毛呢？” 高岗摆摆手，连连摇头：“此一时也，彼一时也。说刘忠于毛，

那么‘和平民主新阶段’，是毛主席的意思吗？” 彭德怀承认：“少奇那个讲话，是走了一点火。” 高岗继续反问：“东北富农党员处理，站到富农一边去了，天津讲话，站到资本家一边去了，也是走了一点火吗？” 高岗又接着点燃一支香烟，狠狠连吸几口，然后恨恨地说：“他就是有一摊摊。他把薄一波安排到华北，把饶漱石安排到华东，把林枫安排到东北，把安子文安排到中组部，就是为了到时候篡党！……当然，饶漱石现在已经觉悟了，看出问题来了，和他一刀两断了。” 彭德怀既没有表示赞成，也没有加以反驳。 十一月，高岗又先后找陈云和邓小平。

据陈云说：当毛主席提出他要退居“二线”的时候，高岗估计中央书记处将会对党的总书记或中央副主席的人选进行讨论，并估计刘少奇可能出任总书记或副主席，于是他匆匆忙忙来找陈云，提出他要担任党中央副主席。陈云说，高岗为了找一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主席，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 陈云认为，这件事情最本质地暴露了高岗反对刘少奇的目的。于是，他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 1953 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刘少奇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刘少奇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刘少奇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这样一来，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毛泽东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四、饶漱石与高岗紧密配合

在高岗事件中作积极配合的是饶漱石。 一九五三年二月，饶漱石由华东局调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

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饶漱石说，某某是一个宗派，某某是一个圈圈，刘少奇是这个“圈圈”的支持者。这次财经会议就斗了这个“圈圈”的薄一波，会后还要斗这个“圈圈”的某某人。

当年七月中旬，未经中央同意，饶漱石就在中组部内发动了对副部长安子文的斗争，指责安起草的组织部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报告不真实，说组织部是一潭死水，问题严重，要把它“震动”一下。安子文将这些情况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找饶谈话，不同意他的这种做法，并告诫他要冷静从事，不要再在组织部

内部继续争吵。但饶漱石在组织部两次召开部务会议，继续向安子文开火，斥责安向刘少奇反映情况是“胆大妄为”。

饶漱石七月在财经会议领导小组会议上提出安子文私拟政治局委员名单问题。这件事提出后。刘少奇、周恩来当即向安子文查问此事，并对安子文进行严厉批评。安子文专就此事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并请求中央给予撤销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职务的处分。中央在审查了安子文的检讨以后，指出他这种做法容易引起党内不和，给予党内当面警告处分。

九月，党中央主持召开第二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会议开始不久，饶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中央发觉了饶漱石的活动，提议会议暂停，先举行领导小组会议，解决中组部内部的团结问题。在领导小组会议上，围绕所谓“饶、安的矛盾问题”，刘少奇说：毛主席指示我们把中组部的争论拿到桌面上来解决。他说：中央组织部过去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在工作中是执行了中央的正确路线的。对于中组部工作中的某些缺点和错误，刘少奇承担了责任并在互助合作、富农党员、半工人阶级等三个问题上作了自我批评。

五、毛泽东开始察觉高饶的问题

高岗对刘少奇、薄一波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的批评，毛泽东是支持的。但同时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活动，毛泽东也已有所觉察。财经会议结束后，毛泽东在同参加会议的一些干部谈话时，指出：中级干部北方人多，高级干部南方人多，是历史形成的。这是因为，在早期南方革命运动发展较为普遍，后来革命运动转到北方来了。现在，不管南方干部、北方干部，中级干部、高级干部，都不要有“圈圈”，要消灭“圈圈”。大家都要重视党的团结，消除山头。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中旬，许多同志陆续向中央谈了高岗的一些情况。毛泽东也做了一些调查，找一些同志了解情况。

毛泽东随即派陈云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分裂党的阴谋活动。毛泽东特别嘱咐陈云，到杭州向林彪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林彪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

这样，高岗问题就在小部分高级领导干部中捅开了。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审阅总路线学习和宣传提纲时，加写了一

段话：“集体领导是我们这一类型的党组织的最高原则，它能防止分散主义，它能防止党内个人野心家的非法活动(如像中国的张国焘，苏联的贝利亚)，因此必须特别强调和认真实行党组织的集体领导制度，而决不可以不适当地过分地去强调任何个人的英雄作用，决不可以使共产党员由满腔热情地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高贵品质堕落到资产阶级的卑鄙的个人主义。”

这是第一次在党的广大范围内不指名地批评高岗。

毛泽东还找一些人个别谈话：

十二月十七日，与陈云、邓小平谈话(后加周恩来)。

十八、十九日，与周、陈、邓连续两次谈话。

二十日，与彭德怀、刘伯承、陈毅、贺龙、叶剑英五人谈话；与刘少奇谈话；与周恩来谈话。

二十一日，与朱德谈话；再次与陈毅谈话。

二十二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一系列谈话，都是专门谈高、饶问题。

二十三日，与高岗谈话，对高岗进行批评。当天晚上，召集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开会。

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召开包括高岗、饶漱石在内有二十九人参加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揭露高岗的问题。毛泽东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阳风，烧阳火，一个是以别人为司令的司令部，叫做刮阴风，烧阴火，一股地下水。”提出两个司令部的问题，人们都会掂量出毛泽东这个话的政治分量。

毛泽东提出中央作一个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的建议。中央政治局一致同意毛泽东的建议，并决定起草《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会议决定，由于毛泽东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刘少奇代理毛泽东主持中央工作。当晚，毛泽东等一行，乘火车南下去杭州休息，并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十二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

六、毛泽东建议召开党的七届四中全会

一九五四年一月七日，毛泽东对决定草案作了修改，给刘少奇和书记处写了

一封信。信中说：决议草案已作了修改，使之有根据些和更明确些。参加修改的，有在这里的几位同志。林彪同志亦表示同意。接着，毛泽东建议：此决议似宜召开一次中央全会通过，以示慎重。他说：中委大多数在京，不在京的是少数，召集甚易，加上若干负重要责任的同志参加会议。此议是否可行，请你们考虑。如召开全会，时间以在一月下旬为宜。关于全会的议程，毛泽东认为：议程可有三个：（一）批准三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二）决定于本年内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纲要；（三）通过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毛泽东提议，报告请刘少奇做，事先写好，有四五千字就够了。关于报告的内容，他提出可分三段：第一段，略叙抗美援朝，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恢复经济，过渡时期总路线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一年的成绩等事；第二段，为了讨论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纲要，有必要于本年内召开一次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并述代表已经选出，只待文件准备好，即可召开；第三段，将关于加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的要点加以叙述，请求全会讨论和批准这个决议。毛说：此报告有三五天功夫即可写成，如时间许可，请用有线电发给我一看，如定于一月二十五日开会，则时间完全来得及。关于四中全会的方针，毛泽东明确说明，讨论加强党内团结问题的决议时，不要对任何人开展批评。他在信后专门交待说：全会应发一简单公报，将三项议程公布就可以了，其他都可不公布。“关于第三项议程，应尽可能做到只作正面说明，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

一月七日，毛泽东又另给刘少奇个人写了一封信，要他在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毛说：如各同志同意开全会，于你的报告稿宣读完毕后，似宜接着读你已有准备的自我批评稿，两稿各有一小时左右即够。并说：自我批评稿宜扼要，有三四千字即可，内容宜适当，不可承认并非错误者为错误。如可能，请一并电告我一阅。

一月十六日，刘少奇致电毛泽东，报告四中全会决定在1月30日开会。现将我准备在全会的检讨发上，请予审阅和修改。这个检讨已经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诸同志审阅修改过。其中有几处地方不是检讨，而是辩护，因为有人对这些地方进行过激烈的攻击，稍加辩护，似有必要。但这样也可能引起人家的攻击。如果有人要攻击，就要让人攻一下，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如何？请主席指示。

就在此时，毛泽东收到了高岗写给他的信。

高岗得知他的私下活动，已为中央所了解，表现很慌张。中央政治局开会通过增强党的团结的决定（草案）以后，高岗开始精神沮丧，态度失常，甚至惊恐不安，他拿着决定（草案）对别人说，这个决定与他有关，要别人帮他看看，决定中那些话是针对他说的。又说，他是受了冤枉的。

他给毛泽东写一封信。高岗在给毛泽东的信中表示：他完全拥护和赞成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草案，并说他犯了错误，拟在四中全会上作自我批评，想于会前来杭州，与毛商量此事。

一月二十二日，毛泽东致电刘少奇，说明收到了高岗的来信。他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高所要商量的问题，请少奇和恩来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为解除高岗的思想顾虑，毛再次交待了四中全会的开会方针。他在给刘的电报中说：“关于四中全会开会的方针，除文件表示者外，对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评均表欢迎，但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批评，以便等候犯错误同志的觉悟。这一点我在一月七日致你和书记处各同志的信中已说到了。如你们同意这个方针，就请你们据此和到会同志事先商谈，并和高岗同志商谈他所要商谈的问题。”毛还专门交待说：此电请送高岗同志一阅，我就不另复信了。一月二十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找高岗谈话。高岗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李富春就自己的问题作了检讨和解释。

二月三日，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一起，找饶漱石谈话。

二月五日，刘少奇约周恩来、邓小平一起，再次找高岗谈话。

二月六日至十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出席全会的正式中央委员 35 人，候补中央委员 26 人，因病因事缺席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 9 人。列席全会的党、政、军和人民团体的负责人 52 人。毛泽东在杭州休假未出席这次中央全会。

刘少奇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会议并向全会报告中央政治局的工作。接着就有关增强党的团结问题作了长篇说明：

朱德、周恩来、陈云、邓小平等 44 人在全会上作了发言。

朱德批驳了所谓“党是军队创造的”谬论，强调指出：军队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建设和发展起来的，是在党的领导之下战胜敌人的。党是军队的领导者，军队是党发展革命和巩固革命胜利的工具。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军队。全军每一个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都要忠实服从党的领导，成为党和人民的工

具。周恩来指出：要反对把自己领导的地区和部门当做独立王国，反对把个人放在组织之上，反对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本位主义等等，要特别着重地反对党内一部分干部首先是高级干部中滋长着的极端危险的骄傲情绪，以避免这样的干部一步一步地发展成为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家，或被这种野心家所利用。

陈云说：保障党的团结，防止党的分裂，其责任主要是在高级领导人员。我党是经过几次分裂的。张国焘等人都搞过分裂活动，使革命受到很大的损失。但是，我们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取得了胜利。现在四中全会重新提出一个决议草案，号召增强党的团结，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说，张国焘这样的野心人物是可能出现的。在胜利了的国家里头，有电影，有照片，开会时热烈鼓掌，阅兵时可威风啦。火车站欢迎的时候，送鲜花，夹道欢呼。物质享受是很具备的，很可以腐化。从前在瑞金、延安时，想腐化也很难，现在腐化很容易。我们对于执政以后党内的状况是不能盲目乐观的。我们不能保证不出野心人物，但是我们可以想办法使乱子不闹大。出了野心人物的时候，乱子闹得大不大，我看关键是在几百个高级领导人，首先是在座诸公，穿黄衣服的，穿黑衣服的，党头、政头、军头这几百个人。如果出了野心人物，能否迅速地把他们揭露，不闹成大乱子呢？那也决定于这几百个人。只要这几百个人头脑十分清醒，革命胜利就会有保证。他最后强调：我们要严守党的制度和党规党法，发扬党的优良作风，那党就有保证了。靠别的，我看都靠不住，要靠我们自己。全会经过认真讨论，完全同意刘少奇的报告，一致通过了《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

这样，在七届四中全会上，实际上就把高岗的问题端了出来，明确点出了高岗问题的性质是分裂党、是个人主义野心家。

在四中全会上，高岗、饶漱石也作了自我批评。二月十日，是四中全会的最后一天，刘少奇对会议作了结论，然后对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了自我批评：

七、四中全会后召开的有关高、饶问题的座谈会 四中全会结束以后，中央书记处决定分别召开高岗问题和饶漱石问题两个座谈会，进一步揭发他们的错误事实。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北京举行高岗问题座谈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

十五日，高岗在会上作了检讨。

十六日，周受刘少奇的委托，在会上转告了刘少奇对高岗 15 日检讨的意见，并介绍了高岗进行分裂活动的有关事实。

会上有 43 人作了发言，尤其是陈云发言中证明高岗向他活动要当党中央副主席一事，高岗甚为惊恐。

十七日，会议进行到第三天，高岗在住处开枪自杀（未遂）。

十七日晚，刘少奇先后主持中央书记处和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本日午后，高岗自杀未遂的情况和对高的紧急处置办法。政治局会议批准了周恩来提出的各项办法。二十五日，周恩来在座谈会上发言：

他说：在这次关于高岗问题的座谈会上根据高岗的发言及其自杀未遂的行为，并综合 43 位同志的发言及其所揭发的材料，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认识，即高岗的极端个人主义错误已经发展到进行分裂党的阴谋活动，以图实现其夺取党和国家领导权力的个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图失败以后，他就走上自绝于党和人民的绝望的自杀道路。周恩来列举了高岗分裂党的活动的主要表现是：

- 一、在党内散布所谓“枪杆子上出党”、“党是军队创造的”，以制造“军党论”的荒谬理论，作为分裂党和夺取领导权力的工具。
- 二、进行宗派活动，反对中央领导同志。从 1949 年起，高岗即将中央领导同志的某些个别的缺点和错误有计划地向不少人传播，后来更将这些个别的一时的而且已经改正的缺点和错误说成是系统的错误，到处传播，有的更抄成档案，作为攻击材料；同时，加上种种无中生有的造谣诽谤。
- 三、造谣挑拨，利用各种空隙，制造党内不和。
- 四、实行派别性的干部政策，破坏党的团结，尤其是对干部私自许愿封官，以扩大自己的影响和企图骗取别人的信任。
- 五、把自己所领导的地区看作个人资本和独立王国。
- 六、假借中央名义，破坏中央威信。
- 七、剽窃别人文稿，抬高自己，蒙蔽中央。
- 八、在中苏关系上拨弄是非，不利中苏团结。
- 九、进行夺取党和国家权位的阴谋活动。

高岗假装举着毛泽东的旗帜，伪造毛泽东同志的言谈，积极反对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刘少奇、周恩来），假装推戴另外两个中央领导同志（注：陈云、邓小平），同时提出自己作为党中央副主席的要求。正是在这个问题上，高岗的一切阴谋的本质便被最尖锐地暴露出来了。除了上述分裂党和夺取权力的阴谋活动以外，根据大家揭露，高岗的私生活也是腐化的。周恩来指

出，从以上所举高岗的主要活动来看，高岗是如何卑鄙地从一个共产党员的二十多年革命生活中堕落到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泥坑里去，是如何卑鄙地企图按照他自己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面貌来改造我们党和国家。他进而分析说，高岗之所以进行分裂党和企图夺取党和国家权力的阴谋，是有其深刻根源的。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和私生活的腐化却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他的严重的罪恶的活动如非中央及时地加以发觉和坚决有力的制止，就可能使党和人民事业遭受重大损失。最后，周恩来结论说，高岗的罪恶已经勾销了他对革命斗争所曾作过的局部的贡献，证明他过去参加革命斗争的动机是不纯的。在他身上，资产阶级的个人野心完全压倒了他所必须具有的为人民服务的始终不渝的耿耿忠心。二月二十八日，毛泽东给刘少奇并书记处的信中说：恩来同志二月二十五日的发言提纲经胡乔木、陈伯达二同志作了一些修改，我同意这些修改，请你们考虑酌定。在周的发言提纲中讲到高岗的个人主义黑暗一面处，毛泽东亲笔加上：“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虽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但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高岗的这种黑暗面的发展，使他一步一步地变成为资产阶级在我们党内的实际代理人。高岗在最近时期的反党行为，就是他的黑暗面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也就是资产阶级在过渡时期企图分裂、破坏和腐蚀我们党的一种反映。”

三月一日，中央政治局批准了周恩来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

三月三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周恩来的《发言提纲》作为向地委书记和解放军军党委以上作口头传达时的材料。三月二十六日至四月二十五日，东北局召开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

周恩来受中央委托在会上作关于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决议和高岗、饶漱石问题

以及初步结论的传达报告。周恩来详细介绍了高、饶进行反党分裂活动的主要事实，批判了高岗的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并明确说明：高岗的错误已经不是普通的政治、思想、组织错误，也不是党内严重的路线错误，他已走上分裂党、反对党的道路，变成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与会同志表示：“坚决拥护七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刘少奇同志受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委托在全会上所作的报告”；严肃、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高岗反党反中央的活动。

林枫、罗瑞卿等在会上作了发言。

林枫根据会上揭露的事实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是党的叛徒，人民的公敌，他的滔天罪行，实为党纪国法所不容。”

四月二十四日，会议通过《东北地区党的高级干部会议关于拥护七届四中全会和讨论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决议》。

四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这个决议。

四月二十九日，高岗写了《我的反省》，说他在全国财经会议上的发言，“除批评薄一波同志外，还有指桑骂槐说少奇同志的意思”，目的就是“企图把少奇同志拉下来，使自己成为主席唯一的助手，准备自己将来做领袖”。但他表示对四中全会的结论有不同意见。

五月四日，中央将东北地区决议和林枫、罗瑞卿在会上的发言批发各中央局和省、军级以上党委。

八月十七日，高岗在东交民巷 8 号他的住处吞服大量安眠药，再次自杀身亡。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中央委托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召开饶漱石问题座谈会。座谈会共开了七次。到会的有华东在京干部与调京干部及中央各部与饶工作有关的同志 26 人。主要是对证饶所犯错误的事实；听取饶的自我批评。

饶漱石在 2 月 23 日的检讨中，只承认对刘少奇有不尊重，并没有反对刘少奇的问题；只是客观上与高岗反刘一致，并无实际上的联系。他说：过去和现在，在方针、路线、思想、政策、组织原则等问题上，我对刘少奇从未有过任何怀疑或有过任何不同意见。而只有当我的个人主义和宗派主义情绪向上发展的时候，在对个别同志的看法上，我同刘少奇在一个时期内有过个别的不同

的意见。这就是在对彭真、薄一波及去年以来对安子文看法上，我与少奇有过不同的意见，由对他不尊重发展到公开对他表示不满。在张秀山发言的问题上，我又在客观上给人以支持张秀山来反对少奇印象。而恰恰在对彭真、薄一波、安子文这几个同志有宗派主义成见这一点上，我与高岗是一致的；我在处理组织部问题上曾经对刘少奇不尊重，在个别场合甚至发展到对刘少奇感情用事，蛮横无理的地步，这又恰恰与高岗反对刘少奇的宗派活动不谋而合。由此而引起许多同志对我的猜测，以为我是全面反对刘少奇；以为我是反安为名，反刘是实；以为我对刘少奇的态度与高岗反刘的宗派活动必然有其密切联系；以为我为先锋，高在幕后；甚至有个别同志以为我在这个问题上存有什么重大政治野心。我请求中央据实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结论。

陈毅在当天的发言中揭露说：在四中全会之前，我到饶漱石家和他谈了七个多钟头，他亲自对我讲，他有两种投机：一种是投主席之机，因为他错误地认为少奇的威望降低了，少奇跟主席的关系不好，他要向主席表示他不是刘少奇的干部，因此以种种行为和言论反对刘少奇；又一种是投高岗之机，他看到高岗的威望高能力强、高反刘，因此就处处设法反刘向高岗表示态度。陈毅说：如果饶能这样检讨，三分钟就解决了问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不讲了，把投机和野心安在一个次要问题上。在这次十天的座谈会上，凡是接触到这个本质的问题，就竭力辩护。陈毅指出，饶正是出于投机，所以当高岗进行反对刘少奇时，饶忙于抢先，首先发难，进行投机，这是铁的事实。

座谈会为证了 1953 年 2 月饶调任中央组织部以后，为了一步一步取得更高权位的目的，在党内积极进行挑拨离间的重要事实。联系饶历史上多次在党内争权夺位的错误事实，座谈会的结论是：饶漱石是一个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野心家，他的个人主义野心家的欲望是日益上升的，而最尖锐的罪恶，是 1953 年他和高岗共同进行分裂党的活动。并认为，饶在会上对自己的错误，仍采取不彻底承认的态度。座谈会要求饶对自己的错误作深刻反省，并向中央作彻底交待

三月十五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批准了邓小平、陈毅、谭震林关于饶漱石问题座谈会的报告。

八、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对高、饶的结论 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至三十一日，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毛泽东在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教训，全党应该引以为鉴戒，务必使党内不要

重复出现这样的事件。高岗、饶漱石在党内玩弄阴谋，进行秘密活动，在同志背后进行挑拨离间，但在公开场合则把他们的活动伪装起来。我们是共产党人，更不待说是党的高级干部，在政治上都要光明磊落，应该随时公开说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对于每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表示自己或者赞成或者反对的态度，而绝对不可以学高岗、饶漱石那样玩弄阴谋手段。

邓小平在会上作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

与会的发言者一致主张开除高岗、饶漱石两人的党籍。会议最后一天，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指出：“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听取了邓小平同志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对中央政治局在中央委员会第七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问题所采取的措施，一致表示同意。”在列举了高、饶的反党主要事实之后，《决议》指出：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特点就是他们始终没有在任何党的组织或任何党的会议上或公众中公开提出过任何反对党中央的纲领，他们的唯一纲领就是以阴谋手段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他们在党的组织和党的会议面前竭力掩藏自己的真正面貌，而在进行阴谋活动的时候，也是随时随地变幻自己的手法。他们是在目前阶级斗争的特殊环境中在党内产生的企图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力的毫无原则的阴谋集团。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一致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至此，反对高岗、饶漱石的斗争宣告结束。

贰、本节简论

近年来，高岗饶漱石事件又成了一个热点。

2006年6月，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了《高岗饶漱石事件始末》（马畏安著），。

2007年8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死亡联盟——高饶事件始末》（张聿温著）。

《中国老年》2007年6月号发表了卓成华、西川的报导《李力群：我只想有一个安稳的家》。2007年12月，美国之音播送系列深度采访，请高岗的

遗孀李力群讲述往事，请高瑜、宋永毅等人发表看法。

2008 年 7 月，香港出版了高岗当年秘书赵家梁和高岗当年部下张明远的女儿张晓霁合著的《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北京》（大风出版社）。

史鉴主编的《高岗“反党”真相》（香港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在这些出版物中，前两种基本上坚持了当年中央的有关决议；后两种则是翻案之作。

翻案者认为：

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但认定高岗“反党”、“分裂党”、“阴谋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则牵强附会，背离事实。撇开高岗思想和工作上的缺点、错误以及生活劣迹而言，说到底，高岗不过是毛主席为推行“左”倾思想政治路线、维护绝对权威而施展权术策动“党内斗争”的一个打手和牺牲品。这，就是所谓“高岗事件”的历史真相。

当年，毛主席先是向高岗放出口风，表示对刘少奇和周恩来“右倾”的不满，打算利用高敲打甚至替代刘周；后又发现高活动频繁、拉帮结派、野心膨胀，加之观察到陈云、邓小平等核心领导人并不赞同“倒刘换周”，于是权衡利弊，平衡派系势力，决定抛出高岗进行批判，但留有很大余地。

毛主席支持反高岗是一个重大失误；它使得以后刘少奇宗派得以坐大，刘少奇的右倾思想不断膨胀，以至到一九六六年不得不发动文化大革命“炮打司令部”。

从这些言论可以看出：翻案者是站在反毛的立场上，完全歪曲了斗争的过程和事物的本质。

翻案者也不得不承认：批判高岗“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理所当然，符合事实。

毛主席是怎样指导这场斗争的呢？

一九五四年二月，召开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关于加强团结的决议，在会上不对任何人进行批评。并指示刘少奇在会上作自我批评。但是，高岗在会上对自己“搞派别活动”、“有个人野心”、“生活腐化”等问题，不作自我批评。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决定分别召开两个座谈会，对高岗、饶漱石的问题进

行“公开揭露”。

在座谈会进行过程中，二月十七日，高岗在家中开枪自杀未遂，实际以此表示与党对抗。

根据这种情况，毛主席决定对高岗进行管教，并暂停他的一切职务。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七日，高岗吞服大量安眠药自杀身亡。

毛主席得知这个消息后说：

遗憾，终于留不住他……他这个人，斗争性太强，性格过于刚烈。高岗是自绝于党，但党内斗争死了人，总是不好。高岗的死，我也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对高岗不是彻底打倒，还要让他继续工作，让他当个省委副书记。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同习讲，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他的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他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还没来得及讲……如此结局，我也觉得遗憾。这事怪我啊！告诉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一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开幕词中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出现，不是偶然的现像，它是我国现阶段激烈阶级斗争的一种尖锐的表现。这个反党联盟的罪恶目的，是要分裂我们的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而为反革命的复辟开辟道路。全党在中央委员会团结一致的领导下，已经把这个反党联盟彻底地粉碎了，我们的党因此更加团结起来和巩固起来了。这是我们在为社会主义事业而奋斗中的一个重大的胜利。”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十一日，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开除反党阴谋的首脑和死不悔悟的叛徒高岗的党籍，开除反党阴谋的另一名首脑饶漱石的党籍，并撤销他们的党内外各项职务。

由以上过程可以看出：

第一，毛主席对高岗有正确全面的评价。一方面，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高岗有其正确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党的信任；另一方面，他的个人主义思想（突出地表现于当顺利时骄傲自满，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时，则患得患失，泄气动摇）和私生活的腐化欲长期没有得到纠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国胜利后更大大发展了，这就是他的黑暗的一面。既没有全盘地肯定他，也没有全盘地否

定他。因而，事前，不可能设想由他来接班当第二把手；事后，也没有想要整垮他。

第二，毛主席对党内斗争是坚持原则的。一方面，对党内出现的“左”或右的错误思想倾向，要展开批评，进行纠正；另一方面，也不允许利用党内的正常斗争进行非组织的活动，以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所谓利用高岗整刘少奇、周恩来，看到形势不对又抛弃高岗，完全是无稽之谈。

第三，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定性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政党，与资产阶级的政党根本不同，它实行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允许在党内进行非组织的活动。高岗在党内抱着个人野心，进行派别活动，制造“军党论”，把共产党分成“红区党”和“白区党”，拉拢一些“红区党”的人，打击、排挤一些“白区党”的人，以达到自己获取更高、更大的权力的目的。这种行为，从政治上来说，当然是“分裂我们党，用阴谋方法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是“反党行为”？

第四，毛主席对高岗问题的处理是适度的。首先是启发他作自我批评，然后才公开揭露，第一次自杀以后才对他进行管教，并考虑保留他的党籍、保留中央委员、委派到陕西省担任省委副书记。只是在他第二次自杀以后，犯了众怒，才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第五，毛主席并没有因高岗的问题而忽视另外一种倾向。1955年批评合作化中右倾思想，1956年批评修正主义思潮，1957年反右派，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先反“左”后反右，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1964年提出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1965年提出党中央出修正主义的问题。不能因为以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思想继续发展了，就反过来说批评高岗搞错了。在党内的斗争中，有什么错误就反什么错误，一个时期只能抓住一种主要的错误倾向。但不因此就忽视其他的错误倾向。

第六，在开展反高饶斗争过程中有人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一棍子打死。在东北高干会议上林枫作结论说：高岗已经成为了人民公敌。这就把高岗问题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了。邓小平在全国代表会议上作的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报告中，称高岗为“可耻的叛徒”，对高、饶有全盘否定的倾向。

2011 年 3 月 28 日修改

第三节 围绕农业合作化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党中央做出了第一个先向地方党组织发布并且在各地试行的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草案。到一九五三年底，农业生产合作社已经发展到一万四千多个。

一、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五日，中共中央召开了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

毛泽东在会前和会中两次同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的负责人邓子恢等谈话。

他在十月十五日的谈话中指出：“各级农村工作部要把互助合作这件事看作极为重要的事，个体农民，增产有限，必须发展互助合作。对于农村的阵地，社会主义如果不去占领，资本主义必然会去占领，难道可以说既不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吗？资本主义道路可以增产，但时间要长，而且是痛苦的道路。我们不搞资本主义，这是定了的。如果不搞社会主义，那资本主义势必泛滥起来。”“‘确保私有财产’，‘四大自由’，都是有利富农和富裕中农的。”“是个体所有制，还是集体所有制？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还是社会主义所有制？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合作社有低的，土地入股；有高的，土地归公，归合作社之公。”

他在十一月四日的谈话中指出：“要搞社会主义。‘确保私有’是资产阶级观念。‘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言不及义’就是言不及社会主义，不搞社会主义。搞农贷，发救济粮，依率计征，依法减免，兴修小型水利，打井开渠，深耕密植，合理施肥，推广新式步犁、水车、喷雾器、农药，等等，这些都是好事。但是不靠社会主义，只在小农经济基础上搞这一套，那就是对农民行小惠。这些好事跟总路线、社会主义联系起来，那就不同了，就不是小惠了。必须搞社会主义，使这些好事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至于‘确保私有’，‘四大自由’，那更是小惠了，而且是惠及富农和富裕中农。不靠社会主义，想从小农经济做文章，靠在个体经济基础上行小惠，而希望大增产粮食，解决粮食

问题，解决国计民生的大计，那真是‘难矣哉’！有句古语，‘纲举目张’。拿起纲，目才能张，纲就是主题。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并且逐步解决这个矛盾，这就是主题，就是纲。提起了这个纲，各项帮助农民的政治工作，经济工作，一切就有了统属了。”很明显，这些批评主要是针对邓子恢的思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六日，党中央正式发布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决议。

一九五四年秋季，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十万个（原计划发展到三万五千八百个）。

一九五五年六月，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六十五万个（较计划数字超过五万个），入社农户共有一千六百九十万户，平均每个社二十六户。

这些合作社，大部分是在北方几个解放较早的省份。在全国大多数解放较晚的省份中，每省都已经建立了一批农业生产合作社，安徽、浙江两省建立的较多些，但是其他各省建立的数目还不是很多。这些合作社，一般是小型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的大型社，每社有七、八十户，有的一百多户，有的达几百户。这些合作社，一般地是半社会主义的；但是其中也有少数发展成了社会主义的高级社。

二、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一九五五年春节，党中央决定，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一百万个。这个数字同原有的六十五万个比较，只增加三十五万个，即增加半倍多一点。毛泽东觉得似乎少了一点。可能需要比原有的六十五万个社增加一倍左右，即增加到一百三十万个左右的合作社，使全国二十几万个乡，除了某些边疆地区以外，每乡都有一个至几个小型的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作榜样。由一九五五年八月至一九五六年十月共有十四个月，完成这样一个建社计划应当是可能的。

可是，有人说，去年的五十万个合作社的计划太大了，冒进了，今年的三十五万个合作社的计划也太大了，也冒进了。他们怀疑建立这样多的合作社不能巩固。

一九五五年七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

在这个报告中，他指出：“在全国农村中，新的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高潮就要到来。我们的某些同志却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说：快了，走快了。过多的评头品足，不适当的埋怨，无穷的忧虑，数不尽

的清规戒律，以为这是指导农村中社会主义群众运动的正确方针。否，这不是正确的方针，这是错误的方针。

目前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有的地方已经到来，全国也即将到来。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义。我们应当积极地热情地去领导这个运动，而不是用各种办法去拉它向后退。运动中免不了要出些偏差，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不难纠正的。干部中和农民中存在的缺点或错误，只要我们去积极地去帮助他们，就会克服或纠正。干部和农民是在党的领导之下前进的，运动基本上是健康的。在有些地方，他们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例如，一方面排斥贫农入社，不照顾贫农的困难；另一方面又强迫富裕中农入社，侵犯他们的利益。这些都应该向他们去进行教育，加以纠正，而不简单地去进行斥责。简单地斥责是不能解决问题的。要大胆指导运动，不要前怕龙，后怕虎。干部和农民在自己的斗争经验中将改造他们自己。要让他们做，在做的中间得到教训，增长才干。这样，大批的优秀人物就会产生。前怕龙后怕虎的态度不能造就干部。

总之，领导不应当落在群众运动的后头，而现在的情况，正是群众运动走在领导的前头，领导赶不上运动。这种情况必须改变。”

问题是：建立这样多农业生产合作社，究竟能不能巩固？毛泽东回答说：“当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要将大约一亿一千万农户由个体经营改变为集体经营，并且进而完成农业的技术改革，确有很多的困难；但是我们应当相信，我们党是能够领导群众克服这些困难的。就农业合作化问题来说，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1）贫农、新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和老中农中间的下中农，因为他们的经济地位困难（贫农），或者他们的经济地位虽然比较解放以前有所改善，但是仍然不富裕（下中农）因此，他们是有一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性的，他们是积极地响应党的合作化号召的，特别是他们中间的觉悟较高的分子，这种积极性更大。我认为我们应当相信：（2）党是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我们党已经胜利地领导了一个伟大的人民民主革命，建立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也就一定能够领导全国人民，在大约三个五年的时间内，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在农业方面，也同其他方面一样，我们已经有了足以说服人的

有力量的证据。

我们应当相信群众，我们应当相信党，这是两条根本的原理。如果怀疑这两条原理，那就什么事情也做不成了。”

毛泽东在这个报告中还从多方面论证了发展和巩固农村合作化运动的问题。这是一篇领导中国农村、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经典文献。

一九五五年九月七日，毛泽东同志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农业合作化必须依靠党团员和贫农下中农》：这个指示解决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即依靠谁的问题。土地改革以后，贫农的数量减少，中农的数量增加，依靠贫农的方针还能执行吗？毛泽东指出：依靠贫农应该包括新老下中农。

三、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的讲话

一九五五年十月，中共中央举行第七届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是一场很大的辩论。这是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期间，关于党的路线是不是完全正确这样一个问题的大辩论。这场全党性的大辩论，是从农业合作化的方针问题引起的，讨论也集中在这个问题上。但是，这场辩论牵涉的面很广，牵涉到农业、工业、交通、运输、财政、金融、贸易、文化、教育、科学、卫生等部门的工作，牵涉到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牵涉到镇压反革命，还牵涉到军队，牵涉到外交，总之牵涉到党政军民各方面的工作。这次大辩论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从总路线发布以来，在党内还没有这样一次辩论。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对会议的辩论作了总结：《农业合作化的一场辩论和当前的阶级斗争》。

这篇讲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农业合作化和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关系

只有在农业彻底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过程中，工人阶级同农民的联盟在新的基础上，就是在社会主义的基础上，逐步巩固起来，才能够彻底地割断城市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联系，才能够彻底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才便于我们彻底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目的，是要在农村这个最广阔的

土地上根绝资本主义的来源。

这是利用同资产阶级的联盟，来克服农民的惜售。同时，我们依靠同农民的联盟，取得粮食和工业原料去制资产阶级。这就把资产阶级要搞自由市场、自由取得原料、自由销售工业产品这一条资本主义道路制住了，并且在政治上使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便于最后消灭资本主义。我们的目的就是要使资本主义绝种，要使它地球上绝种，变成历史的东西。

在这个十五年的期间内，国际国内的阶级斗争会是很紧张的。我们已经看见是很紧张的。使过去一年国内的阶级斗争来说，我们主要做了四件事：一个是进行反唯心论的斗争，一个是镇压反革命，一个是解决粮食的问题，一个是解决农业合作化的问题。在这四个问题上的斗争，都带着对资产阶级作斗争的性质，给了资产阶级以严重的打击，并且在继续给他们以粉碎性的打击。

(2) 在合作化问题上争论的总结

这次讨论中，解决了在几个月以前很多人还是不明了的许多问题：

- 1， 是大发展好还是小发展好的问题。
- 2， 晚解放区能不能发展的的问题，山区、落后乡、灾区能不能发展的的问题。
- 3， 少数民族地区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 4， 没有资金，没有大车，没有牛，没有富裕中农参加，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 5， 办社容易巩固难的问题。
- 6， 没有农业机器能不能办社的问题。
- 7， 办得坏的社是不是都要解散的问题。
- 8， 所谓不赶快下马，就要破坏工农联盟的问题。
- 9， 所谓耕牛死亡，罪在合作社的问题。
- 10， 所谓农村紧张根本由于合作社办得太多的问题。
- 11， 所谓合作社只有三年优越性的问题。
- 12， 应不应当在最近办一些高级社的问题。
- 13， 所谓木帆船、兽力车不能办合作社的问题。

(3) 关于全面规划、加强领导的问题

太慢了不好，太急了也不好，太慢太急都是机会主义。机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慢机会主义，一种是急机会主义。必须注意防“左”。防“左”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机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说要“左”倾，“左”倾机会主义不是马克思主义。

要比质量，比规格。重点是比质量。质量的标准就是要增加生产和不死牲口。要讲全面规划问题，经营管理的问题，领导方法的问题。要讲有些什么好办法，可以使合作社办得又快又多又好。就是说要讲质量问题。

(4) 关于思想斗争

历来的经验说明一条：思想斗争必须中肯。就是要思想交锋。思想不交锋，就缺乏明确性和彻底性，这个不好。

关于犯错误的同志，一条，他本人愿意革命；再一条，别人也要准许他继续革命。

历史经验证明：犯教条主义错误和经验主义错误的人，绝大多数是能够改正的。这要两条：一要有严肃的批评，一方面要有宽大的态度。

中央农村工作部的一部分同志，首先是邓子恢同志犯了错误。他这一次所犯的错误的性质属于右倾的性质，属于经验主义性质的错误。

过去邓子恢同志有过依靠商人（就是依靠资产阶级）和“四大自由”这种纲领性的提法，那是错误的，确实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纲领，资本主义性质的纲领，不是无产阶级性质的纲领，是违背七届二中全会限制资产阶级的决定的。一直到一九五三年还是言不及社会主义，好行四大自由之小惠。

还有一些同志老是喜欢分散主义，闹独立性，甚至闹独立王国，觉得独裁很有味道。无产阶级、共产党也要搞阶级独裁，如果搞个人独裁，那就不好。

不去接触干部，不去接触群众，就嗅不到政治气候。事物已经大量地普遍存在，还看不见，那就太迟钝了。

(5) 若干其他问题

什么叫“左”右倾？事物在时间中运动，到那个时候该办了，就要办，你不准办，就叫右倾；还没有到时候，你要勉强办，就叫“左”倾。

是不是有发生“左”倾错误的可能？完全可能。不加强领导，就一定会出现严重的“左”倾错误。在适当的时机压缩一下人们的脑筋，使这个脑筋不要过于

膨胀，是必要的。

会不会有人翻案？想翻案的人不少。他们认为合作社搞不成器，我们搞的这一套将来统统要翻，说我们并非马克思主义，而是机会主义。但是，据我看，大势所趋，这个案是翻不了的。

将来的趋势如何？在五十年到七十五年这个期间内，国际、国内、党内一定会发生许多严重的复杂的冲突和斗争，我们一定会遇到许多困难。按照我们的经验，一定会有，不是很少，而是许多。这里面包括打世界大战，在我们头上甩原子弹，出贝利亚，出高岗，出张国焘、陈独秀。有许多事现在没有法子料到的。但是，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可以肯定，一切困难是可以克服的，一定会出现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

到一九五六年底，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全国农户总数的 96.3% 其中参加高级社的农户达到全国农户总数的 87.8%。

不能否认，在批判右倾思想的政治压力下，有一些地方的领导人不顾实际情况盲目地发展，使一些建立起来的合作社存在不少问题。但是，总的来说，由于我们党抓住了当时有利的革命时机，在党的领导下，形成的这种农业合作化的社会主义高潮，是健康的。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当时错过了这一时机，在一九五六年以后，国际国内的形势发生变化，社会主义改造将遇到很大的困难。

经过几年的工作，到一九五六年一月底，全国五十多个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集中的大中城市都相继宣布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 99%，私营商业户数的 82.9% 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

一九五六年，中国的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农民、手工业者劳动群众个体所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公有制，资本家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上转变成为公私合营的国家资本主义所有制。

贰、本节简论

关于三大改造问题上的两条路线斗争，一直延续到今天。

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对毛泽东指导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思想，叙

述基本上是正确的；对一九五〇年至一九五六年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基本上也是肯定的。这与那些全盘否定我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极右分子，是有根本区别的。但是，这种肯定是有局限的。在内容上，它肯定的仅仅是互助组、初级农业社；在时间上，它肯定的是一九五五年五月以前的合作化。

关于一九五五年七月毛泽东作的《关于农业合作化的报告》，它说：“由于这个报告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批判‘右倾’，把提出不同意见、主张在推进农业合作化的实际步骤和计划上更稳当一些的邓子恢等，说成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这样一来，党内正常的意见分歧被归结为方针路线之争，认识上的不同看法变成阶级立场问题。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下，不同意见就很难再发表，关于用十八年的时间完成农业合作化的进程，实行起来势必要打乱；关于合作化由互助组到初级社再到高级社这种逐步发展的步骤，也难以保证实施。”

对于报告中毛泽东提出的注意反“左”的指示，它说：“这些话是正确的，就毛泽东的主观愿望来说，很希望这些话能够引起各级领导的注意，以保证合作化运动健康发展而不发生重大偏差。但是，在反‘右倾’的巨大政治压力下，在群众运动大发动的情况下，这些话的分量和实效被大大地削弱了，冲淡了，甚至就不算数了，大家的注意力没有放在这一方面，而是一味求快，甚至脱离实际条件去求快，以致带来许多原来没有料想到的问题。后来的事实证明了一点。”对于广大干部积极拥护毛泽东的意见，它说：“有些发言，用个别事例，夸大地说明农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如何迅速地不断高涨，对所谓‘右倾机会主义者’进行猛烈的批评。有些地方上的同志提出，晚解放区同老解放区一样，可以大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山区也可以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各地的同志纷纷表示，要加快农业合作化的速度，要重新规划，提前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有些发言还提出，不但在农业合作化方面有右倾保守思想，在其他方面也都存在着这种情况。”

关于一九五五年十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的总结，它说：“毛泽东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的争论所作的上述总结，把一些需要经过认真调查研究才能实事求是地加以解决的问题，把一些需要经过一段实践检验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的问题，都说成是“迷信”而加以破除，加以批评，这就很难不助长农业合作化

脱离实际地过快发展。”“但反‘右倾’的政治气氛毕竟太强，声浪太高，给人们的印象十分强烈，因而毛泽东这些话没有引起各级领导和干部的足够注意。”关于毛泽东主持制定《农业发展纲要》，它说：“由于这个文件是在全党反对‘右倾保守’的气氛中制定的，人们头脑普遍发热，提出的各项指标大多超越实际可能性，除了农业合作化一项，其他各项都未能如期实现。”

关于毛泽东主持编辑的《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所写的一些按语，它说：“但是这个口子一开，许多地方很快就动手做起来。不但办高级社，还办大社；不但由初级社转高级社，而且由互助组直接跳到高级社。”“毛泽东的这个观点的继续发展，导致后来‘一大二公’人民公社的出现。”“但就总体而言，按语是以批判所谓‘右倾机会主义’为主旨，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的变革进程，加以人为地加速，助长了超越客观实际的‘左’的倾向。”“对毛泽东来说，全国解放是早已料到的，有了长期思想准备的，而农业合作化的胜利来得这样快，这样顺利，却出乎他的意料。他一向认为，改造几亿个体经营的农民是最艰难的事业，需要花费很长的时间和做许多细致的工作才能完成。谁知道，这么困难的问题，经过三次会议，作一篇报告，在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下，就如此顺利地解决了。”“面对迅猛发展的农业合作化高潮，毛泽东不无某种担心，一度进入比较冷静的思考。”

关于全国农业合作化的总的评价，它说：“可以设想，如果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那末，后来中国农村的发展将会是另一种情况，而避免走上曲折的道路。”“但是，一九五五年下半年，形势骤然起了变化，合作社的发展迅猛异常，出现了全国的合作化高潮。”“农业合作化的过快发展和表面上的巨大胜利，助长了毛泽东对个人意志的过分自信，更加深信自己的主张总是正确的，而且是能够立即见效的。当然，这不是说，合作化高潮纯粹是个人意志的产物。这是不可能的。它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长期处于贫困状态的中国人民，在革命胜利和建立新国家后，普遍急于摆脱原来的贫困落后状态。中国汪洋大海般的、势单力薄而又规模狭小的小农经济，在生产上确有发展互助合作的需要。但是，问题出在没有充分估量甚至不顾客观实际

的条件和农民群众的觉悟程度，过急地人为地加速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

“从农业合作化的加速进程中，人们看到这样一种情形：毛泽东作为享有崇高威望、深受全党和全国人民爱戴和信赖的领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带领人民取得难以想像的胜利，当他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各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积极贯彻实行，唯恐落在别人后头。这样，往往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这些反映到毛泽东那里，使他十分兴奋，又进一步提出新的要求和更高的指标。如此互相影响，循环往复，使得原来提出的比较符合实际的要求，变得逐渐并越来越离开了实际。” “毛泽东急于从初级社向高级社过渡，急于将小社合并为大社，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更多地着眼于发挥集体经营的长处和优势力量，而对于农民个体经营(或称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及其生命力和潜在的活力，严重估计不足，往往对它忽略，甚至把它看作是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在手工劳动的条件下，农民个体经营的积极性对于农业生产来说，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已为中国农业发展的历程所证明。” “毛泽东急于并社升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作为一个农家子弟出身而长期领导农民革命斗争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他的心，他的感情，总是同广大贫苦农民息息相通、紧密相联。他认为，大社、高级社利于提高生产力，能够更好地为广大贫苦农民的生产和生活提供有力保障。”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践证明，毛泽东对邓子恢的批评是错误的，邓子恢在合作化步骤上的逐渐演进的主张是比较符合中国农村实际的。”

“究竟什么是适合中国情况的农村集体经济形式，什么是中国社会主义农村的发展道路，这是一个新事物，是一个缺乏经验的重大而复杂的经济变革问题，因而需要经过长期的实践和探索，才能一步一步地全面深刻地搞清楚。”

在实现高级合作化这一目标上，表面上看来，中共领导人是没有分歧的，分歧只在于后期的发展速度。这种分歧表面上集中表现在毛泽东与邓子恢之间的争论上，实际上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与以刘少奇为代表的错误路线之间的争论。原文对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指导思想的批评，实际上就是站在这种错误路线上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的反对。他们可以赞成初级合作化，但绝不

赞成高级合作化。（因为初级合作化保留了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的私有，仅仅是入股分红；而高级合作化则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不再分红，只实行按劳分配。）他们说：他们所主张的是，“在初级社的基础上，随着生产力的逐步提高，经济的逐步发展，按照经济规律和群众觉悟程度，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坚持稳步发展、根据各地的不同情况有先有后地发展合作化的方针，而且不要搞得那么整齐划一。”请问，你们说的“经过一个比较长的历史时期”，到底是多长呢？是五十年、一百年、还是三、五百年呢？把实现高级合作化推迟到遥遥无期的未来，这究竟是要不要实现高级合作化的争论，还仅仅是发展速度的争论？

如果有人认为这里的推论是不正确的，但这个推论已经被历史的实践所证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发生困难时期，刘少奇、陈云、邓小平、邓子恢等人就曾竭力主张实行包产到户。只是由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领导人坚决顶住，他们的错误主张才没有得逞。一九七八年邓小平重新上台以后，在全国推行包产到户，至今已经二十五年了，他们还一再地说，至少三十年不变，三十年以后还要继续延长。二〇〇一年，有一位领导人就在报刊上公开说：建国以来，我国农村经历了三次大的社会改革：第一次是土地改革，第二次是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第三次是农村的税费改革。这是一个重要信号，它说明一些人公然要在我国历史上全盘否定农业合作化伟大意义和历史成就。

其实，一九七八年以后，一直有人在做这件事。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毛泽东才是中国这场改造运动的‘第一推动力’，而且总是运动加速的动力源。”“高潮从农业开始。农业合作化高潮的出现，并不是所谓广大农民中蕴藏着极大的社会主义积极性，而是一九五五年的‘三个会议一部书’”。“一部书就是毛泽东亲自主编的《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毛泽东在七届六中全会作结论时，不无得意地说：‘我用十一天功夫，看了一百二十几篇报告，包括给文章写按语在内，我就周游列国，比孔夫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这意思是说，他说高潮已经到来是有根据的，是经过调查的。然而这一次调查与以往不同，并不是亲历亲为，实地考察，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该书还引用了一段话：“逢先知这样说：毛泽东自己对这次合作化的‘调查’是比较满意的，但我认为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毛泽东一贯主张，要做亲身调查，并为我们全党做出了榜样，而他的这次调查只

是看下面送来的书面材料，而其中一大部分是批判小脚女人以及后的，他写的那些尖锐批评右倾保守的按语，主要就是加写在各地在 7 月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以后送来的那部分材料上的。尽管这些按单独看起来可能很有道理，但就全体而论，对于合作化这个本来是合乎农民需要（但要根据自愿互利原则逐步发展）的进程，加以人为的加速又加速，拔高又拔高，客观上是在命令主义的产物之上又加上新的命令主义。”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毛泽东把亲自主编《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说成是一次社会调查“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这次调查不能说是成功的”。由此推论，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进行的建国后的第二次调查，即毛泽东称之为“床上地下，地下床上”的前后两个多月听取 34 个部委的汇报，就更“不是亲历亲为”，而是“镜中观花，纸上谈兵”，因此就更“不能说是成功的”了。而实际上他们为了攻击毛泽东而故意歪曲调查的概念，把调查说成是必须“亲历亲为”。

按照肖冬连、逢先知等人的说法，农业合作化，至少是它的“高潮”，完全是毛泽东个人的主观主义、命令主义的产物。既然如此，当然就应该“退回去”，退回到分田到户、包产到户去了！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和刘少奇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之后，尽管刘少奇当即表示尊重毛的意见，但始终认为‘动摇、削弱直至否定私有基础，把农业生产互助组织提高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以此作为新因素，去战胜农民的自发因素，这是一种错误的，危险的，空想的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在实际政策上，刘少奇支持不动摇私有基础的互助合作运动，并不热心发展动摇私有基础的农业生产合作社。”

“邓子恢实际也是这个主张。”

“毛泽东见邓子恢就任农村工作部长后，没有积极贯彻他的思想，却和刘少奇配合非常默契，对邓子恢非常不满意。”

“这确实是两条路线的分歧，这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和科学社会主义路线的分歧。”

“有两种防止两极分化的办法：一种是把社会拉向倒退，回到野蛮人的没有

任何阶级差别的状态，那当然是普遍的贫穷，在普遍贫穷的条件下求社会平等，中国古代的空想社会主义，即大同思想，就是主张‘不患贫而患不均’；另一种是把社会推向前进，不怕道德家的义愤填膺的喧嚷，允许竞争，允许会经营的人先富起来，在生产力大发展，社会财富普遍增加的条件下，使阶级差别的消除成为真正的进步，并且不致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甚至衰落。前一种是毛泽东的合作社、高级社、人民公社所采取的办法；后一种办法是邓小平‘包产到户’的办法。”

所以，辛子陵认为“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的不彻底性主要表现在仍然认为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正确的。现在到了解决的时候了。如果肯定它是正确的，今天农村的包产到户就没有存在的根据……就是对党的决议的背离。”

这个人的观点确实非常彻底，他说出了党内那些右派分子想说而没有敢说出来的话。

关于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问题

《毛泽东传（1949-1976）》说：“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一样，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特别是它的后期，也受到“左”的思想影响（这中间虽然也提出过要纠正“左”的偏向，但从总体上并没有解决“左”的问题）。由此产生了如下一些问题。”

它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在这样一种理论指导下进行的，这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实质，就是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以为只有这样，才是社会主义。在改造过程中，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因而，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长时期内，中国的经济构成过于单一。实践已经证明，这是不利于发展社会生产力、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不适合于经济落后的中国的实际情况。”

实际工作中产生的若干问题与指导思想的错误，两者不能混同。指导思想上有错误，在实际工作中必然会产生问题；指导思想正确而由于经验不足，在实际工作中也会产生一些问题。百分之百的成绩而没有任何缺点，这样的工作谁能做到？一说工作有缺点，就要扯到指导思想上的错误，其实，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的思想在作怪。

关于使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我国国家和社会的唯一的经济基础的问题，前面已经说过了，这里不再重复。这里又提出毛泽东说的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问题。并且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这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难道说作者真的连目标与过程都分不清吗？要使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这是中国共产党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这个目标并不等于进行一次革命活动就可以达到的。

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高潮的时候，明确提出：““现在我国的自由市场，基本性质仍是资本主义的，虽然已经没有资本家。它与国家市场成双成对。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

一九五六年，毛泽东还指出：“在手工业改造高潮中，修理和服务行业集中生产，撒点过多，群众不满意。这就糟糕！现在怎么办？‘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还说：“提醒你们，手工业中许多好东西，不要搞掉了。王麻子、张小泉的刀剪一万年也不要搞掉。我们民族好的东西，搞掉了的，一定都要来一个恢复，而且要搞得更好一些。”

正是在毛泽东的这个思想指导下，八大的报告和发言中才在经济方面提出了“几个为主几个补充”的思想。怎么能说“这导致了社会主义改造中的片面性和绝对化”呢？

它还说：“这一段讲话中提出一些重要的思想，可惜没有深入研究下去，更没有付诸实践。所有制形式过于单一的问题，成为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症结。这个问题的解决，成为留给后人的一个重大历史课题。”

这句话把所有制的问题夸大到此程度，不过是为无限发展私有制留下一条后路而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说，“从政治上看，三大改造的提前平稳实现，的确是个历史性的胜利……然而，从经济上看，这个胜利多少带有表面性。”“问题恰恰在那个‘大胜利’。刚刚建立起来的那种社会主义体制模式，是否真的大大的解放了生产力？我们刚刚建立起来的这种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在它的母国苏联及东欧各国已经显露出严重的缺陷而寻求改革了。这种历史的势差，影响极其深远。”

这是一种貌似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而实际上是完全脱离历史实际的空谈。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现实的社会主义只有苏联这样一种模式，中国以及东欧各国（南斯拉夫在特殊情况下采取了一些特殊政策除外）搞社会主义改造自然要采取苏联的一些基本经验。正是毛泽东在一九五六年就提出“以苏为鉴”寻找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还是辛子陵说得“彻底”，他说：

“一个个体手工业合作化，‘化’出了三个结果：第一，国家背了一个大包袱。第二，劳动生产率降低，社员收入减少。第三，传统名牌产品逐渐退化。”

“从政治上讲，中共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对资产阶级的改造，是非常成功的……从经济上讲，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来讲，从创造物质文明推进社会进步来讲，这一改造的必要性和进步性就值得怀疑了。……毛泽东在这里犯了一个超越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阶段的重大历史错误，他违背了自己制定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和正确的发展路线。”

“有一种为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多留几分成绩的说法：认为‘三大改造’至今仍是正确的；但同时又承认‘改革开放’的路线也是正确的。这在形式逻辑上是一种二律背反的错误。‘三大改造’如果是正确的，‘改革开放’就是‘资本主义复辟’；‘改革开放’如果是正确的，‘三大改造’就是空想社会主义路线的发端。改革，就是改革毛泽东晚年定型的一些政治经济模式；开放，就是从毛泽东晚期思想禁锢下长期形成的封闭状态下开放。理论只有彻底才能说服人，才能指引人民满怀信心地前进理论上羞羞答答，必然带来行动上的动动摇摇，给极左思想留下阵地和市场。”

这个辛子陵确实不愧是极右势力的代表人物。他把一些不敢说的心里话都公开说出来了。他认为仅仅否定“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还不彻底，必须否定“三大改造”；在中国就是要无限制地发展资本主义，“但不再是十五年，可能是上百年或更多一些时间”。

2011年3月28日修改

第四节 迎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新时期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六年四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

1,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五年十月，党的七届六中全会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中的右倾保守思想开展了批判，十一月，中央召开的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工作会议批判了对资改造工作中右倾保守思想。十二月，毛泽东又提出批判右倾保守思想，争取提前完成过渡时期总任务。这次是着重批判经济建设领域的右倾保守思想。

一九五六年初，在落实一九五六年国民经济计划的过程中，一些国务院的领导人就急急忙忙地提出了反冒进的方针。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即将基本完成，毛泽东把注意力转到经济建设和科学文化建设上来。这意味着，开始了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而艰巨的历史性探索，即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

一九五六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我们的工作要加紧一点。现在我们的主动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农业改造方面主动更多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方面主动也更多了。但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没有主动，在工业方面没有主动。大多数重要装备要从外国进口，精密的仪器不能造，大的机器不能造，这上头我们没有主动。经济上没有独立，科学上没有独立。”又说：“现在我们是革什么命呢？现在是革技术的命，叫技术革命，叫文化革命，要搞科学，要革愚蠢同无知的命。”为此，他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造就大批的高级知识分子，同时要有更多的普通的知识分子。

毛泽东在讲话中还提出：“我们要把社会主义事业办得又多，又快，又好，又省。”这是第一次提出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六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更鲜明地提出，我们要大发展，“要在几十年内，努力改变我国在经济上和科学文化上的落后状况，迅速达到世界上的先进水平”。

从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开始，到四月二十四日结束。毛泽东共听取国务院三十四个工作部门的工作汇报。

一九五六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发表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

《论十大关系》重点讨论经济问题，同时也包括同经济建设密切相关的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毛泽东把这些问题，概括成十大关系，即：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党和非党的关系；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是非关系；中国和外国关系。这十大关系不是平列的，而又有重点。“十大关系中，工业和农业，沿海和内地，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和个人，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这五条是主要的。”

2. 《论十大关系》的丰富内容

(1) 一个根本方针

毛泽东指出：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什么是国内外的积极因素？在国内，工人和农民是基本力量。中间势力是可以争取的力量。反动势力虽是一种消极因素，但是我们仍然要作好工作，尽量争取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在国际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都要团结，不中立的可以争取为中立，反动的也可以分化和利用。总之，我们要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这样就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始终坚持的一个根本方针：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2) 一个根本思想

毛泽东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他们走过的弯路，你还想走？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

这样就明确了建设社会主义必须根据本国的情况走自己的道路这一根本的

指导思想。可是，现在有人说，这个思想是邓小平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才提出来的，恶意地歪曲党的历史。

（3）中国工业化的道路

报告的前三条讲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的关系，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报告肯定过去我们在处理这些关系上没有犯大的错误，同时强调根据形势和经验，今后应该适当调整，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更多地利用和发展沿海工业，尽量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长远看，这样反而能够更好地发展重工业、内地工业和加强国防。

这里涉及的实际上是开辟一条跟苏联过去道路有所不同的中国工业化道路的问题。

（4）经济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第四、五两条讲国家、生产单位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毛泽东指出：国家和工厂、合作社的关系，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为此，就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也就是我们过去常说的“军民兼顾”、“公私兼顾”。鉴于苏联和我们自己的经验，今后务必更好地解决这个问题。总之，国家和工厂，国家和工人，工厂和工人，国家和合作社，国家和农民，合作社和农民，都必须兼顾，不能只顾一头。无论只顾哪一头，都是不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这是一个关系到六亿人民的大问题，必须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间反复进行教育。

有人说，毛泽东忽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只有邓小平才让全国人民富起来。这样的谬论不值一驳。

毛泽东提出：工厂在统一领导下的独立性问题。把什么东西统统都集中在中央或省市，不给工厂一点权力，一点机动的余地，一点利益，恐怕不妥。中央、省市和工厂的权益究竟应当各有多大才适当，我们经验不多，还要研究。从原则上说，统一性和独立性是对立的统一，要有统一性，也要有独立性。比如我们现在开会统一性，散会以后有人散步，有人读书，有人吃饭，就是独立性。如果我们不给每个人散会后的独立性，一直把会无休止地开下去，不是所有的人都要死光吗？个人是这样，工厂和其他生产单位也是这样。各个生产单位都要有一个

与统一性相联系的独立性，才会发展得更加活泼。

这里，毛泽东提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问题，这样也就提出了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方针。现在有人说，毛泽东只是固守苏联的僵化模式，经济体制改革的思想也是邓小平才提出来的。他们不可能是无知，只能是恶意地歪曲。现在所谓的政企分离，实际上就是要解决毛泽东在这里所说的统一性和独立性的问题。政府代表国家，企业为国家所有，政府和企业怎样能完全分离呢？除了一些人借口政企分离搞私有化以外，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好。

（5）政治体制改革的新方针

报告的后五条，讲的五种关系，都是属于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中调动各种积极因素的问题。

毛泽东指出：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也是一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目前要注意的是，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这对我们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比较有利。我们的国家这样大，人口这样多，情况这样复杂，有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比只有一个积极性好得多。我们不能像苏联那样，把什么都集中到中央，把地方卡得死死的，一点机动权也没有。我们要统一，也要特殊。为了建设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有中央的强有力的统一领导，必须有全国的统一计划和统一纪律，破坏这种必要的统一，是不允许的。同时，又必须充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各地都要有适合当地情况的特殊。这种特殊不是高岗的那种特殊，而是为了整体利益，为了加强全国统一所必要的特殊。

这里已经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指明了方向。

毛泽东指出：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现在非有不可，而且非继续加强不可。否则，不能镇压反革命，不能抵抗帝国主义，不能建设社会主义，建设起来也不能巩固。列宁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决没有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已经过时”。无产阶级专政不能没有很大的强制性。但是，必须反对官僚主义，反对机构庞大。在一不死人二不废事的条件下，我建议党政机构进行大精简，砍掉它三分之二。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无产阶级政党和无产阶级专政

一定要坚持，但党政机构要大力精简。这些意见，刘少奇、邓小平都不执行。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亲自领导，成立革命委员会，把党政机构砍掉了不止三分之二。一九七八年以后，邓小平重新上台，大搞复旧，党政机构急剧膨胀，行政经费惊人上升，成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一座大山。

毛泽东指出：究竟是一个党好，还是几个党好？现在看来，恐怕是几个党好。不但过去如此，而且将来也可以如此，就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中国现在既然还有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会没有各种形式的反对派。所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虽然都表示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事物常常走到自己的反面，民主党派对许多问题的态度也是这样。他们是反对派，又不是反对派，常常由反对走到不反对。

这里涉及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关于政党结构体制问题，毛泽东在批评蒋介石时就曾经说过，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在共产党执政以后，毛泽东又提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允许民主党派的存在和发展，并不是把它们当做花瓶、摆设，而是承认它们实际上就是程度不同的反对派。但是，共产党与这些反对派有一个共同的基础，这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毛泽东的这个思想，邓小平以及他的后人都是不接受的。

毛泽东指出：党内党外都要分清是非。如何对待犯了错误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正确的态度应当是，对于犯错误的同志，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帮助他们改正错误，允许他们继续革命。过去，在以王明为首的教条主义者当权的时候，我们党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学了斯大林作风中不好的一面。他们在社会上不要中间势力，在党内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不准革命。

毛泽东指出：我们提出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我想是提得对的。现在有些国家的领导人就不愿意提，甚至不敢提这个口号。这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社会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斯大林讲得对的那些方面，我们一定要继续努力学习。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如果每句话，包括马

克思的话，都要照搬，那就不得了。我们的理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党内一些人有一个时期搞过教条主义，那时我们批评了这个东西。但是现在也还是有。学术界也好，经济界也好，都还有教条主义。自然科学方面，我们比较落后，特别要努力向外国学习。但是也要有批判地学，不可盲目地学。在技术方面，我看大部分先要照办，因为那些我们现在还没有，还不懂，学了比较有利。但是，已经清楚的那一部分，就不要事事照办了。外国资产阶级的一切腐败制度和思想作风，我们要坚决抵制和批判。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去学习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企业管理方法中合乎科学的方面。工业发达国家的企业，用人少，效率高，会做生意，这些都应当有原则地好好学过来，以利于改进我们的工作。现在，学英文的也不研究英文了，学术论文也不译成英文、法文、德文、日文同人家交换了。这也是一种迷信。对外国的科学、技术和文化，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和前面所说的对外国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我们的事业不利。

3, 《论十大关系》的历史意义

(1) 《论十大关系》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提出了一系列的重要指导思想和根本的方针，它不仅总结了我党几十年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我党建国以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而且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史上，关于在一个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成果。

(2) 《论十大关系》为党的八大召开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党中央委员会向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是以《论十大关系》为纲来草拟的。

(3) 《论十大关系》对我党的现实情况仍然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邓小平搞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许多方面是根本违反《论十大关系》的基本原则的。

二、一些领导人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然而，毛泽东的这些思想并没有引起一些中央领导人注意，他们仍然沿着过去的脚步，提出了反冒进的政治方针。

六月十五日，由刘少奇主持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国务院在人代会上关于预算的报告中，正式提出反对急躁冒进倾向。在李先念的报告中说：“生产的发

展和其他一切事业的发展都必须放在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在反对保守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反对急躁冒进的倾向，而这种倾向在过去几个月中，在许多部门和许多地区，都已经发生了。急躁冒进的结果并不能帮助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只能招致损失。”

六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反对保守主义，也要反对急躁情绪》，这篇社论是刘少奇指定陆定一主持的中宣传部写的。

七月，周恩来亲自主持“二五”计划的编制，起初，他在他的报告稿中，在“又多、又快、又好、又省”的后面加上了“又安全”三个字。随后，他在一份书面意见中提出：“这个口号需要斟酌”。最后，他在两个文件的稿子中全部删去了“多、快、好、省”的口号。

四、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

1，毛泽东《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发表的历史背景

一九五六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协会的负责同志，与他们进行了亲切的谈话。这次谈话虽然主要是讲的音乐问题、艺术问题、文化问题，即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问题，但是，它的基本原理适用于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军事建设等等各个方面。

可惜，关于这篇讲话的背景材料，我们现在知道的很少。

2，《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一文的要点

这次谈话的要点可以概括如下：

(1)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

一棵树的叶子，看上去是大体相同的，但仔细一看，每片叶子都有不同。有共性，也有个性，有相同的方面，也有相异的方面。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应该接受，不接受是没有道理的，也不利。第二国际曾经否定这些基本原理，但是被列宁驳倒了。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在实践中的表现形式，各国应有所不同。在中国，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中国的革命实际相结合。十月革命就是俄国革命的民族形式。

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原则，各个国家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小的原则和基

本原则的表现形式方面是有不同的。比如打仗的原理是一样的，都是攻、守、进、退、胜、败，但是在打法上，怎么攻，怎么守，各有不同，有很多的不同抗美援朝打到三八线双方顶住了，这种形式就是世界上少有的。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就有许多不同。苏联是由城市到乡村，我们是从乡村到城市。

中国革命有中国的特点。苏联革命采取苏联当时的那种形式，有其不得不如此的原因。列宁也曾经想到过对资产阶级采取别的办法。但是那个时候资产阶级不相信布尔什维克会胜利，他们要反抗。无产阶级开始又没有军队，只有八万党员。我们的情况和苏联不同。中国不是帝国主义国家。我们打了二十多年仗，有军队，有二百万党员。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也受帝国主义压迫。因此，革命的表现形式不同。

要反对教条主义。在政治上我们是吃过亏的。什么都学习俄国，当成教条，结果是大失败，把白区几乎搞掉百分之百，根据地 and 红军搞掉百分之九十，使革命推迟了好多年。这就是因为不从实际出发，从教条出发原故。教条主义者没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他们说中国革命是民主革命，但又要革一切资产阶级的命。照这样办，就搞借了，那就不是民主革命，而是社会主义革命了。这个道理他们没有搞通。革命办法没有搞对，党内关系没有搞对，使革命遭到了很大损失。必须反对教条主义，假使不反，革命就不能胜利。

对资产阶级，对知识分子的问题处理不好的话，对革命事业是不利的。对资产阶级的办法，中国就与苏联不同。中国的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人数虽少，但是他们有近代文化，我们现在还是要他们。地主阶级也有文化，那是古老文化，不是近代文化。做几句旧诗，做几句桐城派的文章，今天用不着。使工人农民来说，工人比较有文化，他们有技术，但还不能当工程师，比较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就差。农民不能说没有文化，精耕细作，唱民歌、跳舞也是文化。但是他们大多数不识字，没有现代的文化技术，能用锄头、木犁，不能用拖拉机。资产阶级在近代文化、近代技术这些方面，比其他阶级要高，因此必须团结他们，并且把他们改造过来。资产阶级掌握的文化，有些是旧的、用不到的，但是许多东西用得到。

(2)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文化艺术建设的一般规律。

社会主义的内容，民族的形式，在政治方面是如此，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

艺术的基本原理有其共同性，但表现形式要多样化，要有民族形式和民族风格。作曲、唱歌、舞蹈都应该是这样。

说中国民族的东西没有规律，这是否定中国的东西，是不对的。中国的语言、音乐、绘画，都有它自己的规律。

中国的豆腐、豆芽菜、皮蛋、北京烤鸭是有特殊性的，别国比不上，可以国际化。穿衣吃饭也是各国不同。印度人穿的衣服就和中国人不同，它是适合印度环境的。中国人吃饭用筷子，西方人用刀叉。一定说用刀叉的高明、科学，用筷子的落后，就说不通。

艺术又怎么样呢？中国的音乐、舞蹈、绘画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

过去说中国画不好的，无非是没有把自己的东西研究透，以为必须用西洋的画法。当然也可以先学外国的东西再来搞中国的东西，但是中国的东西有它自己的规律。

历史总是要重视的。历史久，有好处也有坏处。美国历史短，也许有它的好处，负担轻，可以不记这么多东西，我们历史久，也有它的好处，把老传统丢掉，人家会说卖国，要砍也砍不断，没有办法。但是要回顾这么久的历史，是有些麻烦的。

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在座的都是“西医“，是学西洋音乐的，要依靠你们。请吹鼓手来办音乐专门学校是不行的，这些事还是要靠你们办。

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为八股。过去有人搞八股文章，搞了五六百年。形式到处一样就不好。妇女的服装和男的一样，是不能持久的。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

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

(3) 关于学习外国、学习中国古代与创造中国现代新文化的关系问题。

西洋的一般音乐原理要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这样就可以产生很丰富的表现形式。

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我们要西医学中医，道理也就是这样。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水是怎么构成的，人是猿变的，世界各国都是相同的。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如果先学了西医，先学了解剖学、药理学等等，再来研究中、中药，是可以快一点把中国的东西搞好的。马克思讲过，首先研究近代社会，就容易理解古代社会。这是倒行的，却要快一些。

音乐可以采取外国的合理的原则，也可以用外国的乐器，但是总要有民族的特色，要有自己的特殊风格，独树一帜。

艺术上“全盘西化”被接受的可能性很少，还是以中国艺术为基础，吸收一些外国的东西进行自己的创造为好。现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可以搞，听凭人选择。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但是在中国艺术中硬搬西洋的东西，中国人就不欢迎。这和医学不同。西医的确可以替人治好病。剖肚子，割阑尾，吃阿斯匹林，并没有什么民族形式。当归、大黄也不算民族形式。艺术有形式问题，有民族形式问题。艺术离不了人民的习惯、感情以至语言，离不了民族的历史发展。艺术的民族保守性比较强一些，甚至可以保持几千年。古代的艺术，后人还是喜欢它。

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但是并不等于中国人完全按照外国人的办法办事，并不等于中国人写东西要像翻译的一样。中国人还是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

我们当然提倡民族音乐。作为中国人，不提倡民族的音乐是不行的。但是军乐队总不能用锁呐、胡琴，这等于我们穿军装还是穿现在这种样式的，总不能把那种胸前背后写着勇字的褂子穿起。民族化也不能那样化。乐器是工具。当然工具好坏也有关系，但是如何使用工具才是根本的。外国乐器可以使来用，但是作曲不能照抄外国。

地球上有二十七亿人，如果唱一种曲子是不行的。无论东方西方，各民族都

要有自己的东西。西方国家发展了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是起了作用的。但是现在世界的注意力正在逐渐转向东方，东方国家不发展自己的东西还行吗？

不中不西的东西也可以搞一点，只要有人欢迎。全盘西化，有人提倡过，但是行不通。

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也要把中国的好东西都学到。要重视中国的好东西，否则很多研究就没有对象了。中国历史上有好多东西没有传下来。唐明皇不会做皇帝，前半辈会做，后半辈不会做。他是懂艺术的，他是导演，也会打鼓，但是没有把东西传下来。还要靠你们。你们是“西医“，但是要中国化，要学到一套以后来研究中国的东西，把学的东西中国化。

学了外国的，就对中国的没有信心，那不好。但不说不要学外国。

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鲁迅对于外国的东西和中国的东西都懂，但他不轻视中国的。只在中医和京剧方面他的看法不大正确。中医医死了他的父亲。他对地方戏还是喜欢的。

孔子是教育家，也是音乐家，他把音乐列为六门课程的第二门。

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中国的和外国的要有机地结合，而不是套用外国的东西。学外国织帽子的方法，要织中国的帽子。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搬要搬一些，但要以自己的东西为主。要《死灵魂》，也要《阿Q正传》。鲁迅翻译了《死灵魂》、《毁灭》等等，但是他的光彩主要不在这方面，是在创作。

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外国的乐曲不会听，不会奏，是不好的。外国的作品不翻译是错误的，像西太后反对“洋鬼子“是错误的。要向外国学习，学来创作中国的东西。

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隋朝、唐朝的九部乐、十部乐，多数是西域音乐，还有高丽、印度来的外国音乐。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应该越搞越中国化，

而不是越搞越洋化。这样争论就可以统一了。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保守主义，这两个东西对中国都是不利的。学外国不等于一切照搬。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半瓶醋是不行的，要使两个半瓶醋变成两个一瓶醋。

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非驴非马也可以。骡子就是非驴非马。驴马结合就会改变形象的，不会完全不变。中国的面貌，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都不应该是旧的，都应该改变。但中国的特点要保存。应该是在中国的基础上，吸收外国的东西。应该交配起来，有机地结合。

西洋的东西也是要变的。西洋的东西也不是什么都好，我们要使它好的。我们应该在中国自己的基础上，批判地吸收西洋有用的成分。

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鲁迅的小说，既不同于外国的，也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它是中国现代的。

你们是学西洋的东西的，是“西医”，是宝贝，要重视你们。依靠你们。不要学西洋的东西的人办事，是不对的。要承认他们学的东西是进步的，要承认近代西洋前进了一步。不承认这一点，只说他们教条主义，不能服人。教条主义要整，但是要和风细雨地整。要重视他们，但是要说服他们重视民族的东西，不要全盘西化。应该学习外国的长处，来整理中国的，创造出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东西。这样道理才能讲通，也才不会丧失民族信心。

3, 《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的意义

(1) 这个讲话自始至终贯彻其中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实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既要符合一般原理，又要有中国的特点。这与《论十大关系》中强调的一个根本方针是一致的。这也是毛泽东在召开“八大”会议中，总结过去几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提出今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任务，始终贯彻地一个根本指导思想。

这个讲话强调的基本指导思想，不仅对开好“八大”有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 这个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中国的文化应该发展。

讲话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总体要求是：社会主义内容，民族的形式。

讲话还提出表现形式应该有所不同，政治上如此，艺术上也如此。特别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

讲话提出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对知识分子的团结教育改造问题：音乐家中的许多人在思想上是属于资产阶级的。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是这样。但是我们从那方面转过来了，他们为什么不能转过来呢？事实上有许多人已经转过来了。团结他们是有利于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的。要团结他们，帮助他们改造，把他们化过来。

这个讲话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若干原则，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观察中国的文化问题的指南。

(3) 这个讲话提出了与外国的关系的基本原则：

讲话提出文化上对外国的东西一概排斥，或者全盘吸收，都是错误的。

讲话反复强调要向外国学习科学的原理，学了这些原理，要用来研究中国的东西。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一般道理都要学。外国的许多东西都要去学，而且要学好，大家也可以见见世面。我们要熟悉外国的东西，读外国书。要把外国的好东西都学到。比如学医，细菌学、生物化学、解剖学、病理学，这些都要学。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我们接受外国的长处，会使我们自己的东西有一个跃进。外国有用的东西，都要学到，用来改进和发扬中国的东西，创造中国独特的新东西。演些外国的东西不要害怕。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外国音乐我们能消化它，吸收它的长处，就对我们有益。吸收外国的东西，要把它改变，变成中国的。

讲话还提出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

这个讲话大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使人们从思想上对外国开放，大胆地学习外国的好东西。

这个讲话也彻底地驳倒了一些人攻击毛泽东保守、思想僵化、闭关自守等等谬论。

五、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八大政治报告的起草

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讲话，提出一系列新思想，八大政治报告确定以《论十大关系》为指导思想。

政治报告重点是经济建设。这一点，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及其他中央领导人，认识上都是明确而一致的。毛泽东后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政治报告时说：“这一次重点是建设，有国内外形势，有社会主义改造，有建设，有人民民主专政，有党，报告里面有这么几个大题目，都可以讲。但是重点是两个，一个是社会主义改造，一个是经济建设。这两个重点中，主要的还是在建设。这个报告的主要部分，三万字中有三分之一是讲建设。”

从八月上旬到九月十四日，在这一个多月里，毛泽东对政治报告的起草工作，倾注了极大心血，逐字逐句地推敲和修改。在保存下来的八十多份修改稿中，经过毛泽东修改的就有二十一份。

八大政治报告的整个修改定稿过程，洋溢着民主商量的和谐气氛。工作的节奏是紧张的，又是有条不紊的，高效率的。毛泽东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谈到八大文件的修改过程时说：“第一次推翻你的，第二次推翻他的，推翻过来，推翻过去，这也说明我们是有民主的。不管什么人写的文件，你的道理对就写你的，完全是讲道理的，不讲什么人，对事不对人。”

八大政治报告的内容

政治报告，总结了七大以来，特别是建国后七年来的基本经验，根据新的形势，提出党的基本任务和一系列的新的方针政策。

整篇报告贯穿着《论十大关系》的基本精神和主要内容。

报告分析了国内的阶级变化：

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已经在中國大陸上消灭了。

封建地主阶级，除开个别地区以外，也已经消灭了。富农阶级也正在消灭中。原来剥削农民的地主和富农，正在被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新人。

民族资产阶级分子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

广大的农民和其他个体劳动者，已经变为社会主义的集体劳动者。

工人阶级已经成为国家的领导阶级。它的队伍扩大了，它的觉悟程度和文化技术水平大大提高了。

知识界也已经改变了原来的面貌，组成了一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队伍。

报告提出了现时的任务：“我们党现时的任务，就是要依靠已经获得解放和已经组织起来的几亿劳动人民，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充分利用一切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尽可能迅速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报告宣布：“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新的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斗争的任务已经变为保护社会生产力的顺利发展。”

报告还提出，为了适应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形势，要进一步扩大民主，健全法制，着手系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

关于台湾问题，报告提出：“我们愿意用和平谈判的方式，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的怀抱，而避免使用武力。如果不得已而使用武力，那是在和平谈判丧失了可能性，或者是在和平谈判失败以后。”这是在党的正式文件里首次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特别引人注目。

关于对外关系，报告声明：“我们准备同一切尚未同我国建交的国家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我们以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和平共处政策不排斥任何国家。对于美国，我们也同样具有同它和平共处的愿望。”

八大政治报告，集中了毛泽东和中共其他领导人在历史转变时期，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提出的许多新的理论观点和方针政策，汇集了全党的智慧，达到了当时可能达到的最高认识水平。

3，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

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七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中指出：“在国内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社会主义革命所要解决的矛盾。”“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决议说：“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了，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

决。这时，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

这个决议，毛泽东于一九五六年九月二十四、二十七日作了两次批示，说明当时他也是同意的。

贰、本节简论

八大的政治报告及其决议，遗留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 比如：

(1) 怎样理解“改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这个极其复杂和困难的历史任务，现在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几千年的阶级剥削制度已经基本结束”？

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大陆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并不等于几千的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结束。台湾还没有解放；香港澳门还没有收回，那些地方还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即便在大陆，资本主义工商业还刚刚实行公私合营，资本家还拿着定息。这些都说明，阶级剥削制度在我国还没有基本结束。

(2) 怎样认识““现在这种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

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这更是不符合事实。除了经济上实行了公私合营以外，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思想上仍然还有很大的实力，他们还会继续与工人阶级作斗争。

(3) 怎样认识“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既然在国内仍然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在国际上存在着帝国主义要消灭社会主义国家的斗争,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 就不能说已经解决.

(4) 怎样理解““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斗争是很复杂的,有时缓和,有时紧张,有时甚至是很尖锐的.不能说革命的暴风雨时期已经过去了.

(5) 怎样认识“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在理论上是根本站不住的。我们党的历史文献,历来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都是从国内的社会阶级之间的矛盾、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来说的。即便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不存在了,也仍然存在其他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不可能是什么工业国与农业国的矛盾、需要与生产的矛盾、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

这些问题需要党在今后的实践中逐步加以解决。

当时毛泽东首先发现的是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问题。

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一句话,在决议的历次修改稿上都没有。九月二十七日凌晨大会主席团常委会通过的稿子上也没有,那是在大会闭幕式开会前临时加上的。这个问题是陈伯达提出的,陈伯达找了康生,这时大会已经快闭幕了。他们商量了一个修改的意思,把胡乔木找去。陈伯达搬出列宁的《落后的欧洲和先进的亚洲》这篇文章的一些话作为依据,说明先进的社会制度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问题。然后陈伯达和胡乔木两个人去找毛泽东,把修改的方案拿给他看,他琢磨了半天以后,同意了。他说:“好,赶快去印。”

大会通过政治报告后,过了几天,毛泽东就提出:“这句话不妥当。这样讲,决议里就看不到我们国家还有阶级矛盾。原因是八大开会的时候全部实行全行业公私合营,人家敲锣打鼓,上街游行表示拥护,这种情况下阶级斗争的问题就反映不到我们的头脑里来了”。他做了这样的解释,没有责备。这是毛泽东第一次讲这个问题。也同时对刘少奇讲了这个问题,但没说错了要改要删。

八大闭幕两个星期以后，毛泽东对这个问题进一步提出怀疑。他说：“列宁讲的是亚洲与欧洲比较，你们讲的是自己与自己比。”

从以上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提出异议的，不只是“先进的社会制度与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一个提法，而是对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基本论断有了新的考虑。

一九五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在客观上将会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

这里，毛泽东就明显地没有提到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刘少奇读在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读书会上说：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有四种不同意见：（1）还未完全消灭经济上的差别的矛盾；（2）新社会与旧社会的残余间的矛盾；（3）日益增长的社会需要与生产水平之间的矛盾；（4）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四种提法，大家赞成哪一种？多种经济变成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之后，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逐渐上升为主要地位。新的社会关系和旧社会残余的矛盾还是存在的，将逐渐缩小，慢慢减弱。“社会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包括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社会生产水平和社会需要的矛盾，促进生产的发展。社会主义的生产是在先进技术基础上发展的，当然，先进技术基础，是比较而言。社会生产是不断提高的，社会需要也是不断得到满足的。

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主要是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矛盾，其次是正在成长中的共产主义制度与旧社会的残余之间的矛盾。后一矛盾现在不定期很激烈，将来逐渐减少，到共产主义时，只有前一种矛盾。生产和需要（包括生产和生活）的矛盾促进社会的发展。

刘少奇的这段话很清楚，他仍然坚持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

到了八十年代，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建国以来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又重新提出这个观点，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表现为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的

矛盾。

据此，这些年来，一些人热衷于宣传一种奇谈怪论，说什么在党的八大会议中存在着两条根本对立的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人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另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错误路线。这种谬论的广泛宣传，欺骗了不少的人。

王光美在《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中说：“少奇在 1949 年就提出，全国解放之后，全党工作中心应转到经济恢复和发展上。1951 年，在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上，他提出了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坚持五种经济成分共存。1956 年，全党一致通过，将其写入《党章》。八大结束之后第三天，在天安门城楼上，毛泽东对少奇说：八大关于我国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少奇十分震惊，只回答：‘哟，《决议》已通过公布了，怎么办？’毛主席在八大前和会议期间从没有提出过异议，现在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24 年风风雨雨，一直就没有离开过以阶级斗争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核心分歧点。1980 年，党的十二大召开，我们党终于又把少奇以一贯的行动所坚持的这一中心，正式写入《党章》。实践证明，八大的路线是正确的。”（与君同舟风雨无悔之二）

按照王光美的说法，我党在八大会上就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一条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错误路线；一条是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正确路线。毛泽东反对八大的正确路线，刘少奇坚持八大的正确路线。这显然是歪曲！毛泽东说八大关于我国主要（不是基本）矛盾的提法不正确，怎么就“意味着全党工作中心仍是阶级斗争，而非经济建设”呢？

邓力群在一九九九年《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一）》中，对王光美的这段话作了这样的评论：“这段话很值得注意，文章不长，对历史的表述，说得客气一点是混乱的。但是意思却是非常明显的：争论的核心，毛泽东只搞阶级斗争，刘少奇一贯主张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抑毛扬刘，非常鲜明。通俗地说，就是提高刘少奇，贬低毛泽东。究竟站不站得住，我看还得从历史的叙述中来说明这个问题。据我看，用贬低毛泽东的办法来提高刘少奇，其结果刘少奇提高不了，毛泽东也贬低不了。虽然是一个人的文章，但赞成这种意见的、写这样一类文章的大有人在。很有必要认真对待，还历史以本来的面貌。不能够让这

些人篡改我们国家的历史，篡改我们党的历史。”

肖冬连等在《文革前十年史》中采用了另外一种说法：“毛泽东提出，要以反对右倾保守作为准备八大的中心思想，也就是趁热打铁，把高潮从改造方面推进到建设方面。”“年初以后，在反保守的空气下，又出现了急躁冒进倾向，引起周恩来、陈云、刘少奇等的重视，提出既反保守又反冒进的方针，事实上改变了1955年底提出的以反右倾保守为中心的准备八大的指导思想。”

这种说法的意思很明显，召开八大的指导思想有两种：一种是毛泽东提出来的以反对右倾保守为中心；一种是周、陈、刘提出来的以既反保守又反冒进为中心。结果是后者代替了前者。

《毛泽东传（1949-1076）》用大量的事实说明：八大召开前，毛泽东所作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和毛泽东主持撰写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文章，是召开八大的基本指导思想。在八大的准备工作中，所有的大会报告和发言的起草工作，都是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进行的。在八大会议的进行中，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各次大会并作了重要讲话。在这种情况下，八大会议怎么可能产生并存在另外一条与毛泽东思想相对立的路线呢？

但是，《毛泽东传（1949-1076）》又说：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关于主要矛盾的论述，是“经过集体讨论和反复修改，是全党集体智慧的又一个重大成果。”

“决议的核心，是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 and 据此而作出的关于党和国家主要任务的规定。”

又说：“由于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基本上完成，国家的主要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

“正确地分析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指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明确提出党和国家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和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中共八大最重要的理论贡献。在这个基本理论问题上，当时在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中间，在全党，认识上是一致的。”

其实，这里存在着一个很大的理论误区：这些人歪曲了社会初始矛盾——社会基本矛盾——社会阶级矛盾之间的关系。

社会需要与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初始矛盾

需要是人们对外界对象、客体，首先是物质生活资料的依赖关系。需要不是主观的产物，更不是任意的想象。人们的需要是由人的生理机能发生、受自然环境影响，并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人们的需要按需要客体的差别可以分为不同的类型。社会需要是同满足需要的手段一同发展的。因此，一定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既不是抽象的，也不是固定不变的。

社会需要满足的过程是同一定的社会再生产过程相联系的。从需要为生产提供观念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需要的满足过程是先行过程；从生产为需要提供实在的对象这个角度看问题，生产过程是先行过程。因此，两者是互为条件、互为前提的。

从矛盾的产生来说，首先是社会需要决定社会生产。社会生产必须与社会需要相一致，否则社会生产就会衰退和灭亡。从矛盾的解决来说，社会生产又决定社会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满足了一定的社会需要，又促使新的社会需要产生。需要总是不断发展的，并且往往超过社会实际掌握的满足需要的手段。

因此，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经常存在的，只是在不同的社会条件下其具体表现形式不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及其各个历史阶段的初始矛盾。因为，没有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人类社会就不可能产生、存在和发展。人们必需生活资料，这是由人类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但是，只有通过生产来满足的需要，才是区别于其他动物的人类需要。生产是人类社会的基础，但是，人类社会不是为了生产而生产，生产是为了满足需要，并且创造出新的需要。新的需要又成为新的生产发展的根本动力。满足需要是人类从事生产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的。人类的历史归根到底就是人民群众不断发展生产，不断满足需要，从而不断推动生产发展的历史。

社会初始矛盾决定社会基本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是整个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规定、制约着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以及其他社会矛盾。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运动表现为双重关系：一种是人类与自然界的联系，其标志是生产力；一种是人与人的联系，其标志是生产关系。可以说，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表现，没有社会需

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就不会有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有的人认为，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的表现，这是把两者的关系弄颠倒了。）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制约、影响着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社会集团和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等等。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本身，不是社会的基本矛盾，因为，它的存在并不与社会的内在结构直接联系，它的解决也不直接引起社会结构的实质变化。而且，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也不能看作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种具体表现形式。作为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矛盾的一部分、一方面或一种具体表现形式的生产力和消费关系之间的矛盾，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反过来，任何一个历史阶段的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又总是受到当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的影响、制约和支配。以社会需要和生产关系的关系为例，生产为需要提供对象，首先就引入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分配按一定的经济关系把需要的对象加以分配；交换依照个人的需要把已经分配的东西再分配，这种再分配也受经济关系的制约，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就受价值规律的制约；消费直接满足主体的需要，其社会经济方面如各种消费关系的矛盾、消费的构成、水平、和发展趋势以及社会消费的合理组织等，也同社会的生产关系有密切联系。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必须进行生产。但是，他们的需要之所以不能得到适当的满足，首先是在于当时生产水平的限制。但主要的还在于少数剥削者占有了生产资料，从而占有了劳动者的劳动成果，并运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来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阶级矛盾，其本身则较为隐蔽。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广大劳动人民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也必须进行生产。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首先也取决于当时的生产力状况，但同时也取决于当时的经济关系。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因为人们在公有的生产资料的占有方面仍有差别，在劳动的性质、质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在市场交换中所处的地位仍有差别，在分配的方式、数量方面仍有差别，从而他们的需要满足的程度也仍然存在

相当大的差别。而且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低级社会形态中，还仍然存在大小不同的部分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种情况下，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除了部分表现为不同阶级之间的矛盾以外，还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非对抗性矛盾，直接表现为劳动人民不同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而在所有这些阶级矛盾和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中，必然会出现一个矛盾成为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总之，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社会的基本矛盾；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在任何时候都不可能是社会的基本矛盾。

社会基本矛盾决定社会的群体结构

社会基本矛盾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出来。

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就表现为一个阶级与另一个阶级之间的关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基本矛盾是生产的社会性与生产资料占有的资本私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与资本主义社会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社会基本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就表现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个对立的阶级。

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中包括社会主义制度本身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和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还包括非社会主义制度的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非社会主义上层建筑和社会主义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通过人与人关系表现出来，既表现为集体劳动者阶级和个体劳动者阶级之间的区别，又表现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对立。

在各个社会阶级结构之间存在着各种社会阶级矛盾

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阶级结构，主要包括四个阶级：

工人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集体劳动者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

反动阶级残余（及其知识分子）

此外，还有少量的个体劳动者阶级。

在这四个阶级之间，存在着各种阶级、阶层矛盾：

工人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反动阶级残余内部各个阶层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集体劳动者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工人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集体劳动者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资产阶级和反动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

等等。

在各种社会阶级矛盾之间必然有一种矛盾成为主要的

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阶级矛盾中，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哪些矛盾是次要矛盾？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这些重大的理论问题，在中央领导层的思想上并没有真正统一。毛泽东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步地回答了这些理论问题，形成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刘少奇、邓小平这些人，当时在表面上举手赞成，实际上坚决反对。

2011年3月29日修改

第五节 全党开展整风和反右斗争

壹、本节概述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开展全党整风运动

1，一九五六年十一月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个讲话提出的问题很多，我们只研究其中关于论述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问题的部分。他指出：

(1) 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两点论、矛盾的普遍性

世界上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统一。所谓对立统一，就是不同性质的对立的东西的统一。化合物都是不同性质的东西的对立统一。社会上的事情也是这样。中央和地方是对立统一，这个部和那个部也是对立统一。

两个国家也是对立统一。

有一些同志就是不讲辩证法，不分析，凡是苏联的东西都说是好的，硬搬苏联的一切东西。其实，中国的东西也好，外国的东西也好，都是可以分析的，有好的，有不好的。每个省的工作也是一样，有成绩，有缺点。我们每个人也是如此，总是有两点，有优点，有缺点，不是只有一点。一点论是从古以来就有的，两点论也是从古以来就有的。这就是形而上学跟辩证法。中国人讲“一阴一阳谓之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者只有阳没有阴。这就是古代的两点论。形而上学是一点论。现在，一点论在相当一些同志中间还不能改。他们片面地看问题，

认为苏联的东西都好，一切照搬，不应当搬的也搬来了不少。那些搬得不对的，不适合我们这块土地的东西，必须改过来。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

(2) 阶级消灭以后，社会仍然存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人民内部先进和落后的矛盾、统治集团和劳动人民的矛盾

将来全世界的帝国主义都打倒了，阶级消灭了，你们讲，那个时候还有没有革命？我看还是要革命的。社会制度还要改革，还会用“革命”这个词。当然，

那时革命的性质不同于阶级斗争时代的革命。那个时候还有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搞得不对头，就要把它推翻。上层建筑（其中包括思想、舆论）要是保护人民不喜欢的那种生产关系，人民就要改革它。上层建筑也是一种社会关系。上层建筑是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所谓经济基础，就是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生产力是最革命的因素。生产力发展了，总是要革命的。生产力有两项，一项是人，一项是工具。工具是人创造的。工具要革命，它会通过人来讲，通过劳动者来讲，破坏旧的生产关系，破坏旧的社会关系。“君子动口不动手”，最好的办法是用口。善讲不听，就会武讲。没有武器了，怎么搞呢？劳动者手里有工具，没有工具的可以拿石头。石头都没有，有两个拳头。

我们的国家机关，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拿法庭来说，它是对付反革命的，但也不完全是对付反革命的，要处理很多人民内部闹纠纷的问题。看来，法庭一万年都要。因为在阶级消灭以后，还会有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人们之间还会有斗争，还会有打架的，还可能出各种乱子，你不设一个法庭怎么得了呀！不过，斗争改变了性质，它不同于阶级斗争了。法庭也改变了性质。那个时候上层建筑也可能出问题。比如说，象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有的。

(3) 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如果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群众就有理由把它革掉

无产阶级发动的大民主是对付阶级敌人的。民族敌人（无非是帝国主义，外国垄断资产阶级）也是阶级敌人。大民主也可以用来对付官僚主义者。我刚才讲，一万年以后还有革命，那时搞大民主还是可能的。有些人如果活得不耐烦了，搞官僚主义，见了群众一句好话没有，就是骂人，群众有问题不去解决，那就一定要被打倒。现在，这个危险是存在的。如果脱离群众，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农民就要打扁担，工人就要上街示威，学生就要闹事。凡是出了这类事，第一要说是好事，我就是这样看的。

现在，有这样一些人，好象得了天下，就高枕无忧，可以横行霸道了。这样的人，群众反对他，打石头，打锄头，我看是该当，我最欢迎。而且有些时候，

只有打才能解决问题。共产党是要得到教训的。学生上街，工人上街，凡是有那样的事情，同志们要看作好事。要允许工人罢工，允许群众示威。游行示威在宪法上是有根据的。以后修改宪法，我主张加一个罢工自由，要允许工人罢工。这样，有利于解决国家、厂长同群众的矛盾。无非是矛盾。世界充满着矛盾。民主革命解决了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一套矛盾。现在，在所有制方面同民族资本主义和小生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别的方面的矛盾又突出出来了，新的矛盾又发生了。县委以上的干部有几十万，国家的命运就掌握在他们手里。如果不搞好，脱离群众，不是艰苦奋斗，那末，工人、农民、学生就有理由不赞成他们。我们一定要警惕，不要滋长官僚主义作风，不要形成一个脱离人民的贵族阶层。谁犯了官僚主义，不去解决群众的问题，骂群众，压群众，总是不改，群众就有理由把他革掉。我说革掉很好，应当革掉。

帝国主义都不怕，怕什么大民主？怕什么学生上街？但是，在我们党员中有一部分人怕大民主，这不好。那些怕大民主的官僚主义者，你就要好好学习马克思主义，你就要改。

（4）用小民主的方法、用整风的办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

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中央决定后，先发通知，把项目开出来。比如，官僚主义就包括许多东西：不接触干部和群众，不下去了解情况，不与群众同甘共苦，还有贪污、浪费，等等。如果上半年发通知，下半年整风，中间隔几个月。凡是贪污了的，要承认错误，在这期间把它退出来，或者以后分期退还，或者连分期退还也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免了，都可以。但是总要承认错误，自己报出来。这就是给他搭一个楼梯，让他慢慢下楼。对于其他错误，也是采取这个办法。预先出告示，到期进行整风，不是“不教而诛”，这是一种小民主的方法。有人说，如果用这个办法，到下半年，恐怕就没有什么好整了。我们就是希望达到这个目的，希望在正式整风的时候，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都大为减少。整风是在我们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方法。以后凡是人民内部的事情，党内的事情，都要用整风的方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来解决，而不是用武力来解决。我们主张和风细雨，当然，这中间个别的人也难免稍微激烈一点，但总的倾向是要把病治好，把人救了，真正要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不是讲讲而已。第一条保护他，第二条批评他。

首先要保护他，因为他不是反革命。这就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达到新的团结。在人民内部，对犯错误的人，都用保护他又批评他的方法，这样就很得人心，就能够团结全国人民，调动六亿人口中的一切积极因素，来建设社会主义。

在这篇讲话以后，在毛泽东的主持下，经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发表的《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其中特别是有关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矛盾问题的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形成《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理论的一个中间环节。

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毛泽东说：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和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

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2、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基本思想可以概括如下：

辩证法与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

关于辩证法，列宁说过：“可以把辩证法简要地确定为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这样就

会抓住辩证法的核心，可是这需要解释和发展。”解释和发展，这就是我们的工作。要解释，我们现在解释太少了。还要发展，我们在革命中有丰富的经验，应当发展这个学说。

列宁还说：“对立的统一(一致、同一、均势)，是有条件的、一时的、暂存的、相对的。互相排斥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正如发展、运动是绝对的一样。”

在哲学里边，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是对立统一，这两个东西是相互斗争的。还有两个东西，叫做辩证法和形而上学，也是对立统一、相互斗争的。一讲哲学，就少不了这两个对子。苏联现在不搞对子，只搞“单干户”，说是只放香花，不放毒草，不承认社会主义国家中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的存在。事实上，无论哪个国家，都有唯心主义，都有形而上学，都有毒草。苏联那里的许多毒草，是以香花的名义出现的，那里的许多怪议论，都戴着唯物主义或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帽子。我们公开承认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辩证法和形而上学、香花和毒草的斗争。这种斗争，要永远斗下去，每一个阶段都要前进一步。

斯大林有许多形而上学，并且教会许多人搞形而上学。他在《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讲，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有四个基本特征。他第一条讲事物的联系，好像无缘无故什么东西都是联系的。究竟是什么东西联系呢？就是对立的两个侧面的联系。各种事物都有对立的两个侧面。他第四条讲事物的内在矛盾，又只讲对立面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按照对立统一这个辩证法的根本规律，对立面是斗争的，又是统一的，是互相排斥的，又是互相联系的，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

苏联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第四版关于同一性的一条，就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辞典里说：“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生与死等等现象不能是

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这就是说，这些根本对立的现象，没有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它们只是互相排斥，不互相联结，不能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这种说法，是根本错误的。

在他们看来，战争就是战争，和平就是和平，两个东西只是互相排斥，毫无联系，战争不能转化到和平，和平不能转化到战争。列宁引用过克劳塞维茨的话：“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和平时期的斗争是政治，战争也是政治，但用的是特殊手段。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和平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战争中间不酝酿和平，为什么突然来一个和平？

生与死不能转化，请问生物从何而来？地球上原来只有无生物，生物是后来才有的，是由无生物即死物转化而来的。生物都有新陈代谢，有生长、繁殖和死亡。在生命活动的过程中，生与死也在不断地互相斗争、互相转化。

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转化，为什么经过革命，无产阶级变为统治者，资产阶级变为被统治者？比如，我们和蒋介石国民党就是根本对立的。对立双方互相斗争、互相排斥的结果，我们和国民党的地位都起了变化，他们由统治者变为被统治者，我们由被统治者变为统治者。逃到台湾去的国民党不过十分之一，留在大陆上的有十分之九。留下来的这一部分，我们正在改造他们，这是在新的情况下的对立统一。到台湾去的那十分之一，我们跟他们还是对立统一，也要经过斗争转化他们。

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苏联一些人的思想就是形而上学，就是那么硬化，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不承认对立统一。因此，在政治上就犯错误。我们坚持对立统一的观点，采取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在放香花的同时，也必然会有毒草放出来。这并不可怕，在一定条件下还有益。

统一物的两个互相对立互相斗争的侧面，总有个主，有个次。在一定的意义上，这可以比作原子里面的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一个原子分两部分，一部分叫原子核，一部分叫电子。原子核很小，可是很重。电子很轻，一个电子大约只有最轻的原子核的一千八百分之一。原子核也是可以分割的，不过结合得比较牢固。电子可有些“自由主义”了，可以跑掉几个，又来几个。原子核和电子的关系，也是对立统一，有主有次。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都是矛盾着的，都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的。太阳的光射来叫光波，无线电台发出的叫电波，声音的传播叫声波。水有水波，热有热浪。在一定意义上讲，走路也是起波的，一步一步走就是起波。唱戏也是起波的，唱完一句再唱第二句，没有一口气唱七八句的。写字也起波，写完一个字再写一个字，不能一笔写几百个字。这是事物矛盾运动的曲折性。

在人们的思想方法方面，实事求是和主观主义是对立的。我看那一年都会有主观主义。一万年以后，就一点主观主义都没有呀？我不相信。

(2) 帝国主义、民族主义、社会主义之间的矛盾

从这个事件可以看出当前世界斗争的重点。当然，帝国主义国家跟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是很厉害的矛盾，但是，他们现在是假借反共产主义之名来争地盘。争什么地盘呢？争亚洲非洲十亿人口的地盘。目前他们的争夺集中在中东这个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地区，特别是埃及苏伊士运河地区。在那里冲突的，有两类矛盾和三种力量。两类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即美国跟英国、美国跟法国之间的矛盾，一类是帝国主义跟被压迫民族之间的矛盾。三种力量，第一种是最大的帝国主义美国，第二种是二等帝国主义英、法，第三种就是被压迫民族。现在帝国主义争夺的主要场所是亚洲非洲。在这些地区都出现了民族独立运动。美国采用的办法，有文的，也有武的，在中东就是这样。

他们闹，对我们有利。我们的方针应当是，把社会主义国家巩固起来，寸土不让。谁要我们让，就一定要跟他斗争。出了这个范围，让他们去闹。那末，我们要不要讲话呢？我们是要讲话的。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的反帝斗争，对各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我们就是要支持。

帝国主义国家和我们之间，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们支持他们那里的人民革命，他们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他们里头有我们的人，就是那里的共产党，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进步人士。我们里头有他们的人，拿中国来说，就是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还有地主阶级。现在这些人看起来还听话，还没有闹事。但是假使原子弹打到北京来了，他们怎么样？不造反呀？那就大成问题了。至于那些劳改犯，石家庄那个学校闹事的领袖人物，北京那个要杀几千几万人的大学生，就更不用说了。

总之，对于国际问题的观察，我们认为还是这样：帝国主义之间闹，互相争夺殖民地，这个矛盾大些。他们是假借跟我们的矛盾来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这里很有文章可做。这是关系我们对外方针的一件大事。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资本主义各国很不稳定，乱，人心不安。世界各国都不安，中国也在内。但是，我们总比他们安一点。你们研究一下看，在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主要是美国之间，究竟谁怕谁？我说都怕。问题是谁怕谁多一点？我有这么一个倾向：帝国主义怕我们多一点。作这样的估计也许有个危险，就是大家都睡觉去了，一睡三天不醒。因此，总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帝国主义是不怀好心的，总是要捣鬼的。当然，现在帝国主义要打世界大战也不那么容易，打起来的结果如何，他们要考虑。

(3) 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中苏之间的矛盾

再讲一讲中苏关系。我看总是要扯皮的，不要设想共产党之间就没有皮扯。世界上哪有不扯皮的？马克思主义就是个扯皮的主义，就是讲矛盾讲斗争的。矛盾是经常有的，有矛盾就有斗争。现在中苏之间就有那么一些矛盾。他们想问题做事情的方法，他们的历史习惯，跟我们不同。因此，要对他们做工作。我历来说，对同志要做工作。有人说，既然都是共产党员，就应当一样好，为什么还要做工作呀？做工作就是搞统一战线，做民主人士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做共产党员的工作呀？这种看法不对。共产党里头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有些人组织上进了党，思想上还没有通，甚至有些老干部跟我们的语言也不一致。所以，经常要谈心，要个别商谈或者集体商谈，要开多少次会，做打通思想的工作。

据我看，形势比一些人强，甚至比大官强。在形势的压迫下，苏联那些顽固分子还要搞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行不通了。我们目前的方针，还是帮助他们，办法就是同他们当面直接讲。这次我们的代表团到苏联去，就给他们捅穿了一些问题。我在电话里跟恩来同志说，这些人利令智昏，对他们的办法，最好是臭骂一顿。什么叫利呢？无非是五千万吨钢，四亿吨煤，八千万吨石油。这算什么？这叫不算数。看见这么一点东西，就居然胀满了一脑壳，这叫什么共产党员，什么马克思主义者！我说再加十倍，加一百倍，也不算数。你无非是在地球上挖了那么一点东西，变成钢材，做成汽车飞机之类，这有什么了不起！可是你把它当

作那么大的包袱背在背上，什么革命原则都不顾了，这还不叫利令智昏！官做大了也可以利令智昏。当了第一书记，也是一种利，也容易使头脑发昏。昏得厉害的时候，就得用一种什么办法去臭骂他一顿。这回恩来同志在莫斯科就不客气了，跟他们抬杠子了，搞得他们也抬了。这样好，当面扯清楚。他们想影响我们，我们想影响他们。我们也没有一切都捅穿，法宝不一次使用干净，手里还留了一把。矛盾总是有的，目前只要大体过得去，可以求同存异，那些不同的将来再讲。如果他们硬是这样走下去，总有一天要统统捅出来。

(4) 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基本矛盾、阶级矛盾、两类矛盾

社会上的事情总是对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社会也是对立统一的，有人民内部的对立统一，有敌我之间的对立统一。在我们的国家里还有少数人闹事，基本原因就在于社会上仍然有各种对立的方面——正面和反面，仍然有对立的阶级，对立的人们，对立的意见。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但是还有资产阶级，还有地主、富农，还有恶霸和反革命。他们是被剥夺的阶级，现在我们压迫他们，他们心怀仇恨，很多人一有机会就要发作。在匈牙利事件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

一个工厂，一个合作社，一个学校，一个团体，一个家庭，总之，无论什么地方，无论什么时候，都有对立的方面。所以，社会上少数人闹事，年年都会有。

斯大林在一个长时期里不承认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直到他逝世前一年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才吞吞吐吐地谈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说如果政策不对，调节得不好，是要出问题的。但是，他还是没有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当作全面性的问题提出来，他还是没有认识到这些矛盾是推动社会主义社会向前发展的基本矛盾。他以为他那个天下稳固了。我们不要以为天下稳固了，它又稳固又不稳固。

按照辩证法，就象人总有一天要死一样，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一种历史现象，总有一天要灭亡，要被共产主义制度所否定。如果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不会灭亡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不会灭亡的，那还是什么马克思主义呢？

那不是跟宗教教义一样，跟宣传上帝不灭亡的神学一样？

社会主义社会是对立统一的，是存在着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的。

怎样处理社会主义社会的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一门科学，值得好好研究。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

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对坏人坏事的斗争，是长期的，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

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要把地主、资本家改造成为劳动者，这也是一条战略方针。消灭阶级，要很长的时间。

(5) 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与人民的矛盾

在学校里头也出了问题，好些地方学生闹事。石家庄一个学校，有一部分毕业生暂时不能就业，学习要延长一年，引起学生不满。少数反革命分子乘机进行煽动，组织示威游行，说是要夺取石家庄广播电台，宣布来一个“匈牙利”。他们贴了好多标语，其中有这样三个最突出的口号：“打倒法西斯！”“要战争不要和平！”“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照他们讲来，共产党是法西斯，我们这些人都要打倒。他们提出的口号那样反动，工人不同情，农民不同情，各方面的群众都不同情。北京清华大学，有个学生公开提出：“总有一天老子要杀几千几万人就是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这一“家”也出来了。邓小平同志去这个大学讲了一次话，他说，你要杀几千几万人，我们就要专政。

我们高等学校的学生，据北京市的调查，大多数是地主、富农、资产阶级以及富裕中农的子弟，工人阶级、贫下中农出身的还不到百分之二十。全国恐怕也差不多。这种情况应当改变，但是需要时间。在一部分大学生中间，哥穆尔卡很吃得开，铁托、卡德尔也很吃得开。倒是乡下的地主、富农，城市里的资本家、民主党派，多数还比较守规矩，他们在波兰、匈牙利闹风潮的时候还没有闹乱子，没有跳出来说要杀几千几万人。对于他们的这个守规矩，应当有分析。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原子弹把北京、上海打得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那就难说了。那时，地主，富农，资产阶级，民主党派，都要分化。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隐藏

着。他们的子弟，这些学生娃娃们，没有经验，把什么“要杀几千几万人”、什么“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这些东西都端出来了。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电影《武训传》，你们看了没有？那里头有一枝笔，几丈长，象征“文化人”，那一扫可厉害啦。他们现在要出来，大概是要扫我们了。是不是想复辟？有些民主人士和教授放的那些怪议论，跟我们也是对立的。他们讲唯心论，我们讲唯物论。他们说，共产党不能管科学，社会主义没有优越性，合作化坏得很；我们说，共产党能够管科学，社会主义有优越性，合作化好得很。

学生中间跟我们对立的人也不少。现在的大学生大多数是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其中有反对我们的人，毫不奇怪。这样的人北京有，石家庄有，其他地方也有。

社会上还有那样的人，骂我们的省委是“僵尸”。省委是不是僵尸？我看我们的省委根本就没有死，怎么僵呢？骂省委是“僵尸”跟我们说省委不是僵尸，也是对立的。

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现在有一种偏向，就是重安排不重改造，安排很多，改造很少。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一来，不敢去改造知识分子了。我们敢于改造资本家，为什么对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不敢改造呢？

(6) 真理与谬误、香花与毒草的矛盾

百花齐放，我看还是要放。有些同志认为，只能放香花，不能放毒草。这种看法，表明他们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很不理解。一般说来，反革命的言论当然不让放。但是，它不用反革命的面貌出现，而用革命的面貌出现，那就只好让它放，这样才有利于对它进行鉴别和斗争。田里长着两种东西，一种叫粮食，一种叫杂草。杂草年年要锄，一年要锄几次。你说只要放香花，不要放毒草，那就等于要田里只能长粮食，不能长一根草。话尽管那样讲，凡是到田里看过的都知道，只要你不放手锄，草实际上还是有那么多。杂草有个好处，翻过来就是肥料。你说它没有用？可以化无用为有用。农民需要年年跟田里的杂草作斗争，我们党的作家、艺术家、评论家、教授，也需要年年跟思想领域的杂草作斗争。所谓锻炼出来的，就是奋斗出来的。你草长，我就锄。这个对立面是不断出现的。

杂草一万年还会有，所以我们也要准备斗争一万年。

真理是跟谬误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美是跟丑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善恶也是这样，善事、善人是跟恶事、恶人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总之，香花是跟毒草相比较，并且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禁止人们跟谬误、丑恶、敌对的东西见面，跟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东西见面，跟孔子、老子、蒋介石的东西见面，这样的政策是危险的政策。它将引导人们思想衰退，单打一，见不得世面，唱不得对台戏。

在我们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当然不能让毒草到处泛滥。无论在党内，还是在思想界、文艺界，主要的和占统治地位的，必须力争是香花，是马克思主义。毒草，非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只能处在被统治的地位。从这样的观点看来，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就是有益无害的了。

(7) 这部分人与那部分人的矛盾

统筹兼顾，各得其所。这是我们历来的方针。在延安的时候，就采取这个方针。一九四四年八月，《大公报》作社评一篇，说什么不要“另起炉灶”。重庆谈判期间，我对《大公报》的负责人讲，你那个话我很赞成，但是蒋委员长要管饭，他不管我们的饭，我不另起炉灶怎么办？那个时候，我们向蒋介石提出的一个口号，就是要各得其所。现在是我们管事了。我们的方针就是统筹兼顾，各得其所。包括把国民党留下来的军政人员都包下来，连跑到台湾去的也可以回来。对反革命分子，凡是不杀的，都加以改造，给生活出路。民主党派保留下来，长期共存，对它的成员给予安排。总而言之，全国六亿人口，我们统统管着。比如统购统销，一切城市人口和农村里头的缺粮户，我们都管。又比如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对那些全家没有人就业的，还要救济，总以不饿死人为原则。所有这些，都是统筹兼顾。这是一个什么方针呢？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力量，为了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一个战略方针。实行这样一个方针比较好，乱子出得比较少。这种统筹兼顾的思想，要向大家说清楚。

(8) 农业与工业的矛盾

全党一定要重视农业。农业关系国计民生极大 要注意不抓粮食很危险。不抓粮食，总有一天要天下大乱。

首先，农业关系到五亿农村人口的吃饭问题，吃肉吃油问题，以及其他日用的非商品性农产品问题。这个农民自给的部分，数量极大。比如，去年生产了三千六百多亿斤粮食，商品粮包括公粮在内，大约是八百多亿斤，不到四分之一，四分之三以上归农民。农业搞好了，农民能自给，五亿人口稳定了。

第二，农业也关系到城市和工矿区人口的吃饭问题。商品性的农产品发展了，才能供应工业人口的需要，才能发展工业。要在发展农业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农产品特别是粮食的商品率。有了饭吃，学校、工厂少数人闹事也不怕。

第三，农业是轻工业原料的主要来源，农村是轻工业的重要市场。只有农业发展了，轻工业生产才能得到足够的原料，轻工业产品才能得到广阔的市场。

第四，农村又是重工业的重要市场。比如，化学肥料，各种各样的农业机械，部分的电力、煤炭、石油，是供应农村的，铁路、公路和大型水利工程，也都为农业服务。现在，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农业经济，无论是发展轻工业还是发展重工业，农村都是极大的市场。

第五，现在出口物资主要是农产品。农产品变成外汇，就可以进口各种工业设备。

第六，农业是积累的重要来源。农业发展起来了，就可以为发展工业提供更多的资金。

因此，在一定的意义上可以说，农业就是工业。要说服工业部门面向农村，支援农业。要搞好工业化，就应当这样做。

农业本身的积累和国家从农业取得的积累，在合作社收入中究竟各占多大比例为好？请大家研究，议出一个适当的比例来。其目的，就是要使农业能够扩大再生产，使它作为工业的市场更大，作为积累的来源更多。先让农业本身积累多，然后才能为工业积累更多。只为工业积累，农业本身积累得太少或者没有积累，竭泽而渔，对于工业的发展反而不利。

合作社的积累和社员收入的比例，也要注意。合作社要利用价值法则搞经济核算，要勤俭办社，逐步增加一点积累。今年如果丰收，积累要比去年多一点，但是不能太多，还是先让农民吃饱一点。丰收年多积累一点，灾荒年或者半灾荒年就不积累或者少积累一点。就是说，积累是波浪式的，或者叫作螺旋式的。

(9) 党内矛盾

有一种问题是我们自己家里出的。比如，现在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在评级过程中，有那样的人，升了一级不够，甚至升了两级还躺在床上哭鼻子，大概要升三级才起床。他这么一闹，就解决了一个问题，什么干部评级，根本不评了，工资大体平均、略有差别就是了。以前北洋军阀政府里有个内阁总理，叫唐绍仪，后头当了广东中山县的县长。旧社会的一个内阁总理可以去当县长，为什么我们的部长倒不能去当县长？我看，那些闹级别，升得降不得的人，在这一点上，还不如这个旧官僚。他们不是比艰苦，比多做工作少得享受，而是比阔气，比级别，比地位。这类思想在党内现在有很大的发展，值得我们注意。

要足够地估计成绩。我们的革命和建设，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也有。有那么多成绩，夸大是不行的，但是估低了就要犯错误，可能要犯大错误。这个问题，本来八届二中全会已经解决了，这次会上还多次谈到，可见在一些同志思想上还没有解决。特别在民主人士里头有一种议论：“你们总是讲成绩是基本的，这不解决问题。谁不知道成绩是基本的，还有缺点错误呀！”但是，确实成绩是基本的。不肯定这一点，就泄气。对合作化就有泄气之事嘛！

农业合作化究竟是有希望，还是没有希望？是合作社好，还是个体经济好？，这个问题也重新提出来了。去年这一年，丰收的地方没有问题，重灾区也没有问题，就是那种灾而不重、收而不丰的合作社发生了问题。这类合作社，工分所值，原先许的愿大了，后头没有那么多，社员收入没有增加，甚至还有减少。于是议论就来了：合作社还好不好，要不要？这种议论也反映到党内的一些干部中间。有些干部说，合作社没有什么优越性。有些部长到乡下去看了一下，回到北京后，放的空气不妙，说是农民无精打采，不积极耕种了，似乎合作社大有崩溃灭亡之势。有些合作社社长抬不起头来，到处挨骂，上面批评，报纸上也批评。有些党委的宣传部长不敢宣传合作社的优越性。农业部的部长廖鲁言，又是党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据他讲，他自己泄了气，他下面的负责干部也泄了气，横直是不行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也不算数了。泄了气怎么办？这个事情好办，你没有气，给你打点气就是了。现在报纸上的宣传转了一下，大讲合作社的优越性，专讲好话，不讲坏话，搞那么几个月，鼓一点气。

有些党员，过去各种关都过了，就是社会主义这一关难过。有这样典型的人，薛迅就是一个。她原来是河北省的省委副书记、副省长。她是什么时候动摇的呢？

就是在开始实行统购统销的时候。统购统销是实行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步骤。她却坚决反对，无论如何要反对。还有一个，就是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副主任孟用潜。他上书言事，有信一封，也坚决反对统购统销。实行农业合作化，党内也有人起来反对。总而言之，党内有这样的高级干部，他们过不了社会主义这一关，是动摇的。这类事情结束没有呢？没有。是不是十年以后这些人就坚定起来，真正相信社会主义呢？那也不一定。十年以后，遇到出什么问题，他们还可能说，我早就料到了的。

发给同志们一个材料，是反映某些军队干部的思想动向的。这些干部的意见中虽然有某些合理的部分，比如说有些干部的工资太高，农民看不惯，但是，他们的意见总的方向不妥，根本路线不对。他们批评我们党的政策是农村“左”了，城市右了。中国虽然有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但是合共只有两块地方，一块叫农村，一块叫城市。照他们这一讲，都错了。

在我们军队的高级干部中间，有些人可能是自己回家，或者是接了亲属来，听到富裕中农、富农、地主的那些话，受了触动，于是就替农民叫苦。一九五五年上半年，党内有相当多的人替农民叫苦，跟梁漱溟之流相呼应，好象只有他们这两部分人才代表农民，才知道农民的疾苦。至于我们党中央，在他们”看来，那是不代表农民的，省委也是不代表的，党员的大多数都是不代表的。江苏作了一个调查，有的地区，县区乡三级干部中间，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替农民叫苦。后头一查，这些替农民叫苦的人，大多数是家里比较富裕，有余粮出卖的人。这些人的所谓“苦”，就是有余粮。所谓“帮助农民”、“关心农民”，就是有余粮不要卖给国家。这些叫苦的人到底代表谁呢？他们不是代表广大农民群众，而是代表少数富裕农民。

前年反右倾，去年反“冒进”，反“冒进”的结果又出了个右倾。我说的这个右倾，是指在社会主义革命问题上，主要是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问题上的右倾。我们的干部中间刮起了这么一股风，象台风一样，特别值得注意。我们的部长、副部长、司局长和省一级的干部中，相当一部分人，出身于地主、富农和富裕中农家庭，有些人的老太爷是地主，现在还没有选举权。这些干部回到家里去，家里人就讲那么一些坏话，无非是合作社不行，长不了。富裕中农是一个动摇的阶层，他们的单干思想现在又在抬头，有些人想退社。我们干部中的这股风，反映

了这些阶级和阶层的思想。

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党内绝大多数干部是不满意的，认为整斯大林整得太过了。这是一种正常的情绪，正常的反映。但是，也有少数人起了波动。每逢台风一来，下雨之前，蚂蚁就要出洞，它们“鼻子”很灵，懂得气象学。苏共“二十大”的台风一刮，中国也有那么一些蚂蚁出洞。这是党内的动摇分子，一有机会他们就要动摇。他们听了把斯大林一棍子打死，舒服得很，就摇过去，喊万岁，说赫鲁晓夫一切都对，老子从前就是这个主张。后头帝国主义几棍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几棍子，连赫鲁晓夫的腔调都不得不有所改变，他们又摇过来了。大势所趋，不摇过来不行。墙上一根草，风吹两边倒。摇过来不是本心，摇过去才是本心。党内党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这一下就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一九五七年二月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1)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矛盾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认为，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这个规律，不论在自然界、人类社会和人们的思想中，都是普遍存在的。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矛盾是普遍存在的，不过按事物的性质不同，矛盾的性质也就不同。对于任何一个具体的事物说来，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过渡的，因而是相对的，对立的斗争则是绝对的。这个规律，列宁讲得很清楚。这个规律，在我国，懂得的人逐渐多起来了。但是，对于许多人说来，承认这个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问题和处理问题又是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着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得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不懂得在不断地正确处理和解决矛盾的过程中，将会使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统一和团结日益巩固。这样，就有必要在我国人民中，首先是在干部中，进行解释，引导人们认识社会主义社会中的矛盾，并且懂得采取正确的方法处理这种矛盾。

坏事也可以转变成成为好事。乱子有二重性。我们可以用这个观点去看待一切

乱子。

匈牙利事件不是好事，这是大家清楚的。但是它也有二重性。由于匈牙利的同志们在事件的发展过程中处理得正确，结果匈牙利事件由坏事转变成了一件好事。匈牙利现在比过去巩固了，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也都得了教训。

同样，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发生的反共反人民的世界性的风潮，当然是坏事。但是它教育了和锻炼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阶级，这就变成好事。在许多国家里，有一批人在这个风潮里退出了党。一部分党员退党，党的人数减少了，当然是坏事。但是也有一方面的好处。那些动摇分子不愿意继续干下去了，退走了，大多数坚定的党员更好团结奋斗，为什么不好呢？

总之，我们必须学会全面地看问题，不但要看到事物的正面，也要看到它的反面。在一定条件下，坏的东西可以引出好的结果，好的东西也可以引出坏的结果。老子在二千多年以前就说过：“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日本打到中国，日本人叫胜利。中国大片土地被侵占，中国人叫失败。但是在中国的失败里面包含着胜利，在日本的胜利里面包含着失败。历史难道不是这样证明了吗？

现在世界各国的人们都在谈论着会不会打第三次世界大战。对于这个问题，我们也要有精神准备，也要有分析。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世界上最愿意改变自己地位的是无产阶级，其次是半无产阶级，因为一则全无所有，一则有也不多。现在美国操纵联合国的多数票和控制世界很多地方的局面只是暂时的，这个局面总有一天要起变化。中国的穷国地位和在国际上无权的地位也会起变化。穷国变为富国，无权将变为有权——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在这里，决定的条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和人民团结一致的奋斗。

(2)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的矛盾的理论

在客观上将长期存在的社会生产和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就需要人们时常经过国家计划去调节。我国每年作一次经济计划，安排积累和消费的适当比例，求得生产和需要之间的平衡。所谓平衡，就是矛盾的暂时的相对的统一。过了一年，就整个说来，这种平衡就被矛盾的斗争所打破了，这种统一就变化了，平衡成为不平衡，统一成为不统一，又需要作第二年的平衡和统一。这就是我们计划经济的优越性。事实上，每月每季都在局部地打破这种平衡和统一，需要作出局部的调整。有时因为主观安排不符合客观情况，发生矛盾，破坏平衡，这就叫做犯错误。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

(3)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的理论

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同旧社会的矛盾，例如同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是根本不相同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表现为剧烈的对抗和冲突，表现为剧烈的阶级斗争，那种矛盾不可能由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来解决，而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够加以解决。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是另回事，恰恰相反，它不是对抗性的矛盾，它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不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这些矛盾，同旧社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矛盾，具有根本不同的性质和情况罢了。我国现在的社会制度比较旧时代的社会制度要优胜得多。如果不优胜，旧制度就不会被推翻，新制度就不可能建立。所谓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比较旧时代生产关系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性质，就是指能够容许生产力以旧社会所没有的速度迅速发展，因而生产不断扩大，因而使人民不断增长的需要能够逐步得到满足的这样一种情况。旧中国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下，生产力的发展一直是非常缓慢的。解放前五十年间，全国除东北外，钢的生产一直只有几万吨；加上东北，全国的最高年产量也不过是九十多万吨。在一九四九年，全国钢产量只有十几万吨。但是全国解放不过七年，钢的生产便已达到四百几十万吨。旧中国几乎没有机器制造业，更没有汽车制造业和飞机制造业，而这些现在都建立起来了。当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之后，

中国要向哪里去？向资本主义，还是向社会主义？有许多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是不清楚的。事实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促进了我国生产力的突飞猛进的发展，这一点，甚至连国外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了。

但是，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当然，在解决这些矛盾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新的矛盾，又需要人们去解决。

（4）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理论

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

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

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

目前关于反革命分子的情况，可以用这样两句话来说明：还有反革命，但是不多了。首先是还有反革命。有人说，已经没有了，天下太平了，可以把枕头塞得高高地睡觉了。这是不合事实的。事实是还有（当然不是说每一个地方每一个单位都有），还必须继续和他们作斗争。必须懂得，没有肃清的暗藏的反革命分子是不会死心的，他们必定要乘机捣乱。美帝国主义者和蒋介石集团经常还在派遣特务到我们这里来进行破坏活动。原有的反革命分子肃清了，还可能发现一些新的反革命分子。如果我们丧失警惕性那就会上大当，吃大亏。不管什么地方出现反革命分子捣乱，就应当坚决消灭他。但是就全国来说，反革命分子确实不多了。如果说现在全国还有很多反革命分子，这个意见也是错误的。如果接受这种估计，结果也会搞乱。

我们把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当做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这个阶级矛盾是否完全解决了呢？还没有。还要经过相当的时间才能够完全解决。一方面，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成为公私合营企业中的管理人员，正处在由剥削者变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转变过程中；另一方面，他们现在还在公私合营的企业中拿定息，这就是说，他们的剥削根子还没有脱离。他们同工人阶级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还有一个不小的距离。怎么能说已经没有了两面性呢？就是不拿定息，摘掉了资产阶级的帽子，也还需要一个相当的时间继续进行思想改造。

我国知识分子的大多数，在过去七年中已经有了显著的进步。他们表示赞成社会主义制度。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正在用功学习马克思主义，有一部分人已经成为共产主义者。这部分人目前虽然还是少数，但是正在逐渐增多。当然，知识分子中间有一些人现在仍然怀疑或者不同意社会主义，这部分人只占少数。知识分子必须继续改造自己，逐步地抛弃资产阶级的世界观而树立无产阶级的、共产主

义的世界观。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由于我国的社会制度已经起了变化，资产阶级思想的经济基础已经基本上消灭了，这就使大量知识分子的世界观不但有了改变的必要，而且有了改变的可能。但是世界观的彻底改变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事实上必定会有一些人在思想上始终不愿意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愿意接受共产主义。

(5)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工业和农业、工人和农民之间的矛盾理论

我们必须逐步地建设一批规模大的现代化的企业以为骨干，没有这个骨干就不能使我国在几十年内变为现代化的工业强国。但是多数企业不应当这样做，应当更多地建立中小型企业，并且应当充分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业基础，力求节省，用较少的钱办较多的事。

我国的经济建设是以重工业为中心，这一点必须肯定。但是同时必须充分注意发展农业和轻工业。

我国是一个大农业国，农村人口占全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发展工业必须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工业才有原料和市场，才有可能为建立强大的重工业积累较多的资金。大家知道，轻工业和农业有极密切的关系。没有农业，就没有轻工业。重工业要以农业为重要市场这一点，目前还没有使人们看得很清楚。但是随着农业的技术改革逐步发展，农业的日益现代化，为农业服务的机械、肥料、水利建设、电力建设、运输建设、民用燃料、民用建筑材料等等将日益增多，重工业以农业为重要市场的情况，将会易于为人们所理解。在第二个五年计划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如果我们的农业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使轻工业相应地有更多的发展，这对于整个国民经济会有好处。农业和轻工业发展了，重工业有了市场，有了资金，它就会更快地发展。这样，看起来工业化的速度似乎慢一些但是实际上不会慢，或者反而可能快一些。经过三个五年计划，或者再多一些时间，我国的钢产量仍然可能由解放前最高年产量，即一九四三年的九十多万吨，发展到二千万吨，或者更多一点。这样城乡人民都会感到高兴。

(6)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敌我之间、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的理论

为了正确地认识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不同的矛盾，应该首先弄清楚什么是人民，什么是敌人。人民这个概念在不同的国家和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历史时

期，有着不同的内容。拿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抗日战争时期，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都是人民的敌人。在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在现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赞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属于人民的范围；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视、破坏社会主义建设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

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敌我之间的矛盾是對抗性的矛盾。人民内部的矛盾，在劳动人民之间说来，是非對抗性的；在被剝削阶级和剝削阶级之间说来，除了對抗性的一面以外，还非對抗性的一面。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现在才有的，但是在各个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有着不同的内容。在我国现在的条件下，所谓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工人阶级内部的矛盾，农民阶级内部的矛盾，知识分子内部的矛盾，工农两个阶级之间的矛盾，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之间的矛盾，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我们的人民政府是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但是它同人民群众之间也有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包括国家利益、集体利益同个人利益之间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领导同被领导之间的矛盾，国家机关某些工作人员的官僚主义作风同群众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也是人民内部的一个矛盾。一般说来，人民内部的

矛盾，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

在我们国家里，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两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润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民族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地主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不同。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剥削和被剥削的矛盾，这本来是对抗性的矛盾。但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和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末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敌我之间和人民内部这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不同。简单地说起来，前者是分清敌我的问题，后者是分清是非的问题。当然敌我问题也是一种是非问题。比如我们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这些内外反动派，究竟谁是谁非，也是是非问题，但是这是和人民内部问题性质不同的另一类是非问题。

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

能由一部分人民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与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我们的这个社会主义的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可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我们的专政，叫做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这就表明，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而由工人阶级团结全体有公民权的人民，首先是农民，向着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所谓有公民权，在政治方面，就是说有自由和民主的权利。

但是这个自由是有领导的自由，这个民主是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不是无政府状态。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匈牙利事件发生以后，我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我国另有一些人在匈牙利问题上表现动摇，是因为他们不懂得他们的这种希望是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违反的，是不可能得到人民群众支持的。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予经济方面的损失，需要长时间才能恢复世界上的具体情况。他们以为在我们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他们要求实行西方的两党制，这一党在台上，那一党在台下。但是这种所谓两党制不过是维护资产阶级专政的一种方法，它绝不能保障劳动人民的自由权利。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在阶级斗争的社会里，有了剥削阶级剥削劳动人民的自由，就没有劳动人民不受剥削的自由。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民主。有些资本主义国家也容许共产党合法存在，但是以不危害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为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就不容许了。要求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的人们认为民主是目的，而不承认民主是手段。民主这个东西，有时看来似乎是目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手段。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民主属于上层建筑，属于政治这个范畴。这就是说，归根结蒂，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自由也是这样。民主自由都是相对的，不是

绝对的，都是在历史上发生和发展的。在人民内部，民主是对集中而言，自由是对纪律而言。这些都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矛盾着的侧面，它们是矛盾的，又是统一的，我们不应当片面地强调某一个侧面而否定另一个侧面。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这些道理，广大人民群众是懂得的。

我们主张有领导的自由，主张集中指导下的民主，这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说，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是非的辨别问题，可以用强制的方法去解决。企图用行政命令的方法，用强制的方法解决思想问题，是非问题，不但没有效力，而且是有害的。我们不能用行政命令去消灭宗教，不能强制人们不信教。不能强制人们放弃唯心主义，也不能强制人们相信马克思主义。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为了有效地进行生产、进行学习和有秩序地过生活，要求自己的政府、生产的领导者、文化机关的领导者发布各种适当的带强制性的行政命令。没有这种行政命令，社会秩序就无法维持，这是人们的常识所了解的。这同用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为着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而发布的行政命令，也要伴之以说服教育，单靠命令，在许多情况下就行不通。

在一般情况下，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但是如果处理得不适当，或者失去警觉，麻痹大意，也可能发生对抗。这种情况，在社会主义国家通常只是局部的暂时的现象。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人民的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匈牙利事件所表现的那种范围相当宽广的对抗行动，是因为有内外反革命因素在起作用的缘故。这是一种特殊的也是暂时的现象。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反动派同帝国主义者互相勾结，利用人民内部的矛盾，挑拨离间，兴风作浪，企图实现他们的阴谋。匈牙利事件的这种教训，值得大家注意。

我们是不赞成闹事的，因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可以用“团结——批评——团结”的方法去解决，而闹事总会要造成一些损失，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相信，我国广大的人民群众是拥护社会主义的，他们很守纪律，很讲道理，

决不无故闹事。但这并不是说，在我国已经没有了发生群众闹事的可能性。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一）为了从根本上消灭发生闹事的原因，必须坚决克服官僚主义，很好地加强思想政治教育，恰当地处理各种矛盾。只要做到这一条，一般地就不会发生闹事的问题。（二）如果由于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好，闹了事，那就应当把闹事的群众引向正确的道路，利用闹事来作为改善工作、教育干部和群众的一种特殊手段，解决平日所没有解决的问题。应当在处理闹事的过程中，进行细致的工作，不要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要“草率收兵”。对于闹事的带头人物，除了那些违犯刑法的分子和现行反革命分子应当法办以外，不应当轻易开除。在我们这样大的国家里，有少数人闹事，并不值得大惊小怪，倒是足以帮助我们克服官僚主义。

在我们社会里，也有少数不顾公共利益、蛮不讲理、行凶犯法的人。他们可能利用和歪曲我们的方针，故意提出无理的要求来煽动群众，或者故意造谣生事，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对于这种人，我们并不赞成放纵他们。相反，必须给予必要的法律的制裁。惩治这种人是社会广大群众的要求，不予惩治则是违反群众意愿的。

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就是十分必要的了。

（7）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共产党和民主党派之间的矛盾理论

“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个口号，也是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这个口号并不是突然提出来的，它已经经过了好几年的酝酿。长期共存的思想已经存在很久了。到去年，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这些口号就明确地提出来了。为

什么要让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同工人阶级政党长期共存呢？这是因为凡属一切确实致力于团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事业的、得到人民信任的党派，我们没有理由不对它们采取长期共存的方针。我在一九五〇年六月第二次政治协商会议上，就已经这样说过：“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那末，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这里所说的，也就是各党派可以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这是我们的愿望，也是我们的方针。至于各民主党派是否能够长期存在下去，不是单由共产党一方面的愿望作决定，还要看各民主党派自己的表现，要看它们是否取得人民的信任。各党派互相监督的事实，也早已存在，就是各党派互相提意见，作批评。所谓互相监督，当然不是单方面的，共产党可以监督民主党派，民主党派也可以监督共产党。为什么要让民主党派监督共产党呢？这是因为一个党同一个人一样，耳边很需要听到不同的声音。大家知道，主要监督共产党的是劳动人民和党员群众。但是有了民主党派，对我们更为有益。当然，各民主党派和共产党相互之间所提的意见，所作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也只有在合乎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六条政治标准的情况下，才能够发挥互相监督的积极作用。因此，我们希望各民主党派都能注意思想改造，争取和共产党一道长期共存，互相监督，以适应新社会的需要。

(8)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理论

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并且尽可能地将消极因素转变为积极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这个伟大的事业服务。我们的方针是统筹兼顾、适当安排。无论粮食问题，灾荒问题，就业问题，少数民族问题，知识分子问题，各种爱国力量的统一战线问题，少数民族问题，以及其他各项问题，都要从对全体人民的统筹兼顾这个观点出发，就当时当地的实际可能条件，同各方面的人协商，作出各种适当的安排。决不可以嫌人多，嫌人落后，嫌事情麻烦难办，推出门外了事。我这样说，是不是要把一切人一切事都由政府包下来呢？当然不是。许多人，许多事，可以由社会团体想办法，可以由群众直接想办法，他们是能够想出很多好的办法来的。而这就包括在统筹兼顾、适当安排的方针之内，我们应当指导社会团体和各地群众这样做。

(9)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艺术、科学领域各种派别之间的矛盾理论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学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为了判断正确的东西和错误的东西，常常需要有考验的时间。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作毒草。

同旧社会比较起来，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事物的成长条件，和过去根本不同了，好得多了。但是压抑新生力量，压抑合理的意见，仍然是常有的事。不是由于有意压抑，只是由于鉴别不清，也会妨碍新生事物的成长。因此，对于科学上、艺术上的是非，应当保持慎重的态度，提倡自由讨论，不要轻率地作结论。我们认为，采取这种态度可以帮助科学和艺术得到比较顺利的发展。

(10)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理论

马克思主义也是在斗争中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在开始的时候受过种种打击，被认为是毒草。现在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还在继续受打击，还被认为是毒草。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马克思主义的地位不同了。但是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是有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也有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存在。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人们问：在我们国家里，马克思主义已经被大多数人承认为指导思想，那末，能不能对它加以批评呢？当然可以批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真理，它是不怕批评的。如果马克思主义害怕批评，如果可以批评倒，那末马克思主义就没有用了。

事实上，唯心主义者不是每天都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抱着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而不愿意改变的人们，不是也在用各种形式批评马克思主义吗？马克思主义者不应该害怕任何人批评。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就是要在人们的批评中间，就是要在斗争的风雨中间，锻炼自己，发展自己，扩大自己的阵地。同错误思想作斗争，好比种牛痘，经过了牛痘疫苗的作用，人身上就增强免疫力。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东西，不会有强大的生命力。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

对于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应该采取什么方针呢？对于明显的反革命分子，破坏社会主义事业的分子，事情好办，剥夺他们的言论自由就行了。对于人民内部的错误思想，情形就不相同。禁止这些思想，不允许这些思想有任何发表的机会，行不行呢？当然不行。对待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对待精神世界的问题，用简单的方法去处理，不但不会收效，而且非常有害。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因此，只有采取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理的方法，才能真正发展正确的意见，克服错误的意见，才能真正解决问题。

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地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的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

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开创的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问题的完整的系统的理论，奠定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基础，指出了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前进方向，违背这个理论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4、一九五七年三月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篇讲话的要点是：

(1) 关于我国的社会状况。

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稳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但是，我们大家都应该看到，这个社会主义的新制度是一定会巩固起来的。我们一定会建设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2) 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情况。

从对待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态度来看，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有少数知识分子对于社会主义制度是不那么欢迎、还是爱国的。对于我们的国家抱着敌对情绪的知识分子，是极少数，大约只占百分之一、二、三。

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想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坚决反对马克思

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

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

知识分子，就大多数来说，可以为旧中国服务，也可以为新中国服务，可以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就多数人来说，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完全代替资产阶级世界观，那就还相差很远。知识分子也要改造，不仅那些基本立场还没有转过来的人要改造，而且所有的人都应该学习，都应该改造。

知识分子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

知识分子既然要为工农群众服务，那就首先必须懂得工人农民，熟悉他们的生活、工作和思想。我们提倡知识分子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就世界观来说，在现代，基本上只有两家，就是无产阶级一家，资产阶级一家，或者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或者是资产阶级的世界观。共产主义世界观就是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它不是任何别的阶级的世界观。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的知识分子，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是从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有些人即使是出身于工人农民的家庭，但是在解放以前受的是资产阶级教育，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

(3) 关于整风。

现在共产党中央作出决定，准备党内在今年开始整风。这一次整风，主要是要批判几种错误的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一个是主观主义，一个是官僚主义，还有一个是宗派主义。

片面性问题。

片面性就是思想上的绝对化，就是形而上学地看问题。对于我们的工作的看法，肯定一切或者否定一切，都是片面性的。这样看问题的人，现在在共产党里面还是不少，党外也有很多。

(4) “放”还是“收”的方针问题。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方针。党中央的意见就是不能收，只能放。领导我们的国家可以采用两种不同的办法，或者说两种不同的方针，这就是放和收。放，就是放手让大家讲意见，收，就是不许人家说不同的意见。两种方针，放还是收呢？二者必取其一。我们采取放的方针，因为这是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的方针。

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

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不了解这种情况，放弃思想斗争，那就是错误的。

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否定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这就是修正主义。修正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想。修正主义者抹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抹杀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的区别。他们所主张的，在实际上并不是社会主义路线，而是资本主义路线。在现在的情况下，修正主义是比教条主义更有害的东西。我们现在在思想战线上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开展对于修正主义的批判。

(5) 党委应该把思想问题抓起来。

我们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还有阶级斗争，主要是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而且还很尖锐。

5. 全党开展整风运动

整风的目的

一九五七年三月份以后，党内的整风运动上已经开始。毛泽东一路南下，沿途作报告。

三月十八日，毛泽东在济南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党现在准备开展一次整风运动。整风是用批评和自我批评解决党内矛盾的一种方法，也是解决党同人民之间的矛盾的一种方法。这次整风，就是整顿三风，整顿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经过整风，把我们党艰苦奋斗的传统好好发扬起来。因为革命胜利了，有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过去跟敌人打仗时的那种拚命精神少了，而闹地位，闹名誉，讲究吃，讲究穿，比薪水高低，争名夺利，这些东

西多起来了。

革命党嘛，以饿不死人为原则。人没有饿死，就要做革命工作，就要奋斗。一万年以后，也要奋斗。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革命意志衰退的人，要经过整风重新振作起来。

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

我们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拚命精神，把革命工作做到底。

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这时候，我们有一些缺点，人民还谅解我们。现在是平时，又不打仗，就是训练，如果不坚持密切联系群众，人民对我们的缺点很自然地就难于原谅了。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2]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毫无疑义，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这一条，我们的干部要注意，特别是老干部要注意。

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

（2）开门整风

五月四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请党外人士帮助整风的指示》：

最近两个月以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所展开的，关于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和对于党政所犯错误缺点的批评，对于党和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或间断。其中有一些批评得不正确，或者在一篇批评中有些观点不正确，当然应当予以反批评，不应当听任错误思想流行，而不予回答（要研究回答的时机并采取分析的态度，要有充分说服力），但是大多数的批评是说得中肯的，对于加强团结，改善工作，极为有益。即使是错误的批评，也暴露了一部分人的面貌，利于我们在将

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改造。现在整风开始，中央已同各民主党派及无党派领导人士商好，他们暂时（至少几个月内）不要表示态度，不要在各民主党派内和社会上号召整风，而要继续展开对我党缺点错误的批判，以利于我党整风，否则对我党整风是不利的（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他们同意此种做法。只要我党整风成功，我党就会取得完全的主动，那时就可以推动社会各界整风了（这里首先指知识界）。此点请你们注意。党外人士参加我党整风座谈会和整风小组，是请他们向我们提意见，作批评，而不是要他们批评他们自己，此点也请你们注意。如有不便之处，则以不请党外人士参加整风，而由党邀请党外人士开座谈会，请他们畅所欲言地对工作上缺点错误提出意见为妥。请你们按当地情况斟酌处理。

中央指示下达后，各级党政领导机关和高等学校、科学研究机构、文化艺术单位的党组织纷纷召开各种形式的座谈会和小组会，听取党内外群众的意见。

五月间党中央多次发出党内指示：最近两个月来，在各种有党外人士参加的会议上和报纸刊物上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公开讨论，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绝大多数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改善工作，极为有益。没有社会压力，整风不易收效。党内有一部分人存在反人民的思想作风，所谓人民民主，所谓群众路线，所谓和群众打成一片，所谓关心群众疾苦，对于这些人说来只是空话。党员不尊重党外人士，高人一等，盛气凌人，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完全扳过来，而且越快越好。

（3）右派乘机猖狂进攻

但是，在整风过程中，出现了复杂情况。有极少数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乘机鼓吹所谓大鸣、大放、大民主，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放肆地发动进攻。他们把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攻击为“党天下”，公然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合营企业，要求“轮流坐庄”，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极力抹煞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成绩，根本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把人民民主专政的制度说成是产生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根源。

这种情况引起了我们党的警惕。知识分子队伍中极少数人对社会主义抱有敌

对情绪，这是党本来估计到的并且多次指出过的。但是，他们这时发动猖狂进攻，则是党没有预计到的。

从五月八日到六月三日，中共中央统战部先后召开了十三次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

座谈会期间，有极少数人乘机散布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他们攻击说共产党已经进退失措，社会主义制度不如资本主义制度，历次政治运动失败的居多，要为反革命平反；反对农业合作化、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把官僚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把主观主义、教条主义说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产物和代名词，提出共产党退出机关、学校，公方代表退出公私合营企业，根本的办法是改变社会制度等等。提出要“轮流坐庄”、马列主义的小知识分子领导小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等等。

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了二十五次工商界人士座谈会。

会上有人说：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已经没有两面性，资产阶级分子决不需要脱胎换骨的改造。

五月十四日，毛泽东把五月十日《解放日报》刊登的整风消息，批给其他常委阅读：这一整版值得过细一看，不整风党就会毁了。请你们注意看上海解放日报，南京新华日报，上海文汇报，北京日报，光明日报，集中看人民内部矛盾和我党整风消息，这是天下第一大事。

五月十四日，中央发出《关于报道党外人士对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的指示》：最近各地党外人士正在展开对于党、政各方面工作的批评，这是很好的现象，不但会帮助我党整风，消除同党外人士的隔阂，而且可以在群众中暴露右倾分子的面貌。目前，对于党外人士的错误的批评，特别是对于右倾分子的言论，不要反驳，必须原样的、不加粉饰地报道出来，近来许多党报加以删节，是不对的，这实际上是帮助了右倾分子，并且使人感到是我们惧怕这些言论。这种现象，请立即加以纠正。但是，有三类言论的报道必须加以控制：（一）对于市场物价容易发生影响的消息和言论；（二）违背国家外交政策，易为帝国主义挑拨和利用的消息和言论；（三）涉及个别肃反案件具体事实的消息和言论。

二、打退右派的进攻

运动的初期阶段——发动群众围剿右派

从五月十五日开始毛泽东注意到事情正在起变化

一九五七年五月毛泽东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

五月十五日，毛泽东同志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六月十二日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文章指出：

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他们以为中间派是他们的人，不会跟共产党走了，其实是做梦。中间派中有一些人是动摇的，是可左可右的，现在在右派猖狂进攻的声势下，不想说话，他们要等一下。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党内党外的右派都不懂辩证法：物极必反。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我们和右派的斗争集中在争夺中间派，中间派是可以争取过来的。他们又知道许多大学生属于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的儿女，认为这些人是可以听右派号召起来的群众。有一部分有右倾思想的学生，有此可能。对大多数学生这样设想，则是做梦。新闻界右派还有号召工农群众反对政府的迹象。

只有扣帽子一事，对右派当别论。但是也要扣得对，确是右派才给他扣上右派这项帽子。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给他们留一个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

多数人的批评合理，或者基本上合理，包括北京大学傅鹰教授那种尖锐的没有在报纸上发表的批评在内。这些人的批评目的，就是希望改善相互关系，他们的批评是善意的。右派的批评往往是恶意的，他们怀着敌对情绪。善意，恶意，不是猜想的，是可以看得出来的。

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继续胡闹，自取灭亡。右派先生们，何去何从，主动权（一个短期内）在你们手里。

在我们的国家里，鉴别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的真假善恶，有几个标准。主要是看人们是否真正要社会主义和真正接受共产党的领导。

“为什么不争取右派？”要争取的。只有在他们感到孤立的时候，才有争取的可能。现在，他们的尾巴翘到天上去了，他们妄图灭掉共产党，那肯就范？孤立就会起分化，我们必须分化右派。我们从来就是把人群分为左、中、右，或叫进步、中间、落后，不自今日始，一些人健忘罢了。

是不是要大“整”？要看右派先生们今后行为作决定。毒草是要锄的，这是意识形态上的锄毒草。“整”人是又一件事。不到某人“严重违法乱纪”是不会受“整”的。

这篇文章明确提出了“右派分子”、“右翼分子”，而不是“右倾分子”，指出他们是我们要孤立、打击的对象。

五月十六日，毛泽东为党中央起草党内指示《关于对待当前党外人士批评的指示》：

自从展开人民内部矛盾的党内外公开讨论以来，异常迅速地揭露了各方面的矛盾。这些矛盾的详细情况，我们过去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如实地揭露出来，很好。党外人士对我们的批评，不管如何尖锐，包括北京大学傅鹰化学教授在内，基本上是诚恳的、正确的。这类批评占百分之九十以上，对于我党整风，改正缺点错误，大有利益。从揭露出来的事实看来，不正确地甚至是完全不合理地对党外人士发号司令，完全不信任或不尊重党外人士，以致造成深沟、高墙，不讲真话，没有友情，隔阂得很。党员评级评薪和提拔等事均有特权，党员高一等，党外低一等。党员盛气凌人，非党员做小媳妇。学校我党干部教员助教讲师教授资历低，学问少，不向资历高学问多的教员教授诚恳学习，反而向他们摆架子。以上情况，虽非全部，但甚普遍。这种错误方向，必须扳过来，而且越快好。无论文教界和其他，凡态度十分恶劣，已为多数群众所不信任的同志应当迅速调动工作，以党外资历深信誉好的人员充任，或以胜任的党员充任，以利团结党内外，改进工作。最近一些天以来，社会上有少数带有反共情绪的人跃跃欲试，发表一些带煽动性的言论，企图将正确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巩固人民民主专政以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方向，引导到错误方向去，此点请你们注意，放手让他们发表，并且暂时（几个星期）不要批驳，使右翼分子在人民面前暴露其反动面目，过一个时期再研究反驳的问题。这一点，五月十四日我们已告诉你们了。为了研究问题，请你们多看几份报纸。有些地方例如上海党外批评相当紧张，应当好好掌握

形势，设法团结中间多数力量，逐步孤立右派，争取胜利。

五月十九日，北京有的高等学校开始贴出大字报。中央认为，大字报可以揭露问题，暴露右派，锻炼群众，利多害少。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在高等学校和党政机关迅速展开。

五月二十五日，毛泽东接见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全体代表时的讲话。他说：

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

同志们，团结起来，坚决地勇敢地为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而奋斗。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论行动是完全错误的。

六月六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关于加紧进行整风的指示》。

指示说：毛泽东同志二月二十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及三月间在宣传会议的两次讲话，准备于六月十五日左右在报上发表。各省市一级机关，高等学校及地市一级机关用大鸣大放的方法整风，请即加紧进行。根据北京的经验，在机关及高等学校内部出大字报，一可以揭露官僚主义等错误缺点，二可以暴露一部分有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的人的面貌，三可以锻炼党团员及中间群众（他们应当在大字报上批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故利多害少，毫不足怕。大字报是延安时期的传统，并非现在才有。如果阻止出大字报，就会陷于被动。但机关学校出大字报的消息，报纸不应登载，以免影响中等学校及工厂（个别党外报纸刊登此项消息，可以听之）。将来中等学校及工厂整风时是否允许出大字报，那时再考虑。至于各民主党派及社会人士大放大鸣，使建设性的批评与牛鬼蛇神（即破坏性批评）都放出来，以便分别处理，大有好处。必须注意争取中间派，团结左派，以便时机一成熟，即动员他们反击右派和反动分子。这是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战争和政治战争，我们必须打胜仗，也完全有条件打胜仗。党内团内一部分右倾分子叛变出去，是极好的事，切记不要可惜。对于工厂和中等学校，目前不要整风，但要主动下楼，改善作风，广交朋友，深入群众。不可乱许愿，乱答应，又要避免出乱子，以便上层中层整好，腾出手来，再整好下层。北京的情况证明，各民主党派、高等学校和许多机关中暴露出一大批反动思想和错误思想，反动分子乘机活跃，但是他们只占各单位人数的百分之几，最反动的分子不过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

几是中间派和左派。请你们注意将你们的单位人数，在运动中，按左中右标准，排一下队，使自己心中有数。暑假将届，京沪及各地大学生将回家，其中有些人将到处活动，你们应争取主动，并准备适当应付。最后请你们注意一点，在各高等学校和各机关，凡不合理的事而又现在能解决的，应当尽快解决一批，以利争取中间派，孤立右派。

这时，在各种会议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右派言论有：

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国家交通部部长章伯钧在五月二十一的会上说：政治上的许多设施，就没有一个设计院。我看政协、人大、民主学派人民团体应该是政治上的四个设计院，应该发挥这些设计院的作用上些政治上的基本建设，要事先交他们讨论。现在大学里对党委制很不满，应该展开广泛讨论，制度是可以补充的。

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

民盟副主席、国家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在五月二十二日的会上说：由人大和政协成立一个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不但要检查过去的三反、五反、肃反运动中的偏差，它还将公开声明，鼓励大家有什么委屈都来申斥。这个委员会包括领导党，也包括民主学派和各方面的人士。

储安平“党天下”

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在六月一日的会上说：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不论大小单位，甚至一个科一个组，都要安排一个个做头儿，事无巨细，都要看党员的颜色行事，都要党员点了头才算数，这样的做法，是不是太过分了一点？共产党这样做，是不是“莫非王土”那样的思想，从而形成了现在这样一个一家天下的清一色局面。我认为，这个“党天下”的思想问题是一切宗派主义现象的最终根源，是党和非党之间的矛盾的基本所在。

陈新桂的“无产阶级专政是三大主义的根”

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说：储安平提出的“党天下”、“一党治国”话没有说完。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专政，就是把党外人士看成异党分子，这样不出宗派主义就很奇怪了。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越反越多。

杨玉清的“下轿下台”

国务院参事、《政法研究》副总编辑杨玉清五月三十一在会上说：有些共产党员坐轿子，脱离群众，至今还有人不愿下轿子。那些抬轿了的人也不愿放下轿。首先在北京的上级干部要下轿，有的还要下台。还有一种人特别应该下台，人民日报总编辑非下台不可，因为人民日报几年来都在歌功颂德，这次运动想收不想放。文人的笔杆天然是反现状的，真正的文人是反现状的，从古以来好文章都是反现状的。歌功颂德不为人所称道。不仅要广开言路，而且要广开贤路，今天的事应该谁有本事谁来干。

王德周的“党员有两多两少”

中国人民大学讲师王德周说：党已经到了面临危机的时候了！老百姓开始对中央不信赖了。有些事比国民党的时候更坏。共产党胜利了为什么今天垮的这样？与其说党脱离群众，不如说群众脱离党，现在党快垮了。现在党内有百分之九十的党员闹宗派，甚至无恶不作。现在党员有两多两少，多了特权思想和优越感，少了法律感和道德感。应该由民盟把所有群众组织起来，帮助党整风，监视党整风，以取消特权达到整风的最高效果。

章乃器的“定息不是剥削”

中华全国工商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央副主任委员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而是不劳而获的收入。

李康年的“赎买二十年”

上海公私合营华众织造厂总经理李康年说：目前国家采取的定息办法，每年按股金 5% 发付利息，资本家的股金应该是二十年可以得到全部代价。所以应该把全部资本归还资本家，以赎买到底。

叶笃义的“改变高等党校的党委负责制”

民盟中央办公厅主任叶笃义五月七日在会上说：过去党委管得太多，赞成改变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在学校中不需要有党派组织的活动，共产党员在学校中也不需要以党员身份进行活动。加上一种党派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复杂了。党与非党之间有一堵墙，是因为有了党组织。

陈新桂的“历次政治运动副作用太多”

陈新桂说：三反、思想改造、肃反等等，这几阵暴风雨是产生人民内部矛盾的原因之一。过去几次运动产生的副作用太大，最严重的滋长了唯心主义。人为

地制造了墙和沟；把人分为“积极分子”和“落后分子”。积极分子是“靠运动吃饭”，他们“要避免挨打，就要打人”，这些人简直是败坏社会道德。

这时，在各种会议上，还出现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认为帮助共产党整风，只谈缺点、不提成绩才符合整风精神。以至于在一些场合形成了只准谈缺点错误，不准提成绩优点。

五月二十五日，在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议上，民革中央委员、国务院秘书长助理卢郁文针对这种现象提出批评。民革中央常委谭惕吾当即反驳说：卢郁文的意见不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卢郁文说他与共产党员毫无隔阂，那不是由衷之言。很多党与非党的关系问题，是由无耻的民主人士弄出来的。这些人、隔离党，隔离群众，借机会向上爬。五月二十九日，民革中央小组扩大会上，卢郁文与谭惕吾继续展开争论。六月六日，卢郁文在国务院召开的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宣读了他收到的一封匿名恐吓信，信中说：在报上看到你在民革中央扩大扩大上的发言，我们十分气愤。我们反对你的意见，我们完全同意谭惕吾先生的意见。我们觉得：你就是谭惕吾先生指的那些无耻之徒的“典型”。你现在已经爬到国务院秘书长助理的宝座了。你在过去，在制造共产党与党外人士的墙和沟上是出了不少力量的，现在还敢为虎作伥，真是无耻之尤。我们警告你，及早回头吧！不然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

五月二十七日，在国务院党外人士座谈会上，国务院参事李仲公批评了罗隆基、王昆仑、龙云等人的意见，随后就有人写匿名信骂他是“朋党之恶”。

甚至，还有人写信威胁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要他“随时随地留意，全家留意”。

六月七日，在复旦大学的全校校教师座谈会上，教授笪移今在发言中说：一切言论意见，不利于团结和离开了社会主义的都是错误的。当时，副教授舒宗侨突然站起来大声说：“我们不要听你的教训！”“不要给我们上课！”“不要浪费时间！”有几个人也同时拍手叫喊，要阻止笪移今继续发言。会场秩序陷入混乱状态。

这一切说明，右派的进攻已经达到了猖狂的地步！

右派猖狂进攻发展到顶点的最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是章伯钧召集的“六六六”紧急会议。

民盟中央副主席章伯钧，于六月六日召集六位教授和其他几个人次开会，分析当前的形势并提出他们的对策。

这六位教授是：

曾昭伦，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高等教育部副部长；

钱伟长，清华大学副校长，教授；

费孝通，中央民族学院副院长，教授；

陶大庸，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吴景超，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黄药眠，北京师范大学教授；

参加会议的还有：

叶笃义，民盟办公厅主任；

史良，民盟副主席；

胡愈之，民盟秘书长；（会议开始即离开）；

闵刚候，民盟中央常委；

金若年，民盟中央常委。

在这次会议上一些人认为：

当前的局势非常严重：章伯钧说：交通部在汉口的学校，学生要请愿，其他地方也有学生要罢课，形势十分严重。共产党内部问题也大，评委差不多都是党员，将撤换李富春的大字报贴在李的门口；这是估计不到的。学生上街，市民跟上去，事情就难办了。还有人说：当前的形势很像波兰统一工人党八中全会前夕。

共产党所犯的 error 非常严重。章伯钧说：苏共二十代表大会以后，斯大林被批判，各国共产党所遵循的唯一的理论和行动的教科书——苏共党史也要修改，现在已没有一个理论和实践标准了。列宁死后有两个人，一个是南斯拉夫的铁托成为反对派，另一个是中国的毛公继承了列宁主义。这次整风运动，要党外的人士提意见，其后果，我想毛公一定是估计到的。民主党派提意见想来总是客客气气的，但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党会犯这样多的错误，现在出的问题大大超过了估计，真是超额完成了任务，并且进退失措，收也不好，放也不好。还有人认为，从运动中揭露出来的问题看，情况十分严重主要是制度造成的，而不是个人作风问题。

现在只有民盟站出来说话才能控制局势。章伯钧说：在共产党进退失措、没有办法收的时候，民盟有责任帮助党。民盟现在大有搞头。民主党派要大大发展，同时还要深入到县一级，这样才能真正发挥监督作用。还有人说：在这种严重情况下，要收也容易，只要民主党派站出来说话就可以。现在民主党派说话是有力量的。学生到处找自己的领袖，希望我们能站出来说话。

当然，不是参加会议的每一个人都同意章伯钧等人的意见。但是，章伯钧召集这次“紧急会议”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他就是要利用当时的所谓时机，与共产党摊牌，要共产党实行让步，从而实现他的“轮流坐庄”政治野心。

从六月七日开始毛泽东着手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一九五七年六月毛泽东起草《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六月八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反动分子猖狂进攻。党团员中的动摇分子或者叛变出去，或者动摇思叛。广大党团员中的积极分子及中间群众起而对抗。

反动分子将到本机关、本学校以外的工厂、学校去活动，要预作布置，实行挡驾。

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右派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可以让他们向学生讲演，让学生自由表示态度。最好让反动的教授、讲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

过去七年，我们形式上有主动，实际上至少有一半是假主动。反动派是假投降，中间派的许多人也不心悦诚服。现在形势开始改变，我们形式上处于被动，实际上开始有了主动，因为我们认真整风。反动派头脑发胀，极为猖狂，好似极主动，但因他们做得过分，开始丧失人心，开始处于被动。

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党内，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危险。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动派存在，中间分子又未受到现在的教训，党又未受到现在的锻炼，乱子总

有一天要发生。

六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的社论

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急风暴雨式的反右派运动猛烈地开展起来了。反右派斗争也运用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方法，战场既在党外，又在党内，在共产党内和共青团内也要揭露和批判右派分子。

六月十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反击右派分子斗争的步骤、策略问题的指示》：

（一）北京条件已成熟，人民日报已于六月八日开始反击反动派。但建设性的批评将永远继续登载。也将继续登载一些突出的反动言论，使人民得到警惕，以利批判。各地情况不同，何时开始反击，要看当地情况决定。目前应着重组织各民主党派和高等学校座谈会，推动左中右三派人物展开争论，最为重要。北京正在广泛开座谈会，极有效益。

（二）一个月后，学校将放暑假，许多学生回家乡。你们应当立即通知地县区乡四级，特别是乡级，预作准备。原则是：（1）善意欢迎；（2）向回乡学生解释合作化的优越性，解释二类社三类社现在所以还没有办好的理由，过几年就会办好的。回乡学生可能有许多地富子弟，你们要对地富做好工作，要他们善于教育子弟。学生如果煽动农民反对政府，就要批评他们的错误，给以坚决的教训，但不可打人骂人，讲理为上，以理服人。此点甚重要，请即办。城市也要注意。

（三）在此次浪潮中，资产阶级大多数人表现很好，没有起哄。你们要召集公方代表、党委书记、工会主席等人开会，迅即改善与私方的关系，有鼓励，有批评，拆墙，交朋友。现在工商联、民建会正在向章乃器、李康年等作批判，所以我们不要大搞，以便团结资产阶级大多数，孤立民主党派中知识分子中和学生中的右派和反动分子。

（四）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他们历史复杂，或是叛徒，或是在过去三反肃反中被整的人，或是地富资本家子弟，或是有家属亲戚被镇压的。但他们人数不多，一时可以把空气闹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但是急风暴雨，不崇朝而息。就北京而论，闹了几个星期，现在劲头已不大了，有些动摇恐慌了。各党派中，民

革、民建、九三、民进等颇好，民盟、农工最坏。章伯均、罗隆基拼命做颠覆活动，野心很大，党要扩大，政要平权，积极夺取教育权，说半年或一年，天下就将大乱。毛泽东混不下去了，所以想辞职。共产党内部分裂，不久将被推翻。他们的野心极大。完全是资本主义路线，承认社会主义是假的。民盟右派和反动派的比例较大，大约有百分之十以上，霸占许多领导职位。我们任务是揭露和孤立他们。他们的臭屁放得越多，对我们越有利。但民盟的多数仍然是好的，或者希望改造好的。你们也要作具体的人物分析，实事求是，看得准，打得准。在这次运动中，一定要使反动分子在公众面前扫脸出丑。我们一定要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给扫脸的更是极少数。

3) 毛泽东揭露组织右派进攻的头目——章罗联盟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起草《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看了上海文汇报六月十日刊载的姚文元写的《录以备考——读报偶感》一文，为人民日报写了以“本报编辑部”署名的一篇文章《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还为新华社写了一则转发这篇文章的新闻导语：〈新华社十四日电〉人民日报编辑部就姚文元的文章发表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的资产阶级政治方向的意见：

下面转载的这篇文章见于六月十日文汇报，题为“录以备考”，上海文汇报和北京光明日报在过去一个时间内，登了大量的好报道和好文章，但是，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间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这两个报纸的一部分人对于报纸的观点犯了一个大错误。他们混淆资本主义国家的报纸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报纸的原则区别。在这一点上，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不只文汇、光明两报如此，不过这两报特别显得突出罢了。错误观点是可以经过研究、考虑和批判加以改变的，我们对他们期待着。从最近几天这两个报纸的情况看来，方针似有所改变。党外报纸当然不应当办得和党报一模一样，应有他们自己的特色。但是，它们的基本方向，应当是和其他报纸一致的。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国家，报纸是社会主义经济即在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和资产

阶级国家报纸是无政府状态的和集团竞争的经济通过新闻手段的反映不同。在世界上存在着阶级区分的时期，报纸又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希望在这个问题上展开辩论，以求大家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一致的认识。新闻记者中有一部分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也有资产阶级新闻观点，也应当考虑、研究、批评这个错误观点。教条主义的新闻观点和八股文风，也是应当批判的。这一方面的东西是很讨厌的。党报，包括本报在内，在这一方面犯有错误。这一方面的错误，在辩论中也必须展开批判。这样一来，在新闻问题上就要作反“左”反右的两条战线上的斗争。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故转载于此。并且借这个由头，向我们同业——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说出我们的观点，以供参考。

六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修改中央《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中强调：对于那些仅有右派言论“但并无右派行动的那些人，应把他们和既有言论又有行动（许多人还有历史上劣迹）的那些极右派加以区别，对前者”不要轻率地扣以右派的帽子。“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因为右派势力进攻是有代表人物、骨干分子的，因此，批判右派政治思潮必须结合具体人物。应该说这是符合毛泽东在《事情正在起变化》中说的“批判右派，除个别外，不必具体指名，留下回旋余地，以利在适当条件下妥协下来”的精神的。

为了具体指导这场斗争，毛泽东又继续撰写了一系列文章：

七月一日，毛泽东为《人民日报》撰写了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

这篇文章主要说明了三个问题：

（一）右派猖狂进攻的形势。

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

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呼风唤雨，推涛作浪，或策划于密室，或点火于基层，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以天下大乱、取而代之、逐步实行、终成大业为时局估计和最终目的者，到底只有较少人数，就是所谓资产阶级右派人物。

（二）我党对右派进攻采取的方针。

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

阶级敌人是一定要寻找机会表现他们自己的。他们对于亡国、共产是不甘心的。不管共产党怎样事先警告，把根本战略方针公开告诉自己的敌人，敌人还要进攻的。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就是说，不可避免的。人的意志想要避免，也不可能。只能因势利导，夺取胜利。反动的阶级敌人为什么自投罗网呢？他们是反动的社会集团，利令智昏，把无产阶级的绝对优势，看成了绝对劣势。

（三）与右派矛盾的性质及我们的政策。

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这是一小撮人，民主党派、知识分子、资本家、青年学生里都有，共产党、青年团里面也有，在这次大风浪中表现出来了。他们人数极少，在民主党派中，特别在某几个民主党派中却有力量，不可轻视。

这种人不但有言论，而且有行动，他们是有罪的，“言者无罪”对他们不适用。他们不但是言者，而且是行者。

是不是要办罪呢？现在看来，可以不必。因为人民的国家很巩固，他们中许多又是一些头面人物。可以宽大为怀，不予办罪。一般称呼“右派分子”也就就可以了，不必称为反动派。只在一种情况下除外，就是屡戒不戒，继续进行破坏活动，触犯刑律，那就要办罪。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原则，对他们还是适用。

另有一种右派，有言论，无行动。言论同上述那种右派相仿，但无破坏性行动。对这种人，那就更要宽大些了。错误的言论一定要批判干净，这是不能留情的，但应允许他们保留自己的意见。

所有上述各种人，仍然允许有言论自由。一个伟大的巩固的国家，保存这样一小批人，在广大群众了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不会有什么害处。要知道，右派是从反面教导我们的人。在这点上，毒草有功劳。毒草的功劳就是它们有毒，并且散发出来害过人民。

4) 毛泽东具体组织对右派分子的批判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增加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人数等问题的通知》。

通知指出：有两事通知如下（一）反右派斗争正在深入，准确的右派骨干名单扩大了一倍，全国不是 4000 人，而是有 8000 人。例如北京约有 800 人，上海有 700 多人，包括大学生中的右派在内（清华大学教师及学生中的全部右派骨干分子 50 人）。这些都是在不同范围内点名批判的右派骨干分子。现在的问题是在报纸上点名批判的大约不过只占右派骨干的百分之三左右。例如上海有右派骨干 700 多人，报纸上点名的只有二十多人，不到百分之三。报上老是这几个人，读者也看厌了。因此应当分阶段逐步增加一些人，最后增到右派的百分之十为止。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不要登报。报上点名的百分之十，应包括学生中的著名右派在内。凡报上点名的必须证据充分，最好还有历史劣迹、素来不大得人心的人。（二）北京哲学社会科学家十六人已就右派在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开始举行反攻了。北京此种反攻应当扩大，各地应当响应。自然科学家中在政治方面和学术方面的猖狂进攻，只要有准确的事实，也应组织反击。

七月九日，毛泽东同志在上海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打退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一）对右派人数比例的估计。

北京大学有七千多人，右派只有百分之一、二、三。什么叫百分之一、二、三呢？就是坚决的骨干分子，经常闹的，闹得天翻地覆的，始终只有五十几个人，

不到百分之一。另外百分之一、二的人，是为他们拍掌的，拥护他们的。讲到教授、副教授，那就不同一些，大概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右派。左派也有百分之十左右。这两方面旗鼓相当。中间派占百分之八十左右。

（二）与右派争论的主要内容。

我们的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六亿人民的革命，是人民的事业。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那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好不好？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右派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条。第二条，走那一个方向呢？走这边就是社会主义，走那边就是资本主义。右派就是要倒转这个方向，走资本主义道路。第三条，要搞社会主义，谁人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是共产党领导，还是那些资产阶级右派来领导？右派说不要共产党领导。我看这一回是一次大辩论，就是在这三个问题上的大辩论。辩论一次好。这些问题没有辩论过。这三个问题搞清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的成绩，几亿人民作的事情究竟好不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要搞社会主义的话，要那一个党来领导？是要章罗同盟领导，还是要共产党来领导？来它一个大辩论，把路线问题搞清楚。

（三）反右派斗争采取的形式。

大字报是个好东西，我看要传下去。这个大字报不传下去呀？我看一定要传下去。比如将来工厂里头整风要不要大字报呀？我看用大字报好，越多越好。大字报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用大字报，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大字报。我们相信，多数人是站在无产阶级这一边的。因此，大字报这个工具有利于无产阶级，不利于资产阶级。

大字报，这是个方式的问题，是取一种什么形式作战的问题。大字报是作战的武器之一，象步枪、短枪、机关枪这类轻武器。

（四）对右派的政策。

对右派是不是要一棍子打死？打他几棍子是很有必要的。你不打他几棍子他就装死。对这种人，你不攻一下，不追一下？攻是必要的。但是我们的目的是攻得他回头。我们用各种方法切实攻，使他们完全孤立，那就有可能争取他们，不说全部，总是可以争取一些人变过来。他们是知识分子，有些是大知识分子，争

取过来是有用的。争取过来，让他们多少做一点事。而且这一回他们帮了大忙，当了反面教员，从反面教育了人民。我们并不准备把他们抛到黄浦江里头去，还是用治病救人这样的态度。

（五）整风、反右的政治目标。

我希望造成这么一种局面：就是又集中统一，又生动活泼，就是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

5) 毛泽东系统论述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

一九五七年七月毛泽东的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

七月，毛泽东在青岛召开的省市委书记会议期间写了一篇文章《一九五七年的夏季形势》。这篇文章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七月二十日稿、七月二十五日稿、七月三十日稿、八月一日稿。七月三十日稿经中央政治局批准，于八月一日在这个会议上印发给党内县委及其他相当县委一级的党组织和干部阅读。

在这篇文章的开头，毛泽东就强调指出：“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当时党内高层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七月十一日，中央批准的中央统战部的建议称：“人民内部划分左中右”，右派里面有一部分极右分子，极右分子中的一部分政治上已经处在敌我界限的边缘。这个观点显然同毛泽东在七月一日发表的《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一文中说的“现在又回到‘资产阶级右派就是前面说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派，这是科学的合乎实际情况的说明。”是不一致的。

这篇文章进一步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建成社会主义社会。

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

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准备以八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

（2）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

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造成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新部队（这个新部队，包含从旧社会过来的真正经过改造站稳了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这是历史向我们提出的伟大任务。在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宏大新部队没有造成以前，工人阶级的革命事业是不会充分巩固的。

（3）整风的政治目标。

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

（4）整风的主题和方法。

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派生的方法是党内党外在一起开一些有关大政方针的会议，公开整风，党和政府的许多错误缺点登报批评。民主党派，教育界，新闻界，科技界，文艺界，卫生界，工商界，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各阶层、手工业工人和其他城乡劳动者，都应当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分期分批逐步推行。其中，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城乡独立劳动者），特别是富裕中农，也是使他们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问题；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基本队伍，则是整顿作风的问题。这是性质不同的两个社会范畴的问题。既然有这样的不同，为什么通用整风这个口号呢？这是因为整风的口号较易为多数人所接受。我们向人们说：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尚且进行整风，难道你们不应当整风吗？这就十分主动了。整风的方法是批评和自我批评，摆事实，讲

道理。整风的目的是把斗争方向引导到端正政治方向，提高思想水平，改正工作缺点，团结广大群众，孤立和分化资产阶级右派和一切反对社会主义的分子。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是一个总题目。所谓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就是我党从来经常说的走群众路线的问题。为什么工厂、农村、机关、学校不能够发扬民主，用说服的方法而不是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自己的问题（矛盾）呢？帝国主义都不怕，为什么反而怕老百姓呢？怕老百姓，认为人民群众不讲道理，只能压服，不能说服，这样的人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

大鸣大放阶段（边整边改），反击右派阶段（边整边改），着重整改阶段（继续鸣放），每人研究文件、批评反省、提高自己阶段，这是中央、省市、地、县四级整风的四个必经阶段。还有城乡基层整风。这样整一次，全党和全国人民的面目必将焕然一新。

（5）与右派的矛盾性质、政策和意义。

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

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不这样叫，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一部分右派分子有可能转变过来。

最后不能转变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是死硬派，只要他们不当特务，不再进行破坏活动，也给他们一点事做，也不剥夺他们的公民权。这是鉴于许多历史事件采取了极端政策的后果，并不良好。我们应当看得远一些，在几十年后看这个事件，将会看到我们这样对待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会有深远影响和巨大利益的。

有反必肃。杀人要少，但是决不废除死刑，决不大赦。对刑满释放再犯罪者，再捕再判。社会上流氓、阿飞、盗窃、凶杀、强奸犯、贪污犯、破坏公共秩序、严重违法乱纪等严重罪犯以及公众公认为坏人的人，必须惩办。现在政法部门有些工作人员，对于本来应当捕处的人，也放弃职守，不予捕处，这是不对的。轻罪重判不对，重罪轻判也不对，目前时期的危险是在后者。禁止赌博。认真贯彻取缔会道门。右派学生首领应予彻底批判，但一般宜留在原地管教，并当“教员”。以上各点，适用于过渡时期。

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

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大辩论，全民性的，解决了和正在解决着革命和建设工行是否正确（革命和建设的成绩是不是主要的），是否应走社会主义道路，要不要共产党领导，要不要无产阶级专政，要不要民主集中制，以及我国的外交政策是否正确等项重大问题。很自然地要发生这样一次全民性的大辩论。苏联在二十年代曾经发生过（同托洛茨基等人辩论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1]），我国在五十年代的第七年发生了。我们如果不能在这次辩论中取得完全胜利，我们就不能继续前进。只要我们在辩论中胜利了，就将大大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与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一个伟大的带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6）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

如果有一年整风时间（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就可以跨进一大步。

今后几个月内的任务是教会地县两级取得经验。从现在起，到今冬明春，是逐步教会区乡两级取得经验。城市是教会区级、工矿基层和街道居民委员会取得经验。

在农村中，必须注意阶级路线，必须使原来的贫雇农在领导机关占优势，同时注意联合中农。我赞成迅即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打击地富的反革命行为。其中的主要锋芒是向着动摇的富裕中农，对他们的资本主义思想进行一次说理斗

争。以后一年一次，进行坚定的说理斗争，配合区乡干部的整风，配合第三类社整社，使合作社逐步巩固起来。

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是整个过渡时期的任务。农村中，勤俭持家应当和勤俭办社并提，爱国、爱社应当和爱家并提。

大字报，除商店的门市部、农村（区乡）、小学、军队的营和连队以外，都可以用。在我国条件下，这是一个有利于无产阶级而不利于资产阶级的斗争形式。怕大字报，是没有根据的。在高等学校，在中央、省市、地、县的机关和城市的大企业，大字报、座谈会和辩论会，是揭露和克服矛盾、推动人们进步的三种很好的形式。

在整风中，任何时候都不应当耽误生产和工作。各地整风，不应当在所属一切单位同时并举，而应当分期分批地推行。

2，运动的中期阶段——深入挖掘右派分子

1) 八、九月份毛泽东抓紧深入开展反右斗争

八月一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关于进一步深入开展反右斗争的指示》：

（1）在深入揭发右派分子的斗争中，现在一方面正向地县两级（在城市是向区级和大工矿基层）展开，一方面又必须在中央一级和省市自治区一级各单位深入地加以挖掘。这样，右派分子将继续发现和挖掘出来，人数将逐步增多。右派中的极右分子，即骨干分子，登报的人数，也应适当增加。不是百分之几，也不是百分之十，而是要按情况达到极右派的百分之二十、三十、四十或五十。他们既是极右派，既是事实求是鉴定了的极右派（不是普通右派分子），多一些人在报上，揭露他们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反动言行，使他们在公众面前出丑，就会越有利于教育广大群众，争取中间派，也有利于分化右派。这一点必须坚持，不要犹豫。

（2）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3）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5）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

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5) 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6) 党内团内右派分子，只要是同党外团外右派分子政治面貌相同，即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的，必须一视同仁，一律批判。该登报的，即应登报。

(7) 深入挖掘期间，党和政府工作中错误缺点，边整边改，取信于人，十分重要。这点请你们同样加以注意。

八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转发北京市委《关于反右派斗争情况报告》。报告反映，到八月七日止，全市已发现右派分子 7511 人，已在大小不同范围内重点批判 3529 人，占右派总数 47%。全市有极右分子 1257 人，占右派总数 16.7%。全市已登报的右派分子 135 人，近日又决定增加 55 人。北京各高等学校共发现右派分子 4230 人，占高等学校总人数 1132132 的 3.7%；其中极右分子 1125 人，占右派分子总数的 26.6%。教授中右派分子 192 人（其中极右分子 85 人）占教授总数 1390 人的 13.9%。其中重点批判 108 人，占教授总数的 8%。（十月三十日，中共中央批转北京市委报告说：32 所高等学校，11.3 万余人参加斗争。共发现右派分子 4874 人，占总人数 4.3%，其中极右派 1115 人，占右派总数 23%。已登报批判的极右分子 145 人。）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修改统战部关于在工商界全面开展整风运动的意见时指出：资产阶级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包括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但不叫反革命派而叫右派，一是为了便于争取中间派，二是为了便于分化右派，使右派的一部分有可能转变过来。这是必要的。全国约有十万右派分子，知识分子居多，有些人是有用人材，应当大力争取过来。

八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资产阶级右派斗争中应注意事项的通知》。《通知》指出：有两种表现出来的不适当的办法必须避免。一种是，从追究历史问题转到简单地追究同国民党和帝国主义特务的关系；另一种是，追究右派分子龌龊的私人生活。这两种做法，都妨碍从政治上、思想上对人民进行教

育，必须加以避免。

九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严肃对待党内右派分子问题的指示》。

九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工人、农民中不划右派分子的通知》。

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自然科学方面反右派斗争的指示》。指示说：特别是对于那些有重大成就的自然科学家和技术工作人员，除个别情节严重非划不可者外，应一律采取保护过关的方针。对有圆满解决高科学成就的，不可轻易划为右派，必须划的，也应“斗而不狠”；对有的人“谈而不斗”。对在日内瓦会议以后争取回国的欧美留学生一般要“不排不斗”。

九月十二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为什么说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这篇社论于九月十五日发表。

九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企业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

九月十二日，中财发出《关于在农村举行社会主义大辩论中侨区应当注意的几个问题的指示》。

九月十五日，毛泽东修改人民日报社论《这是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毛泽东强调指出：“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这篇社论于九月十八日发表。

十月，八届三中全会前统计，全国已划右派分子六万余人。

2) 毛泽东主持召开八届三中全会

九月二十日至十月九日，召开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

九月二十日上午一时，毛泽东修改《邓小平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稿》。

经过毛泽东修改的三中全会上邓小平作的《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对前一段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作了总结。《报告》指出：

从今年五月开始的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八月以前主要是在省市以上党政机关、大专学校、民主党派、新闻出版界、科学技术界、文艺界、卫生界中进行。八月以后逐步向工人、农民、工商界、中小学教职员展开，军队也同时开展了整

风。现在正扩大成为全民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同志七月在青岛召开的一部分省市书记会议上，对于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的性质和情况，作出了全面的估计，对于运动的发展，提出了明确的方针。现在的运动正按照中央的方针顺利地开展着。

报告特别对关于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关于农村、关于工人阶级、关于少数民族、关于军队、关于党和团等各个方面的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指导思想、政策、要求作了具体论述。

(一) 报告强调当前的任务是把反右派斗争进行到底。为此，要继续反对右倾情绪，但是，也要防止打击面过宽和简单粗暴的危险。要注意严格掌握划分极右分子、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的界限，始终注意审定所属单位的右派分子名单，对划分不当的必须随时纠正。

(二) 深入挖掘期间，必须实事求是，有些单位右派少，或者确无右派，就不要主观主义地勉强去找右派。

(三) 要准确地鉴定极右派、普通右派和中间偏右分子这三种人的界限，以免泛滥无归，陷入被动，丧失同情。此点必须注意。

(四) 反右斗争，必须坚持辩论方式，摆事实，讲道理。而且事实要是准确的寤，不是虚构的“事实”，讲道理要讲得使大多数人心服，切不可强词夺理。

(五) 地县两级、城市区级及工厂基层的领导人经验较少，有些鉴别水平不高，你们必须谆谆给以教育，随时检查，使他们站得稳、打得准。这是要十分注意的。”

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上讲话：做革命的促进派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 我们同苏联的争论

首先，在斯大林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有矛盾。他把斯大林搞得那么不象样子，我们不赞成。因为搞得那么丑嘛！这就不是你一国的事，这是各国的事。我们天安门前挂斯大林像，是符合全世界劳动人民愿望的，表示了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基本分歧。斯大林本身，你也要给他三七开嘛！斯大林的成绩算它七分，错误算它三分。这也未必见得准确，错误也许只有两分，也许只有一分，也许还稍

微多一点。总而言之，斯大林的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这一点，我们同赫鲁晓夫有不同意见。

还有和平过渡的问题，我们同赫鲁晓夫他们有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无论那个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要有两条：第一条，和平；第二条，战争。第一条，共产党向统治阶级要求和乎转变，学列宁在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之间那个时候所提的口号。我们也向蒋介石提过谈判和平的问题。这个口号，在资产阶级面前，在敌人面前，是防御的口号，表示我们要和平，不要战争，便于我们争取群众。这是个主动的口号，是个策略性质的口号。但是，资产阶级决不会自动地交出政权，它要使用暴力。那末，第二条，你要打，你打了第一枪，我只好打。武装夺取政权，这是战略口号。你说一定是和平过渡，那跟社会党就没有差别。日本社会党就是这样，它只有一条，就是永远不搞暴力。全世界的社会党都是这样。无产阶级政党一般地还是要有两条：君子动口不动手，第一条；第二条，小人要动手，老子也动手。这样的提法，就没有弊病，都管到了。不然，就不行。现在有些国家的党，比如英国共产党，就是只提和平过渡的口号。我们跟英国党的领导人谈，老是谈不通。他们当然骄傲了，他说和平过渡怎么是你赫鲁晓夫提的？我早已经提了！

此外，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苏联同志不理解。我们讲的是社会主义范围的、人民内部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反革命不在内。当然，人民内部可以分化，一部分变为敌人。比如右派，过去是人民，现在这些人，我看是三分之一的人民，三分之二的反革命。是不是剥夺他们的选举权？除开个别的要法办、劳改，那要剥夺选举权外，一般的以不剥夺为好。有的人还可以让他当政协委员，横直政协搞个千把人。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公开宣布，他们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因为他们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无产阶级专政。总之，不合乎六条标准嘛！这是毒草。人民内部不管那一天总要出一点毒草的。

(2) 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

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末，现在的主要矛

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

“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象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他要吹几级台风。那末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

（3）整风的任务

要大胆地放，彻底地放，坚决地放；要大胆地改，彻底地改，坚决地改。我们要有这样的决心。那末，还要不要加一个反右派，大大地反？可以不加。因为反右派是上了轨道的，有些地方已经结束了。现在的重点是基层的放，基层的改，就是县、区、乡三级的鸣放和整改。中央和省市一级，有些部门放还是要放，但重心是改的问题。

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

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去年，

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我看整风搞到明年五月一日，下半年就不再搞了。农村里头明年下半年是不是再搞一次，辩论一次，看那个时候需要不需要，明年再议。后年是要搞一次的。假使我们后年也不搞，几年不搞，那些老右派，新右派，现在出来的右派，又要蠢蠢欲动；还有些中右分子，中间派，甚至于有些左派会要变。世界上有那么怪的人，只要你松松劲，松那么相当的时间，右倾情绪就要起未，不好的议论，右派言论都要来的。

(4) “四大”是发扬社会主义民主的好形式

今年这一年，群众创造了一种革命形式，群众斗争的形式，就是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现在我们革命的内容找到了它的很适合的形式。这种形式，在过去是不能出现的。我们找到了这个形式，适合现在这个群众斗争的内容，适合现在阶级斗争的内容，适合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抓住了这个形式，今后的事情好办得多了。大是大非也好，小是小非也好，革命的问题也好，建设的问题也好，都可以用这个鸣放辩论的形式去解决，而且会解决得比较快。左派不仅同中间派一道鸣放辩论，而且完全公开地同右派一道鸣放辩论，在农村里头同地主、富农一道鸣放辩论。这种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形式，最适合发挥群众的主动性，提高群众的责任心。

我们党有民主的传统。没有民主的传统，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但是，这样的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这种形式只有现在这个时候才能产生。找到了这种形式，对于我们的事业会有很大的好处，克服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命令主义（所谓命令主义，就是打人骂人，强迫执行），领导干部同群众打成一片，就容易做到了。

我们的民主传统今年是一个很大的发展，以后要把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传下去。这种形式充分发挥了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有，资本主义国家不可能有。在这样的民主基础上，不是削弱集中，而是更加巩固了集中制，加强了无产阶级专政。因为无产阶级专政要靠广大的同盟军，单是无产阶级一个阶级不行。中国无产阶级数量少，只有一千多万人，它

要靠几亿人口的贫农、下中农、城市贫民、贫苦的手工业者和革命知识分子，才能实行专政，不然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发动了他们的积极性，无产阶级专政就巩固起来了。

(5) 社会主义建设的两种方法。

讲到农业与工业的关系，当然，以重工业为中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一条毫无问题，毫不动摇。但是在这个条件下，必须实行工业与农业同时并举，逐步建立现代化的工业和现代化的农业。

两种方法。做事情，至少有两种方法：一种，达到目的比较慢一点，比较差一点；一种，达到目的比较快一点，比较好一点。一个是速度问题，一个是质量问题。

去年这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好、省我看没有那个人反对，就是一个多、一个快，人家不喜欢，有些同志叫“冒”了。本来，好、省是限制多、快的。好者，就是质量好；省者，就是少用钱；多者，就是多办事；快者，也是多办事。这个口号本身就限制了它自己，因为有好、省，既要质量好，又要少用钱，那个不切实际的多，不切实际的快，就不可能了。我们讲的是实事求是的合乎实际的多、快、好、省，不是主观主义的多、快、好、省。我们总是要尽可能争取多一点，争取快一点，只是反对主观主义的所谓多、快。

还扫掉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我曾经谈过，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各级党委，还有国务院，各级人民委员会，总而言之，“会”多得很，其中主要是党委会，它的性质究竟是促进委员会，还是促退委员会？应当是促进委员会。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从这次讲话可以看出，毛泽东已经开始把注意力转向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去了。

3) 一九五七年十月毛泽东在第十三次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

这篇讲话主要说明了这样几个问题：

(1) 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时期和社会各阶级的分析

社会主义革命是在一个什么范围内的革命，是一些什么阶级之间的斗争呢？就是无产阶级领导劳动人民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

为什么社会主义这个关难过呢？因为这一关是要破资本主义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要破个体所有制，使它变为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当然，这个斗争要搞很多年的，究竟多长时间叫过渡时期，现在也还很难定。

在全国总人口中间，大概有百分之十的人，是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包括地主阶级，富农，一部分富裕中农，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部分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甚至个别的工人、贫下中农。六亿人口的百分之十是多少呢？是六千万人。这个数目不小，不要把它看小了。

我们说要坚定地相信群众的大多数，有两个出发点：第一，我们有百分之九十的人赞成社会主义。这里包括无产阶级，农村里头半无产阶级的贫农，下中农，还有上层小资产阶级的多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以及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第二，在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里边，最顽固的分子，包括极右派，反革命，搞破坏的，还有不搞破坏但很顽固的，可能要带着顽固头脑到棺材里面去的，这样的人有多少呢？大概只有百分之二左右。

基础就是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相信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是好人。工人的大多数是好人，农民的大多数是好人。共产党里，青年团里，大多数是好人。这里所谓多数，是不是百分之五十一呢？不是的，是百分之九十到百分之九十八。

我国解放以前只有四百万产业工人，现在是一千二百万工人。工人阶级人数虽然少，但只有这个阶级有前途，其他的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都要过渡到工人阶级那方面去。

我国无产阶级数目比较小，但是它有广大的同盟军，最主要的就是农村里头的贫农、下中农，他们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七十或者还要多一点。富裕中农大约占农村人口的百分之二十。现在的富裕中农大体分三部分：赞成合作化的，占百分之四十；动摇的，占百分之四十；反对的，占百分之二十。农民头一步过渡到集体化的农民，第二步要变为国营农场的工人。

富农是农村的资产阶级，他们在农村说话没有什么人听。地主的名声更臭。

买办资产阶级早就臭了。这几年来，经过教育改造，地主、富农也有分化，现在也有不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的。

资产阶级要灭掉。不是讲把人灭掉，是把这个阶级灭掉，人要改造。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改造，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改造，可以逐步地改造过来，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现在许多人进了工会，有人说进了工会岂不就变成工人阶级了吗？不。有的人进了共产党，他还反共。进了工会不等于就是工人阶级，还要有一个改造过程。对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加以分析，不要以为他们都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事实不是那样。在全国总人口中，赞成社会主义的，有百分之九十。我们要相信这个多数。经过工作，经过大辩论，还可能争取百分之八，就变成百分之九十八。坚决反社会主义的死硬派，只有百分之二。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农村的上层小资产阶级（富裕中农），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一些比较富裕的小业主）和他们的知识分子，这些人就有些影响了。特别是这个知识分子吃得开，那一样都缺不了他。办学校要有大学教授、中小学教员，办报纸要有新闻记者，唱戏要有演员，搞建设要有科学家、工程师、技术人员。现在知识分子有五百万人，资本家有七十万人，加在一起，约计六百万人，五口之家，五六就是三千万人。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是比较最有文化的，最有技术的。右派翘尾巴也在这里。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上层小资产阶级和他们的知识分子，他们里头的右派和中间派，对于共产党、无产阶级的领导是不服气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要承认有改造的必要。为什么要思想改造？就是为了要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建立无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那些老知识分子会要逼得非变不可，因为新知识分子起来了。我们估计，大多数人是能够前进的，一部分是能够改造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无产阶级必须造就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这跟资产阶级要造就它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一个阶级的政权，没有自己的知识分子那是不行的。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一定要造就无产阶级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包括从旧社会来的经过改造真正站稳工人阶级立场的一切知识分子。有人说，要先专后红。所谓先专后红，就是先白后红。他在这个时候不红，要到将来再红，这个时候不红，他是什么颜色呀？还不是白色的。知识分子要同时是红的，又是专的。要红，就要下一个决心，彻底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这并不是要读很多书，而是要真正弄清什么叫

无产阶级，什么叫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只有无产阶级有前途，其他阶级都是过渡的阶级，为什么我们这个国家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一定要共产党领导等等问题。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把他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改造成无产阶级世界观，这要一个过程，而且要有一个社会主义思想革命运动。今年这个运动，就是开辟这条道路。

(2) “四大”是一种新的民主形式

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是群众创造的一种新形式，新的革命内容，它要找到新的形式。现在的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它找到了这种新形式。这种形式，可以很快普及，很快学会，几个月就可以学会。对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主要有两怕：一个是怕乱。你们怕不怕乱？我看有许多人是怕乱的。还有一个是怕下不得台。不鸣不放是不利的，小鸣小放不能解决问题，还是要大鸣大放。大鸣大放，一不会乱，二不会下不得台。当然，个别的人除外，目的是要烧共产党，就下不得台。那是少数人，是右派。其他的人就不要怕下不得台，可以下台的。无非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之类的毛病，有则改之，不应当怕。

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这个基础上，在现在这个时候，出现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这种形式，很有益处。这种形式是没有阶级性的。什么大鸣、大放、大字报，右派也可以搞。感谢右派，“大”字是他们发明的。我在今年二月二十七日的讲话中，并没有讲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没有这个“大”字。去年五月，我们在这里开会讲百花齐放，那是一个“放”，百家争鸣，那是一个“鸣”，就没有这个“大”字，并且是限于文学艺术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后来右派要涉及政治，就是什么问题都要鸣放，叫作鸣放时期，而且要搞大鸣大放。可见，这个口号无产阶级可以用，资产阶级也可以用，左派可以用，中间派可以用，右派也可以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究竟对那个阶级有利？归根结底，对无产阶级有利，对资产阶级右派不利。原因是，百分之九十的人不愿意国家乱，而愿意建成社会主义，百分之十不赞成或者反对社会主义的人中间，有许多人是动摇的，至于坚决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只有百分之二。你乱得了呀？所以，大鸣大放的口号，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方式和方法，归根结底有利于多数人，有利于多数人的自我改造。两条道路，一条社会主义，一

条资本主义，归根结底有利于社会主义。

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在多数人拥护社会主义的基础上，用我们这个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办法，可以避免匈牙利那样的事件，也可以避免现在波兰发生的那样的事件。

(3) 右派会一分为二

按照辩证法，我看右派会一分为二。可能有相当多的右派分子，大势所趋，他们想通了，转好了，比较老实，比较不十分顽固了，那个时候把帽子一摘，就不要叫右派了，并且还要安排工作。少数极顽固的，可能死不悔改，戴着右派帽子进棺材，那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这样的人总是会有的。

反击右派总要告一个段落嘛！这一点，有的右派估计到了。你不能老反右派，天天反，年年反。比如，现在北京这个反右派的空气，就比较不那么浓厚了，因为反得差不多了，不过还没有完结，不要松劲。现在有些右派死不投降，象罗隆基、章乃器就是死不投降。我看还要说服他，说几次，他硬是不服，你还能天天同他开会呀？一部分死硬派，他永远不肯改，那也就算了。他们人数很少，摆到那里，摆他几十年，听他怎么办。多数人总是要向前进的。

是不是要把右派分子丢到海里头去呢？我们一个也不丢。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捕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

章伯钧的部长怎么样呀？部长恐怕当不成了。右派当部长，人民恐怕不赞成吧！还有一些著名的右派，原来是人民代表，现在怎么办？恐怕难安排了。比如丁玲，就不能当人民代表了。有些人，一点职务不安排，一点工作不给做，恐怕也不好。比如钱伟长，恐怕教授还可以当，副校长就当不成了。还有一些人，教授恐怕暂时也不能当，学生不听。那末干什么事呢？可以在学校里头分配一点别的工作，让他有所改造，过几年再教书。

(4) 机关学校要抓紧整改

整风有四个阶段：放，反，改，学。就是一个大鸣大放，一个反击右派，一个整改，最后还有一个，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

现在有些机关、学校，反过右派之后，风平浪静，他就舒舒服服，对提出来的许多正确意见就不肯改了。北京的一些机关、学校就发生这个问题。我看，这个整改又要来一个鸣放高潮。把大字报一贴，你为什么不改？将一军。这个将军很有作用。整改，要有一个短时期，比如一两个月。还要学，学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风细雨，搞点批评和自我批评，那是在第四个阶段。这个学，当然不是一两个月了，只是讲这个运动告一段落，引起学习的兴趣。

这篇讲话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的进一步发挥。此后，毛泽东就很少涉及关于整风，特别是反右派问题了。而实际上，就全国来说，更大面积的县以下的反右派斗争，是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进行的。

3，运动的后期阶段——反右逐步趋向扩大化

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批示在船员中不划分右派。

十月十五日，发出《关于在少数民族中进行整风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

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中等学校和小学的教职员中开展整风和反右派斗争的通知》。

十月十五日，中央发出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的通知。

通知指出：在运动进到深入阶段，在切实纠正了温情主义右倾情绪以后，一些单位把右派的标准放得宽了一些，以至多划了一部分右派的情况，比较更需要引起注意。通知还规定：凡是各单位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县一级或县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高级知识分子、重要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和其他特殊情况的右派分子的名单，必须报告省一级或省一级以上的党的领导机关审查批准。

《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规定：

（一）凡言论、行动属于下列性质者，应划为右派分子：（1）反对社会主义制度。（2）反对无产阶级专政。（3）反对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4）以反对社会主义和反对共产党为目的而恶意分裂人民内部团结。（5）组织和积极参加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小集团；蓄谋推翻某一部门或者某一基层单位的共产党的领导；煽动反对共产党、反对人民政府的骚乱。（6）为犯有上述罪行的右派分子出主意，拉关系，通情报，向他们报告革命组织的。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划为极右分子：（1）右派活动中的野心家、为

首分子、主谋分子和分子。(2) 提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意见，并积极鼓吹这种意见的分子。(3) 进行反党反社会主义活动特别恶劣、特别坚决的分子。

(4) 在历史上一贯反共反人民，在这次右派进攻中又积极进行反动活动的分子。

(三) 有下列情形之一，其错误应予批评纠正，但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1)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共产党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2) 有过类似右派的思想，但是并未发表过或散布过，而且已经认为错误、自动检讨出来的人，或者偶然讲过类似右派的话，现在已经承认错误，而在历史上一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3) 对于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制度或共产党的领导发表了错误言论，但是并未积极宣传，事实证明不是出于敌意，经过指正表示愿意转变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4) 一度盲目地附和了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或者一度被蒙蔽参加了右派小集团，或者一度被右派利用，在了解右派错误后，迅速地站到正确立场，同右派决裂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5) 历史上曾经站在反动立场，现在也没有显著转变，但是在右派进攻时期并未进行反动活动的人，不应划为右派分子。

(6) 凡是界乎右派分子和中右分子之间的疑似分子，在尚未查出足以确定为右派分子的充分材料之前，一概不划为右派分子，并且不用斗争右派分子的方法来对待他们。

这个标准尽管仍然十分难于具体操作，总算有了一个全国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对防止多划右派分子，可以起到一定的有益作用。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指出：一届人大代表中右派分子 62 人。经中央决定，其中 53 人由原选区人民代表大会撤消其代表资格。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规定：乡（区）级整风，不进行反右派斗

争。

三月七日，中共中央提出《对民主人士中的右派分子进行工作的意见》。

四月二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问题的指示》。指出：在双反告一段落后，应当及时地转入整风的第四阶段，即阅读文件，个人反省、提高自己的阶段。

五月，浙江、甘肃、安徽、云南、广西、青海、河北、广东、新疆、河南、山东等省和自治区的代表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发言中，报告了本地区党组织在整风运动中，同党内的右派分子、地方主义分子、民族主义分子、以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作斗争的经过。

至一九五八年三月，全国的反右派斗争即已告一段落。而此时全国划的右派分子却达到五十五万人，比一九五七年九月的六万人几乎多出了十倍。但当时统计上报的只有三十万人，后来又说是四十五万人。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实际上去年十二月以后还在小学教员中搞出了十几万右派，占全国三十万右派的三分之一，他们还是猖狂进攻。

三、对右派分子分批摘帽

反右派斗争过后不久，毛泽东就提出给右派分子逐年摘帽的问题。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四日，毛泽东提出分期分批为右派分子摘帽的建议：

关于全国 45 万右派分子分期分批摘帽的问题，据江西省委杨尚奎同志说，是一个重要的政策问题。他说，已经向你说过了，你答应回北京统一考虑此问题。我认为，积以时日，至少可以争取 70% 的右派分子改变过来。例如说，在今后七年中（或更多时间），每年争取转变和摘掉帽子 10% 左右，是有可能的。请你向常委和书记处讨论一次，由中央发一个指示，在国庆十周年时机根据确有改变的情况，给第一批改好了的右派分子，摘掉 45,000 人左右的帽子，即 10%，对于教育右派分子，一般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成员，将大有作用，他们会感到确有前途。对于目前反右倾、鼓干劲也甚有利。摘去帽子后，旧病复发，再次、三次……右倾，也不要紧，给他再戴上右派帽子就是了。

九月七日，中共中央向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下发了《关于讨论特赦罪犯和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问题的通知》。

九月十六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确实表现改好的右派分子的处理问题的决定》。

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摘掉确实悔改的右派分子的帽子的指示》。

十一月二日，中共中央作出了《关于摘掉右派帽子的人员的工作分配和生活待遇的规定》。

第一批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约有五万人左右。到一九六四年又有四批约三十万人先后被摘掉帽子。这就已经超过了七年中摘掉 70%（应为 315,000 人）右派分子帽子的估计。其中，一九六二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右派分子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中曾提出：如果领导上认为需要由右派分子本人或家属申请甄别的，可以甄别。对于确实错划的，予以平反。对于可划可不划而划了的，可以从宽摘掉他们的右派分子。这个建议未被中央采纳。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组织反击右派的问题

这些年来，是遭受右派攻击最多的一个问题。

辛子陵在《毛泽东全卷》中说：

“毛泽东提出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被认为是一大贡献。笔者不敢苟同。因为毛泽东晚年在这个问题上犯的错误最大……而变成了欺世盗名。”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是毛泽东提出的，也变成了宣传口号，如果不说是欺骗口号。许多知识分子相信了这一政策，发表言论，著书立说，招来滔天大祸。”

：“毛泽东主动提出不做下届国家主席，一不是真心退隐，二不是出于谦逊，三不是身体不堪繁巨。他的真实动机是要‘高升’一步，成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进而成为世界革命领袖。”

“问题出在哪里呢？出在恭维了周恩来，把周恩来作了中共和社会主义的代表。这在毛泽东是最敏感的问题……在毛泽东的心目中，拥护周恩来和拥护毛泽东是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

“毛泽东正要在中国知识界树立自己的至上无上的权威，如何能容许这种挑

战！”

“毛泽东震怒了。毛泽东本想通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赢得知识分子的心，逐步确立自己在知识界的思想领袖地位，如今他看到知识分子和工农分子是不同的……在这些人中建立信仰，让他们崇拜自己，是不可能的。于是，毛泽东决心要整倒一批‘资产阶级的大知识分子’，用暴力树立自己的权威。”

这就是辛子陵对反右派运动的攻击和歪曲。

肖冬连的《求索中国——文革前十年史》也认为，毛泽东从整风转向反右就错了。它说：

五月十九日以后，“毛泽东此时关注的不再是整顿三风的问题，而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问题，是在党内肃清修正主义的问题了。”

“毛泽东的态度发生重大变化之后，共产党的开门整风在某种程度或意义上成为‘引蛇出洞’的手段。到了6月8日，毛泽东抓住‘匿名信事件’这一契机，发动了全民的反右派运动。”

“整风的主题变了，鸣放的目的也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党内那些对开门整风方针持抵触情绪的干部，他们一旦了解到毛泽东和中央的反击意图，理所当然地要推波助澜，积极地将各种鸣放形式转化为‘引蛇出洞’的手段。由此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进一步加剧了紧张局势；二是为即将发起的反击右派斗争制造了更多的目标。”

“当时党内一些高级负责干部就这样地运用“引蛇出洞”的战术，人为地制造出“黑云压城城欲摧”的严重局势，从而为大规模的反击提供了最主要的‘客观’依据。由于毛泽东此时的注意力已经返回到阶级斗争问题上，所以他对这种战术也给以肯定和支持。”

“‘引蛇出洞’战术所造成的假象，使毛泽东对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作出了更为严重的判断。”

“从此以后，党的八大所判定的国内主要矛盾就被逐步扭曲，客观上已不是主要矛盾的阶级斗争，又被抬高到不适当的地位，以致产生了一连串的逆向发展，终于把我国推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

“不论是‘章罗同盟’，还是‘章罗联盟’，都必须具备如下的条件：一是

订立盟约，二是具有根据盟约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如果以这两个条件来衡量，所谓的‘章罗联盟’并不存在。”

“‘挖’出这个事实上并不存在的‘章罗联盟’，在当时被看作反右斗争的重大成果，它对于整个反右斗争的战略布署，‘意义’太重大了：不仅确定了反右派的主攻方向，而且向全国人民证明了中断整风而转向反击右派的必要性。”

“反右派斗争此时已经无可挽回地走进了一个‘怪圈’：‘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理论导致了阶级斗争的扩大化，而这种扩大化的成果反过来又成为这个理论正确性的证明。”

“从总体上看，这篇文章（按：指《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表现出的是一种‘左’的倾向，即它过分地强调了阶级斗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并把一些人民内部的思想认识问题夸大为敌对阶级间的阶级斗争。”

“在青岛会议精神和中央上述指示的引导下，几个月的‘深入挖掘’造成了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局面。

首先对右派性质作出了严重脱离实际的判断，在质的方面绝对地夸大了同右派斗争的严重性。……

其次，这声运动采用具有极大主观随意性的策略方针对待批判对象，以至于打击面过宽。……

最后，对被揭露出来的右派分子，处理的份量过严过重。”

《毛泽东传（1949-1976）》与这种攻击毛泽东、全盘否定反右斗争的观点，有根本区别。但是，它对反右斗争的一些分析和评论也是不正确的。

该书说：六月二十九日，又发出经毛泽东审阅修改的《关于争取、团结中间分子的指示》，毛泽东在修改这个指示时加了一段话，涉及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问题。他提出：“右派和极右派的人数，以北京三十四个高等学校及几十个机关中，需要在各种范围点名批判的，大约有四百人左右，全国大约有四千人左右，你们应当排个队，使自己心中有数。”

“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

作者们凭什么说“这个数字规定的打击面已经过宽”呢？至于“以后又大大突破，造成十分严重的后果”，那是另外一回事了。

该书说：“毛泽东和全党都缺乏经验。而毛泽东本人对极少数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对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当时，右派分子向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进攻的形势严重不严重？整个阶级斗争的形势严重不严重？当时亲身经历过来的人，都有深刻的感受。特别是身处北京的高等院校环境中的人，更有深刻的感受。当时之所以没有发展到如匈牙利事件那样更严重局面，就是因为毛泽东和党中央正确地估计了形势并采取了正确的路线和斗争策略。

该书说：“七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的社论。这篇社论，是毛泽东起草的。社论从最近《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的检讨谈起，然后谈到有些民主党派在运动中的表现，特别点了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的名，点了“章罗同盟”的名。事实证明，这些批评并不能成立。”

“在整风鸣放过程中，确有右派言论，也确有极少数人想反对党的领导，反对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能由此得出结论，某个民主党派（如社论所说的民主同盟和农工民主党）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有路线，都是自外于人民的，是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更不能说，这个党派有一条“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社论使用了“章罗同盟”这个词，是根据当时的揭发材料得出的。社论说，“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其源盖出于章罗同盟”。实际上，章、罗之间也不存在什么“同盟”。”

说“章罗同盟”“在组织上应肯定其不存在”，这完全是书生之见！如果由这样的人去指导政党之间的政治斗争，那是要亡党亡国、人头落地的！革命的人们不应该忘记一九二七年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的经验教训。

该书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写道：“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和人民的矛盾，是對抗性的不可调和的和你死我活的矛盾。”“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举行猖狂进攻的资产阶级右派是反动派、反革命派。”这一来，大批被错划的所谓“右派分子”成了“人民的敌人”、“反动派”、“反革命派”。他们虽然还保留选举权，但长期承受着政治上、思

想上的打击、歧视和伤害。这是对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严重混淆。

按照作者们的观点，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不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活的矛盾，而是非对抗性的、可以调和的、你活我也活的矛盾。这可真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

二、关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问题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批驳了这些错误观点，他指出：

我们反右派斗争，扩大化是怎么造成的，是不是毛主席这套理论和政策造成的？人民内部矛盾讲得很清楚，区别毒草和香花，区别右派和左派的标准是六条，其中最重要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按照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只要不是反对党的领导，不是反对社会主义的人，即使他有严重错误，也不应当成敌我矛盾，不应划为右派。还有一个数字的控制，最早毛主席说是 4 千人，后来扩大到 8 千人，最后，毛主席说全国展开以后控制在 10 万人，实际上搞了 55 万人。教训是：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这个看法是不是合乎道理、合乎实际？

这里不能不说书记处有责任。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第一段反右派斗争，统战部李维汉召开民主党派的座谈会、工商联的座谈会，了解民主党派、高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分子中间的反右派情况，及时向中央反映，提出建议。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就没有像统战部那样的部门来帮助书记处干这件事了。书记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由此说整风、整党到后来，除了所说的全党在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有很大提高以外，原来整党的三条：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经过反右派斗争，有些部门，有些地方，三风不正不是减少了，相反是更增加了。省、市、区

领导中，有一些品质不好的人，把反右派当成一个武器，来反对和他不同意见的人。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与斯大林肃反扩大化效果大不相同。应该讲是毛主席接受了苏联肃反扩大化的教训。还有一点应该说到，右派的进攻激发了工人、农民、广大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义愤。右派进攻猖狂的时候，《内部参考》也反应广大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广大干部的不满：为什么要他们这样胡说？为什么让他们这么猖狂的进攻？等6月8日《人民日报》“这是为什么”的社论一出来，工人、农民、广大的知识分子、干部受到了鼓舞，应该说，对广大的人民来讲，这个实践，这个理论起了积极的作用，这也和斯大林肃反的扩大化不一样。1957年的生产发展很好，工人用自己的行动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到1956年，用四年的时间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过1956年调整，使1957年的生产发展更健康，速度虽然稍降低了一点，但是1957年的生产、整个经济工作达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反右斗争发生扩大化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几点分析：

1，毛泽东开始提出的某些原则没有坚持

毛主席作了这样的理论，作了这样的政策规定，作了数字的控制，以后，他的思路转到另一方面去了，实际上等于放羊了。

如果坚持一开始反右派斗争时毛泽东提出的：对右派除个别例外，不必具体指名，不予办罪，是不是可以更有利于开展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而避免斗争的扩大化等后遗症呢？

全国五百万知识分子，从其中划出的右派分子竟占到了百分之十。毛泽东历次讲话中反复强调：知识分子中所谓百分之一、百分之三、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十的右派是一种估计，可能多些，可能少些。在各个单位内情况又互相区别，必须确有证据，实事求是，不可过分，过分就是错误。而运动的结果却达到了他的最高的一种估计。这显然是“过分”了。

2，中央书记处的严重失职。如果说，反右派斗争发生过扩大化，主要应该是在一九五七年九月至一九五八年三月这一阶段。而这一阶段的具体工作，是由作为党的总书记、中央整风办公室主任的邓小平具体进行指导的。这不能不说是邓小平的一个重大失职。省委怎么搞、市委怎么搞、县委怎么搞？应该检查督促，应该了解情况，及时发现毛病加以纠正。等到反右派斗争往下开展的时候，书记

处总以为有理论、有政策了，照政策办事就成了嘛！对干部的情况，对干部中存在的缺点，没有检查，没有督促，没有发现问题。

3，各级领导干部中存在宁“左”勿右的思想。

4，党内一些官僚主义者乘机整人。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全国都整风反右派，一直搞到各个县，各个区、各个乡。到了这个时候，被划成右派的，绝大多数是给本单位、本地区的领导提了不同意见、提了批评的人。各个单位、各个地区，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了严重的扩大化。这不能归咎于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相反是违背了毛主席的理论和政策造成的。

三、关于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

《毛泽东传》说：《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这篇文章还提出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为以后频繁地开展政治运动，发生阶级斗争扩大化，提供了理论上的重要依据。

它指的是《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的这样一段话：“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观点不正确吗？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三）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

“在反右斗争中，毛主席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时提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还要有一个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根据历史的经验看，反右派斗争是一个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所有制的改革完成以后，思想上、政治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没有完成，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是反右斗争一直到1957年底，毛主席多次讲话中加以阐述、加以论证的重大问题。究竟对这个问题怎么看，是合乎马列主义还是不合乎马列主义？是合乎实际还是不合乎实际？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认真讨论、认真研究的。”

“我认为毛主席这些观点是符合马克思的观点，符合列宁的观点的。作为党

史，只讲我们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反右派斗争产生了扩大化的错误，而思想战线、政治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一字不提，不能不说是一个重大的缺点。因此，我们的国史，在这个问题上就不能跟“七十年”同样一个腔调，应该有所差别，要把毛主席在这个问题上对马列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重要问题加以表述。”

“右派斗争以后，多次修改文稿，提出了思想路线、政治战线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我从《在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夏季形势》《三中全会》等文章中选录了 18 段：

1、“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这两个阶级的对抗性的矛盾如果处理得当，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的矛盾，可以用和平的方法解决这个矛盾。如果我们处理不当，不是对民族资产阶级采取团结、批评、教育的政策，或者民族资产阶级不接受我们的这个政策，那么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就会变成敌我之间的矛盾”。

2、“我们的国家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这个专政是干什么的呢？专政的第一个作用，就是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就是为了解决国内敌我之间的矛盾。例如逮捕某些反革命分子并且将他们判罪，在一个时期内不给地主阶级分子和官僚资产阶级分子以选举权，不给他们发表言论的自由权利，都是属于专政的范围。为了维护社会秩序和广大人民的利益，对于那些盗窃犯、诈骗犯、杀人放火犯、流氓集团和各种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坏分子，也必须实行专政。专政还有第二个作用，就是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时候，专政就担负着对外解决敌我之间的矛盾的任务。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谁来行使专政呢？当然是工人阶级和在它领导下的人民。专政的制度不适用于人民内部。人民自己不能向自己专政，不能由一部分人民去压迫另一部分人民。人民中间的犯法分子也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这和压迫人民的敌人的专政是有原则区别的。在人民内部是实行民主集中制。我们的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宗教信仰等等自由。我们的宪法又规定：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

3、“现

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广大群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政府工作人员经验也还不够丰富，对一些具体政策的问题，应当继续考察和探索。这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有一个继续建立和巩固的过程，人民群众对于这个新制度还需要有一个习惯的过程，国家工作人员也需要一个学习和取得经验的过程。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便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使全体人民比较顺利地走过目前的过渡时期，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

4、“从一九五六年以来，情况就根本改变了。就全国说来，反革命分子的主要力量已经肃清。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生生产力。”

5、“在我国，虽然社会主义改造，在所有制方面说来，已经基本完成，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已经基本结束，但是，被推翻的地主买办阶级的残余还是存在，资产阶级还是存在，小资产阶级刚刚在改造。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资产阶级也要按照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世界。在这一方面，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无论在全人口中间，或者在知识分子中间，马克思主义者仍然是少数。因此，马克思主义仍然必须在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

6、“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这是因为资产阶级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影响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作为阶级的意识形态，还要在我国长期存在。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就会忽视必要的思想斗争。思想斗争同其他的斗争不同，它不能采取粗暴的强制的方法，只能用细致的讲理的方法。现在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的斗争中，具有优胜的条件。政权的基本力量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劳动人民手里。共产党有强大的力量和很高的威信。在我们的工作中尽管有缺点，有错误，但是每一个公正的人都可以看到，我们对人民

是忠诚的，我们有决心有能力同人民在一起把祖国建设好，我们已经得到巨大的成就，并且将继续得到更巨大的成就。资产阶级分子和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都是爱国的，他们愿意为蒸蒸日上的社会主义祖国服务，并且懂得如果离开社会主义事业，离开共产党所领导的劳动人民，他们就会无所依靠，而不可能有任何光明的前途。”

7、“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意识是一定要反映出来的。一定要在政治问题和思想问题上，用各种办法顽强的表现他们自己。要他们不反映不表现，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当用压制的办法不让他们表现，而应当让他们表现，同时在他们表现的时候，和他们辩论，进行适当的批评。毫无疑问，我们应当批评各种各样的错误思想。不加批评，看着错误思想到处泛滥，任凭它们去占领市场，当然不行。有错误就得批判，有毒草就得进行斗争。但是这种批评不应当是教条主义的，不应当用形而上学方法，应当力求用辩证方法。要有科学的分析，要有充分的说服力。教条主义的批评不能解决问题。我们是反对一切毒草的，但是我们必须谨慎地辨别什么是真的毒草，什么是真是香花。我们要同群众一起来学会谨慎地辨别香花和毒草，并且一起来用正确的方法同毒草作斗争。”

“我们在批判教条主义的时候，必须同时注意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修正主义，或者右倾机会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它比教条主义有更大的危险性。修正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口头上上也挂着马克思主义，他们也在那里攻击‘教条主义’。但是他们所攻击的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根本的东西。他们反对或者歪曲唯物论和辩证法，反对或者企图削弱人民民主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反对或者企图削弱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取得基本胜利以后，社会上还有一部分人梦想恢复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要从各个方面向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包括思想方面的斗争。而在这个斗争中，修正主义者就是他们最好的助手。”

8、“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

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

9、“新的社会制度还刚刚建立，还需要有一个巩固的时间。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在我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还要经过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

10、“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如果拿他们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来看，似乎可以这样说：大约有百分之十几的人，包括共产党员和党外同情分子，是比较熟悉马克思主义，并且站稳了脚跟，站稳了无产阶级立场的。就五百万的总数来说，这些人是少数，但是他们是核心，有力量。多数人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也学了一点，但是还不熟悉。其中有些人还有怀疑，还没有站稳脚跟，一遇风浪就会左右摇摆。在五百万总数中占大多数的这部分知识分子，还是处在一种中间的状态。坚决反对马克思主义、对于马克思主义抱着仇视态度的人，是占极少数。有一些人虽然不公开表示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是实际上不赞成。这种人在很长的时间内都会有的，我们应该允许他们不赞成。例如一部分唯心主义者，他们可以赞成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 and 经济制度，但是不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宗教界的爱国人士也是这样。他们是有神论者，我们是无神论者。我们不能强迫这些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总而言之，可以这样说，五百万左右的知识分子对待马克思主义的状况是：赞成而且比较熟悉的，占少数；反对的也占少数；多数人是赞成但不熟悉，赞成的程度又很不相同。这里有三种立场，坚定的，动摇的，反对的三种立场。应该承认，这种状况在一个很长的时间内还会存在。”

11、“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个方针不但是使科学和艺术发展的方法，而且推而广之，也是我们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这个方法可以使我们少犯错误。有许多事情我们不知道，因此不会解决，在辩论中间，在斗争中间，我们就会明了这些事情，就会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各种不同意见辩论的结果，就能使真理发展。对于那些

有毒素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也可以采取这个方法，因为同那些反马克思主义的东西进行斗争，就会使马克思主义发展起来。这是在对立面的斗争中的发展，是合于辩证法的发展。”

12、“在我国，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会长期存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建立。我们已经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改造方面，取得了基本胜利，但是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方面，我们还没有完全取得胜利。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我们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还要进行长期的斗争。”

13、“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总题目是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正确地处理敌我矛盾。方法是实事求是，群众路线。”

14、“这一次批判资产阶级右派的意义，不要估计小了。这是一个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单有一九五六年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匈牙利事件就是证明。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共产党在民主党派、知识界和工商界的一部分人(右派)中当然不可能有领导权，因为他们是敌人；在多数人(中间派)中的领导权不巩固；有些文教单位还根本没有建立党的领导。必须建立对中间派的巩固的领导权，并且尽可能早日巩固起来。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共产党不心服，他们中的右派分子决心要同我们较量一下。较量了，他们失败了，他们才懂得他们的大势已去，没有希望了。只有在这时，他们中的多数人(中间派及一部分右派)才会逐渐老实起来，把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逐渐抛弃，站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下决心依靠无产阶级吃饭。少数人至死不改，只好让他们把他们的反动观点带到棺材里去。但是我们应当提高警惕。要知道，他们一遇机会，又会要兴风作浪的。这个斗争，从现在起，可能还要延长十年至十五年之久。做得好，可能缩短时间。当然不是说，十年至十五年之后，阶级斗争就熄灭了，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我国的反革命分子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活动，不但总是带着阶级斗争的性质，并且总是同国际上的反动派互相呼应的。目前的斗争，在一段必要时间之后，应当由急风暴雨

的形式转变为和风细雨的形式，以便从思想上搞得更深更透。第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在过去几个月，主要是最近两个月内，我们已经胜利了。但是还需要几个月深入挖掘的时间，取得全胜，决不可以草率收兵。要知道，如果这一仗不打胜，社会主义是没有希望的。”

15、“必须懂得，在我国建立一个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和现代化的农业基础，从现在起，还要十年至十五年。只有经过十年至十五年的社会生产力的比较充分的发展，我们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才算获得了自己的比较充分的物质基础(现在，这个物质基础还很不充分)，我们的国家(上层建筑)才算充分巩固，社会主义社会才算从根本上建成了。现在还未建成，还差十年至十五年时间。为了建成社会主义，工人阶级必须有自己的技术干部的队伍，必须有自己的教授、教员、科学家、新闻记者、文学家、艺术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队伍。这是一个宏大的队伍，人少了是不成的。这个任务，应当在今后十年至十五年内基本上解决。十年至十五年以后的任务，则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进一步扩大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准备着逐步地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必要条件。”

16、“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我们现在的任务跟过去不同了。过去主要是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那个任务已经完结了。那么，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八大’决议上有那么一段，讲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种提法是不对的。我们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出，全国胜利以后，国内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国外是中国和帝国主义的矛盾。后头没有公开提，但是事实上在那里做了，革命已经转到社会主义革命，我们干的就是社会主义革命这件事。三大改造是社会主义革命，主要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已基本完成。这是尖锐的阶级斗争。”

“去年下半年，阶级斗争有过缓和，那是有意识地要缓和一下。但是，你一缓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地主、富农以及一部分富裕中农，就向我们进攻，这是今年的事。我们缓和一下，他进攻，那也好，我们取得主动。正像人民日报一篇社论说的，‘树欲静而风不止’。他要吹风嘛!

他要吹几级台风，那么好，我们就搞‘防护林带’。这就是反右派，就是整风。”“整风有两个任务：一个任务是反右派，包括反资产阶级思想；一个任务是整改，整改里头也包含两条路线斗争。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东西，我们党内存在这三个东西，这个账要挂在资产阶级身上。一两百年以后，还可不可以挂呢？那个时候恐怕不好挂了。那个时候有没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还是有的，那就挂在落后账上。社会上总有左、中、右，总有先进的、中间的、落后的。那时你犯了官僚主义、主观主义，那你就是落后。”“整风运动要搞到明年五月一日，还有这么多时间。五月一日以后，是不是又要缓和一下呢？我看又要缓和一下。缓和是不是叫右倾呢？我看不叫右倾。好比开会，尽开，白天开，晚上也开，一连开它半年，我看很多人就不见了。所以，工作要按照情况，有时候紧张，有时候缓和。去年，我们取得那么大的胜利，人家服服帖帖，敲锣打鼓，你不缓和一下，那个时候难得说，理由不充分。我们说基本上解决了所有制问题，并没有说完全解决了。阶级斗争并没有熄灭。所以不是原则的让步，而是情况需要缓和一下。”

17、“右派，因为他们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所以是一种敌对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不把他们当作地主、反革命分子那么对待，其基本标志，就是不取消他们的选举权。也许有个别的人，要取消他的选举权，让他劳动改造。我们采取不捉人，又不剥夺选举权的办法，给他们一个转弯的余地，以利于分化他们。不是刚才讲分两种人吗？一种是改正了以后，可以把右派分子帽子摘掉，归到人民的队伍；一种就是顽固到底，一直到见阎王。”

18、“我国人民群众反对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斗争的任务，是为了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彻底完成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是没有完成的。许多人还不认识这一点。右派分子则从来就反对这种革命，并且发展到在行动上反共反人民。这个革命是 1956 年达到高潮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和必不可免的继续。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主义革命，许多时候叫作社会主义改造。在一九五六年，在经济制度方面，即在生产关系方面，主要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完成了（没有最后完成）。人的改造则没有完成。而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则最坚决地反对这种改造。中国共产党曾经再三再四地指出人的改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可是无法说服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毛主席关于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究竟是属于

反右派斗争必要的范围?还是属于反右派斗争扩大化的范围?过去没提出这个问题，也没回答这个问题。后来有一种说法：1957年以后“左”了20年。那么这个理论和实践是属于扩大化的方面了，我们不能同意这种看法。”

四、关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的主要矛盾问题

《毛泽东传》说：“这是毛泽东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第一次谈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问题。但从这个讲话看来，当时对“敌我矛盾”和“阶级矛盾”这两个概念没有明确分清，他说八大讲“敌我矛盾基本上解决了”，实际上八大讲的是阶级矛盾基本上解决了。”

该书说：“把阶级矛盾同敌我矛盾加以区别，说明阶级矛盾不一定是敌我矛盾，这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但是，说阶级矛盾大部分是人民内部矛盾，又容易发生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混淆，造成阶级斗争扩大化。应当而且必须肯定，人民内部矛盾大量的和主要的都不属于阶级矛盾的范围。”

该书说：“毛泽东对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在反右派斗争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自八大以来，他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一九五七年二月七日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三月十二日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在回答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这个问题时，他虽然没有直截了当地回答，但意思还是人民内部斗争为主。这些，都是八大精神的继续和发展，是根据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解决这样的形势判断作出的。但经过七、八、九三个月反右派运动以后，特别是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以后，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作出过于严重的错误判断，他在这个重大理论问题上发生了重大变化，重新确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为主要矛盾。三中全会期间，他先后三次讲这个问题，一次比一次肯定，一次比一次展开。尽管他对八大决议的论断，只是说“是不适当的，但也没有坏处”，不必去修改它。但是，他在党的中央全会上以十分肯定的口气说，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这就在实际上改变了八大决议的正确论断。这标志着毛泽东在指导思想向“左”发展的一个转折，对中国局势的发展带来深远的影响。从程序上正式改变八大决议的论断，是一九五八年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

八大一次会议认为生产落后于需要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大二次会议认

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到底是思想向前发展了，还是向“左”发展了？

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有一个认识过程

一九五七年一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就我国的情况来说，现在的阶级斗争，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提法明确地说明了阶级斗争和两类矛盾的关系：在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阶级斗争，仍然存在；这种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同民主革命时期比较，一部分是敌我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注意！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是与敌我矛盾相对而言的，不是与阶级矛盾相对而言的。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呢？

难道说：在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阶级矛盾不存在了？或者阶级矛盾只表现为敌我矛盾？这两种说法不仅违背历史和现实的实际，在理论上也根本说不通。

说阶级矛盾大量表现的是人民内部矛盾，能不能由此推论出人民内部矛盾中大量的是阶级矛盾呢？不能。这是一个简单的形式逻辑问题：阶级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外延不能相等。人民内部矛盾包括一部分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之间的阶级矛盾、更包括各种劳动者社会集团之间的非阶级矛盾。这后一种矛盾在人民内部矛盾中是大量的。

同年三月六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办公室印发《有关思想工作的一些问题》，供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人员参考，其中第三十问题是：目前，人民内部矛盾主要有几类，什么是当前的主要矛盾？毛泽东在审阅时，对其中的二十二个问题作了二十二条批注，第三十问题没有批注。这说明，毛泽东当时对这个问题考虑仍不成熟，还没有得出结论。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人民内（部）的斗争为主，还是阶级斗争为主？两者都有，都需要注意，但今天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

这一段话写得很简要，如果联系他在此前后的思想，应作这样的解释：这里的人民内部矛盾（斗争）主要是指人民内部各种阶级之间的矛盾；这里的阶级斗争主要是指敌我阶级之间的矛盾。所以说：“两者都有，都需要注意”。但是，就

中国今天的现实情况来说，“突出的问题是人民内部的问题”。人民内部矛盾中既包含有阶级矛盾，又包含有非阶级矛盾。所以，“应作具体分析，不要不适当地扣大帽子”，也就是说，既不能把非阶级矛盾夸大为阶级矛盾，也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夸大为敌我之间矛盾。

一九五七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南京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讲话的提纲中指出：“分清两类矛盾：不能用解决第一类矛盾的方法去解决第二类矛盾。”“第一类矛盾还存在，右的观点要防止，但不要夸大。第二类矛盾显著起来了，同志中也有‘左’有右。”很明显，这里说的“两类矛盾”是指的敌我之间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第一类矛盾”是指敌我之间矛盾；“第二类矛盾”是指人民内部矛盾。在谈到人民内部矛盾对敌我之间矛盾的关系时，毛泽东总是用“突出的”、“显著起来了”来形容，而不用“主要的”来形容。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讲《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指出：“不能说现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矛盾。”“公私合营以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也基本上解决了。”“应该讲，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他认为，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有阶级性）、工人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者的矛盾、人民群众与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者的矛盾（除少数特别恶劣的、顽固的、反人民的官僚主义者以外）、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表现在人民内部）等等，都是人民内部矛盾，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了主要矛盾。刘少奇的这个提法与“八大”政治报告的决议比较，可以说前进了一大步。但是，这种把人民内部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观点，仍然没有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初期阶段哪个矛盾是主要矛盾这个问题。

因为，人民内部矛盾是概括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矛盾的属性的一种矛盾。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人民内部矛盾可以说是主要的。（因为，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通过人与人的关系表现出来时，都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从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成为我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除了少量的敌我之间矛盾以外，大量的、普遍存在的都是人民内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几乎包括了绝大部分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这样一来，我们对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究竟哪一个矛盾是主要的矛盾，仍然是不清楚的。正因为如此，毛

泽东相对于敌我之间矛盾来说，称述人民内部矛盾一般不用“主要的”，而用“突出的”、“显著的”，以避免与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的主要矛盾相混淆。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提纲中指出：“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他在讲话中对这个观点作了具体阐述，指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毫无疑问，这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革命的锋芒是对着资产阶级，同时变更小生产制度即实现合作化，主要矛盾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概括地说，就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八大’的决议没有提这个问题。”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在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当前社会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一九五八年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一个讲话提纲中指出：“两类矛盾：敌我；人民内部； 人民内部：阶级矛盾；先进落后矛盾 主要：阶级矛盾（过渡时期） 大量：先进、落后”这几句话非常简短，但理论意义非常重大。它深刻地说明了各种矛盾之间的内在联系。

首先，把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概括为敌我之间的矛盾和人民内部的矛盾这样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敌我之间的矛盾包括的是人民群众与一部分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如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者、官僚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

人民内部的矛盾包括两部分：

一部分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一部分是非阶级矛盾，即劳动人民内部的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如先进思想与落后思想的矛盾。

在过渡时期，在两类矛盾包括的各种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中，主要的矛盾是阶级矛盾，即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阶级矛盾虽然是主要矛盾，但并不等于是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大量的、突出的、显现的矛盾是劳动人民内部各个社会阶层、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

如先进思想和落后思想之间的矛盾。

一九五九年底至一九六零年春，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话中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矛盾。”

这里毛泽东明确地提出两条道路、两个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说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

毛泽东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判断，是因为：

1、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有以下几个特征：

(1) 这个矛盾斗争的实质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2) 这个矛盾斗争的焦点是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领导资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支配工人阶级；

(3) 这个矛盾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还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占领思想文化阵地。

2、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某些历史阶段，资产阶级在经济、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国际联系等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潜在能量和巨大影响。

3、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对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有重大影响，因而在劳动人民内部就会产生带有阶级斗争性质的矛盾。

4、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直接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前途和方向，关系到青年一代的前途和方向，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1957年1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乘风破浪》一文（这篇文章是以柯庆施的名义发表的，实际上是在毛泽东的指导下由胡乔木修改定稿的）是对毛泽东关于主要矛盾、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及政治战线、思想战线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政策的总结，特摘录如下：“首先，我们谈谈国内的主要矛盾问题。

“这个问题，中央已经作过明确指示。但是，过去一个时期，我们一部分同志被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刮起来的一阵妖风吹昏了头脑，对于党提出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发生了怀疑，好像党的某些基本政策是右了。这一股风虽然不很大，但很值得注意。

“大家知道：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大敌人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开始了我国的过渡时期，上面说的这个主要矛盾在国内基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1956年初达到高潮的资本主义工商业、农业、手工业三大改造运动，标志着我国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这方面的矛盾基本上解决了。但是，社会主义革命是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最彻底、最深刻、最广泛的革命；所有制的基本改变，不但还没有完全解决经济战线上的问题(所有制还没有完全改变，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的发展还很不充分)，尤其还没有完全解决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在我们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党章的总纲里，就着重地指出：党仍然面对着‘彻底消灭剥削制度，并且杜绝产生剥削制度的根源’的严重任务，仍然面对着“继续注意从经济方面、政治方面和思想方面克服资本主义的因素和影响”的严重任务。因此，阶级斗争还没有结束，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整个过渡时期，仍然是国内的主要矛盾。不过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前，这种矛盾突出地表现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之间，即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限制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在所有制基本改变以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就突出地表现在上层建筑同经济基础之间，即资产阶级的政治活动和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同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不相适应，一部分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还不承认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甚至还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从而破坏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

“在我国目前的具体条件下，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这个矛盾，在某些范围内表现为敌我矛盾，在其他范围内则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而且大量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只有在少数情况下才表现为敌我矛盾。旧的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他们同人民的矛盾当然是敌我矛盾，但是他们在人民群众中已经彻底孤立了。还有一些政治资本的反社会主义力量是资产阶级的一部分，即尚未被揭发出来的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里的右派分子。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

盾也是敌我矛盾。但是不论是在全国人民中，或是在资产阶级中，他们也只占极少数。当他们一旦暴露出自己的反社会主义面貌，他们很快就陷于广大人民的包围之中。至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多数(中间派)，对于所有制的改变和无产阶级的领导虽然也不完全心服，但是一般说来，他们还是倾向于接受社会主义道路和无产阶级领导的，他们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般地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不论就全国来看，或是就上海这个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集中的地方来看，情况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举出两个摆在眼前的现实例子，证明党中央对基本形势所作的分析的正确。一个例子是：这次党所领导的上海工商界的反右派斗争，主要是由工商界自己进行的。第一批六千人，经过一个时期的学习，提高了认识，学会了大鸣大放、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在进入反右派斗争阶段以后，揭露出右派分子 248 人，整个工作做得很不坏。目前运动正逐步推广到整个工商界去。另一个例子是：复旦大学六百多个教师中，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60%，上层小资产阶级家庭出身的占 34.5%，工农家庭出身的只有 4.5%，但是，在政治上，左派加中左分子却占 44% (这个比例在全市是比较高的，一般大学占 30%左右)，右派只占 8.5%。这两个例子难道还不能说明，就以商学两界而论，近几年来，特别是近两年来，他们的改造工作做得还不坏，他们自我改造的成绩是显著的吗？这难道还不能说明情况已经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变化吗？难道还不能说明他们的大多数经过教育是可以进步的，认为他们同劳动人民之间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是完全正确的吗？

“我们有些同志不去认真研究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即是在我国的具体条件下，如果我们处理得当，如果资产阶级接受无产阶级的政策，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对抗性矛盾可以转变为非对抗性矛盾。他们看不见国内阶级关系的巨大变化，不认真研究周围事物的新发展，把自己的思想固定化了。他们错误地把我国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概看作敌我矛盾，把不属于右派的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中间派对社会主义的动摇和不满也看作敌我矛盾，企图用处理敌我矛盾的方法来处理这些矛盾，而不懂得必须用不同的方法处理不同性质的矛盾，必须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形式来处理阶级斗争的必要。 “当然，看不到敌我矛盾是完全错误和非常危险的。既然敌我矛盾还存在，否认或者忽视敌我斗争，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中

所包含的一部分敌我矛盾，即我们和右派之间的斗争，也看作人民内部的矛盾，就要犯右倾错误。由于阶级关系时而尖锐(例如当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时而缓和(例如当反右派斗争取得胜利，阶级敌人被迫退却的时候)，我们必须继续保持警惕，注视这方面的发展变化。当阶级关系尖锐化起来的时候，我们必须强调这方面的斗争，并且坚决粉碎一切反社会主义、反劳动人民的分子的进攻，如同这次反右派斗争所做的那样。但是，鉴于资产阶级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大多数(中间派)是能够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我们仍然应该信任他们中间的多数，帮助他们进行彻底的改造，使他们在政治上思想上同右派划清界限，克服在资本主义立场和社会主义立场中间动摇不定的两面性，过好社会主义这一关，并且争取他们中的许多人逐步从中间派转入左派，扩大左派的队伍。当然，这是一个长时期的反复的过程，中间还会起变化。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会逐渐进步，逐步改造好，也会有一部分改造不好，但是数量不会很多。

“我们说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两类，这并不是说，目前我国人民内部的矛盾都属于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之间的矛盾，而劳动人民内部就没有矛盾了。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示我们：人民内部的矛盾除了存在于一般的资产阶级分子同劳动人民之间的以外，还更广泛地存在于劳动人民内部和工人阶级内部。毛泽东同志的报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及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对于这个问题都曾有过全面的深刻的分析。毛泽东同志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在工商业的公私合营企业中，资本家还拿取定息，也就是还有剥削；就所有制这点上说，这类企业还不是完全的社会主义性质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有一部分也还是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完全社会主义化的合作社在所有制的某些个别问题上，还需要继续解决。在各经济部门中的生产和交换的相互关系，还在按照社会主义的原则逐步建立，逐步找寻比较适当的形式。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和集体所有制经济里面，在这两种社会主义经济形式之间，积累和消费的分配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也不容易一下子解决得完全合理。总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经建立起来，它是和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

但是，它又还很不完善，这些不完善的方面和生产力的发展又是相矛盾的。除了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的这种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以外，还有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法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这些上层建筑对于我国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和社会主义劳动组织的建立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它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即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相适应的；但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存在，国家机构中某些官僚主义作风的存在，国家制度中某些环节上缺陷的存在，又是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相矛盾的。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毛泽东同志在这里所指出的种种矛盾，一部分属于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属于小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的矛盾，一部分是由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思想作风传染到无产阶级中的许多人，因而在无产阶级内部产生的矛盾，但是还有许多矛盾却不是由于阶级的存在或者阶级影响的存在，而是由于人们的主观认识不符合于客观实际，人们的领导工作落后于群众需要。这是一种主观同客观、先进同落后的矛盾，这类矛盾就是在阶级和阶级影响完全消灭以后也仍然会继续产生。在同过渡时期比较起来称得起完全巩固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以及在往后亿万斯年的共产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仍然会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的发展到了一定时期也仍然会落后于经济基础的发展。因此，仍然需要及时地发现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中的日常性质和特殊性质的矛盾，及时地加以调整。有了正确的制度，还需要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还需要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在所有这些方面，领导工作情况怎样，是好还是坏，是采取辩证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还是采取主观的片面的思想方法，是走在客观实际和群众觉悟的前面还是落在后面，具有很大的作用。总之，在阶级矛盾消灭以后，正确和错误、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这类矛盾，仍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而人类社会也就将在不断地克服这类矛盾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矛盾永远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 “由此可见，人民内部的矛盾需要加以分析。以我们党的整风为例。我们在整风中要着重反对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作风，要着重批判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绝对平均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想，这些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反映。但是我们要反对的主观主义作风，却是认识上的问题。

我们要解决许多先进和落后’的矛盾，例如对于工业发展速度和农业发展速度的某些争论，对于形势发展快慢的不同估计的某些争论。这种争论将来永远也是会有的。对于这种矛盾，就不能看作阶级矛盾的反映，更不必说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了。我们有些同志过去一个时期怀疑党及时地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怀疑党的若干基本政策的正确性，主要地就是由于没有具体地分析国内的阶级关系和主要矛盾，对不同性质的矛盾又缺乏具体分析。 “我们有一些同志喜欢用压服的方法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总觉得说服的方法收效慢，或者收效小。这是没有根据的。看来他们好像很‘左’，其实，恰巧说明了他们很右。事实证明，对人民采取说服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的最积极、最有效的方法。我们同志们相信马克思主义、相信共产主义事业的最后胜利，难道不是被说服的结果而是被压服的结果吗？为什么我们可以被先进的同志们说服了，而我们就不能用同样的方法说服别人呢？对人民采取压服的方法，这不是别的，正是历史上一切剥削阶级对待被剥削阶级的方法，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方法。国民党蒋介石是最会向帝国主义屈服、向人民施‘威风’的。我们必须反掉这种国民党作风的影响，不许向人民施‘威风’。我们一定要相信群众的大多数，一定要相信党能够说服大多数，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改造旧社会，创造新社会，并且在这个过程中，把旧社会的人改造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在剥削制度下，旧社会把人训练成自私自利，而在新社会的条件下，随着政治上、思想上的斗争的逐步深入，随着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日益强大和巩固，就有可能最后肃清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使旧社会来的人改造成成为具有无产阶级大公无私的思想的人。这当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我国的社会运动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告诉我们，局势是有利于我们这样做的。 “整风运动的经验，最有力地说明对人民采取说服方法的伟大效力。经过今年的全民整风和反右派斗争，我们很多同志学会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贴大字报、开辩论会等等一套方法，正确地处理了我们工人阶级内部、劳动人民内部的大批问题，以及同资产阶级的阶级矛盾中的大批问题，取得很宝贵的经验。同时，我们还取得了用大鸣大放、大争大辩、摆事实、讲道理的一套方法，就是说，也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处理我们同资产阶级右派这一种敌我矛盾的经验。这是极为重要的收获。但是，我们还有不少同志没有学会或者没有完全学会这套办法，不少同志对实事求是的群众路线的工作方法还有抵触。因此，我们

各级党组织和各级领导同志要下定决心，不但自己要对当前的阶级关系和国内的主要矛盾和大量存在的矛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还要帮助各级党组织直到基层党组织、基层干部都能认清形势，分别各类矛盾，并且能够正确地加以处理。只要我们大家有了经验，并且把大鸣大放、大争大辩、大字报、座谈会、辩论会、摆事实、讲道理、边整边改等等这一套办法完全学会，并且把它变成经常的制度，经常的方法，今后许多事情就好办了。无论是革命问题或者建设问题，无论是大是大非或者是小是小非问题，都可以运用这一套办法迅速地加以解决。”

2006 年 6 月 3 日初稿

2011 年 5 月 30 日修改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第二章 1958—1962 年开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批评“反冒进”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八届二中全会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政府根本还是促进的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五日，召开了党的八届二中全会，在这个会上，反冒进的方针集中地表现出来。会上一些人甚至认为，一九五六年各方面都“冒”了。

毛泽东对这次会议上一些人反冒进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明确提出七条意见，这七条意见作为一个妥协方案，是用来挡水的，想挡一挡反冒进之水。

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作了总结发言。

其中关于经济问题，毛泽东说：

我们对问题要作全面的分析，才能解决得妥当。进还是退，上马还是下马，都要按照辩证法。世界上，上马和下马，进和退，总是有的。那有上马走一天不下马的道理？……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辩证法：又动又不动。净是不动没有，净是动也没有。动是绝对的，静是相对的，有条件的。

我们的计划经济，又平衡又不平衡。平衡是暂时的，有条件的。暂时建立了平衡，随后就要发生变动。上半年平衡，下半年就不平衡了，今年平衡，到明年又不平衡了。净是平衡，不打破平衡，那是不行的。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虽然有下马，总是上马的时候多。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根本还是促进的。社会总是前进的，前进是个总趋势，发展是个总趋势。

这里毛泽东从辩证法的高度阐明了前进和后退的辩证关系，从理论上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反冒进方针问题。

一九五七年一月八日到十日，在毛泽东召开的座谈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的会上，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都一致认为一九五六年“冒了”。

陈云提出要防止建设规模超出国力的危险；

李富春认为，一九五六年计划冒了，执行也冒了，是冲昏头脑；

李先念说，一九五六年冒了三十亿到三十五亿；

薄一波列举了一九五六年冒进在经济工作中的十种表现。

到底实际情况如何，这里不妨引用一段薄一波一九九一年的一段话：“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总的说来还算是健康的。据统计，一九五六年实际完成的工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28.1%，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 62%，是‘一五’期间我国经济增长速度最高的一年。能不能把这个增长速度笼统地称为冒进呢？不能。因为这一年增长速度所以这样高，有以下两方面的原因：第一，上两年农业丰歉的影响——第二，‘一五’期间苏联承担的设计项目，头三年到货的设备很少，主要集中在第四年、第五年即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到货，这也促使一九五六年基本建设投资骤增。”“后来总结，认为一九五六年经济工作中的冒进，主要是三条：基本建设投资虽几经压缩，还是多用了二十来亿元；由于职工人数增加过猛，工资改革控制不严，工资福利支出多用了十来亿元；由于支持新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农贷多发了几亿元。”

这些都是具体工作中的问题，能够以此为根据提出反冒进的政治方针吗？

二、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提出是促进还是促退

一九五七年十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三中全会上讲话。他指出：

“去年一年扫掉了几个东西。

一个是扫掉了多、快、好、省。不要多了，不要快了，至于好、省，也附带扫掉了”；

“还扫掉了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这个‘四十条’去年以来不吃香了”；

“还扫掉了促进委员会”，

“至于某些东西实在跑得快了，实在跑得不适合，可以有暂时的、局部的促退，就是要让一步，缓一步。但是，我们总的方针，总是要促进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就已经明确提到了经济建设的两种方法问题：扫掉了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促进委员会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五日，公布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必须坚持多快好省的建设方针》。

社论说：在去年秋天以后的一段时间里，在某些部门、某些单位、某些干部中间刮起了一股风，居然把多快好省的方针刮掉了。有的人说，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订得过高了，行不通；有的人说，一九五六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全部冒进了，甚至第一个五年计划也冒进了，搞错了；有的人说，宁可犯保守的错误，也不要犯冒进的错误，等等。于是，本来应该和可以多办、快办的事情，也少办、慢办甚至不办了。这种做法，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然不能起积极的促进作用，相反地起了消极的“促退”作用。

三、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讲矛盾、不断革命、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六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会议，讨论党领导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技术革命问题等。参加会议的中央领导人只有周恩来，还有华东五省一市的第一书记。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指示：《浙江日报》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可转载，并可广播。”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日至四日，在杭州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部分地方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工作方法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右派是反对派，中右也反对我们，中中是怀疑的。基本群众和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的左派是赞成我们的。

关于对待资产阶级的问題，好多国家怀疑中国是右了，好像不像十月革命。因为我们不是把资本家革掉，而是把资本家化掉。其实，最后把资产阶级（化掉），如何可以说右呢？仍是十月革命。如果都照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做法，布疋没有，粮食没有，（没有布疋，就不能换得粮食）、煤矿、电力各方面都没有了。他们缺乏经验。我们根据地搞的时候多了，对官僚资本（生产秩序）来个原封不动，对民族资本更是如此。但是不动中有动。全国资本家七十万户，资产阶级知识分

子几百万，没有他们就不能够办报、搞科学、开工厂。有人说“右”了。就是要“右”，慢慢化掉，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就是这个路线贯彻下来的。有的是一半敌人，一半朋友，有的三分之一或多一些是敌人。

政治业务要结合，也就是红与专的问题。政治叫红（我们为红，在美国为白）。红与专是对立的统一。两者不同，有区别。一个是搞精神的，一个是搞物质的。有些业务部门的负责同志，说话时口边政治很少，可见平素不大谈政治。忙得很，一谈就是业务。各省管业务的恐怕更厉害些。一定要批评不问政治的倾向，同时要反对空头政治家。要懂得点业务才好，否则名红实不红。不懂农业，要指导农业就不行。搞试验田，红与专的问题就解决了。一种是不懂业务，空头政治家，一种是迷失方向的经济家或其他技术家，都是不好的。要去分析分析。但是批评人家的时候，先要检查自己，自己也有点空，不甚了了嘛。总理去年就钻了一下工资福利问题。我在北京看了工业展览会，一次看一个馆不够，还要多看看。

整风要贯彻到底，不要半途而废。上海说的第三类人，就会作官，要打掉官风。上海提要要有干劲，很好。《浙江日报》社论《是促进派，还是促退派》，《人民日报》要转载。整风中要反浪费，时间不要太长，几天就行了。结合整改，专题鸣放一次，鸣放了，大家警惕。每个家庭成员都要进行教育，要勤俭持家。

在反右派中，批判了右派提出的走“白专道路”的思想。但是，有些人又把“白”与“专”划等号，认为“专”就是“白”。随着形势的发展，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即将转向技术革命，所以，在整改中，要进一步解决红与专，即政治与业务的关系问题。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回答了这个问题。

一九五八年一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阶级矛盾、主要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问题。

首先，毛泽东重申了他在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主要矛盾的思想，即阶级斗争是主要的，阶级矛盾是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

其次，毛泽东进一步阐明了阶级矛盾与两类矛盾的关系：

阶级矛盾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一类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因此，人民内部矛盾也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小资产

阶级之间的矛盾，这是阶级矛盾，在过渡时期，这一类性质的矛盾是少量的；另一类是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过渡时期，这类性质的矛盾是大量的。

劳动人民内部的矛盾，一部分属于阶级斗争性质的，如受封建思想影响，自由主义，个人主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绝对平均主义（小资产阶级思想）都反映着私人所有制问题；一部分是属于先进落后的，是认识上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不断革命问题。毛泽东把他的不断革命论分为四个层次：

第一个层次，是政治机构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这就是推翻国民党反动派代表帝国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在中国的反动统治，夺取政权，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

第二个层次，是生产关系和经济制度的革命，这包括新民主主义的土地改革和社会主义的所有制改造。

第三个层次，是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革命，这包括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资产阶级思想批判、反右派斗争。

第四个层次，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革命。

这四个层次的革命是一个紧接着一个不间断地进行的，但又不是绝然分割的，而是相互联系、互相渗透的。

毛泽东在这个讲话中特别着重说明了，为什么在土地改革完成以后，要紧接着进行资本主义的、个体经济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趁热打铁，这是策略性的，不能隔得太久，不能断气，不能去“建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如果建立了，就得再花力气去破坏。波匈“断”了这么多时候的“气”，资产阶级思想扎了根，再搞就不大好搞了。这个战略思想非常重要。当时很多“老革命”不理解，一些人掉了队，一些人勉强地跟着走过来。右派夺权以后，反对社会主义改造就成为了政治思想上的主流。

四、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批评反冒进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至二十二日，毛泽东主持在广西南宁召开有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地方部分负责人参加的会议，会议讨论一九五八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和国家预算问题，同时研究改进工作方法的问题。会议印发了二十二个参考文件，其中包括李先念一九五六年六月十五日在一届人大三次会议的报告中关于反冒进的一段话、《人民日报》一九五六年六月二十日社论、周恩来一九五六年十一月

十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关于一九五七年计划的报告》的节录。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明确地批评了一九五六年反冒进。当时提出反冒进之所以是错误的：

第一，从政治上来说，一提反冒进就形成一股风，吹掉了三个东西：一为多快好省，二为四十条纲要，三为促进委员会。这些都是属于政治问题。一反就泄了气，六亿人一泄了气不得了。

这一点被右派抓住了，来了一个全面反“冒进”。陈铭枢批评我“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喜怒无常，不爱古董”。张奚若（未划右派）批评我“好大喜功，急功近利，轻视过去，迷信将来”。

第二，从思想方法上来说，拿出两只手来给人家看，看几个指头生了疮。十个指头问题要搞清楚，这是关系六亿人口的问题。究竟成绩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是保护热情，鼓励干劲，乘风破浪，还是泼冷水，泄气？

第三，从具体业务工作上来说，“库空如洗”，“市场紧张”，多用了人多花了钱。要不要反？这些东西要反。这些属于业务问题。一个指头有毛病，整一下就好了，原来“库空如洗”，“市场紧张”，过了半年不就变了吗？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具体地分析了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过程及影响。

先是，一九五五年夏季北戴河会议“冒进”想把钢搞到一千五百万吨（第二个五年计划）。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序言，对全国发生了很大影响，是个人崇拜也好，偶像崇拜也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全国各地报纸，大小刊物都登了，发生了很大影响。这样我就成了“冒进”的罪魁祸首。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我是罪魁，一九五五年十二月我写了文章，反了右倾；（一九五六年四月，）心血来潮，找了三十四个部长谈话，谈了十大关系，就头脑发胀了，“冒进”了。

随后，一九五六年元月至十一月反“冒进”，一九五六年六月一篇反冒进的社论，既要反右倾保守，又要反急躁冒进，好像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实际重点是反冒进的。不是一个指头有病。这篇社论，我批了“不看”二字，骂我的我为什么看？那么恐慌，那么动摇。那篇东西，四平八稳，实际是反“冒进”。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中全会搞了七条，是妥协方案，解决得不彻底。（一九五七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承认部分钱花的不恰当，未讲透。那股反“冒进”的气就普遍了。廖鲁言向我反映，四十条被吹掉了，似乎并不可惜。可惜的人有多少？叹一口气的人有多少？吹掉三个东西，有三种人，第一种人说：“吹掉了四十条中国才能得救”；第二种人是中间派。不痛不痒，蚊子咬一口，拍一巴掌就算了；第三种叹气。总要分清国共界限，国民党是促退的，共产党促进的。

×××为党为国，忧虑无穷，反“冒进”，脱离了大多数部长、省委书记、脱离了六亿人民。

紧接着，（一九五七年）右派一攻，把我们一些同志抛到距离右派只有五十米远了。右派来了个全面反“冒进”，甚么“今不如昔”，“冒进比保守损失大”。五月间右派进攻，使那些有右倾思想的同志提高了觉悟，这是右派的“功劳”，这是激将法。

（一九五七年十月，）三中全会，我讲去年砍掉了三条（多快好省，四十条纲要，促进委员会），没有人反对，我得了彩，又复辟了。我就有勇气再找部长谈话了。

这样批评反冒进就涉及到了具体的事和具体的人。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晚，毛泽东约刘少奇、周恩来谈话，直到深夜。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反冒进伤了许多人的心，水利、办社、扫盲、除四害都没有劲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这个报告（指柯庆施在上海党代会上的报告）把中央许多同志比下去了，中央工作的同志不动脑筋，不下去跑跑，光在那里罗列事实。”“大家都要学习柯老”。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提纲》

上海报告（报告记录：“柯庆施这篇报告，请大家看一看。”“恩来同志，你是总理，你看，这篇文章你写得出来写不出来？{周恩来回答，我写不出来。}上海有一百万工人，工业产值占全国的五分之一，是工人阶级集中的地方，又是资产阶级集中的地方，历史最久，阶级斗争最尖锐，这样的地方才能产生这样一篇文章。没有工人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强烈激情，是写不出这样的好文章的。”“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

（刘少奇当时说，主席的批评是针对管经济工作的几个人的。）

破暮气，走出办公室（报告记录：暮气，我们都有些，现在我们这一班人，容易压制新生力量。我们不下去跑跑，思想僵化。暮气是朝气的对立。讲革命朝气。）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把我撇开，又要利用我。一不麻烦我，二可利用我打别人。没有想到造成这样反冒进空气，挫伤群众积极性没有想到。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七日晚，毛泽东在同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批评主要是对陈云同志的。”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毛泽东约周恩来单独谈话。

一九五八年十九日晚，周恩来在会议上发言说：反冒进这个问题，是上段时间（一九五六年夏季到冬季）带矛盾性的动摇和错误。反冒进是由于不认识或者不完全认识生产关系改变后生产力将要有跃进的发展，因而在放手发动群众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表示畏缩，常常只看见物不看见人，尤其是把许多个别现象夸大成为一般现象或者主要现象，这是一种右倾保守主义思想。这个方针是与主席的促进方针相反的促退方针，不管你主观想法如何，事实上，总是违背主席方针的。越是不自觉这是方针性的违背，就越严重越危险。反冒进的错误，我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日，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冒进是全国人民烈焰冲起来的，是好事，部分是坏事，反冒进把前进放在第二位了。”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结论提纲》：

1，红与专、政治与业务（技术）的对立统一，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错误倾向，反对空头政治家（名红实白）和迷失方向的经济家这样两种人

2，整风一定要坚持到底，全党提起干劲，打掉官气，实事求是，与人民打成一片，肃清一切作风上、工作上、制度上的错误。

3，在整风中每个单位以几天工夫来一次反浪费的鸣放整改，干部的；每个家庭的。

16、不断革命论

夺取政权——土地革命（民主主义的）——再一次土地革命（社会主义

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政治的革命——技术革命从 1958 年起，在继续完成思想、政治革命的同时着重点应放技术革命方面。当然是经济与政治、技术与政治的统一，年年如此。思想、政治是统帅，是君，技术是士兵，是臣，思想政治又是技术的保证。

阶级消灭以后，人与人之间的思想政治斗争，或革命，继续进行，但性质变了。国家权力，在对内职能上，逐步地不存在了，现在对劳动人民也已基本不存在了——说服而非压服，打倒官风，十分必要。

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上层建筑为经济基础服务，政治权力和意识形态（即思想）是为经济服务的

22、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区别

大局与小局的区别

一般与特殊的区别

抓住主流。抓错了（抓了支流），一定栽筋斗。

这是现实问题，也是逻辑问题。

‘反冒进’的教训：反掉了三个东西，把一些同志抛到（同）右派似乎相近的地位。

‘砍掉十万个合作（社）’的教训。

响应反斯大林的教训，完全跟着赫鲁晓夫的指挥棍跑。

响应高饶的教训

登徒子好色赋的方法

我们同志中采用这种方法的人，很不少。革命吃亏很大。

23、以平等态度对待干部，使人感觉人们相互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觉自己的心是交给了他的。学习鲁迅。

26、党委要抓军事。军队必须放在党的领导和监督之下。要好好同军事工作方面的同志们商量。一年抓四次。在整风中，建议军队使出几天时间讨论一次朱可夫所犯严重错误的问题，此事由军委发出指示和有关朱可夫错误的材料，吸取苏联的教训。

36、我辞去共和国主席的问题，在今年九月以前用征求各级干部意见的方式举行一次鸣放辩论，然后在工厂、合作社、学校、机关中，凡是有群众的地方，

举行辩论，求得多数人的同意。

37、在三级（或四级）会议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党是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个人作用与集体领导的统一——班长与战士的统一，上级的决议和指示），工作检查，党委有责。”是否正确？

41、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的方法，是不对的。

42、准备挨骂，硬着头皮顶住。[1 《文稿》第 7 册第 24—31 页]1

在会议过程中，毛泽东看到河南的计划是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一年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本省自给）。

他说，也许你辽宁是对的，我怀疑是错的，你是马克思主义，我是机会主义。河南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全都能做到，可不可以还是提五年做到。今年真的全做到了，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卡死。否则这个省登报，那个省登报，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以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是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各省不要一阵风，不要看河南说一年完成，你也说一年完成。就让河南今年试一年，灵了，让它当第一。你明年再搞。只差一年，有什么要紧。

毛泽东说，此事关系重大，他到武昌时要找吴芝圃谈谈。

他还说，1955 年合作化高潮时周小舟看见别的省一年实现高级社，紧张得不得了。其实不要紧。李井泉就是从容不迫，四川实现高级化不是五五年，也不是五六年，而是五七年，不是也蛮好吗？毛泽东说，现在报纸宣传报道上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订指标要留有余地。

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二日的讲话就说过：我说了各部门都有对形势估计不足的情况。但是，反对右倾保守，为什么要增加人（军队增加了八十万人，工人学徒增加了一百万人）？我不懂，也不知道。这次讲话又说：反右倾保守，并不是要尽唱高调、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而是要按实际条件办事，订指标要留有余地。这番话并不是事后诸葛亮，在一九五九年才说的，而是在大跃进还没有形成之前的一九五八年一月说的。有些人就是不听。出了问题，反过来，还要说是因为毛泽东反右倾、批评反冒进、鼓吹大跃进造成的。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转载了柯庆施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上海市第一届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乘风破浪，加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上海！》。

一九五八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主要强调了三点：

第一，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大有希望。悲观论是没有根据的。现在劲头鼓起来了，现在有了热潮，

第二，都搞社会主义，但有两种领导方法，两种作风。

第三，不断革命论，革命就要趁热打铁，一个革命接着一个革命，革命要不断前进，中间不使冷场。要坚持整风，改掉官气。但不能老整风，整风后目标要转向技术革命。

一九五八年一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和南宁会议讨论的基础上，提出了《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

二月十九日，中央将这个草案转发全党。

这里说的“工作方法”，实际是说的社会主义建设、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方法问题。它是总结几年来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的经验，特别是反右倾和反“反冒进”的经验教训的成果。六十条的内容可以归纳为五个部分：理论、原则、任务、学习、方法。其中：

关于理论

（1）不断革命。

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从一九四九年在全国范围内夺取政权开始，接着就是反封建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一完成就开始农业合作化，接着又是私营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即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革命，在一九五六年基本完成，接着又在去年进行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这个革命在今年七月一日以前可以基本上告一段落。但是问题没有完结，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每年都要用鸣放整改的方法继续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现在要来一个技术革命，以便在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内赶上和超过英国。中国经济落后，物质基础薄弱，使我们至今还处在一种被动状态，精神上感到还是受束缚，在这方面我们还没有得到解放。要鼓一把劲。再过五年，

就可以比较主动一些了；十年后将会更加主动一些；十五年后，粮食多了，钢铁多了，我们的主动就更多了。我们的革命和打仗一样，在打了一个胜仗之后，马上就要提出新任务。这样就可以使干部和群众经常保持饱满的革命热情，减少骄傲情绪，想骄傲也没有骄傲的时间。新任务压来了，大家的心思都用在如何完成新任务的问题上面去了。提出技术革命，就是要大家学技术，学科学。右派说我们是小知识分子，不能领导大知识分子。还有人说要对老干部实行“赎买”，给点钱，叫他们退休，因为老干部不懂科学，不懂技术，只会打仗、搞土改。我们一定要鼓一把劲，一定学习并且完成这个历史赋予我们的伟大的技术革命。这个问题要在干部中议一议，开个干部大会，议一议我们还有什么本领。过去我们有本领，会打仗，会搞土改，现在仅仅有这些本领就不够了，要学新本领，要真正懂得业务，懂得科学和技术，不然就不可能领导好。我在一九四九年所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里曾经说过：“严重的经济建设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习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习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时间过去了八年。这八年中，革命一个接着一个，大家的思想都集中在那些问题上，很多人来不及学科学，学技术。从今年起，要在继续完成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把党的工作重点放到技术革命上去。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注意。各级党委可以在党内事先酝酿，向干部讲清楚，但是暂时不要在报上宣传，到七月一日以后我们再大讲特讲，因为那时候基层整风已经差不多了，可以把全党的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上去了。注意力移到技术革命方面，又可能忽略政治，因此必须注意把技术和政治结合起来。

（2）红与专、政治与业务的关系，是两个对立物的统一。

一定要批判不问政治的倾向。一方面要反对空头政治家，另一方面要反对迷失方向的实际家。

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这是毫无疑义的，年年如此，永远如此。这就是又是又专。将来政治这个名词还是会有有的，但是内容变了。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

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

现在一方面有社会主义世界同帝国主义世界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另一方面，就我国内部来说，并没有最后消灭，阶级斗争还是存在的。这两点必须充分估计到。同阶级敌人作斗争，这是过去政治的基本内容。但是，在人民有了自己的政权以后，这个政权同人民的关系，就基本上是人民内部的关系了，采取的方法不是压服而是说服。这是一种新的政治关系。这个政权只对人民中破坏正常社会秩序的犯法分子采取暂时的程度不同的压服手段，作为说服的辅助手段。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人民中还隐藏一部分反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例如右派分子，对这种人，我们基本上也是采取由群众鸣放辩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只对严重反革命破坏分子采取镇压手段。过渡时期完结、彻底消灭了阶级以后，单就国内情况来说，政治就完全是人民内部的关系。那时候，人和人之间的思想斗争、政治斗争和革命一定还是会有，并且不可能没有。对立统一的规律，量变质变的规律，肯定否定的规律，永远地存在。但是斗争和革命的性质和过去不同，不是阶级斗争，而是人民内部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社会制度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科学技术的先进和落后之间的斗争。由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是一场斗争，是一个革命。进到共产主义时代了，又一定会有很多很多的发展阶段，从这个阶段到那个阶段的关系必然是一种从量变到质变的关系。各种突变、飞跃都是一种革命，都要通过斗争，“无冲突论”是形而上学的。

政治家要懂些业务。懂得太多有困难，懂得太少也不行，一要懂得一些。不实际的是假红，是空头政治家。要把政治和技术结合起来，农业方面是搞试验田，工业方面是抓先进典型、试用新技术、试制新产品。这些都是用的“比较”法，在相同的条件下，使先进和落后比，促使落后赶上先进。先进和落后是矛盾的两个极端，“比较”是对立的统一。企业和企业之间，企业内部车间和车间、小组和小组、个人和个人之间，都是不平衡的。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的，相对的。我国现在经济上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变化，是在总的量变过程中许多部分的质变。若干年后，中国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那时候将完成一个飞跃，然后再继续量变过程。

评比不仅比经济、比生产、比技术，还要比政治，就是比领导艺术。看谁领

导得比较好些。

(3) 上层建筑一定要适合经济基础和生产发展的需要。

政府各部门所制订的各种规章制度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八年来积累起来的规章制度许多还是适用的，但是有相当一部分已经成为进一步提高群众积极性和发展生产力的障碍，必须加以修改，或者废除。在修改或者废除这些不合理的规章制度方面，最近一个时期，在群众中间，已经创造了许多先进经验，例如石景山发电厂改进职工福利待遇的办法，浙江机械制造厂改进职工宿舍制度的办法，江苏戚墅堰发电厂改进奖金制度的办法，广西省一级几个商业机关合并为一个机关，由总数二千四百人缩减为三百五十人、即减少七分之六的人员等。应该作出这样一个总的规定，即是在多快好省地按计划按比例发展社会主义事业的前提下，在群众觉悟提高的基础上，允许并且鼓励群众的那些打破限制生产力发展的规章制度的创举。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还应当派遣负责同志到各地的基层单位去，发现那里有些什么规章制度已经限制了群众积极性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根据那里的实际情况，通过基层党委和群众的鸣放辩论，保存现有规章制度中合理部分，修改或者废除其中的不合理部分，并且拟定一些新的适合需要的规章制度，在这个单位实行，也可以推广到其他单位试行。

中央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应该系统地总结这方面的典型的成熟的先进经验。重大的和全国性的，经过党中央和国务院批准。地方性的，经过相应的地方党委和政府批准。技术性和专业性的，经过主管部门批准。然后在全国或者全省的相同的所有单位中普遍推行。经过一段时间实行以后，在必要的时候，再根据新的经验修改或者重新制定各种规章制度。

这是制定和修改各种规章制度的群众路线的方法。

(4) 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方法

十个指头的问题。

人有十个指头，要使干部学会善于区别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或者多数指头和少数指头。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有区别，这件事看来简单，许多人都不懂得。要宣传这种观点。这是大局和小局、一般和个别、主流和支流的区别。我们要注意抓住主流，抓错了一定翻跟斗。这是认识问题，也是逻辑问题。说一个和九个指

头，这种说法比较生动，也比较合于我们工作的情况。我们的工作，除非发生了根本路线上的错误，成绩总是主要的。但是这种说法对于某些人却不适用，例如右派分子。许多极右分子，那是几乎十个指头都烂了；学生中的大部分普通右派分子也不只烂了一个指头，但又不是全烂了，所以还可以留在学校里。

“攻其一点或几点，尽量夸大，不及其余。”

这是一种脱离实际情况的形而上学的方法。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猖狂进攻，他们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我党历史上吃过这种方法的大亏，这就是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的时期。立三路线也是如此。修正主义，或右倾机会主义，也用这种方法。陈独秀路线和抗日时期的王明路线，就是如此。一九三四年，张国焘也用过这种方法。一九五三年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用的也是这种方法。我们应当总结过去的经验，从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加以批判，使干部觉悟起来，以免再吃大亏。好人犯个别错误的时候，也会不自觉地采用这种方法，所以好人也要讲究方法论。

概念的形成过程，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形成过程，就是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思维的过程。

人脑是能够反映客观世界的，但是要反映得正确很不容易。要经过反复地考察，才能反映得比较正确，比较接近客观实际。有了正确的观点和正确的思想，还要有比较恰当的表达方式告诉别人。概念、判断的形成过程，推理的过程，就是“从群众中来”的过程；把自己的观点和思想传达给别人的过程，就是“到群众中去”过程。在我们的干部中，大概还有不少的人，不明白这样一个简单的真理：任何英雄豪杰，他的思想、意见、计划、办法，只能是客观世界的反映，其原料或半成品只能来自人民群众的实践中，或者自己的科学试验中，他的头脑只能作为一个加工工厂而起制成完成品的作用，否则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人脑制成的这种完成品，究竟合用不合用，正确不正确，还得交由人民群众去考验。如果我们的同志不懂得这一点，那就一定会到处碰钉子。

关于原则

(1) 一定要把整风坚持到底。

全党要鼓起干劲，打掉官风，实事求是，同人民打成一片，尽可能地纠正一切工作上、作风上、制度上的缺点和错误。

(2) 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

中央和省、直辖市、自治区两级党委的委员，除了生病的和年老的以外，一年一定要有四个月的时间轮流离开办公室，到下面去作调查研究，开会，到处跑。应当采取走马看花、下马看花两种方法。哪怕到一个地方谈三、四个小时就走也好。要和工人、农民接触，要增加感性知识。中央的有些会议可以到省会以外的地方去开。

(3) 以真正平等的态度对待干部和群众。

必须使人感到人们相互间的关系确实是平等的，使人感到你的心是交给他的。学习鲁迅。鲁迅的思想是和他的读者交流的，是和他的读者共鸣的。人们的工作有所不同，职务有所不同，但是任何人不管官有多么大，在人民中间都要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姿态出现。决不许可摆架子。一定要打掉官风。

对于下级所提出的不同意见，要能够耐心听完，并且加以考虑，不要一听到和自己不同的意见就生气，认为是不尊重自己。这是以平等态度对待人的条件之一。

(4) 要随时准备挨骂。

各级党委，特别是坚决站在中央正确路线方面的负责同志，要随时准备挨骂。人们骂得对的，我们应当接受和改正。骂得不对的，特别是歪风，一定硬着头皮顶住，然后加以考查，进行批判。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可以随风倒，要有反潮流的大无畏精神。这一点，我们已经在一九五七年受到了考验。

(5) 党的领导原则。

在省、地、县三级或者在省、地、县、乡四级的干部会上，讨论一次党的领导原则问题。讨论一下这些原则是否正确：“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办也有决，不离原则。工作检查，党委有责。”这几句话里，关于党委的责任，是说大事由它首先作出决定，并且在执行过程中加以检查。“大权独揽”是一句成语，习惯上往往指的是个人独断。我们借用这四个字，指的却是主要权力应当集中于中央和地方党委的集体，用以反对分散主义。难道大权可以分揽吗？这八歌诀，产生于一九五三年，就是为了反对那时的分散主义而想出来的。所谓“各方去办”，不是说由党员径直去办，而是一定要经过党员在国家机关中、在合作社中、在人民团体中、在文化教育机关中，同非党员接触、商量、研究，

对不妥的部分加以修改，然后大家通过，方才去办。第三句话里所说的“原则”，指的是：党是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民主集中制，集体领导和个人作用的统一（党委和第一书记的统一），中央和上级的决策。

（6）第一书记挂帅。

是否事事都要问过第一书记？可以不必。大事一定要问。要有二把手、三把手，第一书记不在家的时候，要另外有人挂帅。

（7）党委要抓军事。

军队必须放在党委的领导和监督之下，现在基本上也正是这样做的，这是我军的优良传统。作军事工作的同志是要求中央和地方党委抓这项工作的。只是因为忙于社会改革和经济建设工作，近几年来我们抓得少了一些。现在应当改善这种情况。办法也是一年抓几次。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毛泽东批示“可用”的人民日报社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中说：

“他们的结论是：‘无论如何要稳妥可靠些，不要再犯冒进的错误’，”

“这些人不了解，跃进和冒进有原则的不同。跃进是一种有实际可能性的前进，它不同于通常的前进，它是在有利的革命形势下，在群众运动的高潮中，千方百计，打破常规，采取新的方法或者新的技术，以比通常快得多的速度，迈大步的前进。”“冒进是超越了客观实际的可能，没有根据或没有充分的根据的胡思乱想，主观主义地蛮干。”

“一九五六年我国各项事业的大发展，尽管其中有个别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基本上健康的大跃进。”“有些人却分辨不出九个好指头和一个坏指头的区别。把个别当作一般，把支流当作主流，对整个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名为反‘冒进’，实际反跃进。”

一九五八年二月八日，《人民日报》社论《反浪费反保守是当前整风运动的中心任务》：

整风运动在全国的企业、事业单位和国家机关里，目前出现了一个新的洪峰，这就是以反浪费和反保守为中心掀起了一个新的鸣放高潮和整改高潮。在反浪费反保守的大鸣大放中，中央各国家机关内贴出了二十五万张大字报；北京市三十一个企业三十天的统计，职工们就贴了三十万张大字报，提出了四十三万条意见。

运动声势浩大，锋芒集中在一个方向，贯彻多快好省勤俭建国的方针，促进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

从各地区各企业和各机关的情况看来，这次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同过去历次的增产节约运动有很大的不同。这次运动实际上已经成为反对思想、政治、经济各方面落后现象的斗争，已经形成了广泛地比先进，比多快好省的高潮。在这个波澜壮阔的运动中，很多束缚群众积极性和生产力发展的陈规被冲破了，很多长期不能解决的根本性问题顺利地解决了，各方面的生产和工作已经有了明显迅速的改进。一月份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历年来，一月份生产和基建计划总是完成的最不好的，年初松，年中紧，年底赶，几乎成了一个定例。而今年却一反积习，一月份的工业总产值超额百分之二点五完成了月计划。基本建设的情况也比过去任何一年都好。再如商业部门中的反浪费反保守运动，虽然还开始不久，某些先进单位却已经在广大职工觉悟充分提高的基础上解决了许多长期没有彻底解决的问题。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在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中大胆地突破常规，提出了并且实现了减少人员，节约流动资金，改善服务态度的措施，并且纠正了在商业企业中机械地形式主义地搬用在工业企业中工作八小时的现象，实行了一班到底的工作制度。

这个声势浩大的运动，显然是一九五七年我国人民在思想战线、政治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产物。正因为这样，群众在这个运动中决不满足于克服生活中的铺张浪费，也决不满足于仅仅要求产量指标的突破。许多企业在辩论了浪费的性质、原因和如何堵塞漏洞等问题以后，得出了一个共同的结论：造成浪费的责任应该由领导工作人员、技术人员和工人三方面担负，这三方面都必须同时改进。领导工作人员往往有官僚主义、主观主义、不深入地钻研业务的毛病；技术人员往往是重业务不重政治，墨守陈规，不善于发动和依靠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工人群众中也有许多人没有正确对待个人和国家的关系，没有正确解决为谁劳动的问题。在许多单位的辩论会上，三方面的人都同时揭发和批判了自己的缺点，这样就打掉了官气、暮气和邪气，资产阶级思想受到抵制，无产阶级思想大大抬头。

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带动了各方面的工作，这就是当前整风运动的显著特征。我国，全民性的政治战线上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其最终目的本

来就是为了要把社会主义各方面的建设工作大大推进一步。经过前两个阶段的大争大辩，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在十五年赶上英国和苦战三年，改变面貌的伟大号召的鼓舞下，群众不能不要求生产和工作的大跃进，不能不反浪费反保守。灿烂的思想政治之花，必然结成丰满的经济之果。这是完全合乎规律的发展。有些单位对于这个形势认识不足，在运动中忽视思想工作，只算经济账，简单地从技术上采取一些措施，而不认真开展群众性的争辩，不彻底转变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这样他们就不能从根本上杜绝浪费现象，克服保守主义，引导生产的大跃进。因此，目前的斗争既是一个经济上的斗争，同时又是一个思想政治的斗争，既要算经济账，又要算思想账、政治账。通过大鸣大放，大争大辩，不但要反掉浪费，反掉保守，而且要反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要通过和结合反浪费反保守的斗争，彻底改进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提高全体职工群众的社会主义觉悟，打破那些妨碍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陈规，精简机构。改善生产管理和劳动组织，改进生产技术，降低生产费用，以便贯彻执行多快好省的方针，促进生产的大跃进。

有一些人虽然认识了思想工作的重要性，但是他们采取的办法却是错误的。他们组织群众去抽象地讨论一些原则性问题，结果在辩论会上，群众往往不知所云。当然，重大的原则问题，例如个人和集体，自由和纪律，工农关系，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等等，都必须在群众中辩论清楚。但是在目的阶段，这种辩论必须针对生产和工作具体任务。很多企业，通过反浪费反保守的具体辩论，引导广大群众认清了上述原则，并且也边辩边改，立即付诸行动。拿这种作法同前种作法相比，岂不生动得多，深刻得多吗？我们说以反浪费反保守为纲，首先就是说要以它作为当前整改阶段的纲，通过它来完成当前的整改任务。决不能把这两件事分割开来，如果抛去群众最关心的问题不管，不去因势利导，从解决具体问题中去解决思想，那就必然会失败。

许多企业、学校和机关已经决定，要把反浪费反保守运动作为整改阶段的中心，这是正确的。希望全国所有企业、学校和机关都向他们看齐，争取整风运动的这个新任务的彻底胜利，从而使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实现一个全面的大跃进！

五、政治局扩大会议一些领导人作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三日至二十三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陈云发言检查了反冒进中的错误，表示要负主要责任。还说在财经工作中，材料数字一大堆，是对主席和政治局搞倾盆大雨、本本主义，是不让中央参与对经济工作的设计的分散主义错误。

毛泽东扞话说：“政治设计院究竟在哪里？章伯钧说国务院都是拿成品，他不满意，他要有权参与设计。我们政治局委员可以不可以有权参与设计呢？过去这个五年计划实际上无权参与，我是主席，也没有参与设计每年的年度计划，总是请你签字，叫做强迫签字。我有个办法，不看。你强迫我嘛！老是在国务院讨论，总是拿不出来。千呼万呼不出来，为什么不出来呢？说没有搞好，等到梳妆打扮一番跑出来的时候，对我们说不行，时间迟了。这事实上是一种封锁。”

会上，李先念和薄一波也进行了自我批评，承担了各自在反冒进中所犯的错误的责任。

一九五八年二月十八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讲话：

“南宁会议还是要放一炮的，我看不不过是小炮而已，害得一些同志紧张。先念同志现在还睡不着觉，吃安眠药，何必那么紧张。今后还是要靠你们这些人办事，此外没有人。”

“反冒进反得那么厉害，把群众的气泄下去了，加上右派的猖狂进攻，群众的气就不高，我们也倒霉。我们这些中央委员，你就那么舒服呀？我是不舒服的。”

“如果说冒进是非马克思主义，或者反马克思主义，而反冒进是马克思主义，那马克思主义就在中国变了样子，把搞得少的叫马克思主义，搞得多的不叫马克思主义。我不赞成反冒进叫马克思主义，赞成冒进才是马克思主义。这个冒进好嘛，使农民多搞了水利嘛！”

“右派把你们一抛，抛得跟他相距不远，大概五十米远。”“我们的同志就会生气，‘噢，你右派把我抓得跟你差不多呀！’果然生了气。表现在去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同志在人民代表大会上的那一篇报告，痛驳右派，壮人民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

“不要一讲缺点，就搞得天昏地暗，日月无光。中国六亿人口，一千二百万党员办事，能没有一点缺点。”

“一九五六年反冒进是个什么事情呢？大家都在正确路线之下，在个别问题

上意见不一致，这么一种性质。”

贰、本节简论

一些人当时虽然做了检讨但思想并没有真正通。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又重新翻这个案，还硬说周恩来如何挨了整、受了委屈，并以此证明毛泽东犯了二十年的“左”倾路线错误，

胡绳的《七十年》说：“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作为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起点，有其积极的一面……但是后来的实践表明，这两个会议对中央和全党的工作又有消极的一面。那就是两个会议都对 1956 年的反冒进以用主张反冒进的中央领导人（他们代表党中央的大多数，而且他们的主张得到党的八大一次会议和八届二中全会的确认）作了不适当的批判，从而造成如下两个方面的影响：第一，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从经济恢复到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党和人民所积累并由八大所总结的宝贵的成功经验，就很难不助长脱离实际的臆想和冒进。第二，新的探索实际上否定了党中央领导集体的经验和智慧，也实际上破坏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这就很难不助长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的发展。”

毛泽东对 1956 年反冒进的批评是否“不适当”，姑且不论，上述这种说法对它造成的影响的分析和推论，确实也大得吓人。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也作大体相似的评论：

从批评的以冒进开始，毛泽东逐渐形成了“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思维定势，认为无论如何正确的方面总是“九个指头”，错误的方面总是“一个指头”超出这个范围便是“右倾”实际上是过于自信，且听不得别人批评。

如果说，八届三中全会对反冒进的批评还只是从经济工作的角度提出的，那么到了南宁会议，则把反冒进一下子提高到了政治问题的高度使会议的气氛一开始就十分紧张。

毛泽东是个哲学家，他在讲述辩证法。但是他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平衡与不平衡的转化，是需要条件的。条件有主观条件，有客观条件。毛泽东只强调主观条件，忽略了客观条件，一味要求不断打破原有定额、指标和计划，

使所谓的“积极平衡始终无法建立起来，相反却演变成了遗笑后人的数字游戏。

南宁会议是履大跃进的一次关键性会议，也是毛泽东个人专断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将本是中央集体决定的反冒进当作几位领导人的错误，在党的高级会议上随便指名道姓地批评表明毛泽东已经把自己凌架于中央领导集体之上，毛泽东的个人专断急剧地发展起来。毛泽东个人专断的发展，除了某些客观原因，如制度不健全等等外，毛泽东个人的主观原因不可回避。这个主观原因就是过于自信，不再谦虚谨慎。

《毛泽东传》也说：

“在南宁会议上表现出来的毛泽东与中央其他几位领导人的分歧，不是在是否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问题上，而是在建设速度的问题上。由于毛泽东严厉批评了反冒进，又提出一些超过实际可能性的高指标而被会议一致通过，这就直接导致“大跃进”的开始发动。”

毛泽东承认一九五六年冒了，冒了也应该调整。但是他十分忌讳提“反冒进”，他认为，这样提就成为政治问题、路线问题了。他提出，今后只能提反右倾保守的口号，而不能提反冒进的口号，这就带来片面性，同他历来所倡导的在反倾向问题上进行两条战线斗争的方针是不一致的。”

“这一次对反冒进的批评，实践证明是错误的，由于对当事人采取继续信任的态度，避免了更大的损失。但党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从此开始受到破坏，对后来的历史进程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影响。”

这里也把事情的本质歪曲了。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毛泽东认为他当世界革命领袖的条件，已是万事具备，只欠东风。这东风就是中国的经济。他太急迫了，又把赶超英美的时间提前再提前。”“为急于当世界革命领袖的功业心所驱使，毛泽东决心要发起大跃进运动，使中国的落后的农业经济在短期内出现奇迹。”“关键是要统一思想，统一意志。但他面临着一个巨大障碍，这就是周恩来和他领导的国务院……不把这些入压服，大跃进休想搞得起来。”“于是，继一九五七年九月中央八届三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在一九五八年上半年又接连召开了杭州会议、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汉口会议直至八大二次会议以批判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为主题，反对右倾保守，猛整周恩来。经过这一系列会议逼得周恩来连连检讨，把符合客观经

济规律的综合平衡、稳步前进的正确意见，彻底批倒搞臭，为毛泽东的以‘左’倾冒进为特征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共全党的推行开辟了道路。”

很明显，这是辛子陵的一贯手法：一个是，蓄意歪曲事实，从毛泽东的动机、人格上污蔑攻击毛泽东；另一个是，拚命地把周恩来拉到毛泽东的对立面去，以便“证明”毛泽东一个人执行了一条“左”倾错误路线。

毛泽东批评一九五六年的反冒进，究竟是批评什么思想、什么人？究竟对了还是错了？

其实，毛泽东说得很清楚，他批评的是，在一九五六年的条件下，有的领导同志针锋相对的提出了反冒进的指导方针。

到了一九五七年，右派进攻，抓住“反冒进”大做文章。

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 1957 年 6 月 26 日在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有人认为，我国的发展国民经济计划在 1956 年全面冒进了，在 1957 年又全面冒退了。很明显，这种意见是不正确的。”1956 年的计划“采取了跃进的步骤，而且在各方面取得了如前所说的巨大成就。不错，某些指标是大了一些。但是，这是属于局部性质的缺点”。

正是在这个报告中，第一次提出了“跃进”这个口号。这里，周恩来既回答了右派的进攻，也纠正了他在一九五六年提出反冒进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一月，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讲话中，又高度赞扬了周恩来的这个报告，说它“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的文章”。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表彰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把一号博士头衔赠给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

当晚，周恩来写信给毛主席说：“这是我最早抛弃反冒进的开始。”“我当时的中心思想是维护社会主义，反击右派，从建设的实绩上，肯定了 1956 年的建设是跃进的发展，抛弃了对 1956 年建设是‘冒进’的错误估计。但是，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反‘冒进’是方针性的错误。”

这说明，毛泽东当时批评反冒进，并不是反对纠正一九五六年计划工作中的具体错误，而是反对一些领导人提出的反冒进的错误指导方针。也不是要反对周恩来个人，而是反对一种错误思潮。更不是什么今后只能反右倾不能反冒进。而

且，在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周恩来已经达成了共识。经过一九五八年的一系列会议，到八大二次会议，可以说全党达成了共识（也可以说是得到中央全会和八大二次会议的确认）。

2011 年 4 月 1 日修改

第二节 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举行了中共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在会上发表了六次长篇讲话（三月九日、十日、二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

一九五八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四点：

第一，要跃进，但不要空喊，要有办法，有技术，指标很高，实现不了。我现在又有点“机会主义”，无非是怕打屁股。

第二，现在好像不要平衡，有人认为越不平衡越好，是否有道理？全国各地搞工业，上海工人如何办，哪里去吃饭。地方工业，全国劲头很大。东北农业劲头不大。辽宁工业已占 85%，着重搞工业，没有注意农业，没有双管齐下，是“铁拐李”，农业腿短。现在又有大招工的一股风，这个不得了。山东要招 15 万人，山西要招临时工 17 万人。1956 年工资冒了 10 多亿，如果不注意，就要发生浪费。

第三，两种方法的比较。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冒进”，一种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反“冒进”。究竟采取哪一种？苦战三年，改变面貌，是办得到的。但“一天消灭四害”，“苦战三天”，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了。

第四，规章制度从苏联搬了一大批，有些规章制度束缚生产力，制造浪费，制造官僚主义。苏联的经验只能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不从之。把苏联的经验孤立起来，不看中国实际，就不是择其善者而从之。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通过总结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经验，阐述了坚持普遍真理与发扬独创精神的辩证关系。他的结论是：基本路线是普遍真理，但各有枝叶不同。各国如此，各省也如此。

其中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也是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攻击最多的问题，是毛泽东提出的关于两种个人崇拜的观点。毛泽东说：

个人崇拜有两种：

一种是正确的，如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正确的东西，我们必须崇拜，永远崇拜，不崇拜不得了，真理在他们手里，为什么不崇拜呢？我们相信真理，真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

另一种是不正确的崇拜，不加分析，盲目服从，这就不对了。

反个人崇拜的目的也有两种：

一种是反对不正确的崇拜，

一种是反对崇拜别人，要求崇拜自己，

问题不在于个人崇拜，而在于是否是真理。是真理就要崇拜，不是真理就是集体领导也不成。

我们党在历史上就是强调个人作用和集体领导相结合的。

打死斯大林有些人有共鸣，有个人目的，就是为了想让别人崇拜自己。

所谓反对个人崇拜问题，是从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以后提出来的。在中国的说法有两种；一种是反对个人崇拜；另一种是反对个人迷信。后来，在文章中还是使用了反对个人崇拜这种说法。

毛泽东在这里说的两种个人崇拜，其中第二种不正确的个人崇拜，其实，就是个人迷信。我们不应该反对个人崇拜，只能反对个人迷信。

有人说，毛泽东的这种说法就是鼓吹个人崇拜。要把崇拜真理与崇拜个人分开，我们只能崇拜真理，不能崇拜个人。某个真理总是由某个人提出来的，真理与个人能绝然分开吗？当然，真理与个人也不能绝对等同，不能因某个人提出了某个真理，这个人就成了真理的化身，他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

其实，那些反对个人崇拜的精英们才是真正的个人崇拜主义者。在中国，各种纪念个人的旧居、碑亭、塑像，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多。把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讲话都封为理论、重要思想。成天要人们高举这些旗帜，而且还要一百年不动摇。

一九五八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对《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按语》的批示

这些按语见《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是一九五五年九月和十二月写的，其中有些现在还没有丧失它们的意义。其中说：一九五五年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决战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这样说不妥当。应当说，一九五五年是在生产关系的所有制方面取得基本胜利的一年，在生产关系的其他方面以及上层建筑的某些方面即思想战线方面和政治战线方面，则或者还没有基本胜利，或者还没有完全胜利，还有待于今后的努力。我们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际方面会发生那样大的风浪，也没有预料到一九五六年国内方面会发生打击群众积极性的“反冒进”事件。这两件事，都给右派猖狂进攻以相当的影响。由此得到教训：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们应当准备对付国际国内可能发生的许多重大困难。无论就国际方面说来，或者就国内方面说来，总的形势是有利的，这点是肯定的；但是一定会有许多重大困难发生，我们必须准备去对付。

毛泽东的这个批示指出了对一九五六年国际国内形势分析存在的偏差。这是以后中央领导层产生一系列分歧的基础。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阐述了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观点、四大阶级、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建设速度问题。

关于对立统一观点，

他说：总而言之，量变转化为质变，质变转化为量变。有限变为无限，无限转化为有限。事物总是有始有终的。只有两个无限：时间、空间无限。无限是有限构成的，各种东西都是逐步发展，逐步变化的。要搞几十、百把个例子，来说明对立的统一和相互转化的概念，才能搞通思想，提高认识，展开思想，把思想活泼一下，脑子一固定，就很危险。

关于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

他说：现在仍然存在着四个阶级：

第一个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右派分子及其代理人。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敌我性质。

第二个是民族资产阶级。我们同这个阶级的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的性质。

第三个是工人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全民所有制。

第四个是农民阶级。这个阶级的经济基础是集体所有制。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总路线

他说：路线已开始形成，反映了群众斗争的创造，这是一种规律，领导机关反映了这些创造，提出了几条。但是尚待完备，尚待证实，不可说已经最后完成。只要路线正确——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在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下，波浪式的前进。社会主义的建设路线，还在创造中，基本观点已经有了。全国六亿人，全党一千二百万人，只有少数人，恐怕只有几百（万）人，感觉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可能还有很多人将信将疑，或者是不自觉的。再有一部分人根本不信，可能有几千万人（地、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人士以及劳动人民内部和我们干部中的一部分）。现在已经使得少数人感觉到这条路线是正确的，对于我们来说，在理论上和若干工作的实践上承认这条路线是正确的。正确路线是对错误路线而言的，二者是对立的统一。正确路线是在同错误路线的斗争中形成的。说错误都可以避免，只有正确，没有错误这种观点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是少犯点，犯得小点。正确与错误是对立的统一，难免论是正确的。只有正确，没有错误，历史上没有这个事实，这就是否认对立统一这个规律，这是形而上学。搞社会主义有两条路线：是冷冷清清、慢慢吞吞好，还是轰轰烈烈、高高兴兴的好？十年、八年搞个四十条，那样搞社会主义也不会开除党籍。苏联四十年才搞那么点粮食和东西，假如我们十八年能比上四十年当然好，也应当如此。

关于建设速度

他说：建设的速度，是个客观存在的东西，凡是主观、客观能办到的，就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但办不到的不要勉强。现在有股风，是十级台风，不要公开去挡，要在内部讲清楚，把空气压缩一下。要去掉虚报、浮夸，不要争名，而要务实。有些指标高，没有措施，那就不好。河南提出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消灭文盲，可能有些能做到。即使全部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二年可以做到，也不要登报，内部可以通报。大家抢先，会搞得天下大乱，实干就是了。各省不要一阵风，说河南一年，大家都一年，说河南第一，各省都要争个第一，那就不好。总有个第一，“状元三年一个，美人千载难逢”。可以让河南试验一年。如果河南灵了，明年各省再来一个运动，大跃进，岂不更好。后一年、二年、三年至五年完成四十条，那也不能算没有面子，不能算不荣誉，也许还更好一些。合作化逼得周小舟紧张的要命，四川的高级化，李井泉从容不迫。不慌不忙，到一九五七年才完成，情形并不坏。迟一年有何关系？也许更好些。一定要四年、五年才完成，那也不对，问题是看条件如何，群众觉悟提高没有？需要多少年，那是客观存在的事情。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作了相当完整、系统的论述。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以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分析为基础，已经开始形成，但尚不完备。能做到自觉拥护的人不多，而出自本能反对的人不少。总路线的灵魂、实质是建设速度问题，但对速度一定要辩证地来看，不能刮风。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的中心就是鼓励广大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提高风格，振作精神，树立起势加破竹，高屋建瓴的气概。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给滕代远的信。

指出：“铁道文件，还宜作些补充，才有充分说服力。例如：每一条为什么非修不可的理由，它的经济价值，有些是国防价值或政治价值；八万公里需要多

少钱，有无可能；铁道系统如何反教条主义。这些宜一起写进去，可以在回京后，跟一些同志研究之后，再行改写，不惜反复修改。”

从这封信可以看出，毛泽东当时虽然反复强调要反保守，但同时他又非常冷静，反复教育干部要注意每一个建设项目是否必要和可能。绝不是像有些人攻击污蔑的那样，只是一味的头脑发热，盲目冒进。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的一个批语。

指出：“有资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就没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一个消灭掉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更彻底地灭掉了资产阶级的自由，无产阶级的自由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自由。实际是兴无灭资，无产阶级的自由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自由就被消灭掉了。”^[3]

这里提出了“兴无灭资”的口号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周恩来在会议发言

他说：“在当时就是没有听取多方面意见，没有接触群众和实际，只局限在会议室和办公室中，更没有看清在所有制改变后解放了的生产力要求大发展的群众运动正在起来。我们反而只看见死的物不看见生气勃勃的人，务实而不务虚。我负主要责任提出反冒进报告就是对群众生产高潮这个主流泼了冷水，因而不是促进而是促退，不是多快好省，而是少慢差费，四十条也被打入冷宫，这就是问题的本质。我也认为问题的本质还不是什么战时赤字和和平赤字的问题，这两种赤字虽然有条件的不同，但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解决这两种赤字的方针是一个，就是只能依靠人民的力量。当时确没有这样的认识，等到右派教育了我，主席提醒了我，群众实践更启发了我，才逐渐认识这是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更深一层说也就是对社会主义革命本质的东西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建设的主流发动群众、发展生产看不到，自然就抓不起来了。”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关于反冒进，我看以后不需要谈了。如果从经验上、方法上把它作为例子，那倒是可以的。这个问题不是什么责任问题，重点是要用唯物论、辩证法来深入分析反冒进问题。”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落后分子觉悟起来，共产主义精神高涨，这是目前国内形势的显著特点。”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

会开得很好，重点归结到方法问题，第一是唯物论，第二是辩证法，我们许多同志对此并不那么尊重。反冒进不是什么责任问题，不再谈了。我也不愿听了。不要老是自我批评，作为方法的一个例子来谈，那是可以的。

毛泽东的这篇讲话，重点是总结反冒进在思想方法上的教训。但同时又强调了另一方面应该注意的问题，他说：

许多事情我自己就是半信半疑。例如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究竟对不对，还要看几年。

我认为要把过高的指标压缩一下，要确实可靠，大水大旱都有话可说，必须从正常情况出发。做是一件事，讲是一件事。过高的指标不要登报，登了报的也不要马上去改。

河南今年四件事都想完成，也许可能做到，即使能做到，讲也谨慎些，给群众留点余地，也要给下级留点余地。这也就是替自己留余地。过去我们就有不留

余地之事，例如一九四七年的土改纲领，提出“开仓济贫”的口号，后来又取消了。支票开的太多，难以兑现，对我们不利。

我很担心，我们一些同志在这种热潮下面，可能被冲昏头脑，提出一些办不到的口号。一个县、一个地委没有多大坏处，中央和省两级必须稳当一点。我并不是想消灭空气，而只是压缩空气，把脑筋压缩一下，冷静一些，不是下马。而是要搞措施。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

阶级分析，我们国内存在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两个剥削阶级。第一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残余。地、富、反、坏未改造好的部分。现在要加上右派。反社会主义的阶层。富农有剥削，有选举权，但不受人尊重。右派本来是与我们合作的，现在他们反社会主义，故变成敌人。国民党所做的是、就是右派做的事。帝国主义、台湾蒋介石非常赞成、关心右派分子。地、富、反、坏、右是可以改造的，大多数可以改造好的。第二是民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民主党派的大多数（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占百分之十。其余百分之九十是中间派和左派），至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右派占百分之十，老教授中的右派比例多了（大概全国约有右派分子三十万人，其中县以上和大专是十六万）。

右派这么多，所以采取除少数外，不提它不取消选举权，而采取分化改造的政策。中间派对我们又反对又拥护。“苏报案”是章士钊的文章。他反社会主义反共。对民族资产阶级三百万人要做好工作。他们是可以转变的。

劳动阶级是工人、农民（过去的被剥削者和不剥削人的独立劳动者）。也可以说是两个劳动阶级。独立劳动者，有一部分是有轻微剥削的，如富裕中农和城市的上层小资产阶级。

毛泽东这篇讲话的重点还是分析过渡时期的阶级关系。从这些可以看到毛泽东对阶级关系问题的重视。因为它是党制订政治路线的基础。

总的来说，毛泽东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对理论有重大的丰富和发展，突出贡献有以下几点：

- (1) 提出发展生产力的理论问题
- (2) 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 (3) 提出两个剥削阶级、两个劳动阶级
- (4) 提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到了东方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毛泽东的讲话的确十分精彩，十分具有鼓动性；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不能说不正确。问题是，无论毛泽东本人怎么想，客观上，在反右倾保守的强大压力下，在人们渴望高速建设社会主义的急切心情的支配下，人们就是把科学、把客观规律统统当作教条，当作迷信。其结果必然是主观主义、唯意志论大行其道。

毛泽东把个人崇拜与真理崇拜混同起来，主张如果真理掌握在个人手中，就应该崇拜，其含义就是他自己就代表真理，这就明显地表现毛泽东过于自信。尤其当他的意见和中央集体不一致时，他更需要借助党内民主之外的东西来贯彻自己的主张。所以可以说，毛泽东关于正确的个人崇拜的主张，是天理与人欲并存。

成都会议，就经济建设方面的“左”倾错误而言，无论其深度和广度都远远超过了南宁会议。“大跃进”中的各项主要错误，成都会议都已基本存在或初具雏形。

对照毛泽东的讲话，它的这种攻击可以说没有一句话是站得住脚的。但确实代表了党内那些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心声。

二、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提出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一九五八年四月一日至六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汉口会议，华东和中南一些省委书记参加。

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一次汇报会议上指出：“一九五六年下半年到一九五七年来了个反冒进，搞得人不舒服。这个挫折很有益处，教育了干部和群众，是反面教育。因为受了损失，是个马鞍形，两个高潮之间一个低潮——反冒进。过去说一九五七年比一九五六年实在些，这个话是不符合事实的。一九五七年实际上工作差劲了，许多干部抬不起头来，上面骂冒进，下面也骂冒进，所以一九五七年劲头不大。去年揭开盖子，用整风反掉了右倾保守思想。盖子不解决，压在劳动者、干部身上，精神不振，生产力不解放。”“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没有着手解决这个问题，是因为当时国内外情况紧张，斯大林问题，波匈事件，顾不上开会；我（那时是采取防御的，以后才逐步恢复三个口号。”

一九五八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汉口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突出地强调了两点：

第一，大跃进要留有余地。

生产高潮中要务实，不要搞空气，不实在。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是提基本改变面貌，还是提初步改变面貌？苦战三年以后，还需要再战。我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报告中提的不是三年，而是还要战斗十几年，不要把事情简单化了。

做事情要留有余地，要务实。粮食到手，树木到眼才算数。要比措施，比实际。现在很多指标还不是群众的东西，是领导在头脑中的，好多还是会议上的，到秋后看一看再说。好大喜功是需要的，但大话是不需要的，华而不实是不好的，如果华而不实，喜功便会无功。不是喜大而是喜小，结果会轰轰烈烈之后无功而返，这就不好了。生产高潮方面的指标，现在我担心会不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今年干劲这样大，如果得不到丰收，群众情绪受挫就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上来，社会上就会有人说话了，喊“冒进”了。

宣传工作要务实。报纸宣传要实际。要深入、细致、踏实。不要光宣传指标。现在我们的宣传只注意宣传多快，对好省宣传的不够，不好、不省怎么会改变面貌？今后《人民日报》不轻易宣传某某地方什么“化”了，有些地方稀稀拉拉种了几棵树就算绿化了，怎么行。这产生了一个缺点，这种宣传只能促进睡觉，要回去研究一下，怎样才算“化”了。种上是“化”还是长出来是“化”？除四害也不要轻易宣布“四无”。除四害今年只搞一下，取得经验，再看一看。今年要把许多事情搞完，我不相信。报纸不要简单宣传指标，要多宣传措施，多宣传先进经验。宣传要给自己留余地，讲问题要看远一点，以后不要说什么“化”了，“四无”了，将来要变成“四有”城了怎么办？宣传多了，以后就不好动员了。世界上很多事情都有真有假，没有假也没有真，在运动中的事，打了折扣才可靠。干什么都要踏实些。说苦战三年水利化，我怀疑如果如此，将来我们子孙干什么呢？今后十年内会不会遇见几次大水灾，大旱灾？三个大灾两个小灾应考虑。问题不由你我决定，三年内只能逐步改变面貌。在若干年内只能管地，还管不了天。如果来了灾这个账怎么算？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如果发生灾，就不是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压缩空气，河南一年要实现几个化，当然现在我们不要说他们过火了，

但某些口号要调整一下，登报时要小心些。

两个战役之间需要有休整，不要老紧下去，紧张之间要有调节，不要使群众总紧张下去。调节生产节奏。做一段，休息一段，劳逸结合，要有节奏地，要波浪式前进。连续作战是由各个战役组成的，做了一个时间休息几天，悠哉悠哉，很必要。

第二，阶级斗争要注意反复。

两条道路斗争。恐怕还有几个回合。我们要有策略。要冷一冷，然后再放一放。

第一个剥削阶级为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国民党残余，三十万右派也包括进去。这是敌对阶级。尚待改造。

第二个剥削阶级，是民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加上一部分上层小资产阶级。去年这些人多数是迷失方向的。但是形势逼人，他们就不能不有所改变。

我们是团结后一个剥削阶级，孤立打倒前一个剥削阶级，即团结中间，孤立右派。

我看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形势，百分之五的细菌还是会有有的，中间派也可能变坏。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究竟如何？一定要估计反复。要估计是否还要出什么大问题，如国际上出什么问题，世界大战，大灾荒，右派可能会作乱，中间派还会出乱子的。

两个劳动阶级：工人和农民。

我们在相互关系问题上，过去处理不恰当。我们干部的作风一般说来，是同国民党有原则的区别，但有一部分差不多。有些干部的坏作风同国民党差不多，个别的甚至超过国民党。因此，工人、农民就把他们看作是国民党。工人、农民不敢说话。怕挨整，怕“穿小鞋”，怕不好过，谁敢贴大字报。

我们的整风，就是解决相互关系问题。把相互关系整一整，工厂里的党政工团和工人的关系，合作社干部与社员的关系，各级党政人员与下级的关系，干部和群众的关系，校长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一句话，是人民内部矛盾，用说服的方法，不用压服的方法去解决。这一来揭开盖子，人民舒服，精神解放，敢写大字报。

过去工人、农民的世界观未变，为“五大件”而奋斗。大鸣大放、大整大改一来，这种关系有了很大变化。工人自己批评自己为“五大件”而奋斗不对，工作态度改变了。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从来都是把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虑的。在生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发动大跃进，另一方面，又时刻提醒干部要保持冷静、留有余地。在阶级斗争领域，他一方面指出在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要冷一冷、放一放，另一方面又强调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

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毛泽东讲话：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

他说：“我们这样大的国家，老是稳、慢，就会出大问题，快一点就会好些。对‘稳妥派’的办法就是到了一定时候提出新的口号，使他们无法稳。‘冒进’是‘稳妥派’反对跃进的口号，我们要用‘跃进’代替‘冒进’，使他们不好反对。”“有些人可能是‘观潮派’、‘秋后算帐派’，如果今年得不到丰收，还会有人出来说，‘我早就有先见之明，还是我的对’。到那时又要刮台风的。党内中间偏右的人是观潮派，他们是‘楼观沧海月，门对浙江潮’。”

毛主席在听各省汇报时，作了很多插话。在吴芝圃谈到河南正处在全面大跃进时，毛主席说，这可能是冒险主义，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后来，毛主席

又说,河南的工作做得还是好的,不要说他们过火了,只是要压缩一下空气,做得切实些,一些口号在登报时要注意一下。在曾希圣谈到安徽大搞水利工程时,毛主席说,现在说苦战三年改变面貌,其实三年之后还要苦战五年,才能完成40条。提口号要注意留有余地。苦战三年只能算是初步改变面貌。对于下面报上来的成绩,不可不信又不可全信。凡事有真必有假,要打个折扣才稳当一点。对工程师、科学家,要又信又不信,要相信科学,但要破除迷信。在舒同谈到山东三年实现40条有把握时,毛主席说,今年是空前的一年,这样的大跃进在历史上未曾有过,我们没有经验。今年要看一年,明年胆子可能大一点,现在还是要小心谨慎,不要把事情说满了。在周小舟谈到湖南也处于高潮时,毛主席分析全国出现高潮的原因:一是从前(1955年到1956年上半年)有过一个高潮;二是1956年6月起反冒进,又有了“反面经验”;三是1957年三中全会恢复了40条、多快好省和促进会;四是整风、反右调动了群众的积极性,这是最重要的。毛主席还说,他现在担心是不是会再来一个反冒进。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一日,毛泽东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毛泽东谈了以下几点意见: 1, 近来报纸的宣传反映实际不够,但也有不实之处,如指标、计划讲得过头了。现在要调整一下,压缩空气。鼓劲的话要讲,但不要华而不实。江苏提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这种精神是好的,应当宣传。这次在武昌有些省提出,怕一说调整一下宣传调子就会泄气,这种顾虑要注意。目前总的方针还是鼓足干劲,气可鼓而不可泄。 2, 现在各地提出这个“化”那个“化”很多。“化”就是要变,反映群众的愿望。提出“化”的口号响亮,能动员群众。但是报纸在宣传的时候要慎重。比如说绿化,不能说种一些树就是绿化,要成活、成片、成林,像在飞机上看到湘南、粤北那样郁郁葱葱才算绿化。又如水利化,有说一年实现的,有说三年实现的,其实都不能叫做“化”,只是改变一些面貌。又如说“四无”,应当相信可以实现,但不是一两年或三五年可以实现的。一个“化”,一个“无”,不要随便宣传已经实现了。即使是讲订规划、提口号,也要留有余地,在时间和空间上说得活一点。否则,说一年或两年完成,那不是以后没有事情干了吗?要留给后代子孙一些事做。现在说苦战三年基本改变面貌,其实只是初步改变面貌,能否做到还得看一年。 3, 报纸的宣传要搞深入、踏实、细致。我们讲多快好省的方针,报纸上不能只讲多快,不讲好省。我们是要好大喜功的。大而无功,其实不是好大而是好小。不实就是无功而还。报纸对一些具体问题,要由小见大,要把许多杂乱无章的事情加以概括,从理论上把事情说清楚。报纸的评论,应带理论色彩,这就是深入事情的本质,抓住了规律。这样把纲提起来,才能使干部和群众方向明确。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重要性就在这里。 4, 现在全国出现高潮,出现许多新鲜事物,但也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记者、编辑要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能对眼前彩色缤纷的现象做出政治判断,有远见卓识。这不容易,但应努力做到。目前大跃进的形势正是锻炼的好机会。可以按照各省委提出的意见,编印一些新闻和评论供记者、编辑学习。

我们再看看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对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是怎样评论的:

对于河南和辽宁这两个看起来有点不着边际的计划,毛泽东觉得有必要泼一点冷水,好让他们不要头脑过热,也让其他各省不要头脑过热。但是毛泽东此时泼点冷水,局限性是很大的,因为首先肯定洛河南和辽宁省的计划也是可以实现的。

的，只是要求其它各省不要仿效，以免天下大乱，晚一点也就是一、两年的事，何必着急呢？

什么叫做“攻其一点，不及其余”？这就是一个典型！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广州写《介绍一个合作社》

“一个苦战二年改变了面貌的合作社”，这篇文章值得一读。共产主义精神在全国发展。人民群众的觉悟迅速提高。群众中的落后阶层奋发起来努力赶上先进阶层，这个事实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的经济革命（生产关系方面尚未完成改造的部分）、政治革命、思想革命、技术革命、文化革命正在向前面进。由此看来，我国在工农业生产方面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的那样长的时间了。除了党的领导之外，六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过去的剥削阶级完全陷落在劳动群众的汪洋大海中，他们不想变也得变。至死不变，愿意带着花岗岩头脑去见上帝的人，肯定有的，那也无关大局。一切腐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的其他不适用的部分，一天一天地土崩瓦解了。彻底扫除这些垃圾，仍然需要时间；这些东西崩溃之势已成，则是确定无疑的了。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大字报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城市、乡村、工厂、合作社、商店、机关、学校、部队、街道，总之一切有群众的地方，都可以使用。已经普遍使用起来，应当永远使用下去。清人龚自珍诗云：“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材。”大字报把“万马齐喑”的沉闷空气冲破了。我现在向全国七十几万个合作社的同志们，以及城市里的同志们推荐一个合作社。这个合作社位于河南省封丘县，叫做应举社，很有些发人深省的东西。中国劳动人民还有过去那一副奴隶相么？没有了，他们做了主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上面的劳动人民，现在真正开始统治这块地方了。

这篇文章中的一段话：“除了个别特点之外，中国六亿人口的显著特点是一穷二白。这些看起来是坏事，其实是好事。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受到许多人包括像胡绳这样的所谓“党的理论家”们的攻击，成了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思想的有力证据。很难相信，这些人真的是读不懂这段富有革命精神和辩证法思想的话，而只能说，这些人为了达到攻击毛泽东的目的而不择手段地进行恶意歪曲罢了。

三、八大二次会议正式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至五月二十三日，召开八大二次会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破除迷信，不要怕教授，也不要怕马克思。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日，毛泽东给张闻天的信：

洛甫同志：

三个报告都看了，第三个报告最好。你这个人通了，我表示热烈的欢迎和祝贺。我一直不大满你。在延安时对你曾有五个字的批评，你记得吗？进城后，我对陈云、恩来几次说过，你有严重的书生气，不大懂实际。记得好像也对你当面说过。今天看这个报告，引起了我对你的热烈欢迎。一年下去四个月，走马看花也好，你的建议完全正确。外交部同志们轮流实行。我对你的上述看法，或者

不大对，可能对你估计过高，即书生气，大少爷气，还没有完全去掉，还没有完全实际化。若果如此，也不要紧，你继续进步就是。但是你过去能写出现在的报告吗？能有这样的无产阶级感情吗？能有这样感人的气氛吗？在我看来，没有。现在有了，通了，群众化了，因此向你致贺！

毛泽东

一九五八年五月八号上午三时

（张闻天一九五八年四月中下旬给周恩来、陈毅并报毛泽东三个报告，分别是：四月十三日关于同上海市对外贸易局长齐维礼谈对外贸易工作问题的报告；四月二十五日关于建议改变保留作为点缀方针的报告；四月二十六日关于上海、杭州一些工厂和合作社情况的报告。其中最后的这个报告中说：我这次下来在上海、杭州看了一些工厂和农业合作社，最深的感觉是，中央的全民整风、反右斗争和最近双反运动的政策已经产生了十分丰硕的实果，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工业产品数量赶上英国的口号和多快好省的社会主义建设方针，已经深入人心，变成了极其伟大的物质力量。到处都可以看到人们正在干劲十足，信心百倍地劳动和工作。我们的干部也正在从根本上改进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种实验田、实行跟班劳动，大大密切了同群众的联系。总之，千年的陈规积习已经被打破，人们的精神面貌起了根本的变化，到处出现了一种蓬勃的革命朝气。我们的民族确实是大有希望的，前途无量。我这次下来虽然时间不长，只是走马观花，但是毕竟增加了不少知识，对于国内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和群众的进步有了比以前更多的了解。报告还建议应把经常接触国内实际和国内群众作为外交部干部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可惜，他的思想到五九年下半年又发生了反复。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重点是讲我们发展了辩证法，准备对付大灾难。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两点：

第一，关于跟什么人的问题，他说：

昨天有一位同志说跟着某一个人就不会错。某个人就指着我说。这句话要修正一下：又跟又不跟。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我们跟马克思、跟列宁。有些东西跟斯大林，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即使掏大粪的、扫街的，只要他有真理，我们就跟。合作化我们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工厂、农村、商店学校，军队……找先进的。那个好，真理在那。就跟。不要跟某某人。胡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

这里说得很清楚：跟什么人，主要是跟真理。什么人掌握了真理，就跟什么人。一个人有对有不对，对就跟，不对就不跟。不要糊里糊涂的跟。胡里糊涂跟某个人走很危险，要独立思考。这里说的实际上就是关于个人崇拜的问题。

第二，关于世界大战问题，他说：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但也有战争的可能性，要准备有疯子。

真正打怎么办？要打就打，把帝国主义扫光，然后再来建设，从此就不会有世界大战了。

打起来也不要大惊小怪，打起仗来无非就是死人。原子仗现在没经验不知要死多少。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二十几亿人口剩几亿，几个五年计划就发展起来。换来了一个资本主义全部灭亡，取得永久和平，这不是坏事。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针对有些人说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打原子战争，人类

就会毁灭来说的。第一, 和平的可能性大于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 也有战争的可能性, 不能睡大觉, 要准备; 第三, 帝国主义一定要打, 就打吧, 打完了再建设; 第四, 打仗要死人, 人类会不会毁灭? 不会。最好剩一半。次好剩三分之一。

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一而再地攻击毛泽东这些讲话, 说什么是鼓吹战争、消灭人类。真是无耻之尤。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八日, 毛泽东在八人二次会议代表团团长会议上的讲话国内形势是和五亿农民的关系问题。农民是同盟军, 不抓农民没有政治, 不注意五亿农民的问题, 就会犯错误; 有了这个同盟军, 就会胜利。列宁也是很强调工农民主专政。使农村半无产阶级觉悟起来, 不断革命。有人以为要几十年发展资本主义, 等待工人多了, 农民觉悟了, 才能搞社会主义。但实践证明, 从民主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不需要几十年的间歇。苏联二月革命, 证明列宁是正确的。中国则更不同, 我们有了几十年民主革命的经验, 解放后的农民, 精神振奋, 农村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中国党内相当多的人不懂得农民问题的重要性, 跌斤斗还是在农民问题上。不相信多快好省, 首先是不相信四十条。不相信农业发展可以相当快。

上面讲的是农民问题。城市人口百分之十五, 农村人口百分之八十五, 有些同志在农村混了几十年, 农民的感情没有感染他们, 不了解农民的心。不了解群众, 就看不到好东西。潘××等, 你说他们在农村没有搞过吗? 就感化他们不了。

工人一千二百万, 加上家属只有几千万, 无论如何没有农民多。富裕农民不跟我们走的有几千万, 经过大跃进后, 反对社会主义的可能有百分之五十, 其中坚决的百分之二十。

工农兵, 农民有几亿。托派从来就骂我是“农民主义”。帝国主义也说我搞农民革命。中国工人阶级不抓农民, 就坐不稳。列宁也强调农民问题, 也是“农民主义”吗? 我和欧洲同志谈: 你们怎样? 欧洲情况, 除了农业工人以外, 有自耕农(许多自己都有农业机械)对社会主义抵触大。同南美和印度同志谈, 也是谈争取农民问题。要他们去研究一个农村。弄清阶级关系, 解剖一个麻雀。落后有落后的好处。

一九五八年五月中旬, 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先念分别在八大二次会议的大会上发言。

周恩来说:

毛主席曾经反复地教导我们, 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可以有两种方法: 一种是进行得快一些, 好一些; 一种是进行得慢一些, 差一些。前一种是多快好省的方法, 也就是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依靠各级党委、放手发动群众、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社会主义。后一种是少慢差费的方法, 也就是违反党的群众路线、不注意保护干部和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不放手发动群众、主要依靠行政命令建设社会主义的这两种不同的方法, 也是两种不同的方针。犯了反“冒进”错误的人, 就是按照后一种方法建设社会主义, 这显然是同毛主席提出的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针相违背的。而且, 在过去一段时间内, 曾经减低了我国的建设速度, 损害了干部和群众的生产 and 建设的积极性。因此, 它不是个别问题上的错误, 而是在一段时间内关于社会主义建设规模和速度问题上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一点,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没有意识到, 问题的严重性就在这里。

反“冒进”的错误, 不是偶然发生的。这个错误的根源是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在多数问题上表现为经验主义, 在某些问题上表现为教条主义, 还有些问题上表现为两者的混合。思想方法上的这些错误, 结果造成了建设工作中的右倾保

守的错误。这样，就违背了毛主席一贯主张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总方针。

这里应该特别讲一件的，就是政府在指导发展国民经济的工作中，曾经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当时我和担任政府工作的某些同志却错误地认为，由于基本建设规模过大，速度太快，因而造成市场供应紧张，并且出现了许多不平衡的现象。因为害怕不平衡，就采取了机械的静止的平衡方法，企图以缩小建设规模、压缩消费的办法，只从分配方面去求平衡这种平衡的结果，不但不能起促进生产的作用，反而妨碍了生产的发展。

除了上面所说的认识上和方法上的错误以外，还应该特别指出，反“冒进”的错误，是同政府工作中的脱离党的领导倾向分不开的。

陈云说：

从工作出发 1956 年下半年到 1957 年上半年的这一段时间内，我对于我国经过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三大改造以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形势估计不足，对当时大跃进中出现的个别缺点，主要是由于新职工招收得过多和某些部门工资增加得不适当，一度造成商品供应和财政的某些紧张情况，估计得过分夸大了。我在考虑和提出问题的时候，一般的从财贸系统的情况出发，而对于中央工业、交通多数部门的情况，对于全国各地党的各方面工作，则注意不够，这种从部分情况出发来解决问题，就不会正确地理解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

因此，对于当时反“冒进”的那个方针的错误，我负有主要的责任，首先在思想影响上负有主要的责任。

薄一波说：

现在看得很清楚，1956 年的反冒进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一个带方针性的错误。对于这个错误，我也是有责任的。因为 1956 年的跃进，是有重大意义的。在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暂时的局部的困难对于提前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加速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本来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没有什么可怕的。但是，我对于这种形势没有很好的加以分析，没有抓住形势发展的主流，对于一度出现的材料紧张的困难没有采取积极的措施，动员和依靠群众，千方百计地去克服，反而强调了这种困难认为既然原材料生产赶不上去，基本建设的速度也就不能太快。在积累和消费的关系上，我看到了我国人口多，消费也多，强调提高积累比例有困难而没有首先强调人多可以生产得更多，积累便更多。因此，对于反冒进的错误我是有份的。在反冒进错误的影响下编制的 1957 年计划的第一本帐，也对当前大跃进的形势估计不足。今天看来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在于生产和建设的指标高一点或低一点，而在于反冒进大大挫伤了人民群众和广大干部的积极性，给开始出现的生产建设高潮，泼了冷水。这是必须引为教训的。

李先念说：

在工作中确实发生了不少缺点，甚至在一些时候一个问题上也发生过带方针的错误。往往考虑平衡和稳定多，考虑建设速度少，往往一怕发生赤字，二怕市场波动。建设事业前进当中是会发生某些供求失调现象的，看到这些一时的现象，我们就表现异常敏感，盲目叫喊紧张。当 1956 年建设跃进中出现了个别缺点的时候，我们只是抓住了事物的局部现象，没有抓住事物的本质，夸大缺点，低估成绩，把 1956 年的跃进说成是一种冒进。反冒进的错误给工作带来了相当大的损失，这里我是有责任的。幸而中央及时地作了纠正，否则，损失不知会有多大。

这些发言还是不错的。可惜，在一九七八年以后，有些人又反悔了。一些“笔杆子”们推波助澜，把这些人说成当时受了多么大的委曲。难道说，中央的某些

领导人都是一些反复无常的小人吗？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 (一) 再讲破除迷信。
- (二) 再讲讲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的问题。
- (三) 再讲一个外行领导内行问题。
- (四) 再讲一个插红旗，辨风向的问题。
- (五) 讲一个红白喜事。
- (六) 设立对立面。

毛泽东在这次讲话中肯定了“七年超过英国，再有八年超过美国”的说法，反映了当时一部分领导干部头脑发热的情绪。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们的大会是有成绩的，开得好，做了认真的工作，制定了我们的总路线。大会制定了多快好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总路线，还要在客观实践中证明。过去有些已经证明了。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应该说是去年九月三中全会开始反映这一方面，前年十一月二中全会反映得不够。没有能够占上风。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的口号很好，反映了人民的干劲。“干劲”用“鼓足”二字比较好，比“鼓起”好。真理有量的问题。因为干劲早鼓起了。问题是足不足。最少有六、七分，最好八、九分，十分才足。所以用“鼓足”二字比较好。干劲各有不同。

“鼓足干劲”这一句是新话，“力争上游”以前也有，不是新话。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外国人看来可能不懂，好像不通，没有主词，本来想加一句“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当主词，现在想不要也行。六亿人民就是主词。

这次会议正式通过了中共中央根据毛泽东的倡议而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大中企业和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社会主义国家。

这次会议还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正式改变了八大一次会议关于国内主要矛盾已经转变的分析，认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

这次会议肯定了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剥削阶级和两个劳动阶级的论断。

这次会议肯定了当时已经出现的大跃进，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认真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争取十五年，或者在更短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者超过英国。

这次会议还提出了新的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

会后，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潮。

一九五八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一封信中指出：发明“跃进”这个词的人，“其功不在禹下，如果要颁发博士头衔的话，我建议第一号博士赠与发明这个伟大口号的那一位（或者几位）科学家”。“自从‘跃进’这个口号提出以后，

反冒进论者闭口无言了，‘冒进’可反（冒进即左倾机会主义的代名词），当然可以振振有词。跃进呢？那就不同，不好反了。要反那就立刻把自己抛到一个很不光彩的地位上去了。”

（一九五七年六月，周恩来在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了“跃进”一词，肯定一九五六年的经济发展是“跃进”。）

四、农村合作化中出现了新的组织形式——人民公社

毛泽东在指导农业合作化的过程中，就注意到了合作化以后，合作社的生产发展、经营方向、组织结构等问题，他指出：

“有些地方合作化以后，一时感到劳动力过剩，那是因为还没有扩大生产规模，还没有进行多种经营，耕作也还没有精致化的缘故。对于很多地方说来，生产的规模大了，经营的部门多了，劳动的范围向自然界的广度和深度扩张了，工作做得精致了，劳动力就会感到不足。”

“农村副业，就全国说来，一个很大的部分是为农村服务的，但是必须有一个不小的部分为城市服务和为出口服务，将来这部分可能扩大起来。”

“有些地方可以一乡为一个社，少数地方可以几乡为一个社，当然有很多地方一乡有几个社的。不但平原地区可以办大社，山区也可以办大社。安徽佛子岭水库所在的一个乡，全是山地，纵横几十里，就办成了一个大规模的农林牧综合经营的合作社。当然，这种合并要有步骤，要有适当的干部，要得到群众的同意。”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三月八日至二十六日在成都市召开的工作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

《意见》指出：为适应我国农业水利化、机械化和文化革命的需要，在有条件的地方，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有计划地适当地合并为大型的合作社是必要的。小社合并为大社，必须具备以下条件：在发展生产上有需要；绝大多数社员确实赞成；地理条件适合大社的经营；合作社的干部有能力办好大社。合并后的乡、社规模，以每一乡领导几个农业合作社为宜。如果乡的区划较小，可以适当地合并成新乡。

《意见》下达后，全国开始进行小社并大社工作。四月间，河南省遂平县查岈山卫星社，由 27 个小社合并成有 9369 户的一个大社。

从一九五七年冬或一九五八年春以后，全国不少地区的手工业合作社转变为合作工厂或者直接过渡为地方国营。截至一九五八年六月底的不完全统计，转为合作工厂的已有 9300 多个，职工 61.7 万多人，直接转为地方国营工厂的有 3,100 多个，职工 18 万多人。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倡导农村人民公社，其实质在于农村的集体所有制要按照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方向发展。按照这样的模式来经营，当然就不能称之为“农业生产合作社；当然规模就不能太小，有些事必须发挥联合起来的作用。四十多年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倡导的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这一方向、经营模式是正确的。目前，我国农村的一些先进地区，如河南省的南街村、北京市的窦殿村、河北省的刘庄、江苏省的华西村，以及一大批各地建立的农工商联合总公司，都是按照这一方向发展的。

人民公社化初期，人民公社实行的是一乡一社，内部分有三级（或四级）：公社、管理区（大队）、生产队（有的下面还有生产小队）。原来的高级社有的地方划为生产大队，大部分地区划为生产队。当时确定，生产大队（或生产队）

是管理生产的单位，盈亏由公社统一负责；各农业社并入公社后，要将一切公有财产交给公社，多者不退，少者不补。这样就在一个乡的范围内，把占有生产资料不同的集体所有制单位，一下子“拉平”了。此外，据十三个省统计，还有 94 个县，一县建成一个大公社或已经成立了全县人民公社联社。

这里有两不同的问题必须首先分清：一个是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的基本思想、基本原则问题，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一个是在进行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过程中产生的缺点和错误问题。

辛子陵的《毛泽东全卷》说：

“毛泽东对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准备是不够的……在经济领域，毛泽东只有皮毛的知识”。

“毛泽东在创立公社体制的时候，成天沉湎于《三国志》，没有去翻一翻《资本论》，他才有勇气把自己创立的公社制度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推到世界前台，贻笑天下而不自知；如果他知道马克思分析过印度公社是如何被历史淘汰、瓦解、消亡的，他也许会慎重一些，不急于下‘人民公社好’的‘圣旨’，向全国推而广之了。”

“他犯的是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如果实事求是地评估毛泽东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必须下台，以谢全党、以谢国人。”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

“以全国党代会形式通过的总路线，标志着中央已经彻底否定了两年前八大会议制定的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发展的经济方针，‘左’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已经最终确立了。”“这条总路线，基本方面是不正确的。”

“大办农村人民公社的过程，实际就是大刮‘共产风’的过程。后来，不断地反‘共产风’，‘共产风’的风源何在？就在人民公社化本身。”“人民公社的‘公’，实质上就是一个‘平’字，即绝对平均主义。它是党的领导人在新形势下对战争年代的军事共产主义的套用，反映了小农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很明显，这些观点就是要全盘否定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认为毛泽东提出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本身就错了，犯了路线性、全局性的错误，必须下台。

1，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大二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对这条总路线的解释……就这些来看，本来是正确的。这条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尽快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的普遍愿望。然而它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性，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

八大二次会议关于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的规定和解释，在什么地方忽视了客观的经济发展规律？在什么地方否定了国民经济计划的综合平衡？在什么地方夸大了主观意志和主观努力的作用？原文没有指出来，看来它也指不出来。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大二次会议提出一条以发展生产力为主要目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无疑同实现工作重点转移的要求是相适应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一系列基本点，大都发端于毛主席的《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报告，是党中央和毛主席探索适合于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积极成果。”“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是不是主要表现在以下这些方面：1.不重视综合平衡。”“2.……忽视物质利益的原则。”“3.……

只突出了多快而未能把把同好省有机地统一和结合起来”。

这里，薄一波实际上就承认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本身是正确的，只是“在制定特别是在具体贯彻执行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过程中，发生的忽视客观经济发展规律的缺点和失误”。这是两个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

《毛泽东传》也采用了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逐步实现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在重工业优先发展的条件下，工业和农业同时并举；在集中领导、全面规划、分工协作的条件下，中央工业和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型企业和中小型企业同时并举；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内容，可以看作是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

另一种说：“一九五八年，党的八大二次会议通过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及其基本点，其正确的一面是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其缺点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这两种说法似乎是互相矛盾的。既然是“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所取得的成果”，怎么又会是“忽视了客观的经济规律”呢？难道说总路线的这些内容中不包含对客观经济规律的重视和认识成果吗？作者不可能不知道这种矛盾，但为了“保持一致”也只好让它互相矛盾吧。

2, 关于大跃进,

《毛泽东传》在论述中曾经谈到，“跃进”一词，在五十年代，最初是在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来的，不久，就提出了“全面大跃进”。

薄一波在《回顾》中说：“毛主席所以发动‘大跃进’就是要以尽快的时间，使国家富裕起来，强大起来，摆脱目前这种被动的、在世界上无权的状况。围绕这个目的，1956年开始了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1958年发动‘大跃进’就是这个探索的继续。这个愿望是正当的，无可厚非的。‘大跃进’的号召，一经发出，全国上下，奋起响应，迅速成为规模宏大的群众运动，这也说明毛主席、党中央当时提出的为改变国家贫穷落后面貌而加快经济发展的战略，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同要求和愿望。”

“大跃进”难道说仅仅是一种良好的“愿望”、良好的“出发点”吗？社会的发展，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能不能够实现“跃进”、“大跃进”？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总结世界各国发展的历史经验指出：“在十七世纪，欧洲的一些国家已经在发展资本主义了，经过三百多年，资本主义的生产力有了现在这个样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比较，有许多优越性，我们国家的经济的发展，会比资本主义国家快得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对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修改中还指出：

“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跟在别人后面一步一步的爬行。我们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强国。我们所说的大跃进，就是这个意思。难道这是做不到的吗？”“为什么西方资产阶级能够做到的事，东方无产阶级就不能够做到呢？中国大革命家，我们的先辈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期就说过，中国将要出现一个

大跃进。他的这个预见，必将在几十年的时间内实现。这是一种必然趋势，是任何反动势力所阻挡不了的。”

无论从哲学上来说，还是从政治上来说，毛泽东提出的“多快好省”和“大跃进”这样的战略方针都是不错的。不能因为在大跃进方针指导下进行的第一个战役出了一些问题，就否定这个方针本身。正如，一九二七年中共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提出了“武装暴动”的指导方针，其后，在这个方针指导下进行的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均告失败。不能因此就认为当时提出的“武装暴动”的方针错了。

3，关于人民公社

胡绳的《七十年》说：“7、8月间，《红旗》杂志、《人民日报》公开宣传毛泽东关于把工、农、商、学、兵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的思想。”

这个思想本身究竟对还是错？它没有讲。

薄一波的《回顾》虽然也说了人民公社的思想形成的过程，但它仍然把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思想与人民公社化运动搅在一起，没有区分开来。

《毛泽东传》对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作了大致的勾勒：

“那时我国的乡村中将是许多共产主义的公社，每个公社有自己的农业、工业，有大学、中学、小学，有医院，有科学研究机关，有商店和服务行业，有交通事业，有托儿所和公共食堂，有俱乐部，也有维持治安的民警等等。若干乡村公社围绕着城市，又成为更大的共产主义公社。前人的‘乌托邦’想法，将被实现，并将被超过。”

“我们的方向，应该逐步地有次序地把‘工(工业)、农(农业)、商(交换)、学(文化教育)、兵(民兵，即全民武装)’组成为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为我国社会的基本单位。”

看来人民公社是个好名字，包括工农兵学商，管理生产，管理生活，管理政权。

“人民公社”前面加上个地名，或者加上群众喜欢的名字。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和政府合一了，它的好处是，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人民公社，我的意见是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要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取消自留地，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个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实际上，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中，就已经包含有若干全民所有制的成分了。这种全民所有制，将在不断发展中继续增长，逐步地代替集体所有制。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

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这样的构想究竟是对还是错？原文没有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毛泽东关于建立人民公社的构想也是从实践中来的，并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随着各地工业的发展，一九五八年四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发展地方工业问题的意见》中第一次正式提出农业生产合作社办工业的问题。一九五七年，农业合作社在发展中出现了并大社的趋向，一九五八年四月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批准成都会议通过的《关于把小型的农业合作社适当地合并为大社的意见》。随后，以大搞农田水利建设为中心的农业生产高潮的掀起，地方工业的兴办，带来了农村劳动力的紧张。一些地方为着尽可能地腾出劳动力用到工农业生产上去，举办了简易的公共食堂和托儿所。有的地方还办起了“农业大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以及中央的其他领导人开始酝酿新的农村基层组织的问题。

人民公社的所谓包括工农兵学商、一曰大二曰公、政社是合一的等等特点，都是建立在初步从经济上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差别以后，高度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它与前人提出的“乌托邦”的空想，有着本质的区别。

实行人民公社化的初期，曾经出现过一些错误，但经过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的整顿之后，人民公社就逐步完善，走上了正轨。从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在近二十年过程中，虽然经历了一些人所谓的“大动乱”、“大灾难”年代，农村人民公社依然屹立，各项事业逐步发展，生产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成为我国社会稳定的基础。

时间过去快半个世纪了，在实践的过程中，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在全国，现在仍有几千个建立在集体所有制基础上的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冲破重重阻力，保存下来了，并得到了新的发展。今天的河南“南街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样板。类似这样的“样板”在全国还不少。

实践终究可以证明：毛泽东关于人民公社的基本构想，可以说它还不完善、不具体，但总的方向是正确的。

2011

第三节 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缺点错误

壹、本节概述

一、大跃进和浮夸风

一九五八年二月三日，国家经委提出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625.8 万吨。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五日，国家经委汇总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711 万吨。

一九五八年五月三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800 万吨到 85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七日，冶金部规划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82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中央财经小组讨论估计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可达到 90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同全国妇联党组织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中宣部印了一本有关空想社会主义的资料，其中有一段是康有为《大同书》写的。康有为 27 岁（一说 25 岁）写《大同书》，要破除九界，即国家界限、男女界限、家庭、私有财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想法，在那时没有实现的条件，现在马克思主义者抓住了阶级斗争，已经消灭阶级或正在消灭阶级的过程中，这样，把空想社会主义者不能实现的空想实现了。

他提倡家务劳动社会化、解放妇女劳动力、办食堂、托儿所、洗衣房等服务性事业。他说：‘可以搞很多事业，象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说，小孩子多大年龄就到什么地方去，到处有花园，老人有养老院，还有戏院、小学、图书馆、电影院……搞得好可以达到这种境地。我们到共产主义不要多远，十五年可以赶上美国，再有四十年、五十年中国可以进入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李富春向中央政治局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第二个五年计划的的任务就是：提前完成全国农业发展纲要；建成基本上完整的工业体系，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

毛泽东阅后批示：“很好一个文件，值得认真一读，可以大开眼界。”“没有现代工业，哪有现代国防？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

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李先念提出财政第二个五年计划要点：收入 4000 亿，支出 4340 亿，其中基建投资 3050 亿。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薄一波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

毛泽东批示：“超过英国，不是十五年，也不七年，只需要两到三年，两年是可能的。这里主要是钢，只要一九五九年达到 2500 万吨，我们就在钢的产量上超过英国了。”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七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未参加）上薄一波预计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900 万吨。一种意见同意，另一种意见认为还可以更高一点。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及其他领导人谈话，毛泽东赞成提高钢指标，经研究 1958 年钢产量指标改为 1000 万吨。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召集中央一些同志开会，内部决定 1958 年钢产量指标为 1100 万吨，后来公开宣布为 1070 万吨。

“1070”尽管决定下来了，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这些具体管事的干部提供的根据并不放心，这个指标是否能这样定，他的头脑中仍然是犹豫不决。

薄一波说：“当时，我对”一〇七〇“的任务，已经有些信心不足了……我风格不高，也就不便说出自己的怀疑。”

一九五八年六月中旬，农业部提出《农业大有希望》的报告：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 8500 亿斤，按七亿人口计，每人 1200 斤。

毛泽东批示：“粮食、钢铁、机械是三件最重要的事。有了这三件，别的也就有了。三件中，粮食及其他产品又是第一件重要的事，我们应十分注意农业。”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九日，华东地区农业会议提出：今明两年办把粮食产量提高到每人平均 1000——1500 斤（1958 年，全国每人平均 406 斤）。

随后，西北地区提出一九六二年粮食产量平均每人要突破 3000 斤。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力争高速度》。

文章说：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速度问题是建设路线问题，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根本方针，快是多快好省的中心环节。

一九五八年六月二十三日，冶金部党组关于产钢计划的报告提出：1959年钢的产量可以超过3000吨，而1962年的生产水平则将可能争取达到八、九千万吨以上。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北省安国县南娄底乡卓头村农业社创小麦亩产5103斤的全国最高纪录。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刘少奇在同《北京日报》编辑谈话时说：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组织，现在开始实验。恐怕不能象现在这样，种地的净种地，做工的净做工，现在就要搞工农商学兵。不能搞单打一，现在农业合作社已经开始办工厂、商店、银行、服务事业、洗衣房、食堂、学校，都归它。以后就在工厂、农村、学校发枪操练，工农商学兵都有了。我看，三、四十年之后，可以到共产主义社会，你们看，要不要这么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刘少奇在北京石景山发电厂同工人谈话时说：工厂要办食堂、托儿所、洗衣店，办学校、办农场，发点枪给大家操练。总之，工农商学兵全都自己干。又说：这样下去，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大有希望，不要几年就好了。现在苦干几年很有必要，不然过不了关，苦干几年就不那么落后了。现在赶上英国不是十几年，二年三年就行了。明年后年要超过英国，这不是假的。十五年超过美国的问题，其实也用不了十五年，七、八年就行了。大家干劲这么大嘛！不计上下班，干完就算数，有这么股劲，我看七、八年就行。又说：一是党的领导，一是大家努力，好好干，大有希望。中国进入共产主义不要好久，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到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刘少奇在天津讲话中提出：在并社时，“一乡一社”、“政社合一”。他说：一个乡一个社，将来是否叫社，农庄也包括不了，因为有工业、有学校、有商业、又有民兵，生孩子也有人管，实际上是共产主义的基层结构，这是组织起来的公社，有工业、有农业、有学校，生老病死都在这里，这是共产主义公社。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山东省寿张县视察。

报导说：‘少奇同志还非常关心共产主义生活方式萌芽的出现。他说，现在

有的地方组织了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等等，使家务劳动社会化。’

报导说：少奇同志在参观了台前社亩产将达 3 万至 5 万斤的玉米，3 万至 5 万斤的谷子，30 万斤地瓜和宏伟社亩产 15000 斤籽棉的丰产后，赞扬他们说：“你们压倒了科学家，他们没敢想的，你们做到了，这是个革命。”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目前生产大跃进宣传报道中注意事项的通知》。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毛泽东视察徐水时的谈话：

其实粮食多了还是好！多了，国家不要，农业社员自己多吃嘛！一天吃五顿也行嘛！

你们这粮食吃不完，怎么办呀！粮食多了，以后就少种一些，一天做半天活儿，另外半天搞文化、学科学、闹文化娱乐、办大学、中学，你们看好么？

世界上的事情是不办就不办，一办就办得很多！过去几千年都是亩产一二百斤，你看，如今一下子就是几千上万！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刘少奇派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陈正人，带着康有为的《大同书》，到河北省徐水县搞共产主义公社试点，陈正人传达了刘少奇关于搞试点的指示，还把康有为的《大同书》送给一些人。

徐水县委第一书记张国忠立即宣布“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成立公社，树木归集体，房屋也由公社统一分配，社员实行工资制，社员和干部大搞实验田，计划一亩山药产 120 万斤，一棵白菜 500 斤，小麦亩产 12 万斤，皮棉亩产 5000 千斤。有文章说：这些将要发射的卫星庄稼，是在迈向共产主义的人民公社殿堂上空飘扬的鲜明耀眼的红旗，也只有人民公社才能竖起这样的红旗。试想想，一个二分地沼气山药堆就得花去成百个人工，成本更是不可计算，这除了几万人的人民公社，那一个普通农业社能够办得到！

一九五八年八月，刘少奇派人到山东寿张县进一步了解那里的高额丰产情况，写回的调查报告说：“今年寿张县的粮食单位产量，县委的口号是‘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但实际在搞亩产万斤粮的高额丰产运动，一亩地要产 5 万斤、10 万斤，以至几十万斤红薯，一亩地要产一、两万斤玉米、谷子，这样高产的指标，当地干部和群众，讲起来象很平常，一点也不神秘。一般的社也是 8 千斤、7 千斤，提 5 千斤指标的已经很少，至于亩产一、两千斤的根本没有人提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九日，毛泽东视察山东省历城县北园乡听说准备办大农场时说：还是人民公社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至十三日，毛泽东视察天津市

毛泽东说：地方应该想办法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首先是协作区，然后是许多省，只要有条件，都应该建立比较独立的但是情况不同的工业体系。

13日，毛泽东在天津大学说：高等学校应抓住三个东西：一是党委领导；二是群众路线；三是把生产劳动结合起来。以后要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学生要勤工俭学教师也要搞。老师也要参加劳动，不能光动嘴不动手。

召开北戴河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举行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一）》提出会议要讨论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明年，五年经济计划问题

第二个问题：今年铁、钢、铜、钼问题

第三个问题：明年农业问题

第四个问题：明年水利问题

第五个问题：农业合作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今年商业收购和分配问题

第七个问题：是教育问题

第八个问题：是干部参加劳动问题

第九个问题：是劳动制度问题

第十个问题：是××万人去边疆问题

第十一个问题：是技术保密问题

第十二个问题：是国际形势问题

第十三个问题：是今冬明春农村共产主义教育问题

第十四个问题：是协作问题

第十五个问题：是深耕问题

第十六个问题：是肥料问题

第十七个问题：是民兵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九日，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二）》

第一书记要亲自抓工业。

要破除资产阶级的法权思想。

国内形势要讲全国是一个大公社，不能没有重点，不能没有统一计划。

人民公社问题，名称怎么叫法？可以叫人民公社，也可以不叫，我的意见叫人民公社，这仍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不过分强调共产主义。人民公社一曰大，二曰公。人多、地大、生产规模大，各种事业大；政社是合一的，搞公共食堂，自留地取消，鸡、鸭、屋前屋后的小树还是自己的，这些到将来也不存在了。粮食多了，可以搞供给制，还是按劳付酬，工资按各尽所能发给各人，不交给家长，青年、妇女都高兴。这对个性解放有很大好处。搞人民公社，我看又是农村走在前头，城市还未搞，工人的级别待遇比较复杂。不论城乡，应当是社会主义制度加共产主义思想。苏联片面强调物质刺激，搞重赏重罚。我们现在搞社会主义也有共产主义的萌芽。学校、工厂、街道都可以搞人民公社。不要几年功夫。就把大家组成大公社。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三）》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对生产关系包括所有制、相互关系，分配三个部分相互关系，他们接触到了，但没有展开，我看经济学上没有讲清这一条。苏联在十月革命以后也没有解决。人们在劳动中的相互关系，是生产关系中的主要部分。搞生产关系，不搞相互关系是不可能的。所有制改变以后，人们的平等关系，不会自然出现的。中国如果不解决人与人的关系，要大跃进是不可能的。

在所有制解决以后，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还存在，如等级制度，领导与群众的关系。

马克思关于平等、民主、说服和人们相互关系、打成一片的思想，没有发挥。人们在劳动中的关系，是平等的关系，是打成一片的关系。劳心与劳力是分离的，教育与生产是分离的。列宁曾说，要打破常备军，实行人民武装。有帝国主义存在，常备军是要的，但苏联军队中的等级制度，官兵关系，受了沙皇时代的若干

影响。苏联共产党员多数是干部子弟，普通工人农民提不起来。所以需要找寻我们自己的道路。我们是一定要把干部子弟赶到群众中去，不能有近水楼台。我们的军官，像云南的一个师长，一年当一个月兵，我看这是好办法。是否到处推广，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是永远打不败的军队。

进城后，有人说我们有“农村作风”、“游击作风”这是资产阶级思想侵蚀我们，把我们的一些好的东西抛掉了，农村作风吃不开了，城市要求正规化，衙门大了，离人民远了。要打成一片，要说服，不要压服，多年如此，这些怎么都成了问题呢？原因在于脱离群众，在于特殊化。我们从来就讲：上下一致，官兵一致，拥政爱民，拥军优属。供给制比较平等，衣服差不多。但进城以后变了，经过整风，群众说，八路军又回来了。可见曾经离开过。

搞供给制，过共产主义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作风与资产阶级作风的对立。我看还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好。二十二年的战争都打胜了，为什么建设共产主义不行呢？为什么要搞工资制？这是向资产阶级让步，是借农村作风和游击习气来贬低我们，结果发展了个人主义。讲说服不要压服就忘掉了。是不是由于干部带头恢复供给制。

我们已相当地破坏了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度，但还不彻底，要继续搞，不要马上提倡废除工资制度，但是将来要取消。要强调农村作风、游击习气，一年参加一个月的劳动，分批下乡参加。这一回要恢复军事传统——红军、八路军、解放军的传统，恢复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要把资产阶级思想作风那一套化掉，我们“粗野”一点，是真诚的，是最文明的；资产阶级好像文明一点，实际是虚伪的，不文明的。恢复供给制好像“倒退”。“倒退”就是进步，因为我们进城后退了。现在要恢复进步，我们带头把六亿人民带成共产主义作风。

人民公社，有共产主义萌芽。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四）》

政治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有些问题要重新写。

我们解决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问题。先搞农业，同时搞重工业。赫鲁晓夫与莫洛托夫之争，就是说重工业多了，我们一反苏联之所为，先搞农业，促进工业发展，先搞绿叶，后搞红花。先搞绿叶后搞红花有什么不好？看来有些问题，

需要重新解释。

经济学和历史唯物论要有新的补充和发展。生产关系中的三个方面，所有制、劳动者的相互关系和分配问题，都未展开。

全民所有制不只是中央的，而是全民的。过去所有制是表现为×××、赵尔陆所有，这就是苏联的办法。现在百分之二十中央管，百分之八十地方管，省也要向下分权，直到企业也要有一定的权限和独立性。这里有一个问题大家要想一想，我看跟民族独立有同样的道理，这联系到人民的问题。

分配问题。苏联干部职工工资等级太多，和工农收入相差太悬殊，农民义务交售制，负担百分之四十，限制农业四十年不发展，我们只拿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八（间接负担除外），我们藏富于民，“粮食足，军食孰能不足”。

我们是在干部中搞共产主义，不包括老百姓，但老百姓也受影响，恩格斯说，许多东西都是从军队搞起来的，确实如此。我们从城市到农村。和半无产阶级结合，组织党和军队，我们吃大锅饭，没有礼拜，没有薪水，是共产主义性质的供给制。一到城里来，自惭形秽，过去一套吃不开了，要穿呢子衣服，刮胡子，干部知识分子化，薪水制否定了供给制，衣分三色，食分五等，群众路线在城乡也不充分了。解放后到五二年还好，五三年到五六年主要反映中国资产阶级思想，第二是照搬苏联。过去我们不得不请资产阶级当参谋，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观点不自觉。几亿农民，七百万生产工人，二千多万干部和教员，资产阶级的海洋把我们淹到胸口，有的人被淹死了。

历史唯物论关于上层建筑的问题，是政权问题，已经解决了。人民公社是政、社合一，那里将会逐渐没有政权，人民公社是几个人中加一个坏人，这就专了政，六亿人口中只有一百五十万劳改犯不算多。我们各种规章制度，大多数，百分之九十是司局搞的，我们基本不靠那些，主要靠决议，开会，一年搞四次，不靠民法刑法来维持秩序。人民代表大会，国务院开会有他们那一套，我们还是靠我们那一套。这是讲上层建筑部分。

意识形态、宇宙观、方法论、报纸、文化教育的作用大得很。资产阶级的自由破坏得越多，无产阶级的自由就越多。苏联对资产阶级的自由没有彻底破坏，因而没有充分建立起无产阶级的自由。我们政治思想上的革命搞得比较彻底，干部参加生产，和群众打成一片，彻底改革规章制度，就是对资产阶级自由的彻底

破坏，工人的干劲冲天。政治经济学谈到这些问题几句话就过去了。

意识形态的重要性。意识形态是客观实际的反映，关心基础，为基础服务。改革规章制度。开会就是搞意识形态，北戴河会议就是搞意识形态。去年三中全会，今年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表大会，提出了破除迷信的口号，起了很大作用。因此才有大跃进。不正确地反映客观规律危害很大，八股文章、孔夫子的思想传了几千年，达赖喇嘛的屎和土都有人吃，蠢得不得了。

人民公社当决议草案发下去，每一县搞一二个试点，不一定一下铺开，也不一定都搞团、营、连、排、班。要有领导有计划地去进行规划，现在不搞不行了，不搞要犯错误。自留地要增加，耕畜要私养为主，大社要变小社等几件事，是向富裕中农让步。经过这个过程是可以的，不算严重的原则性错误，在当时条件下，还有某些积极意义，现在又否定了。个别的猪，私人可以喂。社以大为好，人民公社的特点是一曰大二曰公，主要是许多社合为一个大公社。《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中几个按语，都说办大社好，山区也可以搞大社，多种经营综合发展，开始办小一些也有好处。工资制度青年、妇女都高兴。增加自留地那一套道理都是农村工作部出来的。一九五五年我就提倡办大社。全国搞一万五千到两万五千个社，每社五千到六千户，二、三万人一社，相当大了，便于搞工、农、兵、学、商与农、林、牧、副、渔。这一套我看将来有些大城市要分散，二、三万的居民点，什么都会有，乡村就是小城市，哲学家、科学家多半要出在那里。每个大社都将公路修通，修一条宽一点的洋灰路或柏油路，不种树，可以落飞机，就是飞机场。将来每个省都搞一、二百架飞机，每个乡平均两架，大省自己搞飞机工厂。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九日，扩大会议作出《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人民公社是形势发展的必然趋势。

在目前形势下，建立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工农商学兵互相结合的人民公社，是指导农民加速社会主义建设，提前建成社会主义并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所必须采取的基本方针。

社的组织规模，就目前说，一般以一乡一社、两千户左右较为合适。在步骤上，并大社，转公社，一气呵成当然更好，不能够一气呵成的，也可以分两步走，不要勉强、性急。在并社初期可以采取“上动下不动”的方法，首先由

原来各小社联合选出大社的管理委员会，搭起架子，统一规划部署工作，把原来的各小社改为耕作区或者生产队，原来的一套生产组织和管理制度暂时不变，照常经营，一切应该合并调整的东西和合并中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以后再逐步合并、逐步清理、逐步解决，以保证生产不受影响。

由于各个农业社的基础不同，若干社合并成一个大社，他们的公共财产，社内和社外的债务等等，不会是完全相同的，在并社过程中，应该以共产主义的精神去教育干部和群众，承认这种差别，不要采取算细账、用找平补齐的办法，不要去斤斤计较小事。人民公社建立时，对于自留地、零星果树、股份基金等等问题，不必急于处理。

大社统一定名为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不要忙于改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在目前还是以采用集体所有制为好，这可以避免在改变所有制的过程中发生不必要的麻烦。由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过渡，是一个过程，有些地方可能较快，三、四年内就可完成，有些地方，可能较慢，需要五、六年或者更长一些的时间。

过渡到了全民所有制，如国营工业那样，它的性质还是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取酬。然后再经过多少年，社会产品极大地丰富了，全体人民的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和道德品质都极大地提高了，全民教育普及并且提高了，社会主义时期还不得不保存的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差别，都逐步地消失了，反映这些差别的不平等的资产阶级法权的残余，也逐步地消失了，国家职能只是为了对付外部敌人的侵略，对内已经不起作用了，在这种时候，我国社会就将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时代。

人民公社建成以后，也不必忙于改变原有的分配制度，以免对生产发生不利的影 响。要从具体条件出发，在条件成熟的地方，可以改行工资制。

现阶段我们的任务是建设社会主义。建立人民公社首先是为了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速度，而建设社会主义是为了过渡到共产主义积极地作好准备。看来，共产主义在我国的实现，已经不是什么遥远将来的事情了，我们应该积极地运用人民公社的形式，摸索出一条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具体途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上午，毛泽东《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讲话（五）》
从八月二十一日起，还有十九个星期。一百三十三天，一天不多，一天不少，

现在又过去十天，相当危险，要紧急动员，能否完成，我有怀疑。我是“观潮派”，明年一月一日能不能搞到，我总是十五个吊桶，七上八下，如果没有搞到，一是题目出错了，二是工作没有抓紧，是我的错误。冶金部汇报讲九百万吨，我说：干脆一点吧！翻一番，何必拖拖拉拉呢？搞一千一百万吨，问了许多人。都说可以，有希望。今年一千一百吨钢，到底扎实不扎实。我是怀疑的，拿到手才算数。“钢铁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共产主义的第一个条件，是产品丰富，第二个条件是要有共产主义精神。一有命令，每个人都自觉地去工作，没有懒汉。共产主义不分高低，我们有二十二年的军事共产主义生活，不发薪水，与苏联不同，苏联叫余粮征集制，我们没有搞，我们叫供给制，军民一致，

官兵一致，三大民主。我们原来分伙食尾子，津贴，进城以后，熬了三年，到五二年搞了薪水制，说资产阶级的等级、法权那样神气，把过去的供给制说成是落后的办法，游击习气，影响积极性。其实是把供给制变成资产阶级的法权制，发展资本主义思想。难道二万五千里长征，土改革命，解放战争是靠发薪水发过来的吗？抗战时期，二三百万人，解放战争时期，四、五百万人，是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没有星期天，在一元化领导之下，没有什么“花”，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拥政爱民，把日本鬼子打走了，打败了蒋介石。打美国的时候也没有“花”，现在有“花”，发薪水都要有等级，分将、校、尉，可是有的还没有打过仗。结果是脱离群众，兵不爱官，民不爱干。因为这一点和国民党差不多，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办公桌、椅子也分等，工人、农民不喜欢我们，说“你们是官——党官、政官、军官、商官”，其官之多，怎么不出主义？官气多，政治少，所以出官僚主义。整风以来，就是整官气，政治挂帅。争等级、争待遇就不多了。我看要打掉这个东西，薪水制可以不要马上废除，因为有教授，但一、二年要作准备。人民公社搞起来，就逼着我们逐步废除薪水制。进城后受资本主义影响，我们搞运动，本来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是民主作风，他们说我们是“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跟资产阶级、土豪劣绅搞在一起，正襟危坐，学资产阶级的样子，剃头，刮胡子，一天刮三次，都是从这里学来的。解放初，五零年、五一年扭秧歌时期，我们压倒资产阶级，后来秧歌吃不开了，梅兰芳出来了（宇宙锋）压倒了秧歌。本来是与马克思主义的那一些，吃不开了，现在又恢复了“农村作风”，

“游击习气”，是马克思主义作风，讲平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没有星期天，老百姓说：“老八路又回来了。”

我请陈伯达同志自己编了一本书，《马、恩、列、斯论军事》，我读了一二篇，有一篇说，许多东西从古就是从军队首先执行的。我们共产主义也是从军队首先实行的。中国的党是很特别的党，打了几十年仗，都是实行共产主义的。八年抗战，四年自卫战争，群众看到我们的生活很艰苦，群众支援前线，没有工资，粮食自带，打仗要死人，还能那样作。有人说，平均主义出懒汉，过去二十二年，出了多少懒汉，我没有看见几个，这是什么原因？主要是政治挂帅，阶级斗争，有共同的目的，为多数人而辛苦。现在，对外有与帝国主义作斗争，对内主要是向自然作斗争，目标也明确。我们现在搞生产建设，全国一千多万干部，是为谁服务呢？是为了人民的幸福，不是为了少数人的幸福。现在发明一个东西，要给一百块钱，倒是会出懒汉，争吵，不积极。过去创造发明多的很，哪里是钱买来的呢？计件工资不是个好制度。我不相信，实行供给制，人就懒了，创造发明就少了，积极性就低了。因为几十年的经验，证明不是这样的。

似乎一讲军事就没有民主，恰好民主出在军队，即军事、政治、经济三大民主，战斗中可以互助，官长压迫士兵在我们军队中是犯纪律的，不名誉的。公社“三化”很好。这几年来，学了那一套，一从资产阶级——本国生长的，二从无产阶级——苏联老大哥，好在时间不长，根未扎深，命还好革。整风以来，各种规章制度革得差不多了。资产阶级那一套，去掉了不少。这回军委开会取消“花”。干部参加劳动，写了一个决议，中央委员每年一个月，其他干部还多，年老有病的除外。种试验田，何止一个月呢？云南有一个师长，到连队当了一个月的兵，我看所有的“长”——军长师长等，都至少当一个月兵，头一年最好搞两个月，要服从班长、排长指挥。有些是当过兵的。现在有多年不当兵了，再去当一下。文职干部，每年至少参加一个月的劳动，修十三陵水库时，许多部长都参加劳动了。一年学农、二年学工，轮着学，总得学会两套本领。人民公社军事化，并不是资产阶级军事化，有纪律，有民主，相互关系是同志关系，是说服不是压服。劳动要有严格的纪律。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十日下午，薄一波带着一大帮人到毛泽东那里，一个一个当面向他担保。

毛泽东挨个向与会者核实：1070 行不行？

首先问上海市副市长马天水行不行，马天水说可以。

问鞍山市委书记赵敏行不行，赵敏也说可以。

问武汉市委书记，也可行。

问太原市委书记行不行，他说可以。

又问主要钢铁基地重庆、北京、天津、唐山、马鞍山的工业书记大家都说行。

问到冶金部副部长刘彬，毛泽东说：“就看你拿主意啦。”刘彬说：“可以，我们都做了计算了。”

问到冶金部办公厅主任袁宝华，毛泽东说：“你是经常接触基层的，你说究竟有没有把握？”袁宝华说：“冶金工业的生产，从矿山、冶炼、轧制到机修、运输等等有 10 个环节，我们树了十面红旗，只要十面红旗能站得住，他们的经验能够推广，我看有希望。”

然后问到冶金部长五鹤寿，他说：“主席只要下了决心，我们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实现这个目标。我们认为，实现这个目标是可以的。”

最后问到薄一波，他说：“主席，我建议把 1070 吨登报，登报以后，大家都看得到了，义无反顾，就会努力奋斗。”

毛泽东还是不放心，因为只剩下四个月了，时间太紧迫，他念了一句古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他还说：“我是观潮派、算帐派。”“我总是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但是他还是同意了薄一波的意见：“这是个好主意。根据你们刚才讲的不是 1070，是 1100 多万吨，发表 1070，那我们口袋里还装有几十万吨。”

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是一件大事。人民公社大概九月就差不多搭架子搞起来了。看样子。来势很猛，没有办法阻挡，你叫他慢，那不行。至于把一些问题搞清楚，充实这个架子，那就要冬春。这件事要好好领导，要积极领导，要采取欢迎的态度。人民公社的特点是大公社，这是最近几个月出来的新事物。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至十一日，刘少奇到徐水视察，作了许多指示：

“第一，少奇同志感到徐水的“工业发展布局”的“规划仍有些毛病”，于是引用孟子的话“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精辟地说明了生产计划安排的复杂性和重要性。在肯定了这里公社社员要求实物加货币的工资制以后，也同样用孟子上述的话，指示县委，必须慎重考虑实物加工资的比例，以便满足社员们，复杂的生活需要。

第二，少奇同志指示徐水县委按照《礼记》上面的话，修订规划，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报导说：少奇同志还指示县委对全县工、农、后勤和文教各方面的人力算一笔细账，又引证《礼记》上面的话“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野，则财恒足矣！”让县委根据上述细帐，设法使非生产人员和非生产时间尽量减少。

第三，少奇同志指示县委要发展高中，以作为发展大学的后备；并且建议省委解书记帮助徐水大学解决三两个教员。少奇同志在知道徐水大学和县科学研究所共有一部分仪器设备以后，指示说：好呀！你们慢慢地就会办成正式大学，同大城市的差不多，或许比那还好呢！

第四，由于徐水的公社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行了全民所有制，少奇同志又告诉大家，全民所有制还并不是共产主义性质的，希望大家努力，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时代”。少奇同志对徐水人民急迫渴望早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热情和干劲，都给予了最大的鼓舞和赞扬。

第五，少奇同志还对徐水全县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作了许多美妙而广泛的安排。”

刘少奇听到有人说，给山药灌狗肉汤，亩产可以收 120 万斤时，即说道：“那么作真有效果吗？哈哈！你们可以养狗啊！狗很容易繁殖吗！”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李先念等人到徐水视察时，徐水县已经实现了“一县一社，县、社合一”。一县一社，即一县一个公社，全县统收统支，统一核算，共负盈亏，原来各社队的收入统一交县，支出统一由县核拨，供给标准，工资水平全县基本上一致。徐水人民公社已经消灭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某些残余，徐水全县没有一个小商贩，他们全部实行了供给制。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高举人民公社的红旗前进》社

论，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一定要建立“公共食堂”、“托儿所”、“缝纫组”一类组织，要求妇女劳动力全部参加生产，只有这样做才体现人民公社比农业生产合作社更加社会化，更加集体化的优点。

社论说，在建立人民公社时，要把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成片果树、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要转归社有。

社论说，少数人民公社可以实行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在分配上试行工资制或供给制。并说这种实验是有益的，因为它指出了农村中生产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前途。

社论说，一般的人民公社实现由集体所有制转到全民所有制时，经过三、四年或者五、六年就行了。

社论删去了在《中共中央关于建立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中由毛泽东加上去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这句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六日到十八日，刘少奇到河南视察，9月24日人民日报以《少奇同志在河南视察时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几个条件》为题目报导了这一重大新闻。

报导说，这是当时办人民公社急待解决的问题，因为刘副主席在9月13日的人民日报社论中，已经强调，有条件的可以立即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条件还不成熟的最慢不能超过三、四年或五、六年。那么，要创造那些条件才能过渡到共产主义呢？

报导将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的指示，提纲式的归纳为以下几条：

- 每个人都应当参加体力劳动；
- 对小孩子必须强调社会教育；
- 要由低级到高级实行供给制；
- 工厂办半工半读到大学；
- 工厂也可以实行半供给半工资；

接着人民日报详细的报导了少奇同志具体阐述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条件：

第一，使社会上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进行劳动，特别是体力劳动。每个人

都应当担负起力所能及的劳动，体力劳动是搞吃穿的，每个人都吃穿，有人不能负担，别人就要加重负担。少奇同志特别强调说，毛主席说过，马克思、恩格斯都说过。这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必要条件。

第二，搞好食堂、幼儿园、缝纫厂，把妇女从家务劳动解放出来，参加生产。

第三，要搞技术革命，我在河北看到两个小高炉炼铁厂，一个厂要五百人砸矿石，另一个厂一部矿石粉碎机解决了问题，搞技术革命就能节约大量劳动力。

第四，改进社会的劳动组织，也能节省很多劳动力。

第五，要提高技术水平和文化水平。

报导说，少奇同志十分称赞河南的人民公社实行供给制。当吴芝圃谈到许多公社都实行供给制时，少奇同志说：这要由低级到高级，一半供给，一半工资的做法是很好的。

报导又说：少奇同志说，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少奇同志指示，要采取新的办法办工厂、办教育。他说，你们建立新工厂，不要照搬老工厂那一套，目前，公社实行劳动工资加奖励，除了吃粮食等以外每月发几块钱，社员就高兴得不得了了。公社可以这样做，那么按这个办法，工厂为什么不可以呢？工人也是农民，农民也是工人，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新工厂也可以办学校，招一批初中生，就在这里上课，一个工厂就是一个高中。一天读几小时书，做几小时工，工厂即是学校，学校即是工厂。半工半读可以搞到高中，也可以搞到大学。要建立制度，每天六小时劳动，二小时上课，要比较稳妥，搞它八年到十年，一直到大学毕业，这样学生也多了，工人也多了，将来出来，即是大学生，也是技术工人。这也是过渡到共产主义的一个条件。

报导还说，刘少奇在河南视察时，还“听取了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修武人民公社和遂平人民公社党委的汇报，并作了重要指示。”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到二十八日，刘少奇到江苏视察，又大谈“如何建设美好的共产主义生活及培养人民共产主义精神”问题

刘少奇说：共产主义就是要革家庭的命，现在要搞共产主义，当然要实施这一举措。这一举措的做法是：例如一家三代同堂，则将夫妻、父母、儿女分开，各自编在青壮年男子班、青壮年女子班、老年男子班、老年女子班、少年男子班、少年女子班。分别各自到各自的营房住宿（原来社员的房屋，由公社统一调配，

分为集体住宿营房和家人团聚营房。每星期准许夫妻、父母、儿女回团聚营房住宿生活一次，第二天即返回各自集体营房过军事化生活，如此循环往返。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党员干部会上说：“我经过河北、河南、江苏，都决定农民吃饭不要钱，实行粮食供给制。看来大家赞成分配制度：粮食供给制加上工资奖励。”又说：“如果说供给制，标兵在那里？五亿多农民就是我们的标兵。各级干部、军队，都要向农民看齐，向他们排队。”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九月间巡视了长江流域的几个省，在九月二十九日回到北京后，向新华社记者发表了重要的谈话。

毛泽东说：

“此次旅行，看到了人民群众很大的干劲，在这个基础上，各项任务都是可以完成的。首先应当完成钢铁战线上的任务。在钢铁战线上，广大群众已经发动起来了。但是就全国来说，有一些地方，有一些企业，对于发动群众的工作还没有做好，没有开群众大会，没有将任务、理由和方法，向群众讲得清清楚楚，并在群众中展开辩论。到现在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不愿意在工业方面搞大规模的群众运动。他们把在工业战线上搞群众运动，说成是“不正规”，贬之为“农村作风”、“游击习气”。这显然是不对的。”

“在大干钢铁的同时，不要把农业丢掉了。人民公社一定要把小麦种好，把油菜种好，把土地深翻好。一九五九年农业方面的任务，应当比一九五八年有一个更大的跃进。为此，应该把工业方面和农业方面的劳动力好好组织起来，人民公社应当普遍推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日，刘少奇在同一个外国议会代表团谈话中说：“现在公社的性质基本上还是集体所有制，但有一部分全民所有制，这部分还要增加，两三年后，很多公社就会变为全民所有制”。

四、第一次郑州会议 毛泽东迅速纠正五风

一九五八年十月，毛泽东听了华北、东北九省农业协作会议的汇报后的指示：

有些社只搞粮食、薯类，没有可以交换的经济作物，工资发不出去，不好。以后要多搞能交换的经济作物。明年起，所有公社，又要搞粮食，又要搞能交换

的经济作物，如畜牧、鱼、药材等。

交换问题，交换不能轻视，有些人过早的鄙视交换是不对的。交换是永远的。一万年之后还有交换。一个公社不可能“万事不求人”。目前不能鄙视交换。鄙视商品生产，对当前经济发展是不利的。

公社分配问题。公社化后，分配主要还是按劳取酬。供给制部分搞的不要太多了。供给和工资部分是否一半一半。工资要保持一定差额，级差不能太小，否则，不合按劳取酬原则，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要减少收入，并且都是劳动力多的，对生产不利。干部级差也不能太小，虽然太大也不好。

公社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间不会太短。北戴河关于公社的决议上写快的三、四年，慢的四、五年，我加上了或更长一些时间。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六日上午，毛泽东派吴冷西和田家英到地方上去作一次短期的调查研究。地点就是河南新乡地区的一个县（修武县）和一个公社（新乡县的七里营公社）。毛泽东要他们各自带几个助手，分别先后去修武县和七里营公社，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时间一个星期。

毛泽东说，大跃进和公社化，搞得不好可以互相促进，使中国的落后面貌大为改观；搞得不好，也可能变成灾难。你们这次下去，主要是了解公社化后的情况。北戴河会议时我说过公社的优点是一大二公。现在看来，人们的头脑发热，似乎越大越好，越公越好。你们要去的修武县，全县已成了一个公社。我还要派人去了解山东寿张县，听说那里准备苦战三年进入共产主义。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的最终目标是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这是没有问题的。现在的问题在于：什么是共产主义社会，现在并不是人人认识一致，甚至在高级干部中也各说各的，其中有不少胡话。因此公社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你们这次下去调查，要带两本书，一本是中国人民大学编辑的《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一本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出发前要把这两本小册子通读一遍，至少把人民大学编的那一本看一遍，要你们的助手也这么办。毛泽东说，不是要你们搞本本主义，按图索骥，对号入座，也不是照本本上宣传，而是对马、恩、列、斯关于共产主义说过什么话有个大致的了解，下去调查中面对眼花缭乱的实际情况能够保持冷静的头脑。特别当记者的，不能道听途说，人云亦云，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心中有数，头脑清醒，做冷静的促

进派。报纸宣传影响大，人家头脑发热，搞报纸宣传的也头脑发热，那就坏事了。毛泽东交代：下去调查时不要各级领导作陪，要找生产队长就只找生产队长，不要公社书记、大队长参加；要找群众谈话就不要找干部参加；要找县委书记也只请他本人来谈，因为人多了谈话就有顾虑（同级干部如此，上级干部更如此）。找群众谈话要有各个阶层的人物，尤其要注意中农的态度。还可以找下放干部谈话，他们可能顾虑较少。总之要了解各种人的真实想法。助手中可以选一两位女同志，那样同农村妇女谈话比较方便。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在石家庄地区的谈话

人民公社搞的怎么样？只是搭起架子吧，食堂办了没有？是在一起吃饭，还是打回家去吃？

每个人民公社都要种商品作物，如果只种粮食那就不行了，那就不能发工资。山区可以种核桃、梨，可以养羊子，拿到外面去交换。河北是否可以分这样几类县，第一类饭不够吃的有几个县，第二类有饭吃，可以实行吃饭不要钱，工资一个也没有，你们这里有没有？（×××：有两个公社。）这个要研究一下，看能否有些商品出卖？粮食这个商品出路不大了，可以搞些核桃、枣子，是种核桃好还是种枣子好？（×××：这两个社都有核桃。）这两个社有核桃，为什么不能发工资？（×××：这两个社是建屏县高山上的两个社。）第三类发工资很少的，三、五元。第四类发的工资比较多，安国一年就是一百多元，平均大人小孩一百多元。（×××：大人小孩平均 110 元。）

吃饭不要钱都实行了吧？（×××：已经有五个县都实行了。计划在十一月分全部实行。）人家不要求实行，你计划实行怎么能行？有人说劳多人少的不赞成。这部分占 15%，他们感到吃亏，发工资是否多发一些，是否应当多发些？不然，他就不舒服。一家五口人，四个劳力，另一家五口只一个劳力，这两家就是不同了，恐怕要照顾一下劳力多些的。现在是社会主义，价值法则还是存在的，有些政治觉悟不高也不在乎。

干部里也有不痛快的吧，徐水怎么样？实行供给制能不能持久？年把垮台还不如谨慎些好，现在还是依靠这些干部么？向干部讲清楚，不要同群众过于悬殊。

石家庄有唱戏班子没有？有好的没有？他们拿多少薪水？（王力：有个奚哨伯，过去是八百元，现在成了右派降到五百元。）到五百元他还唱不唱？（王力：

评剧团有个郭彦芳，每月 400 元，要求实行供给制。）降低太多了不好，降低八元就不好。城市公社石家庄闹了没有？（王力：正在搞。）可以慢慢研究，不要那么忙。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一日，毛泽东在邯郸地区的谈话：

你们这里收入多少？（×××：平均 80 元）有超过一百元的没有？（×××：有一百三十元的。）最低的是多少？（×××：四十五元。）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了，（×××。四十五元吃了饭就没有工资。）你们有多少社开不了工资的？

（×××：有六个社开不了工资）。是不是因为经济作物太少？（×××：都有经济作物。）你们没有不生产经济作物的社，都是什么？棉花、梨、花椒、养猪也是经济作物吧！鸡鸭也是吧？你们的粮食多了可以多养一些。吃不了可以出口。

经济作物不够的，没工资，发工资少，应当发展经济作物，每个社都应当种些有交换价值的经济作物，发工资不是一元、二元。应当多一些，如果到共产主义还是这么少有什么意思。资本主义就比我们多么。

组织军事化，有些地方强迫命令，有些地方营长可以打连长，打人、骂人、捆人，还辩论，争论成了一种处罚，这是对敌人的法令，不要敌我不分。我们红军、八路军、官长有不大打士兵，不枪毙逃兵，不打俘虏，对老百姓和气。你们这些地方有没有打人、骂人、捆人的？争论和斗右派不一样，可见没有把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弄清楚。对人民内部不要压服，对敌人除了那些反革命，一般的地主、富农、右派也不打他们，在人民内部更不能打人骂人了。已经打了，也不要到处泼冷水，以后不再打了，以后改正也就算罗，因为他打人也是为了完成国家任务，说清楚群众会谅解的。在人民内部是从团结出发，经过斗争达到新的基础上的团结，这是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强迫命令，干是干下去了，人家心里不服，你看看吧，我们走了，也许不干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一）

人民公社问题。究竟扩大自然经济？还是扩大商品经济？还是两者都扩大？人民公社的经济，主要是自然的，说法不对。徐水办工厂，工人不与农民交换，如何吃饭？它应向两方面发展。它同时要扩大商品交换。不交换，就不能消费，不扩大交换，就不能发工资。京津郊区富裕，就是商品发展能交换。

统一是统其可统者，不过过去中央的办法，是有条件的，无条件的说法是错

误的。无条件服从党的领导的说法，也是不对的，不正确的就可以不服从，要破除这个迷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有条件的。要破无条件论，要立条件论。

公社要多搞商品生产，现在好像自给自足才是名誉的，而生产商品是不名誉的，这不好。要扩大商品生产，扩大社会交换。

以公社，联社为单位，搞工农业同时并举，搞使用价值与交换价随同时发展，因此要大修交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二）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什么叫过渡到共产主义，要搞个定义。

苦战三年，再搞十二年，十五年过渡到共产主义。不要发表但不搞不好。

由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要多长时间？三、四、五、六，或更多一点时间，是不是短了？还是长了？有时觉得长了，有时又耽心短了，我耽心短的时间多。人民公社什么时候能达到像鞍钢一样？能不能把农业变成工厂？产品和积累能够调拨，积累不全部要调，但必须调动的产品，则必须无条件的调动，才算全民所有制。河南说是四年，可能短了，加一倍，八年，范县说苦战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

斯大林写的东西必须看。好处是只有他讲社会主义经济，最大的缺点是把框子划死了，说集体农庄只愿意商品交换，不愿意调拨。这是因为不要不断革命，巩固社会主义秩序。我们则相反，破坏社会主义秩序一部分，供给制部分就是破坏这种秩序的。

公粮、积累、劳力，都是调拨性的，全民所有制的。百万雄师下江南，现在为什么不能调人去劳动。现在只能部分的调，全省、全国的调不行。如安国准备明年给阜平每人五百斤麦子，是世界上没有过的事。调拨须有可能与必要，不能乱调。秦始皇调七十万人替他修墓，结果垮台，隋炀帝也因乱调劳力而垮台了。

从集体所有制到全民所有制要多少年？四年是否可以？河南说四年，范县说两年。要多少年来说明期限。这是第一个过渡。第二个过渡，从“按劳取酬”到“各取所需”。现在已开始准备第二个过渡，吃饭不要钱。这不能不说是共产主义因素。

自给、供给制，公社内部调拨与商品交换，要向两方面发展，没有商品经济的发展，发不了工资。要提倡每个公社生产商品，不要忌讳“商品”二字。

供给制是便于过渡的形式，不造成障碍。建成社会主义，为准备过渡到共产主义奠定基础。

苏联的集体农庄，不搞工业，只搞农业，农业又广种薄收。所以过渡不了。苏联的社会主义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斯大林的过渡到共产主义，说得难，不向全民所有制过渡、共产主义因素根本不提倡，割裂重轻工业，公开提倡不着重消费资料的生产，几个差别扩大了。

要重读斯大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资产阶级法权问题文集》要看一下。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六日晚，毛泽东要吴冷西和田家英到专列上去汇报。

毛泽东在汇报中间不断插话，有些是提出问题，有些是发表评论。毛泽东谈到修武一县一社时指出，一县一社恐怕太大了，县委管不了那么多具体的事，而且全县各地生产水平很不平衡，平均分配会损害富队富社的积极性。我们现在还是搞社会主义，还是要按劳分配。凡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就干，一切不利于发展生产的就不要干。供给制只能搞公共食堂，而且要加强管理，粗细粮搭配，干稀搭配，农忙农闲不同，要学会勤俭过日子，不能放开肚皮大吃大喝，那样肯定维持不下去。其他只搞些公共福利事业，不要采取“包”的办法，量力而为。延安时期的供给制，是属于战时共产主义的办法，是不得已而为之，不能作为分配方式的榜样，所以全国解放后就改行工资制了。谈到修武说的全民所有制，毛泽东说，修武不同于鞍钢，产品不能调拨，只能进行商品交换，不能称为全民所有制，只能叫做集体所有制，千万不能把两者混同起来。修武县委书记提出的问题，表明他实际上是不赞成搞全民所有制的。县里的产品不能全部调拨给国家，不可能也不必要。他作为一县之长，不能不慎重考虑。尤其是国家对于县，在平常年景也不能完全保证按照县里的需要调给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遇到灾年更加不能保证，这也是明摆着的。他提出的问题使我们想到：如果生产力没有高度发展，像北戴河会议关于人民公社的决议中指出的，产品极为丰富，工业和农业都高度现代化，那末，生产关系上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分配方式从按劳分配过渡到按需分配，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两种所有制的接近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当汇报到有些公社搞集体住宿时，毛泽东很生气地说，那种搞法不是给国民党对我们的诬蔑帮了忙吗？凡是这样胡搞的地方我都支持群众起来造反。这些干部头脑发昏了，怎么共产党不要家庭呢？要禁止拆散家庭，还是一家

人大、中、小结合为好。谈到群众大炼钢铁的干劲很大，地里庄稼没有人收时，毛泽东说，1070 万吨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从北戴河会议到年底只有 4 个月，几千万人上山，农业可能丰产不丰收，食堂又放开肚皮吃，这怎么得了？这次郑州会议要叫大家冷静下来。毛泽东在结束汇报时说，你们这次下乡调查才一个星期，但发现了坐在北京办公室里想都想不出的问题，是不是头脑比一个星期前冷静一些了？是不是发现许多实际做法违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群众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一定要注意保持冷静头脑，善于看出运动中过激的苗头。

毛泽东说，这次我派陈伯达到遂平去，他回来却向我宣传要取消商品交换，实行产品调拨。他过去到过寿张，很欣赏那里苦战一年向共产主义过渡。我们有些同志读了不少马列主义的书，但临到实际问题，马列主义就不知道哪里去了。

毛泽东说，看来很有必要读一点书。他打算在郑州会议上同到会的同志一起读一本书，就是斯大林写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面读书，一面联系当前我国的经济问题，边读边议，使大家大脑清醒起来。毛泽东还特意对吴冷西说，人民日报和新华社天天作报道，发议论，尤其要注意头脑冷静。要当促进派，但要当冷静的促进派，不能做冒失的促进派。他还说，他对报纸宣传还有一些意见，过几天空一点时再谈。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三）

徐水的全民所有制，不能算是建成社会主义。小全民，大集体，人力、财力、物力都不能调拨。这一点需要讲清楚。两者混同起来不利。现在不少干部模糊，如果说不是就是“右倾”。

有两种所有制，即全民与集体，但有一种起决定作用，即能调拨，不能服从全国的调拨，不能算是全民所有制。全民所有制的调拨，就不是政治经济学上的“商品”了。不完成“两化”产品不可能丰富，不可能直接交换，不可能废除商品交换。

三个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体力与脑力差别），还要加上一个熟练与非熟练。

现在的生产关系还是小集体到大集体，互助组带有社会主义萌芽，由初级社到高级社，由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取消了自留地，经营范围扩大，教育、公共食

堂、带小孩都由社会负担，废除家长制，吃饭不要钱，这是大变化。但所有这些变化，都是一个社、一个县范围内的变化，与社外无关。对全国来讲，还不是根本的变化。这还不如鞍钢，吃饭不要钱的问题，比鞍钢进步了。现在有些地方，废除了定额，按劳动强度、技术高低、态度好坏三者来作定额了，定额和计酬都有变化。

人民公社的性质是工、农、兵、学、商相结合的社会结构的基本单位，它的作用，主要是生产与生活组织者，同时又体现政权需保留的部分作用，现在有人不懂得政权的作用是对付地、富、反、坏的监督改造与对外保护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用来对付解决人民内部问题，现在有人误用政权对待人民内部，如营长打连长，这是强迫命令。公社是大跃进的产物，不是偶然的，是实现两个过渡的最好形式，又大又公，有利于过渡，也是将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

价值法则是一个工具，只起计算作用，但不起调节生产的作用。斯大林著作有许多好的东西。

斯大林最后一封信，几乎全部错误，认为机器交给集体农庄，是倒退。

工人制造价值大，应当略高于农民，明年应当考虑，把取消计件工资的损失补起来，并做到略略有所增加。

大集体、小自由。每家搞点锅灶。家庭作为历史作用的家庭是破坏了，消费还有部分存在，抚养还有一大部分，生育还存在，家长制和金钱关系破坏了，普遍的社会保险。中国的旧家庭是家庭的共产主义，每个家庭都是吃饭不要钱，但是不平等。

资本家定息不取消（不要可以，但不宣布），加入公社是自愿原则。干部待遇问题，要慎重。先试验，不要宣布太早（党员降低工资，也不必宣布。）。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四）

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使住宅的建设便于男女老少的团聚，紧张的时候可以分开。建筑住宅斩头去尾，是强制办法，只废除历史上的家长制，现在的家仍需要一个长，是能者，不一定是长者。

商品同商业，这个问题都是避开这一方面的，好像不如此，不是共产主义似的，人民公社必须生产宜于交换的社会主义商品，以便逐步提高每人的工资。在生活资料方面，必须发展社会主义的商业，并且利用价值法则的形式，在过渡时

期内，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利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的经济学家不喜欢经济学。斯大林临死前，谁说到价值法则就不荣誉，表现在给雅罗申柯写的信上，苏联的一些人，不赞成商品生产，以为已经是共产主义了，实际上差得远，我们只搞了几年，则差得更远。

我看要向两方面发展：一是扩大调拨，一是扩大商品生产。不如此，就不能发工资，不能提高生活。

资产阶级法权，一部分必须破坏，如等级森严，居高临下，脱离群众，不以平等待人，不靠工作能力吃饭，而是靠资格、靠权力，这些方面，必须天天破除。破了又生，生了又破。

另一部分是要保留的，保留适当的工资制，保留一些必要的差别，保留一部分多劳多得。一部分是赎买性的，如对资产阶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民主人士，仍保留高薪制。

商品生产：调拨，我完全赞成。为什么公社与公社之间实行合同制，国家与公社之间不可以订合同呢？这可能触犯“左”派。我们现在的商品生产，不是为价值法则所指挥，而是为计划所指挥，我们的钢铁、粮、棉，难道都是价值法则所指挥吗？

提倡实事求是，不要谎报，不要把别人的猪报自己的，不要把三百斤麦子报成四百斤。今年的九千亿斤粮食，最多是七千四百亿斤，把七千四百亿斤当数，其余一千六百亿斤当作谎报，比较妥当。人民是骗不了的。人民日报最好冷一点。有些问题讲热了要讲得适合当前。要把解决工作方法问题，当成重点。党的领导，群众路线，实事求是。

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要再看一遍。这本书的一、二、三章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东西，有些是正确的，有些不妥的地方，有些可能斯大林自己也没有搞清楚的。

第一章，客观法则，提出计划经济与无政府状态对立。他说计划法则与政策有区别，很好。主观计划力求适合客观法则，提出了问题，但没有展开，可能他自己也不太清楚。第一章斯大林提出了问题，提出了客观规律，但是怎样掌握规律，没有很好的回答这个问题。

第二章讲商品，第三章讲价值法则。你们有什么意见，我相当赞成其中的许

多观点。讲清楚这些问题很有必要。也有些问题，如把商品限制在生活资料方面，说“生产资料不是商品”，就值得研究。生产资料在我国还有一部分是商品，我们把农业机械卖给合作社。

我看斯大林的最后附的一封信差不多完全是错误的，把国家与群众对立起来、基本观点是不相信农民，不放心农民。对农业机械啃住不放，一面说生产资料归国家所有，不卖给农民；一方面又谈农民买不起，买了会损失不起，国家就损失得起。这理由是说不通的。实际是自己骗自己。把农民控制得要死，农民也就控制你。主要是没有找出两个过渡的方法来，没有找到一条解决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的道路。说也说得对，工农、城乡对立消灭了，本质差别也消灭了，但积三十年的经验，也没找到出路，从信中可以看出，斯大林对这一点很苦恼。

斯大林说，社会主义的商品，不是把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商品保存下来，而是新式的商品，价值规律在我们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起调节作用的是计划，这很对。几年来，看得很清楚，我们的大跃进是计划的大跃进。是政治挂帅。

斯大林只谈生产之事，不谈上层建筑。（××：他只看到工农业之间的矛盾）他批评雅罗申柯是对的。但他不谈上层建筑与基础的关系，没有谈到上层建筑如何适应经济基础，这是重大的问题，我们的整风，下放下部，两参一改，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破除不适当的规章制度等等，都属于上层建筑，都属于意识形态。

在斯大林的经济学里，只谈经济关系，不谈政治。虽然报纸上讲“忘我劳动”，实际多作一小时也不行，每小时都没有忘我。斯大林见物不见人，见人也是见干部之人，不见群众之人，人的作用，劳动者的作用不谈。如果没有共产主义运动，想过渡到共产主义是困难的。

“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的口号，不妥当，结果都离不开我。有人说，是马克思讲过的，是马克思讲过的我们可以不宣传，人人为我，是人人都为我一个人，我为人人，能为几个人。斯大林的经济学里，是冷冷清清，凄凄惨惨，阴森森的。

我们对资产阶级法权思想，要破除一部分，即老爷架子，三风五气，不以普通劳动者姿态出现，要坚决的破。但商品流通、商品形式、价值法则，则不能一下子破，虽然它们也是资产阶级法权范畴。现在有些人宣传破除一切资产阶级法

权思想，值得注意，这种提法不妥。

进到共产主义要有步骤，不能一步登天。如人民公社要向两方面扩大，一方面发展自给性生产，一方面也要发展商品生产。我们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以利于发展生产，利于过渡。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不同的工资要保留一个时期。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调拨的只是一部分，多数不是。现在有一种偏向，好像共产主义越多越好。现在有些人总是想三五年内搞成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五）

在没有实现农村的全民所有制以前，农民总是农民，他们在社会主义道路上总还有一定的两面性。我们只有一步一步地引导农民脱离较小的集体所有制，通过较小的集体所有制走向全民所有制，而不能要求一下子完成这个过程，正如我们以前只能一步一步的引导农民脱离个体所有制而走向集体所有制一样。

什么叫建成社会主义？我们提了两条：

- （一）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是实行社会主义的全面的的全民所有制。
- （二）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变为全民所有制。

有些同志不赞成在两种所有制中间划一条线，似乎公社全是全民所有制，实际上有两种所有制，一种是公社的集体所有制。如果不讲此，则社会主义建设还有什么用。

有的同志不赞成，说不能划一条线，说划了就损伤积极性，线内也有共产主义，也有集体和全民所有制（鞍钢与公社）。大线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小线是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秀才都不赞成，是不是秀才要造反？

斯大林是划了线的，讲了三个先决条件，这三个条件基本上不坏，但不具体，

（1）首先是增加社会产品，这是基本的，我们叫以钢为纲，极大地增加产品；

（2）集体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将商品交换提高到产品交换，使中央机构能掌握全部产品。

不愿划界线的，主要是认为时间已到，以为已经上了天，你们是右倾。当然，现在鞍钢是全民所有制，但还没有过渡到共产主义。总要搞个社会主义全民所有

制再过渡到共产主义。现在只有一部分是全民所有，大部分是集体所有。全民所有也不一定过渡到共产主义；

(3) 提高文化水平、文化、体育、智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九日，毛泽东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关于读书建议的信》，建议他们认真阅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六）

报上尽是诗。大跃进有些把人搞得昏昏沉沉。

一个是不要划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界限的问题，一个是不要混淆两种所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问题。

五、召开武昌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七日，在武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上午，毛泽东在武昌会议上的讲话（一）

睡不着觉，心里有事。翻一翻，作为第一本账。出点题目，请大家研究。你们写文章，我有我的一些想法。

(一) 过渡共产主义。

你们看怎么样？

有两种方法，我们可能搞得快一些，看起来我们的群众路线是好办法。这么多人，什么事都可以搞。

赫鲁晓夫的报告提纲，他已经四十一年了，现在想再七年加五年，共十二年，看他意思准备过渡，但只讲准备，并没有讲过渡，很谨慎。

我们中国人，包括我在内，大概是冒失鬼。我们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就整个社会主义阵营来说，我设想一定要苏联先过渡（不是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后过渡。现在国内局势，我们至少有几十万、上百万干部想抢先，都想走得越快越好，对全局顾及不够。我们现在是破落户，一穷二白，还有一穷二弱。我们之穷，全国每人平均收入不到八十元，大概在六十到八十元之间，全国工人平均每月六十元（包括家属）。农民究竟有多少，河南讲七十四元，有那么多？我们说强大，

还没有什么根据。现在我们吹得太大了，不合乎事实。我看没有反映客观事实。我担心，我们的建设有点白杨树，有一种钻天扬，长得很快，就是不结实，钻的太快，不平衡，可能搞得天下大乱。我总是担心，什么路线正确不正确，到天下大乱。你还说你正确啊？

（二）有计划按比例。

什么叫比例？我们现在摸了一点比例，是两条腿走路，三个并举。

我们也有缺点。北戴河会议讲三、四年或五、六年或更多一点时间，搞成全民所有制，好在过渡到共产主义还有五个条件，（1）产品极为丰富；（2）共产主义思想觉悟道德的提高；（3）文化教育的普及和提高；（4）三种差别和资产阶级法权残余的消灭，（5）国家除对外作用外。其它作用逐渐消失。三个差别，资产阶级法权消灭没有一、二十年不行。我并不着急，还是青年人急，三个条件不完备，不过是社会主义而已。

多快好省是客观的东西，能速则速，不能勉强。图 104 飞机高到一万多公尺，我们飞机只几千公尺，老柯坐火车更慢，走路更慢。速度是客观规律，今年粮食九千亿，我不信。七千四百亿翻了翻。是可能的。我很满意了。我不相信八千亿斤，九千亿斤，一万亿斤。速度有两个可能，一是相当快，一个是不那么快。我们设想十年之内搞四亿吨钢，可能搞到，可能搞不到，一个是可不可能，一个是需不需要。

（三）这次会议的任务。

一是人民公社。一是明年计划的安排（特别是第一季度的安排）。当然还可以搞点别的。如财贸工作的“两放、三统、一包”等等。

（四）划线问题。

要不要划线？如何划法？建成社会主义的集中表现为全民所有制。我们以完成全民所有制为第一标准。北戴河文件有个缺点，就是年限快了一点。是受到河南的影响。我以为北方少者三、四年，南方多者五、六年，但办不到。要改一下。我有点恐慌，怕犯什么冒险主义的错误。×××脑子也活动了，认为长一点也可以。还有完成“三化”：机械化、电气化、园林化。要五年到十年，占压倒优势才叫化。（×××：达到 150 元到 200 元的消费水平，就可以转一批，将来分批转，这样有利，否则，等到更高了，转起来困难多，反而不利。）（×××：就

是三化不容易做到，尤其园林化。)(××：我们搞了土改，就搞大合作，又搞公社，只要到每人 150 元到 200 元就可以过渡，太多了，如罗马尼亚那样，农民比工人收入多时，就不好转了，把三化压低，趁热打铁，早转此晚转好，三、四年即可过渡。)照你的讲法，十八年建成社会主义大有希望。(×××：机械化、电气化不容易。)(柯庆施，集体所有制是否促进生产？都包下来是否有利？)(×××：按三分之一调拨的三三制，恐怕要十年，三几年是做不到的。)按照××、××的意见，是趁穷之势来过渡，趁穷过渡可能有利些，不然就难过渡。总之，线是要划的，就是如何划，请你们讨论，搞几条标准，一定要高于苏联的。

(五) 消灭阶级问题。

消灭阶级问题，值得考虑。消灭阶级有两种，一种是作为经济剥削的阶级容易消灭，现在我们可以说已消灭了，另一种是政治思想上的阶级（地主、富农、资产阶级，包括他们的知识分子），不容易消灭，还没有消灭，这是去年整风才发现的。我在一九五六年写的批语中有一条说，“社会主义革命基本完成，所有制问题基本解决”，现在看来不妥当了。

我看消灭阶级这个问题让他吊着，不忙宣布为好。阶级消灭究竟何时宣布才有利，鉴于斯大林宣布早了，宣布阶级消灭不要忙，恐怕基本上没有害了，才能宣布。

(六) 经济理论问题。

究竟要不要商品。商品的范围包括哪些？我看现在的讲法比较好，生产资料。一个时期。仿佛认为商品越少越好，时间越短越好。甚至两三年就不要。是有问题的。我看商品时间搞久一点好，不要一百年，也要三十年，再少说得十五年。这有什么坏处。问题看有什么坏处，看他是否阻碍经济的发展。

(七) 会不会泼冷水？

不要像唱戏拉胡琴，弦拉得太紧了，有断弦的危险，这可能有一点泼冷水的味道，下面干部搞公社，有些听不进去，无非骂我们右倾，不要怕，硬着头皮让下面骂。翻一番。自从盘古开天地，全世界都没有，还有什么右倾呀!?

总是要有实际可能才好，有两种实际可能性，一种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非现实的可能性，如现在造卫星就是非现实的，将来可能是落实的。可能性有两种，是不是？可能转化为现实的是现实的可能性，另一种是不能转化为现实的

可能性，我看非亩产八万斤不结婚，也是非现实的可能性。

（八）人民公社要整顿四个月。

现在据湖北说，有百分之七、八十的公社搞得比较好了，我是怀疑派，我看十个公社，有一个真正搞好了的就算成功。人民公社不会垮？我看什么事都有两种可能性：垮与不垮，合作社过去就垮过的，河南、浙江都垮过，我就不相信你四川那么大的一个省，一个社也没有垮？无非是没有报告而已。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晚上，毛主席与吴冷西、田家英谈话

原想同各大区组长商量降低 1959 年的生产指标，首先是钢的指标。原来的指标是 1958 年 8 月北戴河会议确定的。设想可否把钢产量的指标从 3000 万减为 1800 万吨。他原想说服他们，结果反而是各组长力图说服他维持原来的指标。

他们都想打通我的思想，我硬是想不通，因为他们缺乏根据。他们有的大区明年要增加钢产两倍，有的省要增加四倍，有的省要增加十几倍，有的省竟然要增加三十倍。这怎么能叫人相信？中央已有 12 个部长写了报告，指标高得吓人，似乎要立军令状。但我看完不成也不要杀头。铁道部长说 1959 年要修 2 万公里铁路。周总理主持制订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规定 5 年内才修 2 万公里，他夸下海口要一年完成，怎么完成得了呢？如果真的完成了，我甘愿当机会主义者。其实 1800 万吨钢的指标不是机会主义，能否完成还是个问题，因为今年（1958 年）预计炼出的 1000 万吨出头的钢产量中，好钢只有 850 万吨，看来郑州会议读了几天书并没有解决思想问题，大家头脑还是发热。1958 年钢铁翻一番就使得 6000 万人上山，闹得天下大乱。明年再来个翻一番以至翻几番怎么得了？我看明年要减任务，工业这样，农业也这样。去冬今春修了 500 亿立方水利工程，今冬明春就不要再搞 500 亿土方了，要减下来。做新闻宣传工作的，记者和编辑，看问题要全面。要看到正面，又要看到侧面。要看到主要方面，又要看到次要方面。要看到成绩，又要看到缺点。这叫做辩证法，两点论。现在有一种不好的风气，就是不让讲缺点，不让讲怪话，不让讲坏话。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好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好，也还有坏的一面，反之，坏的事情不是一切都坏，也还有好的一面，只不过主次不同罢了、听到人家都说好，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坏处也没有？听到人家都说坏，你就得问一问是否一点好处也没有？大跃进当然是好事，但浮夸成风就不好。你们看虚报好还是瞒产好？我看瞒

产比虚报好。

大跃进中有些虚报是上面压任务压出来的，问题的危险性在于我们竟然完全相信下面的报告。做新闻工作，无论记者或编辑，都要头脑冷静，要实事求是。下去采访，不要人家说什么你就报道什么。要自己动脑筋想想，是否真实，是否有理。据一些省委反映，人民日报在大跃进中搞各省进度表（如水利工程完成土石方进度表）、放“卫星”（粮食和钢铁的高产“卫星”）等报道方法，对各地压力很大，结果“你赶我追”，大搞虚夸。这要引以为戒。

第一，要实事求是，报道时要弄清事实真相。

第二，现在要下明矾，把混乱的思想加以澄清。

（毛泽东听说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讲到人民公社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时把时间缩短了，说三四年五六年就行了，不要北戴河决议上写的“或者更长一些时间”那半句话了。）

那半句话是我特意加上的，当时想法是谨慎一点好。现在看来还是太急了。你们删去那半句话就更急了，不知是听了哪一位政治局委员的意见。

这半年大家头脑都发热，包括我在内，所以要下明矾，要压缩空气，说泼点冷水也可以，但要注意保护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有错误领导上承担责任就是，不要责怪下面。第三，要考虑国际影响。

今年我们宣传上吹得太厉害，不但在国内搞得大家头脑发昏，而且国际影响也不利。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武昌工作会议讲话（二）
毛泽东的这次讲话强调了以下几个问题：

第一，路线问题

他说：我们的路线，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办法仍然是政治挂帅，群众路线，几个并举，加上土洋结合等等。

第二，破除迷信问题

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作迷信破除了。

第三，虚报问题

他说，现在横竖要放“卫星”，争名誉，管他作假不作假。没那么多东西，就要假造。现在的严重问题，不仅是下面作假，而且是我们相信，从中央、省、

地到县都相信，主要是前三级相信，这就危险。

第四，指标问题

钢的指标，究竟定多少为好？北戴河会议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那是建议性的，这次要决定。问题是办到办不到，有没有根据？去年五百三十五万吨，都是好钢，今年翻一番，一千〇七十万钢，是冒险的计划。结果六千万人上阵，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明年定为二千七百万吨至三千万吨，办不到。可不可以把指标降低？我主张明年不翻二番，只翻一番，搞二千二百万吨有无把握？如果没有把握，还得下压，一千五百万吨也可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对云南省委报告的批语：《一个教训》：

在我们对于人民生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缺少关心，注意不足，照顾不周，（这在现在时几乎普遍存在）的时候，不能专门责怪别人，同我们对于工作任务提得太重，密切有关。千钧重担压下去，使乡干部没有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干，少于一点就被叫作“右倾”，把人们的心思引到片面性上去了，顾了生产，忘了生活。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十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汉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一股热情，三千万吨，当中一千万吨是主观主义，事非经过不知难。

今年下半年出现了两个大问题，一为人民公社，二为以钢为纲。大家有点紧张，现在搞条例，心情就舒畅了。

吃饭问题，究竟把话说满好，还是留有余地？明年春天会不会有的地方吃不到三顿干饭？广东下命令一天三顿吃干的。山东的群众说，现在吃煎饼，明年春天怎么办？现在粮食摸不到底，是否现在少吃些，以后多吃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至十二月十日举行的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在八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

第一，当前的国际形势

敌人方面乱下去，一天天乱下去，我们方面好起来，一天天好起来。当然，也要估计到还有长期的、曲折的、复杂的斗争，并且要估计到战争的可能性。

第二，辩证法在中国的发展

马克思关于对立统一的学说，一九五八年在我国有很大的发展。

两条腿走路是对立统一的学说。都是属于辩证法范畴的。例如在优先发展重

工业的前提下，工农业同时并举，重工业与轻工业同时并举；中央工业与地方工业同时并举，大中小企业同时并举；小土群与大洋群，土法与洋法，几个并举。

在农业中也是很复杂的，有高产、中产、低产同时存在。实行耕作“三三制”是群众的创造，北戴河会议抓着了提出了三分之一粮食。三分之一休闲、三分之一种树。这可能是农业革命的方向。又提出“八字宪法”：水肥土种密保工管。

还有管理体制——中央统一领导和地方各级分级管理，从中央、省、地、县、公社一直到生产队。都给他一点权。完全无权是不利的。

在社会主义制度方面，在社会主义阶段，有两种所有制同时存在。是对立又是结合，是对立的统一。集体所有制中包含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的核心因素。它的根本性质是集体所有制，并且包含有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因素。现在有些县总是好抢先，要先进入共产主义。其实要先进入共产主义的，应该是鞍钢、抚顺、辽宁、上海、天津。中国先进入共产主义跑到苏联前头，看起来不像样子。有没有可能也是问题。

郑州会议提出“大集体，小自由”。

现在又提出抓革命又抓生活。犯错误的干部，主要是强迫命令，讲假话，以少报多，以多报少。以多报少危险不大，以少报多就很危险。主要的毛病在于不关心人民的生活，只注意生产。

武昌会议又提出实事求是，订计划又热又冷，要雄心很大，但又要有相当的科学分析。苦战三年基本改变全国面貌问题。这个口号是否适当？三年办得到办不到？这个口号首先是河南同志提出来的。开始在南宁会议上我们采取了这一口号，那时是指农村讲的。后来不知那一天，推广为“苦战三年，改变全国面貌”。我们把改变面貌的时间说长一点，无非是当“机会主义”者。这样的机会主义，很有味道，我愿意当。对于钢的问题。明年搞三千万吨钢，我也赞成过。到武昌后，感到不妙。过去我也想过一九六二年搞到一亿或者一亿二千万吨。那时只担心需要不需要的的问题。忧虑这些钢谁用，没有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后来又考虑到可能性的问题。一是可能，一是需要，今年一千零七十万吨累得要死，因而对可能性发生问题。明年三千万吨，后年六千万吨，一九六二年一亿二千万吨，是虚假的可能性，不是现实的可能性。现在，要把空气压缩一下。把盘子放小——一千八百至二千万吨。现在要压缩一下，不一定订那么高。留有余地，让群众的

实践去超过我们的计划，这也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

以上这些可否都讲成辩证法的发展。这都是辩证法的推广。

第三，两种可能性问题

围绕人民公社，党内党外有各种议论，大体上有几人：

一种确实是性急了一点。他们有冲天干劲，革命热情很高，非常宝贵，但未作历史分析，形势分析，国际分析，这些人好处是热情高，缺点是太急了，纷纷宣布进入全民所有制，两三年进入共产主义。这次决议的主要锋芒，是对着这一方面讲的。就是说不要太急了。太急了没有好处。“左”派永远会有，也不怕。只要大多数干部思想统一了。就好办了。

二种是有顾虑、恐怕跌交子。有少数干部，他们是好同志，为党为国，他们认为太急了，他们不是观潮派、算账派，不是站在对立面的，他们有顾虑，恐怕我们跌交子，这些人是好人，这个决议也可能说服他们，因为我们并不那么性急。

三种是观潮派、算账派。他们是不怀好意的，他们不懂得当前形势的迫切要求，而且时机已经成熟。

两种可能性问题。一种事物总有两种对立的東西。

食堂、托儿所、公社会不会巩固？看来会巩固，但也要准备有些垮台。

我们的党也有两种可能。一是巩固，一是分裂。精神上要有准备。

我们中华人为共和国也有两种可能，胜利下去，或者灭亡。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在武昌和各协作区主任的讲话

北戴河会议。我犯了一个错误，想了一千〇七十万吨钢，人民公社，金门打炮三件事。别的事情没有想。北戴河会议决议现在要改。那时是担心，没有把革命热情和实际精神结合起来，武昌会议把两者结合起来了，决议要改。两条腿走路，俄国的革命精神与美国的实际精神。

六、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和八届七中全会，进一步解决人民公社的体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一月下旬至二月初，中央召开省市书记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在省市书记会上的讲话：

中央召开的这次会议主要讨论 1959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问题、工农业生产和财政贸易问题。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着重强调了以下几点：

第一，要坚持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

总路线不能改，还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

第二，要坚持正确的立场、辩证的方法

有些人一讲去年的缺点时，尽是缺点，脑筋里记了几十条缺点，把成绩那方面挤得没有了。这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问题。是形而上学还是辩证法？这是个个别与一般，大部分与小部分、部分与全体的关系问题。在分析问题、处理问题中，一定要搞清一个或二、三个指头的问题。当然这是指大多数而言，也有少数个别搞得很坏，一塌糊涂。个别真正犯了路线错误的人，不是一个指头，而是烂了九个指头，例外。

第三，一九五八年工作中的缺点错误一定要改正

抓了一面，忽视了一面，引起了劳动力浪费，副食品紧张，轻工业原料未解决（多种经营），运输失调，基本建设上马太多，这些都是我们的缺点和错误。要正面承认这些缺点错误，有人宽慰我，成都会议不是提出劳逸结合，生产波浪式前进？但是没有提出具体的时间表，还是不行。还有抓了生产没有抓生活，一定要×万人（得浮）肿病，北京一人一两蔬菜才引起注意。

一九五九年二月，毛泽东到河北、天津、山东、河南等地视察。

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天津听取河北省委的汇报。

二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山东视察。

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河南视察，与新乡、洛阳、许昌、信阳四个地委座谈时的谈话：

人民公社究竟是什么性质，是公社所有制，还是队所有制？有穷队有富队。有穷村有富村。现在我们对穷队富队，穷村富村采取拉平是无理由的，是掠夺。是抢窃。包括桌椅板凳在内都要打条子、打借据，十年偿还。

（汇报时说，有的就怕商业部门收购猪，把猪，赶到地里，使猪乱跑，有的是藏在棉花里）这个办法我很赞成。（汇报时反映，有的地里花生没有收净，采取分成办法以后，有的一夜就收净了），要采取分成的办法。我很赞成千方百计的吃掉、跑掉，这样的作法不是本位主义，这是他们劳动的结果。我们反本位主

义，强迫收回来，这样越反越不行。你这实际是无偿外调，你叫他本位主义，名字安的不对，这是所有制的问题。现在部分所有制是社，基本所有制是队。公社逐年扩大点积累，搞他七、八年，社的所有制就形成了。

现在所有制实际上生产队是八个指头、九个指头，公社是一个指头、二个指头。最多不超过三个指头。

我们现在说生产队。队就是社嘛，现在公社实际是联邦政府。公社的权不能那么大，应该是有公粮之权，积累之权，产品分配应该在队。我们一时没有讲清楚，八届六中全会也还没有讲清楚，只讲了按劳分配，只讲了生产责任制。没讲怎么样按劳分配，没有讲清楚集体所有制。现在分配方案要改变一下。公社所有制要有个过程，现在基本上是队所有制。我们国家和社积累 25%，生产费 20%，群众分配 55%。这个比例不变，生产年年发展，绝对数都增加了。

另外，谈谈工业怎么办？工业现在占的资金、人力太多是有冲突的。凡有人力、物力、财力冲突的要调整一下。学校也不可一下办那么多，什么事都要逐步来，如除四害，一次能够除净吗？绿化也要逐步来，文盲也是逐步扫，学校也是分批分期搞。财贸机关把贷款全部收回，现在应该全部退回，最后来个折衷办法。叫他退一半。这是搬石头砸自己的脚。你把原来的贷款都收回了，他发工资就没有钱，结果还得贷款发工资。先宣布安民布告。调拨要研究个章程。分配也要研究一下。要知道人民公社的集体所有制是逐步形成的。我们经过四个时代了：互助组，那只有点集体所有制；初级社集体就多了，叫作半集体所有制；高级社的时候，可以说有十分之七集体所有制；现在要拉平不行。积累太多了群众要反对，这样并非一盘棋。真正一盘棋：第一是农民，第二是公社，第三是国家。这样一来农民就拥护我们了，农民反过来会照顾国家的。这样是否收不到东西？我是替农民说话的，我是支持“本位主义”的。因为现在是队所有制，几年以后才能实行社所有制，一定要注意什么事要有个过程。要认识部分是社所有，基本是队所有。公社是半路插进来的干老子。粮食，生产队有个差等；工资也要有个差等。河北省是上死下活。我们可以采取这个办法，叫作“死级活平，按劳取酬”。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郑州举行的扩大会议。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伟大成绩

人民公社化过程中出现的缺点错误。

现象是：在 1958 年农业大丰收以后，粮食、棉花、油料等等农产品的收购至今还有一部分没有完成任务。再则全国（除少数灾区外），几乎普遍地发生瞒产私分、大闹粮食，油料、猪肉、蔬菜“不足”的风潮。其规模之大，较之 1953 年和 1955 年那两次粮食风潮都有过之无不及。

本质是：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整顿巩固人民公社的政策措施。

由不完全的公社所有制走向完全的、单一的公社所有制，是一个把较穷的生产队提高到较富的生产队的生产水平的过程，又是一个扩大公社的积累，发展公社的工业，实现农业机械化、电气化，实现公社工业化和国家工业化的过程。目前公社直接所有的东西还不多，如社办企业、社办事业，由社支配的公积金、公益金等。虽然如此，我们伟大的、光明灿烂的希望也就在这里。因为公社年年可以由队抽取积累，由社办企业的利润增加积累，加上国家的投资，其发展将不是很慢而是很快的。

建议国家在七年内向公社投资几十亿到百多亿元人民币，帮助公社发展工业、帮助穷队发展生产。

公社的积累应当适合情况，不要太高。我们必须把安排人民生活，安排公社积累和安排国家需要这三个方面的工作，同时统筹兼顾。

公社在统一决定分配的时候，要承认队和队，社员和社员的收入有合理的差

别。

穷队和富队的伙食和工资应当有所不同。工资应当实行死级活评。

公社应当实行权力下放，三级管理，三级核算。并且以队的核算为基础。

在社与队、队与队之间要实行等价交换。不是为了要在群众中间去提倡算旧账。相反，我们认为旧账一般地不应当算。

必须坚决克服公社管理中的浪费现象。人民公社一定要坚持勤俭办社的方针，一定要反对浪费。

在粮食工作方面，鉴于最近的经验，今后必须严格规定一个收粮、管粮，用粮的制度，一定要把公社的粮食收好，管好、用好。社会对于粮食的需要总是会不断增长的，因此，至少在几年内不要宣传粮食问题“解决”了。

必须按农业、工业、运输业、服务业和其他各方面的正当需要，加以统筹，务使各方面的劳动分配达到应有的平衡。公社和县兴办工业是必要的，但是不可一下子办得太多。各种工业企业都必须节约人力，不允许浪费人力。服务业方面的人员，凡是多了的，必须减下来。行政人员只允许占公社人数的千分之几。文教事业的发展，应当注意不要占用过多的劳动力。公社不允许有脱产的文工团、体育队等等。

提议各级干部分期分批下放当社员，少则一个月，多则一个半月。一部分干部可以下厂矿当工人。

准备应付落后分子的嘲笑和敌对分子的攻击。

一九五九年三月一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今年闹粮，主要是基层干部带头，如说理由是宣传工作没做好，我看不对头。只要一平二调三提款，做了宣传工作也会这样。群众以为一切要归公，一切共产。再加小社卖粮，大社堵账，卖粮之后，钱粮两空。有些增产的大队，又增加征购任务，使干部摸不到底。因此基层干部有五怕：一怕拉平，二怕报实产量，追加任务，三怕春荒时要调剂解决，四怕自己吃亏，五怕……，于是先下手为强，把粮食搞到手里再说，他们的决心很好很大，这主要有群众支持，瞒产私分成为普遍现象。瞒产私分，非常正确，本位主义有则反之，不能去反五亿农民和基层干部。瞒产私分、站岗放哨，这是由共产风而来。普遍的瞒产私分、站岗放哨、黑夜冒烟，是一种和平的反抗。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一九五九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的讲话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农民历来知道土地是搬不走的，不怕，但劳动力，产品是可以搬得走的，这就怕了。

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有人斯有土，有土斯有财”，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城市公社问题，（1）小城市可以搞；（2）中等城市没有搞的不搞，已成立了的不要一下解散，可以试办；（3）大城市不搞。

一九五九年三月毛泽东写党内通讯

一九五九年三月九日，毛泽东写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我们已经有了明确的方针取得主动。观潮派算账派无话可讲。当然会有一部分人想不通，骂我们开倒车。这些人会有几天睡不好觉，吃不好饭，但不过几天而已。三天后。就会通的。总之，慢了不好，要快，可以做些准备工作，首先稍稍打通地县两级思想，不必全通，有三天时间也就可以了。拖长反而不好。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五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这封信主要是与各省讨论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问题，即究竟是生产大队、还是生产队（原高级社）作为基本核算单位？很明显，毛泽东倾向于以生产队作为基本核算单位，而不同意以生产大队或管理区作为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给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的党内通讯

各省、市、区党委第一书记同志们：

在会中，专门召集这些同志讲一次，使他们从过去几个月中因为某些措施失当，吹共产风，一平二调三收款，暂时脱离了群众，这样一个尖锐的教训中，得到经验。

应当讨论，除公社、管理区（即生产大队）、生产队（即原高级社）二级所有，二级管理、三级核算之外，生产小队（生产小组或作业组）的部分所有制问题。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的党内通讯

这封信里毛泽东作出了一个重要判断：总支书记、厂矿党委书记、市委书记、市委市府所属各机关负责人和党组书记、中央一级的司局长同志们，我们对于这些话，切忌不可过分相信。他们中的很多人几乎完全脱离群众，独断专行。上面的指示不合他们胃口的，他们即阳奉阴违，或者简直置之不理。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仅仅相信他们自己，不相信群众，根本无所谓群众路线。

毛泽东说的这些干部，大体上相当于地、县两级。

一九五九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对《陶铸同志关于五级干部会议的报告》的批示：

有些地方不是这样，他们怕鬼，不敢将郑州要点立刻一杆子通到生产队，生产小组和全民中去。他们无穷忧虑，怕天下大乱，不可收台。

这三条办法好。群众一到，魔鬼顿消。本来没有鬼，只是在一些同志的大脑皮层里感觉有鬼，这个鬼的名字叫“怕群众”。

牢骚也罢，反动言论也罢，放出来就好。牢骚是一定要人家发的，当然发者无罪。反动言论放出来后，他们会立刻感觉孤立，他们自己会做批判。不批判也不要紧，群众的眼睛中已经照下了他们的丑像，跑不掉了；也可以实行言者无罪这一条规律。现在是一九五九年了，不是一九五七年了。

旧账不算这句话，是写到郑州讲话去了的，不对。应改做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对群众不能怨气。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无一利。一个公社竟可以将原高级社的现金收入四百多万元退还原主，为什么别的社不可以退还呢？不要“善财难舍”。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准备提交八届七中全会讨论通过。

会议对一九五九年的国民计划的指标也进行了调整对外，钢的计划指标 1800 万吨，但内部提要好钢 1650 万吨。毛泽东认为指标仍然偏高，委托陈云进一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八届七中全会。

会前，毛泽东谈及自己和彭德怀的关系，对李井泉、柯庆施、黄克诚等人说过这样一番话：“我这个人是被很多人恨的，特别是彭德怀同志，他是恨死我的了，（转脸对柯庆施说，彭德怀是恨死我了，估计也恨死你了）不恨死了，也有若干恨。我和彭德怀同志的关系是这样的：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黄克诚《我的回忆》，柯六六《怀念我的父亲》，李锐《回忆毛泽东》，李井泉《晚年书怀》中均有）黄克诚事后没有对彭德怀说起此事，倒是

告诉了周小舟等人。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对湖北省委报告麻城经验的批语：

算账才能团结，算账才能帮助干部从贪污浪费的海洋中拨出身来，一身干净；算账才能教会干部学会经营管理方法；算账才能教会五亿农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公社，监督公社的各级干部只许办好事，不许办坏事，实现群众的监督，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

一九五九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一个批语中指出：

要“彻底解决三月会议没有彻底解决的权力下放、算清账目、包产指标三个问题，”

“县、社要向生产队算清过去几个月大调大抓的帐，解决大集体与小集体间的矛盾，这当然是要解决的。还有一个必须随着解决的矛盾，生产队干部与生产小队、全体社员群众间的矛盾，小集体与社员的矛盾等，”

并指出，“这是一个以贪污形式无偿占有别人劳动的问题，是一个普遍的问题，也是一个历史的问题，”

“没有省的决心，县的直接领导，我看是不能解决的。”

一九五九年四月五日，毛泽东在八届七中全会上的讲话

党的总路线，大家都赞成。去年政治上的主要标志是总路线的制定，但是还不能达到预期的效果，这是工作方法问题。

我们要实现总路线，必须有好的工作方法，没有好的工作方法，我们的总路线是不能完全贯彻的。有了总路线，还必须要有好的工作方法，才能实现多快好省、几个并举的方针。所谓方法，无非是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互相结合的，思想方法不对头，工作方法也就不对头。现在中心问题是工作方法问题。

一、多谋善断。

二、留有余地。

波浪式前进。

四、实事求是。

五、要善于观察形势。

六、要当机立断。

七、与人通气。

解除封锁。

九、一个人有时胜过多数，因为真理往往在他一个人手里。

十、要历史地观察问题。

十一、凡是看不懂的文件禁止拿出来。

十二、权要集中。

十三、要解放思想。

十四、关于批评。

十五、集体领导。

十六、和各部门的联系，特别是和工业部门的联系要加强。

这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等省委关于清算账目等问题的四个文件，据反映，经济手续不清的干部，约占全体干部的 40%左右，贪污多占款额平均每人少的 36 元，多的 120 元。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党内通讯》

我想和同志们商量几个问题，都是关于农业的。

第一个问题，包产问题。

第二个问题，密植问题。

第三个问题，节约粮食问题。

第四个问题，扩种面积要多的问题。

第五个问题，机械化问题。

第六个问题，讲真话问题。

我们办农业、工业的经验还很不足，一年、二年积累经验，再过十年，客观

必然性可能逐步被我们认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就自由了。什么叫自由？自由是必然的认识。

同现在流行的一些高调比较起来，我在这里唱的是低调，目的在于真正调动积极性，达到增产的目的，如果事实不是我讲的那样低，而达到了较高的目的，我变为保守主义者，那就谢天谢地，不胜光荣之至。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研究钢铁及整个工业生产建设问题。会后，财经小组反复研究，确定当年钢材的可靠指标为 900 万吨，钢的生产指标为 1300 万吨。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日，毛泽东批发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昌黎工作组副组长王绍飞写的《河北省昌黎县最近工作情况及问题》。

王绍飞反映，农民出勤率提高，干劲不大。产生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是：对秋后能否落实按劳分配政策表示怀疑；生产指标脱离实际太远，伤害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紧张，难以支持劳动；管理区和生产队的关系尚未理顺。严重的问题是生产计划虚假和粮食问题。

毛泽东批示：河北省昌黎县的情况和他们所提出的意见，是有普遍性的，各地各级党委都应注意解决，越快越好。

一九五九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北、河北、广东三个省委关于人民公社和农村情况的报告。

三个报告一致反映：粮食问题是当前农村最严重的问题。

湖北省从旧历年到四月底，闹粮之风此起彼伏，全省有 170 万人的重灾区，春荒相当严重，武汉市曾一度处于供应紧张的情况。

河北省有 30 多个县缺粮，严重的 10 个县。

广东省夏收前，情况将仍然是紧张的。崖县、南雄、罗定、钦县等地，据不完全统计，已经饿肿 10930 人，其中已死 134 人。

造成粮食紧张的主要原因，是对增收幅度估计过高，产量数字水分过大；再加 1958 年秋收没有搞好，以及一度长放开肚皮多吃。

一九五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人民公社夏收分配的指示》指示规定，实行少扣多分的原则；分配给社员的部分，应当占收入的 60%左右，并且使 90%以上的社员收入有所增加；力求做到工资部分占 60——70%左右，供

给部分占 30——40%左右；无力实行供给的地方，继续按照高级社的办法对“五保户”实行“五保”，对困难户实行定额的粮食补助；认真整顿公共食堂。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五日，毛泽东召集少数中央领导同志参加的会议，讨论工业、农业和市场问题。

毛泽东说：一些指标定得那么高，工业也好，也好，指标都是我们同意了，都有一部分主观主义，对客观必然性不认识。讲了多少年有计划按比例发展，就是不注意，就是不讲综合平衡。工业各部门的联系，工业与农业的联系，重、轻、农的联系，都没有顾到。明年的指标切不可定高。今后七个月，主要是搞综合平衡。

周恩来说，我们在工业布局上的毛病是生产资料的指标定高了，把生活资料的指标提高一些，比较有利。

贰、本节简论

（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份，农业上的生产“卫星”开始放了，接着是钢铁“卫星”、煤炭“卫星”也陆续出现了，大跃进形成高潮，浮夸风也到处泛滥。

一九五八年八月的北戴河会议作出一项对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举世瞩目的决定，这就是一九五八年钢产量一千零七十万吨，比一九五七年翻一番。会议通过的关于一九五九年计划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决定，公布了若干项主要产品的计划指标，其中有：一九五九年粮食产量达到八千亿到一万亿斤，钢产量达到二千七百万吨，争取三千万吨。一九六〇年，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三千亿斤左右，钢产量达到五千万吨左右。到一九六二年完成“二五”计划时，粮食产量达到一万五千亿斤或者更多一些，钢产量达到八千万吨至一亿吨。

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在全国各地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在各级领导干部带领下，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成为“大跃进”中最突出、最显眼的举动。

在“大跃进”中，广大干部和群众以前所未有的劳动热情，战天斗地，昼夜苦干，在许多战线上取得新的成绩。一九五八年的粮食产量达到四千亿斤，比一

九五七年增长百分之二点五；棉花产量三千九百三十八万担，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钢产量(除去土钢)八百万吨，增产百分之四十九点一；其他一些基础工业也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从一九五七年冬开始持续几年的大规模水利建设，特别是兴修了一大批大中型水库，对我国农业的发展和旱涝灾害的防治起了重大作用，它的效益至今还在继续发挥。

由于一九五八年定的钢指标过高，不得不大搞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几千万人上山大炼钢铁，给生产建设带来一系列问题。农业生产中争相“放卫星”，滋长起来了浮夸风；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大搞一平、二调、三收款，滋长起来了共产风。

就大跃进运动来说，毛主席犯的错误，就是同意了一九五八年完成钢的生产指标 1070 吨。

一九五九年七月，王鹤寿在庐山会议上说：“开始我们计划一九五八年搞 800 万吨。后来我们看到各省很积极。各省干起来啦，感到有办法，就是搞小土群，认为搞土铁没有问题，能上得去，炼钢搞小转炉。所以，后来主席问我时，我说行，上得去。因为我当时确实认为能够上得去。这个事情由我负责。我还找到林铁同志说，华东能搞 600 万吨，你华北条件好，更应多搞点。我确是认为行，并不是认为不行，有意说行。主席对这事很慎重，曾经几次问我。这事主要是我们缺乏经验，对问题估计不足，反映情况有片面性，应由我们负责。”（李锐《庐山会议实录》第 174 页）

与一些人共事也太难了！接受他们的意见定下来的指标，最后没有完成，他们反倒说：毛泽东“把根本改变中国的贫困面貌看得太简单了”，“把‘一穷二白’看成是我国优点的片面观点”，“只反右不反‘左’”，“搬用革命斗争中大搞群众运动的方法来指导经济建设”，“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未能摆脱传统观念的束缚”，“偏离了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形成的调查研究传统”，“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等等。

就人民公社化运动来说，毛主席犯的错误就是对“两个过渡”的时间估计还是短促了。但关于建立人民公社中产生的缺点、错误，首先也是由毛主席发现的。

（二）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的第一次郑州会议，是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全党纠正“左”倾错误的开端。

这时，通过调查发现，有的地方、有的人否认人民公社有必要发展商品生产、实行按劳分配。毛主席提倡学习斯大林的《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在武昌举行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是第一次郑州会议的继续。

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今后一段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企图在条件不成熟的时候勉强进入共产主义，这无疑是一个不能成功的空想。”

经过武昌会议和八届六中全会，对于破除资产阶级权利的思想问题，有了进一步认识，强调不能过早地否定按劳分配原则，工资等级等等还不能破。但在实行按劳分配的具体形式上，党内思想仍不统一。决议只批评了两个急于过渡的思想倾向，仍然没有解决人民公社的根本问题。

八届六中全会仍然表现了要求过急、过高的“左”的思想倾向。例如全会通过的 1959 年计划，规定钢产为 1800—2000 万吨，虽然比北戴河会议减少了 900—1000 万吨，但仍然太高；粮食产量指标仍为 10500 亿斤，并未比北戴河会议规定的减少。

（三）

一九五九年二、三月举行的第二次郑州会议，中心就是要解决一个所有制的问题，即人民公社内部的所有制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

毛主席尖锐地指出：

我们对农村人民公社所有制的认识和我们所采取的政策，即现在有许多人还不认识公社所有制必须有一个发展过程，在公社内，由队的小集体所有制到社的大集体所有制，需要一个过程，这个过程要有几年时间才能完成。他们误认人民公社一成立，各生产队的生产资料、人力、产品，就都可以由公社领导机关直接支配。他们误认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误认按劳分配为按需分配；误认集体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他们在许多地方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因此，他们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的某些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方面，也把许多农村中的贷款一律收回。公社在 1958 年秋季成立之后，刮起了一阵“共产风”。主要内容有三条：一是穷富拉平，二是积累太多，义务劳动太多，三是“共”各种“产”。

要提高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改善政府与农民的关系，必须从改变所有制着手。现在一平、二调、三提款，否定按劳分配，否定等价交换。现在就是一平、二调、三提款，提起就走，一张条子要啥调啥，不给钱是起破坏作用。忽然一股风，一平、二调、三提款，破坏经济秩序，许多产品归社不归队。这几个月许多地方实际上破坏了价值法则。凡是瞒产私分者，一定都是一平、二调、三提款。农民从十月以来，发生大恐慌，怕共产，从桌、椅、板凳开始，还有个工业抗旱，破钢烂铁，无代价献宝。

六中全会公社决议的一套制度，二个半月来根本没有实行。为什么六中全会的决议没有阻止这股风的发展？是不是只有冀、鲁、豫三省？是不是南方各省道德特别高尚，马克思主义多？我就不相信。

问题不这样提，共产风会继续发展。不解决这个问题，大跃进就没有了。我这篇话不讲，就不足以掀起议论。我们主要反对平均主义，过分集中思想，这实际上是“左”倾冒险主义。

共产主义没有饭吃，天天搞共产，实际是“抢产”，向富队共产。旧社会谓之贼，红帮为抢，青帮叫偷，对下面不要去讲抢，抢和偷科学名词叫做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地主叫超经济剥削，资本家叫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价值。我们不是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吗？富队里有富人，吃饭不要钱就侵占了一部分，这个问题要想办法解决，一平、二调、三收款，就是根本否定价值法则和等价交换，是不能持久的。

土地属谁所有，劳动力属谁所有，产品就属谁所有。要承认三级所有制，重点是生产队所有制。所有人、土、财都在生产队，五亿农民都在生产队，上面只有几个工作人员。如不承认所有制，就立即破坏。

我代表一千万队长级干部，五亿农民说话，坚持搞右倾机会主义，贯彻到底，你们不跟我来贯彻，我一人贯彻，直到开除党籍，也要到马克思那里告状。

严格按照价值法则，等价交换办事。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几万万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

三级所有制，改变为基本公社所有制部分队所有制，要有一个过程，还要三、五、七年。

(四)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一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检查了八届六中全会以来人民公社的整顿工作讨论了公社整顿中提出来的若干问题，并对人民公社管理体制问题作了若干原则规定。这次会议产生的《关于人民公社的 18 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一九五九年四月二日至五日，中共中央举行八届七中全会。

全会讨论通过了《1959 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确定钢产量为 1800 万吨，其中好钢为 1650 万吨。毛主席仍嫌偏高，委托陈云继续落实。

会议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

纪要规定：人民公社的三级管理、三级核算，是以相当于原来高级农业合作社的单位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生产队下面的生产小队是包产单位，也应当有部分的所有制和管理权限。要认真清理人民公社成立以来的各种帐目，各级无偿征调下级单位或社员私人的财物，必须如数归还或作价归还。要改善人民公社实行的工资制度，人民公社计算劳动报酬的原则是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实行供给制、办公共食堂是符合农民群众要求的，必须坚持下去。

一九五九年六月十二日到十三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两天的会议上讲了两次话，并多次插话。表明他对去年工作中的错误考虑得比较多，并且作了坦率的自我批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讲到第一次抓工业像秋收起义时那样，头一仗打了败仗。他详细地讲到他在秋收起义时在田里躲了一夜，第二天还不敢到处走动，因为四面都有地主的“民团”，第三天才找到了起义队伍。他说，当时非常狼狈。因为从来没有带过队伍打仗，没有经验。抓工业也没有经验，第一仗也是败仗。

从郑州会议到武昌会议到上海会议，毛泽东曾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但像这次会议上这样的自我批评还是第一次。两天会议开下来，大家心情都比较舒畅，而且开始有一种感觉，认为毛主席已经做了这样的自我批评，我们自己也得承担自己那一部分的责任，周恩来和李富春发言时就有这样的表示。

2011 年 5 月 16 日修改

第四节 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保卫三面红旗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九年七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第一阶段——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讨论的十九个问题

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开始，到这次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前，毛泽东领导全党纠正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已经八个月了。已经取得了显著成绩，各项工作正在逐步落实。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回到韶山

他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别梦依稀咒逝川，

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

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

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

遍地英雄下夕烟。

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九日下午，毛泽东在武昌他乘坐的轮船上，召集各协作区主任开了个小会，有柯庆施、李井泉、王任重、张德生、欧阳钦、林铁等。他们准备一起从武昌动身，上庐山开会。毛泽东是前一天夜里从长沙到武昌的。

在会上，毛泽东提出庐山会议准备讨论的题目，共十四个：（一）读书。高干读《政治经济学》，地县自编《好人好事》、《坏人坏事》和《党的政策》三本。（二）形势。好转没有？何时好转？（三）今年的工作任务。（四）明年的工作任务。（五）四年的任务（五年计划的框子）。（六）当前的宣传问题。（七）食堂问题。（八）综合平衡。（九）工业、农副业中的群众路线。（十）国际形势。（十一）生产小队的半核算单位问题。（十二）基层党团组织领导作用问题。（十三）粮食三定政策。（十四）如何过日子？

一九五九年七月一日，毛泽东《登庐山》

一山飞峙大江边，
跃上葱茏四百旋。
冷眼向洋看世界，
热风吹雨洒江天。
云横九派浮黄鹤，
浪下三吴起白烟。
陶令不知何处去，
桃花源里可耕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下午，毛泽东召集部分中央领导人和各协作区主任开会，在三天前提出的十四个问题以外，又增加了五个，即：（一）团结问题（中央至县委）；（二）农村初级市场的恢复问题；（三）体制问题，即收回财权、人权、工权、商权，由中央和省市两级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四）协作关系问题；（五）加强工业管理和提高产品质量问题。关于会议的开法，决定采取先分后合的办法，先开几天分组座谈会，讨论十九个问题，然后再用两三天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必要的文件。

毛泽东在六月二十九日和七月二日两次会议上的讲话，被整理成一个讲话记录，变成十八个问题（略去了“国际问题”）。这些问题，是毛泽东这一个时期以来，经过调查研究，认真思考，并同大家交换意见后提出来的，大都是“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以来暴露出来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问题。提出这些问题，主要是为了总结经验，在党的高层会议上从容地加以讨论，得出一致的认识，继续纠正“左”的错误。

第一个问题，读书。

“中央、省、市、地委一级委员，包括县委书记，要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时间三至六个月，或者一年。”“县、社党委成员能读政治经济学的也可以读。”

第二个问题，形势问题。

实际上是：有伟大的成绩，有不少的问题，前途是光明的。基本问题是：（一）综合平衡；（二）群众路线；（三）统一领导；（四）注意质量。四个问题中最基本的

是综合平衡和群众路线。去年大跃进、大丰收，今年是大春荒。现在形势在好转，“在大跃进形势中，包含着某些错误，某些消极因素。现在虽然存在一些问题，但是包含着有益的积极因素。去年形势本来很好，但是带有一些盲目性，只想好的方面，没有想到困难。现在形势又好转了，盲目性少了，大家认识了。”

第三个问题，今年任务，

第四个问题，明年任务，

第五个问题，四年任务，

“今年钢的产量是否定一千三百万吨?能超过就超过，不能超过就算了。去年做了一件蠢事，就是要把好几年的指标在一年内达到，像粮食的指标一万零五百亿斤，恐怕要到一九六四年才能达到。”

“过去安排是重、轻、农，这个次序要反一下，现在是否提农、轻、重?要把农、轻、重的关系研究一下。

著名的“农、轻、重”思想，就是这一次提出来的。以后又提出“以农业为基础”的口号。农业在中国国民经济中占有极端重要的地位，这一点，就全党来说，是经过反复实践而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

第六个问题，宣传问题。

“去年有些虚夸，四大指标定高了，弄得今年不好宣传，现在有些被动。”

第七个问题，综合平衡问题。

“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主要缺点是没有搞平衡。说了两条腿走路、并举，实际上还是没有兼顾。在整个经济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有了综合平衡，才能有群众路线。”“有三种平衡：农业内部农、林、牧、副、渔的平衡；工业内部各个部门、各个环节的平衡；工业和农业的平衡。整个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是在这些基础上的综合平衡。”

第八个问题，群众路线问题。

“群众路线有没有?有多少?”

第九个问题，工业管理问题。

“特别要强调质量问题，能否在很短时间内解决?应该争取在一二年内解决。”

第十个问题，体制问题。

“‘四权’下放多了一些，快了一些，造成混乱，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要强调一下统一领导、集权问题。下放的权力，要适当收回，收回来归中央、省市两级。对下放要适当控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不是说现在是完全无政府主义，而是说有些半无政府主义。说得过死不好，过活也不好。现在看来，不可过活。”

第十一个问题，协作关系。

“划区协作，倒把原来的协作关系打乱了，搞了大的，挤了小的。搞体系，工厂要综合发展，公社要工业化。”

第十二个问题，公共食堂。

“要积极办好。按人定量，分粮到户，自愿参加，节余归己。吃饭基本上要钱。”

第十三个问题，学会过日子。

“包括农村、城市，要留有余地，富日子当穷日子过，增产节约。”

第十四个问题，三定政策。

“定产、定购、定销，群众要求恢复，看来是非恢复不可。政策三年不变，定多少，这次会议要定一下。增产部分四六开，征四留六，有灾照减。自留地不征税。”

第十五个问题，恢复农村初级市场。

第十六个问题，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四川省的同志说，生产、分配在一个核算单位较好，现在改，影响生产，如何办？”

第十七个问题，农村党的基层组织领导作用问题。

“基层党的活动削弱了，党不管党，只管行政。”

第十八个问题，团结问题。

“要统一思想，对去年的估计是：有伟大成绩，有不少问题，前途是光明的。缺点只是一、二、三个指头的问题。许多问题是要经过较长的时间才看得出来的。过去一段时间的积极性中带有一定的盲目性。这样看问题，就能鼓起积极性来。”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开始。

当天夜里，毛泽东把十八个问题重新修改一遍，要杨尚昆印发会议，并将原发件收回。

这十八个问题，归结起来，是三大问题：怎样看待形势？前段工作中经验教训有哪些？今后怎么办？这些都是带根本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在与会者中间，看法并不那么一致。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开始，按协作区分成六个组进行讨论。大家一致同意“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议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形势问题、农业特别是粮食问题、综合平衡问题等。小组讨论中，出现了一些不同的意见。比如，有人建议不提“以钢为纲”，还是提有计划按比例；有人则不同意，仍然主张“以钢为纲”。又比如，有人主张不提“大搞群众运动”，有些人认为否定大搞群众运动的看法是不对的，等等。这些，都属于正常范围内的讨论。朱德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个比较尖锐的意见，“食堂即使全部都垮了，也不一定是坏事”显然与毛泽东说的“积极办好，不要一哄而散”的意见不同，但也没有引起多么大的反应。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凌晨一时，毛泽东在入睡前批阅了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为中央起草的关于在大中城市郊区发展副食品生产的指示稿。修改这个指示稿时，毛泽东加写了两段话。其中一段，体现了“大农业”综合发展的思想：“所谓农者，指的是农林牧副渔五业综合平衡。蔬菜是农，猪牛羊鸡鸭鹅兔等是牧，水产是渔，畜类禽类要吃饱，才能长起来，于是需要生产大量精粗两类饲料，这又是农业，牧放牲口需要林地、草地，又要注重林业、草业。由此观之，为了副食品，农林牧副渔五大业都牵动了，互相联系，缺一不可。”

一九五八年七月四日，毛泽东要杨尚昆把两份材料印发会议，都是中宣部《宣教动态》上登的。

一份，题为《几篇论述大跃进经验教训的文章》，摘要介绍了山西、广东、北京等省市理论刊物发表的四篇文章。有的文章谈到“大跃进”中出现了某种社会分工和协作关系被打乱的情况，各地不应强调建立自己的一套工业体系，不能片面强调人人都当“多面手”；有的文章指出，不能把钢铁生产强调到无限制的程度；有的文章对一些工业部门制定生产计划的做法，提出意见。

另一份是《对我国几年来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忽高忽低的一种分析》。文章认为，最近两年，国家积累中固定资产和流动资产的比例关系失调。国家储备有逐渐减少的趋势。原料工业资源多用于基本建设，用于工业生产的比重在下降。

这些，都是为了总结经验，对“大跃进”中出现的问题提出的批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晨六时，毛泽东写了一个长篇批语，并亲自拟题《粮食问题》，向与会者推荐粮食部副部长陈国栋关于一九五九至一九六〇年度粮食分配和粮食收支计划调整意见的报告。

毛泽东充分肯定了这个报告，说：“陈国栋同志的报告是一个重要文件。请各大区区长主持讨论，细致地讨论，讨论两次至三次。我基本上同意这个文件所述的意见。”他又提出五点补充意见：“

(一)假定今年年成比去年确实好的情况之下，征购一千一百亿斤，力争办到，这是变被动为主动的第一着。今年年成如果在秋收以后确实较去年好、确实证明无妄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征购到这个数目字呢？

(二)下年度销售计划，我感觉不但一千零二十亿斤是太多了，这个文件上调整为八百五十五亿斤，似乎也略为多了一点。是否可以调整为八百亿斤，或者八百一十、二十亿斤呢？告诉农民，恢复糠菜半年粮，可不可以呢？苦一年、两年、三年，就翻过身来了。多储备，少食用，以人定量，粮食归户，食堂吃饭，节余归己，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有稀有干，粮菜混吃，仍然可以吃饱吃好，可不可以这样做呢？

(三)多产粮，是上策。田头地角，零星土地，谁种谁收，不征不购，主要为了解决饲料，部分为了人用。恢复私人菜园，一定要酌给自留地。凡此种种，可以多收。既已多收，可以多吃(主要猪吃，部分人吃，例如菜)。

(四)好好地精细地安排过日子。是否可以按照一九五七年的实际产量安排过日子呢？一九五七年的日子不是过得还不错吗？这样做，农民的粮食储备就可以增得较多了。手里有粮，心里不慌，脚踏实地，喜气洋洋。

(五)在今年秋收确实知道粮食比去年增产的情况之下，一定要划出牲口饲料、猪饲料两种，一定要比过去多些，是否可以有人粮的一半？人粮一斤，饲料半斤。各地情况不同，势必有多有少，但一定要下决心注意这个问题。除灾地外，饲料一定要比过去多些。增加饲料，极为有利。牲口是动力。一部分牲口是肉食奶食(老牛、菜牛、奶牛)。粪可肥田。皮、毛、骨、角，大有用处。吃肉多，吃粮少，动物蛋白优于植物蛋白，人的体格会更发展，会更健康。猪是肉食，又有肥料。在三、五、七年以内，力争做到一亩田一头猪。一头猪就是一个小型有机

化肥工厂。肥料的主要出路是猪，是一亩田一头猪。”

一九五八年七月五日到十日，毛泽东还批示印发了一些会议文件。如：总政治部秘书处编印的《政治工作简报》中关于少数营团干部对经济生活紧张有抵触情绪的材料，中央统战部收集整理的关于国家机关党外人士对国内经济情况看法的材料，河南省委关于农村人民公社整社算账工作的报告，农业部党组关于冬种准备会议情况的报告，河南省委关于公共食堂优越性和改进公共食堂的报告，等等。对这些材料，毛泽东都没有加评论。

一九五八年七月八日上午，周恩来召集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康生、陈伯达、陆定一、胡乔木等开会，商量为会议准备文件的问题，并且确定这次会议以尽快结束为好，而最后的文件，也应以讨论成熟了的问题才作决定为原则，不宜太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下午，毛泽东召集会议并作长篇讲话。

“对形势的认识不一致，就不能团结。要党内团结，首先要思想统一。

“党内要团结，就要把问题搞清楚。有人说总路线根本不对。所谓总路线，无非是多快好省，多快好省不会错。多快是一条腿，好省又是一条腿。”

“人民公社叫大合作社，或者说基本上还是高级合作社，就没有问题了。问题就是把公社看得太高了。

“从局部来讲，从一个问题说，可能是十个指头，九个指头，七个指头，或者三个指头、两个指头。但从全局来说，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

“所以还是那几句话：成绩是伟大的。问题是不不少的，前途是光明的。对这样的形势分析，是关系全党、全民的问题。有无信心，这也是这次会议的重要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日，毛泽东指定杨尚昆、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组成了一个起草小组，负责起草《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

以后的几天里，各组讨论与起草文件同时进行，但文件起草工作进展并不理想。十三日清晨五时，毛泽东写信给杨尚昆，希望加快文件的起草进度。他建议起草小组从五人增加到十一人（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笏、李锐、曾希圣、周小舟六人），并对起草工作提出具体安排：“七月十三、十四即今、明两天议事。十四夜印出交我及各组同志每人一份。十五日下午到我处开大区区长会议，

议修改意见，修改第一次，夜付印。十六日印交所有同志阅读，会谈，修改缺点。”并叮嘱他们：“你们在几天内一定要做苦工，不可开神仙会。全文不超过五千字。”很显然，毛泽东是想尽快把《庐山会议诸问题的议定纪录》搞出来，以利于统一大家的认识，并早一点结束这次会议。

毛泽东当时向会议批示印发的文件不多，他利用晚上找人谈话。

七月十一日晚，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毛泽东主要讲了四点：（一）综合平衡，非常必要，过去计委对此搞得不好。（二）会议不应有什么压力，什么问题都可以谈。（三）去年（农业）估产过高。（这时周小舟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四）谈到蒋干的故事，说曹营的事情不好办。还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

谈话的气氛，轻松活泼，无所拘束。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议定纪录》写出第一稿，并印发会议，总的精神还是纠“左”。

第二阶段——毛泽东回答彭德怀给他的信

彭德怀一直在西北组，几乎每天都发言，对“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提出批评，如头脑发热，得意忘形；“左”的东西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不是党委决定而是个人决定。还直接谈到毛泽东的责任问题。他始终对会议的气氛感觉不满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彭德怀的信的主要内容是：

首先肯定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的成绩，肯定农村公社化“具有伟大意义”，即使全民炼钢，也是“有失有得的”。

彭德怀的信着重讲的是如何总结经验教训的问题。他说：“现时我们在建设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他认为，出现一些缺点错误，从客观因素来说，是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

随后，彭德怀从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上分析暴露出来的问题。他认为主要是：

第一，“浮夸风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楚形势真相。”第二，“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一九五八年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样。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入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彭德怀在列举一些“左”的具体表现后指出：“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

毛泽东从会议的讨论和看到的材料中已经感到，在对形势的估计和存在问题的看法上，党内高级干部中间有相当多的不同意见，有些意见还很尖锐。特别是彭德怀的信对他触动很大。

一九五九年七月十六日，毛泽东提出，要参加庐山会议的一部分人员重新编组，并请在北京的彭真、陈毅、黄克诚、安子文，若干部长，国家经委、计委、建委等三个委员会的若干副主任，赶来庐山参加会议，而且会议要再开一周。

对于彭德怀的信，毛泽东没有表态，小组讨论中，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很快就表现出来。不少人赞成，认为彭德怀的精神值得学习，赤胆忠心。信中提出的缺点错误，实际是存在的，提出来有好处，只是有些问题的提法和分寸需要斟酌。也有不少人提出批评，主要集中在这几个观点上：“由于比例失调引起各方面的紧张，是具有政治性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失有得”、“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浮夸风吹遍各地区各部门”、“纠‘左’比纠右难”等。有的人说，彭德怀的信，不在个别措辞用字不当，而在于总的看法上有

问题。还有人提出，彭德怀曾说过：“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可能要请苏联红军来。”

与此同时，围绕《议定纪录》关于成绩和缺点的估计问题，也展开了争论。一些人认为，《纪录》对成绩估计不够，讲成绩很抽象，讲缺点很具体。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意见，在小组会上对七月十四日的信做了解释。大意是：意见书是仓促写成，提供主席参考的，文字上难免有不正确的地方。对总路线的正确性他是一点也不怀疑的，大家不要误会他认为我们的党是小资产阶级的党，他是就过去一个时期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的来源提出这个问题的。关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他说：去年下半年，党内一些“左”的倾向确实有所发展，如：浮夸风气的滋长，以热情代替科学，一下子全国吃饭不要钱，有的地方几天内便拆了很多房子，三五天内要消灭文盲，等等。这些“左”的倾向的滋长，是有其社会原因的，这就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至三时半，杨尚昆向毛泽东汇报各组讨论的情况时，毛泽东讲了四点意见：一、欠债是要还的，不能出了错误，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错误，每个人都有责任，首先是我。二、缺点还没有完全改正，现在腰杆子还不硬，这是事实。不要回避这些事情，要实事求是。三、有些气就是要泄，浮夸风、瞎指挥、贪多贪大这些气就是要泄。四、准备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愿意承认错误，也不愿意听别人讲他错误的人谈一谈，让他们多听取各方面的意见。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三个小时的长篇发言，在肯定成绩是伟大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以后，系统论列了“大跃进”以来的缺点和错误，并从理论上进行了分析。对彭德怀的信是肯定的，对其中一些受到非议的观点进行了辩护。张闻天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特别注意。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找几个人谈话。

柯庆施说，现在很需要毛主席出来讲话，顶住这股风，不然队伍就散了。他认为，彭德怀的信是对着总路线，对着毛主席的。

当天晚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周恩来商量准备第二天开大会。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

我感觉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触不得，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有部分同志感

到有压力，即是不愿人家讲坏话，只愿人家讲好话，不愿听坏话。我劝这些同志要听。

现在党内外夹攻我们。右派讲：秦始皇为什么倒台？就是因为修长城。现在我们修天安门，要垮台了，这是右派讲的。

说我们脱离了群众，其实群众还是拥护我们的。我看困难是暂时的，就是三个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有那么一点，但是并不那么多。我同意同志们的意见。问题是公社运动，搞共产主义，这股热情，怎么看法？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我看不能那么说，要想多一点，无非是想多一点。这种广泛的群众运动，不能泼冷水，只能劝说，同志们，你们的心是好的，事情难以办到，不能性急，要有步骤。这些干部率领几亿人民，他们要求办公社，办食堂，搞大协作，非常积极。他们愿搞，你能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吗？这不是小资产阶级，是贫农、下中农、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三亿五千万人在一个时期有狂热性，他们要搞。到春节前后有两个多月，他们不高兴了，变了，干部下乡都不讲话了，请吃红薯、稀饭，面无表情，这叫刮“共产风”，但也要有分析，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什么人？“共产风”主要是县社两级干部，特别是公社一部分干部，刮生产队和小队的，这是不好的。群众不欢迎，坚决纠正，说服他们，用一个月的功夫，三、四月间把风压下去，该退的退，社与队的账清了。这一个月算账教育是有好处的，极短的时间使他懂得平均主义不行，“一平二调三提款”是不行的。听说现在大多数人转过来了，只有一部分人还留恋“共产风”还舍不得。哪里找这样一个大学校，短期训练班，使几亿人几百万干部受到教育。为什么一个多月就熄下这股风呢？证明我们的党是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不仅有历史材料为证。三、四月份和五月有几百万干部和几亿农民受到教育，讲清了，他们想通了。

我们不晓得作了多少次检查了。从去年郑州会议以来，大作特作，有六级会议，五级会议，都要检查，我们检讨多次，你们就没有听到。有些人不会放弃他们的观点，无非拖着么！一年、二年、三年、五年，听不得怪话不行，要养成习惯。我说就是硬着头皮顶住呵！无非是骂祖宗三代。这也难，我少年、中学时代，也是一听到坏话就一肚子气，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人先犯我，我后犯人，这个原则，现在也不放弃。

第二方面，我劝另外一部分同志，在这样的紧急关头，不要动摇，据我观

察，有一部分同志是动摇的。他们也说大跃进、总路线、人民公社都是正确的，但要看讲话的思想方面站在那一边？向那方面讲，这部分人是第二种人，“基本正确，部分不正确”的这一类人，但有些动摇。有些人在关键时就是动摇的，在历次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决的。历史上有四条路线，陈独秀路线、立三路线、王明路线、高饶路线，现在又是一条总路线。站不稳，扭秧歌。（国民党说我们是秧歌王朝）。他们忧心如焚，想把国家搞好，这是好的。这叫什么阶级呢？资产阶级还是小资产阶级？我现在不讲。在南宁会议，成都会议，党代大会讲过，1956年、1957年的动摇，不戴高帽子，讲成思想方法问题。如果讲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反过来讲，那时的反冒进，就是资产阶级的冷冷清清，惨惨戚戚的泄气性，悲观性。我们不戴高帽子，因为这些同志和右派不同，他们也搞社会主义，只不过是没经验，一有风吹草动就站不住脚，就反冒进。那次反冒进的人这次站住脚了。如××同志劲很大，受过那次教训，相信陈云同志也会站住脚的。恰恰是那次批判××同志的，他们那一部分人这次取他们的地位而代之。不讲冒进了，可是有反冒进的味道。比如说：“有失有得”。“得”放往后面是经过斟酌了的，如果戴高帽子，这是资产阶级动摇性，或降一等是小资产阶级动摇性。因为右的性质，往往受资产阶级的影响，在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压力下右起来了。

假如办十件事，九件是坏的，都登在报刊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走，我就找红军去。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

我劝一部分同志讲话的方向要注意。讲话的内容基本正确，部分不妥。要别人坚定，首先自己坚定，要别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动摇。这又是一次教训。这些同志据我看不是右派是中间派，不是左派（不加引号的左派）。重复 56 年下半年、57 年犯错误同志的道路。他们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抛到右派边缘去了，距右派还有 30 公里。因为右派很欢迎这个论调，现在有些同志的论调，右派不欢迎才怪。这种同志采取边缘政策，相当危险，不相信，将来看。这些话是在大庭广众当中讲的，有些伤人，现在不讲，对这些同志不利。

我出的题目中加一个题目，团结问题。还是单独写一段，拿着团结的旗帜，人民的团结，民族的团结，党的团结。我不讲对这些同志是有益是有害？有害，还是要讲。我为什么现在不硬着头皮顶了呢？顶了廿多天，快散会了，索性开到

月底。

食堂问题，食堂是个好东西，未可厚非，我赞成积极办好。自愿参加，粮食到户，节约归己。我看在全国保持 1 / 3 我就满意了。现在散掉一半左右有好处。总司令，我赞同你的说法，但又和你的说法有区别。不可不散，不可全散。我是个中间派。食堂可以多一点，再试试看，试它一年、二年，估计可以办成。人民公社会不会垮台？现在没有垮一个，准备垮一半、垮七分，还有三分，要垮就垮，办得不好，一定要垮，共产党就是要办好，办好公社，办好一切事业，办好工业、农业、商业、交通运输，文化教育。

许多事情根本料不到，现在计划机关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计划。一个时期不管综合平衡。名曰计划指示，等于不要计划。所谓不管计划，就是不要综合平衡，这点我没料到。我和××总理根本没有管。不知可说也。我不是开脱也是开脱，因为我不是计委主任。去年八月以前，主要精力放在革命方面，对建设根本外行，对工业计划一点不懂，在西楼（中南海西楼）时曾经说过不要写英明领导，管都没管，还说什么英明。但是，同志们，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主要责任在我身上。过去责任在别人××，××，现在应该说我，实在有一大堆事没管。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无后乎（一个儿子打死了，一个儿子发了疯）。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我今天要闯祸，两种人都不高兴我，一种是触不得，一种是方向有点问题。不赞成，你们就驳，说主席不能驳，我看不对，事实上纷纷在驳，不过不指名。江西党校，中央党校一些意见就是驳。

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一个是一〇七〇万吨钢。一〇七〇万吨钢是我建议，我下的决心。其结果是九千万人上阵，×××人民币，“得不偿失”。其次是人民公社，人民公社我无发明之权，有建议之权。北戴河决议是我建议写的，当时嵯峨山章程如获至宝。我在山东，一个记者问我：“人民公社好不好”？我说：“好”！他就登了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也有一点，以后新闻记者要离开。

我有两条罪状，一条叫一〇七〇万吨，大炼钢铁，你们赞成也可以给我分一点，但是始作俑者是我。推不掉，主要责任是我。人民公社，全世界反对，苏联也反对。还有总路线是虚的实的，你们分一点，见之于行动是工业、农业。我也放了三大炮，公社，炼钢，总路线。彭德怀说他粗中无细，我是张飞粗中有点细。人民公社我说集体所有制。我说集体所有制到共产主义全民所有制的过程，

两个五年计划太短了一些，也许要二十个五年计划。

说要快，马克思也犯过不少错误，天天想看欧洲革命要来了，又没来，反反复复，一直到死了，还没有来。到列宁时才来了，那不是性急？小资产阶级狂热性？马克思开始反对巴黎公社，巴黎公社起来了，他又赞成，估计会失败，看到这是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三个月也好。要讲经济核算，这划不来。我们也有广州公社，大革命失败了。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三日下午起，分组讨论毛泽东上午的讲话。一部分人高兴，说讲话给他们撑了腰。一部分人紧张，说听了讲话大吃一惊。一些曾对彭德怀的信说过好话的，纷纷检讨、表态。直到七月二十六日，分组会上的发言，虽然对彭德怀提出批评，但总的说来语气还比较缓和。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在会上也都作了自我批评。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召集中央常委和协作区主任会议，讲了四点意见：（一）会议也还要继续展开，相互有什么意见都讲完，敞开来讲。（二）现在要对事也要对人。（三）前一段主要是纠“左”，现在要反右，因为现在右倾抬头了。（四）要划清界线，要跟动摇的、右倾的划清界线。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六日，各组传达了毛泽东的四点意见。

同一天，会议又印发了毛泽东对李云仲来信的一个很长的批语，并拟了题目《对于一封信的评论》。

毛泽东的这个批语非常重要：

第一，党中央从去年十一月第一次郑州会议以来至此次庐山会议，对于在自己领导下的各项重大工作中的错误缺点在足够地估计成绩（成绩是主要的，缺点是第二位的）的条件下，进行了严肃的批判，这次批判工作已经有九个月了。必须看到，这种批判是完全必要的，而且是迅速地见效和逐步地见效的，又必须看到，这种严肃的认真的批判，必定而且已经带来了一定的付作用，就是对于某些同志有泄气。

第二，现在党内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潮、右倾活动已经增加，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种情况还没有达到一九五七年党内外右派猖狂进攻那种程度，但是苗头和趋势已经很清楚，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了，这种情况是资产阶级性质的；

另一种情况是无产阶级内部的思想性质的，他们和我们一样都要社会主义，不要资本主义，这是我们和这些同志的基本相同点。但是这些同志的观点和我们的观点是有分歧的。他们的情绪有些不正常，他们把党的错误估计得过大了一些，而对几亿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所创造出来的伟大成绩估计得过小了些，他们做出了不适当的结论，他们对于克服当前的困难信心很不足。他们把他们的位置不自觉地摆得不恰当，摆在左派和右派的中间。他们是典型的中间派。他们是“得失相当”论者。

第三，必须对此种党内的动态作必要的估计。不可估计太高，认为他们有力量可以把党和人民的大船在风浪中摇翻。他们没有这样大的力量。他们占相对的少数，而我们则占大多数。但也不可把他们的力量估计过低，他们有相当一些人。他们的错误观点在受到批判、接受批判、端正态度以前，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观点的，这一点必须看到。党内遇到大问题有争论表现不同的观点，有些人暂时摇摆，站在中间，有些人站到右边去，是正常的现象，无须大惊小怪。归根结底，错误观点乃至错误路线一定会被克服，大多数的人，包括暂时摇摆，甚至犯路线错误的人，一定会在新的基础上团结起来。

第四，现在这一次争论，可能会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争论，如同我们在革命时期，各次重大争论一样，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不可能没有争论的，风平浪静的。庐山会议可能被证明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会议。

在分组讨论的同时，毛泽东一边连续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一边向会议印发各种文件，推动和指导会议的进行。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印发了几个材料。

其中一个材料是反映江西省中级党校学员对人民公社的各种看法，如认为人民公社没有优越性，公社建立得太快了，是一个“早产儿”；中央关于在农村建立人民公社的决议是“心血来潮”；“共产风”是上面刮下来的，等等。

还有一个材料是国务院秘书厅干部学习简报，认为建立人民公社的条件不成熟，人民公社的发展不符合我们党“一切经过试验”的传统；“全民炼钢”的口号是不对的，全民大炼钢铁得不偿失，“以钢为纲”的口号有问题；五个并举成了百废俱兴，两条腿走路成了多条腿走路。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要求将在新华社《内部参

考》上刊登的三篇报道《赫鲁晓夫谈苏联过去的公社》《番禺县有些农民自办小型食堂》、《增城县重灾公社见闻》，以及《外报就赫鲁晓夫谈公社问题挑拨中苏关系》印发与会人员。

批语说：“请同志们研究一下，看苏联曾经垮台的公社和我们的人民公社是不是一个东西；看我们的人民公社究竟会不会垮台；如果要垮的话，有哪些足以使它垮掉的因素；如果不垮的话，又是因为什么。不合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掉，人为地维持不垮是不可能的。合乎历史要求的東西，一定垮不了，人为地解散也是办不到的。这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大道理。请同志们看一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近来攻击人民公社的人们就是抬出马克思这一科学原则当作法宝，祭起来打我们，你们难道不害怕这个法宝吗？”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又把这三篇报道连同他的批语批给王稼祥阅，又写了一封信，其中说：“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

二、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决定召开八届八中全会。

次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了这一决定。

他在讲话中说：这次全会想做两件事。第一，改指标。去年十二月武昌会议规定的一些指标，是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公开修改，党内要经过中央全会决定，然后再向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在八月间改过来。第二，路线问题。“究竟采取一条什么路线好？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同志们大家都扯了很久了，开一次中央全会来再扯几天，我看就差不多了。方法应该开门见山，不搞外交辞令，横直讲老实话。疙瘩不解开，不好工作。有许多疙瘩多少时候了，不是现在才有，非一朝一夕之故。当面不扯，背后又有，那怎么好办事？把一些疙瘩解开，以利于团结起来工作。”

关于会议文件问题，他说：“现在起草的这个东西在搞第三稿。要搞得比较恰当，比较合乎实际，有利于团结，有利于工作。起草这个东西也是个过程。头一稿，大家轰掉了。第二稿，看来作者本人也不满意。现在搞第三稿。这是不发表的。……发表什么呢？发表一个公报，无非是改指标。今年下半年这几个月要

鼓劲，为完成这个任务而奋斗。究竟人民公社怎么办？是解散，还是维持？当前的这些问题要用公报的形式回答一下。不要很长，一两千字就够了。两个文件：一个决议，一个公报。现在这个纪要，索性改为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

为八届八中全会进一步集中批评彭德怀做准备，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会，对彭德怀进行面对面的批评，同时争取一些跟彭德怀持相同意见的人。

政治局常委会开了两次，一次是七月三十一日，一次是八月一日。这两次会都没有正式记录。据当年列席会议的李锐说，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以及彭德怀、彭真、贺龙。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四人列席。

一九五九年八月一日中央常委会谈话记录 毛泽东：你这个同志（指彭德怀），经验主义，承认的？就是不是马克思主义，华北座谈会后，也想搞点马克思主义。你这个同志，世界观是经验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我说彭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哲学基础不懂，经验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敌对体系。你如果承认是经验主义，那就是同马克思主义敌对，是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现在好像讲经验主义舒服点。但这是宇宙观、方法论，不好随便承认的。

会理时期，华北时期，（对彭德怀）你闹独立性，有电报，重大问题自己干自己的，可执行可不执行。可执行者，自己意见同上级相同的；不执行者，即不相同的。洛川会议作了决议也不服从中央方针，到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军委是一个部门，不能闹独立，不服从可以申述理由；何况华北军分会作的是根本违背中央方针的决定。我对军分会小册子批的话，首先给彭看，后给王明看，讲文件本身责任由军分会负，总而言之不对，解决党内问题，一万年都要讲合法方式。

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10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10个大将更不在话下。这种观点同马克思主义政党、阶级斗争、党的学说格格不入。党的内部关系。党与人民的关系，你没有搞清楚，解决的办法只一条：自己革命。你说：一半对一半（毛泽东说，同彭德怀的关系三七开，彭德怀坚决不同意，说对半开），总有点功劳。就搞这一条，你多次讲过，为了革命，专之可也；决策不请示。各人都用此理论，那怎么办？现在有无线电、电话、汽车，还可以步行、骑马嘛。同在北京城，10年9次电话，1年不到1次。我的责任是官僚主义。

比较注意及时或隔一时间答复。9次无下文，我有我的不对。积9次，老子跟你
不往来。（彭德怀插话：你可以写个条子。）条子也是个办法。黄克诚两次想找
我谈（在前两天毛泽东找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时，黄曾谈到，南下
湖南前在北京等候，两次请毛泽东约谈话，终于没能如愿），没有下文，这是我
的责任。香山住3天，有些忙，应当通知你再等一下。我毛病不少，警卫员说未
起床，睡晏觉，你于是拂袖而去。孤僻。不交换意见，跟你谈过，孤僻，林彪更
如此，贺龙好些。（彭德怀：贺、叶好，林也好些。我无事不上三宝殿。）积了
许多问题、疙瘩，互相不通。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许多学说、政党、阶级斗争、
经济学说。政治、上层建筑、政法、意识形态（哲学、文学、艺术、宗教等等），
你根本不大懂，站在马克思主义原则基础上处理工作就难了。韩进（抗战时
在华北局工作，做过彭德怀的秘书）跟你写一通，是封建主义思想，用你的名义
发表申明。讲统一战线，“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还讲自由、平等、博爱，教育宗旨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旧社会流
行的成语，是封建主义骗人的，从古以来未有过的事。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犯法不
同，哪有什么同罪？这是不懂历史唯物主义，阶级斗争学说也不懂。你阶级
分析也不会，此次错误，也是不会这一条。如三亿五农民、一亿五老贫农，总数
占70%。一亿五较贫苦，9000万人炼钢，也有老小上阵，主要是男女劳力壮丁，
牵动人可多了。昨天讲的有不妥当。讲“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你主要是向
着中央领导机关，并非向省，更不是向群众。这是我的观察。讲“得心应手”这
话，是指领导机关，其实讲这个，锋芒是攻击中央。你不承认，也可能承认。我
们认为你是反中央，信是准备发表的，以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按照你的面貌改
造党和世界。你的经验主义。宇宙观、世界观，你的政策，同我们是两个政策：
要修正总路线，你想搞另一个，还没有提出来。你的方法是，信的前半部分说总
路线正确，其实毫无感情，全部感情在后部分。就是说你这人有野心，历来有野
心。你的说法，是说过参加革命做大事。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这都是客气话。
先生，学生，是讲集体、劳动人民是先生。尊劳动人民为先生的思想，你没有建
立。华北群众运动三起三落。

历来要用你的面目改造党、改造世界。有各种原因，未得到机会。这次从国
际取了点经（不能断定）。首先是去年冬天郑州会议你未参加。上海会议重心批

李富春，捎了你一句。去年八大二次党代会讲过，准备对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总司令可能闹乱子，但他只是个招牌（组织不起队伍）。我同你历史关系，这么多次，你每次动摇，昨天朋友，今天敌人。这回重心是彭，不是总司令，总司令这回态度好。我 66 岁，你 61 岁。我快死了。许多同志有恐慌感，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6 亿人中最高明的是你，（说我是）先生（你是）学生，是假的。我们的合作是三七开。（一、二、三次反“围剿”，反张国焘，抗战，解放战争合作。）但整个抗战八年，难讲是合作。其他时间你独立自主。个别原则问题，如对朝鲜劳动党关系，有次战役，电报打了（战役已开始），照你的办。（这时彭德怀插话，讲到朝鲜战争 5 次战役教训，是听从主席的命令。）总起来三七开。英雄所见，大体略同，合作大概是这种时候。历来觉得你这人大可改进，不能同张国焘比，是劳动人民出身，有阶级基础。立三路线闹别扭，一了解，我们一拍即合。朝鲜战争谈得来。北京军事整风（整萧克、粟裕），找我谈，并没冲突起来。有时互相客客气气。萧克的事合作很好，这因为跟你有利，需要帮忙。（彭德怀：这不是我个人事。）你是军委负责的。这几个同志的大错误，应予处理。这回萧克、粟裕可能有功，他们发言权不多。基本话就是这些。不能强加于人。你可能接受那些哲学基础，那是虚的。特别是野心家难以接受。以自己的面目改造世界，这是一个侧面；另一侧面是可以改造，要把这一面扩大起来，洗脑筋，错误的东西慢慢刮掉，刮起来不容易，很痛。你认为不好说的，你不交心。一个心交，一个心不交。人们只看到你简单、坦率、心直口快，初交只看到这一面。久了，就从现象看本质。弯弯曲曲，内心深处不见人。人们说你是伪君子，像冯玉祥。真伪有矛盾。不能说全部假，对敌斗争是真的。心中很严重的东西不拿出来。

当前突出矛盾是什么？“共产风”，指标落空，项目下马，浮夸风，这些都已解决。现在是另一种论点取而代之：越少越好，是新的右倾在发展。言为心声，你就是右倾机会主义。照信的后一部分讲，领导与党就不行了。你要打无产阶级的旗帜。你这人拉拉扯扯，一打一拉。没有看见？小舟，你上了当，搞合股公司，拉过去了。你还说不是。散布空气，无民主自由。我们讲了 9 个月，批判了 9 个月。你们批判的那些，难道超过了我们讲的？

无产阶级英雄主义是好的。个人英雄主义很危险，野心即出在这里。拉拉扯

扯一打一拉，要组织队伍。是否小舟永远被拉过去，看小舟的态度，这个人不觉悟，“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紧张”他都接受。“得失相当”，“‘左’难纠”，这就是没有马克思主义观点。小舟，你马克思主义观点少一点。这是对领导，不是对群众说的。有些事你不知道，信的目的何尝不知道，可以原谅；同意纲领不简单，是气味相投；什么“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是几亿人民的群众运动，此乃马克思主义。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你不知道？我同省委书记，同任何一个人非议过彭德怀没有？同我讲彭不好的，统统挡回去，要当面讲，不当面讲非英雄豪杰。如罗瑞卿，要当面讲。周恩来：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出 18 个题目，就是要总结经验。不能畅所欲言，就是湖南派；你就是说中央闹了乱子，得检讨，郑州会议等不算数。直接向下面写信（彭德怀曾批评毛泽东以个人名义向全党写信，不甚妥当），以后还要用此方式。田家英历来比较偏右，如批《红楼梦》、《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学生闹风潮，《零讯》启事等；

你是立场不同，多年的党员，还是政治局委员。湖南的马克思主义哪里去了？你们要瓦解党，这回是有计划、有组织、有准备，从右面向正确路线进攻。上次（7 月 23 日讲话）说得不准确，说是无计划、无准备、无组织，跑到右派旁边，只差 50 米了。李锐动摇，去年 11 月到苏联，同留学生谈话，说大跃进搞糟了。有过教训，这回又搞这一手。而且这些事都办了；纠正了，批判了 9 个月。为什么搞这一手？其目的，在瓦解中央领导，瓦解总路线，以为有大批群众集合于你的旗下。船要沉了，老鼠赶快离开船。批“小资产阶级狂热”，另搞一套。大跃进你们没有参与，没有责任？北戴河会议没有反对，武昌会议、上海会议时都赞的。

挂一笔账，你们错了。有此一信。抗战时独立王国，你搞你的，并没有写信；抗美援朝也没有信；北戴河、武昌、郑州会议都没有信。这次抓到一个机会，打着无产阶级旗帜，攻击“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以为万无一失。国内外、党内外议论纷纷，乘此机会。你是个投机分子。

参加中央的会，等于没参加。元帅团结在自己周围，疙瘩解开。9 个元帅有意见。也不能搞倾盆大雨，发生逆流。（彭德怀：发脾气多得很。）（周恩来：想用此压服。）对别人要求民主，对自己要求独裁。“共产党不是毛氏宗祠。”

学我 1927 年，搞彭氏宗祠。要实行民主，这回决定开中央委员会。华北座谈会操了 40 天娘；补足 20 天，这次也 40 天，满足操娘要求，操够。大鸣大放，《简报》是中字报。今大谈这些，并非几天就能了解的；有的也许不适合你的情况，我这不是个人意见，而是相当多同志的意见。甚至庐山会议后，你还可保留。批评不能接受，可以顶回。论点不能接受，就不接受。交头接耳，扎根串连，都可以。

从打击斯大林后，佩服赫鲁晓夫。历来估计两面。好的一面扩张，可能改。也有可能不能改。（黄克诚：好好检查，虽然 60 岁了。）不看僧面看佛面，看人民群众，关系好一点，改改，一时改不好不要紧。

历来摇摆，直到高饶事件，但能摇过来。这一次又可摇过来，看环境形势。对你寄托希望。（彭德怀：这两天两次谈话，很感谢。不抵触。）可以继续申辩。平时不往来，是一种现实现象。本质如何，现象不一定准确。会理时，我毫无顾虑。那时靠剑英，不忘记（剑英大功劳）这一条。否则，中央当俘虏。三次反“围剿”战争，我们非常融洽。后来年纪大起来，积累了许多东西。你出身劳动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对群众有感情。问题是经验主义。采纳你的意见，会混乱一时期，又要来纠正。现在右倾情绪，右倾增长，不是刮“共产风”、压指标那些问题。我是因你的信才有觉悟。鹤寿谈有松劲情绪，也不摸底。这十天，较有底。问题不少，不在老问题，现在是新问题，是指标越落越好；以信为代表，以及相当部分人同情你的信，省是陶铸、周小舟。新问题是要反击右倾进攻。很多人是盲目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

9 个元帅、10 个大将，围在你周围岂不好？人少好还是人多好？一下改不可能。洗脑问题，照顾他的特点，不能急于求成，不能急功近利，包括黄老，有缺点，慢慢改。井冈山，中央苏区，枪杆子主义。对我帮助大。

刘少奇：

李井泉也感觉你在拉他。说四川没放卫星好。根本问题：是自己思想上有一种想法，革命要革的，社会主义要搞的。但如何革法，过这个革命关，社会主义如何搞法，脑子所想的社会主义与党是否完全一致，值得考虑。总是有些不同。对我们的搞法，总是不满意，至少不全是像我们这样的党。积极要求实现自己的愿望，批评人，然后也合作。我们长征中认识，认为你爽直，对同志、友邻

部队都照顾，感觉政治开展，也注意政治。一件事感觉不好：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从那以后，觉得此人不简单。（毛泽东：电报张飞会打，曹操不打。）（林彪：有意见向下讲，不向上讲。组织原则问题。）以后想极力合作，求同一性，差别性少提，但搞不好；同彭这样的人，难搞成朋友。（毛泽东：交不亲的朋友。）一下冒犯了，打击时，是敌对态度；当然也不总是采取敌对。（毛泽东：对抗性有几种：横直不合作，敌视，有意见不讲；另一种即敌我阶级斗争。前者意识形态不同，观点不同，谈不来，客客气气敷衍，谈得来无所不谈。）高岗事件前，对我有七八点意见，有些事同我毫无关系。如一件事，召集华北座谈会。（毛泽东：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作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有人要求彭去党校讲讲，何必去党校作报告。不开会，也势必作不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 40 天娘。）账挂在我身上。另一件事，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高岗事件前，讲了对我很多不满的话。这种话，我沾不到边。（毛泽东：关向应讲中了，你这人是搞派别活动的。）值得反省。有些不满并没有讲出来，延安整风审干，也不满意我。（毛泽东：这是我的责任，好、坏都负责，九条方针没有照办，相当长时期下面未执行。北京后来审干反右，自杀也几十个。还是犯“左”的错误，罗瑞卿他们负责的。）感觉彭的思想有自己的一套，同意主席讲的有野心，要按自己面貌改造党和世界。根本问题在此。当面讲这些话。

表面讲的不是真心话。要挖一下记仇、记恨事。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毛泽东：两次声明，要收回信，（简报）上说的；我不相信。）

两个歌子，反对唱《东方红》。认为中国也有个人崇拜，中国很需要反个人崇拜。党章中毛泽东思想领导一条，七大有，八大没有。原起草时，就不赞成写毛泽东思想领导那一条。八大决定不要，又反对。

元帅心情，不好合作。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中间

有个问题，把你那套丢开，服从党，野心抛掉。是大家的野心，无产阶级改造全世界的野心，不是个人野心。党内好好合作，求同存异。原则问题要斗争。团结——批评——团结。

周恩来：

主席讲了话，还听不进去。改与帮，那一套都改掉。要交心，你不易交心。华北又闹独立自主。回延安三年格格不入。解放战争合作。抗美援朝，回到军委，不大靠拢了。

相反，很骄傲，犯上。俯首甘为孺子牛，这是辩证法。要脱胎换骨。我多次错误，认识不全面。难道检讨了就没有骨头？驯服就没骨头？所有领导同志都要驯服，否则如何胜利？你的骨头是犯上。

朱德：

顺着无问题，不顺成问题。投降无产阶级，永不反水，但要防止反水。永远跟着毛主席。名利思想，名是要的，正确也是个名的问题。好话，叫骂娘，听不进去，怎能改正？都希望你彻底改。

林彪：

彭德怀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冯玉祥。中国只有毛主席是大英雄，谁也不要当英雄。

打得猛，拉得猛，先打后拉，先拉后打、旧军阀的办法。发泄积愤，市场也不大。不少人说你讲假话，有野心。（毛泽东：以真话形式出现的假话。）长征时讲过，入党前，救中国舍我其谁。入党后，情形不同，应该谈出来。在党内也有藐视一切的思想，好犯上、有个东西杠起，有思想、愿望、目的，总觉得自己行，有个路线、纲领、世界观，自视很高。（彭德怀：也有自卑感。）弱点，是腰杆不硬。应利用此弱点，慢慢转过来。你看风使舵，没有张国焘蠢，是聪明人，看到不行，采取主动转弯。六中全会时，你赶快撇开王明。六中全会看王明船快沉了，赶快上岸，拿石头打船，以示区别。黄老是老实人，你如果变了，为何不在党委干部会上讲，只给黄老一个人说（指拥护主席的话）。一个东西不对，一定要批，马日事变要来的，统一战线要破裂的。韩进起草的东西要批。疟疾原虫没根绝。根本问题从世界观解决，经验主义世界观，虽无著作。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没有接受。是另外一个党性、派性。鲁迅是马克思主义者，“横眉冷对千夫

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两句话合乎辩证法的。你混同了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个人野心，政治方向，灵魂深处，没有脱胎换骨，危险在此。是个不驯服的党员。三七开，如何形成？入党后即独立为王。滕代远是老党员，你说了算，长期独断专行。从平江到长征，党的生活中很大独立性。陕甘支队一年，（毛泽东：出腊子口到阳县，几次想打，急躁情绪，简单概念），对上级、同级不尊重，对下看不起。项羽封了楚霸王，目空一切。这不是从理性角度看，是直感。组织观念、党的观念一套，你没有建立起来。革命的动机是否全为群众服务？这种成分有；但想在革命事业中成功成名，出风头，也有的。长期笼统印象，是旧内容，新形式，旧的，也有新的。个人主义是旧的，新的有革命内容。好名，揽权，要指挥全局，大场面掌握在手。换个名词，就是野心，派头气势有的。形式上有很多迷人东西，说你张飞，实际上并不是张飞；你自己走火说过，老奸巨猾，老于世故。内容、形式不统一，很用心的人，又似乎无心。（刘少奇：不好敞开谈。）前年同我谈话，简直像准备好发言稿，机关枪放了，走了，非同志式谈话，有戒备。（毛泽东：形式主义的，并非征求意见。）平时以二杆子、张飞出现，一句话不走火，并不随便，是假张飞，不是真张飞。一贯跟刘谈不来。利用坦率形式迷惑人。用很没有成见的形式对人，但仇解不开，如对罗瑞卿，实际记仇，实际是老奸巨猾的本质。（毛泽东：内有二心，外似张飞。）装好意。说信不准备发表，而是准备发表的。这样多的话要说，为何不来谈。信有一二三稿，想定案，党内外刮风。（彭德怀：就是一稿。）大跃进与副作用，账没有算清。没有大跃进，没有总路线，领导就成问题了。正面作用与副作用没有弄清楚。国内外都刮风，以为好时机到了。这些（副作用）事情已经过去了，庐山不应再泼冷水。去年全做错了，很着急。（彭德怀：老实话，成绩是肯定的。）（毛泽东：马后炮不灵了。）一方面肯定成绩基本，缺点次要，思想里却是缺点基本，成绩次要。矛盾有两面，哪面主要？表面似好意，实际要抓辫子。地下档案，控告书，告党状。发表以争取群众，不发则存档。表面似好意，而用意很深，是坏意，表现个人单独政治见解。内容与形式总相反，采取迷人办法。事实证明是右倾，动机是从个人野心出发，捞一笔。几十年不写信，哪有如此简单（毛泽东：经过小舟造空气，说什么讲话不自由），攻击主席，今后动机搞单纯一些，相信党、相信毛主席，增强党性，把相信自己减少些。做法人家知道的，内容与形式都知道。要靠老实

办法，学毛主席著作。马克思主义著作与毛主席著作是联系实际的。政治上不再搞另一套，自以为有正确东西。只有中央和毛主席一套正确，用这一套正确指导革命。不搞理论，兴趣不高，也非嗜好，这不是文化程度问题。哲学、世界观、政治，要学现在一套，自己搞一套不行。加强组织观念最重要。抛掉个人过分自信，抛掉个人英雄主义。只有毛主席能当大英雄，你我离得远得很，不要打这个主意，我有暮气，但没有这个野心：搞个局面，自己一套拿出来。这种雄心、信心没有；缺点是有暮气。主席讲元帅中有暮气。这样大局面，理论知识、精力、威望，只有毛主席有。（毛泽东：66岁了，随时准备打交道准备后事。）都是丘八，就是那么个材料，那么大作用。都要注意，最要紧防止自信、个人英雄，否则就不能尊重党，尊重马克思主义，更不能相信元帅。骂儿子样骂干部，似本能，你是这么个人。个人英雄主义，有新有旧，迷惑手段。相处过多少人，总觉你特别。威风气概，不易接近，不平等味道，自负太大，刚愎自用。这些思想根子不去掉，内心根本东西不去掉，就是个特殊人物。

不是打倒，不是今后不信任，工作要你做。要整风、洗脑筋。

自信心太高，不合乎客观。伟大英雄，其他看不起。几十年本能反映：自信太高，过分自负，想当个大英雄，个人英雄主义不改。 彭真：

你在西北小组讲：人人有责，包括毛主席，个人威信不等于党的威信。说毛主席的话乱传一气，盲目服从。说到处第一书记挂帅削弱集体领导。1070万吨钢的指标是个人决定。说下毛毛雨，送材料又不看。这些箭靶子射谁？ 开始对你信仰高，慢慢感觉不对头，跟中央不对头。抢先思想，组织观念得要。为何要对全国性、世界性的问题讲话？（毛泽东：发了这个指示？）发现闹独立性，动摇对你的信心。1937年开始我逐渐信仰毛主席，感到你那套不对。首先是你的党性，同中央抢先。1937年12月传达王明的东西，我强调夺取领导权。这次在火车上讲匈牙利事变。（毛泽东：思想之混乱可观，我们怎么能同匈牙利比？）信是个纲领，一条路线，重点在后一部分，目标是毛主席。 反对个人崇拜，有无此想法？你有大功劳，但一切功劳离不开党和群众。否则，顶大当个唐生智、程潜。毛主席的路线已得到证明，基本上已证明总路线的正确，也应服从。（刘少奇：彭的功劳也是来自这条路线。）反过来，过去几次路线按照你的办，现在可试验，原来是狂热性，可以设想是什么结果。这样一提，个人东西就去掉了，

同主席谈就拗起来。迷惑人，小舟也被迷惑了。同志在一起，应肝胆相照。这么多元帅支持你，是由于主席，但换不出你一条心。张飞，能换心的。归根结底，宇宙观和党性的根本分歧。

贺龙：

对主席成见深，信中有历史成见。 《八月一日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谈话记录》，虽然不是一个正式材料，但它多少反映了这次会议的进程。从中可以看出与彭德怀的斗争的复杂性，这不仅仅是一封信或在会上的几次发言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一日晚十时，毛泽东写信给周小舟，送上几句勉励他改正错误的话。周在延安时曾经给他当过秘书，现任湖南省委第一书记。信中说：“‘迷途知返，往哲是与，不远而复，先典攸高’，几句见丘迟与陈伯之书。此书当作古典文学作品，可以一阅。‘朱鲔喋血于友于，张绣剥刃于爱子，汉主不以为疑，魏君待之若旧’，两个故事，可看注解。”信的末尾，还嘱咐说：“如克诚②（②克诚，即黄克诚。）有兴趣，可给一阅。”

在这之前，七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找陈伯达和田家英谈了一次话。毛泽东说：你们上庐山后表现了动摇。但是你们还是赞成总路线，赞成人民公社的。你们的意见基本上是对的，但有些话不对，方向不对，立场不对。毛泽东还谈到世界观要不断地改造，知识分子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要经常注意不要翘尾巴，要学会夹着尾巴做人。七月三十日，杨尚昆告诉陈伯达等人，说毛主席已经要他向各组组长打招呼，以后不要再提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的事情，要他们关照一下参加会议的同志，集中力量准备开好八届八中全会。杨尚昆说，这是下停战令了。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始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一百四十七人，列席会议的十五人。这次全会是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继续，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也由此进入高潮。

中委、候补中委 191 人，到会 147 人，列席 15 人，共 165 人。

毛泽东在第一天会议上讲话：

毛泽东的这个讲话为八中全会定了基调：

第一，前一阶段反了九个月的“左”，现在主要已不是反“左”的问题，而

是要反右的问题；

第二，现在是右倾机会主义向党猖狂进攻；

第三，现在党内出现了分裂的倾向。

这些都是极其严重的结论。

会前，毛泽东给张闻天写了一封信，信中说：

怎么搞的？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去了。真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你这次安的是什么主意？你把马克思主义的要言妙道通通忘记了，于是乎跑进了军事俱乐部，真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现在有什么办法呢？愿借你同志之箸为同志筹之：两个字曰：“痛改”。承你看得起我，打几次电话，想到我处一谈，我愿意谈，近日有些忙，请待来日，先用此信，达我担忧。

一九五八年八月四日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由刘少奇主持，几位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没有参加前一段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介绍了前一段开会的情况。这以后，会议的揭发批判，集中到“军事俱乐部”问题上，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反党集团”。

一九五八年八月五日，毛泽东对《湖南省平江县谈岭公社稻竹大队几十个食堂散伙又恢复的情况》一文的批语

我们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属于这一点。困难是有的，错误也一定要犯的。但是可以克服和改正。悲观主义的思潮是腐蚀党、腐蚀人民的一种极坏的思潮，是与无产阶级和贫苦农民的意志相违反的，是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相违反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反对右倾思想的指示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毛泽东《关于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问题》的批语：

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中委会里有，即军事俱乐部的同志们，省级也有，例如安徽省委书记张恺帆，我怀疑这些人是混进党内的投机分子。他们在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中，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蓄谋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分裂共产党，在党内组织派别，散布他们的影响，涣散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另立他们的机会主义的党。这个集团的主要成分是高岗阴谋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就是明显证据之一。这些人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们是愿意参加的，有革命性，至于如何革法也是常常错误的。他们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一到社会主义革命时期他们就不舒服了。早就参加了高饶反党集团，而这个集团是用阴谋手段

求达其反动目的的。高饶集团的漏网残余，现在又在兴风作浪，迫不急待，急于发难，迅速被揭露，对党对他们本人都有益处，只要他们愿意洗脑筋，还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因为他们是具有反动与革命的两重性，他们现在的反社会主义纲领，就是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不要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迷惑，例如说总路线基本正确，人民公社不过迟几年办就好了。要挽救他们，要在广大干部中进行彻底揭发，使他们的市场缩小而又缩小。一定执行治病救人的方针，一定要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还要给他们革命与工作的出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八届八中全会召开全体会议，

毛泽东讲话：开了 40 天了。《简报》每天几本。今天允许我讲一点，可不可以？不是讲言论自由吗？要求民主吗？

一、彭德怀同志是世界观、人生观问题，是经验主义人生观、世界观问题。他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同马克思主义相违反的，是主观唯心主义、经验主义，或唯我主义。

二、如彭德怀同志，我感觉到他三十几年资产阶级立场没有改变过来。从 1928 年起，31 年，因此总跟我们格格不入。他们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而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以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资格参加共产党。

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这个阶段，他们是参加的，他们是积极的，但在方法上他们也常常搞错，不“左”即右。立三路线、第一次王明路线是“左”嘛，跟着走嘛。第二次王明路线是右嘛，又跟着走嘛。比如还有闹独立性，党性不纯嘛，闹独立王国这套东西。我说中国这个党实际是个联合会。中国这么一个大国；是各个山头结合起来的，山头中彭、黄是资产阶级世界观、经验主义，洛甫是教条主义。他们都是参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至于参加共产党，他们那个党员称号是不合乎他们的实际，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的同盟者，是马克思主义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阶段的同盟者，带着资产阶级世界观参加革命的。对无产阶级革命，他们是没有精神准备的。我记得彭德怀跟我讲过，他对无产阶级革命究竟如何革法是没有准备的。党内一千几百万党员，很多是因为反帝反封建参加党，后来许多人成为完全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这些同志不是逐步接近。什么“历史经验证明纠‘左’比纠右难”，这个历史就不对嘛。

我看现在你们猖狂进攻，一部分同志是与西藏事件、全世界骂我们有关系的。对于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没有精神准备，一来就抵触。高饶集团是

在 1953 年嘛！我们知道彭德怀是陷得相当深的，那时是保护过关。是高饶联盟，还是高彭联盟？为什么那个情绪一下子反映到那边去呢？我看要从阶级斗争来得到解释，从历史唯物主义得到解释。这些同志对地主阶级、帝国主义是仇恨的，现在革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个体经济）的命！消灭剥削阶级，赎买民族资产阶级，对农民、手工业者用集体化办法。这就触动几亿人口了。他们不理解。但是我总看，要消灭掉中国的剥削阶级以及小资产阶级，他是没有下决心的。这十年，对他们是突如其来的。现在是什么时候？是人民公社、大跃进年代，这个公社、工农业生产大跃进，与人民群众密切相联。人民公社一来，于是就闹翻了。

彭德怀连解放军都不承认了，说可以垮台。四、历史上他们参加过多次的分裂组织。第一次王明路线。至于高饶集团，这是一个大的阴谋活动，彭在历史上最严重的是参加高岗集团。

五、彭这次迫不及待，你挂帅，组织派别，进行分裂活动。所提出的问题，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我说他们看错了。

去年一年，今年这半年，不但有正面成绩，而且有反面成绩，如“共产风、浮夸风吹遍全国”，还有强迫命令，否定商品经济、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比例失调，引起城乡各阶级关系紧张，市场紧张。这一切，据我看大为教育了全党全民。七、这些东西在全党全民中间，在这一年内进行，等于过去几十年。学会了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浮夸之风走向实事求是，现在卫星不放了。还有比例失调，对中央、地方的同志，做经济工作的同志，是极深刻的教育。

八、确有大跃进，我看可以肯定。我到处问，公社究竟是好，还是坏？我看是好，而且是很好。再有一条，必须政治挂帅。彭德怀讲什么“自由、平等、博爱”，根本不懂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叫上层建筑，什么叫经济基础。他就是不懂，又装懂，发表长篇大论。还有第一书记挂帅，在彭德怀他们看来实在十分讨厌，我高兴。我看无非是你想挂帅，与其你挂帅，不如我挂帅。你们如通过彭德怀挂帅，我没有办法，我服从。你们如通过我挂帅，我就挂。一朝权在手，就把令来行。必须政治挂帅，第一书记挂帅。九、我们中国国境内有没有集体领导？有没有所谓民主同言论自由？提出 18 个问题，就没有团结这个问题。我说要加一个团结，这为什么？就是对抗那个分裂。因为 7 月 2 日那次常委会上，彭德怀同志所表示的那种态度，我就看出这个苗头，是要刮点什么风嘛。所以我

那天晚上加个团结问题，变成 19 个问题。但是刮的什么风，这个庐山是两个司令部，详细情况，完全没有料到。这回为什么要开会，就是为了满足同志们要的“集体领导”嘛！你不是老说我没有民主吗？没有集体领导吗？就是个人独裁吗？他们那个意见，就是还是你那个独裁好。但是要指出，他们所谓“集体领导”，就是要他们来领导，要高饶集团的残余分子、漏网分子，还掺杂点别的人来领导。所谓“民主”，就是要反现在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民主”。十、这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不要妄想。秀才就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

十一、所谓一百八十度的转变。这是说 7 月 23 日。你们不是二番四次要求我们开放民主，要言论自由，说是庐山空气很不正常，压迫民主吗？我很同情你们，我说那还得了，那决不能够。所以我就答应他们，开组长会，说服这些同志，要听他们讲话，要开放民主。同时我跟“俱乐部”的同志也说，你们也照办，横竖好的就听进去，不好的就硬着头皮顶住。你说我不公道吗？我两边都这样说的。至于你们还有些什么屁要放，香的或臭的，我就不知道。后来才感觉不是个别问题，而是要推倒总路线；要把“俱乐部”合法化，扩大“俱乐部”，招收会员。要合法。我同意过你们办“俱乐部”吗？我同意过你们推倒总路线、推倒大跃进、推倒人民公社吗？如果同意过你们，然后又反过来反对你们，那就算我是一百八十度转弯。十二、后天开大会，请同志们准备讲话。告诉你们我心里想些什么东西，以便你们“俱乐部”同志准备讲演稿。十三、德怀同志提出辞职，不干这个国防部、军委工作了。这个问题是个大问题。究竟彭德怀同志干不干国防部长？黄克诚同志干不干总参谋长？请同志们考虑。工作是要给的。究竟是照样不动好，还是改换工作好？十四、是否要开一次军委扩大会？有些同志建

议，特别是军队方面的同志建议，这个问题今天要解决，如要开就发通知。我主张开。每个师来两个人，师长同政委。大概最多开半个月，两个星期或 10 天。十五、现在我们搞三个决议、一个公报。一个决议，就是个增产节约，公开发表的，鼓足干劲，增产节约，争取下半年完成任务。要反对右倾思想，不要松劲，要鼓干劲。第二个是党内的，叫“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这个不指名的，发到全党去讨论，分析现在党内的情况，也不具体指庐山有什么“俱乐部”。这是一般的。第三个就是关于彭德怀同志的错误，要作个决

议。这个决议，大体上我先讲下方针：就是他犯了错误，允许他革命，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个决议我们准备不要发广了，发到县一级、团一级干部，不在全党去讨论。只要有这样一个处置，就保障了我们的党没有危险。如果他们继续进行分裂活动，那一直发下去。再闹乱子，那么公开在报纸上发表。“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现在不要发表，在全党讨论。但看他们的情况，他们变不变，转不转。如果需要发表的时候，在报纸上公开发表，翻成外文，让全世界知道，看他们改不改。我也不赞成把他们开除出政治局，更不赞成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些都是我们常委会议论过的，我现在代表常委会说话。再一个公报，讲改变指标，以及形势、情况，无非是鼓足干劲，确有大跃进，人民公社很好，这一套。

十六、这次会议，我建议收场要收得好。要以团结合作收场，双方交心通气，一看二帮。十七、要估计到那些同志的两面性，革命性和反动性。他们的历史证明他们完全不革命了，不合事实。我们的会开到今天，对他们的反动性批判比较着重，现在要注意他们革命性一面，我跟彭德怀同志说过，难道我们 31 年的关系，现在就在庐山分手吗？我们就决裂吗？我说不，不应该决裂，我们要合作，31 年的关系嘛。

总的国际形势我看是好的。国内形势，主要是人民内部的问题。

现在为什么不出皇帝？匈牙利事件闹不起来？现在红军还没有请？我看几个原因：第一，共产党是联系群众的。中国党没有拉科西，中国又没有纳吉，你能说周恩来同志是纳吉吗？他是总理啊！我不是拉科西啊！这是最主要的。这是路线正确，作风正确，这是联系群众。第二，反革命杀了 100 多万。匈牙利没有杀反革命。六亿几千万人，消灭那个 100 多万，这个东西我看要喊万岁。只有黄绍竑说我搞坏了。第三是反了右，你看 45 万嘛。

我们“俱乐部”同志对于国内形势他们是悲观的，国际形势他们也可能是悲观的。

十九、欢迎最近几天那些同志的进步。我在这里表示欢迎。二十、我要喊一个口号，叫“马克思列宁主义万岁”！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辽宁省执行中央反右倾指示报告的批语：

看来各地都有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存在着，增长着。有各种程

度不同的情况，有些地方存在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绪，必须按照具体情况加以分析，把这歪风邪气打下去。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至十五日，连续召开全体会议，由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作检讨。与会者对他们的问题进行揭发批判。主要集中在揭发批判“军事俱乐部”成员之间的联系，以及追查说毛泽东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三日，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发言（摘要）

现在，检查我这次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我在庐山会议的小组会上，特别在七月十四日写给毛泽东同志的信上，发表了一系列右倾机会主义的谬论。向党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总路线进行了攻击。同时打击了广大群众和干部的积极性，损害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威信，现在我了解这是一种罪恶。七月十四日的这封信，实际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

我的右倾观点，主要表现在：把党所领导的广大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高度热情，说成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从资产阶级的立场出发，对轰轰烈烈的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大泼冷水，横加指责，伤害群众和干部的革命干劲和建设热情。把已经纠正和正在纠正的错误，片面扩大，说成是“左”的倾向，政治性的错误，把个别的、局部的缺点，夸大为一般的、普遍的缺点，把九千万大炼钢铁的巨大意义，说成是“有失有得”。人民公社化运动本来是适应我国工农业大跃进而出发的，是人民群众的自发性的运动。北戴河会议经毛泽东同志提出，作出决定加以推广，为全国人民欢欣鼓舞地接受和拥护。我却抱着消极的看法，认为搞早了一些。把由于比例失调而造成局部的暂时的紧张，并且这种紧张已在逐渐缓和，说成是引起阶级关系紧张，等等。更错误的是采用了含沙射影的手法，攻击毛泽东同志，损害毛泽东同志的崇高威信，引起党内的思想混乱，破坏党的团结。

这次错误的严重性，还因为它不是我一个人的偶然错误，而是一种有准备、有组织的行动，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军事俱乐部”就是发动这次进攻的“司令部”。具体事实就表现早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上。

现在我来简单交代一下我和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同志的关系：

张闻天同志在北京有时来我处，次数不太多。这次我出国回北京后一两天，他到我家，我谈了东欧各国的情况。他向我谈了毛泽东同志 4 月 29 日的“党内通讯”说：这封信起了好作用，但是也树立了个人作风。我当时不仅没有表示不同意见，而且也有相同的看法，这次来庐山后，住地相邻，来往较多，谈问题也比较多了，谈了对小土高炉的看法，他说是得不偿失，损失很大。还谈了一千三百万吨钢，三亿四千万吨煤难以完成计划，也谈了他 7 月 20 日发言中的某些观点，他谈到庐山会议压力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政治局会议只是一些大的报告会，没有集体讨论，我对此不仅表示同感，也交谈了一些紧张的情况，特别谈到甘肃情况出人意外，他提到毛泽东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厉害（大概是指反教条主义），与斯大林晚年一样。我当时抱同情态度，并向他说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历史比党内任何同志都熟悉，历代的王朝第一个皇帝总是厉害的英明的。我 7 月 14 日的信写出草稿后，张闻天同志恰巧来了，我念给他听，他未听完就走了。张 7 月 21 日发言，我事先不知道，那天晚饭后在门前散步碰到了，他说讲了三个小时，我说：“讲了些什么，看一下你的发言。”当天晚上他秘书送来提纲，我要参谋念了一遍，第二天早上他来时带走了。毛泽东同志 23 日讲话后，又见过一次，彼此心情都很紧张，他说不能讨论了，我说讨论一下弄清一些模糊思想也好。没有谈什么其他问题。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给与会者写了一封关于读两本书的建议信。

信中说：“为了从理论上批判经验主义，我们必须读哲学。理论上，我们过去批判了教条主义，但是没有批判经验主义。现在，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在这里印出了《哲学小词典》中的一部分，题为《经验主义，还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期引起大家读哲学的兴趣。”

他提出：“我们现在必须作战。从三个方面打败反党的反马克思主义的思潮：思想方面、政治方面、经济方面。思想方面，即理论方面。建议从哲学、经济学两门人手，连类而及其它部门。”

同一天，他又批示印发了一个题为《马克思主义者应当如何正确地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的文件，这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等从列宁和毛泽东的有关言论中摘编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关于如何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

你们是不愿意听我的话的，我已“到了斯大林晚年”，又是“专横独断”，不给你们“自由”和“民主”，又是“好大喜功”，“偏听偏信”，又是“上有所好者，下必有甚焉”，又是“错误只有错到底才知道转弯”，“一转弯就是180度”，“骗”了你们，把你们“当做大鱼钓出来”，而且“有些像铁托”，所以有的人在我面前都不能讲活了，只有你们的领袖才有讲活的资格，简直是黑暗极了，似乎只有你们出来才能收拾局面似的。如此等等。这是你们的连珠炮，把个庐山几乎轰掉了一半。好家伙，你们那里肯听我的那些昏话呢？但是据说你们都是头号的马列主义者，善于总结经验，多讲缺点，少讲成绩，总路线是要“修改”的，大跃进“得不偿失”，人民公社“搞糟”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都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表现。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一个批语，题为《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

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消灭，斗争才会止息。旧的社会斗争止息了，新的社会斗争又起来。总之，按照唯物辩证法，矛盾和斗争是永远的，否则不成其为世界。资产阶级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有所不同罢了。就现在说，社会经济制度变了，旧社会遗留下来残存于相当大的一部分人们头脑里的反动思想，亦即资产阶级思想和上层小资产阶级思想，一下子变不过来，要变需要时间，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这是社会上的阶级斗争。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周、张问题，就有许多人感到惊奇，这种惊奇，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社会矛盾是由隐到显的。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理解，是要通过自己的斗争和实践才会逐步深入的。特别是一些党内斗争，例如高、饶、彭、黄这一类斗争具有曲折复杂的性质。昨日还是“功臣”，今日变

成祸首，“怎么搞的，是不是弄错了？”人们不知道他们的历史变化，不知道他们历史的复杂和曲折，这不是很自然的吗？应当逐步地、正确地向同志们说清楚这种复杂和曲折的性质。再则，处理这类事件，不可用简单的方法，不可以把它当作敌我矛盾去处理，而必须把它当作人民内部矛盾去处理。必须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批判从严，处理从宽”，“一曰看，二曰帮”的政策。不但要把他们留在党内，而且要把他们留在省委员会内、中央委员会内，个别同志还应当留在中央政治局内。这样，是否有危险呢？可能有。只要我们采取正确的政策，可能避免。他们的错误，无非是两个可能：第一，改过来；第二，改不过来。改过来的条件是充分的。首先，他们有两面性，一面，革命性，一面，反革命性。直到现在，他们与叛徒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是有区别的，一是人民内部矛盾，一是敌我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可能转化为敌我矛盾，如果双方采取的态度和政策不适当的话；可能不转化为敌我矛盾，而始终当作人民内部矛盾，予以彻底解决，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矛盾及时适当地加以解决的话。下面的这些条件是重要的。全党全民的监督，中央和地方的大多数干部的政治水平，比较一九五三年高、饶事件时期大为提高了，懂事了。庐山会议上这一场成功的斗争，不就是证据吗？还有，我们对待他们的态度和政策，一定要是符合情况的马克思主义的态度和政策，而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态度和政策。改不过来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无非是继续捣乱，自取灭亡。那也没有什么不得了。向陈独秀、罗章龙、张国焘、高岗队伍里增加几个成员，何损于我们伟大的党和我们伟大的民族呢？但是，我们相信，一切犯错误的同志，除陈、罗、张、高一类极少数人以外，在一定的条件下，积以时日，总是可以改变的。这一点，我们必须有坚定的信心。我党三十八年的历史提供了充分的证据，这是大家所知道的。为了帮助犯错误的同志改正错误，就要仍然把他们当同志看待，当作兄弟一样看待，给以热忱的帮助，给他们以改正错误的时间和继续从事革命工作的出路。必须留有余地。必须有温暖，必须有春天，不能老留在冬天过日子。我认为，这些都是极为重要的。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枚乘〈七发〉》一文，借汉赋《七发》来比喻现实。

他写道：“枚乘所说，有些像我们的办法，对犯错误的同志，大喝一声：你

的病重极了，不治将死。然后，病人几天，或者几星期，或者几个月睡不着觉，心烦意乱，坐卧不宁。这样一来，就有希望了。”“‘溲然汗出，霍然病已’。”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下午，八届八中全会闭幕。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再次讲话

他们为什么不在那么长的时间里提意见？因为他们有自己一套东西。如果是站在正确方面，有独到见解，比我们高明，就在北戴河会议及以后一些会上提出来嘛！不，他们不，等到大部分问题解决了的时候，他们才来提。他们感到这次庐山再不提就没机会提了，再过几个月更不利于提了，目的更难达到了，想扩大队伍，招收党员，办不到了。这是由来已久的，正如决议所讲的。这次对彭德怀同志来说，是第五次路线错误，总要发作的。这是两个阶级，两个总路线，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革命；这些同志是前一个革命阶段入党的，对后一阶段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个体经济，无精神准备。

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的精神准备，这是两个反党集团犯错误的根本原因。

要估计他们有可能改造好。

这次会议是一次很大的成功。分两个侧面，第一个主要侧面，揭露了多年没有解决的矛盾，相当多的同志忧虑的一个问题，这次解决了。并且把当前形势搞清楚，当前形势主要是反右倾，鼓干劲，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第二个侧面，主要是彭、黄、张三，对缺点错误有了认识。不要把这些看做没用的人，要看做是我们的同志，关系要搞好，要帮助他们、这方面要强调一下。（讲到这里，毛泽东对着彭德怀说）三十几年关系难道就拉倒了？我们不要告别。要尽一切努力，把他们争取过来。过去张国焘、高岗告别了。高岗这件事，我有责任，就是时间延误了。我本来想同习仲勋谈，我与他约了，目的就是跟习讲。因为那时高岗想去陕北，我们想保留他的党籍，还想保留中央委员，让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迟了一步，我没有来得及讲。他自杀了，竟这样结局，我也觉得遗憾。所以这事怪我，这是个很不好的事。

（刘少奇插话：陈独秀抗战初期曾要求到延安来，如来，看到革命胜利，也可能改）他后来去世。那个责任在我，我没有把他接来。那时我们提了3个条件，当时我们还不稳固，他不能接受。

在八月十六日的闭幕会上，通过了一个公报，四个决议和决定。这四个决议

和决定是：

《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
《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
《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六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摘要）

（一）在一九五九年七月党中央召集庐山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前，直到庐山会议的一段时间内，在我们党内出现了以彭德怀为首、包括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一小批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反对党的总路线、反对大跃进、反对人民公社的猖狂进攻。

（二）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进行分裂党的活动，由来已久。他实质上否定总路线的胜利，否定大跃进的成绩，反对国民经济的高速度发展，反对农业战线上的高额丰产运动，反对群众大办钢铁运动，反对人民公社运动，反对经济建设中的群众运动，反对党对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即“政治挂帅”。他在意见书中公然把党和几亿人民的革命热情污蔑为“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甚至在谈话中一再声称，“如果不是中国工人农民好，早就要发生匈牙利事件，要请苏联军队来。”很明显，他所犯的错误不是个别性质的错误，而是具有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三）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在庐山会议期间和庐山会议以前的活动，是有目的、有准备、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这一活动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现在已经查明，彭德怀和黄克诚早就同高岗形成了反党的联盟，并且是这一联盟中的重要成员。张闻天也参加了高岗的宗派活动。

（四）彭德怀这一次所犯的错误不是偶然的，它有深刻的社会的、历史的、思想的根源。彭德怀和他的同谋者、追随者，本质上是在民主革命中参加我们党的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代表。他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从来只愿领导别人，领导集体，而不愿受别人领导，受集体领导。他不把自己所担任的革命工作的成就看成党和人民的斗争的成就，而把一切功劳归于自

己。他的反党活动，正是中国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革命、企图按照资产阶级面貌来改造党、改造军队、改造世界这样一种阶级斗争的反映。他的世界观既然同革命无产阶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格格不入，背道而驰，他在党内当然就不愿意接受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在党的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例如立三路线时期、第一次王明路线时期、第二次王明路线时期、高饶反党联盟事件时期，他都站在错误路线方面来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

（五）八届八中全会认为：党对于彭德怀仍然应该采取满腔热情的态度，帮助他认识和改正自己的错误。当然，把彭德怀和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他们的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仍然可以保留，以观后效。

一九五九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一定要有班长。俄共政治局只有五个人，他们就说你们太专制了。有些中央委员没有召集开会，忙得很，那些人就说为什么不召集我们开会，就发议论了。列宁说会是没有召集，可是革命胜利了。他说你无非是要你来办，与其你来办，不如我们来办。我们就是五个人，就是这么一件事。在这个问题上有赞成有反对，看是站在什么一个立场，什么一个观点上。现在我们这些人，譬如常委会这几个人，年纪都大了，按照自然规律，总有一天要办交代，这是个长久的问题，没有共产党，这个问题还存在的，党没有了，人类社会要有组织的，不能是一个无政府主义。所以我看是一个反对派的问题，看问题不同。像恩格斯这样的观点，这是无产阶级我们这一派的人这么说的，资产阶级也是赞成的。人类社会通过几个阶段，这成了常识了，为什么又反对这种常识呢？他因为没有一个人破坏，就不能建立我们反对派的那些朋友们登台，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在这种时候，可是不能轻易地把阵地让出来，在这种时候讲谦虚我看是不行的，我这个时候谦虚了，那是危险的。

这一次从彭德怀同志信发出的那天起，16、17、18、19、20、21、22日，这一个礼拜，并没有通知任何同志（除我们常委会几个同志之外），说是辩论这封信的性质，包括几个组长。我们跟他们谈过，可是没有说辩论彭德怀同志这封

信，只说过要他们开放言路，扩大民主，让人家讲话。说你们耳朵是听话的，人家长四是讲话的，无非是放出来的东西，有香有臭，香的你就吃下去，臭的你就硬着头皮顶住。就是这么讲的。后头向那些人我也是同样讲的。你说我不公平呀！我说你们能够吃下的吃下，你们不愿吃下的硬着头皮顶住。一直到昨天，我看周小舟这位同志他是执行硬着头皮顶住的，硬着头皮顶住。但是出乎意料之外，昨天他赞成这个决议案了，不晓得真赞成假赞成就是了。（有同志插话：他写了一个承认是反总路线、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东西）暖，你怎么又不顶了呢？

讲到这里为止。同志们，还有什么意见？我看这一次会开得好，是逐步发展的。一个初上庐山时期，一个中期，一个后期。解决了一个大问题，同时工作又没有耽误。这一个来月的集会很有必要，这么一个大国呀，这么 100 多人，我们领导机关中央委员会集合这么一个时期。当然有一部分，大概有一半人，只经过半个月，有一半是经过一个月或者一个半月，陆陆续续来的。我们这些人就是从这次会议得到教育，我是得到很大教育。谁料到出这样的乱子呀！我就没有料到，结果出了，出了就好啊，就欢迎呀！就可以解决呀！所以讲是一次胜利的会议。就如林彪所讲的，避免了两个危害。一个是党的分裂——党的大分裂。避免了大分裂，小分裂已经分裂一个时期了，就是一个小集团。以后看他们改不改，无非一个改，一个不改。我们希望他们改，帮助他们。大分裂是避免了。一个是避免了大马鞍形。中国要搞大跃进，这是不可避免的。你可以临时搞大小马鞍形，都可以的，但是速度要加快呀，这是形势的要求，群众的要求，而且有可能，有这个条件。

据我看，总的形势是好的。国内的政治情况，经济情况，总的形势是好的，有些缺点，可以改，并且不难改。

所以总路线有两条，那时候搞改革的总路线；现在是建设的总路线，多快好省呀，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呀！凡是路线问题，是要经过考验的，就是不是那么安宁，不是那么太平的，并非太平无事。你看总路线的建立嘛，建立又倒，倒又建立。去年党代大会是 5 月间嘛，现在庐山闹乱子是 7 月嘛，一年多一点时间，就觉得不行了嘛。现在经过大家一议，又可以了嘛。你说将来没有风了？一点风没有了？我看还会有。你们说从此天下太平，四方无事？那么今年在庐山开会，才不过隔了一年，所为何来？但是总的趋势是好的，这个信心完全要有的。不管

你出多少乱子，代表无产阶级劳动人民意志的倾向要占优势，它总要占优势的；一个时候不占优势，另一个时候，它要占优势。现在看起来，我们是有保证的，我们的大多数、绝大多数，除极个别少数之外，是团结一致嘛。要建设得快一点，好一点，为建设社会主义的强大国家而奋斗，这是必然性，现在有保证。但是也要估计到；不会是那么风平浪静，要风平浪静一个时期，是完全可能的，另一个时期要准备刮台风的。这个政治台风将来什么时候来呢？我就料不到，但有台风要刮，这可以断言的，不会没有的，有阶级存在嘛。在一个省，在地方，也有这个问题，要有准备。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张闻天写给毛泽东一封信，说：“我这次动了大手术，对我以后的身体健康，定会起良好的影响。我衷心地感谢你和中央其它同志所给予我的帮助。我一定要同昨天的那个反动的我，永远决绝。”“我今天下山，希望能在北京，再见到你，并希望你多多指导。”

毛泽东收到这封信，当即批示：“印发各同志。印 160 多份，发给每人一份。走了的，航送或邮送去。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洛甫这封信。”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二日，黄克诚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承认错误的信。

毛泽东同样以热情欢迎的态度给以复信：“克诚同志：信收到，很高兴。你的那种态度很好。我表示热情的欢迎。错误并不可怕，只要能改就好了。错而能改，出以真诚老实，就能逐步地见信于人、变为一个好同志。这样一想，忧愁就可以减轻了，顺复。祝你大进一步。”

一九五九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给诗刊的第二封信

近日右倾机会主义猖狂进攻，说人民事业这也不好，那也不好。全世界反华反共分子以及我国无产阶级内部、党的内部，过去混进来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投机分子，他们里应外合，一起猖狂进攻。好家伙，简直要把昆仑山脉推下去了。同志，且慢！国内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一小撮投机分子，不过捡起几片鸡毛蒜皮，当作旗帜，向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举行攻击，真是“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了。全世界反动派从去年起，咒骂我们狗血喷头。照我看，好得很。六亿五千万伟大人民的伟大事业而不被帝国主义及其在各国走狗大骂而特骂，那就是不可理解的了。他们越骂得凶，我就越高兴。让他们骂上半个世纪吧！那时再看，究竟谁败谁胜。我这两首诗，也算是答复那些忘八蛋的。

一九五八年九月，在北京召开军委扩大会议，在军队负责干部中对彭德怀、黄克诚继续进行批判。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表示决心继续彻底反省自己的错误：

现在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根深蒂固的，个人主义是极端严重的。现在我也认识到党和人民培养我这样一个人，付出了多么大的代价，如果不是及时得到彻底揭发和批判，其危险性又是多么可怕！过去由于自己的资产阶级立场作怪，将你对我善意的恳切的批判，都当作是对自己的打击。因此，在每次对错误路线的斗争中，自己都没有受到教育，得到提高，使错误的顽症得不到医治。

请求中央考虑，在军委扩大会议以后，允许我学习或离开北京到人民公社去，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部分劳动，以便在劳动人民集体生活中得到锻炼和思想改造。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毛泽东对彭德怀来信的批语

此件即发各级党组织，从中央到支部。印发在北京开会的军事、外事两会议各同志。

我热烈地欢迎彭德怀同志的这封信，认为他的立场和观点是正确的，态度是诚恳的。倘从此彻底转变，不再有大的动摇（小的动摇是必不可免的），那就是“立地成佛”，立地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我建议，全党同志都对彭德怀同志此信所表示的态度，予以欢迎。一面严肃地批判他的错误，一面对他的每一个进步都表示欢迎，用这两种态度去帮助这一位同我们有三十一年历史关系的老同志。对其他一切犯错误的同志，只要他们表示愿意改正，都用这两种态度去对待他们。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和外事会议上的讲话

有几位同志，据我看，他们从来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到现在，他们从来就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是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他们只是资产阶级分子，投机分子混在我们的党内来。资产阶级的革命家进了共产党，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他的立场没有改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就不可能不犯错误，这样的同路人在各

种紧要关头，不可能不犯错误。

资产阶级分子混进共产党里面来，我们共产党员中，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成分很多，应该加以分析。分为两部分，大多数他们是善良的，他们能够进入共产主义，因为他们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少数人大概是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样的数目，或者一、或者二、或者三、或者四、或者五。少部分人他们要进入共产主义，要真正变成马克思主义者就是困难，我讲困难不是讲他们不可能，就是刘伯承同志讲过的，要脱胎换骨。

团结的旗帜非常重要。要团结，就是要有纪律。

绝对不可以背着祖国，里通外国。我们不许可中国的党员去破坏外国的党组织，挑起一部分人来反对另一部分人，同时我们也不许可背着中央去接受外国的挑拨。

我们大家要学点东西，要学习马克思主义。

一九五八年九月，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把《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和《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传达到全体党员，进而又传达到党外。

随即在党内开展了一场“反右倾”运动。运动中一大批党员、干部受到错误的批判和处分，一些同志被错误地划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批转湖南省委关于开展整风运动的情况和今年意见的报告。截止 12 月 10 日，湖南全省县以上机关单位共揭发出重点批判对象 4696 人，其是有 1630 人初步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其他各类分子，占参加整风干部的 1，96%。

一九六〇年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央直属机关党委、中央国家机关党委《关于在反右倾斗争的整风运动中犯有错误同志的处理问题的请求报告和关于划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标准和处理原则》。

中央直属机关的反右整风运动，从 1959 年 8 月中旬开始。两党委所属党员中列为重点批判对象的共 1900 人，占党员总数 61559 人的 3 %；被列为重点帮助对象的共 2714 人，占 4，4% 。重点批判对象中司局长以上（党中央直属机关 12 级以上）的党员干部有 287 人，占同级党员干部的 9，3% 。

贰、本节简论

关于庐山会议，已经出版的著作多有评论：

胡绳的《七十年》说：

“彭德怀的信反映了客观实际和群众要求。”

“毛泽东认为，从郑州会议以来，中央一直在领导全党努力纠正‘左’倾错误，而彭、张并未参与这种努力。在毛泽东看来，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方向是正确的。他始终没有放弃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若干空想的执着追求。他认为一九五八年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属于工作中的问题，只是十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而且他认为到上海会议……已经大体解决”。

“由于对彭、张过去积有不满，更加重了毛泽东看到他们的信和发言记录后产生的反感和猜疑。”

“又把国内的批评和争论同国际上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攻击和苏联赫鲁晓夫对中国的批评联系起来”。

“把庐山会议上党内关于方针政策的不同意见的正常讨论，当作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来看待和处理这就使反右派以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进一步升级，并且引伸到党内和党的高级领导层中来。”

薄一波的《回顾》中说：

“这表明毛主席改变了原来的观点，认为庐山会议原来就不应该反‘左’，而应该反右。这是庐山会议造成严重灾难性后果的主要原因。”

“根本的原因是毛主席和大家都认为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是不能动摇的。虽然从 1958 年 11 月郑州会议起就开始纠正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的各种问题，但始终把这些问题看作是具体执行中的问题而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本身没有任何怀疑，不认识也不承认指导思想有什么失误。毛主席积极地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辩护，甚至搬出马克思主义原理来辩护。”

“彭、黄、张、周的‘右倾机会主义’，说到底，无非就是他们要求总结‘大跃进’、人民公社经验教训的深度和广度，超出了毛主席所允许的限度和范围。这是他不能同意和接受的。庐山会议转向的原因，我想可能就在这里。”

《毛泽东传》说：

“彭德怀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作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给毛泽东写信，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精神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如实地指出“大跃进”中的一些偏差和错误，反映广大党员和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不论从信的内容还是从组织原则来说，都是正确的。（虽然彭德怀在小组发言中和个别谈话中，也说过一些情绪偏激的话，对毛泽东有刺激。）如果没有彭德怀那封信，事情也许不会发展到如此激烈的程度。这样看起来，事情似乎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是，由于毛泽东的“左”的指导思想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变，纠“左”纠到一定程度，即超越他可能允许的范围时，就会提出反右的问题，这又是不可避免的。”

那末，庐山会议的斗争是怎样引起的？其性质及影响如何呢？

不妨再分析一下会前会中的情况。

已经出版的各种著作，只突出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在会上的发言，而对其他的重要情况，不是不说，就是把它湮没在各种“材料”之中。最典型的是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关于这本书，据李锐说，1980年讨论《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时，中央领导同志即建议作者写出这一段历史，胡在11月19日的信中说：“你是否可以负责写一庐山会议始末史料，写出后再找有关同志补充审定。这事很要紧，值得付出心血。万一我辈都不在了（人有旦夕之祸福），这一段重要史料谁来写呢？会写成什么样子呢？”并“指定党史研究部门的同志，从资料方面给我以帮助。”后来，胡乔木收到这本书以后说：这是我建议写的，我对此完全负责。胡乔木确实有心计，想问题想得深。诚如他所预料的，李锐的这本书出版以后，成了有关庐山会议的最具权威的说法，几乎占领了整个干部以及知识分子的思想市场。市场如此看好，因此，在1988年内部出版以后，又于1992—1993年加以增订并公开发行。无庸讳言，既然李锐他们是按照自己的观点来写的，在选择材料时，极有可能只选那些对自己有利的东西，而对他们不利的东西就不选用，或者在材料的处理编排上加以“淡化”，使它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关于前一种情况，一般人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他们既然不是“党史研究部门”，就不可能垄断占有党史资料，也就不可能提出新的资料去反驳他。但是，邓力群说过：“李锐在他的一本书中，把毛主席在庐山会议上的讲话发表了，但只是把对他有利的发表了，不利的就删掉了。他的书中，资料不全面、不准确。我保存的档案资料里有毛主席历次讲话的记录。”（邓力群关于社会主义

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关于后一种情况，一般人是可以有所作为的。就是把那些被他湮没在材料的海洋之中的资料找出来，还它本来的生命和价值。

下面把《实录》提供的情况作一些梳理：

1959，7，1 在专列上，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在一起谈话：

几个人都“对 1958 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增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 年 6 月第一版，第 12 页，以下简称实录）

几个人都认为：“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台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这时，他自己也感觉到，应当如何来转变了。”（实录，13 页）

李锐说：“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据李锐说，这是转述胡乔木的一种比喻）（实录，158 页）

1959，7，1，在专列上，彭德怀说，匈牙利人均每年吃 40 公斤肉，还出了匈牙利事件。“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也会要请红军的。”（实录，96 页）

1958，7，3 中南组开会传达十八个问题。李锐感到“依然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绝对肯定”，“大跃进等‘三面红旗’不根本怀疑，实难从根本上纠‘左’”。

李锐与田家英交谈：“我们都感觉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我们都认为，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实录，35 页）

1959，7，5 周小舟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毛泽东以个人名义直接写信给基层组织和干部，不知是否经过中央。从欧洲回来向毛泽东汇报，说起铁托左右有几十人跑到阿尔巴尼亚去了，此时毛泽东脸色顿时发红。中央常委之间有些问题不能很好展开讨论，有的是不便说话，有的是不多说话，他自己对某些工作的缺点，倒是敢于说话的，并且还给毛泽东送上些反面材料，例如这次送的广州军区材料。毛泽东凡事总要一竿子插到底，否则，不愿转弯或回头。有些意见想找他谈，又怕讲错，引起不满；由于自己性格，言词生硬，容易顶撞，容易戳一下，弄不好引起误会。不过，犯上了，顶多撤职，也不要紧，黄克诚可以当国防部长。（实录，99 页）

1959，7，3-10 日，彭德怀在西北小组会议上发言说：

人民公社办早了一些，北戴河会议以后搞了一个“左”的东西——全民办钢铁。

我们党内总是“左”的难纠正，右的比较好纠正。“左”的一来，压倒一切，许多人不敢讲话。

成绩是伟大的，缺点是一个短时间（9 至 11 月）发生的，而影响则不止 3 个月。

换来的经验教训是宝贵的，要把问题搞一致，就团结了。要找经验教训，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责任。人人有责，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泽东同志在内。我也有一份，至少当时没有反对。

现在不是党委的集体领导作决定，而是个人决定；第一书记决定的算，第二书记决定的就不算。不建立集体威信，只建立个人威信，是很不正常的，是危险的。

（实录，98 页）

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实录，119 页）

1959，7，12 前，张闻天与彭德怀多次交换意见：

张闻天说：庐山会议压力很大，只能讲好，不能讲坏。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从中国历史学了不少好东西，但也学了些统治阶级的权术。

彭德怀不同意张的说法，认为毛泽东同斯大林晚年不同。上海会议时，毛泽东批评了一些人，包括对他的批评，他是不满意的。毛泽东自己犯了错误，不认帐，不检讨，反而责备别人。

两人都认为，革命和建设的胜利，有些胜利冲昏了头脑，毛泽东也有些骄傲了。

（实录，100 页）

1959，7，12 日上午，周小舟再次找彭德怀谈话。彭德怀说，有些意见还不成熟，在西北小组会上没有谈。有些谈了，会议简报上也没有登，因此想写一封信。周小舟很赞成写信，说将那些发言加以充实，就很好了。（实录，99 页）

1959，7，12 日以后，彭德怀的信写好以后，把内容都讲给张闻天听了，并

告诉张：信中安了五条刺毛泽东同志的“刺”。并叫张看信。张没有看，怕说搞宗派。（实录，266页）

1959，7，14日下午，彭德怀把信送到毛泽东处。

1959，7，16，在这天之前，周惠在一次打牌中说：“1958年是三种人：官僚主义，不讲真话，看风使舵。”“各省第一书记都该打一百板屁股。”（实录，69页）

1959，7，16，会议印发了彭德怀的信，并对参会人员重新编组。

1959，7，17下午，毛泽东又找周小舟、周惠、胡乔木、田家英和李锐谈话。

1959，7，16日之后，李锐、胡乔木、田家英、张闻天等聚谈，李锐说：我们这是“低调俱乐部”（抗日战争初期，汪精卫、陈公博等人持悲观论调，自称为“低调俱乐部”）。胡乔木马上说，不是，不是，我们这是马克思主义俱乐部。（实录，122页）

1959，7，21日早，胡乔木给张闻天打电话：“要他少讲些缺点，尤其不要涉及全民炼钢和得不偿失的问题。”（实录，122页）

1959，7，21日，张闻天在第二组作长篇发言。

张闻天把发言提纲给彭德怀看，彭德怀赞扬讲得全面，张闻天说“这是支持你的”。（实录，266页）

1969，7，22日前，田家英对李锐说：“左派”司令部由柯庆施、李井泉等挂帅，他们组织人攻击《会议记录》，攻击彭德怀的信，也攻周惠。他们知道彭德怀同毛泽东之间有历史上的宿怨，说这封信的矛头就是针对毛泽东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个人决定”，“政治性问题”，“纠‘左’比纠右难”，“不那么得心应手”，这些话都是指着毛主席说的。说犯了路线错误，自己是不能改正的。还有传言，彭德怀在拉队伍；说书记处成员，一半对一半，等等。（实录，119页）

1959，7，23日上午，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言。

1959，7，23日晚上，李锐去周小舟、周惠住处谈话。周小舟说：毛泽东的这篇讲话，是否经过常委讨论。按照讲话精神发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没有真正集体领导，只有个独断专行。这样，终将导致党的分裂。李锐、周惠都同意这种看法。周惠说：毛泽东对一些问题的决定，反复变化太快。斯特朗曾当面称

赞毛泽东超过马恩列斯，而毛泽东没有答话。多年来的顺境，毛泽东确实骄傲起来了。李锐说：毛泽东确是喜欢高指标的，只喜欢柯庆施那样一些吹牛说大话、奉承迎合的人。这样的讲话不是翻云覆雨吗？周小舟说：这个讲话是一百八十度转弯，使人转不过弯来。（实录，141 页）

1959，7，23 日夜，周小舟、周惠、李锐到黄克诚处谈话。

周小舟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自己有错误，多想想，可以作检讨。

彭德怀进来后，周小舟说：老总呀，我们离右派只有真有三十公里了。

彭德怀说：着急有什么用。

（实录，141-142 页）

1959，7，23-29 之间，李锐同周小舟、周惠之间还有来往，田家英也悄悄与李锐联系。

“有天晚上，田家英来到我的住处特意告诉我，在起草反党集团文件，周小舟在内，让我通知二周，加倍小心谨慎。田家英还告诉我，问过总理，没有我的名字。这期间田家英还告诉我一些重要情况：在毛泽东住处召开的大区负责人会上，有人说彭德怀就是纳吉。毛泽东独自在房间时，林克在旁，对林克说，朱德是老右派，张闻天也是；李锐这次也是个右派。

“我向二周转告了田家英的关照之后，觉得有必要作最坏的打算了。约定三人之间所谈的种种危险的东西，如同烧掉一般，任何情况之下不要再提了，免得情况说不清楚，搞得越来越复杂。”

（实录，169 页）

1959，7，29 日，田家英向李锐转告胡乔木一个主意，让李锐给毛泽东写一信，以释去“二十三号夜晚的猜疑”。（实录，172 页）

1959，7，30 日，毛泽东与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

李锐在毛泽东处谈完话出来，遇见田家英。田家英对李锐说：决不要轻信，大难还在后面。彭德怀是政治局委员，政治局没有开会讨论就让小组去批斗，太

不应当了。毛泽东这样独断专行，晚节不终。担心总理被牵扯上。这些党的元勋，应当受到保护。（实录，173 页）

当晚，李锐接受胡乔木的意见，向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当然‘斯大林晚年’等要害问题，我隐瞒了，而且用政治生命这样的重话作保证，想取得他的相信。”（实录，174 页）

1959，8，13 日，周小舟给毛泽东写信，其中写到李锐与田家英等来往交谈之事，特别是提到田家英准备在离开中南海时向毛泽东的三条进言（即：一是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是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是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实录，34 页）

后来周小舟在大会上作交待时又重复证实这件事。当场，李锐为了保住田家英就站出来说：这三条意见是我自己的想法，跟田家英无关，大概是小舟听误会了，这完全由我负责。（实录，305 页）

以上只是根据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提供的某些材料。根据上述情况，可以看出：

一、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反党集团的决议是有根据的。

首先，彭黄张周等人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在他们那个小圈子内部谈话时，可以看出他们确实是反对“三面红旗”的。

彭德怀说，大跃进的缺点，我也做了调查，要不是中国的工人农民好，我们也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

李锐与胡乔木、田家英等“对 1958 年的‘大跃进’，都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 1958 年大跃进出了轨，翻了车。1958 年毛泽东亲自到前如来直接管经济，来发号司令，结果碰了这么一个大钉子。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太外行，去年不到前台来指挥就好了。毛泽东不如总结中国革命经验，专门从事理论著述为好。

但是，在公开的场合，他们都说自己是拥护社会主义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二十年后，在新的流行思潮中，他们中一些人，争先恐后地亮明身份，都说自己当时就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

其次，他们都宣扬：毛泽东与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张闻天说：毛泽东很英明，但整人也很厉害，同斯大林晚年差不多。

周小舟对黄克诚等人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前，围着袁的

那些人，专门印一种报纸给袁看。

李锐说：他不能一手遮天。

黄克诚说：毛泽东又不是慈禧太后，中央集体领导很好。

所谓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袁世凯称帝”、“慈禧太后”是什么意思呢？

在会上，胡乔木对“斯大林晚年”说法，作过一些分析说明：他说，毛主席有点像斯大林晚年这个话，用意显然是专门说斯大林的错误方面，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这是对毛主席和党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污蔑。他从六个方面作了比较：

(1) 斯大林晚年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 (2) 斯大林晚年在党内是不讲民主的或少讲民主的，连中央全会都不召开…… (3) 斯大林晚年提倡个人迷信…… (4) 斯大林在肃反问题上犯了严重错误，他常把党内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同敌我矛盾混淆起来，以致在苏共党内有许多中央委员、高级将领等被错误地杀害了…… (5) 斯大林晚年无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停滞的倾向…… (6) 斯大林晚年对外犯过大国主义的错误……。 (实录，282 页) 这里，暂时不评论胡乔木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讲这番话，以及他讲这番话的真意是什么？但是，他至少承认“这是一个严重的原则问题”。

李锐在《实录》中也说：“8 月 10 日这一天，是揭批‘军事俱乐部’中突破最后‘堡垒’的一天，在三个临时小组中，都是上午开始揭开所谓‘斯大林晚年’这个问题的。” (277 页) “斯大林晚年这个爆炸性的问题一攻破，人们的‘攻坚战’取得最后胜利，当时我就感觉到，庐山会议可以结束了。” (284 页)

这说明，说毛泽东“很像斯大林晚年”，这是小圈子中的人的一个共同的、带有纲领性的口号，因而成为这场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问题，也成为判定“反党集团”的重要根据。二十后，依然是其中的某些人，更鲜明地提出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口号。这就说明“很像斯大林晚年”这个口号对于他们的重要性，而且始终没有放弃。

再次，他们之间确实有一个小圈子，有一些非组织的活动。人们称之为“湖南集团”、“湖南派”，他们自己称之为“低调俱乐部”。

正是根据以上几点，1959 年 8 月 1 日，周恩来在常委会上说：“方向是对总路线进攻，站在右倾立场，信的锋芒指向总路线。” (实录，196 页)

二、里通外国问题也不是“捕风捉影”。

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中说了这样一段话：

“毛主席批彭德怀的重要原因，是他“里通外国”。” “1959年彭德怀到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去访问，在苏联的时候，赫鲁晓夫利用会见彭的机会批判我们，内容没有比我们党内自己揭发的错误有更多的东西，但是，彭德怀当时没有把赫鲁晓夫这些批判给顶回去。同他一起去访问的，还有肖华，回国以后，肖华给党中央、给军委作了汇报，彭德怀没有汇报，这可能成为后来所谓里通外国的证据。” “庐山会议期间，北京只留下陈毅同志留守，陈毅对尤金讲，我们中央同志都上山开会啦，北京就剩下我一人了。也不知道是出于开玩笑，还是有意试探，尤金说，那你可以搞政变了。陈毅当天晚上向中央发了电报。”

“在去庐山开会的火车上，彭德怀对康生等说，我们大跃进的缺点，他也做了调查，搞不好我们还得请苏联红军来帮助我们。这种话可能引起毛主席的注意。”

“后来听说，随彭德怀出访中有一个人庐山会议后，编了一些黑材料。直到1962年，毛主席对彭德怀“里通外国”的问题还一直不放。”

肖华是怎样向中央汇报的？另一个人编了一个什么样的“黑材料”？这些情况只有待将来文件全部解密以后，才能搞清楚。

三、历史旧帐也确有不得不算的理由。

本书原文说：“彭德怀为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同任何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难免有缺点和错误一样，他在历史上也有过失误，而这些问题都早已解决。因发生意见分歧而算历史旧账，不仅无助于弄清是非，而且必然伤害同志。”“说彭德怀他们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的同盟者”，这个论断显然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正是后来把老干部等同于“民主派”，“民主派”等同于“走资派”这个错误观点的初始。”

“历史旧帐”问题是由彭德怀自己首先提出来的。他在西北小组会议的发言中说：延安整风时召开的“华北座谈会”，“操了我四十天的娘”。这里虽然只说了这样一句话，但这句话的份量是很重的。它说明彭德怀对延安整风、对华北座谈会的根本态度。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召集华北座谈会“这是我建议的。因彭要到党校作报告，怕做不好，对他不利。小范围扯清楚，使彭得到了解，再去作为好……华北会应开，人家这么多意见，同中央关系如此恶劣，而你名之曰操四十天的娘。”（实录，200页）

罗瑞卿在庐山会议指出：“华北会议你还不舒服，我看你怎么也赖不掉。因为我们批评你的四大错误：反对洛川会议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执行王明路线；对群众运动鞋泼冷水；闹独立王国。这是铁一般的事实，怎么也赖不掉的。”（实录，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常委会上说：“会理会议前，批评军委，很不守纪律，我听不下去了。建议打电报，不要这样讲。我要打电报，话都是彭的。写好电报交彭和尚昆，彭不签字。会理杨、刘电报，是彭的意见。不签字不对，并不勇敢。”（实录，199页）我与彭“同去看关向应，关流着眼泪说：‘彭总，你不要反对毛主席，闹派别。我是快死的人了。’觉得我没发表意见，对我不满。”（实录，200页）

“历史旧帐”与现实问题有着密切联系。彭德怀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同张闻天搞在一起，反对“三面红旗”、反对党中央、反对毛泽东？难道没有他的政治根源和思想根源吗？

四、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考虑

本书原文说：“由于对形势做出错误的估计，对党内的矛盾和意见分歧做出错误的判断并采取错误的方针，其结果只能使党内的政治生活遭到严重破坏。”

当时党中央和毛泽东对形势是怎样判断的？

1959年8月1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你跟人的关系搞不好，十个元帅，除自己外，都对你有意见，工作怎能做好？对于元帅，你如此看待：一个也不佩服，不在眼下。哪个在眼下？十个大将更不在话下。”（实录，190页）“我六十六岁，你六十一岁。我快死了（要准备后事了，如果我有三长两短，谁还能管得住你。216页）。许多同志有恐慌，难对付你。很多同志有此顾虑。”（实录，193页）“邓小平在你面前有顾虑，对你并非没有意见。”（实录，195页）

1959年8月1日，刘少奇说：“高岗事件后，本想找你谈一次，怕扯开一谈，谈不进，没有谈，怕挡回去。”（实录，203页）“元帅心情，不好合作。

我也有此心情。难道都怪这些人，你就那么好？”（实录，206 页）

1959 年 8 月 3 日，聂荣臻在小组会上说：“我们都提到他的犟不驯。剑英同志说：毛泽东同志健在时，你就这样，将来党内谁管得了你。”（实录，170 页）

正是由于考虑到党和国家的长治久安，才下决心作出决议的。站在不同立场的人，或不处在政治高层的人，恐怕很难理解这样的良苦用心。但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在中外的历史上，这样的事例是不少的。

五、庐山会议的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

本书原文说：“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扩大化，导致改变中共八大关于当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而把阶级斗争作为主要矛盾，成为毛泽东失足的地方。庐山会议，把阶级斗争直接延伸到共产党内，使阶级斗争进一步扩大化，成为毛泽东又一个失足的地方。”

“把党内的分歧和矛盾，直接说成是阶级斗争，这大概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就把一九五七年反右派运动中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进一步延伸到党内，使党的民主生活和民主集中制原则遭到严重损害，影响深远。”

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它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我们再看一下毛泽东的这个批语的有关段落：

在《机关枪和迫击炮的来历及其它》的批语中，他写道：“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在中国，在我党，这一类斗争，看来还得斗下去，至少还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个世纪。总之要到阶级完全灭亡，斗争才会止息。”

“资产阶级的政治家说，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一点也不错。不过，斗争形式，依时代不同而有所不同罢了。”

“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是毫不足怪的。没有这种斗争，才是不可思议。这个道理过去没有讲透，很多同志还不明白。一旦出了问题，例如一九五三年高、饶问题，现在的彭、黄、张、周问题，就有许多人感觉惊奇。”

毛泽东在第一段话中说“庐山出现的这一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实质来说的；在第三段中又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

争”，这是就这场斗争的性质来说。庐山会议这场斗争就其实质来说是一场阶级斗争，为什么说它是阶级斗争，它与阶级斗争是什么关系？毛泽东说“党内斗争，反映了社会上的阶级斗争”。这里说得很完整、很清楚。

2011 年 5 月 22 日修改

第五节 反对急躁冒进，完善公社体制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五九年冬以后急躁冒进再次抬头，重新刮起“共产风”

一九五八年冬以来，党中央和毛泽东再三再四地指示，必须坚决纠正农村人民公社化初期产生的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但实际上，大部分地区纠正不彻底，一九五九年冬以后又重新刮起“共产风”；还有一部分地区则一直没有认真纠正。破坏和阻碍农业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仍然存在。除了其他政治上的原因（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以后，全党开展了一场“反右倾”斗争，放松或中断了纠正“左”的错误）外，最根本的原因还是在于，农业集体所有制采取何种具体形式才能与当前阶段农村的大部分地区的基本的生产力发展状况相适应。毛泽东和全党同志一道仍在作艰苦的探索。

此外，经济建设中的高指标、浮夸风也没有完全纠正过来，加之，一九六〇年提出几个大办，更助长了这种风气。

一九五九年七月初，毛泽东在庐山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始的讲话中，就提出要使生产小队成为半核算单位。

一九五九年十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批转农业部党组《关于庐山会议以来农村形势的报告》中，又批评有些地方变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为以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或者在保持基本队有制的情况下，把收入的 50%——60%以上归生产小队分配。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三十日至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毛泽东说：

一九六〇年钢产指标一千八百万吨，无论如何要超过，二千二百万吨不要去打算，搞到二千万吨就了不起了。

棉提个四千五百万担或者稍多一点，就可以了。去年估计四千七百万担，实际只有三千八百万担。这九百万担是脑筋里的。现在提四千五百万担，比较稳当，这并不束缚我们手脚。粮食定为六千亿斤，行不行？天有不测风云，今年只要有五千亿斤，就大有可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浙、皖、苏、沪四省市座谈会讨论人民公社过渡等问题，会议同意以分配给社员每人平均二百元左右作为由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的条件。据此，从基本队有过渡到基本社有，上海大约要三到五年，其他各省大约要五年左右，或更长的时间。会议认为，从现在起，就应当积极发展社有经济，为过渡创造条件。生产大队的经济同样要积极发展，保留生产小队小部分所有制，也是必要的，但必须进行适当的控制。

这次会议以后，急于由基本队有向基本社有过渡的苗头又有所滋长。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十日至一九六零年二月九日，毛泽东读苏联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

1959年的12月上旬，毛主席指定陈伯达、胡绳、田家英和邓力群同他一起读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社会主义部分。12月10日读书开始，边读边议，听毛主席谈话，大家也插几句话。在杭州前后二十五天，除去三个星期日和1960年元旦，实际读书的时间是二十一天。每天下午读，一般从四时左右起到九时左右吃晚饭止；也有时从二时、五时、六时开始读，到七时、七时半、十时结束。

毛主席读书很认真，一边听朗读，一边看书本，还不时在一些提法下面划横道，或者在旁边划竖道，打记号。从头到尾，都这样划。有的段落，毛主席划了以后接着就发表议论，有的长，有的短。

1960年1月7日至17日在上海举行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分组讨论时，各组讨论时参加毛主席读书小组的人传达了毛主席读书时的谈话内容。

1960年1月17日上海会议结束后，至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在广州白云山读完了第三十四章至第三十六章和结束语。陶铸、胡乔木参加了这段读书活动。

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召开的上海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国家计委《关于一九六〇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会议认为，一九六〇年还将是一个大跃进年，可能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确定一九六〇年钢产量为一千八百四十万吨，粮食产量为六千亿斤。会议还要求本年内大办公共食堂，试办和推广城市人民公社。

二、一九六〇年三月毛泽东批转广东、山东报告再次强调存在着重复“一平

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中共中央批转的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又指出：在人民公社从基本队有制过渡到基本社有制的问题上，存在着加快过渡、想赶先的苗头；在发展公社一级经济力量问题上，存在着重复“一平二调”刮“共产风”的错误。

一九六零年三月五日，毛泽东对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的批语：

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主要问题的指示》，是一个很好的文件，甚为切合现时人民公社在缺点错误方面的情况和纠正这些缺点错误的迫切要求。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的情况大体上一定都同广东一样，发生了这些问题（一共有五个问题），都应当提起严重的注意，仿照广东的办法，发出一个清楚通俗的指示，迅速地把缺点错误纠正过来。中央建议，把广东这个指示发到地、县，公社三级党委，请公社党委的同志们，切实讨论几次，开动脑筋，仔细地冷静地想一想，谈一谈，议一议，想通这五个问题，纠正缺点错误。现在形势大好，缺点错误是部分的。但是一定要纠正，不使这五方面的现在还是部分性质的错误扩大开去。我们的相当多的干部，在政治水平、经济理论水平和对实际工作的分析、理解水平都是不高的，有些人还是很低的，他们在这些方面还不成熟，这是他们的缺点。他们正在逐步走向成熟的过程中。这是一方面。他们干劲很大，热情很高，要把中国变成一个伟大、强盛、繁荣、高尚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国家的雄心大志，则是很好的。这是又一方面。特别是第一个方面，即他们的缺点方面，努力学习，认真思考，在几年之内，例如说，五年至十年之内，将自己的政治、理论和业务水平大进一步的成熟和提高起来。在这里，顺便说一句，工业交通战线，教育文化科学战线，卫生医疗药物战线，中央建议也照这样办，解决他们自己的问题。

（附注：这个批语所说的五个问题是：

- 一、不顾条件，抢先从队有制过渡到社有制的苗头；
- 二、用削弱大队经济的办法，来发展社的经济，重复刮“共产风”的错误；
- 三、公社积累过多，收回社员自留地，集中私养的家畜、家禽，不适当地限制社员的家庭副业生产；

四、社、队干部不讲究经济核算，铺张浪费；

五、社、队干部不如实反映情况，作风浮而不深、粗而不细、华而不实，不同群众商量，不关心群众生活。）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

山东发现的问题，肯定各省、各市、各自治区都有，不过大同小异而已。问题严重，不处理不行。在一些县、社中，去年三月郑州决议忘记了，去年四月上海会议十八个问题的规定也忘记了，“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又都刮起来了。一些公社工作人员很狂妄，毫无纪律观点，敢于不得上级批准，一平二调。另外还有三风：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又大发作，危害人民。什么叫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他们全不理睬。所有以上这些，都是公社一级干的。范围多大，不很大，也不很小。是否有十分之一的社这样胡闹，要查清楚。中央相信，大多数公社是谨慎、公正、守纪律的，胡闹的只是少数。这个少数公社的所有工作人员，也不都是胡闹的，胡闹的只有其中一部分。对于这些人应该分别情况，适当处理。教育为主，惩办为辅。对于那些最胡闹的，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平调方面的处理，一定要算账，全部退还，不许不退。对于大贪污犯，一定要法办。一些县委为什么没有注意这些问题呢？他们严重地丧失了职守，以后务要注意改正。对于少数县委实在不行的，也要坚决撤掉，换上新人。同志们须知，这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是一个客观存在。出现这些坏事，是必然不可避免的，是旧社会坏习惯的残余，要有长期教育工作，才能克服。因此，年年要整风，一年要开两次六级干部大会。全国形势大好，好人好事肯定占十分之九以上。这些好人好事，应该受到表扬。对于犯错误而不严重、自己又愿意改正的同志，应该采用教育方法，帮助他们改正错误，照样做工作。我们主张坚决撤掉，或法办的，是指那些错误极严重、民愤极大的人们。在工作能力上实在不行，无法继续下去的人们，也必须坚决撤换。

一九六零年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天津会议上的讲话

四化问题。

机械化、半机械化、自动化、半自动化今年要大搞一下。现在全国都在搞，包括城市、农村、工业、农业、商业、服务行业。统通提出来。半年要化，十年以后还要化。

农村人民公社问题。

五个问题（指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中的五个问题）。还有其他问题，中央已发指示。要开六级干部会。山东的一个材料，一平二调，不守纪律，根本不向县委、更不向省委报告。这种现象不会很多，也不会很少。要切实整顿一下。要抓落后的，先抓落后的。

这个问题很值得注意。敢说、敢想、敢做是对的，如果什么都敢想、敢说、敢做，那就不对了。有所不为，然后才能有所为。现在把“三敢”变成绝对化，这是没有辩证法。

农业问题。

主要是粮食问题。农业有十二个字：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十二个字是个部署问题，要从战略布局出发。省、地、县、社干部都要懂得十二个字，有计划地进行布署。这是农，还有林、牧、副、渔。林，有各种林：用材林、薪炭林、防风林、水源林、经济林等。种什么树？杉树、松树？柏树？都要因地制宜。牧，“马牛羊、鸡犬豕”，此六畜人所食，还有鸭、兔。此外，还有副、渔。要看各种具体情况。大家都去搞粮食，其他没有人搞，这是破坏原有的经济秩序。

工业问题。

现在小土群、小洋群只剩下××××个，又有点冷冷清清的样子。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还是要搞，出点乱子不要紧。小洋群、小土群搞什么？搞金属、化工、石油、水泥、木材等等。一九六〇年抓紧搞，搞三年，分期分批地搞，把小洋群钢铁布点搞起来。凡是有煤有铁的地方都搞一点，有煤无铁的地方可以交流。

支援农业问题。

工交系统、财贸系统、文教系统、大中城市、大中小工矿企业普遍支援农业，全国普遍化，农业有希望了，否则“四、五、八”有危险。上海有十一个县，达到亩产八百斤，上海支援农业的成绩最大。广东的县，百分之四、五十达到亩产八百斤。这首先是个布局问题。

教育问题。

地方要大搞教育，比如业余教育、扫盲教育、农业中学。日本福冈县，一个县有七个大学。我国自秦始皇统一以来，好处是统一，坏处是统死。欧洲小国很

多，一个小国等于我国一个省，坏处是不统一，但是经济、文化大大发展了。我们要在统一的原则下，补充我们的不足。各地要办大学，各部门也要办大学。这也是个布局问题。我们总要比秦始皇、唐太宗进步些，使省、专、县、社发展起来。

除四害问题。

近两年来，比较放松了。现在不打麻雀了，以臭虫代替麻雀，臭虫是代表。

我说过卫生部门从来不讲卫生，不讲爬山、跑步、游泳，也不讲爬山要领。稷山县的那个材料是卫生部的好文件。

三反问题。

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好几年不反了，要大反。山东茌平县八万元的积累，用七万元盖大礼堂。有的贪污救济粮款。

三、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上海锦江饭店召开，主要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后三年的补充计划。

这次会议，毛泽东提出，要转入主动，改变被动局面，决心降低计划指标。

在六月十四日的政治局扩大会上，毛泽东就计划问题发表讲话，中心内容就是降低计划指标，把质量问题提到第一位。

他说：“八大一次会议通过的“二五”计划，总理作的报告，最好的部分，就是指标订得低的那部分，现在谁说八大犯了右倾机会主义？八大有两条经验，第一，大多数项目，以钢为例，打得很低，以至给我们留了很大余地。第二，有些指标打高了，就是棉、油、糖。”他说，要按实际可能办事，还要打点回旋余地。

毛泽东特别对基本建设不放心，怕失控。他说：“今年大型水利工程计划搞一百个，结果是三百六十个，搞那么大的规模，就要有那么多人上阵，质量就不够标准，大水一冲就垮。所以基本建设要好好抓一下。规模不要过大，质量不可不讲。恐怕要提出质量放在第一位。过去有个时期，包括我在内，想那个大数目字，比如一亿吨钢，实在有味道。多少年之后，我们有一亿吨钢，接近美国，那该多好呀！我看，现在不要着重那个东西，要着重门类样样都有，钢与钢材的

规格很高，普通钢之外还有特殊钢，而特殊钢要达到世界水平。总而言之，这次会议要解决这个问题。报告指标要修改，讲质量、品种、规模，把这个提到第一位，把数量放到第二位。”

他说，把质量提高到第一位，恐怕到时候了。五八、五九年讲数量，今年要讲质量。规格、品种，过去就是没人管，不安排，十年不安排。你九年不安排，第十年安排也好，可是直到今天为止，还不安排。有什么办法呢？是不是专门搞个缺门部，叫拾遗补缺部。日本、德国的钢并不多，但品种全。我们的钢，都要顶用的，要品种全，普通钢之外，要有各种特殊钢。要着重搞规格、品种、质量。品种、质量放在第一位，数量放在第二位。

根据毛泽东压缩指标的意见，国家计委六月十七日提出一个新方案交会议讨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

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

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一九五七年反右整风斗争，是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反映了客观规律，而前者则是开始反映中国客观经济规律。一九五八年五月党代表大会制定了一个较为完整的总路线，并且提出了打破迷信，敢想、敢说、敢作的思想，这就开始了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

几个月内公社的架子就搭起来了，但是乱子出得不少，与秋冬大办钢铁同时并举，乱子就更多了。

主动权是一个极端重要的事情。主动权就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这件事来自实事求是，来自客观情况对于人们头脑的真实反映，即人们对于客观外界的辩证法的认识过程，中间经过许多错误的认识，逐步改正这些错误，以归于正确。现在就全党同志来说，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正确的，有许多人并不懂得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我们有责任帮助他们懂得，特别是县、社、队的同志。

看来，错误不可能不犯。如列宁所说，不犯错误的人从来没有，郑重的党在于重视犯错误，找出犯错误的原因，分析可能犯错误的主观和客观的原因，公开改正。我党的总路线是正确的，实际工作也是基本上做得好的。有一部分错误也

是难于避免的。哪里有不犯错误一次就完成了真理的所谓圣人呢？真理的认识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逐步完成的。我们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者，不是形而上学的认识论者。自由是必然的认识。由必然王国到自由王国的飞跃是在一个长期的认识过程中逐步完成的。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我们已经有十年的经验了，已经懂得了不少的东西了，但是我们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还不足，在我们面前，还有一个很大的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还不深刻地认识它。我们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研究它，从而找出它固有的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对中国如此，对整个世界也应该如此。

6月18日，毛泽东对国家计委提出的新方案仍不满意，认为这“后三年的指标，仍然存在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对于留余地，对于藏一手，对于实际可能性，还要打一个大大的折扣，当事人还不懂得”。他说，昨天常委和几位管经济工作的同志交换了一下意见，认为这个调整方案还得调整。

周恩来说：“这次搞得彻底一点，像主席《十年总结》说的，一次把这个主动权拿过来。”

毛泽东说：“就是想得点自由，不然总是捆绑手脚，自己不得翻身。我当了这么多年解放军，结果自己又没有解放。”

这次会议，指标一压再压，会议的过程成了压指标的过程。

一九六零年七、八月，中共中央举行北戴河工作会议。

一九六零年七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的三级所有制，至少五年不变，死死的规定下来。搞一个“机械论”，再不要讲三年五年从队基本所有制过渡到社基本所有制。不这样，基层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都不满意，满意的只是社干部。在集体所有制占优势的前提下，要有部分的个人所有制，总要给每个社员留点自留地，多少一定要给他们一点，使社员能够种菜、喂猪喂鸡喂鸭。这个问题是同生产队干部作斗争的问题，要下个狠心解决。只有大集体没有小自由，不行。人家没有不同意见，回去就照着这个意见作，不要忘记，不要面从心违。在自留地问题上中央批转贵州食堂问题的指示。有毛病。要改过来。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中指出：（1）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2) 坚决反对和彻底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3) 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4) 坚持生产小队的小部分所有制。(5) 允许社员经营少量的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代中央草拟的关于彻底纠正五风问题的指示：

必须在几个月内下决心彻底纠正十分错误的共产风、浮夸风、命令风、干部特殊风和对生产瞎指挥风，而以纠正共产风为重点。带动其余四项歪风的纠正。省委自己全面彻底调查一个公社（错误严重的），使自己心中有数的方法，是一个好方法。经过试点后分批推广的方法，也是好办法。省委不明情况是很危险的。只要情况明了，事情就好办了。一定要走群众路线，充分发动群众自己起来纠正干部的五风不正。反对恩赐观点。下决心的问题，要地，县、社三级下决心（坚强的贯彻到底的决心），首先要省委一级下决心，现在是下决心纠正错误的时候了。只要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根据中央十二条指示，让干部真正学懂政策（即十二条），又把政策交给群众，几个月时间就可把局面转过来。湖北的经验就是证明。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精简干部和安排劳动力五人小组《关于中央一级机关抽调万名干部下放基层情况的报告》上批示：

全国大好形势，占 2/3 的地区；又有不大好形势，占 1/3 地区。在讲大好形势、学习政策的过程中，要有一段时间大讲 1/3 地区的不好形势，坏人当权，打人死人，粮食减产，吃不饱饭，民主革命尚未完成，封建势力大大作怪，对社会主义更加仇视，破坏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

经过 5 个月的工作，把一切坏人坏事都改过来，使邪气下降，正气上升，争 1962 年的农业大丰收。

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代中央起草对《甘肃省委关于贯彻中央紧急指示信的第四次报告》批示

甘肃省委在报告中检查说：人民公社化后，全省的“共产风”一刮再刮的根源是：急于第八个五年计划基本队有制向基本社有制过渡，总想多搞一点共产主义因素，要求各地发展各种社有经济过急过高；省委主观主义，去冬今春动员 70%—80% 的农村劳动力大搞水利、养猪场、商品基地、丰产方等七、八项工作，

任务重、要求急，这些都造成平调、刮“共产风”。与此同时，又对估产偏高，谴责以认为粮食相当多，口粮安排不落实，致使部分县社发生了严重事故（即浮肿病、非正常死亡），并且到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

批示指出：

甘肃省委在作自我批评了，已经有了真正改正错误的决心。

毛泽东对这个报告看了两遍，他说，他是同一切愿意改正错误的同志同命运、共呼吸的。他说，他自己也曾犯了错误，一定要改正。错误之一，是在北戴河决议中对公社所有制转变过程的时间设想得过快了。现在更正了。

无论何时，队的产业永远归队所有或使用，永远不许一平二调。公共积累一定不能多，公共工程也一定不能过多。不是死规定几年改变农村面貌，而是依情况一步一步改变农村面貌。

四、一九六一年一月召开八届九中全会毛泽东提出搞一个实事求是年、调查研究年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四至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泽东说：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过去一搞就是几个大办。看来大办只能有一个，大办这个就不能大办那个。过去我们大办工业，现在要大办农业，由大办工业转变到大办农业，工业发展速度要压低。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讲话

“现在看来，建设只能逐步搞，恐怕要搞半个世纪。”

“过去这些事情是专管部门搞的，可是有我们看过的，批准的，如大办水利、大办副食品基地、养猪等。我们有责任，这样才能总结经验。”

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

这几年说人家思想混乱，首先是我们自己思想混乱。一方面纠正“共产风”，纠正瞎指挥风；另一方面，又来了几个大办，助长了“共产风”，不是矛盾吗？庐山会议时以为，“共产风”已经压下去了，右倾又压下去了，加上几个大办就

解决问题了。原来估计一九六〇年会好一些，便没有估计对。一九六〇年天灾更大了，人祸也来了。这人祸不是敌人造成的，而是我们自己造成的。今年一平二调比一九五八年还厉害，突出的是大办水利，大办工业，从农业上调劳动力过多。

我跟好多外国人都讲过，我们搞经济工作没有经验。我们搞革命，搞阶级斗争有经验，搞建设没有经验。

三年经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要真正地好好地总结三年经验。把这几年的经验总结起来，接受过来，就可以把消极因素转化为积极因素。信阳专区就是一个证明。争取明年形势好转是有条件的，有办法的。

一九六一年一月三日，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第一项议程已经结束，即日起，讨论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

晚上，毛泽东听第四次汇报。

毛泽东问李富春：今年的方针是怎么提的？

李富春答：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

毛泽东又问：这个方针是什么意思？

李富春说：调整就是调整各方面的关系，有调整、充实，才能巩固、提高。

毛泽东说：是四面八方了，你这个意思就是休整的意思，和部队在两个战役之间的休整一样。

毛泽东又问大家：大跃进的口号能不能在一九六一年提？

邓小平说：今年元旦社论，没有提大跃进，提的是争取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胜利。

许多人说：大跃进，作为一段来算账，还是大跃进。

毛泽东说：今年可能是就地踏步，休养生息。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这次工作会议，据我看比过去几次都要好，大家头脑此过去清醒了些，冷热结合得好了一些。过去总是冷得不够，热得多了些，这次比过去有了进步，对问题有了分析，对情况比较摸底了。当然，有许多情况还是不摸底。

省委书记、常委，包括地委第一书记，他们究竟摸不摸底？他们不摸底就成问题了。应该说现在比过去进一步，也在动了。要用试点方法去了解情况，调查问题。

我们下去搞调查研究，检查工作，要用眼睛去看，用耳朵去听，用手去摸，用嘴去讲，要开座谈会。看粮食是否增了产？够不够吃？要察颜观色，看看是否面有菜色，骨瘦如柴。这是眼睛可以看得出来的。保定的办法是请老农、干部开座谈会，与总支书、支书谈，群众也发言议论，这些意见是有钱买不到的东西。

这些年来，这种调查研究工作不大作了。我们的同志不作调查研究工作，没有基础，没有底，凭感想和估计办事。劝同志们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一切从实际出发，没有把握就不要乱发言，不要下决心。作调查研究也并不那么困难，人不要那样多，时间也不要那么长，在农村有一两个社队，在城市有一两个工厂，一两个学校，一两个商店，合起来有七、八个，十来个，也就行了。也不必都自己亲自去搞，自己搞一两个，其他就组织班子去搞，亲自加以领导。

调查研究这件事极为重要，要教会许多人。所有省委书记、常委、各部门负责人、地委、县委、公社党委，都要进行调查研究，不做，情况就不清楚。公社有多少部门，第一书记不一定知道，一个公社，有三十多个队，公社党委只要摸透好、中、坏三个队就行。做工作要有三条：一是情况明，二是决心大，三是方法对。这里情况明是第一条，这是一切的基础。情况不明，一切都无从谈起，这就要搞调查研究。

今年搞一个实事求是年。实事求是汉朝的班固在汉书上说的，一直流传到现在。我党有实事求是的传统，但最近几年来不大了解情况，大概是官做大了，摸不了底了。今年要摸它一个工厂、一个学校、一个商店、一个连队、一个城市人民公社，不搞典型就不好工作。这次会议以后，我就下去搞调查研究工作。总而言之，现在摸到这个方向，大家都要进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四日至十八日，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次会议，因为经过二十天的工作会议的准备，开得比较顺利。今天想讲一讲工作会议上讲过的调查研究问题，别的问题也讲一下。

我们在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时期，提倡调查研究，那时全党调查研究工作作风比较好，解放后十一年来就较差了。什么原因？要进行分析。在民主革命时期，犯过几次路线错误，在解放后又出过高岗路线。右的不搞调查研究，“左”的也不搞调查研究。那时，中国是什么情况，应采取什么战略方针和策略方针才

适合中国实际情况，长时期没有得到解决。自从我们党一九二一年成立起，到一九三五年遵义会议，十四年间，有正确的时候，也有错误的时候。大革命遭到了损失，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也遭到了损失，长征损失也很大，在遵义会议后到了延安，我们党经过了整风，七大时，……王明路线基本上克服了。抗战八年我们积蓄了力量，因此在一九四九年，我们取得了全国革命的胜利，夺取了政权。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和蒋介石作战，情况比较清楚，比较注意搞调查研究，对革命一套比较熟悉，那时情况也比较单纯。胜利后有了全国政权，几亿人口情况比较复杂了。我们过去有过几次错误，陈独秀机会主义错误，立三路线的错误，王明路线的错误等等，有了几个比较，几个反复，容易教育全党。近几年来，我们也进行了一些调查研究，但比较少，情况不甚了解。譬如农村中，地主阶级复辟问题，不是我们有意识给他挂上这笔账，而是事实是这样，他们打着共产党的旗子，实际上搞地主阶级复辟。在出了乱子以后，我们才逐步认识在农村中的阶级斗争是地主阶级复辟。凡是三类社、队，大体都是与反革命有关系，这里边也有死官僚。死官僚实际上是帮助了反革命，帮助了敌人，是地、富、反、坏、蜕化变质分子的同盟军。因为死官僚不关心人民生活，不管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帮助了敌人，是反革命的同盟军。还有一部分是糊涂人，不懂得什么叫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懂得共产风刮不得。反革命、坏分子、蜕化变质分子就利用死官僚、糊涂人把坏事做尽。一九五九年，有一个省，本来只有××××亿斤粮食，硬说有××××亿斤，估得高，报得高。出现了四高，就是高指标、高估产、高征购、高用粮，直到去年北戴河工作会议，才把情况摸清楚。现在事情又走到了反面，是搞低标准，瓜菜代。经过调查研究，从不实际走到比较合乎实际。

农、轻、重，工农业并举，两条腿走路，我讲了五年，庐山会议也讲了，但去年没有实行。看来今年可能实行，我只说可能实行，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一九六一年国民经济计划已经反映了这一点，注意了农、轻、重，就可能变成现实。

对地主的复辟，我们也缺少调查研究。我们进城了，对城市反革命分子比较注意，比较有底。一九五六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我们让他们分散的大鸣大放，出了几万个匈牙利。这样把情况弄清楚了，就进行了反右斗争。整出了×××万个右派，搞得比较好，底摸清了，决心就转大了。农村那年也整了一下，没有料到地主阶级复辟问题。当然，抽象的讲是料到的。过去我们总是提出国内矛盾是

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矛盾，基本矛盾是阶级矛盾。是资本主义的天下，还是社会主义的天下，是地主的天下，还是人民的天下？

没有调查研究，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一九五九年就反对刮共产风，由于情况不明，决心就不大，中间又加上了一个庐山会议，反右倾机会主义。本来庐山会议要纠正“左”倾错误，总结工作，可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进攻打断了，反右是非反不可的。会后，共产风又刮起来了，急于过渡，搞了几个大办。大办社有经济、大办水利、大办养猪、大办县社企业、大办土铁路。同时要这么些个大办，如养猪什么也不给，这就刮起共产风来了。当然大办水利、大办工业取得了很多的成绩，不可抹煞。还有大办文化、大办教育、大办卫生等等，不考虑能不能做。共产风问题，反革命复辟问题，死官僚问题，糊涂人问题，干部情况问题，县、社、队分为一、二、三类，各占百分之××、百分之××、百分之××问题，这些问题以前我们就没有搞清楚，有的摸了，我们也没有讲清楚，或讲清楚了也不灵。郑州会议反共产风，只灵了六个月，庐山会议后冬天又刮起共产风。庐山会议前，“左”的情况还没有搞清楚，党内又从右边刮来一股风。彭德怀等人与国际修正主义分子、国内右派相呼应，打乱了我们纠“左”步骤。

过去我们吃了亏，就是不注意调查研究，只讲普遍真理。六一年要成为调查研究年，在实践中调查研究，专门进行调查研究。

中共中央八届九中全会以后，毛泽东带三个调查组到浙江、湖南、广东农村调查，发现一九六零年十一月三日中央发出的《紧急批示信》，只解决了自上而下的“调”的问题，没有解决各生产队之间的、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

六、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十三日，毛泽东写信给刘少奇、周恩来，指出：大队内部生产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生产队（过去是小队）内部人与人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是两个极端重要的大问题。要求讨论并切实调查一下。

一九六一年三月，中央政治局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讨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给

全党同志的信》中规定，作为基本核算单位的管理区和生产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大队；生产小队，以后一律改名为生产队。

一九六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广州会议上的讲话

他说：主要是两个平均主义的问题。一个是生产大队（即原来的生产队）内部，各生产队（即原来的生产小队）与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一个是生产队内部，社员与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这两个问题很大，不彻底解决，不可能真正地全部地调动群众的积极性。

他说：人民公社是生产大队的联合组织。公社、生产大队不能瞎指挥，县、地、省、中央也不能瞎指挥。不能用领导工业的办法来领导农业，也不能用领导农业的方法来领导工业。

他说：几年来出的问题，大体上都是因为胸中无数，情况不明，政策就不对，决心就不大，方法也就不对头。最近几年吃情况的亏很大，付出的代价很大。

要作系统的由历史到现状的调查研究，省、地、县、社的第一书记，都要亲自动手。不做好调查工作，一切工作都无法做好。第一书记亲身调查很重要，足以影响全局。今后我们必须摆脱一部分事务工作，交别人去做。报告也要看，但是不要满足于看报告。最重要的是亲自作典型调查，走马观花只能是辅助的方法。

只有原理原则，没有具体政策不能解决问题。没有调查研究，就不能产生正确的具体政策。

调查研究的态度，不可以先入为主，不可以自以为是，不可以老爷式的，决不可以当钦差大臣。而要讨论式的，同志式的，商（量）的。

不要怕听不同的意见，原来的判断和决定，经过实际检验，是不对的，也不要怕推翻。

一九六一年四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写信给邓小平，建议五月下旬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要求到会各同志，利用会前时间，对农村的食堂、粮食、供给制等关键问题，进行重点调查，向群众求真理，以便五月会议能比较彻底地完成上述任务。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毛泽东转发周恩来关于农村政策问题的调查报告，主要内容是：（1）社员普遍不赞成办食堂；（2）供给制这种办法带有平均主义性质，

害处很多；（3）社员群众迫切要求恢复高级社时评工记分办法。随后又批转了胡乔木五月八日的报告，邓小平、彭真五月七日的报告，内容大体一致。

一九六一年五月七日，刘少奇在湖南宁乡县炭子冲同农民谈话说，食堂没有优越性，不节省劳动力，不节省烧柴。这样的食堂要散，勉强维持下去没有好处，已经浪费几年了不能再浪费下去。

一九六一年五月九日，朱德写信给毛泽东反映农村公共食堂问题，他说，四川社员吃饭是“两道烟”，即在食堂做一道，社员打饭回家再加一道，对人力和物力浪费不少。

七、一九六一年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

一九六一年五——六月，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对三月党中央广州会议讨论制定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作了重大修改，取消了分配上的部分供给制；规定办不办公食堂完全由社员讨论决定，社员的口粮分配到户，由社员自己支配，等等。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二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议上的讲话

人民公社问题，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

前人民公社工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由此可见，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是逐步深入的，任何人不能例外。

我们党从一九二一年成立，经过了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和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严重挫折，经过了万里长征，经过延安整风，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一九四五年的七次代表大会，共用了二十四年的时间，本形成了思想上真正的统一，并且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和党的建设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实现民主革命总路线的具体政策，保证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胜利。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我们过去谁也没有干过，必须在实践中才能逐步学会。我们已经搞了十一年，有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积累了很多经验。只有总路线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具体政策。现在要好好地总结经验，逐步地把各方面的具体政策制定出来。我们已经有可能这样做，并且已经制定了人民公社六十条。

形成一整套的具体政策，看来还需要一段时间，也许还需要十多年。这是一种设想。如果大家都觉悟了，也可能缩短一些。

现在的重要问题是要重新教育干部。干部教育好了，我们的事业就大有希望。

不教育好干部，我们就毫无出路。我们要利用人民公社六十条等文件，作为教材，用延安整风的方法，去教育干部。这次参加会议的同志，思想通了，就要去教育地、县的干部，他们的思想通了，再由他们去教育社、队的干部，使大家真正懂得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按劳分配、等价交换。教育干部的事情，今年一定要做出一点成绩来，并且一定要长期地做下去。搞民主革命，我们长期地教育干部，搞社会主义也必须如此。

一九六一年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讨论和试行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案的指示》。

八、一九六一年九月毛泽东提出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

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如果要使一九六二年的农业比较一九六一年有一个较大的增长，我们就应在今年十二月工作会议上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意见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所谓大队“统一领导”要规定界限，河北同志规定了九条。如果不作这种规定，队的九种有许多是空的，还是被大队抓去了。此问题，我在今年三月广州会议上，曾印发山东一个暴露这个严重矛盾的材料，又印了广东一个什么公社包死任务的材料，并在这个材料上面批了几句话：可否在全国各地推行。结果，没有通过。待你们看了湖北、河北这两批材料，并且我们一起讨论过了之后，我建议。把这些材料，并附中央一信发下去，请各中央局、省、市、区党委、地委及若干县委亲身下去，并派有力的调查研究组下去，作两星期调查工作，同县、社、大队、队、社员代表开几次座谈会。看究竟那样办好。由大队实行“三包一奖”好，还是队为基础（河北人叫做分配大包干）好？要调动群众对集体生产的积极性，要在明年一年及以后几年，大量增产粮、棉、油、麻、丝、茶、糖、菜、烟、果、药、杂以及猪、马、牛、羊、鸡、鸭、鹅等类产品，我以为非走此路不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过去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一九五六年高级社

成立时起），第七年应该醒过来了吧？

一九六一年十月七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农村基本核算单位问题给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就农村基本核算单位究竟以生产大队为好还是以生产队为好的问题认真调查研究，并指出，就大多数来说，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是比较好的。它最大的好处，是可以改变生产的基本单位是生产队，而统一分配的单位却是生产大队的不合理状态，解决农村经济中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生产和分配不相适应的矛盾。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十一月，毛泽东关于一九六〇年的计划的讲话，大都是压缩指标的，压了水利建设的指标、开荒的指标、土铁路的指标；对粮食指标，心里还不踏实；但对钢产指标，不但没有压缩，而且还要求一九六〇年无论如何要超过一千八百万吨，希望搞到二千万吨。这个讲话强调把产品质量、规格、品种放在第一位，把数量放在第二位。这是毛泽东在指导工业生产方面认识上的一个重要突破。

一九六〇年一月的上海会议，是在继续“大跃进”的浓厚氛围中召开的，对形势的估计和指标的确定都不切实际。会后，全国又开始大办县社工业，大办水利，大办食堂，大办养猪场等，一些原来确定减缩的基本建设项目重新上马，高指标、浮夸风、命令风和“共产风”又严重地泛滥起来。这段时期，一九五九年冬与一九六〇春，是经济工作中“左”倾蛮干最厉害的一段时期。

一九六〇年，粮食浪费太多，抗旱也多吃了粮食。所以，这一年浮肿病多，主要是信阳专区，旁的专区也都有一点，不怎么严重。信阳专区说病了十来万人。正常死亡与浮肿病死亡也很难分，死亡率是增加的，信阳专区可能增加好几万人。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先后读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下册）的谈话和批注，是继《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规律的又一次重要的探索。结合苏联四十二年的历史与现实，新中国十年的历史与现实，他提出了许多重要的问题，发表了一系列超越前人、启迪后人的卓越见解。毛主席的这些

独创性的理论成果，主要是政治经济学，同时也涉及哲学、科学社会主义、历史科学等诸多学科。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毛泽东主持下，对三年补充计划的十四项指标，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有的比第二个五年计划原定的指标还低。这次会议主要明确了两个问题。一是坚持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加快发展农业；二是强调作计划必须留有余地。这一切，都是为了从全局上改变被动局面，争取主动权。这次上海会议与一月上海会议有很大的不同。一月会议时，人们的头脑，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还很热，认为一九六〇年仍将是一个大跃进年，比一九五九年形势更好，因而不论是三年补充计划，还是八年设想，都是脱离实际的。在这近半年的时间，经济形势日益困难，严重问题逐步暴露，计划完成情况很差，因而这次会议出现另一种情况，全面降低指标、强调留有余地。尽管这次调整仍然是不彻底的，但总是向实际靠近了一些。

一九六一年六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北京工作会议上，毛主席对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对人民公社问题的认识发展过程作了一个简要的回顾：

在一九五八年的北戴河会议以后，开了两次郑州会议。第一次会议解决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线问题，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界线问题。第二次会议解决公社内部三级所有制的界线问题。这两次会议的基本方向是正确的。但是，会议开得很仓促，参加会议的同志没有真正在思想上解决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开始懂得了一些，还是懂得不多。

在一九五九年三月的上海会议上，通过了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纪要。后来，我给小队以上的干部写了一封“党内通讯”，对农业方面的六个问题提了意见。在这一段时间内，普遍地对人民公社进行了整顿，使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逐步地得到纠正。不过，由于各级干部还不真正懂得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按劳分配，什么是等价交换，他们对党中央关于人民公社的许多意见和规定，还没有认识清楚，他们的思想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一九五九年夏季庐山会议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向党进攻，我们举行反击，获得胜利。反右以后。工作中出现了一些假象。有些地方有些同志以为从此再不要根据两次郑州会议的精神，继续克服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了。

一九六零年春，我看出“共产风”又来了，批转了广东省委关于当前人民公社工

作中几个问题的指示。在广州，召集中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小时的会，接着在杭州又召集华东、西南各省的同志开了三、四天会，后来又在天津召集东北、华北、西北各省同志开了会。这些会，都因为时间短，谈的问题很多，没有把反“一平二调”、反“共产风”的问题作为中心突出出来，结果没有解决问题。几个大办一来，糟糕，那不是“共产风”又来了吗？

一九六零年北戴河会议，用百分之七、八十的时间谈国际问题，只是在会议快结束的时候，谈了一下粮食问题，没有接触到人民公社内部的平均主义问题。同年十月，中央发了关于人民公社十二条的指示，从此开始认真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但是仍然坚持供给制、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作法。而且，在执行中，只对三类县、社、队进行了比较认真的整顿，对于一、二类县、社、队的“五风”基本上没有触动，放过去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九中全会以后，经过农村调查，在广州开会，强调提出人民公社内部存在着必须解决的两个平均主义问题，起草了农村人民公社六十条。这次会议，启发了思想，解放了思想，然而还不彻底，继续保留了三七开（即供给部分三成，按劳部分七成的分配办法）、公共食堂、粮食到堂的尾巴。

经过会后的试点和调查，到这次会议，大家的思想彻底解放了，上面所说几个问题的尾巴最后解决了，大家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也比过去清楚得多了。但实际上，还有一些问题并未搞清楚。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六日，毛泽东写信给政治局常委及有关同志，指出：我们对农业方面的严重平均主义的问题，至今还没有完全解决，还留下一个问题。农民说，六十条就是缺了这一条。这一条是什么呢？就是生产权在小队，分配权却在大队，即所谓“三包一奖”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农、林、牧、副、渔的大发展即仍然受束缚，群众的生产积极性仍然要受影响。由此，毛主席提出：“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即基本核算单位是队而不是大队。

至此，才算把人民公社的所有制体制理顺了。

2011年5月31日修改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城市和农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第三章 1962—1965 年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第一节 从七千人大会到八届十中全会

壹、本节概述

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总结经验，加强民主集中制

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一日至二月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

1月日，刘少奇代表中央提出书面报告并作用了讲话。

1月29日，林彪就军事工作讲了话，他说：现在这些困难，恰恰是由于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可是我们有些同志，不能够很好体会毛主席的思想，把问题总是向“左”边拉，向右边偏。我们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

1月30日，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2月3日，朱德在山东组会议上发言说：这几年党内斗争扩大化了，吃了一些亏，这次会议，畅所欲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上下通气了，我很满意。

2月6日，邓小平就党的工作讲了话。

2月7日，周恩来说经济工作讲了话。

2月8日，陈云在陕西组让讲话：这几年我们党内生活不正常。“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这种现象是非常危险的。这次会议取得了非常大的胜利，不要估计低了。

二、一九六二年上半年党内外刮了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刘少奇在中南海西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后称西楼会议)。

应刘少奇的要求，陈云在二十三日的会议上就目前的财政经济形势和克服困难的办法发表了讲话。

刘少奇非常赞同陈云的意见。他在插话和会议的结论里指出：中央工作会议对困难情况透底不够，有问题不愿揭，怕说漆黑一团！还它个本来面目，怕什么？说漆黑一团，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激发人们向困难作斗争的勇气！现在处于恢复时期，但与一九四九年后的三年情况不一样，是个不正常的时期，带有非常时期的性质，不能用平常的办法，要用非常的办法，把调整经济的措施贯彻下去。

一九六二年三月八日，周恩来在中央财经小组召开会议上讲话，他说：总的形势，包括政治、经济，包括方针、政策、干部经验等等，从这些方面看，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目前财政经济的困难是相当严重的，而且有些困难我们可能还没有看到，没有预计到。今年计划还需要大调整。原来还想慢慢转弯，现在看来不行，要有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如果说，过去是改良的办法，那么现在就要采取革命的办法。当然，步子一定要踩稳。在今后十年中要有个恢复时期，这是讲它的主要性质，而一般地仍可称它为“调整时期”。

一九六二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在武汉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开会，同意转发三人讲话（发至省军级），同意陈云担任中央财经小组组长。毛泽东同意西楼会议，只是说“调整时期要成为一个阶段”，而没有说对形势的估计问题。刘、周、邓向毛汇报时，关于对形势的估计问题，毛泽东没有表态，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六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

说：“最近，我要邓力群找陈云同志几年来有关经济工作的一些意见来看，他找来了，并搞了一个摘要。我只看了这个摘要。现特送上，请主席看看。此外，陈云同志在今年三月七日财经小组会议上的讲话，也提出了一些很重要的意见，很值得一看。”同时提出：“以上几个文件，已要办公厅发给中央常委、书记处和中央财经小组各同志。是否还要发给其他同志？请主席阅后酌定。再征求陈云同志意见。”

毛泽东看了陈云三月七日的讲话，重要之处还画了杠杠。但对刘少奇的信没有表态。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三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刘少奇又谈了如下一些意见：（一）国民经济有全面失调的问题，要全面调整。（二）要有秩序地撤退。不然，搞乱了，党会失掉威信。（三）现在要讲清形势。看来，

对形势还估计不足，不是过分。在经济上没有大好形势。所谓大好形势，是指政治上，表现在党的团结，人民的团结。如果对形势认识不一致，就会发生不团结。但是，在讲形势时，不要讲得人心惶惶。

一九六二年五月初，田家英到上海向毛泽东汇报，反映农民要求包产到户的情况。

毛泽东对田家英说：“我们是要走群众路线的，但有的时候，也不能完全听群众的，比如要搞包产到户就不能听。”

一九六二年五月七日至十一日，由刘少奇主持，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

周恩来在讲话中，对形势的估计，仍然重申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的书面报告所作的分析，即从全国来说，最困难的时期已经基本渡过了，但是目前还是处在一个严重困难的时期。他估计，调整的时期要相当长，一般地说，第三个五年计划恐怕就是个调整时期。

刘少奇讲话重申自西楼会议后他对经济形势的基本估计，说：“目前的经济形势到底怎么样？我看，应该说是一个很困难的形势。从经济上来看，总的讲，不是大好形势，没有大好形势，而是一种困难的形势。”“我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讲了这样一句话：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这一句话，现在大家都抓到了。最困难的时期是不是已经过去了？恐怕应该说，有些地区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但在城市里面，在工业中间，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他认为，“现在的主要危险还是对困难估计不够”。

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在会议提出，有些地区，特别是受灾地区和山区分散地区，如果适合搞包产到户，农民也有搞包产到户的的积极性，那就让他们搞。

会后，他在中央党校、解放军总后勤部和政治学院等单位作报告，系统地发表了包产到户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陈云回到北京后，就分田到户的问题同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等人交换过意见，大家的看法大体一致或者没有表示不同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六至七月，毛泽东巡视各地听取负责人汇报情况

6月18日，在长沙同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谈话时，了解到湘潭地区夏粮增

产了十亿斤。

7月初，在郑州，从刘建勋那里得知麦收不那么坏，预计秋收还要好一点。

7月初，在济南，从山东省委的汇报里，了解到“情况大变”，除了德州、惠民等地遭灾外，农村形势不坏。麦收四十二亿斤，比原来估计的二十九亿斤增加了十三亿斤。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田家英回到北京立即向刘少奇汇报。

汇报刚开了个头，刘少奇就接过去说，“现在情况已经明了了”。

接着田家英提出分田到户的意见。刘少奇对当时国内形势的估计比较严峻。他说：这样下去，无产阶级专政要垮台，我现在一天也不敢离开北京。

田家英问刘少奇，他关于分田到户的意见可不可以报告主席。

刘少奇说，可以。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日，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

会上谈到几个中央局主要负责人对这一段时间老是讲错误、讲困难，有意见。还谈到据陶铸、柯庆施讲，毛泽东也表示恐怕讲错误差不多了，讲困难是否也差不多了，以后要讲克服困难。对此，彭真提出：“讲困难缺点到此为止，转为积极方面。”邓小平说：“我倾向这样。”

这次书记处会议还讨论了包产到户问题。

邓小平说：“恢复农业，相当多的群众提出分田。陈云同志作了调查，讲了些道理。意见提出是好的。”还说：“不管是黄猫黑猫，在过渡时期，哪一种方法有利于恢复，就用哪一种方法。我赞成认真研究一下。分田或者包产到户，究竟存在什么问题。你说不好，总要有答复。对于分田到户要认真调查研究一下，群众要求，总有道理。不要一口否定，不要在否定的前提下去搞。过渡时期要多种多样。现在是退的时期，退够才能进。总之，要实事求是，不要千篇一律。这几年就是千篇一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清晨，毛泽东回到北京，当天就在中南海游泳池召见田家英。田家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意见。他的意见是：现在全国各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农民约占百分之三十，而且还在继续发展。与其让农民自发地搞，不如由领导地搞。将来实行的结果，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的可能达到百分之四十，百分之六十是集体和半集体。等到生产恢复了，再把他们重新引导到集体

经济。

毛泽东提出：“你的主张是以集体经济为主，还是以个体经济为主？”一下把田家英问住了。

毛泽东接着又问：“这是你个人的意见，还是有其他人的意见？”

田家英回答：“是我个人的意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陈云致信毛泽东，说：“对于农业恢复问题的办法，我想了一些意见，希望与你谈一次，估计一小时够了。我可以走路了，可以到你处来。”

当天下午，毛泽东约见了他。

陈云申述了主张实行分田到户的理由。他还说，分田到户不会产生两极分化，不会影响征购，恢复只要四年，否则需要八年。

据陈云后来回忆说：“谈话以后，毛泽东同志很生气”。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邓小平在接见共青团三届七中全会与会者时说：在全国，巩固集体经济，这是根本方向，但要承认多种多样的形式。有些包产到户的，要使他们合法化。现在，实行各种形式的包产到户的，恐怕不只百分之二十，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样的问题应该百家争鸣，大家出主意，最后找出个办法来。中央准备在八月会议上研究一下。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召开由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田家英等人参加的会议。

会上，毛泽东介绍了河南、山东两省的夏收情况，说形势并不那么坏，建议刘少奇等找河南、山东、江西的同志谈谈，了解一下农村的形势。

毛泽东批评田家英回到北京不修改“六十条”，却热心搞什么包产到户、分田单干。

他指定陈伯达为中央起草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七日，邓子恢当面向毛泽东陈述实行包产到户的意见。

他说，从安徽的当涂和宿县的情况来看，“责任田”能做到五统一（即主要生产资料、生产计划、劳动力、分配、上缴任务统一于集体），不是单干。“责任田”实际上是一种联产计酬的生产责任制，有强大的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

变。

关于这次谈话的情况，据后来毛泽东说：他向我谈了，他也向别的同志谈了。他要保荐，认为这是唯一正确的管理方法。那个时候，我给他提出几个问题。我一提出一个问题，他就不答复，他讲他的。我又提出，他又不答复我的问题。所以，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他的训。因为我给他提出的问题，他不答复嘛。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在对中直机关和国家机关下放干部的讲话中，讲了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的问题，他说：现在相当多的集体经济发生动摇，如果搞不好有散的危险。对于这个问题，中央正在讨论，即将规定若干政策措施。你们到农村去，要抓巩固集体经济的问题。

同一天(七月十八日)，中央紧急下发了《关于不要在报纸上宣传“包产到户”等问题的通知》。

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约杨尚昆谈话。

这次谈话的内容，据杨尚昆的日记记载，毛泽东提出：“(1)是走集体道路呢?还是走个人经济道路?(2)对计委、商业部不满意，要反分散主义。”

这次谈话使杨尚昆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他在日记里写道：“我觉得事态很严重!!十分不安!”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

在会上把前一天同杨尚昆谈的那两个问题，重复了一遍，但没有点名。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同前来参加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的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话。他批评了包产到户和分田到户的意见。他说：“你们赞成社会主义，还是赞成资本主义?当然不会主张搞资本主义，但有人搞包产到户。现在有人主张在全国范围内搞包产到户，甚至分田到户。共产党来分田?对农民，要让他自愿，如果有的人非包产到户不可，也不要采取粗暴态度。问题是要分析农民的基本要求是什么，我们如何领导。有人似乎认为我们和农民搞了几十年，现在好像不行了，难道我们就这样脱离群众?有人说恢复农业要八年时间，如果实行包产到户，有四年就够了，你们看怎么样?难道说恢复就那么困难?这些话都是在北京的人说的。下边的同志说还是有希望的。目前的经济形势究竟是一片黑暗，还是有点光明?”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看了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和第二书记王任重广西桂林专区龙胜县主持召开的关于巩固生产队集体经济问题座谈会的记录，当即批示印发即将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

这个文件提出，要划清集体经济和单干的界限，并提出目前巩固集体经济的方针和必须做好的工作。

为了引起与会者的重视，毛泽东写了一段批语：“这个文件所作的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分析之后所提出的意见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是否还有可议之处，请各同志研究。并且可以发给省、地两级去讨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审阅了《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并决定作为中央工作会议文件之一印发讨论。

三、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十四日，在北戴河举行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谈到国际国内形势时，毛泽东尖锐地提出一个问题：当前国际国内都有一个共同性问题，就是革命究竟由无产阶级领导，还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对我们这些国家来说，就是究竟要无产阶级专政，还是要资产阶级专政。赫鲁晓夫说我们是独特路线。不独特不行，不与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划清界限不行。国际上的外交、外事工作方面，也有右的苗头。（这年七月，在莫斯科召开的争取普遍裁军的世界和平大会上，中国代表团按照事先商定好的“低调”方针发言，较多地强调高举和平旗帜的立场，引起几个亚非国家代表团的不满。对此，）毛泽东说：我们犯了错误，脱离了群众。要对这些党打招呼，向他们说明我们仍然坚持斯德哥尔摩会议（指 1961 年 12 月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在这次会议上，中国代表团曾经中途退席，以表示反对苏联的对外政策。）上我们的主张，我们在那个会上的调子，就是我们现在的调子。

在谈到党内开始出现一些所谓右的苗头时，毛泽东说：出气的好处是思想活了。同时，像包产到户等主张也出来了。有的是正确的考虑，有的则是牛鬼蛇神。他问三北地区的负责人：你们稳住稳不住？你们那里是资产阶级领导，小资产阶级领导，还是无产阶级领导？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日晚，毛泽东同华北地区负责人谈话。

毛泽东说：看来你们那里单干问题还不严重。从全国看，今年的收成比去年好，去年比前年好，错误在纠正嘛。有少数人把形势看得很黑暗，也有少数人说一片光明。从整个形势看，前途一片光明，也有些问题。问题主要是反映在国内的阶级斗争方面，也就是究竟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这个斗争的时间相当长，一百年后还有这个问题，这种形势要看到。

谈到有的大队核算单位没有下放，生产也搞得很好，毛泽东说：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办得好，又增加生产，就不一定下放到小队。

谈到生产队的规模和管理问题时，毛泽东说：生产队以二十户左右为宜，太大了不好。田间管理责任制要搞好。有的地方按地段包工到组、到户、到人，这是进步的管理办法，不能说不好。

一九六二年八月五日，毛泽东找来华东的柯庆施、李葆华和中南的陶铸、王任重谈话。

他说：我“周游”了全国一遍，找各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昨天下午，西南区云南、贵州、四川各省的同志谈到这样的问题：一搞包产到户，一搞单干，半年的时间就看出农村阶级分化很厉害。有的人很穷，没法生活。有卖地的，有买地的。有放高利贷的，有讨小老婆的。他们说，贫困户、中间户、富裕户各占三分之一。你们有没有这种调查？

他说：有没有阶级呢？我看还有。地主、富农、反革命残余都还存在。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有没有矛盾呢？接着，他又说：矛盾分几种。第一种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包括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也类似敌我矛盾，因为这两个敌对阶级是互不相容的，这种矛盾同第一种矛盾虽然近似，但是要有区别，还是把它说成是内部矛盾为好。在讲两类矛盾的时候，毛泽东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矛盾放到这样突出的地位，这同他自八届三中全会以来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是一致的。

他还说：“一九五九年反右倾斗争，大多数是搞错了。彭德怀要翻案，要求平反。我看一九五九年反右倾运动不能一风吹。准备把彭德怀的信印发给大家看一看。”

讲到分田到户，毛泽东说：有的人主张百分之六十分田到户，有的人主张全

部分田到户。这就是说，基本上单干或者全部单干。也就是说，把五亿多农民都变成小资产阶级，让小资产阶级当权，让小资产阶级专政。可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他说：看来允许百分之几到百分之十几闹单干是可以的，还有百分之九十是集体的嘛！如果全部闹单干，或大部分闹单干，我是不赞成的。如果那样搞，党内势必分裂。

谈到形势问题，他说：我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看来并非一片黑暗。有的同志把情况估计得过分黑暗了。当然也不是像一九五八年搞浮夸时讲的都是一片光明。我是中间派。应当说基本上是光明的，有许多问题还亟待解决。还要花几年的工夫，这些问题才能得到解决。

最后，他提出几个问题，要大家议一议：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搞资产阶级专政，还是小资产阶级专政？我们到底走什么道路？

一九六二年八月六日下午，由毛泽东主持，在北戴河中直俱乐部会议室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全体大会。毛泽东在讲话中提出三个问题，即阶级问题、形势问题和矛盾问题，要大家讨论。

关于阶级问题，他说：究竟有没有阶级？阶级还存不存在？社会主义国家究竟还存不存在阶级？外国有些人讲，没有阶级了。共产党也就是叫做“全民的党”了，不是阶级的工具了，不是阶级的党了，不是无产阶级的党了。无产阶级专政也不存在了，叫“全民专政”，“全民的政府”。对什么人专政呢？在国内就没有对象了，就是对外有矛盾。这样的说法，在我们这样的国家是不是也适用？可以谈一下。这是个基本问题。我同六个大区的同志都谈了一下，听说国内也有人这样讲。有人听到说国内还有阶级存在，为之吃惊。

关于形势问题，毛泽东说：国内形势，就是谈一谈究竟这两年我们的工作怎么样。过去几年，我们有许多工作搞得不好。有些工作还是搞好了，比如我们的建设工作，还是有成绩的。这主要是讲工业方面的建设，农业方面的水利。现在有些人说，去年比前年好一些，今年又比去年好一些。这个看法对不对？这是讲农村。工业，因为主观客观的原因，今年上半年是不那么好的，那末下半年怎么样？也可以谈一谈。大体上说，有些人把过去几年看成就是一片光明，看不到黑暗。现在有一部分人，一部分同志，又似乎看成是一片黑暗了，没有什么好多光明了。这两种看法，究竟是哪一种对？或者都有不对？如果都不对，就要提出第三

种看法。第三种看法是怎么样的?一片光明也不是，一片黑暗也不是，而是基本上是光明的，但是问题不少。还是回到我们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讲的三句话：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我倾向于不那么悲观，不那样一片黑暗。一点光明都没有，我不赞成那种看法。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说：有些什么矛盾?第一类是敌我矛盾，然后就是人民内部的矛盾，无非是这两类。人民内部有一种矛盾，它的本质是敌对的，不过我们处理的形式是当作人民内部矛盾来解决，这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如果我们承认阶级残余还存在，那就应该承认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存在的，而且是长期存在的，不是几年几十年的问题。我想甚至是几百年，这个残余还要存在。哪一年社会主义完结，进到共产主义社会，就没有阶级矛盾了。不是阶级矛盾，也有别的矛盾嘛。马克思主义是不赞成没有矛盾的，不赞成“无冲突论”的。

接着，他讲到现实存在的一些矛盾。

首先是单干问题。他说：现在有一部分农民闹单干，究竟有多少?从全国来说，你们估计一下，是百分之几，还是百分之十几，还是百分之二十?不是从个别地方来说。个别地方，比如安徽，那就多了。现在这个时期，这个问题比较突出。是搞社会主义，还是搞资本主义?是搞分田到户、包产到户，还是集体化?农业合作化还要不要?主要就是这样一个问题。已经包产到户、分田到户的，现在暂时不要动，不要去强迫纠正，但是要注意做工作。我们的中心，这一次文件（指《关于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草案)》。）上表现了。为什么要搞这么一个文件，讲巩固集体经济呢?就是因为现在这股闹单干的风，越到上层风越大。

其次是阶层问题。他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接着又谈到积累同消费的矛盾、集中同分散的矛盾、民主同集中的矛盾、敌我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随时插话。

毛泽东说：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的还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代表贫下中农，也代表一部分富裕的农民，所以要按劳分配，平均分配的不能太多。

他还说：集体化的巩固，必须经过几个回合。我们的集体化已经经过了考验，将来还会继续经受考验的。

在谈到对形势的看法时，毛泽东说：应当有分析，有比较，不能是一片黑暗。过去讲一片光明，现在又说是一片黑暗。一片光明，现在没人讲了。从一九六〇年下半年以来，大家只说黑暗，不讲光明，已经有两年了。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

毛泽东还提出，关于矛盾问题，要再加上一条，即正确与错误的矛盾。他说：搞社会主义革命，从一九五三年算起，不过才十年。经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人民公社，中间犯过错误，如“共产风”、瞎指挥、“大办”、高征购等，本来想搞得快些，结果反而慢了。引黄灌溉是瞎指挥，没有经验，不知道还会盐碱化。这些都属于认识上的错误。所以我说要加上一条正确与错误的矛盾。

毛泽东还指出，现在城市工人生活太苦了，要提高一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一日，中心小组继续开会。毛泽东插话说：

“会议抓主要问题、本质问题很需要。最近，陕西一个公社有人给中央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有些地方出现包产到户，是‘一叶知秋’。我说不对，也可以一叶知冬，冬过了还有春嘛！总之，不要尽讲黑暗。有些小说如《官场现形记》等，是光写黑暗的，鲁迅称之为谴责小说。只揭露黑暗，人们不喜欢看，不如《红楼梦》、《西游记》使人爱看。《金瓶梅》没有传开，不只是因为它的淫秽，主要是它只暴露，只写黑暗，虽然写得不错，但人们不爱看。”

“夏收还没有定局。今年整个讲是增产了。山东增产了八亿斤，全国都增产。”

“那时河南、安徽外逃的人减少了，社会秩序很好。夏收秩序空前好嘛，全

国如此。这说明基本核算单位下放起了很大作用。”

“恐怕还是一月会议估计得对。过去打仗，军队有两种情况。一种伤亡大，一个连损失一半，但他们不叫困难，把几个连合并起来。另一种是伤亡小，一个连只损失百分之二十到三十，就大叫困难。你们有这样的经验没有？有人估计，恢复需要五年到八年。讲农业恢复，不要说需要那么多年，什么五年、八年，要有点希望。讲得那样长，就没有希望了。不要把困难不适当地夸大。如果那样讲，就是说我们的政策如‘六十条’、‘七十条’、减人两千万、改变高征购等都不灵，或者说我们的政策要长期才能见效，那就需要另搞一套。事实上已经起了作用。单干风越到上面越大，下面就好一些，尤其是灾区越好。”

“不只是在农村，在商业、在工业方面都要产生，党内也可以产生资产阶级分子。”

“这是指共产党，而且是共产党的一部分。其他人要那样想，你有什么办法？我经过河北、山东，到了上海，又到了浙江、江西，到了长沙、武汉，走了一圈。在武汉，把柯庆施叫去，大家谈到要修改‘六十条’，田家英不想修改。他主张百分之四十搞集体，百分之六十有领导地下放搞包产到户（当时田家英的主张是：百分之四十包产到户和分田单干，百分之六十为集体和半集体。），否则生产就要破坏。”

批评邓子恢“是属于没有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准备的人，对社会主义革命不感兴趣”。

关于矛盾问题，毛泽东又加了一个：照抄外国与自力更生的矛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二日，毛泽东对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批评

中共中央组织部从来不向中央作报告，以至中央同志对组织部同志的活动一无所知，全部封锁，成了一个独立王国。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三日的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插话：

他说：“在中国一定不出修正主义？这也难说，儿子不出，孙子出。不过也不要紧。孙子出了修正主义，孙子的孙子就又要出马列主义了。按照辩证法，事物总要走向反面的。”

这是毛泽东不是最早也是比较早地提出中国出修正主义的问题。

毛泽东说：“为什么江西没有按他的办法，就搞得好呢？山东破坏得厉害，

为什么恢复得很快呢?河南也有起色嘛。搞得好的，每个省都有。北京十个县今年就可以恢复到一九五七年。有的地方就没有恢复的问题。”

毛泽东说：“军人能看到光明，地方干部讲的是一片黑暗。华东局在上海开会，有的省委书记，如山东的周兴，都是讲一片黑暗。但同一个周兴，只过了两个月，我到了山东找他和裴孟飞谈话，他就眉飞色舞，说形势很好，估计今年山东小麦可增产八亿到十亿斤。”

邓子恢再次作检讨。毛泽东说：“你记得不记得，红军长征由原来的三十万人只留下二万八千人，当时中央是怎样估计的?当时中央估计，我们不是弱了，而是强了。因为过去不巩固，方针、战略、战术不对头。后来一总结就清楚了，有了经验了。”

邓子恢谈到，他这一次的问题，不仅表现在思想上，而且表现在行动上，讲了四次话，赞成包产到户。毛泽东接过来说：“这与你主张贫农团不是自相矛盾吗?贫农是搞集体的嘛，难道贫农团要搞单干?田家英在湖南韶山作调查，只调查了一个公社的一个队，在湘乡、宁乡也只调查了一个队，连一个公社也没有调查。大概这气候适宜于你，你敢讲了。你六月讲了，只有两个月嘛。你也多看一看嘛，看一两年再说也好嘛。”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五日，中心小组会议上，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说：“我们各方面政策的出发点和着眼点是发展生产，促进生产，对生产有利。”

毛泽东说：“瞎指挥我们不干了，高征购改正了，农业恢复的时间会快一些，恐怕再有两年差不多了，主要是今明两年，六四年扫尾。”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七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插话：

毛泽东说：“打了一辈子仗，把阶级斗争忘记了。现在阶级斗争的形势和过去不一样了，过去是流血的，现在不是了。”

毛泽东说：“减少了七十万吨，就是十四亿斤。你看，进口减少了嘛，逐年减少嘛。现在人还没有减到两千万，减到两千万，进口还可以再减。”

毛泽东说：“只一个夏收就下降了，秋后还要下降。这是供求关系法则嘛。猪多了不卖干什么?”

毛泽东说：“自由市场既然有，又起交流作用，还不如让它公开出来，起粮

食交流作用。有许多三类物资，我们不搞，又不允许上自由市场，结果邯郸把几百万斤三类物资都损坏了。”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中心小组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也讲了话。

他说：“问题讲清楚，不伤人。如邓老，你看我，我看你，究竟是单干好，还是集体好，要由历史作结论。苏联搞了四十多年，合作化也没有搞好，粮食也没有过关。”又说：“我们要和风细雨地把问题讲清楚，分清是非，广泛地联系实际，主要是解决思想问题。要说理，要讲道理，像这次会议一样。”

讲话又转到阶级问题。他说：“阶级、阶级斗争问题，有的同志讲，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十七世纪四十年代，出现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两个阶级。经过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产生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明确地宣布，他的学说不是资产阶级的，也不是小资产阶级的，而是无产阶级的。到了列宁，就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我学习马克思主义是经过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才传播到中国，我们才学习。总之，离开阶级就不能谈问题，不能说明问题。”他说：“过去简报看得少，这次的简报都看了。对讲阶级、阶级斗争，我有兴趣。不讲阶级，不讲阶级斗争，就没有劲了。”

四、召开八届十中全会

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六日到九月二十三日，举行八届十中全会的预备会议。八月二十六日至九月五日，主要讨论农业问题的两个文件，批评邓子恢的“单干风”，还讨论了国际形势和干部交流等问题。九月六日至九月二十三日，以各中央局为单位的六个组先后转入批判彭德怀、习仲勋的“翻案风”。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正式召开。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四日，由毛泽东主持开大会并讲话

他说：“这次中央全会，要解决几个重大的问题。农业问题、商业问题，这是两个主要的问题。第三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党内团结的问题。工业问题、计划工作问题，是第二位的问题。另外还有两个问题，一个是监察委员会扩充成员的问题，再一个是干部上下左右交流的问题。”“这次全会可以说不是今天开始，已经开了两个月了。在北戴河开了一个月，在北京又开了一个月。实际的问题，在那两个月各小组都讨论清楚了。现在开大会，就不需要多少时间了，大概三天

到五天。”

“我在北戴河提出三个问题：阶级、形势、矛盾。

关于阶级。国际帝国主义、民族主义，那些都是资产阶级国家，阶级斗争没有解决，那是不待说了。所以我们有反帝的任务，有扶助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在社会主义国家还有没有阶级？有没有阶级斗争？应该肯定还是有的，还是存在的。列宁曾经说，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长时期内，因为国际资产阶级的存在，因为本国资产阶级残余的存在，因为本国小资产阶级主要是农民阶级中间还不断生长资本主义分子，所以剥削阶级虽然被推翻了，它还是要长期存在的，甚至于要复辟的。在欧洲，封建阶级被资产阶级推翻以后，比如在英国、法国，经过几次复辟。读过英国革命史、法国革命史的就知道。社会主义国家也可能出现复辟的情况。……我们这个国家要好好掌握，要好好认识这个问题，承认阶级同阶级斗争的存在。要好好研究，要提高警惕。老干部也要研究，尤其是青年人，我们要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从现在就讲起，年年讲，月月讲，开一次中央全会就讲，开一次党大会就讲，使得我们有一条比较清醒的马克思主义的路线。”

“国际形势是很好的，国内形势过去几年是不好的。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这两年走低潮，因为我们办错了许多事，主要是高征购、瞎指挥这两件大错误。各种的瞎指挥，农业的瞎指挥，工业的瞎指挥，几个大办。一九六〇年下半年，我们就开始改变了。在一九五八年十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就开始讲这个问题了，就看出这个问题了。然后就开了武昌会议、第二次郑州会议和上海会议。这中间，有一段强调得不够，因为修正主义来了，修正主义压我们。从一九五八年夏季开始，要封锁我们的沿海，要搞共同舰队。然后就是一九五九年九月中印边界问题，塔斯社发表声明，表示中立，实际上是帮助尼赫鲁。这一年十月，我们国庆十周年，赫鲁晓夫在我们的讲台上攻击我们。一九六〇年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我们‘围剿’。然后，就是这一年的两党会谈、二十六国起草委员会会议和八十一国莫斯科会议。（周恩来插话：还有个华沙会议。）你看，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出现这样的现象。这个问题在社会主义阵营中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复杂虽然复杂，但也就是那么一个道理，就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斗争。至于形势，无论国际国内，现在都在好转。”

“矛盾。我们跟帝国主义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跟帝国主义首先是美国的矛盾；我们跟反动的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各国人民跟本国反动派的矛盾；各国人民跟修正主义的矛盾。在我们中国，也有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我们过去叫右倾机会主义，现在恐怕改一个名字为好，叫中国的修正主义。北戴河和北京这两个月的会议，讨论了两项性质的问题：一项是工作问题；一项是阶级斗争问题，就是马克思主义跟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

“我现在再讲一点，关于我们怎么对待国内和党内的修正主义的问题。我说，还是照我们历来的方针不要改变，即：不管犯了什么错误的同志，只要认真改变，我们就欢迎。还是一九四二年到一九四五年整风运动的那个路线，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团结-批评-团结。是非要搞清楚，不能吞吞吐吐。犯了错误的同志，只要你好好想一下，回到马克思主义立场，我们就跟你团结。在座的有几位同志就是这样。我欢迎你们采取这样的态度。我们是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一看二帮嘛。我劝一些同志，无论是里通外国也好，搞什么秘密反党小集团也好，只要把自己那一套端出来，诚实地向党承认错误，我们就欢迎，决不采取不理他们的态度。近来有一股风，无论什么都要平反，那是不行的。真正搞错了的要平反，部分搞错了的部分平反，没有搞错，搞对了的，不能平反。”

“要分开一个工作问题，一个阶级斗争问题，我们决不要因为对付阶级斗争问题而妨碍了我们的工作。请各部门、各地方的各位同志注意。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反党集团扰乱了我们，我们那个时候不觉悟。本来是搞工作的，后头来了一个风暴，就把工作丢了。这一回，可不要这样。各部门、各地方的同志传达也要注意，要把工作放到第一位，阶级斗争跟它平行，不要放在很严重的地位。现在组织了两个审查委员会，交给他们去审查。要有确实证据，要说服人。不要让阶级斗争干扰了我们的工作，大量的时间要做工作，但是要有专人对付这个阶级斗争。”

“现在不是小说、刊物盛行吗？利用小说来进行反党活动，这是一大发明。这是搞上层建筑。”“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

毛泽东还在会上的插话中说：

“从一九五八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一九五九年第二次郑州会议、上海会议、

北戴河会议就抓了，但是一九五九年来了一个庐山会议，扰乱了我们。阶级斗争扰乱了我们的经济建设、社会改造。庐山会议以后，又有国外修正主义的干扰，以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一九六〇年差不多整个一年，我们的精力就是对付那方面去了。这一次，不管国内修正主义，国际修正主义，国际帝国主义，国际反动的民族主义，一切都不受它干扰，什么金门打炮也好，沿海要进攻也好，U—2飞机也好，中印边界也好，新疆事件也好，东北黑龙江的事情也好，准备今年下半年要闹风潮的，我们要‘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船’。国内也好，国际也好，只有那么大的事，没有什么好大的事。‘一个游鱼三个浪，引得懒汉去上当’，那个懒人就得意了，以为很可以捉一批鱼了，结果只有那么几条鱼。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或者现在已经站在我们这方面，或者将来要站在我们这方面，这是一个坚定的观点，应该相信。”

“一九六一年比较一九六〇年好一些，今年又比较去年好一些，今年大概可以比去年增产二百亿斤左右的粮食。再有两年，明年、后年，整个国民经济可能走上轨道。”

“我刚才讲的两年到三年的时间，是讲恢复生产，粮食增长。至于要过关，苏联四十三年了还没有过关，我们是不是四十三年还不能过关？就是要有化学肥料、拖拉机、各种农业机械、农药、种子，要搞农村运输，还有水利等各个方面。要按照科学办事。过去不重视农业科学家。……什么种子站、牲畜配种站、农业技术推广站、拖拉机站、农业试验场，这次精简农业部门把这些东西都减掉了。这些东西不应该精简呀，这些东西要保留的呀，现在要恢复。商业部门也搞弱了，把供销社取消了，骨干分子调出去了，这些也要恢复。”

“日本还卖给我们化肥，卖给我们特殊钢，卖给我们农药，还准备卖给我们生产维尼纶的世界第一流的设备。而社会主义国家不卖给我们。大概下个月他们的代表就要来了，叫高崎达之助，此人当过日本的贸易大臣。要利用他们的技术。列宁也利用，斯大林也利用，利用德国的技术、美国的技术。我们现在要走这条路，因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尖端不给我们嘛。”

“那个时候我在一个会议上就批评了你们两个同志，一个是陈伯达同志，一个是吴芝圃同志，就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一章。”

一九六二年九月二十七日，八届十中全会通过十个文件：

《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

《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

《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

《关于有计划有步骤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

《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

《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名单》

《关于撤销和补选中央书记处成员的建议》

《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问题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关于清查习仲勋等同志反党活动的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名单》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公报中写道：

“八届十中全会指出，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有一部分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因此，在人民中，还有一些没有受到社会主义改造的人，他们人数不多，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几，但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在这些情况下，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早就阐明了的一条历史规律，我们千万不要忘记。这种阶级斗争是错综复杂的、曲折的、时起时伏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这种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党内来。国外帝国主义的压力和国内资产阶级影响的存在，是党内产生修正主义思想的社会根源。在对国内外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同时，我们必须及时警惕和坚决反对党内各种机会主义的思想倾向。”

贰、本节简论

一、关于七千人大会的问题

1, 《毛泽东传》说：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比喻成绩和缺点错误的关系，是毛泽东第一个提出来的，而且经常讲，尤其是在出现工作失误遇到困难的时候。现在，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其实，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但那是在一个小范围的内部谈话时说的。如今，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向全党这样尖锐地提出问题，特别是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主要是没有讲势好转的问题）

这里又拿“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来说事。其实，这种说法不过是一种形象的比喻，就是说要分清事物的主要方面和次要方面的关系，而不是强调它的绝对数量。为了避免人们的误解，毛泽东对这个问题曾经作了解释。一九六〇年十二月三十日，毛泽东在北京中央工作会议上听取汇报时就说过：光讲“一个指头”好不好？事实上有的地方的缺点、错误不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有的是两个指头，有的是三个指头。总之，把问题查清楚了，有多少，讲多少。这里作者特别强调：“刘少奇突破了这个说法，对国内形势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这句话本身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既然不久前，毛泽东也已经突破了“一个和九个”的框框，他要求对成绩和缺点错误进行具体分析，是多少就是多少，而且也把工作中的错误称作“人祸”，怎么能说“刘少奇突破了”呢？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的说法是否科学，人们至今没有看到权威的、有根据的解释和说明。而且，刘少奇也说得很巧妙，这句话是某个农民说的，并不是他说的，他也没有明确表示同意这句话。现在，原文的作者说“这种在当时听起来颇有些刺激性的话，对毛泽东来说不会是愉快的”，那么，对刘少奇来说是不是就非常愉快呢？当时处在第一线工作的难道不是刘少奇而是毛泽东吗？这里，作者们扬刘抑毛的企图是非常明显的。

2, 《毛泽东传》说：林彪的讲话，有一个与众不同的明显特点，就是带有浓厚的个人崇拜色彩。

林彪讲话之后，毛泽东接着讲话。他说：“林彪同志讲了一篇很好的讲话，

关于党的路线，关于党的军事方针。我希望把它整理一下。给你一个星期、半个月搞出来。（1962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审阅林彪讲话整理稿后，致信田家英、罗瑞卿，指出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很高兴”。）

这种观点，早在胡绳的《七十年》中就提出来了：“林彪在大会的发言，说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这几年发生错误和困难，恰恰是由于我们有许多事情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或者用”左‘的思想或者用右的思想干扰了他的原故。如果听毛主席的话，困难会小得多。林彪离开实事求是，实践检验的原则，用个人崇拜的精神来总结经验教训，对于纠正缺点错误和发扬党内民主，起了消极作用。”（第380页）

薄一波的《回顾》重复了上述观点。（《回顾》下册第1045-1046页）

辛子陵在《全卷》中更是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在七千人大会上，只有林彪了解领袖的孤独、被动和忧虑，了解毛泽东让步的最大限度，和必须坚守的最后的防线。在毛泽东最需要支持的时候，林彪登上讲台，他给毛泽东送上了一副新的光环，使领袖的头再放异彩……这一番话立即使毛泽东坚持错误的胆气又豪起来。有林彪带着几百万军队帮我守住三面红旗这一道防线，社稷无忧矣！他心中暗自高兴，脸上放出红光……刘、周、陈、邓——这些能臣，忠心耿耿，心竭虑，支撑着这个国家，支撑着这个政权，支撑着毛泽东的‘江山’，免于在‘三面红旗’的破坏中陷于崩溃，他们没有得到毛泽东的任何表扬和勋勉。林彪——这个奸雄，制造了中共历史上两个最大、最离奇的谎言：一个是饿死的百姓两千万，他还硬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一个是不承认‘三面红旗’造成的严重后果，严重困难。这两大谎言受到毛泽东的表彰。”（下册第481-482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与辛子陵的说法大体相同，甚至有的词句都雷同，也不知道是谁抄谁。不过这本书更多地摘引了林彪的话，并作了剖析。

那么，看看林彪究竟说了些什么，引起了他们这样大的愤懑：

林彪说：我们党近几年内提出的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人民的创造，党的创造。当然，三面红旗在开始提出时不那么完整，可是它在发展中逐渐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而且将会继续完整起来，具体化起来，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譬如：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这条总路线，毫无疑问是正

确的。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是需要多、需要快、需要好、需要省的，是能够多、能够快、能够好、能够省的。我们需要鼓足干劲，能够鼓足干劲；需要力争上游，能够力争上游。我们不能有相反的作法，不鼓足干劲的作法，少慢差费的作法。……这几年我们工作中产生的一些缺点，不是总路线本身的问题，而是执行中间的毛病。

大跃进，事实证明，可以大跃进，应当大跃进。去年、今年虽然生产数量不那么多，明年也不那么多，但是与我国各个历史时期比较起来，还是大跃进。大跃进与否，是比较来说的，同过去比，同客观事实比，就是大跃进。如与主观的过大过快的指标比，就不是大跃进。

人民公社，具有很多优越性。开始没有整套的经验，是自然的。但是它把初级化、高级工程师化优点都吸收过来，具有许多新的特点，它的效果日益显著，我们的确找到一个建设社会主义，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林彪说：这几年的困难是多方面的原因造成的。特大的自然灾害，给我们造成不可逃避的困难，工作中也有些错误。但，这只是工作上的错误，而不是路线上的错误。

我们这几年在物质方面有所减少，这种减少，就像学生们上学付学费一样，学出来以后，作用就很大了。一个小娘子，从上小学起，一直到大学毕业，十七八年的时间，他什么也没有生产出来，相反地，尽吃，尽穿。但是他学了以后，就会直很大作用。如果没有付出那一点物质和时间，不让他学那么一下，他就不行。

林彪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加强党的团结。我想，事情千千万万，项目多得很，而最大的、首要的，是党的团结。在困难的时候，我们更应该依靠、更加相信党的领导，中央的领导，毛主席的领导，这样，我们才更容易克服困难。而且事实证明，这些困难，在某些方面，要某种程度上，恰恰是由于我们没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听毛主席的话，体会毛主席的精神，那么，弯路会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难会小得多。我感觉到，我们同志对待许多问题，实际上经常出现三种思想：一种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种是“左”的思想，一种是右的思想。当时和事后都证明，毛主席的思想总是正确的……我个人几十年来体会到，毛主席的最突出的优点是实际。他总比较人家实

际一些，总是八九不离十的。他总是在实际的周围，围绕着实际，不脱离实际……我深深感觉到，我们的根本任务搞得好的时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够顺利贯彻的时候，毛主席的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见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干扰的时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们党的历史，就是这么一个历史。因此，在困难的时候，我们党更需要团结，更需要跟着毛主席走。（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第 827-830 页）

如果人们采取对事不对人的立场，谁能从正面指出林彪的这篇讲话究竟错在什么地方？这里，关键在于，一些人坚持认为：“三面红旗”错了，党的路线错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错了，从一九五六年以后就开始犯了“左”倾路线的错误。如果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当然就会认为林彪是在搞个人崇拜了。

3，《毛泽东传》说：七千人大会也有缺点和历史局限性。会议仍然肯定“三面红旗”是完全正确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左”的指导思想，而且还留下了后来党内斗争的阴影。作为这次会议的中心问题，民主集中制问题，后来也没有能够真正的贯彻实行，相反，却逐步地背离了这个基本原则。

胡绳的《七十年》是这样说的：“当然，当时还没有改变从原则上肯定‘三面红旗’这个前提”。（第 380 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会上对‘三面红旗’仍是完全肯定的，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因而，七千人大会总结经验教训，纠正错误，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下册，第 1045 页）

肖冬连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七千人大会……有一条不能逾越的界限：‘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路线没有错，只是工作中发生了错误，大家都小心翼翼地把握着这个大前提，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而这样一来纠错、总结经验就不能不是初步的、浅层次的。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否定‘左’的指导思想——速成论和空想论。”“毛泽东的讲话只字不提‘八大’，总是从‘八大’二次会议谈起，这是因为‘八大’二次的路线，推翻了‘八大’的路线。这次纠‘左’，就其实质而言，是回到‘八大’的正确路线。然而，毛泽东坚守‘八大’二次会议的路线不退。在这个前提下，容许刘、周、陈、邓实行调整政策。”“恰恰在‘三面红旗’问题上，大会出现了微妙的分歧。与会者迂回曲折，对‘三面红旗’

提出了许多质疑和批评。在中央领导层，林彪发言对‘三面红旗’的全面肯定与刘少奇的说法有很大差异。刘虽未明确否定‘三面红旗’，但他不愿对此作最后定论，甚至说过五年、十年再作结论。这使毛泽东甚为不满：‘这不是犹豫动摇吗？’”“问题在于三年‘大跃进’的错误不是具体政策上的错误，而是根本指导思想上的错误。”

现在，情况很清楚了！当时，除少数人外，广大干部，包括中央领导层都认为“三面红旗”是正确的，只是在一些具体政策上犯了错误。至于谈到林彪与刘少奇的“很大差异”，可以从两个不同的侧面来分析：一方面，刘少奇对待“三面红旗”的根本立场，与林彪是一致的，只是说法不同而已。因为类似的话，毛泽东早就讲过。一九五九年七月十日，毛泽东在第一次庐山会议上的第二次讲话中就说过：“我总是同外国同志说：请你们给十年时间，再来看我们是否正确，因为路线正确与否，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的问题，要有时间，从实践的结果来证明。我们对建设应该说还没有经验，至少还要十年。”另一方面，假定刘少奇当时对“三面红旗”确实产生了怀疑动摇，因而他不愿明确肯定“三面红旗”，问题在于：这样评价刘少奇是否实事求是？毛泽东批评刘少奇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是不是指的这一点说的？更有可能是：一九七八年以后的一些人以及现在的某些人，为了制造毛泽东的二十年一贯的“左”倾错误的神话，放肆地歪曲事实。

4，《毛泽东传》说：这里顺便说一下，一九六六年二月，即“文化大革命”发动的前夜，中共中央在将毛泽东这个讲话印发给党内干部阅读时，曾经他本人同意，将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中的一段话加进去了。这段话是：“已经被推翻的反动阶级，还企图复辟。在社会主义社会，还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这种阶级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

这里的问题在于，毛泽东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而有关这一方面的内容，《毛泽东传》中除了上面这一段话外，根本就没有论述。下面我们一起重温一下毛泽东的这些论述：

“在我们国家，如果不充分发扬人民民主和党内民主，充分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无产阶级集中制。没有高度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

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是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在我国内，人剥削人的制度已经消灭，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已经消灭，现在反动阶级已经没有过去那么厉害了，比如说，已经没有一九四九年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候那么厉害了，也没有一九五七年资产阶级右派猖狂进攻的时候那么厉害了。所以我们说是反动阶级的残余。但是，对于这个残余，千万不可轻视，必须继续同他们作斗争。”

“我们的专政工具不能削弱，还应当加强。……没有广泛的人民民主，无产阶级专政不能巩固，政权不会稳。没有民主，没有把群众发动起来，没有群众的监督，就不可能对反动分子实行有效的专政，也不可能对他们实行有效的改造，他们就会继续捣乱，还有复辟的可能。这个问题应当警惕，也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

由此可见，毛泽东在一九五七年以后，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一九六一年，到一九六二年，反复指出对阶级斗争应当警惕、要好好想一想。并不是在八届十中全会时才突然提出阶级斗争问题。有些人之所以感到很突然，是因为他们对毛泽东反复提出的阶级斗争问题，始终听不进去，甚至于认为这是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了，提出了一条“左”倾的错误路线。

5，七千人大会还有人提出关于批判彭德的问题。

在刘少奇的讲话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同志给主席写信反映意见，“信中所说到的一些具体事情，不少还是符合事实的”，“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但是，一是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是高、饶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二是彭和高都有国际背景，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三是阴谋篡党，背着中央在党内进行派别活动；四是他这时写信是以为时机已到，利用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向党进攻。

三、关于八届十中全会问题

1，关于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问题

一九六二年六月至八月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会议。一九八〇年以后，对毛泽东在这次会议上作的《关于阶级、形势、矛盾》的讲话，都作了否定的评价。

《历史决议》说：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把社会主义社会中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发展了他在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斗争以后提出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仍然是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观点”。

胡绳的《七十年》说：“八届十中全会……进一步断言以阶级斗争为主要矛盾的过渡时期应该延伸到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到来以前，并且说这个时期比几十年要更长，可能是一百年或几百年，这个论点更是武断的和不清醒的。……这标志着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观点进一步系统化，为党在这个问题上‘左’倾错误的再度发展，作了理论准备。”（第 393 页）

薄一波的《回顾》说：“1962 年下半年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在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十年中的消极影响是突出的，主要表现在：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把一定范围的存在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并把当时党内关于国内形势、关于恢复农业生产的办法、关于干部甄别等方面存在的意见分歧和不同主张，斥之为‘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用阶级斗争的观点去分析和批判。从而，使国内的政治风向发生逆转，由刚刚进行不久的、对扭转困难局面极为重要的纠‘左’又变成了反右。”（下册第 1070 页）“问题出在，毛主席把当时在党内开展的不正常斗争，也说成是反‘复辟’斗争了。”“

《毛泽东传》说：

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重提阶级斗争，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断言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资产阶级都将存在和企图复辟，并成为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根源。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这一段话，基本形成后来被称之为党在社会主义整个历史时期总路线的完整表述。从此，“反修防修”作为一个基本战略，成为当时全党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以后所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从中苏论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直至演变成为“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正是这一思路的延伸和发展。

当时，毛泽东在指导思想上越来越强调阶级斗争，但也并非只讲阶级斗争，

不讲生产，不讲发展生产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是毛泽东终生追求的目标。在他的思想上，一方面是阶级斗争(越来越占主导地位)，一方面是发展生产力。在许多情况下，他总想把这两者统一起来，方法是通过抓阶级斗争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这样做总是事与愿违，往往不是促进而是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毛泽东越来越把国际方面的斗争(主要是同苏共的意见分歧)，同国内、党内的的问题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错误地批判彭德怀等人的所谓右倾机会主义就开始了。而今，干脆就把“右倾机会主义”改称为“修正主义”，并且确立了在国内要解决“跟中国的修正主义的矛盾”这样一个观点，这样一个提法。他认为，这两种斗争，国际的和国内的(主要是党内的)，归根到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修正主义的斗争。随着形势的变化，毛泽东的这个思想观点越来越发展，越来越强化了。

说来说去，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的讲话究竟说了些什么呢？《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上没有，《毛泽东文集》上也没有。这本传记上作了一些摘录。人们要想看到讲话的全文就很难很难了。

对照讲话的原文，再看看上面那些评价正确吗？

邓力群说：

“8月6日的讲话，在我脑子里留下的印象叫三风：黑暗风、单干风、翻案风。去年(1998年)我才从文献研究室搞到全文，细看全文，跟我的印象完全不一样，这篇讲话，完全正确。”

“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由毛主席修改定稿的一段话……这段话能够说不对吗？能够说同马恩列斯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相违背吗？能够说和我们中国的情况相违背吗？十中全会公报的这段话是总结了国内外历史和现实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

“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

割的。”

一些人攻击得最多的是公报中的这一句话：“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

说“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如果不存在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要搞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要实行什么无产阶级专政呢？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有什么不对吗？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都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说的，之所以要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因为还存在着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因此，就完全可以说“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这段话里面说“这个时期需要几十年，甚至更多的时间”，应该说是说少了而不是说多了。在毛泽东的讲话中，说过甚至于需要几百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毛泽东的这个说法可能比较合乎客观实际情况。现在人们已经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可能需要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那么，还有中级阶段、高级阶段呢？

薄一波说：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中国也存在着阶级斗争；只要有阶级、阶级斗争，一万年也要搞；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这样一来，“问题是，毛主席把这种一定范围内存在的阶级斗争现象扩大化、绝对化，看成是普遍现象了。”（第 1098 页）

理论上的分歧恰恰就在这里。毛泽东强调：在社会主义国家，包括中国在内，仍然存在着阶级斗争，这种现象具有普遍性。另一些人认为：阶级斗争的存在不具有普遍性，只具有特殊性(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他们所说的这种“特殊性”，并不是说只有中国存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不存在，或只有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存在，中国不存在。而是说这种阶级斗争只存在于人民与反动阶级残余之间，而不存在于人民内部，更不存在于党内。他们之所以认为人民内部不存在阶级斗争了，就是因为资产阶级已经作为一个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党内不存在阶级斗争

了，就是因为阶级斗争再也不可能反映到党内来了。问题在于：原来的资产阶级在经济范围内基本上被消灭了，是不是就等于在政治思想范围内也被消灭了呢？原来的资产阶级被在经济上被消灭了，还会有新资产阶级分子或新的资产阶级产生出来呢？既然有阶级斗争存在，为什么它就不再反映到共产党内来了呢？

薄一波说：“为了说明阶级斗争是普遍存在的，8月5日毛主席说：农村当中还有富裕阶层，阶层之间存在着两类矛盾一是对抗性的敌我矛盾，一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农村现在主要是阶层之间的矛盾，即贫农和富裕农民之间的矛盾，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想复辟的助手。显然，这种说法是不科学的。……如果把这些也看成是阶级斗争，那么，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下册第1099页）

薄一波在这里引用毛泽东的话时，断章取义。毛泽东在八月六日的讲话中又说“资产阶级分阶层，农民、小资产阶级也分阶层。比如现在闹单干的，是那个劳动力强的、比较富裕的阶层。有比较贫的阶层，有比较富的阶层，还有中间阶层。地主富农的残余还存在着。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无产阶级如果不做工作，集体化就不能巩固。”

把这两段话联系起来看，毛泽东在这里说了三种矛盾：一种是敌我矛盾，即人民与地主阶级、富农阶级残余之间的矛盾；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阶级矛盾，即劳动农民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第三种是劳动农民之间的矛盾，即比较贫的阶层与比较富的阶层之间的矛盾。第三种矛盾不属于阶级矛盾，而是劳动农民阶级内部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有时也可能反映社会存在着的阶级斗争。这就是毛泽东说的：资产阶级跟地主富农争夺小资产阶级，他们就是要搞单干，农村富裕阶层是反革命的助手。这样说有什么不对吗？为什么这样分析就会导致“阶级斗争将永无终止”呢？

薄一波说：毛主席把当时党内存在的问题看得过于严重是导致阶级斗争扩大化、绝对化的又一个重要根源。……他在这里说的修正主义，在很大程度上，是冲着1962年上半年的“三风”（即党内认识分歧）说的。在阶级社会里……在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只在一定范围内存在，党内矛盾主要是认识问题。当然，……但如果把党内存在的认识上的分歧和不同意见随意说成修正主义、阶级斗争……（第1100页）

二、关于形势、翻案和单干问题

1, 关于形势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到八届十中全会前后，毛主席就把这两次会议（指 1962 年 2 月召开的西楼会议和 1962 年 5 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对形势和困难的实事求是估计当作‘黑暗风’来批判了。”

邓力群说：与毛泽东讲话的原文相对照，“留在我的记忆中的‘黑暗风’，很显然是很不准确的。”

《毛泽东传》说：周恩来对形势的估计，同刘少奇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在某些提法上更加慎重，而且尽量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

实际情况，与这种说法也相差甚远。七千人大会以后，如何估计当时的形势，又成了中央领导层中的一个有分歧的重大问题。原来，七千人大会同意毛泽东对形势的分析，认为下降的趋势已经到了谷底，此后将逐步好转。然而，七千人大会以后，特别是在西楼会议上及以后，刘少奇反复强调：最困难的时期还没有过去，不要怕把形势说得漆黑一团。也就是说“刘少奇直言不讳地改变了七千人大会关于最困难的时期已经过去的基本估计”（《文革前十年史》第 816 页）而周恩来虽然也强调当前的形势困难是严重的，但认为已经到了谷底。周恩来的提法“同七千人大会的提法相衔接”。这说明：周恩来与毛泽东的判断是一致的，而与刘少奇是不同的。现在的一些文章作者们之所以要强调周恩来与刘少奇是一致的，是为了贯彻他们的一贯的策略：敲打林彪，拉拢周恩来，孤立毛泽东。

以后的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分析是正确的。整个国家的经济形势，一九六一年下降的趋势到了谷底，从一九六二年开始逐步好转，到一九六四年就完成了调整的任务，并没有要五年、八年或十年。

关于形势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国际形势问题。

肖冬连等等的《文革前十年史》说：王稼祥的“这些意见和主张，在当时堪称空谷足音。这又是一次冒险的陈词。”（下册第 945 页）

《毛泽东传》说：这些意见却遭到错误的指责。后来，毛泽东还把王稼祥等人的意见概括为“三和一少”，即所谓对帝国主义和气一点，对反动派和气一点，对修正主义和气一点，对亚非拉人民斗争支援少一点，并称这是“修正主义的路线”。

这里涉及的是有关王稼祥对当时国际形势的看法以及提出的有关政策的建议问题。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王稼祥给中央写信和会议上发言，提出对国际形势的看法和主张。

在世界战争问题上，他说：“不要说社会主义阵营同帝国主义阵营的根本矛盾必然导致发生世界战争；不要说必须在消灭美帝国主义以后，第三次世界大战才能避免；不要简单地说‘打不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取决于我们，而取决于帝国主义’；不要过分强调世界战争的危险，而冲淡了防止世界战争的可能性；不要笼统地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就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就世界战争来说，存在着防止的可能性。”

在和平共处的问题上，他说：“那种认为‘在帝国主义存在的条件下，不可能有和平共处’，‘必须打倒帝国主义，才能有和平共处’，‘必须彻底消除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才能实现和平共处和世界和平’等等的说法是错误的”。

在和平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问题上，他说：“我们应当把和平运动的意义讲够”，“不要只讲民族解放运动，不讲和平运动”，“在和平组织中，不要把民族运动讲得超过了和平运动”。

他建议：一，发表一个全面的对外关系声明，正确地全面地阐明和确认我们的对外政策是和平政策。二，对外有必要采取缓和的方针，而不是采取加剧紧张的方针。三，在国际斗争中不能勇往直前一斗到底。在当前要注意避免把帝国主义的锋芒全部集中到中国来。四，对外援助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要说过头，做过头，不要乱开支持支票，开出的支票要留有余地，不要满打满算，要某些地方甚至还要适当收缩。（参见《王稼祥选集》）

九月十四日，陈毅在华东组发言说：现在有一股风，叫“三面和一面少”。意思是说我们对美国斗得过分了，对修正主义斗得过分了，对尼赫鲁斗得过分了，要和缓一点。一少，是指我们对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太多了，要少一点。这种三和一少的思想是错误的。大量的实事说明我们同肯尼迪、赫鲁晓夫、尼赫鲁的斗争是躲不掉的，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我们的斗争又是有分寸、有约束的，不能说已经斗得过分了。对于民族解放运动，随着我们力量不断增长和技术的提高，我们还应当给他们以更多的支持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目光短浅，不能打

小算盘，要打大算盘，不能只算经济帐，要算政治帐。所以吹起了“三和一少”那样一股歪风，主要是三年的暂时困难，把一些马列主义意志不坚定的人吓昏了。毛泽东十分赞同陈毅的发言，把登有这篇讲话的简报批给江青阅：“可看，很好。”（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 967 页）

一九七九年以后，中国的对外政策基本上实行了王稼祥的这一套主张，所以，现在的一些出版物对王稼祥当时的主张称赞不已。效果如何究竟如何呢？左派和右派各有不同的评论。过去说当缩头乌龟好，现在说要做负责任的大国。也不知究竟谁是谁非。

关于翻案问题

彭德怀在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六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一封申诉信（即所谓八万言书）；八月二十二日，他再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信，“请求对我所犯的错误，进行全面的审查，作出正确自找处理。”

这个问题双方的观点已经非常明确，就无须再讨论了。

另外一个问题是关于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的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这个案件“是康生制造的一起大错案”。

《毛泽东传》说：毛泽东提出一个理论观点：“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搞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无论革命也好，反革命也好，他先要搞意识形态。”毛泽东提出的这个问题，从历史上的阶级斗争和夺取政权的斗争看，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历史现象，很值得重视。但是，毛泽东把它用到小说《刘志丹》上，用到习仲勋等人的身上，则是完全用错了。而且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本书把小说《刘志丹》及习仲勋问题的责任推到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上是错误的。

事实是：一九六二年夏天，小说《刘志丹》印出送审稿，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不同意出版这部书。北戴河会议期间，他看到有些报刊已开始连载部分章节，一面打电话提出停止连载，一面报告康生。康生立即要中宣部通知各报刊不准发表。八月二十四日，康生给杨尚昆写信，说小说《刘志丹》“带有政治倾向性”问题，要中央书记处处理这个问题。九月八日，阎红彦在西南组会上首先提

出小说问题，说在当前国内外的气候下，各路人马都借机出动闹翻案，小说《刘志丹》是习仲勋“主持”写的，“是利用宣传刘志丹来宣传高岗”。康生接着提出：现在的中心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来宣传高岗？他们的发言在全会总72号简报上登出，引起了爆炸性轰动。九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讲话时，康生递了一张条子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毛泽东在会上念了这张条子，接着说：“近来出现了好些利用文艺作品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事。用写小说来反党反人民，这是一大发明。……”。九月二十七日，全会决定成立审查习仲勋等人的专案审查委员会。这一专案审查一直到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尚未结束。文化大革命中也没有作出结论。（参见《回顾》下册第1095-1097页）

事实说明，毛泽东提出的理论观点是正确的，他并没有简单地把这个观点用在小说《刘志丹》和习仲勋的身上。当然也就更谈不上什么“这样一来，给中国的文艺事业乃至整个思想界也带来很大的损害，导致后来的所谓在意识形态领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严重后果。”

3. 关于单干问题

薄一波的《回顾》说：“八届十中全会批判所谓‘单干风’的做法是不对的。第一，对包产到户的性质弄错了。……它本质上仍然是集体经济，只是分户经营，联产计酬，多劳多得，是把集体经济的优越性与农民分户经营的积极性统一起来的较好方式。可是，八届十中全会把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把‘单干’说成是搞资本主义，这就把事物的性质弄错了。第二，片面追求经营管理上的单一模式。……第三，动辄把生产经营管理上的问题上纲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去分析。”（下册第1089-1090页）

《毛泽东传》说：“包产到户，可以说是同农业合作化相伴而生的一种现象。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对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具有很强的生命力，尤其是在手工业的技术条件下。后来的实践证明，它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仍然保留了集体经济的部分优点，在这个基础上，仍然可以实行双层经营，以至条件具备时发展为规模经营。从农业合作化以来，几次出现要求包产到户的风潮，都被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而受到压制。”“但是，它（指集体经济）的局限性和某些不合理性也是显而易见的，仍然不能充分调动农民的生产经营积极性。许多

农民要求包产到户，正是这种情况的反映。对于毛泽东来说，不论是实行包工到组，还是包工到户、到人，他都可以接受，并且认为这是一种进步的经营管理方法。但是，一联系产量，即一搞包产到户，他就认为是资本主义道路，是一条危险的道路。所以，包产到户问题成为毛泽东一九六二年重提阶级斗争的直接导火索。在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究竟怎么搞，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这是需要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生产，是否符合农民的要求，在实践中去探索的。”

他们的这一套所谓“包产到户”是“集体经济的一种经营方式和经营层次”的说法，今天还会有人相信吗？几十年的实践证明：他们说的“包产到户”，就是在土地挂着集体所有的招牌下面的单干，而单干（个体经济、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会产生资本主义。

一九六五年六月十八日，陈云在写给毛泽东的信中说：“一九六二年七月初，我曾经向你提出，同时也向中央常委中有几位同志谈过，用重新分田的办法，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以便恢复农业产量。这个意见是错误的，性质是严重的，它关系到农业向集体经济与小个体经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现在用加强集体经济的办法，三年就恢复了农业，如果用分田的办法，可以想是资本主义的大发展，后患不堪设想。思想根源，在于没有把人与物的关系搞准，没有人的因素第一这种思想。这是右倾错误。”

一九六五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更明确地指出：“在国内主张三自一包的是陈云，而他对我们讲，不仅要包产到户，还要分田到户。说这样四年才会恢复，解放军也会拥护。邓子恢到处乱窜，刮单干风。陈云还守纪律，但是最厉害。”

（以上两段转引自《〈文革前十年史〉》下册第 1136-1137 页）

邓力群说：“毛主席在 1962 年 8 月北戴河工作会上批评，单干风愈到上面愈厉害，应当承认是正确的。”（《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四）》）“有些事情，事前无法预料到。就在总路线所需要的各种具体工作路线已经制订完成的时候，纠正”左”倾错误工作已经完成的时候，一种倾向掩盖着另外一种倾向，右的倾向又冒出来了。这时，田家英从农村调查”包产到户”回来反映说，被调查的人民公社的多数社员认为退得不够。怎么办？只有分田到户，才算退够了：是多数社员认为应该这样做。当时，因为我们的错误而造成的农村和农民的困难，确实太惨重了。听到田家英反映的这种呼声后，中央常委中，

刘少奇、陈云、林彪、邓小平同意田家英的意见，周恩来没有表示同意，但是也没有反对。一种倾向掩盖另外一种倾向，在全力纠正“左”倾的时候，右倾来了。而且确实像毛泽东讲的，这种倾向越是到上面越厉害。这是合乎历史事实的，合乎实际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采取适当的办法加以解决，我们的工作会发生很大的变化。由于我们过去有经验，在这点上，应该说，毛泽东既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但是又接受了庐山会议时的经验教训，采取了完全不同于庐山会议的方法，来解决当时确实存在的右倾。在这一点上，应该讲，毛泽东是接受了教训。这时确实是右倾。中央常委中有四个人赞成分田到户，这还不严重啊？应该解决，但是又不能用庐山会议的办法，实际上是用整风的办法来解决。在会上，没有批评任何一个常委。只是在会前个别谈话时，对陈云作了严厉的批评。对刘少奇批评他没有顶住。对中央常委的错误，采取个别谈话的办法来解决，而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中央全会上，用党内整风的办法，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办法来解决，把这个右倾向端正了、纠正了，使经济调整工作没有走入邪路，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继续前进。到后来，收到了明显的效果。所以，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八届十中全会采取的办法，中国的历史在 1962 年 5 月以后会是一个什么样子？这样，完成了经济调整的方针的制订和实行，并使它沿着正确的方向实现经济调整、经济恢复。经过 1962 年、1963 年两年恢复，1964 年后就转向全面的发展。”（《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归根到底，八届十中全会在我党的历史上，起了什么作用？邓力群经过二十多年的观察和思考以后，他说：“现在看，这次的北戴河工作会议、八届十中全会是正确的。过去只讲恢复发展是西楼会议的功劳，应该讲十中全会端正政治方向和调整工作结合在一块，才有 1961 年以后、文革以前的最好形势。过去的印象里头，十中全会重新提阶级斗争，认为是一种干扰。现在看，十中全会是端正政治方向，没有十中全会，确实可能走偏方向。及时提出这个问题，避免了这样一个危险。1962 年调整工作取得成绩，不应该只讲刘少奇的贡献，应该把毛主席的贡献，中央集体的贡献放在一起估价。”

他的这种看法或许可以作为一种意见，供人们参考吧！

2011 年 6 月 4 日修改

第二节 围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三年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专门讲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再次提出阶级斗争以后，毛泽东从“反修防修”的战略出发，决定在全国城乡发动一场普遍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二年冬和一九六三年初，毛泽东在杭州、南昌、长沙、武汉、郑州、邯郸等地，分别找来一些省委负责人谈话，只有湖南省委书记王延春、河北省委书记刘子厚向他汇报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情况。毛泽东感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并没有引起各地负责人的高度重视，感到不满，决定在一九六三年二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一下。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至二十八日在北京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会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增产节约和“五反”运动，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厉行增产节约和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反对分散主义、反对官僚主义运动的指示》。

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召集各中央局第一书记谈农村工作问题：

他说：“各省农村情况究竟如何？王延春、刘子厚同我谈过，他们都写了报告。但刘子厚的报告没有写清楚。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讲什么？他们原来写了提纲，按提纲讲碰了钉子，后来才按中央文件原原本本地讲。谁讲？我看从省委书记到县委书记，凡是年轻力壮的都要到公社去讲。”

他说：“在农村要加强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要有一套制度防止修正主义。现在的事情，实际上是上一个朝代传下来的，是上一个朝代孕育的。”

二月二十八日，在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天的会议上，毛泽东专门讲了社会主义教育问题。

他强调指出：“要把社会主义教育好好抓一下。社会主义教育，干部教育，群众教育，一抓就灵。”

说：“我跑了这么多省，两个省的同志（王延春同志在长沙，刘子厚同志在

邯郸)突出地跟我讲这个问题。干部教育中，要保护大多数，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同志把包袱放下来，也不是洗冷水澡，也不是洗滚水澡，而是洗温水澡。然后，他们去和贫下中农积极分子结合，团结富裕中农以及或者已经改造或者愿意改造的那些地主残余、富农分子，打击那个猖狂进攻的湖南人叫‘刮黑风’的歪风邪气、牛鬼蛇神。”

他说：“现在又证明，我们的干部，包括生产队长以上的这些不脱离生产的以及脱离生产的，绝大多数不懂社会主义。他们之所以不懂，责任在谁呢？在我们。我们没有教育嘛，没有教材嘛，没有像‘六十条’这样的东西以及阶级教育。十中全会公报是很好的一个教材。有教材了，教育的方法，还得照湖南、河北现在的办法。请各省把湖南省委、河北省委这些报告，参考你们自己的经验，加以研究。要走群众路线，保护大多数干部，又使他们放下包袱，又解决问题。只要五个晚上，歪风邪气、牛鬼蛇神就打下去了，不需要多少时间。”

毛泽东问王延春：“只要五个晚上，是不是这样？”王延春答：“是这样的，可能有的多一点。”毛泽东接着说：“这个教育问题，提出来还只有一两年，从‘六十条’起，还只有两年，从去年七千人大会着重提出教育干部算起，也只有一年多。再有几年，我们的干部是可以教育好的，可以把那些牛鬼蛇神打下去。既然是牛鬼蛇神，就要打。打的方法，也不能个个拿来枪毙，不能用那个生硬的方法。像少奇同志那一天讲的斯大林那个办法，动不动就杀人，那不解决问题。”

最后，他说，今年如果能够再增产一百五十亿斤到二百亿斤粮食，棉花再增产若干，油料再增产一些，工业的调整再有一个进步，那就很好了。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对于开展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说，具有标志性的意义。会议后，各地纷纷行动起来，把农村社教运动当作一件大事来做，并且初步总结了一些典型经验，上报中央。毛泽东对这些经验报告极为重视，选其重要者，及时批转各地，催促参照实行。

二、一九六三年五月杭州会议起草《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转发了山西昔阳县干部参加生产劳动的材料。这个材料以中央名义于转发，毛泽东审批时重新拟写了一个标题：《山西省昔阳县，县、社、大队、生产队四级干部全体参加生产劳动的伟大范例》。

一九六三年四月间，毛泽东又先后收到几个报告。主要有：（一）四月四日保定地委关于“四清”工作向河北省委的报告。（二）四月十日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两个问题的报告。（三）四月十五日河南省委关于当前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报告。毛泽东对这几个报告都很重视。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日至十二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一个会议，主要就是讨论和修改决定草案稿。

五月二日，毛泽东亲自起草对宋任穷的报告和河南省委的报告的批语：

批语指出：“河南报告说明，他们在中央二月会议以前是没有根据十中全会指示的精神，认真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或者是没有抓住问题的要点，没有采用适当的方法。二月会议以后，他们抓起了这个工作，并且抓住了问题的要点，采取了适当的方法。”

批语在肯定河南的试点工作后指出：“总之，必须团结绝对大多数(百分之九十几)的干部和群众，适当地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即解决程度不同的不正常的干群关系问题，组成有领导的广大干群队伍，以便一致对敌。对坏人坏事，也要有分析。轻重不同，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必须以教育为主，以惩办为辅。真正要惩办的，只是群众和领导都认为非惩办不可的极少数人。”

批语向全党推荐了宋任穷报告中讲的用村史、家史、社史、厂史教育青年群众的做法，认为是普遍可行的。批语最后指出：“社会主义教育是一件大事，请你们检查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认识和工作，检查一下是不是抓住了要点和采取的方法是否适当，查一查是否还有很多的地、县、社没有抓住这方面的工作。如果有的话(看来一定是有的)，应当在农忙间隙，在不误生产的条件下，抓住进行。”

这个批语，毛泽东特地用中共中央指示的形式下发，意在大力推动全国农村的社教运动。同时，在工作步骤和政策上，采取了较为稳健的方针，强调：“特别要注意分步骤的方法、试点的方法和团结大多数、孤立极少数的政策”。

五月七日，毛泽东主持讨论决定草案第一稿。他对这个稿子提出了指导性的修改意见：

他说不要那么长，要短些，严肃些。要写些这样的问题，如认识不一致的问题。他说，他走了十一个省，只有王延春、刘子厚滔滔不绝地向他讲社会主义教育，其他的省就不讲。三级干部会开了，社会主义教育没有抓住要点，方法不对。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要点就是：阶级、阶级斗争，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四清”，干部参加生产劳动这样一套。

他说：各地都要试点，试点很要紧。凡是一般化的，不触及洗手洗澡，不触及贪污盗窃，就不能抓住问题。我们在农村中十年来没有搞阶级斗争了，只是土改搞了一次，“三反”、“五反”是在城市，一九五七年搞了一次，也不是现在这个方法。现在的方法，是要使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洗温水澡。说精神愉快，那是结果，要有点紧张，但不是所有的人都那么紧张。有些人实行了退赔，就不戴贪污分子的帽子了。吐出来就算洗了手，一不叫贪污，二不叫盗窃，伤人不要过多。十年来，“四清”就没有搞清楚过。“四清”是人民内部矛盾，敌我矛盾就是敌人的破坏，投机倒把，贪污盗窃。要用现在这个方法，使多数人洗手洗澡，轻装上阵。要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团结教育过来，发动群众，打击极少数贪污盗窃分子。要使多数人有敌我观念，把阶级队伍组织起来。

他又提出：不要性急。今年搞不完，明年再搞。明年搞不完，就后年。社会上总是一分为二，对立的统一，没有贪污盗窃，不成世界。不然辩证法就不灵了。

毛泽东与大家一起进餐。他举杯祝酒：“为‘四清’、‘五反’，挖修正主义根子的胜利干杯！”他接着说：“有人有顾虑，无非是两条，一是怕耽误生产，一是怕伤人太多。要使阶级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有利于生产。‘四清’、‘五反’的结果，一定会有利于增加生产。”

饭后，继续开会。他说：干部参加劳动问题，请大家注意一下。昔阳的材料很好，你们看了没有？那个县的干部每年参加劳动，至少有六十天。那是一个在山上的县，很穷。越穷就越要搞社会主义。富了就不搞了吗？！各省都有这样的材料，浙江搞了七个。请每个省都搞一批。干部一参加劳动，许多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修正主义的根子就在这里。支部书记参加劳动了，大队长、队长、会计就会参加，整党整团就好办了。这样，修正主义就少了。县、社两级干部也要参加劳动。我希望在几年之内，分期分批，办到昔阳那样的程度。

说到组织阶级队伍问题，毛泽东认为，“六十条”中对阶级队伍问题写得不突出是一个缺憾。他说：农村里贫下中农大约占百分之五十到七十，组织起来了，就有了中心。搞“六十条”时，还没有好好注意提依靠谁的问题。依靠谁，总得有阶级，不是依靠全民，而是依靠较贫苦的。

五月八日，毛泽东向会议印发并推荐了湖南省委的两个报告：关于农村社教运动情况的第二次报告和关于树立贫农优势的报告。

毛泽东说：“你们的文件就是平淡，逻辑性也不够，有的长，有的短。”“启发就是河南的这两个材料。我又看了一次昔阳的报告，写得很好。浙江的七个材料我都看了。”

毛泽东提到的河南的两个材料，指的是在《中南通讯》上刊登的《偃师县三级干部会议的做法》和《巨陵店区三级干部会议》。同时刊登的还有另外两篇，湖北的《五里界区四级干部会的开法和效果》和湖南的《花明楼公社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毛泽东向全党推荐了这四个材料，并给了很高的评价。

他在批语中写道：“这几个文件很好，看到了问题，抓起了工作，正确地解决了大量的人民内部的矛盾和敌我之间的矛盾，政策和方法都是正确的，因而大大地推动了农业生产。可以作为各省、地、县、社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工作的光辉的榜样，应当组织干部学习这些文件。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都需要收集这种又有原则，又有名有姓、有事件、有阶段、有过程、有结论的文件，请你们注意这件大事，认真调查研究，是为至要。”

毛泽东说：“什么是调查研究的范围？一个生产斗争，一个阶级斗争，一个科学实验。不然，哪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恩格斯不参加生产，是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我们这些人年纪大了，不能劳动了，就靠总结人家的生产经验。现在要好好提倡干部参加生产劳动。阶级斗争和生产同时搞就不行？一边开会，一边生产，生产劲头就来了。阶级斗争可以促进生产嘛。”

毛泽东接着说：“你们中央局就开这样的会。注意这种会不要伤人。伤人只伤少数人，百分之五、百分之六也多了。我看最后还要缩小，还要加上不追不逼，不打不骂。有些事不要搞绝了。过去几年没有管，要在几天就解决，恐怕也困难，还是要慢慢打通思想。压服不行，压而不服，一定要说服，说服就要有一个过程，一次谁都认识不了。现在才懂得什么叫心情舒畅。贫雇农不起来，几股黑风不打倒，干部不洗澡，能够心情舒畅吗？干部心情不舒畅，贫下中农也不能心情舒畅。要反对修正主义。要不这样搞，地富反坏就要反攻倒算，投机倒把分子也要猖狂起来，不出修正主义才怪！”

毛泽东表示：“整党，我看不忙，明年后半年再搞。你不搞阶级斗争，不搞生产，不搞‘五反’，不搞‘四清’，不把贫下中农组织搞起来，整党怎么搞得起来？这些事，两年做好就不错了。”

五月九日，毛泽东又转发了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他一口气写了一千三百多字的长篇批语：

“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三项伟大革命运动，是使共产党人免除官僚主义、避免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确实保证，是使无产阶级能够和广大劳动群众联合起来，实行民主专政的可靠保证。不然的话，让地、富、反、坏、牛鬼蛇神一齐跑了出来，而我们的干部则不闻不问，有许多人甚至敌我不分，互相勾结，被敌人腐蚀侵袭，分化瓦解，拉出去，打进来，许多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也被敌人软硬兼施，照此办理，那就不要很多时间，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马列主义的党就一定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党，变成法西斯党，整个中国就要改变颜色了。请同志们想一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情景啊！”“这一场斗争是重新教育人的斗争，是重新组织革命的阶级队伍，向着正在对我们猖狂进攻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作尖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把他们的反革命气焰压下去，把这些势力中间的绝大多数人改造成为新人的伟大的运动，又是干部和群众一道参加生产劳动和科学实验，使我们的党进一步成为更加光荣、更加伟大、更加正确的党，使我们的干部成为既懂政治、又懂业务、又红又专，不是浮在上面、做官当老爷、脱离群众，而是同群众打成一片、受群众拥护的真正好干部。这一次教育运动完成以后，全国将会出现一种欣欣向荣的气象。差不多占地球四分之一的人类出现了这样的气象，我们的国际主义的贡献也就会更大了。”

五月十日和十一日，毛泽东集中两天时间修改《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五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上讲话：

他说：不要性急，横直准备搞他一年、两年，两年搞不完就三年。有的地方一时还搞不了，就不要勉强搞。可以允许两个办法，一个搞，一个暂时不搞。这样一来，就防止了急。总之，这一次要搞得稳一点，分期分批，一个县也要分期分批，先搞试点，可以有先有后，允许参差不齐。这样就做得好。

毛泽东说：“我看可以这样说的，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已经批的文件，都改过来。”

毛泽东说：“要注意不同地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的做法要有不同。西藏、新疆做法要有不同。甘肃、青海、宁夏也要注意民族地区的特点。”

毛泽东形象地把阶级斗争现象比作“蚂蚁”，说大踏步走路就看不见蚂蚁，一蹲下去就看见了。没有“蚂蚁”的地区就不要去找“蚂蚁”，比如那些一类队，一定要搞阶级斗争就不一定。那些地方，过去注意了阶级斗争，注意了社会主义教育，就不一定采取这些方法去搞。但是，人民内部矛盾是普遍的，那要搞多少年。

他说：赃物赃款，不退不行，但又要合情合理。退得太挖苦了也不行，使干部生活过不去也不好，群众过些时候也会同情他的。

毛泽东说：从基本上说，不是派人去的问题，而是依靠群众，依靠省、地、县、社的广大干部。把广大干部群众发动起来，这是最主要的。用这种方法，自我教育的方法，来办好人民公社。

五月十二日，他说：还有些话，又把你们找来了，谈谈总结经验这个事情。各中央局是否在七月二十日北戴河会议以前再开一次小型的一会，总结总结这一段经验，搞得天下不是大乱，中乱小乱也不好。你晓得地委怎么样？摸一摸底，不然，宁可不发动。要自觉的，不要勉强的，要他懂得这是怎么一回事。准备一年、两年搞完，搞好。不要伤人，伤了人，敌人又搞不准。“四清”我们从来没搞过，过去有许多运动，搞出毛病，后边还要平反。对于干部要着重说服，说服不通的，就用实际证据再说服。老口号不行，没有贫下中农来说服不行，那些顽固的，你们说不行，他就是听群众的。总之，中央局要看情况，如果蛮干一气，你就开会，把蛮干的说服，不然，那就一下子搞乱了。毛泽东强调指出：对于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要实行不抓辫子、不打棍子、不戴帽子这一条。手脚不干净的要检讨。要讲清楚，第二批、第三批铺开的不算不名誉，不然他力争上游，一哄而起。就怕伤人，搞过了头。

杭州会议结束了。

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八日，在周恩来主持下，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

这个决定草案在五月二十日正式下发，成为全国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导文件。杭州会议以后，各地开始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试点，城市的“五反”运动进一步展开。到这年九月，中央机关的“五反”运动基本结束。

三、一九六三年九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至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议程之一，就是讨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会议通过了这个文件，同时提出一些意见。

在一线负责这项工作的彭真，从五月十五日到六月十五日，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到一些省份视察，发现了不少问题。七月四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写了一份情况报告，提出“不要重复老区土改整风时‘搬石头’、‘跳圈子’的错误”。同时，各地陆续报来一些材料，反映农村社教中出现的一些偏差和问题，提出要划清一些具体的政策界限。为此，中央决定，由邓小平、谭震林主持起草《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具体工作由田家英组织的一个起草班子负责。这个文件也写了十条，简称“后十条”，五月间下发的《决定(草案)》简称“前十条”。

“后十条”首先肯定《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是一个伟大的具有纲领性的文件”，并肯定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阶级矛盾、阶级斗争问题的论述，在中央的正式文件中第一次使用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两个十条的核心内容是一致的。但“后十条”主要是针对前一段试点工作中出现的偏差和问题，从政策上作出一些具体规定，着重划清一些政策界限。文件突出了两个“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民群众，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农村干部)，并认为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群众的一个前提条件。文件强调，社教运动要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绝大多数的干部是好的。工作队的任务，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决不能包办代替。文件还强调，运动要同生产工作紧密结合，运动的一些措施，都应当有利于生产。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和宣传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问题的两个文件的通知》。《通知》肯定“后十条”是一个“重

要文件”。指出：由于“后十条”对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部署作了修改，“前十条”通知中的规定要作相应的改变。原先规定，暂不搞社教运动的县、社和大队，“前十条”暂不传达；现在改为：“前十条”和“后十条”两个文件向农村每个支部发两本，由县、区、社的党委领导干部向全体党员和全体社员宣读。城市工厂、机关、学校、街道以及军队，都照此办理。民主党派成员发给他们阅读。对地、富、反、坏、右也要向他们宣读。“总之，要使全国家喻户晓，做一次伟大的宣传运动”。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将修改过的“后十条”和中央通知稿，批给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罗瑞卿、陈伯达、谢富治、杨尚昆、田家英阅，请他们开会讨论一次。“如认为可，即照办；如认为不可，即再商量。”

一九六三年十月三十一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后十条”第六稿。刘少奇建议，将文件标题改为《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具体政策问题的规定(草案)》。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上旬，毛泽东在杭州召集刘少奇、邓小平及柯庆施与华东各省委第一书记，再次讨论修改“后十条”。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四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最后通过“后十条”，与毛泽东起草的中央通知一起下发。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于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日才正式下发，三个月之后，中央就决定起草“后十条”。在毛泽东看来，当时并无充分的实践经验作根据，但他为了尊重集体的意见，还是同意起草并下发了“后十条”。

四、一九六四上半年毛泽东巡视南方各地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二日，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一个通知，通知提出：我党从一九六三年开始的全党全民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把“双十条”在几年内分几次在城乡全党全民中宣读讲解，为此要组织宣讲队伍。“从中央委员到县委市委委员，与县一级相同的党委委员以及其他有相当文化和政治水平的同志，除年老体弱及有病者外，一律要使他们充当宣读员，至少一次到两次。避免不去的，叫作消极怠工分子。这样做，于己于人，好处极多，能使全党全民获得社会主义教育，首先是各级干部获得这种教育，免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和

教条主义的危害。”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八日，听说山西全省从去年十二月以来，在面上普遍宣讲了“双十条”：点上正在公社搞“四清”试点，毛泽东关切地问：“你们这样做，究竟妨碍了生产没有？生产情况如何？”并说：“每一步骤都要紧密结合生产。”

当汇报到有人说阶级斗争是共产党挑起来的，毛泽东说：什么挑起来的呀，共产党是反映人民的要求。人民要求“四清”，反贪污、反浪费、反多吃多占、反对反革命破坏。因此才写了“五反”指示，才出了“双十条”，然后发下去，到工厂、农村去念，看他们赞成不赞成，有无修改。你说这些东西是天上掉下来的？是主观挑起来的吗？说是共产党想出来的，为什么群众欢迎？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时，四类分子跃跃欲试。地主用归宗图教育他们的后代，还要搞阶级斗争，他们用送礼、美人计拉拢我们的干部，是谁挑起来的？阶级斗争确实存在。不能把没有说成有，也不能把有的说成没有。

他了解到一些人想降低“四清”标准，贪多求快，立即表示：革命要革到底。我看从去年算起，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紧了不行。现在全国有点苗头，就是太急。要什么今年搞百分之五十到六十，明年要搞完，何必那么急。劲头上来了就急，我看宁可慢一点。无论“五反”也好，“四清”也好，时间长一点，搞好一点。急了就不能达到目的。当然也不是说要慢腾腾地搞，现在不是慢腾腾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在另一方面，就是太急。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日，毛泽东提出几个问题：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搞粗一些好，还是搞细一些好？时间长一些好，还是短一些好？他说：中央最近发了一个指示，提出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必须进行到底。要搞彻底，至少要三年到四年的时间。“现在各地做法不一样。看起来，一般的还是先解决人民内部问题，先解决‘四清’问题，然后再解决敌我问题为好。如果领导权被敌人篡夺了，就要先夺权，解决敌我问题。”“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绝不能着急，一定要搞彻底，不要滑过去。两年不行搞三年，三年不行搞四年。过去民主革命没有搞彻底，现在要补课。社会主义革命如果滑过去，将来又要补课。”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日，毛泽东听说湖北当年计划百分之五十的社队完成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毛泽东问：“你们是不是要求太急了？这样做，会不会走过场？”

又问：“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做法，是从对敌斗争入手，还是从‘四清’入手？”下一批是不是可以从干部洗澡放包袱搞“四清”入手？”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八日，毛泽东就城市街道是否可以成立劳动人民协会，进行阶级划分这个问题，明确的回答说：“我赞成。农村有阶级，工厂有阶级，城市无阶级，那是全民党、全民国家了。城市也有阶级，过去没有划就是了。”这样，社教运动又增加了一个新的内容。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九日，毛泽东说：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以搞好为主，不要赶时间。要多花些时间，工作队要经常进行整顿。不要冤枉人，又要教育人，把坏人搞出来，把坏人制服，“四不清”变成“四清”，不劳动变成劳动。领导要强，要依靠贫下中农群众，干部和群众密切团结。生产要发展。如果生产搞坏了，下降了，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就是失败了。我们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应当比土改时搞得更深入细致一些，因为土改时干部少，没有经验。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有人提出，过两年“六十条”是否修改一下，“六十条”对社办企业的劳力投入的限制有问题。毛泽东说：“是否暂时不改，到大多数公社、大队都有了社办企业或大队企业、公共积累，‘六十条’再承认既成事实。”他还说，自留地不要动，自留地生产的粮食不要算口粮。自由市场不要动。浙江还有恢复蚕桑、桐油、茶叶的问题，要订出计划。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日到十三日，毛泽东说：要依靠大多数，依靠贫下中农，把他们组织起来。看你站在百分之九十五的人这一边，还是站在百分之五的人那一边，要算这个基本账。他说：“我们这一辈子忘不了贫下中农，有时只要提醒一下就行了。干部子弟恐怕就会忘记了。我们许多人中间，地委书记也忘记了，他们现在丰衣足食了。”

他说：“你们做计划工作的也一定要注意绝大多数，注意贫下中农。”

毛泽东说：“工业、农业、商业都要划阶级，学校、机关、军队、文化团体也要划阶级。此外，街道、小市镇也要划。划阶级主要是把坏分子清出来。阶级成分和本人表现要加以区别，重在表现，唯成分论是不对的。问题是，你是站在原来出身的那个阶级的立场上，还是站在改变了的阶级的立场上，即站在工人、贫下中农方面。又不能搞宗派主义，又要团结大多数。地富子弟要团结，连地主富农中的一部分人也要团结。反革命分子、破坏分子只要愿意改造，就应该要他

们。我们在工厂中划阶级，主要是把那些国民党的书记长、反动军官、逃亡地主、地富反坏分子清查出来。并非查所有的人，并非主要为了查剥削阶级出身的技术人员。他们过去有的是为剥削阶级服务，只要现在表现好，就要信任他们。即使表现不大好，也要改造。这个问题，我是首先看了西安在工人中查阶级的报告才提出来的，去年转发了给大家。”

毛泽东提出了搞好社会主义教育的四条标准：“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第三，发现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四，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

五、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开始显露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七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决定修改“后十条”。由谭震林负责，根据五月中央工作会议提出的意见进行修改。

一九六四年六月底，刘少奇和王光美离开北京南下。第一站到天津。七月五日，王光美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讲桃园经验。七月六日，离开天津到济南。王光美在山东又讲了一次。刘少奇就让王光美给河北省委打个电话，请他们将王光美在河北报告的录音整理出来。离开山东，继续南下，先后到安徽、江苏，上海。七月底回到北京。

从济南开始陪同刘少奇的华东局魏文伯打电话给江苏省委书记江渭清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和十七日，刘少奇在南京作了两次报告，其中，对当时城乡社会主义教育，包括江苏的四清运动，提出了批评：

第一，对大约三分之一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他认为，也许不止三分之一，有些地市、县的领导说没有这么多，这是对和平演变、资本主义复辟警惕性不高，是很危险的。

第二，对干部队伍的估计：他认为，真正有严重问题的、四不清的，占基层干部的多数，不是少数；没有多少问题的、可靠的、团结了 95% 群众的干部很少，不是多数；对基层干部靠得住就靠，不可靠就不靠。要等基层干部改变了，再来依靠。

第三，对运动情况的估计：他认为，社会主义教育已经搞了一年多，农村、城市都没有搞好。这个革命运动比土改、合作化、公私合营更广泛、更深刻、更复杂，因此没有充分时间不行。

第四，后十条要修改。

第五，要追根子。他说：生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大队有人保护。大队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公社有人保护。公社有严重问题，一定是县委、地委有人保护。地委有严重问题，一定是省里、中央有人。工厂、机关也一样。处长有严重问题，一定有部长保护。四不清的根子在上面，不可不追。

第六，各级领导都要蹲点。

从形式上看，刘少奇的一些意见，确实相当“左”。

然而，刘少奇的某些意见遭到江渭清的抵制。

江渭清对刘少奇说：说社教都没有搞好，江苏不是这个情况。

刘少奇说：去年一年多，小四清打了败仗嘛！

江渭清说：不能这么讲，我们了解，已经开展社教的大队，百分之六十打了胜仗。江苏的基层干部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说：你这是没有下去，讲的还是三年前的老情况。

江渭清说：我经常下去，对情况还是知道的。毛主席也说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比较好的。

刘少奇说：你赞成不赞成王光美同志的报告？

江渭清说：从江苏的实际出发，学习精神实质。符合江苏情况的，就学习运用，不符合江苏情况，就不照搬。

刘少奇说：那你们江苏就不执行了？江渭清说：不盲目执行。

第二天晚上，刘少奇离开南京时，对江渭清说：你昨天讲的那个意见是不对的。

江渭清执意坚持，刘少奇发了脾气。

七月二十六日，刘少奇回到北京，向毛泽东汇报了这些情况。毛泽东说：不要怕右，半年总结一次。

一九六四年八月一日，刘少奇召集在京党政军机关和群众团体负责干部的大会，就农村社教运动发表长篇讲话。

关于蹲点，他突出地强调，各级负责干部都要亲自下去蹲点，自始至终地参加“四清”的全过程。如果不去取得这种直接的经验，那就不能做领导工作了。省委书记当不成了，地委书记、县委书记也当不成了，中央部长恐怕也当不成了，中央委员恐怕也当不成了。

关于对敌斗争，他说：“现在，我们是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条件下来进行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现在可以说到处都有。在过去十五年以来多次的运动中间，阶级敌人已经改变了同我们作斗争的方式。敌人现在是向我们采取合法斗争的方式。在很多地方，他们是利用我们的口号，利用我们的政策，利用共产党员的招牌，利用我们干部的面貌来篡夺领导权，或者把持领导权。坏人坏事，在上下左右都有根子，一律应该追清楚。追到哪里是哪里，追到谁是谁，一直追到中央。而上面的根子危害性更大。”

关于调查方法问题，刘少奇说：“现在，调查农村情况、工厂情况，在许多情况下，用那个开调查会的方法（毛主席在《农村调查》中间讲了开调查会），找人谈话，已经不行了。现在要做调查研究，对于许多单位，应该去搞社会主义教育，搞‘四清’，搞对敌斗争，搞干部参加劳动，发动群众，扎根串连，这样做，你才可以把情况搞清楚。”

刘少奇对“后十条”提出批评：

他说这个十条是有缺点的，对于强调放手发动群众写得不够，应当加以补充修改。

他说：“现在证明，这两个十条，包括第二个十条，普遍读一次有好处。但是，地、富、反、坏分子，犯了严重错误的干部，他就利用这个第二个十条的许多政策规定来顶工作队，来反对放手发动群众，反对搞‘四清’。第二个十条的那些具体政策的规定，是群众发动起来以后，问题解决了，如何宽大处理的问题。群众还没有发动，怎么就拿第二个十条去搞呢？念一遍有好处，以后不要强调了。”

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面讲了两个依靠。平常我们说，在农村里面贫下中农是我们的唯一依靠。现在搞出两个依靠来了。两个依靠就不是唯一的了嘛。如果基层组织是依靠贫下中农的，贫下中农又信任基层组织，那依靠这样的基层组织是对的。如果基层组织它自己不依靠贫下中农，它脱离群众，它犯了严重的

‘四不清’错误，那你依靠它就靠不住。这个时候，必须工作队自己去扎根串连，直接发动群众，不要经过基层组织，才能够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搞好‘四清’、‘五反’，然后才能达到团结两个百分之九十五，共同对敌。”

刘少奇说：“第二个十条上有这么一句话，说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基层干部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的前提。这句话讲得不对，讲反了。应当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群众是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的前提。”

关于工作队的任务，“后十条”规定，主要是给基层干部当“参谋”，出主意，启发基层干部善于分析问题，确定方针和办法，而决不能包办代替。刘少奇说：“所谓‘工作队只当参谋’，只适用于群众已经发动起来，证实它是一个好支部，或者是经过改造了的支部，或者他们已经改正了错误，积极参加劳动的地方。凡是有严重问题的那种基层，你不能去当参谋。所以，第二个十条不分好坏，讲工作队只能一切经过基层，只能当参谋，解决不了问题，常常是不妥当的。”

刘少奇的这个报告实际上全是在反他认为的右倾。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田家英向毛泽东请示对“后十条”的修改有什么意见。

毛泽东谈了两点：第一，不要把基层干部看得漆黑一团；第二，不要把大量工作队员集中在一个点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中央书记处会议再次决定，“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由刘少奇负责。同时又决定，中央成立“四清”、“五反”指挥部，由刘少奇挂帅。

一九六四年八月五日，田家英在从北京飞往武昌的专机上，把毛泽东修改后十条的意见转告了刘少奇。刘少奇紧皱眉头，没有说话。

从刘少奇八月一日的讲话和毛泽东对修改“后十条”的意见中，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到十六日，刘少奇先后在湖北、湖南、广东三省向机关干部作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并在广州修改审定“后十条”。王光美也同时作桃园经验报告。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六日，刘少奇从广州致信毛泽东，对农村社教运动的部署问题提出一个新建议，即改变原先以县委领导为主的办法，采取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力量搞一个县的办法。他在信中写道：“我在几个省走了一遍之后，了

解到各省对社会主义教育进行了认真地讨论，省、地、县三级干部的认识大有提高。但是，还有一部分县委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把这一次社会主义革命搞彻底是没有决心的。另一部分县委虽有某种决心，但不够坚定，又缺少办法。此外，一部分社队的严重问题，又牵连到区委和县委、县人委的某些人员。县委对这一部分社队犯有严重错误的干部和有牵连的人员，常常难于下决心去发动群众加以揭露、批评和斗争，并且给以适当的处理。因此，由各县分散去进行农村社会主义教育，是否都能搞深搞透，我认为是难于保证的，至少也有一部分是没有保证的。因此，我向湖北、湖南省委建议：是否可以把各县工作队集中到地委，省委工作队也分到各地委，在省委、地委领导下集中搞一个县。县以下各行各业和城镇的五反以及农村社会主义教育，都由工作队统一包干或先或后地全部搞好。经过湖北、湖南省委讨论，他们都赞成这个建议。在我到广州之前中南局也赞成这个建议，并决定中南五省都照此办理。”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七日“后十条”的修改工作结束，原为草案，修改后叫修正草案。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复信，完全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他说：“八月十六日来信收到，我于昨天(十七日)看了一遍，觉得很好，完全赞成。今天(十八日)即与中央各同志商量，照此办理，迅速实行。十月工作会议还应该讨论此事一次，取得一致同意，统一党内思想。在此以前，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各地委、各县委先行讨论一次，收集各种意见，以利十月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八月中旬至十月中旬，中央、各中央局、各省、地、县委、各中等城市市委，以两个月时间，即照你的办法，立即训练工作队，以利秋冬实施。”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九日，刘少奇致信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信中说：“第二个十条，已由田家英同志和中南局、广东省委的同志作了一些重要的修改，我已看过。我意可以发给各中央局，省、地、县委征求意见，在十月会议时定稿。现由田家英同志带回，请主席和中央审核。我也将带到其他几个省和中央局征求意见。”

“后十条”的修改工作，主要是按照刘少奇这个时期关于社教运动的讲话内容，特别是他对“后十条”的批评意见进行的。刘少奇还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文件对农村阶级斗争形势作了更加严重的估计，对基层政权的问题看得十分严

重，提出了“反革命的两面政权”的概念。从这种错误的估计出发，改变了原先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的做法，改由工作队领导整个运动，把广大基层干部从运动领导中撇开。

修正草案还增加了毛泽东一九六四年六月在一次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提出的关于搞好社教运动的六条标准（这六条标准是：第一，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第二，干部中的“四不清”问题，是彻底解决了，还是没有彻底解决。第三，干部是参加了劳动，还是不参加劳动。第四，一个好的领导核心是建立起来了，还是没有建立起来。第五，发现有破坏活动的地、富、反、坏分子，是将矛盾上交，还是发动群众，认真监督、批评，以至展开恰当的斗争，并留在那里就地改造。第六，要看是增产，还是减产了。）

同一天(十九日)，刘少奇还给毛泽东写了一封推荐王光美关于“桃园经验”报告的信，信里说：“王光美同志的这个报告，陈伯达同志极力主张发给各地党委和所有工作队的同志们。”“现代中央拟了一个批语，请中央审阅，如果中央同意，请中央发出。”

他在为中央起草的转发批语中说：这个报告“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是有普遍意义的”。

刘少奇代中央拟的批语，全文如下：关于一个大队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经验总结”，是王光美同志在河北省委工作会议上的报告记录，是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一个比较完全、比较细致的典型经验总结。文字虽长，但是好读，各地党委，特别是农村和城市的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急需了解这种材料和经验。现特发给你们，望你们印发给县以上各级党委和所有社会主义教育工作队的队员阅读。这仅仅是一个大队的经验。在许多问题上有普遍性，但在另外的许多问题上又有很大的特殊性。例如：中央“双十条”的基本精神是彻底革命的精神；必须放手发动贫下中农和其他农民群众才能解决干部的“四不清”和对敌斗争中的各种问题，把社会主义教育搞深搞透，形成新的生产高潮；在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以后，要掌握群众运动的火候，适时地提出实事求是地对待问题，强调贯彻中央各项具体政策的规定；县、区、公社、大队、生产队的许多干部以至工作队的许多成员对于放手发动群众有无穷的忧虑，不把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

群众作为基础和前提条件，而片面地强调依靠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不把贫下中农作为我们党在农村中惟一的依靠；“四不清”严重的干部和他们上面的保护人要用各种办法抵抗“四清”运动；等等，都是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即是在许多地方都要遇到同样的问题，因此，桃园大队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但是，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情况，又是各不相同的，都有它的特殊性，所以主观上不要先有框框，一切要从实际出发，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所以桃园大队的经验只能作为参考，不要把它变成框框，到处套用。到底各个地方、各个大队有些什么情况，有些什么问题，这些问题又如何解决，都要领导运动的同志在放手发动群众的过程中，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工作，并且认真地同贫下中农商量和讨论，才能真正了解，并且找出比较最好的解决办法。这是不能偷懒的，没有什么捷径可走或其他取巧的办法的。桃园大队的经验，只是给我们指出了进行工作的一些方法和处理某些问题的方法，并不能使我们顺利地来解决各个地方、各个大队的问题。这是各地同志阅读这个文件时必须注意的。田家英带着刘少奇的信和“后十条”修正草案稿回到北京，送给毛泽东。当时毛泽东正在北戴河。刘少奇则按原定计划，到广西、云南、四川、陕西、山西五省区，继续作关于社教问题和两种劳动制度、两种教育制度的报告。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毛泽东在北戴河同正在这里参加华北学习会的李雪峰、乌兰夫、陶鲁笏、刘仁、刘子厚等人谈话，向他们征求对刘少奇十六日来信的意见。

李雪峰说，大家认为那样做牵涉太大。

陶鲁笏说：现在我们在全省范围内，已经铺开了将近四千个点，如果今冬一个地委集中搞一个县，已经铺开的点，大部分都要把工作队从半路上撤回来，这样做贫下中农很不满意。

他们是不赞成刘少奇的意见，但讲得比较婉转。

毛泽东说：少奇同志的信，我已经批了，中央讨论后发了，你们不赞成，怎么办？

李雪峰提出，是否到十月工作会议再议？毛泽东当场打电话告诉邓小平：文件缓发，立即派飞机把大区书记找到北京开会，重议刘少奇同志的意见，华北有不同意见。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日当天，毛泽东回到北京。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将刘少奇十九日报送的“桃园经验”和中央批语稿，交邓小平，并告诉他可以等大区书记会议以后再处理。

由于华北几个负责人对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建议有不同意见，毛泽东便打电话给刘少奇，请他回北京主持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当时刘少奇正在昆明，随即中断行程，八月二十六日返回北京。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又改变了主意，作出批示：“此件先印发此次到会各同志讨论一下，如果大家同意，再发到全国去。我是同意陈伯达和刘少奇同志意见的。”“请小平办。”同时，指示邓小平将“后十条”修正草案印发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请他们研究，并提意见，再加修改”。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至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召开。邓小平宣布这次会议的目的，是解决“四清”部署问题。他说，对社教运动的部署，少奇同志有个意见，主席为了慎重起见，找大家商量一下。为什么现在开会，不等十月中央工作会议呢？因为现在时间比较紧了，社教十一月就要开始了。另外，修改了第二个十条，主席批了个意见，可以议一下，定下来用，以后需要改时再改。

刘少奇在会上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意见。陶铸、王任重、李井泉、柯庆施都支持刘少奇的意见。李雪峰作了检讨性的发言。

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出席了会议。

他说：有分歧，不一致，怎么办？不是什么路线之争，不是彻底革命和改良主义的问题，不是搞资本主义和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是个部署问题，是个办法问题。

他说：我同意少奇同志的意见，发了电报，没有先征求他们（华北）的意见，这是个缺点。雪峰说，粮食、棉花、经济作物主要在落后地区，怎样做法好？派一万多人的工作队下去，倾盆大雨，是不是径流太大？王光美在河北桃园大队实际上是少奇同志亲自指挥，王光美每月汇报一次，河北省就没有一个人能指挥。

毛泽东话中有话，实际上对派一万多人工作队下去等做法，是有意见的。

一九六四年九月一日，中央局第一书记会议结束。会议同意刘少奇关于社教运动部署的意见；同意将“桃园经验”的报告作为中央文件向全党下发，并通过了刘少奇起草的转发批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刘少奇代中央起草了《批转李雪峰同志给刘少奇同志的信》的批示，同意李雪峰提出的反对右倾的意见，强调要及时提出反对“怕左不怕右，宁左勿右”的问题。提出对已烂掉的地委、县委、区委、公社、大队和厂矿企业及其他机构，应进行夺权斗争，迅速加以解决。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又转发天津市委《关于小站地区夺权斗争的报告》。为转发这个报告，他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夺权斗争问题的指示》。在这个指示中，根据小站地区的经验，提出：“当前我们国内的敌我矛盾有一部分在形式上是以人民内部矛盾出现的，甚至是以党内矛盾出现的。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同党内矛盾交织在一起。”刘少奇的这个观点，后来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工作团的领导权限的规定(草案)》，提出：“今后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多数地方已经决定组织强大的工作团，按照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原则进行。”“中央认为，有必要加重工作团的责任，把所在县的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交由工作团领导。”从此，农村社教运动出现了一种新的组织形式，由从中央单位来的和省、地、县数千干部组成的强大工作团，集中在一个县里，用打歼灭战的方式组织运动，并包揽了这个县的各级组织领导权。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明显地出现了“左”的倾向。

六、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制订“二十三条”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央政治局利用各地主要负责人集中在北京参加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机会，举行中央工作会议，集中讨论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的一些问题。

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农村社教运动问题上的分歧，一步一步地公开化。毛泽东对刘少奇在社教运动中的一些做法的不满，已经积累一些时间了。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会议。刘少奇就各地社教运动中反映的一些问题，提请会议讨论。

刘少奇说：“陶铸同志有一封信给我，提出了一个农村新兴的富裕阶层、特

贫阶层的问题。还有些地方提新资产阶级分子。农村里面用不用新资产阶级分子这个名字？还是就叫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

毛泽东说：“恐怕农民他不懂得什么叫资本主义。你讲投机倒把，讲贪污盗窃，他懂得。”

刘少奇又说：“看来，工作队的骨干力量不够分配，领导不很强。是不是战线过长了？是不是需要缩短一些战线？如何缩短？”

毛泽东淡淡地说了一句：“缩短容易嘛，你一缩就行了。”

刘少奇说：“有些地方提出，机关家属里面很多恶霸、地主、富农、四类分子。这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

毛泽东说：“也没有那么多。全国人口几亿，那些人总之是什么几百万、千把万嘛，又是散在各地。清是要清，多是不多，有是有。”

刘少奇还提出对“四清”中农民自己报出来的隐瞒的土地，要不要增加征购的问题。

毛泽东说：“不能征购。要到五年之后，在增产的条件下，酌量增加一点。（周恩来插话：“整个社教时期都不要征。”）粮食存在老百姓家里好呀。”

随后，刘少奇提出其他一些问题要大家讨论，并且说：就是这些问题，我也提不出什么。其余的都是你们提，或者今天也就可以提一点。

毛泽东说：今天不要提了，回去讨论。有话就在这里讲嘛。就在这里冲口而出，畅所欲言。

会议没有就陶铸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六日到十九日，每天上午小组讨论，下午全体会议。全体会议由毛泽东主持，陶铸、李井泉、宋任穷、刘澜涛、李雪峰、魏文伯、谭震林先后发言。这些发言都突出地反映阶级斗争形势严峻。

刘澜涛说：这次社教，中心问题是夺取领导权的问题。西北地区三百二十八个县市委和城市的区委，其中烂掉的、基本烂掉的、有严重问题的，共一百四十九个，占总数的百分之四十五点六。有一个县的党委书记、县长，在国民党里头当过连长。

毛泽东插话：“共产党里头有国民党。”

李雪峰说：情况愈摸愈严重。山西八个重点县的县委，已烂掉三个，常委七

十二人中有问题的三十八人。

这几天，毛泽东批示印发会议的刘少奇送给他的几个报告，反映的问题也十分严重。例如，江华的报告里说，他进村后，感受最深的是新的剥削、新的压迫的情况“确是普遍而严重的，很多基层单位已经被坏人篡夺了领导权”。就他所在的那个公社来说，被敌人篡夺了领导权的基层单位，不止三分之一。山西省委重点县社教总指挥部一个会议纪要指出，要继续贯彻反右倾的精神，目前主要危险之一，仍然是对敌情估计不足。又说，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和广大贫下中农之间的矛盾是当前农村阶级斗争的主要矛盾。

十二月十九日，会议只开了几天，毛泽东没有正式讲话，刘少奇、邓小平就宣布会议结束了。

会后，江青请陶铸、曾志夫妇在人民大会堂看《红灯记》。毛泽东问陶铸：你们的会开完了吗？我还没有参加就散去啦？有人就是往我的头上拉屎！我虽退到二线，还是可以讲讲话的么！你们开会的人是不是都已经走了？告诉他们走了的赶快回来！

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各省书记们，又都被召回来，继续开会。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继续讨论社教问题。在这次会上，毛泽东同刘少奇发生了当面的意见冲突。

毛泽东先到会场，同已到的一些人谈笑风生，气氛没有什么异常。刘少奇来了。毛泽东要他主持会议，刘少奇执意不肯。毛泽东便要他先讲话。

刘少奇从蹲点问题讲起，谈到最近看到的几个材料。他说：“农村方面有一个问题，是陶铸同志提出的，说农村当前的主要矛盾是富裕农民阶层跟广大群众、贫下中农的矛盾。几个同志也这样讲，说农村里面已经形成富裕阶层了，已经形成特权阶层了。是这样提呢？还是原来提的地富反坏跟蜕化变质的有严重错误的坏干部结合起来跟群众的矛盾？”

毛泽东说：“地富反坏是后台老板，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他显然不赞成前一种提法，注意点已放到“当权派”上面了。

毛泽东说：“农村的中心问题是这一批干部，主要是大队和生产队的干部，骑在农民头上，农民不好混，穷得要死。”“地主富农那些人已经搞臭过一次了。

不是反封建吗?不是民主革命吗?不是分土地吗?至于这些当权派，从来没有搞臭过。他又是共产党，上面又听他的。他又给定工分，他又是共产党员。

显然是，毛泽东是主张运动的重点要整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接着说：“对当权派，这是头一仗。但他们后头有地富反坏。”他说：有三种人：漏划的地主、新生的资产阶级、烂牛了的干部。有的干部出身好，犯有四不清错误，同地富反坏勾结在一起。有的地富反坏操纵；也有漏划地富当了权的。

显然，他的主张是有什么矛盾就解决什么矛盾。

毛泽东说：“漏划地富变成中农，变成贫农，有的当了共产党，因为他漏划了。那也是一种当权派。”

他说：不管什么阶级、阶层，只管这些当权派，共产党当权派。发动群众就是整我们这个党。中心是整党。不然无法，不整党就没有希望。

他说：无非是左、中、右。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有打有拉，这套策略，我看现在还用得着，现在这个党内就是国共合作嘛！也有统一战线。还有少数烂掉了，省委也有烂掉了的，你安徽不是烂掉了！你青海不是烂掉了！贵州不是烂掉了！云南还是个别的，不够。河南吴芝圃“左”得狠嘛！

刘少奇又重复开头提出的问题：“这个主要矛盾怎么讲法?广东是老早提出这个问题来了，我也看到了，我没有转发。这个问题恐怕要讨论一下，看这个语言怎么讲法?”

毛泽东好像没有理会，继续说他的：“他在那里记工分，搞会计，五大领袖嘛，五大领袖难道不是当权的?”

刘少奇还是讲陶铸提出的那个问题：“陶铸同志那个文件开始提出就有人不赞成，中央机关也有人不赞成，我听到了这个反映。”

毛泽东则照样讲他的：“不要管下层，只管‘五大领袖’，这是共产党，是当权的人，不当权也是跟着跑的人。管你是挂名的共产党也算，过去是国民党的也算，过去是真共产党变了的也算，总而言之你是掌大权。就是要发动群众来整我们这个党，整那个支部，那个公社党委。”“中心问题是整党，不整党没有希望。”毛泽东又说：“不要提阶层，那个东西一提就吓倒人了。只提党、党委。省委也是党委，地委也是党委，县委也是党委，区委也是党委，公社党委也是党

委，支部委员会也是个党委。”

刘少奇立即表示同意：“不提阶层，不提富裕农民阶层，特权阶层。就是有这么一些在农村里面掌权的人，反群众，剥削群众，压迫群众。”

这时，刘少奇再次把话题拉到主要矛盾问题上：“主要矛盾就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行不行？”

陶铸立即表示：“赞成。”

毛泽东说了一句：“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

这句看来答非所问的话，实际上是表示不赞成。

大家就这个问题继续讨论着。

毛泽东却接过刘澜涛关于农村坏干部情况分析的话，说：“这是对当权派的分析。”“杜甫有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挽弓当挽强，用箭当用长。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四句通俗明了，就是搞那个大的，大的倒了，那些狐狸慢慢清嘛，群众知道嘛。群众就怕搞不了大的。我们对冶金部也是擒贼先擒王，擒王鹤寿嘛！把他擒下马来，然后加以改造，其办法就是让他去蹲点。

他又重复地说：“一个省委，一个地委，一个县委，一个公社党委，一个支部委员会，抓住这个东西就有办法。”

毛泽东始终盯住“当权派”这个问题，而不谈主要矛盾问题。

刘少奇说：恐怕不能太绝对了。现在是党内外矛盾、敌我矛盾、四清四不清的矛盾，各种矛盾交叉。

毛泽东说：首先抓敌我矛盾性质的问题，重点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刘少奇坚持说：还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不是到处都有敌我矛盾。煤炭部、冶金部，哪个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说：张霖之就是。

但是，刘少奇却急于想把主要矛盾问题明确下来，以肯定的口气说：“四清与四不清，这是主要的，当然还有其他的。”

李葆华问了一句：“矛盾的性质是什么？”

刘少奇答：“就是人民内部矛盾跟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

毛泽东当即反问道：“什么性质？反社会主义就行了，还有什么性质？”

刘少奇：“总不是社会主义。”

毛泽东：“是资本主义性质。还加个封建主义、帝国主义？搞个资本主义就差不多了。我们搞了民主革命，就是为社会主义开辟了道路。”

随后，刘少奇又解释了一句，说：“政治、经济、思想、组织四不清，有人民内部矛盾，有敌我矛盾，问题的复杂性就在这里。”

接下去，大家分析这部分掌权人的情况以及对他们采取不同的处理办法。

毛泽东提出：“搞的结果，户数不超过百分之七、八，人数不超过百分之十。”这是比照土地改革时划地主富农成分的比例数字，目的是想控制一下，以免打击面过宽。

他说：“我提出这个问题有点右。我就是怕搞得太多了，搞出那么多地主、富农、国民党、反革命、和平演变的，划成百分之十几、二十，如果百分之二十，七亿人口就是一亿四，那恐怕会要发生一个‘左’的潮流。农民起来，红了眼睛，影响到你们，你们走群众路线嘛，就站到群众那方面，结果树敌太多，最后不利于人民。”

他还说：“把那些贪污几十块钱、一百块钱、一百几十块钱的大多数四不清干部先解放，我们的群众就多了。把贪污一百块钱到一百五十块钱的解放出来，就解放了百分之八十。”

这时，邓小平也插话说：“这次运动的打击面还是百分之几比较有利。在运动开始的时候，就要分化四不清干部，在斗争中分化他们，争取他们，教育他们，改造他们，最后的打击面是百分之几。”

毛泽东又转到另一个问题，他说：“过去那个‘四清’，清财务、清仓库、清工分、清账目，那只是经济，变成‘一清’了。”“我赞成眉毛胡子一把抓，把过去那个‘四清’的概念改变，现在就是包含一个思想，一个组织，一个政治，一个经济。”

包括毛泽东在内，大家对四不清干部都主张打击面不要太宽，在经济处理上也不要搞得太挖苦，要合情合理。但毛泽东很快又想到，这样会不会对群众运动泼冷水？他怕泼冷水。所以他又嘱咐：“现在不要把这个气候传下去，现在还是反右。至少还要搞到明年什么时候，一月、二月、三月、四月、五月，再搞五个月。你们掌握气候。一不可搞得打击面太宽了；二不可泼冷水，撑那个四不清干

部的腰。”

接下来，双方没有再发生争执。然而，事情并没有完。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七十一岁生日。当晚，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老北京厅请了一些人吃饭。名单是毛泽东亲自定的。

毛泽东一到场，就宣布说：“今天不是请客，更不是祝寿，我拿自己的稿费请大家吃顿饭，也算是实行‘四同’吧！”

他接着说：“不能光吃饭，还要讲讲话呀！有些人一摸到一点东西就翘尾巴，这不好。摸到一点不要翘，摸到两点三点也不要翘。”“现在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刚开始，有人翘了尾巴怎么样呢？我没有蹲点，没有发言权也要说，错了，大家批评。帝国主义、修正主义说我是教条主义，就算教条主义吧。教条主义什么时候变？一万年也变不了。我们写文章打仗，不会死人的。”今天我没有叫我的子女们来，因为他们对革命没有做什么工作。

随后就陆续批评社教运动中的一些错误认识和提法：说什么四清四不清，党内外矛盾交叉？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指出中央有的机关搞‘独立王国’；还谈到党内产生修正主义的危险。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主持全体会议，朱德、陈伯达、董必武、陆定一发言。

（当陈伯达说到，国民党也说有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时，）毛泽东说，我们这个党至少有两派，一个社会主义派，一个资本主义派。

（董必武发言说，文件规定县以上干部定期调换好。）毛泽东说，现在十五年了，成了独立王国，北京，我说的不是北京市委，就有两个独立王国，你们去猜，我不讲了。

陆定一主要讲文化革命问题。他说，文化部全部烂掉了，整个单位是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并点了部长和几位副部长的名字。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央工作会议继续在人民大会堂河北厅开全体会议。毛泽东主持，罗瑞卿、陈毅、谢富治发言。在大会发言后，毛泽东讲话，主要就“十七条”中的第一条和第十六条发表意见。

文件的第一条“运动性质”，其中这样表述：“几种提法：1. 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2. 党内外矛盾的交叉，或者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3. 社

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是这次会议上毛刘争论的焦点。

毛泽东说：“这么规定可不可以？有三种提法，是前两种提法较好，还是第三种提法较好？我们常委会谈过，也跟几位地方的同志谈过，恐怕还是以第三种提法较好。因为我们这个运动，它的名称就叫做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不是叫做什么四清四不清教育运动，不是什么党内外矛盾交叉或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的教育运动。”“我们常委会觉得，大区同志也觉得，似乎你们也讨论一下吧，小组也觉得，就是说，大家都觉得，第三条这样的提法比较妥当，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的矛盾，概括了问题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第十六条“工作态度”，文件规定：“好话，坏话，正确的舌，错误的话，都要听。特别是那些反对的话，要耐心听，要让人把自己的话讲完。”

毛泽东说：“就是要讲点民主。天天是讲民主，天天不讲民主。有那么一些同志，叫别人讲民主，自己就不讲民主。”“好话要听，这不成问题，好话是爱听的，问题就是坏话。”“正确的话同错误的话，两者都要听。讲得正确，当然要听。讲错了呢？你也得听下去。他批评你批评错了，有什么问题呢？自己本身是正确的，人家批评错了，那就没有问题，责任在那个批评者嘛。那你也不爱听？批评正确的要爱听。自己正确，人家批评的错了的，那更好听嘛。”

他还说：“在同志中间，不要使人怕。在敌人面前，要使他怕。你在同志中间那么凶，使人怕，那不行。我说，有鬼，不然为什么怕你呀？凡使人怕的，他大概是道理比较少一点。”

接着，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对“十七条”提了一些具体修改意见。

看大家没有什么意见了，毛泽东又讲了一番话，使刚才还比较轻松的气氛立刻紧张起来。

他说：“我是没有话了。如果要还讲几句，就是请你们回去找党章看一下，宪法第三章也看一下，那是讲民主自由的。有一本书，叫《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第一百页到一百零四页，你们去看一看。不要犯法呀，自己通过的，又不遵守。又有一本书，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章的第一条，这个条文叫第八十五条，中间讲到，‘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然后第八十七条讲

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比如我们这些人算不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如果算的话，那么有没有言论自由？准不准许我们和你们讲几句话？有没有出版自由？现在文化部它就只许那些人有出版自由。这个出版机关，我看得整顿一下，许多抓在坏人手里。集会自由，譬如我们现在这个河北厅不是在这里集会吗？这叫集会吧？不算呀？（周恩来答：算集会。）还有结社。现在我们要结社，就是要把那些四不清太严重的人弄出去，要结一个共产党。要把支部整顿好，把基层党委整顿好，把各级党委也整顿好。这叫结社。游行、示威，早几天我们不是在天安门搞过游行示威吗？那是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刚果。我是历来赞成对于我们官僚主义者举行示威的。”最后他问大家：“同志们有话没有？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要耽误你们的时间，我又变成个官僚主义。”

这次主要是毛泽东讲话，刘少奇讲得很少。这同前几次会议刘少奇不断地大段讲话，形成鲜明对比。毛泽东的话，讲得很尖利，虽然没有点名，但与会者都明白他的锋芒所指。

十二月二十八日，“十七条”经过多次修改，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正式发出。按原定计划，中央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闭会了，与会的省委书记们也都陆续返回了。

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央办公厅通知各地，“十七条”停止下发，并自行销毁。中央工作会议又在一九六五年元旦以后继续召开。

一九六五年一月三日晚，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在指导“四清”运动中的一些做法。

他一开头就用批评的口吻说：“有同志提出打歼灭战，怎么打？集中了一万五千人，搞一个小县，二十八万人口，搞了几个月还搞不开。学习文件四十天，不进村。我看是搞了繁琐哲学。我不赞成这种学习，到农村去可以学嘛。”

他说：“我跟前的一个警卫员写信来说，学了四十天文件，根本没有学懂。下去两个礼拜之后，才弄清了一些问题。听说还有好多怕，怕扎错根子，怕住错人家，怕干部捣鬼。怕这个，怕那个，那怎么行？”

又说：“你一个新城县，二十八万人口，下去一万五千人，还说人少了。哪里来这么多的人？哪里要这么多的人？我看是人多了。你只依靠工作队，为什么不

依靠那个县的二十几万人?比如二十八个人中有一两个是坏的，还有二十六七个是好的嘛。为什么不依靠这些人?如果依靠好了，我看十几个人就行了。可能十几个人不行，但我们革命从来不是这么革的。你一万五千人扎根串连，什么扎根串连!冷冷清清。”“扎根串连，冷冷清清，这个空气太浓厚了。这样集中力量打歼灭战，我看歼灭不了敌人。现在这个搞法同我们过去搞的不一样。我看方法要改。”

他说：“一进村就宣布几条，开门见山。一条是对社员宣布，我们不是来整你们的，我们是整党、整干部队伍，不是整社员。”“对干部也要宣布来意。小队、大队、公社干部，无非是大、中、小、无，多吃多占，有多多的，有少的，有没有的。贪污几十、百把块，两百块的，你们自己讲出来，能退就退，不能退的，群众批准，拉倒!其他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大的怎么办?坦白退赔好的，不戴帽子，千把块的也可以赦免。表现好的，群众同意的，还可以当干部。”

接着，与会者一起议论。

毛泽东又继续讲了一些话，主要内容是：真正的领导人要在斗争中才能看出来。你在访贫问苦中看得出来?我不相信。要开大会搞斗争。地、县、社三级开大会搞斗争，而不是读文件。总之，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领导群众起来斗争，在斗争中群众会造出他们的领袖来。一是不要读文件，二是不要人多，三是不要那样扎根串连。一去就开会，有事就开，无事就散。开会不要太长，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要让群众去搞。不相信群众，只相信工作队，不好。四清，要给群众讲清楚，是清干部，清少数人，不清社员。有不清者清之，无不清者不清。没有虱子就不要硬找。要革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分子的命。要搞大的，小的要刀下留人。反革命分子也要整那些最坏最厉害的。

与会者都同意毛泽东的意见。

邓小平说：方法问题很重要，我赞成主席的意见。我们一些大干部，如中央局书记、省委书记蹲在一个小队、大队，太长了不一定有利。至少要着眼一个县，还有你的全省嘛，全局嘛。蹲点的经验并不一定全面。现在蹲下去了，是好的。现在要慢慢上来管广一些，这也是可以搞快一些的方法。陷到里面出不来，就不好了。

一月五日下午，再次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毛泽东继续不点名地批

评刘少奇。

他说：“我听说有六怕，一怕扎错根，二怕沾干部等，所有的怕，都是怕右倾来的。怕右倾成为一种框框。还是江苏那句话，有啥反啥，有多少反多少，有右反右，有‘左’反‘左’。现在的问题是工作队的人数很多，按兵不动，人海战术。”

他说：“现在，有些人好像马克思主义都是对别人的，对自己就一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了。完全否定一切，不是一片漆黑嘛！干部贪污几十元、百把元、几百元的还是多数嘛，千元以上的不多嘛。有百分之七八十是好的，是可以争取的。王光美去的那个大队，我数来数去，贪污上千元的只有四个人，没有第五个人嘛！”

会上有人提出运动的时间是不是要缩短一些，毛泽东说：“时间问题，全国六七年搞完不要改了，可以提早。这句话写上去是为了防止急躁。事实上，一个单位只有几个月就行了。你还是教育嘛。搞运动首先是依靠群众，再就是依靠放了包袱的大多数干部，第三才是依靠工作队。工作队也要依靠前两者。一个县二十八万人，总要依靠二十几万人才能搞起来。”

宋任穷讲到现在形势一年比一年好，毛泽东说：“在人代会上讲的一片光明，在工作会议上讲的一片黑暗，对不起头来嘛！”

陶铸谈到当前形势的新特点时，毛泽东说：“七届二中全会指出，国内主要矛盾是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矛盾。那个时候还没有修正主义。八大一次会议、二次会议都是这样说的，杭州会议制定十条，一直都是搞社会主义，整个运动是搞社会主义教育。怎么来了个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交叉？哪有那么多交叉？什么党内外交叉？这是一种形式，性质是反社会主义嘛！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一月六日，与会的省委书记陆续又来到北京。中央工作会议继续进行，主要是分组讨论，修改“十七条”。毛泽东的两次讲话在各小组进行了传达。

“十七条”修改工作加紧进行，由邓小平、彭真、陈伯达负责。

从九日起，分组讨论新的纪要稿。一边讨论，一边修改。

一月十一日，毛泽东将华东组八日讨论的意见批给刘少奇阅。华东组提出，第二个十条可以不要，只要修改、充实“十七条”就行了。此外还提了一些具体

修改意见，比如说要加上“不能否定蹲点，也不能否定过去调查研究的方法”。

一月十三日下午三时半，刘少奇召集了一个党内生活会。参加会议的有：周恩来、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罗瑞卿、陈伯达、李井泉、李雪峰、刘澜涛、宋任穷、谢富治、王任重、魏文伯、李葆华、谭启龙，共十七人（中央工作会议期间，朱德、贺龙等人曾找过刘少奇，希望他顾全大局，要谨慎，要尊重毛泽东）。会议结束后，刘少奇主动找毛泽东谈话，作了自我批评。

一月十四日，《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最后定稿。当天下午，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主持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最后一次会议，并讲了话。

他说：“文件定了，那就没事了嘛，会就可以散了。开了一个月，反复了一次。我放了一些炮，现在问题也解决了。党内搞社会主义没有经验，我也没有呀。现在这些经验（指“二十三条”）还不是大家创造的吗？很集中地反映到中央。”

他说：“现在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是从八届十中全会开始的。一九六三年五月搞了十条。为什么只隔了三个月，九月北京开会又搞出一个十条？只有三个月，有那么多经验？第二个十条条文繁了，有些内容，就是文件太长太繁。前冬去春经验比较多些。特别是少奇同志去年夏天那篇讲话，使得中央、各省都下去蹲点。我说根本上好，不然不去，就是不那么全面。”

他说：“这次又来总结经验，是因为前年下半年，去年一整年，特别是有一百一十万工作队下去，在战线上有几怕，怕群众，怕根子扎不好，怕右倾，怕犯错误。过去历来行之有效的开大会向群众讲明来意也不搞了，这次搞秘密工作了，就是不大张旗鼓了，就是有好多怕。一百一十万人搞那样多的怕，怎么得了。群众对我们有批评，很多批评嘛。看了这个文件比较好一些，但是还要实践证明。同时，我又怕少奇同志讲的话不灵了，又不去蹲点了。再就是不要搞大轰大嗡。现在这个规定要惹干部了。不要怕干部，都来。开会讲要点，不要那么繁琐。根子就在运动中看出来。这个文件里扎根串连没有了，因为这样扎，究竟何年扎出来，扎多少年也不成。”

他说：“归根到底，我们中央工作成绩多一点，错误少一些。……你这个文教，我说在延安放了一通空炮，讲了一篇空话，二十几年了，没有抓，你怪陆定一、沈雁冰？我没有抓，你们也有责任。总而言之，放了空炮。但你只要不触及

全面问题，只是解决个别问题，枝枝节节，修修补补不行。自从说文化部改为帝王将相部，要赶下乡去，说用一个团不行，用一个师把他们赶下去以来，灵了些。不用兵也可以，这是极而言之。真正动口，不必动手。对章罗联盟也没有使用兵力，何况对文化部呢？天天讲社会主义，搞成修正主义，这么多党教育了我们，苏联党教育了我们。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别人打倒，书也收了，像也收了。”

中央工作会议结束的当天，刘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二十三条”。随即发到全党，取代“后十条”成为指导“四清”运动的重要文件。

一九六五年一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对《陈正人同志蹲点报告》的批示

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决不能依靠他们，我们能依靠的，只是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

一九六五年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接见中南局第九次全体会议同志时的指示
搞四清，要把民兵搞好。

民兵，第一是组织，第二是政治，第三是军事。

贰、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把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阶级、矛盾的分析和论断进一步具体化，分析了当时中国社会中出现的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明确指出：在社会上，除了那些继续搞投机倒把的旧的资产阶级分子以外，还出现了新的资产阶级分子，靠投机、剥削大发其财；在机关中和集体经济中出现了一批贪污盗窃分子，投机倒把分子，蜕化变质分子。这些分子，是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一部分，或者是他们的同盟军。

这个决定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经验，得出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五个不可忘记”的结论：任何时候都不可忘记阶级斗争，不可忘记无产阶级专政，不可忘记

依靠贫农、下中农，不可忘记党的政策，不可忘记党的工作。

这个决定初步地系统地解决了在我国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开展阶级斗争，反修防修的路线、政策和方法。

对于这个决定，右派们当然是反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这里，对农村阶级斗争情况的估计，已经严重地脱离了现实。然而，毛泽东却认为已经获得了正确认识，他写下了一篇著名的哲学文章：《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这是一种讽刺，还是一种悲剧呢？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刘少奇在全国推广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大搞形“左”实右的一套做法。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公开化。毛泽东批评了刘少奇从指导思想到具体部署的错误。会议首先制定了一个“十七条”，毛泽东仍不满意，又继续开会讨论，制定了“二十三条”。

从“十七条”到“二十三条”，是一个很大的变化。转变点是一九六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就是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办通知各地停发“十七条”那一天。可以看出，毛泽东对“十七条”还不满意，觉得还没有解决问题，他还有许多话要说。对于毛泽东来说，“十七条”是带有一定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而“二十三条”则充分肯定和反映了毛泽东的意见，否定了刘少奇的一些重要意见，实际上是对“四清”运动以来毛刘争论的一个结论。从两个文件的比较中，可以看得很清楚。

“二十三条”加了“形势”问题，列为第一条。强调八届十中全会以来，各条战线都出现了大好形势。证明党的社会主义总路线是正确的。我国城乡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

关于“运动性质”，“十七条”列了三种提法，只说“后一种提法较适当，概括了问题的性质”，对前两种提法并未批评。“二十三条”则以相当篇幅批评前两种提法，说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重申了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主要矛盾的论断。

关于运动的重点，二十三条明确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关于“工作方法”。“十七条”中第三条的第一点，就讲“集中力量，打歼

灭战”；第二点讲扎根串连，说“在贫下中农那里，扎根串连，发动群众，组织阶级队伍，这是主要的。从头到尾，都要这样做”。在“二十三条”里，“扎根串连”没有了。相反，强调的是：工作队必须依靠群众大多数，依靠干部大多数（包括放了包袱的干部），实行群众、干部、工作队“三结合”；在运动中不要冷冷清清，不要神秘化，不要只在少数人当中活动；工作中有什么偏向，就纠正什么偏向。

关于“集中力量，打歼灭战”，在“二十三条”里单列为一条，却赋予了新的意思，强调“领导运动，要有全局的观点和全局的部署”；要“适当”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突破一点，推动全局；不是靠人海战术，不要在一个县、社、队，集中人数过多的工作队。

关于“蹲点”。这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特地写了两段关于调查研究和调查会的话，指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毛泽东同志的这一教导，是我们在工作中必须遵守的。”“过去我们党采用的开调查会等行之有效的调查研究方法，应当继续采用。”还讲到从中央局到县各级党组织的领导人，除了在一个点上蹲下来以外，还要对其他点的工作和全大区、全省、全专区、全县的面上的生产等工作，进行调查研究和指导。

关于“干部问题”。这也是“二十三条”新增的一条。引用了毛泽东关于对犯错误的人实行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以及对于犯了错误还可以教育的人，不论其出身如何，都要加以教育而不是抛弃他们的指示。还说到，对于犯轻微“四不清”错误的，或者问题虽多但交待好的，要尽可能早一点解放出来；问题不严重，检讨又较好，经群众同意，经济退赔可以减、缓、免。

“二十三条”还保留并着重强调了“十七条”中一些积极的内容，例如：不论在运动中或运动后，都不许用任何借口，去反社员群众；“四清”要落在建设上面，要使生产、建设、科学、文化、教育、卫生、公安、民兵工作，都有所前进；在运动中始终要抓生产，同时要注意抓当年分配（生活问题），如果不抓生产和分配问题，势必脱离群众，势必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损害，等等。

此外，“二十三条”还沿用了“十七条”关于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今后一律称“四清”运动的规定。

从以上对比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刘少奇在四清问题上的分歧，集中表现在四

个问题上；第一，运动的性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还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或党内外矛盾的交叉？第二，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还整地富反坏分子？第三，对干部问题的估计是大多数是好的？还是一团漆黑？第四，运动的作法是依靠贫下中农、分期分批进行？还依靠工作队、打歼灭战？其中最重要的是第一和第二两个问题。

二十三条在理论上的突出贡献是：在坚持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前十条中关于社会主义阶段阶级斗争的长期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观点。这是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又一个重要发展。

“二十三条”的贯彻实行，使前一段运动中打击面过宽的偏差得到一定的纠正，广大基层干部和整个农村的局势也比较稳定了。

召开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是要纠正社教运动中出现的一些“左”的偏向。

历时三年的“四清”运动，对于纠正干部中多吃多占、强迫命令、欺压群众等作风和集体经济管理中的许多缺点，起了一定的作用；对于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和刹住封建迷信活动等歪风，也起了一定的作用。这次运动，还只是在部分地区开展，而且是经过试点，分期分批地进行，从一开始就尽量避免影响生产的正常进行，并且纠正过运动中的一些偏差。因而全国工农业生产还没有受到大的影响，而且有所增长。

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除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争论之外，党的领导层的认识似乎是一致的。其实这是一种假象。一九八〇年以后，这些人的立场就充分暴露出来了。在他们的这种思想指导下，一些相关著作，对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采取了基本否定的立场。

胡绳的《七十年》中说：毛泽东在杭州主持制定的《关于目前农村工作中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对国内政治形势作了过分严重的估计，认为当前中国中出现了严重尖锐的阶级斗争情况，四清、五反是打击和粉碎资本主义势力猖狂进攻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后十条“明确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二十三条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

派’ ”。“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是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混淆了两类矛盾，使不少干部和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搞活农村经济、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农民生活的一些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执行。”（第 394-396 页）

薄一波的《回顾》与胡绳的《七十年》有所不同的是，它首先肯定了“毛主席发动这场运动，目的是为了防止发生修正主义和和平演变，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为了整顿干部作风解决干部与群众之间的矛盾，把党、干部队伍和社会主义建设搞得更好。这些，是符合广大干部群众愿望的。关于开展运动的方式方法，在原则规定上也大都是正确的。”（下册第 1110 页）然后话锋一转：“但是，这场运动是在八届十中全会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左的思想理论指导下开展的，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难于达到运动的预期的目的。”（下册第 1110 页）

“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少奇同志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主席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这个阶级‘已经变成或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下册第 1128 页）

“不容否认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 1964 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了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下册第 1135-1136 页）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提出了一些独特的看法。它认为：

“官僚主义本是一些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高度集权的体制和运动式的发展模式，偏偏助长了官僚主义的发展”（下册第 1011 页）。

“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下册第 1026 页）

“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合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情心。”（下册第 1089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也说：

“毛泽东在指导中苏论战的同时，又指导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两件事互相影响，互相推动，使毛泽东的思想一步一步地向“左”的方向发展，并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舆论准备。在探索中，总会有不同的意见发生。随着运动的深入进行，对于这场运动的性质、基层干部状况的估计，以及工作步骤和方法等问题，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的加深，成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直接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转发浙江省委办公厅印发的《一批干部参加劳动的材料》的批语，“这个批语中不乏精辟论述，但就总体而言，是建立在对阶级斗争形势的过分估计上，因而对于干部思想，及对实际工作的指导，都产生了“左”的影响。”

“毛泽东最担心的是在农村社教运动中出乱子，搞过了头。尽管对此三令五申，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思想指导下，乱子还是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在试点过程中普遍发生了混淆两类矛盾、打击面过宽的问题。”

“同时他又提出“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一指导思想。他的锋芒也越来越指向党内各级领导人特别是高层的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进一步发展，为后来“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

“由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许多不同性质的问题都被认为是阶级斗争或者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甚至混淆了两类矛盾，在一段时间内，不少干部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一些有利于搞活经济的正确政策和措施，往往被指责为“资本

主义倾向”、“资本主义尾巴”，而不能很好地执行甚至被否定。”

综合以上的议论，可以看出，他们加在毛泽东领导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的罪名，主要有以下几条：

1，对于当时的阶级斗争形势看得过于严重了，甚至把党变修、国变色、全国孪生反革命复辟看成已是面临的现实危险，这就严重脱离了当时的党内实际和社会实际；

2，提出运动要‘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这是一个‘左’倾的方针

3，片面强调这次运动的性质是解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矛盾

4，提出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就把斗争的矛头集中指向党的各级领导人，从而使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左’倾思想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人为地任意地有系统地制造所谓阶级斗争的阶段

5，在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声浪下开展大规模群众运动，势必走偏方向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扩大打击面；

6，这场运动的确犯了“左”的错误。这个错误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严重扩大了打击面，特别在 1964 年下半年，使许多基层干部和一部分群众受到不应有的打击和错误的处理影响了他们的积极性，甚至留下了一些后遗症……二是在一些问题上颠倒是非，把本来正确的或基本正确的东西当作错误加以批判；

7，毛泽东和刘少奇之间出现分歧，二十三条的一些规定部分地纠正了 1964 年下半年在刘少奇主持“四清”工作影响下各地运动中产生的一些过左作法；但关于主要矛盾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认为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或人民内部矛盾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而毛泽东则把问题的性质看得严重得多，认为已经形成了一个“官僚主义者阶级”。

8，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理论，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种错误理论：官僚主义本许多社会的一种通病，它只有通过民主和法制的不断健全才可能遏制。然而，按照传统社会主义观念，官僚主义只能是资产阶级社会肌体上的寄生虫，社会主义社会一旦出现官僚主义，那就是蜕化变质，就是阶级斗争；任何运动一旦纳入阶级斗争的轨道，就具有了敌对斗争的性质，难免发生过火行为；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就像一根魔杖，它使人们失去理智、失去判断力，甚至失去同

情心。

1999年7月13日，邓力群在《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五)》的讲话中，也谈到了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问题，经过反复研究，他认为：

关于前十条，“总的精神就是在全国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是个好文件，跟八届十中全会公报的会议精神是完全一致的。”

关于对形势的看法，“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他对中央内部少数人讲，我们的政权有三分之一不在我们手里，是在敌人手里，是在地主、富农手里。事实证明，这个看法过头了。相当一段时间里他坚持这种看法，到“文化大革命”时，他还讲，三分之一没有掌握在马克思主义手里。”（前一种看法是过头了，后一种说法恐怕不是过头了，而是过高了。这几十年的实践证明：当时，我们的政权、党的领导权，难道有三分之二是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吗？中国党当时有那么多的马克思主义者吗？）

关于主要矛盾和运动的性质，“刘少奇讲了“四清”运动的性质问题，应该讲这是不对的，本来前十条讲的很清楚，农村也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有具体情况、方针、政策、措施，其中一个措施是清理账目、清理工分。提出实现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的一些具体措施这样一个问题。少奇同志没有认真研究，前十条是怎么样提出问题的。把“四清”的问题突出起来，说这次“四清”的性质是“四清”与“四不清”，是党内外矛盾交叉，是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交叉。”

关于毛泽东对刘少奇的批评和二十三条，23条“在文字、语言、提法上没点名，实际上是批判了刘少奇同志那些提法，那些做法。批评少奇同志的缺点错误，不能说过分。23条所确定问题的性质，维持了前10条的提法，也是维持了十中全会的提法。23条讲，这个提法就是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以来的提法。在这个问题上，1964年12月和1965年1月的工作会议期间，少奇同志的意见是站不住的。毛主席反对他的意见是合乎党的规定的，这样批刘少奇同志不能说不。现在看，23条的文件和前10条的文件可以互相衔接，也应该说23条合乎实际、合乎理论，是站得住的。”

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学说，“我们要理解马、恩、列、斯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斗争的学说，理解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

斗争，不能局限于一个国家之内，局限于我们国内。国内的阶级斗争，只是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存在两条道路斗争、两个阶级斗争的一个部分，在世界范围内，同帝国主义国家、资产阶级的斗争同样是过渡时期阶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

邓力群的讲话不仅回答了那些理论家们提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于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国内阶级斗争与国际阶级斗争是不能分割的。这就是毛泽东与刘少奇等人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的根本分歧所在，也就是现在左派与右派的根本分歧所在。

2011 年 6 月 5 日修改

第三节 围绕文化艺术、社会科学中的右倾展开的两条路线斗争

壹、本节概述

一、一九六一年以来意识形态领域中的资本主义复辟活动

一九六一年以后，刘少奇、周扬等人实行“放宽”文艺政策，传统剧目的上演大量增多，其中有许多未加整理、格调低下、解放后一直禁演的剧目。

一九六一年夏，昆曲《李慧娘》在北京上演，后到各省巡回演出。

一九六一年八月三十一日，北京日报发表廖沫沙的评论《李慧娘》的文章《有鬼无害论》。

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江青看了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立即发现有严重的政治问题，向毛泽东报告，提出要批判。

一九六二年八、九月，江青约见文化部长齐燕铭，指出：舞台上牛鬼蛇神甚多，文化部要注意。齐燕铭不以为然。

江青又向陆定一、周扬、齐燕铭、林默涵等人提出：舞台上银幕上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牛鬼蛇神泛滥成灾。《李慧娘》有政治问题，有鬼魂形象，要批判。

这些人仍然无动于衷，置之不理。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同华东的省、市委书记谈话中对戏剧提出批评：

“对修正主义有办法没有？要有一些人专门研究。宣传部门应多读点书，也包括看戏。有害的戏少，好戏也少，两头小中间大。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多起来，有点西风压倒东风。东风要占优势。梁山伯不出粮食，采茶灯不采茶，旧剧团多了些，北京的京剧团就不少。过去的文工团只有几个人，反映现代生活，不错。《杨门女将》、《罢宴》还是好的，搞清一色也不行。要去分析，不分析就说服不了他们。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二日，柯庆施提出“大写十三年”的口号。

一九六三年二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华东代表发言强调：电影、戏曲中现代的、革命的题材太少了，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妖魔鬼怪的题材太多了，外国的、香港的也不少，已经有喧宾夺主、泛滥成灾的味道。应该有解决的措施。

一九六三年四月，张春桥在中宣部召开的文艺工作会议上，讲了写十三年有十大好处。

但周扬等人说，写十三年这个口号有片面性。

一九六三年三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批转十六日中共文化部党组向中宣部及中共中央写的《关于停演鬼戏的请示报告》。报告说：有鬼魂形象的戏演出渐增，更为严重的是新编的剧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评论界又大加赞美，并且提出‘有鬼无害论’，来为演出辩护。

一九六三年五月六日，由江青提议、柯庆施组织人写的批判“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

一九六三年五月八日，毛泽东说：有鬼无害论是农村、城市阶级斗争的反映。

一九六三年六月，关锋就在北京展览馆以“在历史研究中运用阶级观点和历史主义的问题”为题发表讲演，开始批判翦伯赞的“历史主义”。

多年以来，翦伯赞提出并宣传一种封建社会历史发展的公式：农民战争——统治阶级的让步——推动了历史的发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北京工作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在讲到国内问题时说：我们现在搞农村十条，城市“五反”，实际上是在国内反对修正主义，打下基础。这中间，要包括意识形态方面，除了文学之外，还有艺术，比如歌舞、戏剧、电影等等，都应该抓一下。现在各省都在抓，多数地方都注意了，也有一些地方还没有大注意。要推陈出新。过去唱戏，净是老的，帝王将相，家院丫头，保镖的人，黄天霸之类，那个东西不行。推陈出什么东西呢？陈就是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东西推出去，出社会主义的东西，就是要提倡新的形式。旧形式要搞新内容，形式也得有些改变。总而言之，老是帝王将相，刘、关、张，净是那一套，我看不成功。现在经济形式已经改变了，是社会主义经济了；上层建筑应该适应这个经济形式，上层建筑的形式也应该有所改变，内容也应该有所改变。

二、毛泽东关于文艺工作的两个批示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对《戏剧报》和文化部两次提出批评。他说：

“（一个时期以来，《戏剧报》尽宣传牛鬼蛇神。）文化部不管文化，封建的、帝王将相的、才子佳人的东西很多，文化部不管。如果不改变，文化部就要

改名字，改为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或者外国死人部。”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毛泽东修改周扬《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稿子，其中指出：

“作为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之一的哲学社会科学，在我国，同自然科学一道，是为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服务的，是为革命的政治斗争服务的。不为经济基础服务，不为当前的政治斗争服务，是不行的。”

“这种情况看起来好像有些奇怪，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反科学的修正主义道路上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面，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因为现在社会有阶级的分裂，一万年以后的社会也会有先进集团和落后集团的不同，总是要不断产生对立物的。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门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

“现代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都是政治上的崇美派。在他们的全部政策中所实际遵循的，也就是美国牌的实用主义哲学。历史的发展确实是这样，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后来出了伯恩斯坦、考茨基；搞俄国革命，列宁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也一分为二，出了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斯大林继承列宁的事业，出了一个反对派。任何学术领域的队伍在历史发展中，都必然一分为二，产生反对派，产生对立面。”

毛泽东同时提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要反对修正主义。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给林彪、荣臻等同志的信

国家工业各个部门现在有人提议从上至下（即从部到厂矿），都学解放军，都设政治部、政治处和政治指导员，实行四个第一和三八作风。我并建议从解放军调几批好的干部去工业部门那里去作政治工作（分几年完成，一年调一批人），如同石油部那样。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毛泽东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

“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

今还是‘死人’统治着。不能低估电影、新诗、民歌、美术、小说的成绩，但其中的问题也不少。至于戏剧等部门，问题就更大了。社会经济基础已经改变了，为这个基础服务的上层建筑之一的艺术部门，至今还是大问题。这需要从调查研究着手，认真地抓起来。”“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岂非咄咄怪事。”

一九六四年一月三日，刘少奇召集中宣部和文化艺术界三十多人举行谈会，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等人都在会上讲话。大家都同意毛泽东对文艺界问题的看法。从四月开始，全国文联及各协会进行整风。五月八日，中宣部文艺处写出《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三日在春节座谈会上，毛泽东讲教育要革命。

毛泽东指出，“现在课程多，害死人，使中小学生、大学生天天处于紧张状态”。课程可以砍掉一半。学生成天看书，并不好，可以参加一些生产劳动和必要的社会活动。”“旧教学制度摧残人材，摧残青年，我很不赞成”。课程讲的太多，是繁琐哲学。繁琐哲学总是要灭亡的。如经学，搞那么多注解，现在没有用了。我看这种方法，无论中国的也好，其他国家的也好，都要走向自己的反面，都要灭亡的。书不一定读得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要读，读了要消化。读多了，又不能消化，也可能走向反面，成为书呆子，成为教条主义者、修正主义者。”

一九六四年四月，杨献珍在给高级党校新疆班学员讲课时，进一步发挥了“合二而一”的观点，提出：“对立统一规律也可用‘合二而一’来表述。”

杨献珍宣传：任何事物都是合二而一的；对立面的不可分的联系；事物的不可分性；研究对立面的统一性的任务在于寻找共同要求、求同存异；合二而一是世界观，一分为二是方法论。

高级党校的哲学教师艾恒武等从杨献珍的讲课里受到启发，写了一篇《“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文章，送《光明日报》准备发表。康生得到了清样稿，便组织人写了批判文章《“合二而一”不是辩证法》。这两篇文章，在几天内先后刊登在《光明日报》上。康生还把这两篇文章同时送给毛泽东看。

一九六四年六月五日至七月三十一日，文化部在北京举行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

参加演出的有 19 个省市自治区，28 个剧团、2000 多人。演出了《芦荡火种》、《红灯记》、《奇袭白虎团》《节振国》、《红嫂》、《红色娘子军》、《草原英雄小姐妹》、《黛诺》、《六号门》、《智取威虎山》、《杜鹃山》、《洪湖赤卫队》、《红岩》、《革命自有后来人》、《朝阳沟》、《李双双》、等剧目 37 个。

这次会演是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举行的。这一批京剧现代戏是京剧界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进行京剧改革的成果汇报。当时周来亲自抓了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编导和排练。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毛泽东在有各中央局第一书记参加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说：“‘一分为二’是辩证法，‘合二而一’恐怕是修正主义、阶级调和吧！”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与部分演出人员开座谈会。江青在会上发表了《谈京剧革命》的演说：

她说：对京剧演革命现代戏这件事，要坚定，在共产党的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的舞台上占主要地位的不是工农兵，那是不能设想的事。在方向不清楚的时候，要好好辩明方向。

她说：全国的剧团有 3000 个，其中 90 个左右是职业话剧团，80 多个是文工团，其余 2800 多个是戏曲剧团。在戏曲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还有牛鬼蛇神。那 90 几个话剧团，也不一定都是表现工农兵的，也是“一大、二评、三古”，可以说话剧舞台上也被中外古人占据了。剧场本是教育人民的场所，如今舞台上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是封建主义的一套，是资产阶级的一套。这种情况不能保护我们的经济基础，而会对我们的经济基础起破坏作用。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对江青的这次讲话作出批示：讲得好。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中宣部的报告上又写了关于文艺工作的第二个批示：

“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泽东批评《人民日报》“提倡鬼戏”和“不抓理论工作”。

一九六四年下半年，开展了对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的批判。

一九六四年七月，《人民日报》实际上根据江青的意见，发表文章批判影片《北国江南》。

《电影艺术》第 4 期开辟专栏批判《早春二月》和《北国江南》；第 5、6 期合刊批判瞿白音的《创新独白》。

三、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初，毛泽东亲自召集小型会议，批评文化部、中宣部和周扬，提出要彻底整顿文化部。指定陆定一、彭真、周扬、康生、吴冷西等人组成领导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七日，中央书记处决定：根据毛泽东的提名，组成以彭真为组长的五人小组，负责贯彻中央和主席关于文学艺术和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批示。后来，这个小组称为文化革命小组。

一九六四年七月，毛泽东观看北京京剧一团演出的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的指示

要突出武装斗争，强调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正面打进去。加强军民关系的戏，加强正面人物的音乐形象。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卫生部党组关于高级干部保健工作报告的批示“保健局应当取消。”

“北京医院医生多，病人少，是一个老爷医院，应当开放。”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对《中央宣传部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北国之春〉、〈早春二月〉的请示报告》的批示

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别的都需要批判。使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约集康生、陈伯达、关锋、吴江、龚育之、邵铁真等谈哲学问题。当时，准备写一篇批判“合二而一论”的文章，题为“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搞了一些材料，还拟写了一个提纲送给毛泽东看。这次谈话中，毛泽东几次谈到“合二而一”的问题。

他说：“杨献珍提出‘合二而一’，说综合是两种东西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有什么不可分割的东西？有联系，总要分割的，没有不可分割的事物。”

最后，谈到当前关于“合二而一”问题的讨论，毛泽东表示：“《红旗》可以转载一些比较好的东西，写一篇报道。”

一九六四年八月，《红旗》杂志第十六期发表文章：《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关于杨献珍同志合二而一论的讨论报道》

报道指出：杨献珍在这个时候大肆宣传合二而一论，正是有意识地适应现代修正主义的需要，帮助现代修正主义者宣传阶级和平和阶级合作，宣传矛盾调和论。同时，也是有意识地适应资产阶级和封建残余势力的需要，给他们提供所谓的理论武器，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一九六四年八月，毛泽东同毛远新同志的第二次谈话

（接班人五条条件）这五条是互相联系的，第一条是理论，也是方向；第二条是目的，到底为谁服务，这是主要的，这一条学好了什么都好办；三、四、五条是方法问题。要团结多数人，要搞民主集中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要有自我批评，要谦虚谨慎，这不都是方法吗？

主席在件到接班人的第一条时说，你要学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那可不一定，谁知道你学什么，什么是马列主义，你知道吗？

马列主义的基本思想就是要革命，什么是革命？革命就是无产阶级打倒资本家，农民推翻地主，然后建立工农联合政权，并且把它巩固下去。现在革命任务还没有完成，到底谁打倒谁还不一定，苏联还不是赫鲁晓夫当政，资产阶级当政。我们也有资产阶级把持政权，有的生产队、工厂、县委、地委、省委都有他们的人。有的公安厅付厅长也是他们的人。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服务的，不是为多数人服务的！你说谁领导的？学习马列主义就是学习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到处都有，你们学院就有。你们学院出了个反革命知道不知道？他写了十几本反动日记，天天在骂我们，这还不是反革命分子？你们不是感觉不到阶级斗争吗？你们旁边不是就有吗？没有反革命还要什么革命？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二条时说：你就知道自己着想，考虑的都是自己的问题。你父亲在敌人面前坚毅不屈，丝毫不动摇，就是因为他为多数服务。要是你还不是双膝跪下乞求饶命了。我们家很多都是让国民党、美帝国主义杀死的，你

是吃蜜糖长大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苦。你将来不当右派，当个中间派我就满足了，你没有吃过苦嘛，怎么能当上左派？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的第三条时说：你们开会是怎样开的？你当班长是怎么当的？人家提意见你能接受吗？提错了受得了吗？如果受不了那怎么团结人？你就喜欢人家捧你，嘴里多吃点蜜糖，耳里听的赞歌，这是最危险的，你就喜欢这个。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四条时说：你是否与群众合得来，是否只和干部子女在一起，而看不起别人？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个人说了算。

主席在讲到接班人第五条时说：你现在有了进步，有点自我批评了，但还刚刚开始，不要认为什么都行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 观看革命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后的指示

《红色娘子军》方向是对的，革命是成功的，艺术上也是好的。

一九六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周扬召集各协会和主要报刊负责人会议，提出写批判文章不要打空炮、乱猜、乱扣帽子，要防止片面性和绝对化，不能搞教条主义。并强调对夏衍、田汉等要有历史观点，要一分为二，政治与学术要分开。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人民日报》发表齐向群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 编者按说：孟超同志新编的昆剧《李慧娘》，是一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但是，这个戏在一九六一年秋天由北方昆曲剧院上演以后，戏剧评论界的一些人却对它颂扬备至。一九六三年春天，虽然在报刊上发表了一些文章予以批判，仍未彻底揭露出它的反动本质。去年以来，随着社会主义文化革命的日益深入，大家对这出戏的认识也逐渐提高了。最近，不少报刊都发表文章，重新展开批判。本报今天发表的齐向群同志的文章，对这个戏作了比较深入的分析 and 批评。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本报曾经发表过陶君起、李大珂同志的一篇剧评，题为《一朵鲜艳的“红梅”》。这篇文章对《李慧娘》是充分肯定、十分赞扬的，说它“在百花园中，放出光彩，真是一朵新鲜的‘红梅’”。作者认为孟超赋予了李慧娘以斗争精神，“从而丰富了李慧娘的思想感情”，使得“李慧娘的性格更加完整”，“令人鼓舞”；认为改编者在太学生与贾似道的斗争中，增加了政治内容，因而“是一个相当成功的改编尝试”；认为昆剧《李慧娘》有很

高的艺术性，“全剧中洋溢着诗情”，“语言的运用上，也充满了文学性”。

事实同这些论断相反。孟超通过李慧娘这个人物，不仅宣传了鬼神迷信思想，更重要的是宣扬了活着不必斗争，死后才有力量的反动哲学；散布了阴暗、消极的情绪和任性放情的极端个人主义思想；剧中加强的所谓政治性，是通过剧中人物发泄对现实的不满，号召和鼓励被推翻的剥削阶级向社会主义去进行复仇斗争。《李慧娘》的艺术性，是为它的反动内容服务的，而且唱词尽是陈词滥调，谈不上什么“文学性”。

对于这样一出坏戏，我们不但没有及时揭露和批判它，而且还错误地发表了赞扬这出戏的文章，这说明我们对阶级斗争、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内的阶级斗争，缺乏深刻的认识；对于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利用文学艺术形式向社会主义进攻，缺乏应有的警惕；对于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通过对《李慧娘》的再评论，使我们进一步认识到，文艺评论工作和其他各项工作一样，必须坚决执行党和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正确方针路线，必须遵循毛泽东同志所规定的文艺批评的标准。任何时候，任何工作，一旦忘记了毛泽东同志的指示，就会犯严重的错误。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说：现在有人不敢写文章了，新华社每天只收到两篇稿子。戏台上只演兵，只演打仗的，电影哪有那么完善？这个不让演，那个不能演。那些革命派想靠批判别人出名，踩着别人肩膀上台。他还提出要赶快刹车。

一九六五年七月三日，毛泽东对北京师范大学调查材料的批示

学生负担过重，影响健康，学了也无用。建议从一切活动总量中砍掉三分之一。邀请学校师生代表，讨论几次，决定执行。如何请酌。

一九六五年七月十九日，毛泽东对医务人员的谈话

（×××说明主席对卫生部的批评是一针见血，要切实改正。）

主席：城市医生下乡不一定高兴，在城市住惯了。可不要相信有些人嘴上说的那一套，要看。嘴上说的好，不一定。

北京医院改的怎么样了？

（说明北京医院目前情况。）

主席：北京医院并没有彻底开放。×××、×××就不能去看病，××、××

可以去看，这不是贵族老爷医院是什么？要开放，给老百姓开放。不要怕得罪人。这样做得罪了一批人，可是老百姓高兴。这批人不高兴让他们不高兴好了。做什么事总要得罪人，看得罪的是些什么人，高兴的是什么人，老百姓高兴就行。

（说明北京医院改了，中央改了，可以影响地方。）

主席：不一定，他可有他的办法呢。反正是扫帚不到灰尘照例是不会自己跑掉的。

县卫生院认为赚钱的医疗队就好，不赚的、少赚的就不好，这难道是人民的医院？

药品医疗不能以赚钱不赚钱来看。一个壮劳力病了，给他治好病不要钱，看上去赔钱，可是他因此能进行农业或工业生产，你看这是赚还是赔？×××告诉我，在天津避孕药不收费，似乎赔钱，可是切实起到节制生育的目的，出生率受到控制，城市各方面工作都容易安排了，这是赔钱还是赚钱？

有些医院，医生就是赚钱，病人病不大或没有什么病也要他一次次看，无非是赚钱。甚至用假药骗人。有两个十七、八岁的青年，说检查了，有脊柱病。我说不要信，这是他们骗。要他们去休养，两三个星期回来了还不是照常上班。搞一些赚钱的医院赚钱的医生、假药，花了钱治不了病，我看还不如拜菩萨，花几个铜板，买点香灰吃，还不是一样？

最近政治局要讨论一次卫生部的工作，××同志已经告诉我了。他找他们谈过。

（说明卫生部现在正讨论具体办法，很想在政治局讨论之前，主席先接见一次，再给以指示。）

主席表示同意。

一九六五年九月二十二日，《光明日报》发表署名文章《应该怎样估价“让步政策”》，批评“让步政策论”是“根本歪曲了毛主席关于中国农民战争历史作用的理论”。

一九六五年十月，毛泽东关于大学文科改革的指示

希望学哲学的人，都要到工厂、农村跑跑。我看了南京大学一个学生参加四清后写的一篇体会，写得很好，善于通过现象看本质，本质看不见摸不着，只有调查研究才能看到。同志们要多学点东西，学点植物学，土壤学。现在大学教育

我很怀疑，上大学，看不见务工务农务商的，学完了不知工人怎样做工，农民怎样种地，还把身体搞坏了。我告诉我的孩子学农务商，学完了到农村，就说我到这里来补课。

大学里要学那么长时间，一个人两岁学会说话，三岁就会打架，五岁可以看父母种田，从小学会很多概念。现在教育太脱离实际了，大学教育要很好改进，不要学那么长时间，特别是文科要改进。不然，学哲学的不懂哲学，学历史不懂历史，学文科写不出文章。大学生要到工厂、农村去，下连队当兵，接触实际。高中毕业后先做几年实际工作，然后再读几年书，过去的大发明家都不是什么大学出身。

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戚本禹在《红旗》杂志第十三期上发表题为《为革命而研究历史》的文章，全面批判了翦伯赞的错误观点。

一九六六年六月十一日，红旗杂志的文章指出：在经济学界，孙冶方等人提出了一整套修正主义谬论，他们反对毛泽东思想挂帅、政治挂帅，主张利润挂帅、钞票挂帅。他们妄图改变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把社会主义企业变成资本主义企业。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四年、六五年，毛主席不仅提出了教育革命、卫生革命的任务，而且特别提出了关于批判意识形态领域，特别是文艺领域的修正主义问题。

在“四清”运动开展以后，毛泽东对文艺问题作出了两个批示，从一九六四年夏季开始，在意识形态领域，从文艺界逐步扩大到哲学、经济学、历史学等许多方面，开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文化领域内规模最大的批判运动。这种批判，是反修防修的重要组成部分。批判的对象，在文艺界，以昆曲《李慧娘》为代表；在哲学界，以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为代表；在经济学界，以孙冶方的“生产价格论”、“企业利润观”等经济思想为代表；在历史学界，以翦伯赞等的“历史主义”和“让步政策论”等史学观点为代表。

一九八〇年，中共中央在一份文件中公开说：1962年和1964年关于文艺问题的两个指示中对文艺工作的指责，不符合实际情况并且被后来的《部队文艺工

作谯会纪要》所利用，产生了严重的后果。

《毛泽东传（1949-1976）》说：毛泽东这个讲话，实际上把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范围，把反对修正主义的问题，从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进一步扩大到意识形态方面，特别是文艺领域。他越来越关注文艺领域。过了两个月，十二月十二日，他写了一个对后来产生重大影响的关于文艺工作的批示，把这方面的问题看得十分严重：看了毛泽东的这个讲话，读了他的这两个批语，人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会把文艺问题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突破口。这以后，文化领域的批判运动越来越升级，火药味也越来越浓厚。毛泽东的兴趣和注意力也从“四清”逐渐转到这个方面。文化批判运动直接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邓力群经过反复思考以后，他说：“在 4 年多中，我提到的 16 件重要的事，无非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就是毛泽东看到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部门、思想部门的工作，同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不相适应。要使上层建筑、意识形态领域同我们已经建立的经济基础能够互相适应，要着手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说明，1962 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后，一个方面，在一个时期中，抓城市“五反”和农村“四清”；另一个方面，毛泽东注意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的问题，他提出了批评、提出了任务。就其中一件一件事看，我说，不好说毛泽东提出的这些问题不对，不能够说我们的意识形态领域、文化领域与经济基础不相适应的矛盾不需要解决，不好说提出这样的任务不妥当。从方法讲，也与过去党中央对地方和部门工作的领导方法一样，提出批评和任务，责成改正。”（《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与阶级斗争问题的讲话（六）》）

这说明：右派翻案不得人心！

2006 年 8 月 9 日初稿

2011 年 6 月 7 日修改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第四章 批判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思潮

第一节 中共发表两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六年，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一、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人民日报发表《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 赫鲁晓夫发表秘密报告大反斯大林，中共中央内部开会讨论

1、苏共召开二十大，赫鲁晓夫作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二月十四日至二十日，苏共召开二十次代表大会，我党派出朱德同志为团长、邓小平同志为副团长的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大。

从大会开幕到闭幕，我党代表团都没有听到赫鲁晓夫大反斯大林的秘密报告。只是在大会闭幕后的第二天，苏共中央联络部的人才把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向我代表团通报，只口译一遍就把稿子拿走了。当时，邓小平表示：此事关系重大，要报告中央。没有表态。

半个月后，《纽约时报》在三月十日详细发表了秘密报告。在全世界引起极大的震动。特别是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犹如发生了一场政治大地震。在东欧各国，对当权的领导人，造成极大的政治压力。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乘机掀起一场反苏反共的浪潮。

2、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评论秘密报告

一九五六年三月十七日晚，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报告，一是揭了盖子，这是好的，二是捅了娄子，全世界都震动。揭开盖子，表明斯大林及苏联的种种做法不是没有错误的，各国党可以根据各自的情况办事，不要再迷信了。捅了娄子，搞突然袭击，不仅各国党没有思想准备，苏联党也没有思想准备。这么大的事情，这么重要的国际人物，不同各国党商量是不对的。事实也证明，全世界的共产党都出现混乱。

过去认为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死板，较灵活。一九五四年，我国国庆五周年，赫鲁晓夫到中国访问，那次接触中感到此人比较灵活。那次谈判结果，他给了我

们一些东西。如将旅顺口和新疆的几个中苏合营公司还给我们，帮助我们修建兰州、乌鲁木齐到阿拉木图的铁路，给我们贷款五亿卢布，帮助我们修建十五个项目，连同过去斯大林答应的 141 个项目，共 156 个项目，是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骨干工程。不过，现在看来，此人有点实用主义。他上台后需要我们支持，所以把中苏关系搞得好一点，把斯大林的沙文主义的某些做法收敛了一些。

三月十九日晚，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继续讨论赫的秘密报告，毛泽东说：我并不认为斯大林一贯正确，这个话过去不好讲。他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出的主意，有许多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只讲我们自己错了，没有联系到斯大林。那时我们党采取这样的方针是正确的。斯大林的错误是明摆着的，问题是如何评价斯大林的一生。是二八开，三七开，还是倒二八，倒三七，还是四六开？我看三七开比较合适。正确是七分，是主要的；错误是三分，是次要的。这个问题大家还可以议。还要想一想我们对批判斯大林是否表态，采取什么方针。

三月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我们党同苏共的关系，历史上斯大林整了我们四次。

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是斯大林在莫斯科决定，要中国党执行，结果白区党损失百分之百，苏区损失了百分之九十。

第二次，抗日战争初期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叫做“一切通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就是一切听蒋介石的，也是斯大林主持的共产国际

在莫斯科决定的。我们党很快就抵制了这条错误路线，制定了又团结又斗争，实行保持我党独立性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终于巩固和扩大了革命力量，特别是抗日根据地，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结束后，蒋介石发动内战，我党进行自卫反击，斯大林从莫斯科发来电报，要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打内战，否则中华民族要毁灭。我党没有听他的。这些事想起来就有气。

第四次，最后一次是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我在莫斯科整整呆了两个月（1949 年 12 月 16 日到达至 1950 年 2 月 17 日离开）。这两个月很不好受。当然我们是去祝寿的。斯大林七十寿诞，世界各国共产党都去向他祝寿。但我们此行的目的不单是祝寿，主要是要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我在莫斯科看出斯大

林不愿意订立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对中国党是不信任的。我在《论人民民主专政》的文章中不是说要一边倒吗？我们中国共产党人是真心诚意把苏联作为最亲密的战友，我们要和他们站在一起。斯大林曾把铁托看成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把南斯拉夫共产党开除出情报局。我们党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斯大林并不把我们看作是共产主义者，而是把我们看作属于铁托一类的人，说我是半个铁托。但我们当初并不了解这个底细，而一心要同苏联签订一个同盟条约。我到莫斯科第一次见到斯大林就向他提出这个问题。当时苏联采取拖延的办法，一直不提这个问题。在开完斯大林的祝寿会以后，我在莫斯科没事干，我就发牢骚，骂娘，估计他们会听到的。我对苏联党的联络员说，我在这里没事，。但是我做了很重要的事情，第一吃饭，第二拉屎，第三睡觉。每天做这三件事。他们让我参观，我不去，不答应签订同盟条约我那里也不去。这样坚持到一九五〇年元旦那一天，斯大林才同意签订同盟条约，我同意发表对塔斯社记者谈话。第二天他又派莫洛托夫和米高扬来看我，商定请恩来到莫斯科来具体商谈订条约事宜。所以，周总理 1 月 20 日到莫斯科来。总理在莫斯科与他们谈判很辛苦，七磨八磨，最后才谈成。苏联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也答应帮助中国搞建设，搞重点工程项目，后来陆续增加到一百多项重点工程。但是，在谈判中他们明显表现出对我们不信任，至少不完全信任。中长路要共同管理，旅顺口要做苏联的军事基地，在靠近苏联的新疆搞了什么合股公司，总之，新疆和东北三省他是不想放手的。

苏共二十大反斯大林，对我们来讲的确是个突然袭击。但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这样也有好处，打破紧箍咒，破除迷信，帮助我们思考问题。搞社会主义建设不一定完全按苏联那一套公式，可以根据本国的情况，提出适合本国国情的方针、政策。

苏共二十大大反斯大林已经发生，我们也没有办法。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什么办法呢？我们要做的是从苏联的错误中吸取教训。不要一反斯大林就如丧考妣。现在全世界是否要来一个反共高潮，我们也没有办法。人家要反，有什么办法呢？当然，我们自己要硬着头皮顶住。

其实，十月革命以来，搞社会主义时间并不长。说到共产主义运动，从马克思发表《共产党宣言》时起，迄今也只有 100 年多一点，实现共产主义是空前伟

大、空前艰巨的事业。不艰巨就不能说伟大，因为很艰巨，才很伟大。这样伟大艰巨的事业，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苏联要犯错误，我们也要犯错误。因为我们所走的道路是前无古人的道路。苏联是第一个搞社会主义，第一个搞无产阶级专政，所以，可以说他们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中国搞社会主义也可能犯错误，甚至犯大错误。因为要摸清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是不容易的事情。路如何走，不容易。我们搞民主革命也是犯了许多错误以后才成功的。建设社会主义同样是这样。要树立错误难免的观点。任务是尽量少犯错误，使主观符合客观，按客观规律办事，反对主观主义，反对片面性。这样才能不犯大错误。我们力求不犯大错误。

斯大林是什么时候对我们比较放心了呢？那是我们派志愿军过鸭绿江，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之后。我们军队过江一打，他放心了，觉得我们不是半个铁托，是国际主义者，是真正的共产党了。苏联决定援助我们 141 个项目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打起来以后才完全决定下来的。我们在莫斯科的时候没有完全定下来。

是不是用支持苏共二十大的姿态，讲一些道理，弥补赫鲁晓夫报告的片面性，对斯大林的错误做一些分析，讲一讲我党也是犯过错误的，也不赞成个人崇拜的。在讲我们的错误时不要联系苏联。对共产主义前景要表示充分的信心。“四十而不惑”，这是中国的古谚。十月革命明年才到四十周年。是不是四十岁就不惑呢？这也难说，可能好一点，但是要充分表示共产主义最终要胜利的信心。

（二）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1、毛泽东提出撰写文章的基本观点

一九五六年四月四日下午，中央书记处会议上讨论撰写文章，

毛泽东说：要鲜明地提出斯大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个犯了一些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除了其他原因外，这主要是由于他思想上和工作作风上有严重毛病。

还有两个重要观点：

第一个观点：在消灭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矛盾是普遍存在的。消灭了阶级对立之后，社会主义社会还会存在什么矛盾？至少还会有新与旧的矛盾，先进与落后、正确与错误的矛盾。按照辩证法，没有矛盾就没有运动，没有运动，生命就要结束，社会就要停止运动，以至灭亡。

第二个观点：斯大林的著作还要不要读？既然斯大林有错，他的书也是有错误的。但斯大林一生中正确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的书里正确也是主要的，第一位的，错误也是第二位的。还是应该读。因为搞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不长，真正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斯大林还是第一人。他主持写的《联共（布）党史》，其中是否有错误可以研究，但它毕竟是第一部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叙述共产党的斗争历史，总结苏共革命斗争的经验。这是国际共运历史上第一部这样的书。还有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是第一本总结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书，还是应该读的。这些书中肯定有错误，但我们还是应该读。学习苏联的经验，学习任何国家的经验，有两种学习方法，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方法，生搬硬套，全盘接受，不加分析、思考，不联系本国实际，这当然是要不得的。我们党的历史上犯过这样的错误。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学习时要加以分析，要联系本国当时当地的实际，学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问题，这种态度是正确的态度。所以，大家要动脑筋，多想想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要按照实际情况办事，不受苏联已有的做法束缚。比如苏联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我党历史上也犯过这样的错误，那是王明“左”倾路线时期，后来我们对这个问题处理比较妥当。我们的方针是有反必肃，有错必纠。我们还规定：在党政机关中搞肃反，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在社会上则劳动改造，可杀可不杀的不杀。这不仅可以保留活证据，如果他真是反革命的话；如果我们搞错，他不是反革命，还可以改正。一旦人头落地，平反也没有意思了。

发表这篇文章，我们对苏共二十大表示了明确的但还是初步的态度。苏共大反斯大林，各种议论正在开始，以后还会有，还会有更广更深的表现表现出来。问题在于我们自己从中吸取教训。这篇文章算是我们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我认为最重要的教训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国情，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我们的路线、方针、政策。民主革命时，我们走过一段弯路，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有过不少的探索和实践，但也不是没有缺点，没有片面性，这说明我们还没有完全地系统地

掌握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规律，还要在今后长时期内探索符合客观规律的正确道路。开始我们模仿苏联，因为我们毫无搞社会主义的经验，只好如此，但这也束缚了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初步的实践，又有了苏联的经验和教训，应当更加强调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强调开动脑筋，强调创造性，在结合上下功夫，努力找出在中国这块大地上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

毛泽东建议把文章的题目改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并修改了文章的最后一段。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原文及要点

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体讨论，反复修改，最后由毛泽东定稿。

这篇文章的要点，参加编写者之一的吴冷西概括如下：

1，文章从各国反动派对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兴高采烈讲起，指出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出现错误同一切剥削阶级专政的错误在性质上根本不同。

人类社会自分裂为几个阶级以来，几千年间经历了奴隶阶级专政、封建主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他们在很长时间内犯过无数次错误，而且重复地一犯再犯，最后仍然不可避免地要犯更大更多的错误，促进自己的灭亡。

无产阶级专政是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完全不同于过去一切阶级专政的新的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没有阶级、没有剥削的共产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个伟大的目标的斗争，无疑是情况很复杂、道路最曲折、斗争最艰难。因此在这个斗争过程中，不可避免要出现许许多多错误，但也存在着无限发挥人民群众主动精神和积极作用以克服种种错误的可能性，从而为实现共产主义开拓光辉的前景。

2，文章充分肯定苏联人民和苏联共产党在过去几十年中，在世界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打败法西斯的主力，大大鼓舞了和支持了世界各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创造了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业绩。

同时，文章在指出苏联的伟大成就的同时，也指出在建设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程中产生的严重错误。文章指出，作为列宁逝世后苏联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的斯大林，在苏联的伟大成就中有他的不可磨灭的功劳，在苏联的严重错误中也有他的不可否认的责任。当斯大林正确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在国内外人民

中获得很高的荣誉时，他却错误地把自己的作用夸大到不适当的地位，把个人的权力放在和集体领导相对立的地位，他骄傲，不谨慎，脱离群众，脱离集体。他思想里产生了主观主义，产生了片面性。他接受个人崇拜和实行个人专断。他离开了原来自己宣传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某些基本观点，理论同实践脱节，从而在某些重大问题上不可避免地作出了不合实际的错误决定，并且使那些个别的、局部的错误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和严重错误。

3，文章指出，斯大林一生的后期，愈来愈深地陷入主观主义和片面性，欣赏个人崇拜，违反党的民主集中制，因而发生了例如以下的一些重大错误：在肃反问题上扩大化；在反法西斯战争前夜缺乏必要的警惕；对于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农民的物质福利缺乏应有的注意；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出了一些错误的主意，特别是在南斯拉夫问题上作了错误的决定。

文章在这里提到的斯大林的错误，有同于又有别于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既指出个人崇拜的影响，又指出思想的原因。文章还指出，对于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有些人认为斯大林完全错了。这是严重的误解。斯大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但也是一个犯了严重错误而不自觉其为错误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应当用历史的观点看斯大林，对于他的正确的地方和错误的地方作出全面的适当的分析，从而吸取有益的教训。

4，文章专门论述了个人崇拜。文章指出，个人崇拜是人类长期历史所留下的一种腐朽遗产，也是千百万人的习惯势力，在社会主义社会中仍然有影响，甚至像斯大林这样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也接受和鼓励这种落后思想。

文章肯定，苏共二十大展开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扫清前进道路的思想障碍的斗争。文章谈到，中国共产党曾经不断地反对脱离群众的个人突出和个人英雄主义，反复提倡领导和群众相结合、集体领导和个人负责相结合，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集中起来和坚持下去的群众路线。

文章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肯定领导人物在历史上有很大的作用，同时任何时候也反对夸大领导人物作用的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思想影响还会长期存在，一次克服了，下次还会出现，有时由这些人表现出来，有时又由另一些人表现出来，这是应该经常加以注意的问题。

5，文章没有谈到斯大林在中国革命问题上出过的一些错误的主意。文章只

是正面论述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几次路线错误，检讨自身的错误教训，强调反动教条主义，特别是王明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和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其实，这两次王明路线的错误，都是同斯大林有关的。文章只批评了斯大林在革命中基本打击方向是孤立中间社会政治力量的公式，但指出这是我们自己犯了千篇一律地加以应用的教条主义错误。

6，文章把斯大林的错误提高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述。文章指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7，文章指出，人类现在还是在青年时代，人类将来要走的路，将比过去走过的路，不知道要长多少倍。无产阶级专政现在已经在地球上九亿人口的范围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无论在苏联，在中国，在其他人民民主国家，都有自己成功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我们应当继续总结这些经验。不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或错误方面，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种现象，带有时代的特点。整个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只有一百年多一点的时间，从十月革命胜利以来，还只有三十几年的时间。我们有伟大的成绩，但许多工作的经验还是不足的。必须有这样的警惕：以后我们还是可能犯错误。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机关应该使错误限制在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范围内，而不应该让它们变为全国性的或者长时期的错误。

文章最后表示：中国共产党人深信，经过批判个人迷信之后，苏联曾经被压抑的一切积极因素将普遍活跃起来，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人民将比过去更好地团结一致，为建设一个人类从来没有看见过的伟大共产主义社会和争取世界持久和平而奋斗。

3、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发表以后的反应及工作

《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当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问题发表独特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受到国际舆论的普遍重视，也发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联《真理报》转载了这篇文章。

一九五六年四月六日，毛泽东在接见米高扬时说：面对西方国家的反共喧嚣，中苏应当加强团结，共同对敌。中苏之间有些不同的看法，如对斯大林。我们认为斯大林功大于过，对他要作具体分析，要有全面的估计。但我们一致的地方远远超过分歧，有必要也有可能团结对敌。

四月二十九日，毛泽东接见拉丁美洲六个国家（古巴、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危地马拉、哥伦比亚）的共产党代表。他们在谈话中对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致给予好评。

毛泽东说：这篇文章是经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次讨论写成的。我们认为，斯大林有好的东西，有坏的东西。大体上，他是七分功劳，三分错误。如果说他八分好，二分坏，同志们不会通过。如果说他六分好，四分坏，更不会通过。否认他好的东西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虽然没有指名批评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含义是明白无误的。

九月和十月，毛泽东会见一些兄弟党代表团，也谈了我党斯大林的看法。

毛泽东在单独同米高扬谈话时指出：兄弟党之间有不平等的现象。

毛泽东在会见南斯拉夫代表团时说：斯大林对中国革命出了一些坏主意。苏联总的来说是好的。敌人利用对斯大林的批评在全世界展开反苏反共攻势，我们应当支持苏联。

毛泽东会见英共主席时，波立特称赞《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写得好。毛泽东说：我们有些话还没有在文章中讲，现在说了没有好处。由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我们对斯大林问题只说了分量和原则，说了三七开，说了历史的、社会的和思想的根源。但对责任问题，我们说了斯大林的责任，但没有说只是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别人没有责任；也没有说不但斯大林个人有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

从这些情况可以看到，毛泽东和党中央是认真的、慎重的、也是维护大局的。可以说，毛泽东和党中央着眼点放在如何从苏联历史（包括苏共二十大在内）吸取经验教训，探索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

二、波匈事件，人民日报发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波匈事件

1，波兰事件

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六月间波兰各地不满增长。波兹南市工人首先要求提高工资，政府不接受。工人要派代表团谈判，政府不愿意谈。这样一来，工人开始罢工，然后上街游行示威。波兹南事件以后，波兰许多地方的工人都在闹事。波兰统一工人党在七月间召开七中全会，讨论局势。会上，大家认为这几年的经济工作不好，不如哥穆尔卡时期。（哥穆尔卡是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四八年任波党总书记，一九四八年由于他反对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党，被免除总书记职务并被开除出党，一九五一年被监禁，一九五四年秘密释放出狱。）七中全会认为哥穆尔卡没有错，开除他是受斯大林的影响。会议决定为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并在全党和全国平反错案、冤狱。

哥穆尔卡恢复名誉后积极参加了波兰党中央的工作。这时波兰党内批判斯大林的情绪高涨。由于过去斯大林对波兰采取大国沙文主义的政策，这种批判就带有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苏联认为这是反苏。但是波兰党认为，过去党的路线是错误的，要像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那样肃清个人崇拜的影响，要加强法制，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等等，意见很激烈。

波兰党政治局决定在十一月初召开中央全会，到十月十五日又确定提前在十九日召开中央全会。苏共知道波兰党决定召开中央全会后，非常紧张，要求波兰党中央政治局成员到苏联去谈判。波兰党的答复是在中央全会之后再去莫斯科。接着，苏共又建议苏共派代表团到华沙去。波兰党回答说，他们要开中央全会，无暇接待，要苏共代表团在波兰党开过中央全会后再来。赫鲁晓夫认为这是波兰党采取拖延的办法，以便中央全会上改组政治局，然后再让苏共代表团去。

赫鲁晓夫非常生气，于十月十七日决定下命令调动军队。首先调驻波兰境内的苏军包围华沙，同时调动驻民主德国的苏军向波兰西部边境靠拢，苏联西部白俄罗斯驻军也向波兰东部边境集中。

一九五六年十月十九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刘少奇递交了苏共中央关于波兰问题致中共中央的通知。

命令下达后，苏联方面通知中国，说苏已采取行动，并征求中国的意见。

赫鲁晓夫还决定不顾波党不同意接待，匆匆率代表团于十月十九日晨飞往华沙。苏共代表团的座机到达华沙上空后，华沙机场拒绝接收。结果赫鲁晓夫所乘飞机在华沙上空盘旋（一到两个小时），最后才被降落。

这时，波兰党正在开中央全会。会议由奥哈布主持。原来的波兰党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贝鲁特参加苏共二十大后，听到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情绪激动，导致心脏病突发，在莫斯科逝世。这以后波兰党的工作就由奥哈布主持。奥哈布在会上宣布，现在苏联代表团已到达华沙，问大家是否先开会再同苏方会谈，还是先与苏方会谈然后再开会。会上有人主张先同苏联代表团会谈再开会，但多数人主张先选出新的政治局后再跟苏联代表团会谈。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先开会选出政治局成员。其中包括哥穆尔卡。

苏共代表团十九日上午到达华沙以后，一直等着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全会选出新的政治局，然后举行两党会谈。两党代表团在十九日整个上午到下午一直进行激烈的争论。赫鲁晓夫首先指责波兰掀起反苏情绪，谴责波兰党对民族主义情绪不加制止，致使事态迅速恶化。赫鲁晓夫说话非常粗野，态度非常横蛮。会谈很决变成了互相指责。在两党会谈过程中，赫鲁晓夫看出波兰方面不会同意苏方不让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也不会采取措施制止所谓反苏浪潮，他在会谈过程中曾同华沙条约国军队总司令、苏联元帅科涅夫商量，并与苏籍波兰人、当时任波兰国防部长、波兰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商量。赫鲁晓夫了解到：目前波兰反苏情绪激昂，华沙正在酝酿示威游行，局面难以控制。波兰军队的情绪也很不稳，很难依靠他们来平息群众示威。于是，他与政治局其他人商量后，在会谈过程中就要科涅夫下令驻波兰境内的苏军部队向华沙前进。苏联军队的这种行动，很快被波兰方面察觉。哥穆尔卡在谈判中听到这个消息，不觉激动地站起来，绕过会议桌，走到苏联代表团那边去，大声地对赫鲁晓夫说：你们的部队正在向华沙前进，我要求你们马上下命令叫他们停止前进，返回驻地。赫鲁晓夫开始时抵赖，哥穆尔卡走出会议室，很决又返回来说，我证实这是确实的，我要求你马上下命令叫部队立刻返回营房，否则后果由你负责。现在我要求休会，你们考虑一下答复我们。这样，会议休会到晚上再开。

在两党会谈休会时，赫鲁晓夫得知华沙人民准备自卫，阻止苏军入城，大工厂的工人已拿到枪枝，成立工人自卫队，准备巷战。如果苏联军队坚持进城，就

会发生战争。波兰国防部长罗科索夫斯基曾经表示，如果发生战争，他不能保证波兰部队支持苏联部队。这样，赫鲁晓夫的态度才软下来，只好同意波兰的意见，命令苏军停止进入市区。

晚上会议的气氛与白天不同。赫鲁晓夫同意波兰党所做的决定，新选出的政治局由哥穆尔卡当第一书记。波兰方面欢迎苏联的态度。哥穆尔卡激动地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胜过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并说波兰党中央委员会结束之后，他一定到莫斯科去讨论如何解决波苏关系问题。

苏共代表团在二十日早晨（北京时间十九日晚或二十日凌晨）返回莫斯科。

这时，苏联同波兰的关系的形势已经缓和。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共中央发来关于波兰问题的通知，

毛泽东说：看来苏联要武装干涉，但还没有下最后决心。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我们要早定方针。苏联要动用军队来对付波兰这样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很不妥当。儿子不听话，老子要打棍子，旧社会习以为常。但苏波关系不是老子与儿子的关系，是两个国家、两个共产党之间的关系。按道理，两党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不能像旧社会老子对儿子那样。看来苏联就是把波兰当作儿子。苏波关系搞得很紧张，我看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造成的。赫鲁晓夫批评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政策不对，可是他对波兰的政策比斯大林还要厉害。他要动用军队，是严重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日晚七时，在接见苏联大使尤金时，毛泽东说：如果苏联出兵，我们将支持波兰反对你们，并公开声明谴责你们武装干涉波兰。

二十日，赫鲁晓夫回到莫斯科后，知道了中国的态度。苏共中央打电报给中国，邀请中国方面派两位负责同志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苏波两党会谈。建议苏、波、中三党在一起协商解决苏波关系的问题。

二十二日晚七时，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苏联的邀请。毛泽东说：现在惹上麻烦了。我们对波兰问题表了态，反对苏联武装干涉，主张协商解决。现在他们要协商，要求我们参加。

刘少奇、周恩来都主张参加。毛泽东说：我们可以派人去，以调解人的身份去，不是以当事人的身份去，不参加他们的会谈，而是从旁调解。我们不好当波

兰同志的面批评苏联同志，也不好当苏联同志的面批评波兰同志。就是说，我们只能分别同苏方或波方谈，不搞三方一起谈，这样我们可以主动一些，回旋的余地大一些，说话也方便一些。

常委会最后决定，代表团的任务是劝和；方针是着重批评苏共的大国沙文主义，同时劝说波兰党顾全大局，总的是劝他们协商一致，达成协议，巩固苏波友谊。方式是分别与波兰或苏联代表团谈，不参加他们双方的会谈。会议决定由刘少奇和邓小平率代表团到莫斯科去。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苏联发表宣言，十一月一日，中国发表声明支持；一度十分紧张的波苏关系，经过莫斯科苏、波、中三党的三角会谈告一段落。

2、匈牙利事件

匈牙利事件几乎与波兰事件同时发生。

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三月中旬，匈牙利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组织了一个裴多菲俱乐部，要求所谓民主和自由。

一九五六年四月，部长会议主席纳吉下台，原因是匈牙利中央指责他搞资本主义复辟，并把他开除出党。

一九五六年七月，苏共派米高扬去匈牙利，要求匈牙利党的领袖拉科西下台，认为他实行斯大林式的领导，把匈牙利局势搞糟了。匈牙利改选格罗为党的第一书记，兼部长会议主席。

一九五六年十月，为原党的领导人之一的拉伊克（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判处死刑）平反；同时为纳吉恢复党籍。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三日，宣布撤换原总理格罗，由纳吉当总理。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苏联军队应纳吉的邀请进驻布达佩斯。同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布达佩斯，参加匈党中央会议，会议选举卡达尔代替格罗任第一书记。

从二十四日到三十一日，毛泽东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政治局会议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并与刘少奇保持直接的电话联系。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纳吉发表广播讲话，要求苏军撤出匈牙利。全国罢工不断发生，反革命分子的夺权活动非常猖獗。甚至在首都以外的一些省都宣

布解放。布达斯到处听到枪声。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苏军基本上控制了布达斯的局势。同日，纳吉宣布成立新政府。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八日，匈党中央又举行会议，成立六人小组代行中央职权，以纳吉为首，把卡达尔排挤出中央领导层。

这时，整个局势非常混乱，许多共产党员、公安人员和群众被叛乱分子抓住吊死，街头电线杆上、树上到处挂着许多尸体。反革命暴乱越来越严重，而纳吉政府却采取节节退让的方针。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米高扬和苏斯洛夫到达布达斯，他们表示：苏联党和政府准备从匈牙利撤兵。并把这一决定通知了中国。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赫鲁晓夫、莫洛托夫、布尔加宁三人来到中共代表团住处，再次就波匈事件与中共代表团会商。谈话中间，毛泽东与刘少奇通了一次电话，要他跟苏方商量：苏联是不是可以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上、经济上放手，放开，让这些国家独立。刘少奇在向苏方转达上述意见的时候还说：“我听毛泽东同志讲过，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可以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共代表团经过讨论后认为，一个是进攻的方针，即用苏联的军队把反革命压下去；一个是退让的方针，即苏联从匈牙利撤军。究竟采取哪个方针？刘少奇打电话请示毛泽东，说：“我们是不是把这两个意见都提出来同苏方商量？”毛泽东同意这样做，同时提出，暂时不忙作决定，看多少天以后再说。如果采取进攻政策，要等反革命更多地暴露、人民看清楚的时候，这样比较适当。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十日，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了苏联准备从匈牙利撤兵问题

毛泽东说：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冒失决定派军队干涉波兰是错误的，而现在在匈牙利问题上又匆忙决定撤出驻匈的苏军，置匈牙利政权垮台于不顾，同样是错误的。赫鲁晓夫一左一右的做法都不对头。我们不赞成他们从匈牙利撤兵，建议苏军仍然留在匈牙利，帮助匈党和人民。

3，中共中央讨论波匈事件的教训

波匈事件过去了，但国际共运中出了这么大的波折，不能不引起毛泽东的深

入思考。应当从中吸取些什么经验教训呢？他想得很多。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一日，刘少奇、邓小平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听取他们的汇报。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四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苏军重返匈牙利后的问题，毛泽东说：在匈牙利完全照过去一套是不行的，而新的一套还要靠匈牙利同志自己去摸索，我们也要支持他们。不但要支持赫鲁晓夫，还要支持卡达尔。对波兰也是这样。现在摆在世界各国执政的共产党面前的问题是如何把十月革命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的问题，这是个大问题。要根据最近一个月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一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主席铁托发表演说。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十五日，在八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说：波兰、匈牙利出了乱子，我看是坏事也是好事。凡事有两重性，马克思主义者要坚持两点论。波兰也好，匈牙利也好，既然有火，总是要烧起来的，纸是包不住火的。现在烧起来了，烧起来就好了。匈牙利有那么多反革命分子，这一下暴露出来了。匈牙利事件教育了匈牙利人民，同时也教育了苏联一些同志，也教育了我们中国的同志。

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另一把是斯大林。

现在斯大林这把刀子，赫鲁晓夫这些人丢掉了。于是铁托、匈牙利一些人就拿起这把刀子杀苏联，大反所谓斯大林主义。西方好多国家的共产党员也批评苏联，带头的是意大利的陶里亚蒂。帝国主义也拿这把刀子杀人，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就拿起来耍了一阵。这把刀子我们中国没有丢。我们是：第一，保护斯大林；第二，批评斯大林。我们发表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篇文章。我们不像有些人那样丑化斯大林，毁灭斯大林，而是按实际情况办事，坚持两点论。

列宁这把刀子现在是不是也被苏联一些领导人丢掉一些呢？我看也丢掉相当多了。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报告中说，可以通过议会道路去取得政权。这就是说，各国共产党可以不学十月革命道路了。这个门一开，列宁主义就基本上丢掉了。

我们中国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十月革命的。我们依靠群众，走群众

路线，是十月革命那里学来的。不依靠群众进行阶级斗争，不清敌我，这是很危险的。东欧一些国家的基本问题就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反革命分子没有肃清，没有在阶级斗争中训练无产阶级及其他劳动人民，分清敌我，分清是非，分清唯心论和唯物论。现在自食其果，火烧到自己头上来了。

（二）中共中央讨论《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五至二十九日，政治局常委连续召开会议讨论当前形势，毛泽东说：

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斯大林生前的思想和观点。所谓斯大林分子，顾名思义，指向的是跟着斯大林走的人。那么斯大林这个人怎么样呢？依我看，斯大林基本上是正确的，是三七开。斯大林主义也基本上是正确的。因此，所谓斯大林分子，也应当是三七开，有缺点有错误，但还是共产党人。斯大林是好人犯错误。所以铁托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我们要彻底把它驳倒，否则共产主义队伍就要分裂，自家人打自家人。现在看来斯大林主义还是要的，非保持不可，因为它基本上是对的，错误的去掉了就是好东西，这把刀子不能丢。这是我们的资本，跟列宁主义一样。

要再写一篇文章，文章的题目可以叫做“全世界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就是说团结一切社会主义力量。当然，对铁托，对苏联，都要有批评，通过批评达到团结的目的。我们的批评要符合实际，要有分析。这里用得上中国人作文章的方法，一个叫“欲抑先扬”，一个叫“欲扬先抑”。就是说，你要批评他时，先肯定他的好的方面。因为批评的目的还是要他变好，达到团结的目的。对铁托适宜采用这个方法。对斯大林则要采取另一个方法，你要表扬他时，先要批评他的错误的方面，然后再讲他基本上是正确的，这样别人看了就容易接受。

我一生写过三篇歌颂斯大林的文章。头两篇都是祝寿的。第一篇是在延安，1939年斯大林60寿辰时写的。第二篇是在莫斯科，1949年他70大寿时的祝词。第三篇是在苏联《真理报》发表的，在斯大林去世之后写的，是悼念文章。这三篇文章老实说我不愿意写。从感情来说我不愿意写，但从理智上来说又不能不写，而且不能不那样写。我这个人向来不愿意人家向我祝寿，也不愿意向人家祝寿。但是，第一篇是祝斯大林60大寿的，我抛开了个人感情，把斯大林当作第

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来写。如果讲个人感情，我想起第一次王明的“左”倾路线和第二次王明右倾路线都是斯大林制定和支持的，想起来就有气，但我还是以大局为重。因为那时欧战已经爆发，苏联因同希特勒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受到西方舆论的责难，很需要我们支持。因此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有生气。其他两篇也不是出于心愿，而是出于需要。国民党在抗日战争结束后向我们发动内战，斯大林不赞成我们自卫反击。我们建立新中国时，斯大林还怀疑我们是不是第二个铁托，对我们不那么信任。但是，1949年底，我到莫斯科向他祝寿，不歌颂他还能骂他吗？我写了祝寿文章，他还是对我们很冷淡。后来我生气了，大发了一顿脾气，他才同意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他去世以后，苏联需要我们支持，我们也需要苏联支持，于是就写了一篇歌功颂德的悼念文章。这不单是对斯大林个人，而是对苏联党和人民的问题，所以从理智上讲还是那样写了。我们现在要写的这篇文章，还是要肯定斯大林的主要的正确方面，但要批评他的重要的错误方面。对苏联也要肯定它的正确，也要批评它的错误。

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三十日，政治局常委继续开会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题目可以用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口号，叫做“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基本论点是：

一、十月革命是各国革命的共同道路，它不是个别民族的现象，而是具有时代特征的国际现象，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共同规律。否定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

二、各国有不同的具体情况，因此各国要用不同的办法解决各自的问题。正如每个人的面目不同一样，每棵树长得也是不一样。要讲个性，不讲个性此路不通。各国革命都有具体的民族特点，十月革命本身也带有一些民族特点，没有民族特点的道路是走不通的。但是，所有道路都有它们的共性，条条道路通莫斯科。这就是十月革命的基本经验。各国革命党人的任务就是把体现在十月革命道路中的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制定本国革命的路线、方针、政策。

三、苏联建设时期，斯大林的基本路线、方针是正确的，应明确加以肯定。有缺点是难以避免的，可以理解的。斯大林过分强调专政，破坏了一部分法制，但他没有破坏全部法制；破坏了一部分宪法，但民法、刑事诉讼法只破坏了一部

分，没有完全破坏。他过分强调专政，但苏联的专政基本上还是对的。民主不够，但也有苏维埃民主。有缺点，有官僚主义，但他终究把苏联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打败了希特勒。如果都是官僚主义，都是官僚机构，怎么能做到这些呢？说苏联是由官僚主义者统治不能说服人。

四、区别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先要分清敌我，不能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对待自己的同志。斯大林过去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犯了错误，用对待敌人的办法来对待铁托同志。后来苏联同志改正了这个错误，用对待同志的方法对待铁托同志，改善了苏南关系。铁托同志现在却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对待斯大林和其他与他观点不同的同志，是错误的。他把这些同志称之为斯大林分子加以攻击，是分裂共产主义队伍，亲痛仇快的。在共产党人内部，在人民内部，存在着种种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用对待敌人的办法处理，只能采用对待人民内部矛盾的民主的说理的办法处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

毛泽东说：现在考虑也可以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做题目，表示我们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文章的连续性，而且用这个题目理论性更强一点。这篇文章形式上面向国内，实际上面向全世界。我们不能说我们自己要怎样影响国际。要晓得，苏联自己开香肠铺，但不愿中国也开香肠铺，他要推销他的香肠。这篇文章的要点：

一、要讲世界革命的基本规律、共同道路。一定要遵循十月革命的基本规律，然后讲各国革命的具体道路，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二、讲清什么是斯大林主义，为什么把共产党分为斯大林分子和非斯大林分子是错误的。应明确地讲，如果说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确切地说，是有缺点的马克思主义。所谓非斯大林主义化就是非马克思主义化，就是搞修正主义。

三、讲清沙文主义。大国有沙文主义，小国也有沙文主义。大国有大国主义，小国对比自己小的国家也有大国主义。要提倡国际主义，反对民族主义。

四、先要分清敌我，然后在自己内部分清是非。我们整篇文章可以从国际形势讲起，讲波苏关系、匈牙利事件，也讲英法侵略埃及事件，要分清两类事件性质根本不同，说明当前的反苏反共风潮就是一种阶级斗争，是国际范围内的阶级

斗争。要指出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是两类性质根本不同的矛盾，要采取不同的方针、不同的办法，解决不同性质的矛盾。

五、既要反对教条主义，也要反对修正主义。要着重指出，斯大林的著作还是要学，但是不能用教条主义的方法学，可以讲中国党吃过教条主义的亏。别人的情况我们不讲，让人家自己讲。我们一贯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苏共二十大提出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批评斯大林时的一些论点和采取的方法，否定一切的做法，助长了各国共产党内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助长了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要明确提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

六、文章从团结讲起，最后也落脚到团结。没有理由不讲团结，没有理由不克服有害团结的思想混乱。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十九、二十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问题，

毛泽东说：文章的主要锋芒是反对修正主义，捍卫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也就是十月革命的共同道路。

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存在着矛盾，这篇文章中要分清两种性质的矛盾，一种是敌我性质的矛盾，另一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上篇文章我们主要讲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在讲人民内部矛盾时还要讲敌我矛盾。当前世界上帝国主义力量 and 社会主义力量之间的敌我矛盾是基本矛盾。从此出发，站在社会主义立场上反对帝国主义。这个基本立场在文章中就要讲清楚，这样才能够贯通全局，既解决敌我矛盾，又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我们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时要从存在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基本矛盾的大背景来考虑问题。要指出各社会主义国家间和各国共产党间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要用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解决，以便协同一致地反对帝国主义。

对斯大林这个人要作认真的分析，先说他正确的一面，不能抹杀；然后说他的错误，强调必须纠正；然后强调实事求是，不能否定一切。这叫做“三娘教子”，三段论法。对斯大林犯错误进行分析时，可以讲建设社会主义是没有先例的，国内外情况是复杂的。但也不能强调过分，因为列宁在世时也是没有先例的，情况也是复杂的。在同样的条件下，有人可能多犯错误，有人也可能少犯错误。个人的因素，个人主观对客观的认识正确与否，在这里起着重大作用。斯大林不同意对立统一规律，认为矛盾转化的观点是错误的。要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又要防止

修正主义倾向。赫鲁晓夫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丢掉了斯大林为把刀子，结果别人捡起来打他，帝国主义打他一棍子，无产阶级又打他一棍子，还有铁托和陶里亚蒂又打他两棍子。这样在全世界刮起了否定一切、一棍子把斯大林打死的风潮。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分子”，是一种诽谤，颠倒了大是大非。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不能采取对待敌人的办法，否定一切。在这个问题上，铁托是不公平的。他有什么权利攻击各国共产党人，说他们是斯大林分子？他有什么权利对各国共产党指手画脚？南斯拉夫的同志在这些问题上做得太过分了。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写文章的问题，毛泽东说：

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矛盾，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在上篇文章中我们讲存在这种矛盾。现在要讲这个矛盾不仅存在，如果处理不好，还可能由非对抗性矛盾发展成为对抗性矛盾。苏波关系和匈牙利事件都说明了这一点。生产力要革命，发展成新的生产力。当原有的生产关系不能容纳它时，它就要造反，发展成对抗性的矛盾。上层建筑要保护经济基础的发展。当上层建筑不适应时，经济基础也要造反，那里就要发生革命。这时的矛盾也成了对抗性的矛盾。这种看法可以考虑在文章中讲。当然在无阶级的社会中，对抗性矛盾的解决方法同阶级社会中的解决方法是不同的，将来的革命与阶级社会中的革命也不一样。我们现在还不能设想将来如何。但是，按照辩证法，量变会发展到质变，非对抗性矛盾会转变为对抗性矛盾，渐变会过渡到突变。这种意见可以先写起来看。是否现在讲早了一点，同当前的情况是否适应，发表前再斟酌。按照辩证法应该是这样。

现在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既为它的革命阶段辩护，又为它的建设阶段辩护。苏联的革命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现象，而是一种国际现象，是带有时代特点的国际现象。所以无论它的成就和挫折，都是整个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财富。如果苏联的革命和建设是所谓斯大林主义，这种所谓斯大林主义就是好的主义，所谓斯大林分子就是好的共产党人。如果苏联的这种革命和建设是所谓官僚主义，那么这种所谓的官僚主义也是好的，因为它取得这么伟大的成就和胜利，可见它不是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百分之百的官僚主义是绝不会取得这么伟大成就的。所以我们要为苏联的两个阶段辩护。这是我们的义务。现在也只有中国能够理直气壮地作这样的辩护。中国有些新的作法，如三大改造等，是鉴于过去苏

联的缺点提出来的。我们的群众路线也是根据苏联十月革命初期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的经验，学习苏联，学习列宁的。看来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是正确的，可惜这一政策结束得太早了，再搞若干年可能会更好一些。苏联的革命和建设反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基本规律，我们要懂得这个规律。掌握这个规律，运用到我们的工作中去。当然，运用中也会有错误，这也是难免的。问题是我们怎样从必然到自由。认识客观规律性，获得自由，是一个艰苦的过程。中间遇到各种失败、挫折都是题中应有之义。我们懂得这个道理，就不会哭鼻子，就不会遇到一时的挫折便唉声叹气，就能保持旺盛的革命乐观主义。

毛泽东还说，我们四月间发表了一篇文章，讲的道理现在看来还是对的。但是经过半年时间，特别是经过波匈事件，原来文章所谈的已经不够了，需要再写一篇。要根据波匈事件的教训好好总结一下社会主义究竟如何搞法。矛盾总是有的，如何处理这些矛盾，是我们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三）文章要点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的要点

全文共两万字，分为四个部分，外加一个引言和一个结束语。

引言部分：从当前国际上对匈牙利事件的议论说起。

当前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

第一种是敌我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营之间，帝国主义同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之间的利害冲突。

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相互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这就是本文的根本立场。

第一部分：从苏联历史的发展的分析，归纳苏联革命和建设的基本经验有五条：

（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这个政党，以马克思列

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按照民主集中制建立起来，密切地联系群众，力求成为劳动群众的核心，并且用马列主义教育自己的党员和人民群众。

（二）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联合劳动人民，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

（三）革命胜利以后，无产阶级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联合广大的人民群众，建立无产阶级对于地主、资产阶级的专政，镇压反革命分子的反抗，实现工业的国有化，逐步实现农业的集体化，从而消灭剥削制度和对于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度，消灭阶级。

（四）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领导人民群众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文化，在这个基础上逐步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积极准备条件，为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

（五）无产阶级和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承认各民族平等，维护世界和平，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原则，努力取得各国劳动人民的援助，并且努力援助各国劳动人民和被压迫民族。

我们平常所说的十月革命的道路，就是指的这些基本的东西。这些基本的东西，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

第二部分：论述如何正确地认识和对待斯大林的错误

斯大林的错误的发生，是不是由于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已经过时，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在于依靠群众和集体的力量，及时地调整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各个环节，及时地发现和纠正工作中的错误。当然，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员的主观认识，总不可能百分之百地符合于客观实际。因此，在他们的工作中，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错误总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只要严格遵守并且努力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只要彻底遵守党和国家的民主集中制，只要认真地依靠群众，全国性的、长时期的、严重的错误，却是可以避免的。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错误就是由于他没有做到这些。

斯大林尽管在后期犯了一些严重错误，他的一生乃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家的一生。斯大林毕竟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只要我们是全面地观察问题，那么，如果一定要说什么“斯大林主义”的话，只能说，首先，它是共产主义，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这是主要的一面；其次，它包含一些极为严重的、必须彻底纠正的、违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斯大林的错误同他的成绩比较起来，只居于第二位的地位。

铁托同志和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其它领导同志在最近的言论中，对于斯大林错误和其它有关问题所采取的态度，不能够认为是全面的和客观的。我们也同意铁托同志这次演说中的一些论点，但是他把所谓“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分子”等等作为攻击的对象并且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在南斯拉夫开始的”路线和所谓“斯大林主义路线”哪一个得胜的问题，这种态度是不正确的。这只能把共产主义运动引向分裂。

第三部分：是论述反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

批判斯大林的错误的同时，展开了克服教条主义的斗争。这个斗争是完全必要的。但是一部分共产主义者由于对斯大林采取了否定一切的态度，由于提出了反对“斯大林主义”的错误口号，因而帮助了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思潮的发展。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有共同的基本规律。但是在不同的国家和民族中间，又存在着千差万别的特点。因此每个民族都经历着阶级斗争，并且最后都将沿着在一些基本点上相同、而在具体形式上各有不同的道路，走向共产主义。教条主义者不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通过一定的民族特点，才能在现实生活中具体地表现出来和发生作用。他们不肯认真地研究本国、本民族的社会历史特点，不肯根据这些特点具体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因此，他们也就不能指导无产阶级的事业达到胜利。

学习必须有正确的方法。苏联的一切经验，包括基本的经验，都是同一定的民族特点结合在一起的，都是别的国家所不应该原样照抄的。如前所说，苏联的经验中还有错误的、失败的部分。所有这些成功的和失败的经验，对于善于学习的人都是无价之宝。因为它们都可以帮助我们少走弯路，少受损失

教条主义的错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是必须纠正的。但是反对教条主义同

容忍修正主义毫无共同之点。。在目前的反对教条主义的潮流中间，有人借口反对照抄苏联经验，而否认苏联的基本经验的国际意义，借口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而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的意义。

社会主义民主在任何意义上都不允许同无产阶级专政对立起来，都不允许同资产阶级民主混淆起来。如果因为看到了斯大林后期所犯的的错误，就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原理，把这个基本原理污蔑为什么“斯大林主义”和“教条主义”，那就会走背叛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离开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道路。

在借口反对教条主义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们中间，有些人索性否认无产阶级民主与资产阶级民主的区别，无产阶级专政和资产阶级专政之间的界限，在他们看来，某些资产阶级国家的国家资本主义就已经是社会主义，甚至全人类社会都已经在“长入”社会主义了。但是，帝国主义的种种行径，同这些人的宣传相反，证明了修正主义的破产。

第四部分：论述加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

共产主义运动一开始就是国际性的运动，因为只有各国无产阶级共同努力，才能战胜各国资产阶级的共同压迫，而实现自己的共同利益。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这种国际团结，大大地帮助了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发展。苏联由于是第一个胜利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在社会主义阵营出现以后，又是这一阵营中最强大和经验最丰富的国家，所以它一直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为了共同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攻，为我们必须继续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国际无产阶级的团结。

各国共产党之间的国际团结，是人类历史上完全新型的关系。这种团结，是建立在完全平等的、协商一致的、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的基础上，是坚持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相结合的。各国共产党人必须是本国人民的正当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的者，同时又用国际主义精神教育人民，协调各国人民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

斯大林在对待兄弟国家的关系中，曾经表现过些大国主义的倾向。忽视各国在国际联合中的独立平等地位。这种倾向有一定的历史原因。旧时代大国对待小国的积习固然还会留下某些影响，而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在革命事业中所取得的

一系列胜利，也难免使人们产生一种优越感。大国主义并不是某一国家特有的现象，乙国比甲国小和落后，但是比丙国大和先进，这样，乙国尽管怨甲国的大国主义，却往同时对于丙国摆出大国的架子。我们中国人特别需要记住的是：我国在汉唐明清四代也是大帝国。要注意反对大国主义倾向。

斯大林的错误曾经引起了某些东欧国家人民的严重不满。但是，在这些国家中，某些人对于苏联的态度也不是公正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竭力夸大苏联的缺点，而抹煞苏联的贡献。我们高兴地看到，波兰和匈牙利的共产主义政党现在已经在认真地制止那些制造反苏谣言、在各个兄弟国家的关系中煽动民族对立的坏分子的活动，并且着手破除在一部分群众中以至一部分党员中的民族主义偏见。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国家友好关系的迫切需要的。斯大林所犯的一些错误，决不能使伟大的苏联人民的这种历史功绩减色。

为了巩固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除了首先要在较大国家中克服大国主义的倾向以外，还必须在较小国家中克服民族主义的倾向。无论是在大国或是小国，共产党人如果把本国本民族的利益同国际无产阶级运动的总利益对立起来，必须认真维护无产阶级国际团结，反对任何损害这种团结的行为。

加强以苏联为中心的无产阶级国际团结，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国家中的无产阶级和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这三种力量，在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的联合斗争中，相互支援，共同努力。

结束语部分：

回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近一百年历史时指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还年轻，社会主义国家还年轻。对于社会主义国家犯过一些这样的那样的错误，无论敌人高兴、同志和朋友的难过或者动摇，都是没有充足理由的。无产阶级初次担负国家的管理，迟的只有几年，早的也只有几十年，要求他们不遭到任何失败是不可能的。短时间的、局部范围的局部性的失败，不但过去有，现在有，将来还会有。资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例如英国和法国，曾经经过多少次反复，其间交织着进步和反动，共和和帝制，革命的恐怖和反革命的恐怖，内战和外战，征服外国和投降外国，尤其动荡不宁。世界上哪有一种新生事物没有困难和弱点呢？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体系，目前在许多方面还有许多困难和弱点。但是比之以前苏联孤军奋斗的情况，我们现在是好得多了。而且，我们前面的道路无论还有多

少曲折，人类最后总是要走到光明目的地——共产主义，这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止的。

贰、本节简论

关于《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这里应该补充说明一下，要点的最后一段中使用了个人迷信一词。确实，关于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的提法，在文章讨论过程中，是有分歧的。刘少奇说，不能把所有问题都算到个人迷信上。邓小平说，斯大林搞个人崇拜的确是要不得的。个人崇拜与个人迷信，这两个词的含义确实是有区别的。按照毛泽东的观点，我们应该加以反对的是个人迷信，而不是笼统地反对个人崇拜。邓小平虽然这个时候反复强调，毛泽东没有搞个人崇拜，也一贯地反对搞个人崇拜；但是由于他观点上的模糊不清，他在一九七八年以后，就又拿起这个武器来攻击毛泽东。这篇文章之所以全篇中都使用个人崇拜一词，这是为了与当时苏联的提法相连接。并不表明这就是毛泽东的看法。

这篇文章特别具有深远意义的是，强调提出：有一些天真烂漫的想法，仿佛认为社会主义社会不会再有矛盾。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各个社会的矛盾性质不同，解决矛盾的方法不同，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也是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中进行着的。革新和守旧，先进和落后，积极和消极以至主观与客观、唯心论与唯物论这类矛盾，都将不断地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下和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出现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内。一切还都是这样：一个矛盾将导致另一个矛盾，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这样看来，存在着个人与集体矛盾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什么奇怪的事。

这就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奠定了哲学基础。

《再论》进一步总结社会主义社会历史经验，深刻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

文章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的特点及发展的规律：

文章说：

在基本制度适合需要的情况下，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在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之间，也仍然存在着一定的矛盾。这种矛盾表现成为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某些环节上的缺陷。这种矛盾，虽然不需要用根本性质的变革来解决，仍然需要及时地加以调整。

有了适合需要的基本制度，也调整了制度中的日常性质的矛盾（按照辩证法，就是处在“数量变化”阶段的矛盾），是否就可以保证不发生错误了呢？问题没有这样简单。制度是有决定性的，但是制度本身并不是万能的。无论怎样好制度，都不能保证工作中不会发生严重的错误。有了正确的制度以后，主要的问题就在于能否正确地运用这种制度，就在于是否有正确的政策、正确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没有这些，人们仍然可以在正确的制度下犯严重的错误，仍然可以利用良好的国家机关做出并不良好的事情。

为了解决以上的所说的这些问题，必须依靠经验的积累和实践的考验，不可能一蹴而就。而且，情况是不断变化的，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产生了，任何一劳永逸的解决也是不会有的。从这种观点看来，就是在已经建立了巩固的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中，它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某些环节也还有缺陷，在党和国家的政策、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还有这样那样的偏差，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地方。

引言中，有一大段经过毛泽东多次修改的文字，集中表达了他在国内外出现一些新情况下，对整个世界范围内矛盾问题的理论思考，深刻阐述了 了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在我们面前有两种性质不同的矛盾：第一种是敌我之间的矛盾（在帝国主义阵营同社会主义阵营之间，帝国主义同全世界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之间，帝国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同无产阶级之间，等等）。这是根本的矛盾，它的基础是敌对阶级之间的利害冲突。第二种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这一部分人民和那一部分人民之间，共产党内这一部分同志和那一部分同志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之间，社会主义国家相互之间，共产党和共产党之间，等等）。这是非根本的矛盾，它的发生不是由于阶级利害的根本冲突，而是由于正确意见和错误意见的矛盾，或者由于局部性质的利害矛盾。它的解决首先必须服从于对敌斗争的总的利益。”

又说：

“当然，实际生活的情况是复杂的。有时为了对付主要的共同的敌人，利害根本冲突的阶级也可以联合起来。反之，在特定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某种矛盾，由于矛盾的一方逐步转到敌人方面，也可以逐步转化成为对抗性的矛盾。到了最后，这种矛盾也就完全变质，不再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范围，而成为敌我矛盾的一部分了。这种现象，在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总之，一个人只要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就决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

《再论》阐述的上述观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发表，再一次从理论上解答了人们因国际共运出现的挫折和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而产生的种种疑虑和困惑。它同《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样，在国际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这篇文章是中共领导人集体智慧的结晶，毛泽东在其中起着指导性和决定性的作用。从一九五六年二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的错误，到波匈事件和铁托发表普拉演说，这一连串的事件，深深地触动了毛泽东，促使他深入思考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问题，并引发他对中国国内问题的深入思考。他主持撰写的“两论”，既是他对这些问题进行思考的理论成果，又是他对这些问题进一步研究的理论准备。

2011年4月26日修改

第二节 毛泽东出席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

壹、本节概述

一、毛泽东与赫鲁晓夫谈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一日，莫斯科会议中苏两党对宣言草案基本达成协议以后，在与赫鲁晓夫谈话中，毛泽东说：

这次你们能够平等相待，把会议的宣言搞好，我很高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而是亚洲式的，带封建性的。这次莫斯科会议，你们改变过去对兄弟党那种不平等的态度，以平等相待，共同商量问题，这是好的，希望以后能保持这种关系。

（会不会发生世界大战？）估计不会。从目前的情况来看，美国不敢发动世界大战。因为社会主义阵营力量很强大，特别是你们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美国有些恐慌，更不敢。我们对战争的态度，第一是反对，第二是不怕。反对是没有问题的。不怕呢，因为你怕也没有用，你越怕危险就越大，你不怕不见得战争就会打起来。与其天天提心吊胆，不如索性不怕。我们还是应该争取延长和平时期。第一次世界大战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有二十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现在，已经过去十二年，还有八年就够二十年，我们应该争取这八年里面不打仗。你们是用十年的时间超过美国，应该争取十年和平，然后再争取十五年，然后再争取更长的时间，总之是力争不打仗。但是，也要准备美国人发动战争，这个警惕性不能放松，不过我们的战略还是防御战略，不是进攻战略。（针对朱可夫说的，如果帝国主义要发动战争，我们要采取先发制人的战略；进攻任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就是进攻苏联，苏联要反击。）如果是进攻社会主义国家，你们苏联准备反击，这是对的，但是还得看那个社会主义国家是不是请你们去。战略问题很值得认真考虑。我看还是不要先发制人为好，还是采取防御战略为好。我们不首先打，不首先打原子弹，如果他要打，我们就反击。这就是防御战略，不是先发制人战略。

二、毛泽东在三次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大会开始，在大会上

毛泽东说：

苏联为首是中国党先提出来的，苏联同志开始没有提这个问题。中国党提出来的时候，苏共开始也不赞成。苏联同志提出过以中国、苏联为首，或者为中心。我们党不赞成，认为应该以苏联为首，并且应该写在宣言里面。第一个理由是，我们有这么多人，这么多党，总要有一个头。一个党支部，一个党小组还有一个头，我们这么多人，这么多党，在一起总得有一个领先的、为首的。第二个理由是，就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事务讲，需要互相协商、互相调节，也要互相合作，要协调行动就需要召集会议，也需要有一个头。第三个理由是，我们社会主义阵营外部还存在帝国主义阵营，他们是有头的，是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如果我们没有头，就组织不起来，就没有力量。在世界范围内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还有严重的斗争。所以从社会主义阵营外部的情况，世界范围的情况来讲，需要有一个头。所谓为首，就是他可以提议召集国际会议，以苏联为首的提法，同由苏联负责召集会议的提法差不多是一个意思。既然要有头，是不是随便找一个头就行了呢？恐怕也不行。如果按国家名称的第一个字母来排，那就是阿尔巴尼亚，是不是可以为首呢？恐怕也不能按字母来排。其他国家恐怕也很难当这个头。我们中国是当不了这个头的，我们没有这个资格。因为我们经验少，虽然人口上是一个大国，但是经济上是一个小国。苏联发射了卫星，我们半个卫星都没有，只有山药蛋，而苏联共产党有四十多年的经验，是经验最丰富的，也是最完全的。所谓最完全，就是说它有正确的经验，也有错误的经验，总的来讲基本的都是正确的，有一部分是错误的。正确的经验和错误的经验，这两方面的经验对我们大家都有益处。

现在有一些同志觉得斯大林犯过一些错误，特别是在对兄弟党的关系上犯过一些错误，对苏联同志印象不好。我看这个问题不妥当，因为错误已经犯过了，而且现在已经改正了，从前有害处，现在已经变了，已成为我们的鉴戒了。当然，在兄弟党的关系中，苏联党犯过一些错误，有过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别的兄弟党有这样的经验，我们中国党也有这样的经验。中国党过去对苏联党是很有意见的，因为我们党最严重的一次“左”倾路线错误同苏联共产党有关，但这不应该成为苏联不能够为首的理由。现在我们的敌人是全副武装的，而我们现在拥有全副武装的也只有苏联，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也是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现在

全世界也只有一个苏联能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如果一旦有事，我们大家还是要靠苏联，这是大局。希望大家认识这个大局。其他一切小的别扭是一个小局。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

讲起对苏联有气，特别对斯大林，我也有一肚子气。过去我没有讲过，今天也不准备讲，只是说有气就是了。这些都是过去的事了。从大局来看，还是应该承认苏联基本上还是对的，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贡献是大的。我两次到莫斯科来，头一次是不愉快的，那个时候斯大林还在，说兄弟党只是说说而已，实际上兄弟党关系是不平等的。这次到莫斯科来，我感到有点平等的空气，不知道在座的兄弟党的领导同志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可以互相提不同的意见，你批评我，我批评你。如果第一次意见没有采纳，还可以提第二次、第三次。最后大多数同志认为不能采纳，自己还可以保留，在实践中看谁对。所以中国党认为，还是有必要承认以苏联为首，承认苏联共产党作为会议的召集人，现在这样做没有坏处。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会议即将结束时，毛泽东说：

我认为我们的宣言是好的，将来我们回过头来看这个宣言的时候，就会觉得它很有意义。这个宣言没有修正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将来我们去见马克思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会怎么样评价我们这个工作呢？当然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马克思大发脾气，说你们搞坏了，这个宣言不好，是一个机会主义的；第二种可能是他说不坏，没有机会主义，没有违背我的学说。也许列宁也会出来评价，他会说，现在这些新的共产党领导人工作得不错，他们会工作了、成熟了。他们起草委员会经过辛勤的努力，搞出了一个这么好的宣言，既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看我们这个宣言是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宣言。我们力求和平，力求团结，没有冒险主义，也没有机会主义。这个宣言总结了几十年的经验，尤其近几年的经验。这些经验是从痛苦中得来的，我们要感谢这些痛苦，它使我们开动脑筋，努力去避免再发生这样的痛苦。我们这个宣言所以搞得这么好，还因为我们采取了一个正确的方法，这就是协商的方法，在讨论过程中间，我们既坚持了原则，又有灵活性，是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我们这次开会，形成了一种协商的气氛，这是过去不可能有的。这次会议没

有强加于人。在同志之间采取强加于人的办法是不好的。我们用说服的办法代替过去那种压服的办法。虽然费的时间比较多，宣言到现在还没有最后定稿，但我们基本上达到一致了。花点时间是需要。我们采取协商的办法不是无政府主义。我们不是一个清谈俱乐部，我们有中心也有大家，是中心和大家的统一，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如果没有苏联共产党，那就成无政府主义了，但是如果大家提意见，只有一家的意见总是不完全的。由于我们这次会议充分发扬了民主，所以搞出了一个比较好的宣言。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六十八个党大会结束之前，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

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优势。四十年前的十月革命是整个人类历史的转折点，那么现在又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当然在这之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反法西斯战争有一个转折点，这个转折点就是斯大林格勒战役。从此希特勒走下坡路，苏联红军势如破竹，一直打到柏林。斯大林格勒这一仗是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现在又遇到一个新的转折点。现在的形势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西方帝国主义那么猖狂、那么神气，不大一样了，也同去年反苏浪潮中间西方给我们脸上抹黑，大反共产主义很不一样了。今年的形势是，我们的天下是一片光明，西方的天下是一片乌云。

第一件事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在望的时候，英美苏首脑一九四五年初在雅尔塔开会，同意将德国易北河以东作为苏联红军的进攻区，这样就使得东欧国家有可能变成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件大事是中国革命的胜利。我们把蒋介石几百万大军都消灭了，美国也帮不了忙，蒋介石只好跑到台湾去了。

第三件是朝鲜战争。我们警告美国不要打过三八线，否则中国是不会坐视的。美国不听，硬是要突破三八线，结果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把美国打回到三八线。最后，一九五三年我们在三八线上突破 21 公里，美国只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第四件事是越南战争。以胡志明同志为首的越南党领导人民把法国人打败了。于是开了一个日内瓦会议，法国人同意把大半个越南划给越南民主共和国，

美国人想阻挠也没阻挠得了。

第五件事是苏伊士运河事件。英法两个帝国主义侵略埃及，占领苏伊士运河区，引起了全世界人民反对，苏联提出了严重警告。英法军队被迫撤退。

第六件事是叙利亚事件。美国计划好要打的，它的军队在黎巴嫩登陆，又遭到各国人民反对，苏联又讲了话，美国人就不敢打了。这件事还没有完，可能将来还会出乱子。

第七件事是苏联发射两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美国说它自己很厉害，但是它一个人造卫星也没有发射上去。苏联做了先锋。

从这七件事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概念，西方世界被抛在我们后面了，我们做得好的话，就可以一直把它抛在后面。赫鲁晓夫同志说他们在 15 年内可以超过美国。我们想，中国也可以订个计划，用 15 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因为英国现在年产 2000 万吨钢。据波立特和高兰同志说，再过 15 年英国钢产可能达到 3000 万吨。那么中国再过 15 年也可能达到 3000 万吨。这样就钢产量讲，不是讲别的，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

另外，第八件事是英国退出亚洲、非洲一大片殖民地、半殖民地。

第九件事是荷兰退出印度尼西亚。

第十件事是法国退出叙利亚、黎巴嫩、摩洛哥、突尼斯，看起来也很可能还要退出阿尔及利亚。

从上面这些事情看，是原来落后的国家强一些，还是西方的发达国家强一些？是印度强一些，还是英国强一些？是印尼强一些，还是荷兰强一些？是阿尔及利亚强一些，还是法国强一些？据我看，所有帝国主义都是下午六点钟的太阳，而我们是早上六点钟的太阳。这就形成了一个转折点，把西方国家抛在后面，我们占了上风，不是西风压倒东风，而是东风压倒西风。根本的问题是，决定历史的不是由钢铁数量的多少来决定，而首先是由人心向背来决定。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从来就是弱者战胜强者，没有枪的人战胜全副武装的人。布尔什维克曾经一支枪也没有，但是终于打倒了沙皇政府，那时候苏联共产党只有 4 万人，十月革命的时候也只有 24 万人。

（哥穆尔卡说，他不同意说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原子弹是纸老虎。）纸老虎是我一九四六年对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的时候说的。我说的意思

是，希特勒是纸老虎，他被打倒了；沙皇也是纸老虎，中国皇帝也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也是纸老虎，都被人民打倒了。现在美帝国主义还没有倒，还有原子弹，但我看也是纸老虎。蒋介石也是个纸老虎。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中国共产党同敌人进行了长期的残酷斗争，在这长期的斗争中间，我们慢慢形成了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是，我们在战略上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要重视一切敌人。也就是在整体上要藐视它，要打倒它。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的时候，就要打倒全世界资本主义。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我们有根据藐视它。但是并不是轻视敌人，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重视一切敌人，就是说，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要重视它，要认真地、具体地研究如何同它作斗争。这样我们一方面不至于犯右倾机会主义，在敌人面前惊慌失措，丧失斗志，没有信心；另一方面又是认真地同敌人进行具体的斗争，一仗一仗地同它打，一部分一部分地消灭敌人，直到最后完全消灭敌人，这样就不会犯“左”倾机会主义。这好比吃饭一样，我们战略上要藐视吃饭，这顿饭我们一定能够吃下去。但具体来讲，只能一口一口地吃，不能把一桌子酒席一口吞下去，这就要逐个地解决，军事上叫做各个击破。

我们说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就是不要怕原子弹。帝国主义手里有原子弹，苏联也有，要设想一下，如果爆发战争要死多少人？这个问题最初是我同尼赫鲁会谈时提出来的。尼赫鲁说，原子弹不得了，美国人讲了，原子弹一打世界就要毁灭。不是我们要打原子弹，是美国人要打原子弹，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拿氢弹来吓唬我们。我们怎么办呢？是不是一打原子弹全世界的人就死光了呢？我当时回答尼赫鲁说，极而言之，如果打原子弹的话，美国一定要打，我们也没有办法。它要打，极而言之打死世界人口的一半，可是还有一半人口，他们还要革命，还要造反。如果帝国主义要打原子弹，最后的结果是帝国主义灭亡，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现在有 27 亿人口，死掉一半，还有 13, 5 亿，再过若干年，人口又会增加到 27 亿，而且一定还会更多。我觉得我们要有这么一个思想准备，不要怕原子弹，不要怕帝国主义拿原子弹来吓唬我们。我们中国人曾经这样说过，如果帝国主义硬要打仗，我们也只有横下一条心，打完仗再建设。如果我们天天怕战争，战争来了怎么办？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又不能决定什么时候打，在什么地方打。我们怕也不管用。与其天天怕不如索性不怕。对这个问题，既要藐视它，又要认真对待它。从藐视这点讲，原子弹是纸老虎，跟帝国主义是纸老虎

一样，我们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这没有机会主义，也没有冒险主义。

我们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和人民上升的朝气。当然，我们还有很多缺点、错误，但是我们的工作，成绩是主要的，是年年见成效的。

这次会议开得很团结，反映在我们六十多个党的大会上有一种朝气，而且这次会有一个头，一致承认有一个头，这个头就是苏联，就是苏共中央。中国有句俗语，叫做“蛇无头而不能行”。你看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每个国家、每个党也有一个头，有集体的头，有个人的头。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是集体，第一书记是个人，两者都要，不然就闹成无政府主义了。听了哥穆尔卡的讲话很高兴，不过像波兰这样的国家，有些人在感情上还接受不了，暂时还想不通，可以换一种形式讲，比方说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相信波兰同志、哥穆尔卡同志都是好人，是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能够使先进分子同意，广大人民群众也同意。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不方便，他们党中央讨论了这个问题，决定不在十二党宣言上签字。因为斯大林组织的情报局整了南斯拉夫党，包括铁托同志，所以他们搞国内建设需要西方世界贷款，要美元。西方的经济援助、军事援助在南斯拉夫占相当大的比重，他们党不能在骂帝国主义的宣言上签字。但是我很高兴南斯拉夫同志准备在第二个宣言上签字。这就表示团结。他们没有在十二党的宣言上签字，使本来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缺了一个，从十三个变成十二个。南斯拉夫同志说他们有困难，我们想不签字也可以，不要强加于人。南斯拉夫同志不愿意签字就不签好了。我想，若干年后他们可能会在像第一个宣言那样的宣言上签字的。

我只想讲团结的方法问题。对同志，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不是敌对分子、破坏分子，就要采取团结的态度。对这些人要采取辩证的方法，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所谓辩证的方法，就是一切事物是可以分析的。要承认人是会犯错误的，不要因为人犯了一些错误就否定他的一切。列宁就讲过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我自己也曾经犯过许多错误，这些错误对我很有益处，教育了我。所以任何人都需要别人来支持。中国还有一句成语叫做：“一个好汉要三个帮，一个篱笆也要三个桩。”你赫鲁晓夫这朵荷花很好，但是也要绿叶扶持。我毛泽东这朵荷花不好，更需要绿叶扶持。中国还有句成语：“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这就是集体领导，单独一个诸葛亮是不完全的，有缺陷的。

我们这次十二党的宣言不是经过好几稿吗？到现在文字上的修改还没有完结。把一个人看作全智全能，像上帝一样，那种看法是不对的。所以对犯错误的同志要采取一个适当的态度，就是分析的态度，辩证的态度，不要采取形而上学的态度。就是说，对犯错误的同志，第一要斗争，就是批判他的错误思想，肃清他的错误思想；第二要帮助，帮助他改正错误。在中国，这叫做“一斗二帮”，就是从善意出发，来帮助他改正错误，斗是为着帮他改正错误，使他有一条出路。

对另一种人就不同了，像托洛斯基、像陈独秀、张国焘，那只能打倒。对希特勒、蒋介石、沙皇、也只能打倒。那是敌对分子，是敌人。对帝国主义制度、资本主义制度，最后也只能打倒。这是从整个战略上说的，但在策略上有时候就需要妥协。我们在朝鲜三八线不是跟美国人妥协了吗？在越南不是同法国人在十七度线妥协了吗？所以在各个策略阶段上，要善于斗争，也要善于妥协。

对敌人是这样，那么对同志中间的关系呢？我们之间有不同的意见就需要谈判，不要以为加入共产党的就个个都是圣人，没有错误，互相之间没有分歧、没有误会了，都铁板一块、整齐划一了，不需要谈判，不需要交换意见，不需要协商了。这些还是需要的。因为加入共产党的人，有 100%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有 90%的、80%的、70%的、60%的、甚至有 50%的、40%，所以还是要谈判，还要帮助改正错误，用帮助的精神来谈判，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这就不同于跟帝国主义谈判，这是共产主义内部的谈判。我们这次召开十二党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六十多党的会议不也是谈判吗？实际上都是谈判，互相妥协，在不损害原则的基础上接受别人的可以接受的意见，放弃一些自己的可以放弃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大家逐渐取得一致。

我们对犯错误的同志，一方面跟他斗争，另一方面跟他团结，斗争的目的坚持马克思主义原则，这是原则性，团结就是给他一条出路，跟他妥协，这是灵活性，两方面加在一起，叫做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我们的大会之所以取得圆满的成功，就是用了这种方法，团结的、协商的、谈判的方法，互相交换意见的方法，互相妥协的方法。

在会议过程中，我想到一些问题，就是我们要讲辩证法，要讲哲学。哲学要走出哲学家的小圈子，到广大人民群众中去。我有一个建议，希望各兄弟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谈谈怎样运用辩证法的问题。

十一月，经过一系列交换意见之后，关于和平过渡的问题，毛泽东说：

应当提出两种可能性。从理论上、原则上讲，不通过暴力革命是不能掌握政权的，因为资产阶级不会自动让出政权，一定会使用暴力镇压无产阶级的，这是历史已经证明的理论原则问题。但是，在和平时期，为着争取群众、动员群众，可以提出一个策略口号，就是我們希望能够通过议会斗争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是我们的愿望。我们并不是拒绝、反对和平过渡，也是希望能够和平过渡。同时应强调，究竟是和平过渡还是非和平过渡，与其说决定于无产阶级，不如说决定于资产阶级，因为资产阶级是不会自动放弃政权的。当然，如果它们使用武力的话，我们只能也使用武力自卫，进而夺取政权。（另外写成一个《关于和平过渡问题的提纲》）

三、毛泽东在莫斯科告别时的讲话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哥穆尔卡率代表团向毛泽东辞行，毛泽东说：

（关于召集会议的问题）一般情况是两年开一次，三年开一次也可以，如果有要紧的事一年开几次也可以。开会不开会首先要通过协商。开什么会，多大范围的会，也要通过协商。有事就开，没有事就不开。开会的时候先要有个题目，要有一个文件，预先准备好，发给参加会议的各个党。文件要尽早同各个党商量，而不是像这次会议这样，到十月二十八日我们才收到文件，可是南斯拉夫党在十月十八日就收到文件了。苏共不和我们商量，先跟南斯拉夫党商量，这就耽误了时间，而且南斯拉夫党早就否定了这个文件，声明不签字，可见还是要大家商量好。我们这次会议取得成功，就是因为大家一起搞文件，大家一起商量，创立了协商一致的原则。

（关于共同刊物的问题）刊物不容易办好，既然要办就把它办好。谁参加谁不参加由各个党自己决定。不要搞联络局，也不要搞联络局刊物，更不要成立像第三国际、情报局那样的固定组织。

我们中国党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教会我们党怎么样来正确对待战略、策略问题，怎么样才能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同自己国家的实际结合起来。只有成功的经验还不行，还要有失败的经验。没有失败的经验就不能比较，而且最好既犯过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也犯过“左”倾机会主义错误，这样才可以比较，才会在人们的脑子里引起震动，

才能够找到既不“左”又不右的正确路线。

对犯错误的人，应该采取正确的态度，不要一棍子把他打死，使他感觉到没有出路，把事情做绝。一方面应该在政治上、思想上严格批判，肃清他的错误影响，这一点绝不能妥协。但是另一方面，在做组织处理的时候，可以采取宽大的方针，这个宽大并不是要他做总书记，而是给他政治上出路。因为这些错误，特别是路线错误，它的影响是有相当范围和相当长时期的，要改正过来并不容易。所以对犯错误的人，只要他表示服从中央的路线，拥护党中央，那么我们不仅要把它当做同志，而且要当做兄弟，这样他就会感觉到有出路。

我们中国党的领导核心，从一九三五年的遵义会议到现在，是经过很艰难的过程才建立起来的，又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巩固的。我是不是可以坦率地跟你们说，劝你们要看到你们领导中央只有一年，现在还不稳固。你哥穆尔卡，你们中央这个朝廷，要经过至少十年，才能够建立起比较稳固的基础。我劝你在这一点要自觉，切不可认为已经是稳固了。根据中国的经验，领导核心是要经过长时期才能稳固的。今年米高扬到中国来谈苏共“反党集团”的时候，我就跟米高扬说过，我说你们要谨慎小心，就是说不要粗心大意，以为一切都好了。有很多事情是料不到的，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在国际上，总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事情会出现的。如果不意识到这一点，就等于把自己摆在一个危险的地位。我向你讲这些话可能不对，不礼貌，搬了中国的经验。但是我是由衷的想把这些当作礼物送给你们的。也可能你会有这样的想法，说毛泽东真是岂有此理。我是希望你们的朝廷一年比一年巩固，不希望你们朝廷毁灭。我是真心诚意说这些话的。看一个人也好，看一个党也好，是好是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观察，党外也有人要观察。一个党也是很容易被人误会的。

我第一次到莫斯科来，斯大林是不高兴的。本来我们到莫斯科来，并不完全是为了祝寿，还希望中苏两国订个条约。但是祝寿完了以后，斯大林就把这个事搁起来，不想跟我们订条约。有一次我生气了，就直接给斯大林挂电话，在电话里我说，我到这里来不完全是为你祝寿的，也希望我们订个条约。现在我没有事情做，你看怎么办？这时斯大林火了，他把电话挂了。后来我又一次去电话，那边说斯大林不在家，你有什么事可以找米高扬。这个时候我也火了，我就抓住苏共联络部派来跟我联络的同志（其中有一位过去在中国当过总顾问，现在是苏联

铁道部长)大发脾气,狠狠骂了他一顿。他问我去不去参观,我说没有兴趣。我这次来不是专门为斯大林祝寿的,还得做点工作。既然现在没有工作可做,那么我的任务就是三个:第一个任务是吃饭,第二个任务是拉屎,第三个任务是睡觉。我拍着桌子狠狠批评了他们一顿,目的就是要他告诉斯大林。后来斯大林也大发脾气,把我们代表团和他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召集在一起开了一次会,狠狠批评我们一顿。会上有三个人放炮,一个是莫洛托夫,一个是贝利亚,一个是斯大林。总的意思是说,中国有民族共产主义,毛泽东如果不是一个铁托的话,至少是半个铁托。那个时候他们就是这样批评我们的。我当时就在鼻子里发笑,一点也不申辩。什么中共是民族共产主义,什么半个铁托,等等,我都不申辩。我只说一句话。我说:同志们,你们说的不符合事实。他们也无可奈何,也不能把我关起来。后来他们想一想,还是签个条约好,因为不签条约我就不走。他们知道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后来周总理来了,就跟莫洛托夫专门谈订条约的问题,最后总算把条约谈妥了。我们也做了让步,同意中苏两国共同管理中长路,在新疆开了三个中苏合营公司,把旅大给苏联做海军基地,他们可以驻军。斯大林还特别关照,不许外国人到东北和新疆。这些当时我们都忍下来了,当时也没有办法改变。所以从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三年都按苏方要求办了。到什么时候他们才想改变呢?什么时候斯大林觉得我不是半个铁托呢?那是朝鲜战争。原来他们说我是亲美英派,我们抗美援朝了,哪有亲美派同美国打仗呢!一九五〇年初在莫斯科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后,我们举行了一个招待会,答谢苏联的招待。当时我们请了斯大林,别人以为他不会来。结果他还是来了。他说他那天夜里没有睡好觉。在招待会上我先致辞感谢苏联,斯大林也起来祝酒,说的都是好话,说中国如何如何好。因为我们是按照他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他也是按照我们的意思签订了一个同盟条约。跟斯大林这样的人要斗,你不斗他就要把你整下去。斗的结果,经过几个礼拜,他想了一想,先是不赞成订条约,后来觉得还可以。当然也要讲公道话,斯大林还有好的一面。抗美援朝一来,他就说我们是真正共产主义者了,不是民族共产主义了,不是半个铁托了。所以对于国与国之间的一些分歧,兄弟党之间的一些分歧,需要时间,需要等待,要准备挨骂。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二十日晚,在启程回国时,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

这次会议开得好,开会的方法也好。你们愿意跟大家商量,这点我们很高兴。

我们两家达成一致意见，中国代表团是满意的，相信你们也是满意的。现在宣言是达成协议了。以后是执行的问题。各个党根据宣言中肯定的原则，结合自己国家的情况去执行，可以有这种政策或那种政策，这种方针或那种方针。在执行中会有不同意见，如果发现不同意见，我们希望还是内部谈清楚，不要采取公开批评的方法。不要在共同办的刊物上展开兄弟党之间的争论，不要一个党发表文章批评另一个党。在各个党自己办的刊物上，也不要公开批评别的党。两个党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通过内部协商，内部解决问题。历史证明，一个党公开批评另一个党效果都不好。这个问题跟多列士谈过，跟杜克洛也谈过，跟意大利党也谈过，跟英国党也谈过。他们都觉得，公开批评别的党的办法不好，即使意见正确，别的党也不容易接受。所以希望我们对这个问题能够达成协议，不要公开我们内部的分歧，不要在刊物上公开批评另外一个党。这个问题我是答应了哥穆尔卡的。在最后临别之前，给你提这么一个建议，刊物办起来之后，不要办成互相争论的刊物。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七年十一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党、工人党会议，是一非常重要的会议。毛主席在这次会议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在与各党的交流、协商中，既坚持了高度的原则性，又具有适当的灵活性。

2011年4月26日修改

第三节 赫鲁晓夫妄图侵犯我国主权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参加这两次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彭德怀、陈毅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在中南海游泳池向毛泽东提出苏联要在中国领土和领海上建立中苏共有共管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种损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当即遭到毛泽东和中国其他领导人严辞拒绝。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召见苏联驻我国大使尤金谈话：

昨天你们走了以后，我一直睡不着，也没有吃饭。今天请你们来谈谈，当个医生，下午就可以吃饭、睡觉了。你们很幸运，能够吃饭、睡觉。我们言归正传，吹一吹昨天交谈的问题。就在这个房间里吹！我们之间没有紧张局势。我们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相同，一个指头不同。这个问题，我讲了两三次了你忘了没有？昨天的问题我又想了一下，可能我有误会，也可能我是正确的，经过辩论可以解决。看来，关于海军提出的核潜艇的请求[2]可以撤销。这个问题我脑子里没有印象，问了他们才知道，海军司令部里有那么些热心人，就是苏联顾问，他们说苏联已经有了核潜艇，只要打个电报去，就可以给。海军核潜艇是一门尖端科学，有秘密，中国人是毛手毛脚的，给了我们，可能发生问题。苏联同志胜利了四十年，有经验。我们胜利才八年，没有经验，你们才提合营问题。所有制问题老早就提过，列宁就提过租让制[3]，但那是对资本家的。中国还有资本家，但国家是由共产党领导的。你们就是不相信中国人，只相信俄国人。俄国人是上等人，中国人是下等人，毛手毛脚的，所以才产生了合营的问题。要合营，一切都合营，陆海空军、工业、农业、文化、教育都合营，可不可以？或者把一万多公里长的海岸线都交给你们，我们只搞游击队。你们只搞了一点原子能，就要控制，就要租借权。此外，还有什么理由？你们控制过旅顺、大连，后来走了。为什么控制？因为当时是国民党的中国。后来你们自动走了，因为是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了。在斯大林的压力下，搞了东北和新疆两处势力范围、四个合营企业[4]。后来，赫鲁晓夫[5]同志提议取消了，我们感谢他。你

们一直不相信中国人，斯大林很不相信。中国人被看作是第二个铁托[6]，是个落后的民族。你们说欧洲人看不起俄国人，我看俄国人有的看不起中国人。斯大林在最紧要的关头，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在这一点上，他犯了很大的错误，与季诺维也夫[7]是一样的。另外，我们对米高扬[8]不满意。他摆老资格，把我们看做儿子。他摆架子，可神气了。一九四九年他第一次来西柏坡的时候，架子就很大，后来又来了几次，都是这样。每次来都劝我去莫斯科，我说去干什么？他说，总会有事情做的。后来，还是赫鲁晓夫同志出了题目，去开会，搞个文件。去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这是我们共同的事业。当时我说过，什么兄弟党，只不过是口头上说说，实际上是父子党，是猫鼠党。这一点，我在小范围内同赫鲁晓夫等同志谈过。他们承认。这种父子关系，不是欧洲式的，是亚洲式的。当时在场的有布尔加宁、米高扬、库西宁、苏斯洛夫[9]等人，还有你(指尤金)吗？中国方面，有我和邓小平[10]。我对米高扬在我们八大[11]上的祝词不满意，那天我故意未出席，表示抗议。很多代表都不满意，你们不知道。他摆出父亲的样子，讲中国是俄国的儿子。中国有它自己的革命传统，但中国革命没有十月革命也不能胜利，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能胜利。苏联的经验要学。普遍真理要遵守，这就是《莫斯科宣言》里所写的那九条[12]。要学习所有的经验，正确的经验要学，错误的经验也要学。错误的经验是：斯大林的形而上学、教条主义。他不完全是形而上学，有一部分辩证法，但大部分是形而上学。你们叫做个人崇拜，是一个东西。斯大林很爱摆架子。我们支持苏联，但错误的东西不支持。关于和平过渡问题，我们没有公开谈，报上没有讲。我们很谨慎，也未公开批评你们，采取了内部交谈的办法。我去莫斯科以前，和你谈过。在莫斯科期间，由邓小平同志谈了五条[13]。今后，我们也不准备公开谈，因为这对赫鲁晓夫同志不利，应该巩固他的领导。我们不谈，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些意见不是真理。在国家关系上，我们两国是团结一致的。这连我们的敌人都承认，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只要是不利于苏联的，我们都反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对苏联的进攻，在大的问题上我们都反对。苏联也是这样做的。苏联人从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中国人的呢？从打朝鲜战争开始的。从那个时候起，两国开始合拢了，才有一百五十六项[14]。斯大林在世时是一百四十一项，后来赫鲁晓夫同志添了好多项。我们对你们是没有秘密的。我们的军事、政治、

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一千多个专家在我们这儿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但在我们的关系中，也有过问题，主要与斯大林有关。有三件事：第一，两次王明路线[15]。王明是斯大林的后代。第二，不要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第三国际[16]已经解散了，还下命令，说你们不与蒋介石讲和、打内战的话，中国民族有灭亡的危险。然而我们并没有灭亡。第三，我第一次去莫斯科时，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17]就向我进攻。为什么当时我请斯大林派一个学者来看我的文章？是不是我那样没有信心，连文章都要请你们来看？没有事情干吗？不是的，是请你们来中国看看，中国是真的马克思主义，还是半真半假的马克思主义。你回去以后说了我们的好话。你对斯大林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国人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斯大林还是怀疑。只是到朝鲜战争时才改变了他的看法，也改变了东欧和其他各国兄弟党对我们的怀疑。这种怀疑是必然的：“第一，你们反王明；第二，不要你们革命，你们非革命不可；第三，到莫斯科要斯大林订条约，要收回中长路，那么神气。”在莫斯科，科瓦廖夫[18]招待我，费德林[19]当翻译。我发了脾气，拍了桌子。我说，我在这儿有三个任务：一、吃饭；二、睡觉；三、拉屎。军事学院有个苏联顾问，在讲战例的时候，只准讲苏联的，不准讲中国的，不准讲朝鲜战争的，只准讲苏军的十大打击。让我们自己讲讲嘛！他连我们自己讲都不让。我们打了二十二年仗嘛！在朝鲜还打了三年嘛！请军委把这个材料搜集一下，交给尤金同志，如果他说的话。有些事情我们没说，怕影响中苏关系，尤其是在波、匈事件的时候。当时波兰要赶走你们的专家，刘少奇同志在莫斯科建议你们撤走一部分，你们接受了，波兰人就高兴了，说他们有自由了。那时我们不能提专家问题，怕你们怀疑我们利用这个机会赶走专家。我们不赶，即使有十个波兰赶，我们也不赶。我们需要苏联的帮助。我劝过波兰人，要学习苏联，劝他们在反教条主义以后，提出学习苏联的口号。学习苏联，对谁有利？对苏联有利，还是对波兰有利？这首先对波兰有利。我们要学习苏联，但首先要考虑到我们自己的经验，以我们自己的经验为主。有些苏联顾问，任职可以定个期限。如在我国军事、公安两个部门的首席顾问，一直没有个期限，换来换去，也不通知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意见。好比说派大使吧，你尤金走了，派另外的人来，如果不和我们商量，能行吗？这种做法是不对的。你们派到我们公安部门的顾问，

坐在那里，如果中国人不告诉他情况，他能知道个什么？我劝你们去各省跑跑，与人民接触，多了解情况。我同你谈了多次，如果不是一万次，也有一千次了。苏联专家中大部分人基本上是好的，个别人有些缺点。我们过去也有缺点，没有主动多向苏联同志介绍情况。现在要克服这些缺点，采取积极的态度。这次就向他们介绍中国的总路线，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多次。这些话，都是由于搞核潜艇“合作社”引起的。现在我们决定不搞核潜艇了，撤回我们的请求。要不然就把全部海岸线交给你们，把过去的旅顺、大连加以扩大。但是不要混在一起搞，你们搞你们的，我们搞我们的。我们总要有自己的舰队。两把手不好办。打起仗来情况就不同了，你们的军队可以到我们这儿来，我们的军队也可以到你们那儿去。如果在我们这儿打，你们的军队也应该听我们的指挥。如果在你们那儿打，我们的军队比你们少的话，也应该听你们的指挥。我这些话很不好听，你们可以说我是民族主义，又出现了第二个铁托。如果你们这样说，我可以说，你们把俄国的民族主义扩大到了中国的海岸。取消四个合营公司、撤销旅顺基地的是赫鲁晓夫同志。斯大林在世时，要在我们这儿搞罐头工厂。我回答他说，你们给我们设备，帮助我们建设，全部产品都给你们。赫鲁晓夫同志夸奖了我，说我回答得好。但为什么现在又搞海军“合作社”？你们建议搞海军“合作社”，怎么向全世界讲话？怎么向中国人民讲话？你们可以训练中国人，同帝国主义斗争，你们作顾问。否则，旅顺，不仅旅顺，可以租给你们九十九年。搞“合作社”有一个所有权问题，你们提出双方各占百分之五十。你们昨天把我气得一宿没有睡觉。他们（指在座的其他中国领导人）没有气，我一个人有气。如果犯错误，是我一个人。（周恩来：这是我们政治局的一致意见。）这次没谈通，可以再谈，可以每天向你谈一次。不行，我可以去莫斯科同赫鲁晓夫同志谈，或者请赫鲁晓夫同志来北京，把一切问题都谈清楚。（彭德怀：今年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同志给我打来一个电报，要求在中国海岸建设一个长波雷达观测站，用来在太平洋指挥潜艇舰队，需要的费用一亿一千万卢布，苏联负担七千万，中国负担四千万。）这个问题和搞海军“合作社”一样，无法向人民讲，向国外讲，政治上不利。（彭：彼得罗舍夫斯基[20]，在作风上也很粗暴。他对我们的建军原则，对我们个别地方不采用苏军条例，很不满。在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福建军区的叶飞[21]同志说，福建到处是山，苏军的练

兵条例不完全适用，因为苏军条例主要是按平原的条件制定的。彼得罗舍夫斯基听了很不满意当时就说：“你污辱了伟大斯大林所创造的伟大的军事科学。”他这样一说，会场的气氛很紧张。） 上面这些事，有的过去讲了，有的没有讲。你们这样大力地帮助我们，而我们又讲你们的坏话，可能使你们难过。我们的关系，就好像教授与学生的关系。教授可能有缺点，学生是不是要提意见？要提，这不是要把教授赶走，教授还是好教授。 你们就帮助我们建造核潜艇嘛！你们可以作顾问。为什么要提出所有权各半的问题？这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打算搞二三百艘这种潜艇。 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你可以告诉赫鲁晓夫同志，如果讲条件，我们双方都不必谈。如果他同意，他就来，不同意，就不要来，没有什么好谈的，有半个小指头的条件也不成。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一万年不要援助。但其他方面的合作还可以进行，决不会闹翻。我们还是始终一致地支持苏联。我们可以在房子里吵架。 我在莫斯科时同赫鲁晓夫同志谈过，你们不一定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你们不给援助，可以迫使我们自己努力。满足一切要求，反而对我们不利。 政治上的合作很重要。在政治上，我们拆你们的台，你们不好办；你们拆我们的台，我们也不好办。 战时，我们的一切军港、一切机场，你们都可以使用，一切地方你们都可以来。你们的地方，你们的海参崴，我们也可以去。战争结束了，就回来。关于这点，可以先订一个战时协定，不要等到战争开始时才订，要提前订。在协定里也要规定，我们也可以到你们那里去，即使我们不去，也要这样订，因为这是个平等问题。平时，这样做不行。平时你们帮助我们建立基地，建设军队。 搞海军“合作社”，就是在斯大林活着的时候，我们也不干。我在莫斯科也和他吵过嘛！ 赫鲁晓夫同志取消了“合作社”[22]，建立了信任。这次提所有权问题，使我想起斯大林的东西又来了。可能是我误会了，但话要讲清楚。 你昨天说，你们的条件不好，核潜艇不能充分发挥力量，没有前途，中国的条件好，海岸线长，等等。你们从海参崴经库页岛、千岛群岛出大洋，条件很好嘛！ 你们讲的话，使我感到不愉快。请你照样告诉给赫鲁晓夫同志，我怎么说的，你就怎么讲，不要代我粉饰，好让他听了舒服。他批评了斯大林，现在又在搞斯大林的东西。 分歧还是有的。我们的，有的你们不同意；你们的，有的我们不同意。比如，我们的“人民内部矛盾”、“百花齐放”，你们就那么满意呀！ 斯大林支持王明路

线，使我们的革命力量损失了百分之九十以上。当革命处在关键的时候，他不让我们革命，反对我们革命。革命胜利后，他又不信任我们。他大吹自己，说什么中国的胜利是在他的理论指导下取得的。一定要彻底打破对他的迷信。斯大林对中国所做的这些事，我在死以前，一定写篇文章，准备一万年以后发表。（尤金：对于中共的各项政策，我们苏共中央的态度是：中国问题怎样解决，是中国同志自己的事情，因为他们最了解情况。同时，我们认为，议论像中共这样伟大的党的政策是否正确，是轻率的、傲慢的。）只能说是基本上正确。我自己也犯过错误，由于我的过错，在战争中也打过败仗，比如长沙、土城等四次战役。如果说我基本上是正确的，我就很高兴了。只能说基本上正确是接近实际的。建立潜艇舰队的问题，这是个方针问题：是我们搞你们帮助，还是搞“合作社”，这一定要在中国决定。赫鲁晓夫同志也可以来，因为我已经去过他那里了。对于什么都不能迷信。比如，你们一位专家，根据一个院士的一本书，就说我们山西的煤不能炼焦。这样一来就完了，我们没有炼焦煤了，因为山西的煤最多嘛！

在长江大桥工作过的苏联专家西宁同志，是一个好同志。他的建桥方法，在你们国内一直没有用武之地。大型的不让他搞，让他搞个中型的嘛！中型的也不让他搞，让他搞个小型的嘛！小型的也不让搞。但是，他到我们这儿来一说，蛮有道理。反正我们什么也不懂，就请他搞吧！结果一试验就成功了，成了世界上第一流的科学工作。我没有见过西宁同志。我和建设长江大桥的很多领导同志谈过话，他们一致反映：西宁是个好同志，一切工作他都亲自参加，工作方法很好，凡事都和中国同志一起做。大桥修好了，中国同志学会了很多东西。你们当中谁认识他，请代我向他表示问候。不要在专家中，在两党和两国的关系中造成一种紧张气氛，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们的合作是全面的，是很好的。你要向使馆的工作人员和专家们讲清楚，不要说毛泽东同志提了意见，可不得了了。有些问题早就想讲，但过去情况不好，发生了波、匈事件，你们政治上有困难，不宜于讲。比如专家问题，那时我们不好讲。斯大林后来也很好了，中苏订了条约[23]，帮助了朝鲜战争[24]，搞了一百四十一项。当然，这不都是他个人的功绩，是整个苏共中央的功绩。因此，我们不强调斯大林的错误。

一九五八年七月三十一日到八月三日，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举行了四次会谈，七月三十一日，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说：

你讲了半天，还没有讲到问题的实质。你还是没有说清楚，究竟你们要搞什么。我问你，什么叫共同舰队？你们大使尤金同我们谈话，谈了五次，讲的都是共同舰队的问题。他还说到你们的黑海不行，波罗的海没有出路，北海太窄了，海参威也有危险，等等，等等。总而言之，你们很难搞大的远洋舰队。你们要在中国搞共同的核潜艇舰队。我们只要求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并没有说要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核潜艇舰队，更没有说要搞中苏两国的共同舰队。你们提出搞共同舰队，正是触犯了我们的自尊心。我们中央商量以后，提出了几个方案：第一个方案，你们帮助我们建设海军。第二个方案，共同建设共同舰队，因为不共同建设你们就不援助。第三个方案，我们撤回我们要你们帮助建设海军的请求。因为我们不同意搞“合作社”你们就不帮助，所以我们不建设海军了，不搞舰队了，不要核潜艇了。第四方案，把中国所有的海岸都交给你们。第五个方案，把旅顺大连和其他的港口都交给你们。斯大林过去在旅大这样搞过，你们想扩大，那就扩大吧。你赫鲁晓夫究竟是不是再来搞斯大林那一套？长波电台的问题好办，就是我们建，我们有，你们可以用。

一九五八年八月三日，发表《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会谈公报》。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在郑州会议上谈中苏关系问题。毛泽东说：

今年发生一连串的事情，在有些人的印象里，好像炮轰金门是我们跟苏联商量好的。其实，赫鲁晓夫在七月底八月初到中国来的时候，根本没有谈什么金门问题。如果说谈了一句也就算谈了，但是一句话也没有谈到。那次赫鲁晓夫来，主要是来吵架的，吵什么呢？他提出要搞中苏舰队，我们反对。他就迂回曲折地再三解释，还是想搞。我们臭骂了一顿，顶回去了。当时我向他提出了五个方案，其中一个方案是：你不帮助我们搞海军，硬要搞共同舰队，那么我们就不搞，索性把我们的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我们一点也不要了。当时我说我去打游击，搞点游击队。赫鲁晓夫说，你为什么要搞游击队呀！现在世界上游击队不行了。我对他说，我的鼻子都让你堵死了，海口统统都交给你了，我不搞游击队还干什么事？没有事做，我只有搞游击队。我是搞游击队出了名的。赫鲁晓夫说，这个不好。后来他就缩回去了。最后才决定发一个联合公报，吓唬帝国主义一下。其实，那次赫鲁晓夫来根本没谈金门的问题，一句话都没有谈。倒是谈了国际形势，谈了中东事件。

赫鲁晓夫回去以后，大概经过他们中央考虑，在十月间来信说，照我们意见办，帮助我们搞海军，帮助我们搞核潜艇，不再搞共同舰队了。但是，他们后来又来信提出，台湾地区比较紧张，苏方考虑要派一个导弹部队去。后来又一次提出，要派带有导弹的轰炸机和歼击机部队到福建前线去。我们给他复信，表示我们不赞成他们派空军，也不赞成他们派导弹部队。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导弹部队不能交给我们，由他们自己指挥。我们说，你不交给我们，我们就不要，不要飞机，也不要导弹部队。看来，他们还是想控制我们沿海，控制福建那个地方，跟美国在台湾驻扎美军一样。那样一来，以后我们有什么动作都得问他，像蒋介石有什么动作都要问美国一样。这些我们都不干，我们统统都给他项回去了。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七年莫斯科会议之后，中苏的矛盾加剧。一方面是意识形态分歧，两党对于国际形势，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和策略，对于对方的国际和国内政策，有尖锐的意见对立；另一方面是苏联党当时的领导仍然以老子党自居，在军事和外交上要求中国服从它的“苏美合作，主宰世界”的战略需要。

一九五七年七月二十一、二十二日毛泽东约见尤金，苏联提出中国沿海建立“长波电台”和中苏两国建立“共同核潜艇舰队”的要求。

毛泽东把这个事件看作是苏联企图控制中国的一个严重步骤。

毛泽东两次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反对苏联侵犯我国主权

谈话的重点是拒绝苏联提出的建立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

由这个问题进一步涉及到在华的苏联专家问题。

由这些问题又涉及到一些历史上的问题。

毛泽东的态度，使赫鲁晓夫感到问题严重，立即动身，秘密来华向毛泽东解释。

最后以赫鲁晓夫收回要求而告平息。

这件事再次表现了毛泽东维护国家尊严、独立自主的立场和决心。

2011年4月26日修改

第四节 中苏分歧进一步扩大

壹、本节概述

一、苏联在中印冲突问题上偏袒印度，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一九五九年二月一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1月26日至2月2日）上，毛泽东（针对赫鲁晓夫在1958年12月1日、1959年1月不指名影射攻击中国）在讲话中指出：

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的报告比二十大有进步。他在报告中讲的国际形势和对外政策，是符合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原则的。他对二十大报告中的一些问题作了修补。例如，关于斯大林问题、和平过渡问题、社会党问题，基本上还是维持了1957年莫斯科宣言的口径。

我们同赫鲁晓夫的关系，还是十个指头中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关系，就是有一个指头不同，其他九个指头是相同的。因此，对于赫鲁晓夫在二十一大的影射，我们可以暂不理睬，看看以后再说。我们之间是有分歧的，但现在不要说。

一九五九年三月十九日，西藏叛乱集团指挥藏军向解放军发动全面进攻，

一九五九年三月二十日，解放军开始反击全力平息叛乱。

一九五九年八月二十六日，中印边境发生冲突。

一九五九年九月九日，苏联塔斯社发表关于中印边境冲突的声明，责怪中国，偏袒印度。

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五日至二十八日，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一九五九年九月二十九日，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十周年大庆。

二、中苏北京会谈

一九五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是一个大庆的日子。中共中央邀请苏联等十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率领的党政代表团和日本、印度等六十个国家的共产党代表团参加中国国庆活动。在这期间，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同一些代表团进行了会谈或谈话。

十月二日，毛泽东与苏共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在颐年堂举行会

谈，中方出席的有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彭真、陈毅、王稼祥。

赫鲁晓夫是刚刚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戴维营会谈回国后不久，来到北京的。会谈时，他应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向中国领导人提出在中国监禁的五名美国犯人的问题。

毛泽东和周恩来对他说明，这五个人都是特务，他们的刑期还没有满，放是要放的，但现在不能放。

十月二日，在中苏两党会谈中，

毛泽东指出：我们赞成你访美，赞成你跟艾森豪威尔会晤。我们赞成同美国搞和平共处。美国究竟怎么样，不能看表面，应该要看美国帝国主义的本质。艾森豪威尔有阶级局限性，很难说他真正爱好和平。

赫鲁晓夫说，你们去年对金门打炮不是办法。台湾现在也不能解放，索性像苏联过去内战时期对“远东共和国”的那样处理。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同志，你把问题搞错了，你把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搞混了。一个问题是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这是国际问题；另一个是我们跟台湾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国内的问题。我们跟美国的关系问题是美国侵略我国的台湾的问题，是我们要求美国撤出台湾而美国应该撤兵的问题。至于我们跟台湾的问题，则是台湾怎样解放的问题。这个问题只能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别人无权过问。你赫鲁晓夫同志，对前一个问题有发言权，可以劝艾森豪威尔从台湾撤出一切武装力量。对后一个问题，你是无能为力的，不宜说三道四。

赫鲁晓夫又指责中国不该与印度搞坏关系，并且说，印度有一个士兵被打死，一个士兵受伤，这就证明你们不对，是你们先打死了人家的人，又把达赖放跑了，你们何必去争那么一点地方呢？喜马拉雅山下荒无人烟，争那么一小块地方有什么意思？你们才是冒险主义，狭隘民族主义。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还是要把事实搞清楚。别的事情我们不管，对有关中国的事情，我们希望苏联同志能够听听中国的意见，把事情搞清楚，预先向中国打招呼，同中国商量，再对外公开表态，这样比较好。对尼赫鲁，我们还是要同他友好，还是要团结他。我们的原则是人我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不为天下先。但是谁要欺负我们，那是不行的。谁都不行。

毛泽东、周恩来、林彪、彭真、陈毅反复地向他说明事实真相：第一，他们

越境；第二，他们先开枪；第三，他们打了十二小时之久，中国士兵才开枪的。

毛泽东还指出：这是局部的纠纷，是双方士兵打的，不是双方政府下命令打的。事先不仅我们不知道，就连我们西藏军区也不知道。尼赫鲁也是事后才知道的，现在他们知道了，是他们占了我们的地方，所以才撤出了两个地方。

可是赫鲁晓夫不顾这些事实，只咬定被打死的是印度人这一点，而责备中国。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说：“在中印边境问题上，你们做的不对，不公平，你们公开地表明了我們两党的分歧。”

彭真接着说：我们不知道你们苏联是什么原则，难道别人越境，先开枪达十二小时之久，还不还枪吗？

双方争论很激烈，措词也很强硬。快到最后，为了缓和一下紧张气氛，

毛泽东说：“声明已经发表了，不谈了，算了吧！我、刘少奇同志和周恩来同志，都说过你们的问题。但这是一小部分的问题，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之比。我们的基本路线是一致的，只是在个别问题上有分歧。现在可否还这样认为？”

赫鲁晓夫说：“我们一向是这样认为的。”

毛泽东说：“在原则问题上、个别问题上的分歧，不应该影响我们的团结。”

赫鲁晓夫说：“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中国支持了我们，而我们也支持了你们。今后还是这样的。”

这次会谈，双方最后都表示了团结的愿望，但事实上中苏两党之间的裂痕在进一步扩大。

一九五九年十月四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对于共产党人来说，更重要的教员是反面教员，像蒋介石、像日本帝国主义、像美帝国主义这样的反面教员。用反面教员来教育他，往往比我们来跟他辩论、跟他讲道理，会起更好的效果。我们目前应采取团结为重、不搞争论、冷静观察的方针，但要看到国际上出现修正主义思潮。

与赫鲁晓夫会谈后不久，毛泽东写了一首打油诗：

西海如今出圣人，涂脂抹粉上豪门。一辆汽车几间屋，三头黄犊半盘银。

举世劳民同主子，万年宇宙绝纷争。列宁火焰成灰烬，人类从此入大同。

三、毛泽东谈反修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月下旬，毛泽东离京，到达杭州后，十一月间接连开了两次小

会议论国际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一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又对中国党进行影射攻击，并且公然提出社会主义各国必须对表。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至六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国际问题，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亲笔写了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 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 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修正主义是否已经成了系统，是否就是这样坚决干下去？

可能是这样；可能还可以改变。

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

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

中苏根本利益，决定这两个大国总是要团结的。某些不团结，只是暂时的现象，仍然是九个指头与一个指头的关系。”

毛泽东列举了“一个指头”的历史事件，从一九四五年的“不许革命，但后来又赞成了”，直到一九五九年三月以来，“我们朋友与帝国主义、反动民族主义和铁托修正主义组织一次反华大合唱”。

他接着写道：

“中国将在长时期内，一方面被孤立，一方面得到世界许多共产党、许多国家、许多人民的拥护。在这种困难局面下，中国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八年内，中国完成工业体系的初步建设，完成尖端工业的初步建设；完成技术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理论队伍的初步建立；完成党与人民政治觉悟的大提高。

（或者三者都完不成，或者能完成。）

谨慎小心，摆事实，说道理。

学习苏联优点，拥护苏联一切正确主张。

反动派大反华，有两件好处：一是暴露了反动派的面目，在人民面前丧失威信；二是激起世界大多数人民觉醒起来，他们会看到反动的帝国主义、民族主义、修正主义是敌人，是骗子，是黑货，而中国的大旗则是鲜红的。

全世界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大发展在中国，这是毫无疑义的。

赫鲁晓夫们很幼稚。他不懂马列主义、易受帝国主义的骗。

他不懂中国达于极点，又不研究，相信一大堆不正确的情报，信口开河。他如果不改正，几年后他将完全破产（八年之后）。

他对中国极为恐慌，恐慌之至。

他有两大怕：一怕帝国主义，二怕中国的共产主义。

他怕东欧各党和世界各共产党不相信他们而相信我们。

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这是一种极端的主观唯心主义。他缺乏章法，只要有利，随遇而变。

苏联人民是好的，党是好的。党与人民中若干不好的作风，若干形而上学作风，若干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是历史遗传下来的。列宁早死，没有来得及改造。

这些自由主义，还有大国主义，总有一天走向反面，变得好起来。世界上一切事物没有不走向反面的。我国也将走向反面，然后又走向反面之反面，即正面。不断革命。

共产主义竞赛，不平衡是客观规律，不依人的意志而存在。对表论②是反马列主义的。提出对表论，表示了他们的极大恐慌。”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国际形势发表讲话：

第一、帝国主义的战略目的是保存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制度，消灭社会主义制度，也要消灭民族独立运动。这如同战争的目的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一样。帝国主义现在使用两套办法，一套办法是用战争手段，另一套办法是用和平手段。这就是一方面搞原子弹、导弹，搞军事基地，准备用战争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但是它打的也还是和平的旗帜。这点要看清楚。另外一套办法也是打着和平的旗帜，发展文化往来，甚至经济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的办法，从内部搞演

变的办法来消灭社会主义。帝国主义总是这样的，能够消灭就立即消灭，暂时不能消灭的就准备条件消灭之。这两套办法可以同时并用，也可以交替使用，根据对象不同采取不同的办法。机会主义、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拉拢的对象，帝国主义尽力扩大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影响，从内部通过和平演变来搞垮社会主义。

第二、赫鲁晓夫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也不完全是修正主义者。他的宇宙观是实用主义，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有大国主义，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形而上学始于斯大林。历史上我们跟苏联分歧很多。1945 年日本投降后苏共警告我们不要进行自卫战争，1959 年 10 月赫鲁晓夫在莫斯科讲我们是不战不和的托洛茨基主义，12 月 1 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党的代表大会上不指明名地攻击我们“抢先”，提出要“对表”。赫鲁晓夫这个人不是全部是错的。在国际上他还是要社会主义阵营，一直到现在仍然支援中国建设。在国内他搞农业、工业、七年规划，他还是要搞社会主义。他在和平过渡问题、中印关系问题、对美国看法问题上同我们分歧还是一个指头的分歧。这个分歧是不是会扩大到几个指头，那还得看。赫鲁晓夫有两种可能性：一种可能性是继续向严重化的方向发展；一种可能性是改变，向好的方向发展。从同赫鲁晓夫这么多次接触看，这个人不大懂马列主义，比较浮浅，不大懂阶级分析的方法，有点像新闻记者，随风转，容易变。因此，我们对待他，一方面不能不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又不要太认真了。他有时候说话是冲口而出。当然这也反映他本质的一个方面。现在两种可能性都存在，但应该相信他的错误到头来是会被纠正的，应该有这个信心。最好是他自己来纠正，如果自己已不能纠正，那么苏联党内会有力量来纠正他。我们应该保持这种革命的乐观主义。第三种可能，可能要坚持一个长时期，例如十年以上；第四种可能，可能只坚持一个短时期，例如一、二、三、四年。赫鲁晓夫如果不改正，几年后，可能是八年之后，他将完全破产。

第三、我们的方针应该怎么样呢？我们现在的方针是硬着头皮顶着，在一个时期不批判他们。对他们好的、正确的、先进的经验，我们要好好学。对他的言论、行动，凡是正确的、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有利于世界和平的、有利于民族解放运动的，我们就支持、拥护；否则我们就反对，但也不要马上就反对，要等一个时期看，不能跟着他走。我们的方针还是以团结为重，很难想像两个社会主义大国闹分裂，不可能，也不应该，应该有这样的信心和决心。

第四、现在国际上反华浪潮来势汹汹，其中有美帝国主义，有民族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反动派，也有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者。闹得特别凶的、表现特别积极的、态度特别恶劣的，就是南斯拉夫党，这是不足为怪的。从一定意义上讲，这次反华浪潮也是好事，一来可以暴露他们的反动面目，二来可以激发各国人民的觉悟。应该看到，这种反华现象是因为我们坚持原则、坚持维护马列主义纯洁性、坚持独立。我们自己要心中有数。我们应当尽快把我国的独立工业体系建设起来，尽快建设我们自主的方针，这必然会遇到国际上各种各样反动势力的反对。对于这种必然性，我们应该加强党内的团结，首先是一万多高级干部的团结。

贰、本节简论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毛泽东关于国际形势的提纲和讲话，分析了帝国主义的对外战略方针和基本原则；批评了赫鲁晓夫的对外政策及其对中国的态度；历数了中共同苏共之间，特别是自一九五六年起同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中苏之间的分歧，后来继续扩大，演变成为中苏两党公开论战以至中苏关系严重恶化。但此时毛泽东仍认为这些分歧，这些不团结，只是“一个指头的问题”（毛泽东十月二日与赫鲁晓夫会谈时，也反复指明了这一点）；对赫鲁晓夫的政策如何发展没有说死，还要看。毛泽东对全世界的和对中国的发展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就全世界而言，“极为光明。乌云越厚，光明越多”；就中国而言，将在八年内相当强大起来。

这个提纲和讲话，集中地反映了毛泽东这个时期对国际形势的基本看法和基本估计，其中有一些观点，是具有长远和战略意义的。

2011年4月27日修改

第五节 纪念列宁诞辰九十周年的三篇文章发表

壹、本节概述

一、分析赫鲁晓夫的发展前途

一九六〇年一月七日至十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大家讨论：赫鲁晓夫的前途怎么样？他可能发生什么变化？大家认为，有几种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是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继续滑下去。这种可能性很大，但目前看来还不能定论。

第二个可能是有所改变，就是碰了钉子以后，他不得不作些改变。

第三个可能是根本的改变。这个可能看起来也比较小。

第四个可能是赫鲁晓夫完全变成修正主义，公开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完全投到美国的怀抱里面去。这个可能性也比较小。

毛泽东着重分析了这种可能性，他说：这种可能性不太大，但是也存在这种可能性，不是完全没有。帝国主义一方面拿着核武器，扩军备战，另一方面又搞糖衣炮弹。他们采取一硬一软的两面手法，目的都是为了把苏联搞垮。赫鲁晓夫手里也有核武器，是惟一能在战略上与美国抗衡的大国，他是有所依恃的，不会轻易向美国俯首称臣。同时，修正主义者又是实用主义者，在美国糖衣炮弹面前，又很容易为了局部的暂时的利益而牺牲整体的长远的利益，可能会变来变去。修正主义不是偶然现象，有一定的社会原因，但是，赫鲁晓夫的所作所为，也受各种社会条件的制约：

首先，美国不会照赫鲁晓夫的想法去做。虽然它们都讲不要妨碍赫鲁晓夫，不要损害他的地位，但是要帝国主义完全按照赫鲁晓夫所想的那样让步，那是做不到的。

其次，在苏联内部，因为长期受列宁思想的影响，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还是相当多的，十月革命到如今已经 40 多年，要改变这种传统思想是不容易的。

第三个因素，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党还是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不会完全听任赫鲁晓夫为所欲为的。赫鲁晓夫自己也有所顾忌，即使他想同帝

国主义搞某种妥协、让步，在帝国主义面前退让，也是不敢贸然从事或者做得过分的。

第四个因素，是民族独立运动还要继续发展下去。赫鲁晓夫要削弱这个运动，要被压迫民族不革命，服从他的指挥棒，也跟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搞妥协，这是很困难的。这也不能不影响赫鲁晓夫的政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我们党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对赫鲁晓夫不能有所影响，不能不有所制约。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大国，我们党对赫鲁晓夫的影响就不同于一般的小党。这不是大国主义，这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力量。

这样一来，一方面是革命力量对他的制约，另一方面是革命的敌人——帝国主义和资产阶级反动派这些反面教员的作用，也是不可低估的。这些反面教员是不会按照赫鲁晓夫的指挥棒和他的想法去做的，是不会满足赫鲁晓夫的要求的。赫鲁晓夫在革命力量面前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在反革命面前也可能碰得头破血流，大搞修正主义是没有好下场的。世界形势的发展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以赫鲁晓夫的意志为转移。

在会议的最后，毛泽东发表了五点系统的意见：

1、这次会议只在一个问题上做决定，就是决定 1960 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其他问题，关于国防战略问题，关于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问题等等，都是交换意见，都不做决定。

2、大家还是要读书，要组织省、市、自治区的党委学习苏联出版的两本书，一本是《政治经济学》，一本是《哲学原理》。读这两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把苏联的观点搞清楚，特别要从理论上搞清楚。这两本书不能说完全没有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还不少，但是也不能说它基本上是马克思主义。

3、国内的形势是好的。如果能在国际上发生什么影响的话，主要靠我们自己把国内的工作做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把事情办好。现在人家不大相信我们，这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我们搞大跃进、人民公社才在摸索。我们对人家的意见不能大骂一顿了事，更不能打仗，要靠我们把国内的工作做好。

4、国际形势是好的。世界人民一天天觉悟起来。还有一点应该估计到，就是苏联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军事上是强大的。因为有这么一个重要因素，加上全世界各国人民和各国共产党的共同努力，世界大战现在是打不起来的。在这一

点上，赫鲁晓夫是做了好事的，这是应该肯定的。赫鲁晓夫访美缓和了紧张局势，帝国主义现在不敢打大战，这一方面是好的。但是，另一方面他给美国擦粉，给艾逊豪威尔擦粉，这一点是不好的。赫鲁晓夫不是利用好的形势来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而是给人家擦粉。当然，帝国主义也给赫鲁晓夫擦粉，也说他的好话。双方都擦粉，但是比较起来，讲原则的还是西方国家，还是艾逊豪威尔他们擦粉是有分寸的，不是像赫鲁晓夫那样把艾逊豪威尔捧上天。赫鲁晓夫想控制我们，控制不行就整我们。他整了我们几下。我们党历史上受过多次整，也习惯了。挨整挨得多了也就不怕了。我们顶了他，结果还是顶住了。我们对苏联，包括对赫鲁晓夫本人，我们的政策还是团结的政策，这是我国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世界人民根本利益所在。两个社会主义大国要团结。赫鲁晓夫虽然有缺点，但还是应该团结，而且是可以团结的。斯大林不是也整过我们吗？但是还是可以团结的。当然这两个人不能相提并论，但可以对赫鲁晓夫做工作。有关南斯拉夫的问题，我们给赫鲁晓夫写了一封信，讲明对南斯拉夫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他还是听了。有些事情可以事后给他讲，有些事情也可以事先给他讲。赫鲁晓夫很快就要访问印度，他很可能要插手中印边界问题。这对我们不利，对苏联也不利。所以应该通过外交部告诉他们，叫他对尼赫鲁讲，要同中国协商解决问题。中印之间的问题我们不要别人来调停，我们跟印度直接打交道，直接协商解决问题。赫鲁晓夫是不是系统的机会主义？这个问题我们暂时不做结论为好，因为赫鲁晓夫这个人善变。我们要看几年，他也要看我们。他有两怕：一个怕我们搞得他过不去，在这一点上我们需要照顾照顾；再一个怕我们给他戴机会主义的帽子，这一点我们现在不能说他是机会主义，更不能公开说。其实，我们和他的分歧是一个指头的事情，或者是一个小指头的事情，其他九个指头还是相同的。苏共还是好党，这个大前提现在还是应该肯定的。但不同的一个指头也要用正面讲道理的方式公开说清楚，可以用阐明《莫斯科宣言》的方法，把我们的一些观点明确地讲清楚。原则上我们要鲜明，但具体问题上要策略一些，不要把话讲绝，要留有余地，要谨慎。对有些原则问题、理论问题，我们要讲就公开讲，不要放暗箭。赫鲁晓夫现在不断地放暗箭，他越放越对他不利。应该公开讲清楚帝国主义本性难移，它的策略可以改变，但是它要消灭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目的是不会变的。它要消灭一切革命力量，对这一本质问题要讲清楚。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在这

个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赞成缓和紧张局势，我们赞成和平共处，但是我们不赞成给帝国主义涂脂抹粉。正面讲道理时不要同苏共、赫鲁晓夫公开争论，不点他们的名，不引用他们的讲话，但可以引用南斯拉夫人的讲话，用批评南方的观点的形式讲清道理。

5、面对反华浪潮，我们要坚决顶住，也能够顶住。我们要准备顶它十三年。因为我们离开延安到现在整整十三年，我们再顶它十三年，分三步：第一步顶三年，第二步顶五年，第三步再顶五年。不要有顾虑，要准备出大乱子。大不了再回到延安。这一点我跟民主人士也讲了，大不了再从头来。我就不相信我们革命不成，一定会成的，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赫鲁晓夫也是能顶的，顶了他就缩回去了。我们的总方针是团结的方针。我们全国要团结，同苏联要团结，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要团结，同世界力量要团结。当然，同赫鲁晓夫也要讲团结，就是又团结又斗争，目的还是要团结他们反对帝国主义。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土壤，战争终究要在帝国主义消灭以后才能够说是可以避免的。在这个根源没有消灭之前，不能说是可以避免的。我们不要怕形式上的孤立，这种孤立是暂时的、形式上的。全世界绝大多数人民还是拥护我们的，拥护的人是会越来越多。这是因为我们的事业是符合他们的利益。

会议决定，要充分批判南斯拉夫的修正主义，要高举马列主义的旗帜。

会后指定中央宣传部组织起草文章，批评南斯拉夫党的错误观点，正面阐述与当前国际形势密切相关的若干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纪念列宁诞辰 90 周年时发表。

二、赫鲁晓夫提高反华的调门

一九六〇年二月四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首脑会议上放肆攻击中国和毛泽东，一次是围绕中印边界问题，一次把矛头直接对准毛泽东。

他说，有人要以苏联为首，可是“为首”能给什么呢？既不能给面包、黄油，又不能给道义、政治支持。共产主义只是一种形式，内容就是面包、黄油。如果一个老头子不明智，等于是一双破套鞋，实际上是摆在那个角落里当废品，没有用处。

一九六〇年三月初，政治局会议决定：要收集列宁有关帝国主义、战争与和平、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等问题的文章编成小册

子，并撰写文章，在列宁诞辰 90 周年的时候发表。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会议前两天），毛泽东在我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发回的电报上的指示：《关于反华问题》：所谓大反华，究竟是些什么人，有多少人呢？不过是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一些国家的反动派和半反动派，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和半修正主义分子，以上三类人，估计总共只占全人类的百分之几，例如说百分之五吧，最多不过占 10%。而有 24 倍 3000 万人是拥护我们的，或者是不反华的，或者是暂时被敌人欺骗对我们表示怀疑的。如同 1949 年以前在中国发生的情形一样，国民党制造谣言，说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多数人不相信，一部分人表示怀疑。巴基斯坦的情况，就是这样一种情况。印度的情况也是如此，真正反华的，不过是一小撮人。在新德里展览的农业馆，在所谓的大反华空气中展出，到中国馆参观的人民群众达 350 万之多，超过任何国家的农业馆。

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三、二十四日，毛泽东主持在天津召开会议，讨论了中苏关系等问题。

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劝同志们，对西方国家的帝国主义分子，其他国家的反动分子半反动分子，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修正主义分子半修正主义分子，对于所有这三类分子，要有分析。第一，他们人数极少。第二，他们反华，损伤不了我们一根毫毛。第三，他们反华，可以激起我们全党全民团结起来，树立雄心壮志，一定要在经济上和文化上赶上并超过最发达的西方国家。第四，他们势必搬起石头打到自己的脚上，即是说，在 90% 以上的善良人民面前，暴露了他们自己的丑恶面目。他们反华，对于我们来说，是好事，不是坏事，证明了我们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证明了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错。对于他们说来，是坏事，不是好事，是他们的不祥之兆。蒋介石一反共，他就倒霉了，1946 年全力大进攻，只有三年半，他就被人民打垮了。这件事是人人明白的。现在的外国人反华，不过空口骂我们几句，并没有动手打。假如他们要动手打我们的话，也一定逃不脱蒋介石、希特勒、东条英机的结局。他们不是反华，而是拥华、亲华，称赞我们，给我们讲好话，那将置我们于何地呢？各国坏人半坏人反华，不是每天都反，而是有间歇性的，有题目可借的，例如西藏问题和中印边界问题，他们就反一阵。这个题目也不能永远借来反华，因为他们理亏，90% 以上的人不相信他们的话，

每天反下去，他们就越站不住脚。美国和我们的仇结得大一点，但也不是天天大反其华，也有间歇性。其原因也是因为无理由地天天大反，听众感觉讨厌，市场缩小，只好收场。过一个时期另有新题目可借，再来掀动反华。不但现在有较小的间歇性，而且将来会有较大的间歇性，看我们的工作做得怎么样。我劝同志们利用巴基斯坦这件材料，想一想我们的任务，想一想我们的工作，想通这个所谓大反华问题的性质和意义，做出充分的精神准备，准备着世界上有 10% 左右的人长期地，但是间歇性地反对我们。所谓长期，至少要打算十年。甚至会有整个 20 世纪的后 40 年。如果给我们 40 年的时间的話，那时候世界情形将起大变化——总之，一切问题的中心在于我们自己的团结和自己的工作都要做得好。

三、发表纪念列宁的三篇文章

一九六〇年四月初，邓小平主持书记处会议讨论三篇文章初稿，确定了文章的主要内容和分工。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发表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陆定一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

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的基本内容：

中国人民在纪念列宁的时候有三个方面的任务：一个是建设社会主义，一个是争取世界和平，一个是团结国际友人。争取世界和平就需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现阶段，帝国主义还是在继续执行它的侵略和战争政策、扩军备战政策。继续维护和平，首先要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进行斗争。要团结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力量，首先是团结社会主义阵营，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战争政策。

陆定一在列宁诞生九十周年纪念大会的讲话《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的基本内容：

列宁的精华就是列宁的革命精神。

列宁的革命精神突出地体现在他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中。修正主义由害怕战争进而害怕革命，由自己不想革命进而反对人家革命。

现代修正主义是帝国主义政策的产物，它们被帝国主义的核讹诈政策吓破了胆，自己害怕战争，也害怕革命，害怕由革命引起战争。它自己不想革命，也反

对人家革命，既反对资本主义国家人民革命，也反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革命。

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的基本内容：

当前的时代并没有变，虽然新技术的发明、核武器的出现具有重大意义。

现在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列宁主义并没有过时。

列宁主义关于暴力、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的理论、关于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的区别的理论，没有过时。

要坚持列宁主义的旗帜，坚持列宁的革命学说。

一九六〇年四月二十六日，文章发表以后，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说，帝国主义反华有它的间歇性。一个战役和一个战役之间应该有间歇，这是军事学上的一般原理。那么，在政治斗争中也有这个问题，不能老是紧张下去，天天都那么斗，应该有个间歇，波浪式的发展。一张一弛，文武之道。应该停一个时期，看看各方面的反应，无论是美国的或是苏联的，都要看看他们有什么反应。人家反华有间歇性，我们反美反修也要有间歇性。但是，我们要充分准备，准备在十年或者更长的时间内这样的斗争反反复复、打打停停。

贰、本节简论

如果说把一九五六年发表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两篇文章，算作是公开在报刊上进行反修斗争的第一波，那么，一九六〇年发表的这三篇文章，就可以算作是公开在报刊上进行反修斗争的第二波。

三篇文章中涉及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

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问题；

争取世界和平与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

现代修正主义与帝国主义关系问题；

暴力、革命、战争与和平的关系问题；

和平共处和和平过渡的区别问题，等等。

搞清楚这些问题，仍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011 年 4 月 27 日修改

第六节 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公开论战

壹、本节概述

一、四国首脑会议破产

一九六〇年五月一日，美国 U-2 飞机侵入苏联领空。苏联政府向美国提出抗议。

一九五九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在会见日本等四国访华代表团时，肯定苏联做得很正确。他说：“这件事再一次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在虚伪和平的幌子下所进行的准备侵略战争的真面目，进一步向全世界证明了这样的真理：对帝国主义不应当存有不切实际的幻想。曾经有些人把艾森豪威尔说成是一个十分爱好和平的人，我希望这些人能够从这样一些事实中觉悟起来。”

毛泽东说的“这些人”，就是指赫鲁晓夫以及国际共运内部与赫鲁晓夫持相同观点的人。

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还谈到首脑会议。对首脑会议的看法，中共与赫鲁晓夫之间存在分歧。赫鲁晓夫把解决世界和平问题的希望全部寄托在大国首脑会议上；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则认为，解决世界和平问题，大国首脑会议固然有重要作用，但主要是依靠各国人民的斗争。毛泽东说：“我们支持首脑会议的召开，不管这种会议有无成就和成就的大小。但是世界和平的取得，主要应当依靠各国人民的坚决斗争。”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六日，赫鲁晓夫飞抵巴黎准备参加四国首脑会议，但又声明美国必须就入侵事件公开道歉。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七日，艾逊豪威尔断然拒绝赫鲁晓夫的要求，四国首脑会议流产。对赫鲁晓夫的强硬态度，毛泽东认为是好的，说在这件事情上，赫鲁晓夫做对了。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在全国各地举行群众集会，支持苏联对四国首脑会议的立场。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召开 120 万人参加示威游行的群众大会，支持苏联。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日到达杭州，毛泽东在这里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会谈。金日成是因四国首脑会议流产而来同中共中央交换意见的。四国首脑会议的流产，在世界上引起震动，时局骤然紧张起来，国际共运内部也出现一些思想混乱，甚至有人说这是“大战前夜”。金日成特地想来听听中共中央的意见。中方参加谈话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柯庆施、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王稼祥、杨尚昆、江华。

在谈到赫鲁晓夫的对美政策时，金日成说了这样一个情况：赫鲁晓夫一九五五年就叫他们不要反对美帝国主义。

毛泽东说：“美国在巴基斯坦、土耳其、西德、英国、法国、意大利、希腊都有军事基地。去年十月三日，赫鲁晓夫在中国放了一炮，说我们不应该拿武器去试验资本主义政权是否稳固。他在匈牙利党代表大会上骂我们不战不和是托洛茨基。五月一日苏联打下美国间谍飞机，五月二日艾森豪威尔就说U-2飞机是他派的，而且说今后还要派，逼得赫鲁晓夫再无考虑余地，这才下决心。我们开群众大会支持苏联，这样可以迫使美国规矩点。”

毛泽东说：“意大利共产党说，大战就要爆发了，陶里亚蒂他们悲观起来了。当然，也有可能打起来，但是，英、法不愿意打，西德、日本还没有武装好，此外，还有拉丁美洲和非洲人民的斗争。我看不必悲观，自然也要警惕。”

一九六〇年五月二十一至二十二日，在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关系，一种是战争，即帝国主义发动大战，双方处于战争状态；另一种情况是比较缓和，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若和平共处，不是没有纠纷，没有冲突，只是表现为比较缓和的形式。除了这两种情况外，还有一种情况是冷战共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多数时间是冷战共处，双方剑拔弩张，有局部战争，如朝鲜战争，印度支那战争，中东战争等，但没有打起世界大战。冷战共处的形势也不是一直很紧张，有时高一阵，有时低一阵。我们的方针是争取缓和，同帝国主义和平共处，即使冷战共处也比打大仗好。我们能争取10年、15年也好，更长的时间更好，使我们能把我国的建设搞好。第二次世界大战到现在已有14年，这是两次大战中的间歇期，也就是冷战共处时期，这个时期延长的得越久对我们越有利。

赫鲁晓夫这个人有两面性，你看，去年他在开戴维营会议后把艾逊豪威尔捧上天，这次为了 U-2 飞机事件，他们两人对骂起来了。很难设想强大的社会主义苏联的首脑会一下子向美国总统下跪。但应该看到，赫鲁晓夫以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基本想法没有变，他这次以强硬的姿态同艾逊豪威尔对抗，实在是因为美国派 U-2 飞机入侵苏联，把赫鲁晓夫置于非常难堪的地位。他只能强硬对待，不能示弱，否则对苏联人民交待不过去，对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和世界人民交待不过去，他要垮台。无论如何，这次他做了好事，我们应当大力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百万人民群众示威游行做得好。理应如此，我们是识大体顾大局的。

我们的文章有影响，但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很难说影响有多大。对赫鲁晓夫，正面教育可以起点作用，但有限，他至今仍说 1957 年 1 月间总理给他们“上大课”，仍耿耿于怀。对他能起较大作用的是反面教员，像艾逊豪威尔、阿登纳这样的人。从这两年间的情况来看，赫鲁晓夫在重大问题上，他的倾向是修正主义的，但也不好说他在所有问题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不好说他的修正主义已经完全形成了。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是半修正主义。赫鲁晓夫是一个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而且是一个不甚高明的资产阶级式的政治家，同这个人相处比较困难。我们从他搞掉贝利亚、莫洛托夫、马林科夫，现在又搞掉伏罗希洛夫，连波斯别洛夫这样一个书生也容不下了，都要排挤，同此种人怎能共事呢？至于中苏关系，时好时坏，反复无常，不好相处。这个人不可信赖。他和我们签订了原子技术合作协定，他突然单方面撕毁了。就是说，他想怎么干就怎么干，不讲什么条约、协议，是很难信赖的人。当然，他做得对的，我们还有是表示支持；做得不对的，我们就要反对。现在是内部批评，不公开指名骂他，用今天正面表态的办法讲道理。将来说不定要公开批评，但我们绝不天下先。

二、布加勒斯特会议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日，苏共中央建议举行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
一九六〇年六月十日至十八日，在上海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

这次去布加勒斯特开会，要做两手准备，一是要准备他们整我们，二是要准备他们拉我们。拉我们好办，无非是要我们多支持少批评，我们本来是采取团结为重的方针。要充分做好思想准备的是他们要整我们，把开不成首脑会议的气都撒到我们身上，组织对我们的围攻。谚语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

保持高度警惕并做好充分准备没有坏处。首脑会议流产后，苏联报刊宣传的还是老一套“三无世界”之类。这次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苏方代表团态度恶劣，值得我们警惕。代表团应该采取的方针，可以归纳为六句话，即：坚持团结，坚持原则，摸清情况，后发制人，据理辩论，留有余地。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二日，彭真率领的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与赫鲁晓夫的会见，持续六个小时，大部分时间是赫鲁晓夫对中共进行猛烈指责。赫鲁晓夫信口雌黄，破口大骂：你们搞大跃进，可是人民没有裤子穿，穷得要命。你们搞百花齐放，现在怎么样，还放不放？你们那么爱斯大林，你们把斯大林的棺材搬到北京去好了。我们可以送给你们，你们老讲东风压倒西风，就是你们中国想压倒大家，要压倒全世界。中印冲突完全是你们造成的。我们发表一个声明保持中立，是帮助你们而不是反对你们，现在你们跟印尼关系也搞坏了，责任也在你们。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苏共代表团交给中共代表团一封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所署日期为六月二十一日，通篇内容是反驳《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的观点。他们还把这封信改为《通知书》的形式，提前在二十一日散发给到会的其他党代表团。二十三日这一天，苏共又送来一份关于公报的稿子，说是准备二十四日开会讨论。因此，会议开始前，空气已十分紧张。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三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我们跟苏共的共同点不是越来越多，而是越来越少。因此要估计一下这次会晤会怎么样发展，会不会破裂，是不是破裂不可避免。依我看，彼此都不想破裂，我们本来就不想破裂，看来苏共也没有那么大的决心敢于破裂。上海会议时有同志提出，要赖着跟他团结，不搞破裂。但是，我们也要想到，破裂也不要怕，也要做这个准备。只要你不怕，才可以争取到不破裂。立场是要坚持的，但在什么场合讲什么话，要注意方法，态度要诚恳。人家不同意的，我们不强加于人，让历史来裁判。究竟怎么样，要看这几天的发展，要给我们代表团打招呼，要他们准备受围攻，还是临走的时候中央交待的原则，后发制人，留有余地。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六日，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团举行会晤。一些国家的党攻击中国，一些国家的党（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不赞成这样开会。赫鲁晓夫又一次对中共进行激烈的攻击，涉及中国内政、外交各个方面。彭真给予反击，单批评赫鲁晓夫，着重批评他说帝国主义跟过去不一样，

批评赫鲁晓夫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彭真提出：原先苏共给我们的来信，只讲“会晤”，没有讲发表公报的事，我们对公报有些意见，请考虑修改。赫鲁晓夫立刻表示，不能修改，而要中共代表团在会议公报上签字。代表团请示中央。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下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我们打的是反包围，赫鲁晓夫对我们搞突然袭击，预先布置好了包围圈，是骗我们到布加勒斯特去的。他6月2日的信是他下决心要对我们施加压力。6月7日的信是一个骗局，骗我们说不开正式会议，在布加勒斯特只是“会晤”，只对会议的日期、地点和会议的内容交换意见。这完全是撒谎。看来他们的《通知书》早准备好了，临时写是不会这么长篇大论的，一共有五六十页，说明他是准备好对我们实行围攻。这个《通知书》就是对我们发起围攻，拿这个《通知书》来武装跟随他们走的喽罗。现在我们跟赫鲁晓夫的分歧，根本的问题是全世界除社会主义国家以外的三分之二的人民要不要革命的问题，属于社会主义国家三分之一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这是两条路线分歧的根本问题。赫鲁晓夫是代表老板阶级，代表资产阶级，不要革命，不要继续革命，不要共产主义。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赫鲁晓夫擅自把会议扩大到五十一个党，对中共代表团进行围攻。

由于中共代表团不断地、及时地把布加勒斯特会议情况报告国内，中共中央对会议的进展情况了如指掌，及时地给代表团指示，所以代表团的斗争进行得很成功。经中共中央同意，中共代表团在公报上签了字，同时发表了一个声明。

一九六〇年七月六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布加勒斯特会议这场斗争是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是人家准备好向我们“围剿”，而我们中央委员只去了三个人，搞反“围剿”。不管赫鲁晓夫是怎样一个庞然大物，我们还是把他顶住了。现在反“围剿”告一段落。下一回合是十月革命节时召开世界兄弟党会议。我们现在要静观一个时期，暂时不公开发表跟他论战的文章，看他还有什么法宝拿出来。他既然下决心在布加勒斯特会议采取这么恶劣的办法企图压服我们，但没有压服得了，是不是还要压呢？估计他还要压。所以我们还要看一看，看看他还要拿出什么东西。当然，他们的《通知书》是要回答的，要统统给他顶回去，秀才们要做准备。

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新鲜

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惟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国内工作决定我们在国际上的发言权，我们要埋头苦干，把国内的工作搞好。

三、苏联撤走全部在华专家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六日，苏联政府照会中国政府，决定召回在中国工作的苏联专家。

一九六〇年七月十八日，在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说：

现在全世界反华的人最多只有 10% 的人，这里面包括反动派、半反动派、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半修正主义。90% 的人是同情我们的，因为他们要革命。尽管一个时期好像是满天乌云，全世界都反对中国，好像跟 1947 年 3 月国民党进攻延安时一样，那个时候也是满天乌云。我们不要被这种假象吓倒了。当时如果给吓倒了，那就要站在蒋介石一边去了。现在呢，从去年以来反华表面化了，就是 9 月 9 日塔斯社声明发表以后就表面化了。依我看，越表面化越好，他放毒越多越好。多行不义必自毙，“多”是数量，“毙”是质量，到一定数量以后他就垮台了。所以我们不要被暂时的现象吓倒。现在我们先把这个问题搁一搁，还是搞我们自己国内的问题要紧。

我们不要忘记苏联党和苏联人民在历史上给我们很大的帮助。现在不帮助了，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勤俭建国这个方针。非这样不可。不是可以这样，可以那样，而是非这样不可。我们既不能向赫鲁晓夫乞求，也不能向美国乞求。十月革命以后，没有什么别的国家，更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援助苏联，可是列宁就是开始领导苏联党和苏联人民进行建设。斯大林搞工业化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现在我们可能而且必须搞自力更生。这是列宁主义的道路。一国可以取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什么非要外国援助才行呢？我们要走列宁、斯大林的道路，一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此期间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说：

不管怎么样，过去我们答应买武器弹药按半价的，现在我们还是按半价还债，一个钱也不赖。经济建设的设备也一个钱不赖，欠多少还多少。因为这是苏联人

民的钱，我们要对得起苏联人民，在我们困难的时候他们帮助了我们。现在他们领导这么反华，但是钱是苏联人民的钱，还是全部还清。各地方、各部门要下决心把东西挤出来。延安时期那么困难，我们吃辣椒也不死人，现在比那个时候好多了，要勒紧腰带，争取五年内把债务还清。中国人不信邪，不怕压，也不怕逼债，就是要有这么一个志气。

一九六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苏联政府不等中国答复就通知说，在中国工作的全部苏联专家都将在七月二十八日到九月一日期间全部撤走。

当时在中国的苏联专家共有一千三百多名，分布在经济、国防、文教和科研等二百多个企业和部门。他们全部撤走，使中国一些重大的设计项目和科研项目中途停顿，使一些正在施工的建设项目被迫停工，使一些正在试验生产的厂矿不能按期投产。这对正处在困境中的中国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苏共这一举动，把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扩大到国与国的关系上，显然是为了进一步对中国施压。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日，毛泽东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答复苏联撤回专家照会的复照稿。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将复照交给苏联驻华大使馆，同时印发会议。复照指出，苏联撤回专家的行动，违反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违反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友好关系的准则，希望苏联政府重新考虑并且改变召回苏联专家的决定。

但是，苏方以毫无商量余地的态度，在短短一个月的时间内，撤走全部苏联专家，撕毁了两国间签订的所有有关协定与合同。

一九六〇年七月三十一日，在毛泽东主持下，周恩来就苏联撤走专家和外贸问题向会议作报告。

这两个问题，都是当时大家特别关心的，影响到国家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当时，在中国进出口贸易额中，对苏贸易占一半，中国主要出口粮、油、肉、蛋等农产品。由于这两年农业大幅度减产，粮、油、肉、蛋等不能按计划收购上来，对苏贸易欠账达二十五亿卢布。在赫鲁晓夫咄咄逼人、对中国采取高压政策的背景下，大家一了解到这种情况，迸发出一种勒紧腰带还债的激愤情绪。有人说，“要争口气，明年把债还掉”。有人说，“共赴国难，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毛泽东以坚定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账。”大家认为，这不仅仅是一个关系到国家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国家在国际上的声誉，关系到同现代

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问题。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日，在北戴河会议结束时，毛泽东说：

中苏关系的问题不大也不小，天不会塌下来，也不必无穷忧虑。无非是不给设备，把中国共产党逐出教门，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一风吹，对中国实行军事威胁，甚至同美国人一起来打我们，极而言之，无非如此。中国这个地方历来是不好惹的，进得来就出不去。美国人曾经说过，在朝鲜打仗是在错误的时间，在错误的地点，向错误的对象，实行错误的战略。现在再来，他要打就打嘛。中国地方大，有西南，有西北，蒋委员长就躲在那个地方，日本就打不到他。我们不相信美国就能打得进来，能够占领整个中国。应该相信苏联老百姓的 90%以上是好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也许有些人暂时被蒙蔽，但是最终是会明白过来的。也应该相信 90%的苏联专家是搞国际主义的，是好同志。我们要相信他们，要好好欢送他们。什么叫孤立呢？我们把道理讲清楚，使得人家了解了，我们就不会脱离群众，就不会脱离大多数，就不会孤立。

这次苏联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后这么迫不及待地撤退所有专家，看起来是有一种什么需要。听说苏联通过一个法律，反对领导要判六至于七年徒刑。我们对右派都没有这样做，看起来他们有些惊慌失措，所以这么着急，这么迫不及待，看来是害怕，是心虚。我们不急，无非是那么几手，要硬着头皮顶它 10 年，如果太长了，缩短五年也可以。如果五年不行，还要顶，就再顶五年。当然，我们希望时间越短越好，但是要做越来越长的准备，有长期打算，硬着头皮顶着。首先要县一级的干部知道这个道理，然后让 12 万个乡一级干部懂得这个道理。听说苏联已在全党都传达了，我们现在只传达到 12 万干部。这叫留有余地，那么急不必。苏联是急于作决议，中央全会作了决议，急于往下传达。看起来这里面有什么名堂，有什么需要，说穿了就是怕。布加勒斯特会议把我们骗去，搞了两天的突然袭击。我们要修改，他不赞成。修改一个字都不行。代表团说要请示中央，他也不赞成。世界上哪有这么蛮干的，还像共产党吗？列宁在搞第三国际的时候，开会开一个月都有的，因为有理不怕辩论，真理越辩越明。他害怕辩论急于作决议，说明他心虚，说明他有弱点。我就不相信这种状况能长久。

四、中苏两党莫斯科会议上的争论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一日，毛泽东在会见胡志明时指出：

你们是好心。你们的意见我看基本是好的。我不说它是完全好的，只说它基本上是好的。你们想要加强团结是好的。你们提出要反对以美帝国主义为首的帝国主义和它们的走狗，这是我们的共同任务，这也是好的。但是，究竟谁是朋友，谁是敌人呢？这个问题要分清楚。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跟赫鲁晓夫早就有分歧。赫鲁晓夫现在是修正主义的代表，向马克思列宁主义进攻，向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攻。对于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他们表示很亲热，同他们站在一起。

我们还是赞成采取共产党内部解决问题的办法来解决中苏两党的分歧。在内部讨论，不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其实，赫鲁晓夫早就把分歧暴露在敌人面前了。在印度挑起中印边境冲突期间，赫鲁晓夫叫塔斯社发表了一个声明，偏袒印度，谴责中国。但是我们还是不愿意把这个分歧公开化。中苏不和后果是严重的，所以我们赞成你们劝和，赞成你们当和平使者。

现在人家把我骂得狗血喷头，我去谈什么？而且，在我们党内还有很多人，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还有彭真同志，他们都可以去谈。我现在不讲话，再过一两年可能讲。赫鲁晓夫本人不知道讲了多少次话，甚至讲到要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中国来。他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对中国代表团说，中国那样喜欢斯大林，老讲我丢掉一把刀子，那么，把斯大林的遗体搬到你们那里去好了。

一九六〇年八月十九日，胡志明又从莫斯科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就在中国南海勤政殿会见了胡志明。

胡志明说，苏联方面指责中国从 1958 年起在许多事情上都不给苏联打招呼，不跟苏联商量。比方说，提百花齐放，办人民公社，搞大跃进，提出东风压倒西风、纸老虎，还要修成吉思汗陵墓，等等。他们特别抓住成吉思汗这个问题做文章。

毛泽东说：成吉思汗的陵墓是日本人破坏的。蒙古人很尊重他的祖先成吉思汗，所以把他的陵墓重修了。苏联人不也在列宁格勒重修了彼得大帝的陵墓吗？而且赫鲁晓夫还想在中国的旅顺口把日俄战争时的两位沙皇将军的塑像重新修起来，只因我们不同意才作罢。

赫鲁晓夫说 1958 年起中苏之间谈不拢的事多起来了。的确是这样，在 1957 年莫斯科会议的时候，以至早在 1953 年斯大林去世以后的一段时间内，1954、

1955 年，双方还好谈，1956 年虽有争论也还好谈，但是 1958 年起就不好谈了。他们提出 搞中苏共同舰队，要在中国搞长波电台，要派空军驻在我们的国家里，这些我们都抵抗了。就是说，他们想要控制我们，我们不受控制，他们就不高兴，就打击我们，就要整我们。实质就是这么一个问题。他们要把他们的意见强加给我们，要把我们管得死死的，要搞大国沙文主义。我们不抵抗行吗？意识形态的争论，可以争个面红耳赤，也可以从长计议，让实践证明谁对谁错。但大国沙文主义非抵抗不可，没有谈判、妥协的余地。

至于人民公社、大跃进、百花齐放，这是中国式的香肠，我们不准备向外国推销。在布加勒斯特会议期间，赫鲁晓夫都提到这些问题，惟一新的是成吉思汗这一条。赫鲁晓夫 1954 年见阿登纳的时候曾提到成吉思汗，说要提防中国的“黄祸”，可见这个人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成吉思汗是征服了俄国之后才征服中国的，并不是先在中国称王然后打到欧洲去。我们并没有这样就埋怨俄国人。赫鲁晓夫这种颠倒历史的说法很可笑。

胡志明说，他同赫鲁晓夫还谈到了中苏两党中央见面的事情。赫鲁晓夫表示同意并说苏联将尽力而为，但要看中国的态度。他还表示希望起草委员会能够开好，能够为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做好准备。

毛泽东说，会议可能开成，可能有希望，但是我们不能松懈。你们是 12 日到苏联的，14 日他们就给我们两封信，一封信提到两党见面，大家讲团结；另一封信把我们大骂一顿，是回驳我们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的声明的。看了后一封信，我很担心，究竟他们心里想些什么，会议能不能开好。看来我们得有思想准备，斗争是不可避免的。究竟怎么样答复苏联，我们中央在几天之内再讨论作决定。现在是 8 月 19 日，8 月份还有 12 天，9 月份还有一个月。他们提出 9 月 29 日或是 30 日召开起草委员会会议，看来要在这个时间之前半个月左右举行中苏两党会谈。1957 年在莫斯科的时候，我们中苏两党开了五天会，这次有半个月，时间比过去长，但是问题很多，究竟是开得好开不好，再看。

一九六〇年九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中苏两党在莫斯科会谈。中共代表团由邓小平任团长，彭真任副团长。

两党会谈共举行五次。因双方意见分歧很大，争执不下，无结果而散。代表团二十三日下午回到北京，当天晚上向政治局常委汇报。毛泽东在汇报会上讲了

一些意见。大意是：

中苏两党还是应该团结的。我们需要团结，他们也需要团结。问题是如何达到团结。我们要争取在马列主义基础上同苏共达成协议。苏共习惯于以老子党自居，不习惯于兄弟党之间进行民主讨论。这次中苏会谈有好处，你讲我也讲，不是布加勒斯特会议那种一面倒的方式。将来在世界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争取达成协议，但也不怕分裂，准备苏共要分裂。我们总的方针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

一九六〇年十月一日至二十二日，莫斯科会议声明起草委员会在莫斯科举行，有二十六个共产党代表团参加。

九月三十日，邓小平、彭真率代表团再次赴莫斯科，出席起草委员会会议，主要讨论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草案。声明草案是苏共准备的，其中有不少是影射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团将这一情况向中共中央报告。四日，接到中央指示：对苏共中央草案中的一系列错误观点，必须加以有力的反驳，然后再提出具体的对案。起草委员会经过三个星期激烈的争论，声明草案最后基本取得协议，但还有几个问题，没有取得一致的意见：（一）关于从人类生活中排除战争可能性问题；（二）关于全面肯定苏共二十大、二十一大问题；（三）关于集团活动与派别活动问题；（四）兄弟党之间关系的平等、协商原则问题。中共代表团在二十二日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上发言时，把上述问题暂时挂起来，强调团结，高举团结旗帜，以争取多数人的同情。二十四日，邓小平、彭真一行回到北京。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会议，听取他们汇报。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在 81 党莫斯科会议前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81 党会议有一番恶战，辩论会非常激烈，甚至会发展到破裂边缘，因此我们要有破裂的思想准备，但是也不一定就会破裂，仍有可能争取达成一定的协议。我们的方针应当是坚持原则，坚持团结，放手斗争，不怕破裂，以斗争求团结，力争达成一定协议。

一九六〇年十一月十日至十二月一日，八十一个党参加的莫斯科会议举行。中共代表团由刘少奇任团长，邓小平为副团长。

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初，在会见越南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这次莫斯科会议结果是好的，是协商一致，保持团结。大家都是共产党，一

定要团结，要和。终究是要和的。先和后吵，吵了又和，又和又吵，又吵又和，就是这么一个过程。

这次 81 党会议之所以开得起来是因为你做了说客。你当说客在先，后来又发起请愿，你当请愿团的团长。你是两重身份，既是说客，又是请愿团团长。

大家还是要建设社会主义，还是要反帝，天是塌不下来的。上一次我在北戴河跟你们两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们交了底。我说，没什么了不得的事情，不要怕原子弹会落下来。现在我想起我们那次谈话还有点好笑。这次又搞了一个协商一致的原则，这是最重要的。按这个原则办，不一致的就不写，不论大国、小国、大党、小党，都不能不商而强加于人。看起来还应该采取一些措施，双方都应该不强加于人。还有一点，就是我们跟苏方达成了君子协定，停止互相攻击。（胡志明说，都不要丢香烟了，即不要争吵）到某个时候还可能要丢呢，我不相信从此就不丢了，可能是丢一阵，递一阵，生活的规律就是这样。

如果他要分裂，我们有什么办法？苏共方面这次是搞的边缘政策，一步紧一步，先撤走专家，再来个经济封锁，破坏团结还不够，还画漫画，指名公开攻击中共。压的办法无非两条：一条是物质的，如经济封锁、撕毁协议等等；一条是精神的，就是谩骂。这是搞边缘政策。结果这次走到边缘又回来了。我们也是采取边缘政策，就是斗争到底。你不退让，你不接受我们的原则性意见，不拔掉钉子，我们就不签字。这就是说双方都采取边缘政策，结果双方走到边缘又回来了。也许将来又要走边缘，又回来，我们准备着。

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也有各种各样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我们要的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曾经对小平同志讲，你以后不要带棍子来（邓小平因为腿摔伤后还没有完全复元，参加会时拿着一根手杖，赫鲁晓夫在中苏两党会谈时曾提出这个问题。彭真说，小平同志的棍子是保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赫鲁晓夫很怕你这根棍子。（邓小平说，我这根棍子挨了两千次骂，有的时候一回骂十几次还不够，再骂第二回，都是指名骂我的。）你这根棍子出名了。我们党有九十几个中央委员，只有四个人出面和苏方对骂，这就是彭真、康生、胡乔木，加一个邓小平。我们党的五位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都没有出面，都没有指名批评，都留一手，更不要说我这位主席了。我现在不讲话，看他怎么样，也许几年以后我要讲话，到那时候再说。

这是生活中常有的现象。开一次重要会议只能解决当前的一些重要问题，还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各党保留着。比如，“纸老虎”，现在中苏两党无法达成协议，这并不妨碍两党团结。有一些问题还有不同意见，那就把这些问题保留下来，还是讲团结。我看这种办法还是需要的。这次会议能取得的一致意见，实现和解，比我们过去预想的要早一点。本来我们是准备十年的，现在只争论了一年。以后是不是还有争论？也可能还有争论，我们准备着。这次会议取得的第一个胜利就是明确了革命路线，第二个胜利是肯定了协商一致的原则，用说服而不是压服的办法，压服不是列宁的办法，那是对敌人的办法。

一九六一年一月十八日，在八届九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

比较起来讲，我们中央对国际情况调查研究比较充分，所以了解情况也比较充分，因此决心也比较大。开始，我就不了解赫鲁晓夫为什么那么急急忙忙要搞布加勒斯特会议，苏共中央也急急忙忙地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做决议，而且把决议下达到支部，攻击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他们用意何在。当时我曾讲过，他不这样做恐怕是考虑不好办。现在看来，他们也估计错误，认为中国共产党是可以压服的。一个是他不这样做不好办，一个是估计错误，这两个原因可能都有。因而当时赫鲁晓夫对我们非常害怕，对三篇文章非常害怕，因而不能不为维护他的权威而斗争。而我们什么都不怕，他们的文章我们登，而且把他们的文章集中起来出书，公开发行，一共发了十几万本。赫鲁晓夫说我们闹宗派活动，说我们三篇文章和小平同志 11 月 10 日的讲话是纲领。从这方面来看，这三篇文章实在好，别的党也这么讲。三篇文章出来后，赫鲁晓夫就急急忙忙搞了几手，就是搞布加勒斯特会议，搞撤退专家，搞撕毁合同等等，这就搞到国家关系上去了。他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把我们压倒。结果并不如他们所想的，而是比较合乎我们所想的。我们对赫鲁晓夫的观点有研究，比较熟悉，所以能够对付，能够取得胜利。有调查研究，有科学分析，才能情况明了，才能下决心，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正确办法。处理国际问题要这样，处理国内问题更要这样。

81 党会议成绩很大，应该说取得了伟大成果，基本上把赫鲁晓夫发动的反华攻势打下去了。当然，这个反华浪潮也有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也有来自于民族国家的反动派。印度反华，南斯拉夫也参加反华，有些党的机会主义分子也参加了。但是最主要的还是赫鲁晓夫领头，在今后还会有反华浪潮，还会有

起伏，不可能根除，因为修正主义有它的社会基础。

我们现在在党内讲团结，在国际上跟苏联要讲团结，跟社会主义国家要讲团结，跟兄弟党要讲团结。在 81 党会议上骂过我们的党，我们也要同它讲团结。我们应该有耐心等待他们自己觉悟。共产党人不挨骂就不是共产党人。不管他们怎么样，我们要采取团结的方针，这不是说要不要的问题，而是一定要采取这样的方针。同样，我们讲团结也不是说不要必要的斗争，但是不是现在这个时候。去年进行斗争是必要的，因为他们骂了我们一大堆，我们不能不反击，批评了他们一顿。马列主义中国化，他们也反对，我们无非是把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际相结合，这是一个树干和枝叶的关系，有什么好反对呢！每一种树都是不一样的，杨柳和松柏就不一样。同样是杨柳，这一棵和那一棵是有差别的。同样是松树，这一棵和那一棵都是有不同的。各国具体的历史、具体的传统、具体的文化都不同，应该区别对待，应该允许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具体化，也就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提出了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要不要继续革命的问题。

布加勒斯特会议标志着国际共运阵营分裂的升级，中苏两党之间在一系列重大原则问题上的分歧完全公开化了，中苏两党关系急剧恶化。

从六月布加勒斯特会议赫鲁晓夫发动对中国共产党的围攻，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中共采取一系列高压政策，到八十一党代表会议达成协议，圆满结束，这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方针，经过艰苦而又复杂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中苏两党的争论告一段落，出现了团结的局面。这是符合中苏两党、两国的需要，也是适应世界各党一致的要求。

但是，八十一党会议声明，毕竟是中苏两党双方妥协的产物，两党之间的分歧并没有消除，只是暂时被搁置下来了。

2011 年 4 月 27 日修改

第七节 兄弟党会议上的围剿和反围剿

壹、本节概述

一、苏共二十二大上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观点系统化

一九六一年九月，苏联公开发表苏共二十二大《苏共纲领草案》。

一九六一年九月十五日，在讨论《苏共纲领草案》的中央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总的估计，这两年我们的斗争没有能够完全拖住赫鲁晓夫，更谈不上改变他的基本立场。他是很顽固地坚持他的立场的。看来，赫鲁晓夫这样的人是代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高薪阶层，包括那些收入很高的经理、作家、科学家，当然不是所有的作家、科学家，而是一些在银行存了几十万、上百万卢布的那么一些人，他们有一本支票，可以任意从银行取钱。在苏联党的干部队伍中是有这么一个特殊阶层的。这个特殊阶层还包括社会上的盗窃集团和搞非法经营、搞黑市、投机倒把、牟取暴利的那么一帮子人，也就是社会主义社会中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这些人的思想反映到《苏共纲领草案》中。他们有权、有势、有钱，特殊于广大人民群众和一般干部。赫鲁晓夫讲的全民党是一种欺骗。现在苏联社会正在分化。要从经济上最后消灭资产阶级是很不容易的，在意识形态上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更是长时期的事情，这个任务是很艰巨的，甚至要几十年、上百年。这个高薪阶层对低薪阶层毫无人道主义，而赫鲁晓夫却大讲人道主义。其实，现在苏联社会是很难不公正的、很不人道的，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已经出现了。还有反革命分子，还有帝国主义间谍。社会主义社会这么复杂，怎么能说是一个全民国家呢？所以说赫鲁晓夫的思想是一个唯心主义的、实用主义不容辞的，或者说是主观唯心主义的。

赫鲁晓夫对兄弟党、兄弟国家就是要欺压，就是要把你压服，压而不服就整你，把兄弟党、兄弟国家当做敌人，搞颠覆，这是典型的大党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另一个方面，对帝国主义，赫鲁晓夫是怕帝国主义的，他口口声声要搞裁军、搞谈判，实际上是要争取在帝国主义的舞台上有一席之地。

赫鲁晓夫说我们是民族共产主义，说我们单干，其实我们搞的是自力更生。这也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而是学苏联的，首先是学列宁，其次是学斯大林，他

们是搞自力更生的。那个时候只有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帝国主义四面包围，他们不单干怎么办？只能单干。我们学的是他们，这有什么罪过？我们并没有要共苏联人的产，我们是自力更生。我们国家有我们国家的上帝，那就是玉皇大帝。他们是什么呢？是东正教，他们有他们的上帝。我们只能采取自力更生的方针把我们自己的国家建设好。

当然，去年莫斯科会议也是开得好的，我们斗争是必要的，而且斗争是有成绩的，至少是一段时间内限制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思潮的泛滥。我们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是在意识形态里无产阶级思想和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在国家关系上是国际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我们并没有脱离社会主义阵营。撤退专家、在中印边境问题上发塔斯社声明谴责我们，是赫鲁晓夫搞的，是他首先骂我们的。我们并没有挑起争论，而是他已经下起了倾盆大雨之后，我们迫不得已起而抗争，才发表了三篇文章。不能不发表这三篇文章，我们应该坚持这三篇文章的立场。

现在，赫鲁晓夫又挑战了，我们怎么办？我看，我们要做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修堡垒，就是把内部整顿好，做好物资建设，也要做好思想建设。另一件事情就是要准备斗争，现在要准备可能在“22大”上有一场斗争，也可能围攻我们，我们要做好这个准备。说修堡垒也不是说我们把自己封锁起来，不让人民知道赫鲁晓夫这一套东西。我们要发表赫鲁晓夫这个《纲领》，等他们通过以后就发表，利用这个东西来进行思想政治工作，解释为什么说他们提出的这些观点是错误的，是修正主义的，为什么我们要坚持反对他的错误观点。

从这个《纲领》上看，现在赫鲁晓夫是违背 81 党声明的。那个声明虽然是妥协的产物，但基本上是好的，应该成为我们手里同赫鲁晓夫、同一切修正主义进行斗争的武器。我们要批评他们违反 1957 年的《莫斯科宣言》和 1960 年的 81 党《声明》，这两个文件是我们进行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重要武器。我们要高举这两面旗帜同他们进行斗争。我们一方面要坚持原则，另一方面要坚持团结。

当然，现在他们还没骂我们，他只发表了一个《纲领》，宣传他的观点，所以我们也不好现在就来批评他。去年 81 党会议以后平静了一个时期，从去年十二月到现在已经十个月了，总的来讲还是可以的，只是他要整阿尔巴尼亚这一点我们是一直是反对的。中苏方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还是维持 1960 年他撤

退专家、撕毁合同那个状况，没有什么大的改善。现在我们的方针是集中力量搞好我们自己的整顿工作，把过去三年的缺点错误改正过来。对中苏关系，我们要尽量使目前这种比较缓和的时间延长，不希望很快又吵起来。虽然现在是不死不活，但是比起公开吵起来还是有利一点。我们要尽量延长这个时间。如果他在“22大”发起进攻，那我们也没有办法，我们只能被迫还击，叫做自卫反击。我们对国民党发动的内战也是实行这个方针，也叫自卫反击。现在虽然不能把赫鲁晓夫看成国民党，但是现在他背叛马列主义，已经对马列主义发动进攻，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动进攻，首先对阿尔巴尼亚进攻，这些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矛盾。但是他还没有对我们进行公开的围攻，我们要保持某种形式的团结，尽量延长这个时间，争取时间把我们国内搞好。

一九六一年十月十六日至三十一日，苏共举行二十二大。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参加会议。赫鲁晓夫在会上大搞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

一九六二年一月三十日，在七千人大会上毛泽东指出：

在中国、在苏联和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归根到底是拥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在还有许多人被帝国主义、修正主义、社会民主党、反动派蒙蔽，但是他们终究会觉悟过来的。世界革命的潮流是不可阻挡的。

应该坚决相信苏联是个好的国家，无论哪一年、无论什么时候，都要学苏联的经验，不学就会犯错误。当然，我们要学的不是学它的修正主义，不是学它错误的东西，而是学正确的东西，合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好的经验。

我们跟苏联的关系，不一定采取阿尔巴尼亚那种办法。即使苏联要破裂，我们可以不破裂，我们要求谈判，我们要建议召开 81 党参加那样的国际会议。就是说用一切办法避免破裂、推迟破裂，即使是维持一个很不好的、表面上不破裂的局面也是好的。现在苏联大反阿尔巴尼亚，有一些党又指名反对我们，苏联也登了很多不指名地反对我们的文章，但是，我们现在不要登反批评的文章，不要和他们争论，让他们骂。现在骂我们的人多着哩。历史上我们就是挨骂的，但我们从来不怕孤立。现在我们的七千人代表六亿五千万的中国人民在这里开会，力量更大了，党更大了，还怕什么孤立呢！延安时期开“七大”的时候，解放区只有几千万到一亿人。现在我们新中国比那时的解放区大得多，我们更不怕孤立。

实际上全世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最终会站在我们一边的。

我们要团结全党、全国人民的绝大多数。这不同于修正主义，它只代表占人口百分之十以下的人，我们要有倾向，就是倾向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列宁开始建党的时候是少数，布尔什维克党长期是少数到 1917 年十月革命前夜才在苏维埃代表中占百分之五十一，所以才决心发动十月革命。我们不怕孤立，不要怕我们暂时好像是少数，实际上我们代表正确方面，终究是会取得大多数人拥护的。我们要有充分的信心。

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顶峰就是苏共“22 大”，他在大会上搞“四反”（反斯大林、反“反党集团”、反阿尔巴尼亚、反华），好像是嚣张得不得了，但是他已经到了顶点，接着就走下坡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有比较完整的纲领、路线和理论体系，这就是苏共“22 大”通过的《纲领》和赫鲁晓夫作的报告。这是他的顶峰，从此就走下破路了。

二、中共中央答复苏共的来信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二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给中共加了三条罪名：其一，支持阿尔巴尼亚的“反列宁主义行为”；其二，在国际民主组织会议上采取了所谓“特殊立场”；其三，在国际共运中实行所谓“独特路线”。并要中共接受它所说的“共同路线”。

一九六二年三月一日，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苏共中央的信当面交给邓小平，表示应尽量消除分歧，保持团结。暗示两党可以坐下来谈，但没有提出具体建议。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毛泽东在武汉听取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关于十二日、十三日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情况汇报时，同他们一起研究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一九六二年三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讨论复信。根据常委会的意见，刘少奇两次召开会议，修改复信稿，报送毛泽东审定。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再次召开会议，讨论复信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这封复信。

一九六二年四月九日上午，邓小平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将中共中央致苏共中央的复信交给他。对他说：这封信的中心内容是，为了团结就需要解决问题，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开会。信中提议再次召开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来解决苏共中央来信中提出的问题。我们的出发点是，要开，就必须开好。所谓开好，就是团结起来。

一九六二年五月三十一日，苏共中央在给中共中央的复信里，提出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人放弃其立场作为召开会议的先决条件。中共方面的这一建议只好搁置下来。

三、中苏边境事件、中印边境冲突、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以及美苏核对抗危机

1，苏修在新疆搞颠覆活动

一九六二年四五月间，苏共领导在我国新疆塔城伊犁地区搞大规模的颠覆活动。

一九六二年初开始，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中共中央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平息这一严重事件。这一事件，既涉及民族政策，又涉及中苏国家关系，处理起来非常棘手。这时，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

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中央又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

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2. 中印边界冲突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到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判断中印边界特别是西段边界将是一个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局面，要使外交斗争同军事斗争相配合，军事斗争服从外交斗争。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

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的意见是：

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

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

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就是在中印边界双方紧张对峙的情况下，中国政府仍然没有放弃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努力。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

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犯，动用了十多个旅的兵力，而且出动空军配合，占领了一大片中国的领土。中国边防进行自卫还击，打退了印度军队的进攻，清除了印度军队入侵以来在中印边界中国领土一侧上修建的据点。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实行单方面在中印边界停火，并从十二月一日起主动地撤回部队。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发表讲话，公开指责中国：中国军队现在后撤了，为什么当初要从原阵地前进呢？

3，台湾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在中国西部边陲发生新疆问题和中印边界反蚕食斗争问题的同时，在台湾的蒋介石也趁国内发生经济严重困难之机，叫嚣“反攻大陆”，并积极作了部署。东南沿海地区的局势，顿时紧张起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中央军委就开始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一九六二年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

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毛泽东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一九六二年十月，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这一段时间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

“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

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4，苏美核对抗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二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宣布：苏联在古巴建造导弹基地、装配携带核武器的轰炸机。为此他下令对古巴实行封锁，在离古巴 500 英里的范围内，所有船只都要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五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支持古巴正反对美国入侵，也支持苏联反对美国入侵古巴的立场。

一九六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赫鲁晓夫接受美国总统肯尼迪的建议：下令撤出在古巴的导弹并在撤出时接受美国军舰的检查，同意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再次发表声明：反对苏联放弃维护古巴政府的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巴实行国际监察，侵犯古巴主权。

四、五国党代会上对中国发起新的围剿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五日到十四日，保加利亚党代会，二十几个党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匈牙利党代会，三十几个党不指名或指名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到八日，捷克斯洛伐克党代会，五十多个党指名或不

指名攻击我党。朝鲜代表团致辞中不赞成会上对中国党的攻击。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并修改，《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社论指出：某些兄弟党在中印边境武装冲突问题和加勒比海危机问题上对中国党的攻击，根本背离了共产党人对敌狠、对己和的原则立场，迎合了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只服从真理，决不服从任何反马列主义的指挥棒和所谓多数。各国共产党人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为重，以共同对敌斗争的利益为重，遵循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所规定的兄弟党关系的准则，采取正确的方法来消除分歧，维护团结。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在其党代会上也公开攻击我党。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四日召开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邓小平传达了毛泽东十二月二日下午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的一些决定。他在传达中说：意共的会，原以为问题不多，现在看问题很多。匈牙利党代会就有邀请南斯拉夫的迹象。意大利带头邀请南共，又指名攻击中国，陶里亚蒂的报告就攻击，不只阿党问题，还有纸老虎问题、战争与和平问题。这就确定，他们公开批评我们，我们就可以批评他。这次本来要批评他是机会主义，主席说大会致词中不讲，放在酒会致词中去。以后的斗争怎么样，要研究。现在看，今后的斗争更加展开了。这就需要一系列的东西，也要有适当的刊物。写文章的问题，每个问题写一篇，要适合于外国人看。如什么叫冒险主义，现在必须回答。还有纸老虎问题，赫鲁晓夫和陶里亚蒂都攻，主席说，可以就写‘驳陶里亚蒂’。最近要组织一两篇文章，同时要把陶里亚蒂攻击我们的言论摘登出来。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把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整理的《列宁在第二国际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的材料批给柯庆施，让他印发参加华东局会议的各同志，“大家读一、二遍，并讨论两天”。还在最后一页上写下了清代诗人严遂成的诗作《三垂冈》，并指出这是“咏后唐李克用和其儿子后唐庄宗李存勖的诗”。

英雄立马起沙陀，奈此朱梁跋扈何。
只手难扶唐社稷，连城且拥晋山河。
风云帐下奇儿在，鼓角灯前老泪多。

萧瑟三垂冈畔路，至今人唱百年歌。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是毛泽东六十九岁生日，他写了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经毛泽东审定，《人民日报》发表社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篇社论在战争与和平问题、对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态度、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问题、关于和平共处问题、关于结构改革也就是和平过渡的问题、关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等问题上，重申了我党的观点，既批判了陶里亚蒂，也详细阐明了我们所坚持的马列主义的原则立场。

一九六三年一月，《红旗》杂志第一期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社论论证了当前的时代是什么时代、帝国主义的本质是否已经改变、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否过时、现代修正主义的国内根源和国外根源是什么等问题。社论指出，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斗争类似列宁同第二国际机会主义者的斗争，也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反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即现代修正主义的又一次严重的斗争。

一九六三年一月六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会见日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袴田里见一行。毛泽东说：

有些党依靠压力过日子，还搞收买、颠覆，强加于人，不让各国党有自己的独立思考，不让各国党自己制定自己党的路线。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是阶级斗争的学说。但是现在修正主义者不讲这些，讲阶级调和、和平过渡、全民党，没有阶级性的自由、平等、博爱，超阶级的、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全民政府等。

这一法宝是从意大利取来的。我们现在得到一种机会，可以公开地批评意大利共产党的‘结构改革论’。意共把结构改革说成是共产主义的一般方向。我们并非干涉内政，但由于意共说是一般方向，同时又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如果他不公开攻击，我们就不好公开回答。现在就非公开回答不可。

陶里亚蒂也作了一些好事。

一九六三年一月七日，苏联《真理报》发表长篇文章《为和平和社会主义的胜利加强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二日下午，毛泽东在南昌会见委内瑞拉民族解放阵线代表团等外宾。他说：

现代修正主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段和平环境中滋长起来的。它和老修正主义在本质上是一回事，都是不要革命。他们的社会基础是高薪阶层，是那些生活优裕的人。

一九六三年一月十五日到二十一日，德国党代会，赫鲁晓夫亲自出马指挥反阿反华，第一次公开指名批评中国共产党，同时又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实际上是要阻止中共继续反驳。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五日晚，毛泽东审定了《人民日报》社论《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团结起来》稿，在批语中说：“二十四日送来的社论，已经看过，写得很好，可以发表。”

一九六三年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发表。社论点出了一些严肃的原则问题：要什么样的团结？在什么基础上团结？是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还是在别的纲领基础上的团结？社论明确指出，公开论战是从苏共“22大”开始的，是从苏共利用他们的党代会讲坛公开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党开始的。

一九六三年二月十一日到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也是议题之一。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致信中共中央，表示要停止论战，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为召开新的兄弟党国际会议作准备。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晚，毛泽东召开常委会议研究苏共来信。然后约见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参加会见的有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和伍修权。毛泽东正患感冒，是在菊香书屋的卧室里会见的。

毛泽东说：

你们 2 月 21 日来信我今天刚才看完，也同政治局常委的同志商量了。我们认为你们这封信的态度是好的，欢迎你们这样做。

你们提出停止公开论战，你们信里的提法基本上也是好的。但你们言行不符，自相矛盾。不久以前赫鲁晓夫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党代表大会上，一方面提出停止公开论战，另一方面自己又在那里攻击阿尔巴尼亚，影射攻击中国共产党。这就是在论战。这个不好，要言行相符。

我们从 2 月 20 日起在报纸上发表你们的文章，已经登了三天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一共有 43 个党骂我们，其中包括赫鲁晓夫的两个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这是讲主要的，其他的不算。我们也要发表，但不能全部发表，只能发表主要的。今天就发表了法国党、意大利党攻击我们的言论。

兄弟党相互之间有不同意见可以互相谈，在内部谈，该批评的批评，批评得不对的也不要紧，但是不要采取公开论战的形式。现在的公开论战，不是我们首先发动的，我们是被攻击的。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来而不往非礼也”。你们可以攻击我们，那我们就有权利答辩。我们从去年 12 月中旬起开始回答你们的攻击。但是我们中央的方针是，有的问题我们现在不回答，把它发表在报纸上，挂一笔帐，保留以后答复的权利。至于什么时候回答，那要看情况。

彼此骂来骂去，中间总要休息一下。我们赞成你们建议停止公开论战，暂时停止一下也可以。但要说清楚，首先提出不要公开论战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就是在座的周恩来同志在你们苏共“22 大”上，当你们公开指责阿尔巴尼亚的时候，我们就建议你们不要这么做。在一个党的代表大会上谴责另一个党，这只能亲痛仇快。不晓得你们记不记得。但是你们当时不听，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你们按照这个方针，后来在欧洲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从保加利亚共产党代表大会开始，接着在匈牙利、捷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意大利等五个党的代表大会上，一次又一次的，不仅攻击阿尔巴尼亚党，而且攻击中国党。你们认为这样做很有必要。我看这也好，这样就把我们之间的分歧摆在全世界的共产党人、全世界人民面前了。当然，我们不主张公开论战，但是，既然你们那样攻击我们，我们就在我们的报纸上发表你们攻击我们的文章，然后给予回答。是不是你们也可以照我们办法，把我们回答你们的文章也发表在你们的报纸上，然后你们又加以评论呢？索性公开论战不好吗？我看，进行这样的公开论战，天不会塌下来，

草还是照样长，女人还是照样生孩子，河里的鱼还照样游。

过去你们说公开论战很有必要，现在你们来信说公开论战有很多害处，根本不提你们过去所讲的很有必要。在这封信里，你们说意见的分歧不要人为地把它夸大，不要发展成为深刻的冲突。你们这个意见我也赞成。但是是谁人为地夸大呢？是你们嘛！是你们造了很多谣言嘛！比如我这个人，你们就造了很多谣言嘛，说毛泽东不行了，不能工作了，没有用了，老了，要死了。你看，我今天在床上接见你，大概是快要死了。你们说中国有个人崇拜，崇拜我这个老而不死的人。你看，是谁人为夸大呢？是谁引起深刻的冲突呢？这是我发点牢骚。我总的还是欢迎你们这封信，但是你们也应该允许我稍微发一点牢骚吧。你们过去骂了那么多，那不是人为地夸大吗？有意造成深刻冲突吗？

你们提出中苏两党会谈，为的是筹备兄弟党会议。这个我们也赞成。但是你们在信中说你们早在去年 5 月已经提出这个问题，这就不符合事实了。其实，比你们来信早一个月，我们去年 4 月 7 日给你们的信里面就提出召开兄弟党会议，并且提出为开好这个会议，要进行包括中苏两党会谈在内的一系列的准备工作。而你们去年 5 月的复信说什么呢？恰恰是拒绝了我们的建议，或者说是实际上拒绝了我们的建议。你们同时也拒绝了印尼党、越南党、新西兰党及英国党、瑞典党的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你们这次来信说，现在是面临一个严重的时刻，是关系到今后我们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还是陷入一场沉重斗争的问题，这取决于我们。你们信里的这句话我看也不错。的确，我们中苏两党是不是在一个队伍里前进，现在倒成了问题了。像你们最近几个月那样搞下去，那我们互相之间就搞不到一起，你们是制造分裂。五个党的代表大会那样跺脚、那样起哄，不让我们代表把致词念完，这叫什么？这叫民主吗？还有你们的赫鲁晓夫同志的两篇讲话，《真理报》的两篇社论，都公开地攻击我们，这能使我们走在一起吗？你们批评我们，我们就得回答，但什么时候回答，回答哪些，这是我们的事情。最近我们留了一手，没有直接回答你们赫鲁晓夫那两篇讲话和《真理报》的两篇社论。我们只回答了捷克党、德国党、意大利党，还有法国党。他们骂了我们那么多，但是我们每次只回答了一篇，不多也不少。当然，这是打笔墨官司。中国有句古话，叫做“君子动口不动手”。

你们信里讲，如果我们不克服分歧，子孙后代是不会饶恕我们的。这个话也

对。但是我说，不要等待子孙后代饶恕我们了，现在广大群众已经不饶恕我们了。中苏两党、两国有什么仇，为什么这样公开大吵特吵。既然有吵架的勇气和力量，就应该有解决分歧、达成团结的勇气和力量。闹那么一阵该休息了。

你们来信讲，这次来信再一次对公开论战、召开兄弟党会议加以肯定。这是文过饰非。去年初印度人、新西兰人就提出要开会，我们去年 4 月也赞成他们的建议。可是你们 5 月的信，表面上看似乎赞成，但实际上是拒绝了。现在说“再一次肯定”，其实，肯定要开国际会议、停止公开论战的是这封信，而不是去年 5 月的信。不过，这也好，我们还是欢迎这封信。所以我们一收到你们的来信，就把你这个大使找来。

为了准备会议，我们政治局常委商量了，认为中苏两党要先举行会谈，会谈的时间、地点是不是可以在赫鲁晓夫访问柬埔寨之前或之后路过北京的时候面谈，如果这个做不到，那我们就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一点请你向赫鲁晓夫报告，有什么决定快点通知我们。如果赫鲁晓夫同志到北京来，就不能像 1959 年那样子到北京来把我们骂一顿，说什么“不要用武力试验资本主义的稳定性”啦，还说什么“公鸡好斗”啦！请问，他的意思是不是说他是母鸡，不好斗？如果真想搞好关系、达成协议、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是欢迎他到这里来的。因为一直到现在我、少奇同志、恩来同志、朱德同志，还有陈云同志和林彪同志更不要说了，他们两个有病，我们都没有一个人公开发表演讲、公开在报纸上批评你们，没有批评赫鲁晓夫同志。所以赫鲁晓夫同志到这里来，我们还是当面谈好。至于要我本人到莫斯科去，我现在不准备去，我还是隔远一点好。与其送到你们那里去挨骂，不如避开一点好。不过，我声明，我不是怕吵架的人，我 1949 年也跟斯大林吵过架，1958 年也跟赫鲁晓夫吵过架。

关于筹备兄弟党开会的方式，可以用 1960 年的方式，也可以用 1957 年的方式。1960 年的方式就是两个党先吵，一直吵到开大会，一直吵到大会闭幕的一天才达成协议，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是 1957 年的方式，就是两党先协商，协商一个共同的草案，再同其他党协商，这中间当然还有争论，但是还是比较快的达成协议。据我看，最好还是采取 1957 年的方式。我今天给你谈话，也算是对你们来信的答复，欢迎你们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同意召开兄弟党会议、同意开中苏两党会谈。但是，我们党中央正式给你们的复信才算是正式的回答，这

个复信在两个星期内就会交给你们。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五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问题的长篇报告，详细介绍了现代修正主义的发展过程和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斗争的目前情况，争论的性质和主要问题，以及这场斗争的前途和我们的方针。他指出：要坚持团结的方针，但是公开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们再发表三篇文章给予反驳，随后争论可能要停止一个时期；当前的工作，是准备两党会谈，准备兄弟党国际会议。

毛泽东主持这次大会，在刘少奇作报告中间不断插话：

刘少奇讲到，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态度和缓了。毛泽东说，实际上是因为二十日看到我们发表了他们的几篇东西。

刘少奇讲到，现在修正主义不敢首先同中国分裂。毛泽东说，我看中苏长期分裂是不可能的。中苏一破裂，美国就不同它和平共处了。那时我们再团结嘛。

刘少奇讲到，反对修正主义关系到各国革命和人类命运。毛泽东说，也关系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命运。

刘少奇讲到，不怕分裂。毛泽东说，不怕分裂，是指怕也分裂，不怕也分裂，那为什么怕呢？如果怕分裂就可以不分裂，那就怕，我赞成怕。

刘少奇讲到，要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在党和国家的组织上，在军队的组织上，防止出修正主义。毛泽东说，出不出修正主义，一种是可能，一种是不可能。从十中全会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依靠贫下中农，然后团结上中农，这就可以挖修正主义的根子。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分歧从何而来——答多烈士等同志》。这篇文章第一次公开指明中苏两党的分歧是从苏共二十大开始。文章指出，“某些兄弟党的同志，屡次企图把一个党的代表大会的决议置于各国兄弟党的共同纲领莫斯科宣言之上，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分歧”。如果说，前面的四篇文章，还只是澄清或正面回答一些争论问题；那么，这篇文章的发表，则把争论的深度向前推进了一步，指出了这场争论是由谁引起的，谁应对此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八日，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指出：

《分歧从何而来？》反响可大了。在北京的波兰记者、奥地利记者、英国记

者，开头可紧张了。看了以后，松了一口气，讲他们国家的只有那么一点。

赫鲁晓夫昨天晚上的讲话，一个字也没有骂我们。我们是二十三号和苏联大使谈的。我看，他是看了我们跟苏联大使的那个谈话了。

我们的四篇文章，苏联又是四篇，以及法国的、意大利的，在知识分子中可以试验一下。据我看，大多数，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能接受我们的观点的。有百分之几，他们是反对我们的观点而欢迎赫鲁晓夫的。究竟百分之几，可以去研究。我看，不超过百分之一、二、三、四、五。这证明我们这几十年的教育工作是有很大成绩的。

现在形势的确是好。我们还没有回答，只是把赫鲁晓夫他们的东西登出来，“游行示众”，一连登了三天，他是二十三号派人来的，摸不到底，不晓得我们要怎么搞。我们现在有个十万字的东西，要从明天起开始登。还有答复美国共产党的一篇。

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要团结起来，教育那些不懂或不大懂马克思主义的干部和群众，目前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重大意义在此。应当研究湖南、湖北、河北的经验。我们已经发表的反修文章，在知识界里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赞成的。可见过去十多年的思想教育是有成绩的。赫鲁晓夫的讲话、文章不可怕，因为他们没有马克思主义。赫鲁晓夫骂我说纸老虎不对，引得世界上许多人都想知道我说的纸老虎是什么意思。现在有 43 个党骂我们，“帽子”满天飞，我们不怕，我们把他们骂我们的决议、声明、讲话、文章通通发表，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他们敢不敢照我们这样办，这是挑战。看来他们不敢，这说明他们理亏。如果真理在你们手里，你们可以批驳我们。他们不敢发表我们的文章，是因为他们驳不倒我们。现在倒是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不少资本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派人到瑞士同我们联系，要我们的文章看。看来修正主义不好混，反对的人多起来了。我们再发表几篇文章之后，可以停一停，看一看再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不可以老是把弦拉得太紧了。

最后，毛泽东提出，还要把问题转到国内的反修防修。

一九六三年三月，《红旗》杂志第三、四期发表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编辑部文章《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

三月一日至四日在《人民日报》上连载，作为第六篇答辩文章。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极为重视，改了几遍。文章要分四天连载，就是毛泽东提议的，他认为这样可以让大家有时间仔细阅读。这篇文章，是这一时期连续发表的几篇文章中，最有分量的一篇，也是毛泽东下功夫修改最多的一篇。

文章共八个部分，十一万字。

二月三日最先送给毛泽东看的是前三部分，文章题目是《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问题——评陶里亚蒂等同志的论点》。毛泽东看过，把题目改为“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和我们的分歧——关于列宁主义在当代的若干重大问题”，并批示，要提下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发表的《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那篇文章，说明为什么又要写这篇文章。

毛泽东先修改的是引言部分。在“他们这次既然直接地向我们挑起了公开争论”一句之后，加写了一段话：“我们有什么办法呢？难道还能如过去那样缄默不言吗？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不行，不行，不行。我们一定要回答。他们迫得我们没有别的路走”。

二月十四日，陈伯达把毛泽东修改后的引言打出清样再送毛泽东。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其中写到：“我们共产党人之间的分歧，只能采取摆事实说道理的态度，而断不能采取奴隶主对待奴隶的态度。全世界无产者和共产党人一定要团结起来，但是只能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的基础上，只能在摆事实说道理的基础上，只能在平等商量有来有往的基础上，只能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才能够团结起来”。

二月十五日，毛泽东批示陈伯达：“请再打清样，送给我看。”

十五日下午，陈伯达将毛改稿的清样送来。毛泽东把第二部分的标题改为“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

次日早晨在写给陈伯达的批语里关切地问道：“以下各章改的情况如何？请打清样即送我看。”

十七日，陈伯达送来了第八部分（最后一部分）的初稿。毛泽东又加写了一大段话，着重剖析一种现象，就是给别人扣上“教条主义者”、“宗派主义者”、“分裂主义者”、“民族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的帽子的人，却惧怕别人的答辩文章，严密封锁。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你们既然肯定我们的文章是错误的，何不将这些错误文章通通发表出来，然后，逐条予以批驳，以便在你们自己国内的人民中间能够引起痛恨，痛恨那些被你们称之为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邪魔外道呢？你们为什么不敢这样做呢？为什么要封锁得铁桶一般呢？你们怕鬼。一个‘教条主义’亦即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巨大幽灵在全世界徘徊着，这个幽灵威胁着你们。你们不信任人民，人民不信任你们，你们脱离群众，所以你们害怕真理，害怕的情况达到那样可笑的程度。先生们，朋友们，同志们，好样的，站出来，在全国全世界人民面前公开辩论，双方互登对方一切批评自己的文章。我们希望你们学习我们的榜样，我们就是这样做的。我们敢于全部全文地登载你们的东西。在登载你们一切痛骂我们的‘伟大’作品以后，然后逐条地或者扼要地驳斥你们，当作我们的回答。有时我们只登载你们的错误文章，我们一个字也不作回答，让读者们自己去思考。”

过了一天，毛泽东对第八部分又作了一次修改。他改用《共产党宣言》结尾的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作为这部分的小标题。并以三句口号作为全文的结束：“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一切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一切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团结起来！”

这样就更增强了这篇文章在当时的震撼力和号召力。

二月二十日上午，毛泽东最后审阅了引文和第八部分。他在批语中，写了少有的满意评价：“改得很好，很完整，再也没有遗憾了。”

文章一共讨论了七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这一次各国共产党人大争论的性质是什么”？文章认为：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正在理论问题、根本路线问题和政策问题上展开一场大规模的论战。论战中的思潮，归根到底，一种是革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一种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潮。当前这场争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同现代修正主义者的国际规模的论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当代世界的矛盾。文章重申了毛泽东在一九四六年同美国记者斯特朗谈话中提出的“中间地带”理论，列举了十六年来世界形势的重要变化，指出：“美帝国主义者的奴役政策同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美帝国主义者向全世界的扩张政策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

界矛盾的焦点。这种矛盾，特别表现为美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各国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之间的矛盾，表现为新老殖民主义者之间争夺这些地区的矛盾。”

第三个问题是关于战争与和平。文章重申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基本原理和“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论断，提出：“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主张依靠社会主义国家力量的团结和发展，依靠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的斗争，依靠国际无产阶级的斗争，依靠全世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的斗争，来保卫世界和平，防止新的世界战争。”

第四个问题是关于国家与革命。文章重申马克思、恩格斯根据一八四八年到一八五一年经验和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经验总结出来的关于摧毁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和用什么代替被摧毁的国家机器的有关论述，重申列宁提出并为俄国十月革命证实了的无产阶级战略原则，着重批驳了“结构改革论”，实际上是批驳苏共二十大提出的“和平过渡”理论。

第五个问题是关于“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文章重申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强调要“敢于藐视敌人，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反对“畏惧敌人，不敢斗争，不敢胜利”的改良主义或投降主义思想。

第六个问题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文章阐明如何正确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如何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如何正确地坚持原则性和灵活性等问题，认为“现代修正主义是国际工人运动中的主要危险”，并试图划清同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界限。

第七个问题是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团结。文章重申一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社论的基本论点，强调在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基础上的团结。

一九六三年三月八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评美国共产党声明》，回答美共一月九日的声明。文章指出，美共的一些人一方面极力美化美帝国主义和美国总统肯尼迪，另一方面又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敌我不分，颠倒是非。

一九六三年三月上半月，在刘少奇二月二十五日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基础上，由毛泽东和几位常委共同修改，形成了一个指导性的文件，题为《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问题》。

这个文件表明，在中苏论战的强烈影响下，中国的国内工作和国际斗争，逐步走上以反修防修为中心的轨道。

贰、本节简论

关于新疆事件，毛泽东明确提出：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这次事件说明：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毛泽东写《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一九六三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写《满江红》：

小小寰球，有几个苍蝇碰壁。嗡嗡叫，几声凄厉，几声抽泣。蚂蚁缘槐夸大国，蚍蜉撼树谈何易。正西风落叶下长安，飞鸣镝。

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毛泽东用诗词的形式表达了对国际大势的基本看法和斗争意志。不论是书写古人诗作，还是他自己创作的诗词，都表现出一种豪迈气势和博大胸怀。

从国际上的反修联系到国内的反修防修，不仅毛泽东、刘少奇这样想、这样做，中共其他领导人基本上也是这样一个思路。不过，最早提出这个问题，并感到最紧迫的是毛泽东。

毛泽东对这场论战充满自信，表现出中国共产党人道理在手、以理服人的雄浑气势和魄力，这种气势和魄力加上犀利的笔锋、雄辩的逻辑，使得中国共产党在这场论战中屡占上风。

《再论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这一长篇文章，是自一九六〇年四月发表《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以来，最为系统也最有分量的理论文章，全面阐

明了中国共产党在那个时期对时代主题和国际局势的基本看法，以及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一些重大理论问题的基本看法。名义上是批驳陶里亚蒂，锋芒所向实际上是对着赫鲁晓夫等人。这篇文章在中苏论战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其中许多观点，是多年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是对中苏两党分歧和争论的一个初步总结。这些观点，后来都被吸收到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而且进一步地理论化和系统化。

2011 年 4 月 29 日修改

第四章第八节 两条根本对立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

壹、本节概述

一九六三年三月九日，中共中央发出对苏共中央二月二十一日来信的复信，赞成停止公开论战，举行两党会谈，宣布从三月九日起，暂时停止发表论战文章。

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正式启动。

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又致信中共中央，详细地提出了苏共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问题，并且建议以他们来信中关于这个问题所阐述的一系列观点作为中苏两党会谈的基础。四月二日，这封信通过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当面交给了周恩来和邓小平。

一九六三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 3 月 30 日来信时说：没有看完苏方来信。既然大家看了有这个印象，那么我们索性把苏共中央这封信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让大家研究。赞成我们准备一个对案，根据马列主义的分析，提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应该采取的总路线。可以从当代世界矛盾讲起，一直讲到如何停止公开论战的问题；从重大原则问题，一直到当前应该解决的具体问题，作一个总的答复。我们可以采取答复他们来信的形式，采取正面提出意见的形式，而不是采取同苏共来信争论的形式。不要给人觉得似乎我们现在就拒绝他们的来信，那样两党会谈就没有讨论的余地了。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既然苏共中央在来信中明确提出了总路线的问题，我们就要起草一封复信，全面阐明中国共产党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基本观点。

一九六三年四月四日，中央书记处讨论了起草复信的问题。从此，中苏两党会谈的准备工作，就转向起草关于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复信。

复信先在北京起草，逐渐形成共二十条的一个比较成熟的提纲，在这个基础上写出初稿。

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一日，邓小平、康生、陆定一、陈伯达等四人来到杭州。毛泽东在杭州、上海多次主持讨论复信稿。周恩来陪同外宾到上海时，也参加了

部分讨论。

在五月十九日稿上，毛泽东增写了两段内容。一处是在讲和平共处政策的地方，写道：“因为在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实行和平共处，根本不允许也完全不可能触动共处国家的社会制度的一根毫毛，而阶级斗争，民族解放斗争，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那些都是为了改变社会制度的激烈的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这是另一回事，同和平共处是风马牛不相及的。”（这段话后来又作过补充。）另一处是在讲应当有一个什么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地方，写道：“如果不是自己能够思索、能够自己动脑筋，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工作，深知本国各阶级的准确动向，善于应用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而只是人云亦云，不加分析地照抄外国经验，跟着外国某些人的指挥棒团团打转，那就是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样样都有，成为一个大杂烩，而单单没有马列主义原则性的党”。

在五月二十一日稿上，毛泽东又作了修改，主要是一些文字上的润色和增补。

对六月五日稿，毛泽东作最后一次修改，把复信的题目正式定名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于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九六三年三月三十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五月五日，在杭州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北京、杭州两地起草的复信时，毛泽东说：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问题，我们还是慎重一些为好，先不要提到政治局去讨论。要先在常委范围中搞得比较成熟，然后征求一些兄弟党的意见，比如朝鲜党、越南党、新西兰党、日本党，还有印尼党等东南亚一些党的意见。这样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可能会搞得更完备些、更周密些。但是，这不是作为各国左派党的共同文件提出，而是中国党提出的建议，针对苏共 3 月 30 日的来信提出的一个反建议。因为既然苏共可以提，别的党也可以提，但不是作为左派几个党共同建议。人家不说我们搞宗派主义吗？其实这不是宗派主义，但是要避这个嫌。而且，要其他兄弟党完全同意我们的文件也比较困难。大家开会也总是有不同意见，要求完全一致是比较困难的。如果大的方向能够得到他们的赞成就很好，但是只能作为我们中国党的建议提出来，而不是作为好几个党的共同文件提出来。这一点要十分慎重。

从五月下旬起，根据毛泽东提议，中央政治局决定邀请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

威尔科克斯，朝鲜劳动党总书记金日成，越南劳动党领导人黎笋、长征来中国，就复信征求他们的意见。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同新西兰共产党总书记处威尔科克斯谈话时，毛泽东说：

“我们准备搞一个比较完备的备忘录，包括二十大、二十一大、二十二大。他是二十大起家的，这些东西是碰不得的。我却偏偏要挖你的底子。” “他们放肆地骂了我们，就给了我们一个批评他们的权利。难道只有他们可以说话，我们就不能说话吗？可以把两封信比较一下。他们的来信是一个软体动物，我们的复信是像你所说的采取攻势。……现在这样也不算骂嘛。这是摆事实，讲道理。”

这个文件还要征求其他兄弟党的意见。现在的文件（陈伯达稿）还不太成熟，我对总路线的第一部分很不满意，文字太长，而且有些重复，不够简练、鲜明、概括。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五日，邓小平主持的中央反修文稿起草小组整理出复信初稿。

一九六三年五月二十九日，在同金日成第一次会谈时，毛泽东说：

这次请你们来，主要是征求你们对我们给苏共复信的意见。这个信已经由秀才们起草了，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同志也看过了，虽然政治局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大部分同志都看这个稿子了。现在请同志们来，请你们提意见，看看草稿行不行，需要大改还是小改。如果这个稿子不行，可以重新写。除了已经征求威尔科克斯同志的意见以外，现在又请你们来，还要请越南同志来。为什么这样做呢？主要是我们怕犯错误，是想在发表之前搞得正确一点。本来还应该征求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意见，因为相隔万里，来往不便，只好作罢。越南同志将在你们之后来。印尼党和日本党是资本主义国家的大党，可惜也不能征求他们的意见了。对这些兄弟党，我们只是征求意见。这封复信不是作为一个共同文件提出来，而是中国党的建议，由我们党负责，错了打我们的屁股。但是，我们想尽量避免犯错误，所以请大家来提意见。因为这封信是同全世界党、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斗争有关，所以请你们来帮我们一把。不论在基本的原则方面，或者是个别观点、文字词句方面，你们有什么意见请提出来。我们中央常委在北京、杭州交换过几次意见，在杭州我参加了，北京的意见也告诉我了。现在又到武汉来，征求你们的意见，然

后再加以修改，最后正式提交我们党的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以后再以中国党的名义向苏共发出。

一九六三年五月三十日，毛泽东和金日成举行第二次会谈。

金日成说：文件总的感到很好。主要的精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这样的文件对争取中间派很有好处。这个文件很有力量，右派是驳不了的。不管有没有这个文件，他们还是照样要攻击我们是宗派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好战分子等等，帽子满天飞。

毛泽东说，我们搞这个文件的目的是争取中间派，要使右派驳不倒。至于他们给我们扣上这项帽子、那项帽子，那没有关系。但是，我看他们是不会给我们扣上修正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四日，毛泽东和越南党代表团会谈。毛泽东说：

本来我们是不赞成把内部争论公开于全世界的。

“修正主义和思想上有点‘左’或右是不同的。偶然的、不成系统的、不是一贯的，不能叫修正主义，是认识问题。”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常委会通过复信稿。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二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全体会议通过复信。

决定六月十五日交苏共中央，当晚在国内广播。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毛泽东在最后定稿时把复信的题目改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1963 年 3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五日，复信由中国驻苏联大使潘自力当面交给苏共中央的苏斯洛夫。第二天，在国内各主要报刊上全文发表。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要点：

导言：

苏共中央在 3 月 30 日来信，特别提出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问题，并且就这个问题系统地提出苏共中央的观点。因此我们有必要就这个总路线的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阐明中共中央的观点，作为我们提交中苏两党会谈和兄弟党会议的建议。

第一条：

总路线只能根据 1957 年和 1960 年共同签署的《宣言》和《声明》所规定的革命原则，而不能根据别的其他什么东西。

第二条：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概括起来就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也就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

第三条：

各国的共产党人只能根据上述的总路线进行革命斗争，而不能把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这样片面概括为“三和”，是违反 1957 年《宣言》和 1960 年《声明》的革命原则的，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革命学说的。

第四条：

当代世界四大基本矛盾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被压迫民族同帝国主义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垄断资本集团同垄断资本集团之间的矛盾。这四大矛盾中，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是重要的，但不能只看到这个矛盾而抹杀其他矛盾。其他三种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各国人民的革命。

第五条：

批判在当代世界基本矛盾问题上的五种错误观点。这五种错误观点是：

第一，抹杀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的矛盾的阶级内容；

第二，只承认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的矛盾，而忽视或者低估其他矛盾；

第三，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中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矛盾，不需要经过本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就可以解决，而被压迫民族和帝国主义的矛盾，也不需要被压迫民族的革命就可以解决；

第四，否认资本主义世界固有矛盾的发展，必然引起帝国主义之间紧张斗争

的新局面，而认为它们之间可以调和甚至消除它们的矛盾；

第五，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世界体系的矛盾，会在经济竞争中自然消失，其他三种矛盾也随着这种矛盾消失而消失，可以出现没有战争的世界、全面合作的世界。

这里提到的五种观点，是苏共理论上的重大错误。

第六条：

社会主义阵营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财富，社会主义阵营负有援助世界各国人民革命的任务（七项任务），要保持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关于团结：维护社会主义阵营所有国家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团结在当前具有特别重要性；是不是维护这个团结，成为检验每一个共产党是否忠实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试金石；在社会主义阵营内部制造分裂，是背叛国际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的利益。

第七条：

美帝国主义是全世界最凶恶的敌人，是世界反动势力的主要堡垒。国际无产阶级必须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利用敌人的内部矛盾。不能不分敌友，把革命的命运、人民的命运、人类的命运寄托于同帝国主义的合作。

第八条：

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广大地区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世界的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社会主义国家和一切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阶级，必须真正实行列宁提出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这两个革命口号，坚决支持亚非拉人民的革命行动。

第九条：

亚非拉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面临着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迫切任务。这些国家的无产阶级政党肩负着光荣的使命就是高举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新老殖民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争取人民民主的旗帜，站在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最前列，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要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并能同它划清界限，不要成为它的俘虏。

第十条：

在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中间，要实现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就必须和社会民主党划清界限，争取同社会民主党影响下的群众实行广泛的联合行动。

第十一条：

共产党人是从来愿意经过和平的方式过渡到社会主义的，但是不可以把和平过渡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世界战略原则。无产阶级革命政党要准备两手，在准备革命和平发展的同时，必须对革命的非和平发展做充分的准备。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艰苦的积蓄革命力量方面，准备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夺取革命的胜利，或者在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突然袭击和武装进攻的时候给以有力的回击。

第十二条：

历史证明，革命没有不通过一些曲折的道路，也没有不遭受某些牺牲而能够取得胜利的。借口牺牲而取消革命是完全错误的。如果认为革命必然一帆风顺，或想得到不遭受牺牲和失败的保票以后才进行革命，那他根本就不是一个革命者。

第十三条：

社会主义国家同全世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的，互相援助的。社会主义国家一定要支持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如果采取敷衍的态度、民族自私的态度，都是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第十四条：

因为害怕战争而反对革命是完全错误的。不区别是什么样的和平，不区别是什么样的战争，对战争一律加以反对，对和平一律加以赞成，这是资产阶级和平主义的观点，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那种认为可以通过全面彻底裁军，在帝国主义仍然存在的条件下就可以实现没有武器、没有军队、没有战争的世界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十五条：

核武器的出现并没有能够解决当代世界的各种基本矛盾，也不可能改变阶级斗争的规律，不可能改变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本性。那种认为核武器的出现

就出现了一个新时代、否定人的作用、否定革命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十六条：

社会主义国家的对外政策中有一项重大的原则，这就是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之间和平共处。不能对和平共处作任意的、随心所欲的解释，不能把它引伸到被压迫阶级和压迫阶级之间、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之间，借以反对被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不能把和平共处说成是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主要内容，因为还有人民的革命斗争，还有社会主义国家支持这些革命斗争。因此把和平共处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是错误的。

第十七条：

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继续存在，只是形式不同于取得政权以前。列宁说过：第一，被推翻的剥削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企图恢复被夺去的天堂；第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经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第三，在工人阶级队伍中间，由于资产阶级的影响力和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包围和腐蚀作用，也会产生一些蜕化变质分子；第四，国际资本主义的包围、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威胁以及和平瓦解的阴谋活动，是社会主义国家里阶级斗争继续存在的外部条件。列宁讲的这些现象，在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中没有一个是例外的，即使苏联也是如此。

第十八条：

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很长时期中，无产阶级专政不可避免地继续存在。所谓全民国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

第十九条：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因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所谓全民党的观点是错误的。

第二十条：

正确认识和处理领袖、政党、阶级、群众的关系，只能依据列宁提出的三个原则。一、群众是划分为阶级的；二、阶级通常是由政党来领导的；三、政党通常是由比较稳固的集团来主持的，而这个集团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响、最有经验、被选出来担任最重要职务而称为领袖的人们组成的。赫鲁晓夫提出所谓“反对个人迷信”，它实际上是把领袖和群众对立起来，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统一

领导，涣散党的战斗力，丑化无产阶级政党，丑化无产阶级专政。更严重的是，他们借口反对个人迷信粗暴地干涉兄弟国家和兄弟党的内部事务，强行改变兄弟党的领导人，把自己的错误路线强加给别的兄弟党。这种做法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是搞颠覆活动。

第二十一条：

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建立在完全平等、相互尊重领土完整和尊重国家主权和独立、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基础上，必须建立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互相援助、互相支持的原则基础上。同时，每一个国家主要应当依靠自力更生。借口所谓单干、所谓民族主义，反对兄弟国家执行自力更生的方针，这是大国沙文主义。反过来，借口国际分工专业化，把自己的意见强加给兄弟国家，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独立主权，损害别的兄弟国家的人民利益，这也是大国沙文主义。

第二十二条：

兄弟党关系应当遵守四项原则，即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基础上实行联合的原则，互相支持和互相援助的原则，独立自主和平等的原则，通过协商达到一致的原则。一个党把自己置于其他兄弟党之上，干涉兄弟党内部事务，在兄弟党关系中实行家长制，把自己一个党的纲领、决议当作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强加给别的兄弟党，破坏协商一致的原则，用少数服从多数来强行推行自己的错误路线，搞宗派主义和分裂主义活动，都是错误的。

第二十三条：

为了实现各兄弟党一致协议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共同纲领，即 1957 年和 1960 年兄弟党会议通过的两个文件，必须同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各种机会主义进行不调和的斗争。当前主要是反对右倾机会主义也就是修正主义的倾向。在反对主要危险修正主义的同时，也必须反对教条主义。

第二十四条：

革命能不能胜利的关键，是取决于有没有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党。建设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党所必须要具备的条件——。

第二十五条：

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发生的分歧，马列主义者有责任分清是非。为了团

结对敌的共同利益，我们历来主张经过内部协商解决问题，反对把分歧公开在敌人面前。目前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公开论战，是某些兄弟党的领导人强加于我们身上的。我们认为，既然公开论战挑起来了，那么各兄弟党之间就应该在平等的、民主的基础上，采取摆事实、讲道理的态度来解决。某些党的领导人既然公开地攻击了其他兄弟党，挑起了公开论战，他们就没有理由、也没有权利禁止被攻击的兄弟党公开来回答他们。

前三条，可以看作是整个复信的总纲。

第一条，指出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是国际共运的共同纲领，必须坚决捍卫。

第二条，阐明中国共产党关于现阶段国际共运总路线的基本内容，即：“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争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巩固和壮大社会主义阵营，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

第三条，说明这条总路线是同苏共纲领中所说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相对立的，指出如果把国际共运总路线片面地归结为“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那就是违反一九五七年宣言和一九六〇年声明的革命原则。

第四、第五条，分析当代世界的基本矛盾和批判在这个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第六条，是关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国内和国际的主要任务。

第七条，是关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指出美帝国主义企图在全世界建立一个空前未有的大帝国。

第八、第九条，是关于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问题。

第十至十二条，是关于无产阶级革命与和平过渡的问题。

第十三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同被压迫人民、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是互相支持、互相援助。

第十四至十六条，是关于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以及全面禁止和完全销毁核武器的问题。

第十七至十九条，是关于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阶级斗争与“全民国家”、“全民党”的问题。

第二十条，是关于“反对个人迷信”问题。

第二十一、第二十二条，是关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和兄弟党关系的准则。

最后三条，第二十三至二十五条，是关于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问题，划清无产阶级革命党和资产阶级改良党的界限问题，以及国际共运的公开论战问题。

贰、本节简论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是一个纲领性的文件，也是中苏论战中的一个重要回合。一九六四年一月毛泽东指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

《建议》提出的基本观点，对现实斗争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2011 年 4 月 30 日修改

第四章第九节 关于总路线建议的声明战和举行中苏两党会谈

壹、本节概述

一、中苏两党会谈，苏共中央发表《公开信》，苏美英签订部分停止核试验条约

《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复信发表以后，引起强烈震动。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八日，苏共中央发表声明，拒绝中共中央的这封复信，并表示不能在苏报刊上发表这封复信，指责复信“包含有对苏共和其他兄弟党的毫无根据的攻击”。

一九六三年六月十九日，毛泽东决定立即全文发表苏共的声明。

《人民日报》在第二天就刊登了。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一日，苏共中央全会通过一项决议，表示：“苏共中央断然拒绝中共中央对我们党和其他共产党，对苏共第二十次、第二十一和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定，对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和国际革命运动的实际经验制订的苏共纲领进行的攻击，认为这种攻击是没有根据的和诽谤性的。”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有关中苏两党会谈问题时，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六月二十一日日决议，指示他们的代表团根据苏共“20大”、“21大”和“22大”的路线行事。看来赫鲁晓夫已下决心。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很可能是一场恶战，不但比一九五七年严重，而且比一九六〇也要严重得多。

目前的形势是我党开始反攻，苏方转为被动，我方进可攻，退可守，十分有利。这次中苏两党会谈可能有三种结果：

第一种可能是对一些问题达成协议。这些协议基本上只能是1957年《莫斯科宣言》和1960年《莫斯科声明》这两个文件所包括的内容，很难搞出一个比这两个文件好一些的共同文件。因为苏共领导现在已经走得相当远，离开《莫斯科宣言》和《莫斯科声明》也相当远，所以最大限度也只能是暂时在一些问题上达成妥协，不可能超过这两个莫斯科会议的共同文件。

第二种可能是双方大吵一顿。因为要苏方放弃他们的一套很困难，甚至保持1960年声明的水平也困难，而我们也不能从这两个文件的立场后退。结果会谈破裂。这种可能性很大，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第三种可能是大吵一顿，但不破裂，就是吵而不破，形成拖的局面。我们是不愿意破裂的，要争取不破裂。估计苏联现在也不敢破裂，因为破裂对他们也不利，他们同美国的矛盾不好解决。

根据估计的这三种可能性，我党代表团的方针应该是坚持原则，高屋建瓴，放手反攻，以理取胜，不急于达成协议，以不破裂为限度。

我们在坚持原则的同时，也要坚持团结。在公开的场合、在会议的发言中，要抓团结的旗帜，不给他们任何把柄，使他们不能借以把会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我们身上。但是要坚持原则，原则问题不能含糊，不能做任何无原则的让步。要争论就争论，他们吵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我们争取不破裂，即使保持一种非常脆弱的联系也好，不要完全破裂。我们是不主张破裂的，如果苏共想破裂，我们也要尽力把他们拖住，推迟破裂的时间，避免完全的破裂。即使这次会议毫无结果，也要建议下一次会谈在北京举行。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毛泽东连续召开会议研究中苏两党会谈的有关问题。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声明稿。下午二时，在住处召集会议，研究发表声明的有关问题。

当天晚上，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中共中央声明和中共代表团在两党会谈中所采取的方针。

邓小平在会上发言说：最近在主席那个地方多次考虑了谈判的方针。首先要估计一下，这次谈判究竟能不能取得什么结果。看来，取得什么积极成果，现在不可能，赫鲁晓夫也没有这个准备。他现在的一系列步骤，包括驱逐我们六个人在内，就是不想达成什么协议的。原来，常委、主席大家都在考虑，是不是有这么一个可能，他求得达成一个某种限度的协议。我们考虑的结果，根据他现在的态度，根据他现在的措施，不可能。我们这二十五条，挖了他的底，他现在不好讨论这些问题。它的决议，实际上就是拒绝讨论。因此，这次谈判的结果，实际上只能是两个前途：一个叫拖，一个叫破。今天在主席那里谈了这个问题。第一

条要放在他破，我们不主动破。我们不给他一个借口，好像我们首先来破裂。今天政治局决定了这样的方针，我们代表团轻松愉快，就好办了，就比较自由了。至于讲话，当然也不给他抓我们，也要讲分寸，也要站得稳。

周恩来在会上发言说：主席今天也说了，这是边缘政策。现在的问题就是一个破裂，一个拖。这个破裂必须要准备。今天主席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一破二拖，达到边缘，你走到哪里，我们代表团跟到哪里，摆到边缘，看你敢不敢破裂。我想，在破裂和拖以外，还会出现又破又拖的情况。我们要准备他破，但是又可能拖，拖里头又要破。总是在一破二拖、破中又拖的斗争中，极其复杂地交叉着。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斗争。主席说一破二拖，这个问题就全面了，辩证了。

一九六三年七月一日，中共中央发表声明，宣布参加中苏会谈的中共代表团组成人员，邓小平为团长。

一九六三年七月四日，在讨论苏共中央七月四日声明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7月4日苏共声明表明赫鲁晓夫已决心在会谈中对我系统攻击，而且还要在报刊上公开正式点名同我论战。形势已进一步恶化，同时又有情报说苏政府正同美英两国谈判，要签订部分禁止核试验协定，目的是共同对我施加压力迫我放弃核计划。赫鲁晓夫已走到同帝国主义相勾结，共同对付原来是苏联盟邦的中国。这表明，苏方已对两党会谈无诚意，断绝了协议的道路，迫我屈服。对此我们必须更加强调坚持原则，也并不放弃争取不破裂的机会，但必须有破釜沉舟的坚定性，才能击退苏方的攻击，争取破而不裂。我代表团此次去莫斯科，达不成协议，不向赫鲁晓夫下跪，就是胜利。

一九六三年七月六日至二十日，举行中苏两党会谈。会谈中双方展开了激烈辩论。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三日，根据会谈情况，《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我们要团结，不要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五日，苏联宣布：苏美英三国关于部分停止核试验谈判开

始。赫鲁晓夫重演联美反华。

一九六三年七月十九日，在中苏会谈中，康生发言，点名批判赫鲁晓夫过去吹捧斯大林，从“20大”起又咒骂斯大林，前后矛盾，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同日，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的苏匈友协大会上讲话，攻击中国采取独特的路线，搞分裂。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共中央发言人的声明，指出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的内容是不符合事实的，观点是我们不能同意的。

同日，《人民日报》发表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并加编者按语。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在迎接参加莫斯科会谈回国的代表团时，毛泽东指出：

代表团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完全的胜利是什么呢？你们没有同苏方达成任何有失原则的协议，这就是完全的胜利。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就是两党会谈告一段落，像公报所说的，以后再继续举行。留这么一个尾巴，这么一个余地，就是说中苏两党的关系还不是完全破裂。但是，离破裂也差不多，已经到边缘了。赫鲁晓夫曾经说，邓小平人那么矮，但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事实上是这样，赫鲁晓夫都搬不动你、斗不过你，苏斯洛夫更不在话下。这次你们取得了完全胜利，完成了任务，做了一件好事情。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

当时，中国正在抓紧进行核装置的研制工作。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

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三十日，毛泽东连续三天召开会议，研究对策。七月三十一日，针对三国条约，中国政府发表了由周恩来主持起草修改、毛泽东审定的声明。在这个声明中指出：条约旨在巩固他们的核垄断地位而把一切受核威胁的爱好和平的国家的手脚束缚起来。中国政府建议，全世界所有国家（有核国家和无核国家）庄严宣布全面、彻底、干净、坚决地禁止和销毁核武器。

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

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二、评苏共中央《公开信》

一九六三年七月底，在准备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由于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是公开指名攻击我们党的，这使我们得到解放，可以在回答他们时也公开地指名道姓地批评苏共领导，特别是可以指名批评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因为数他讲话最多，出头露面最多，而且他的这些讲话又是前后矛盾，逻辑混乱，漏洞百出，语言粗野，有时甚至胡说八道。我们的评论，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八月初，在中央政治局常委研究如何评论苏共《公开信》时，毛泽东指出：

1，信已指名道姓攻击我们，我们的评论也要指名道姓，苏方已公开论战，我们也公开论战。

2，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评论紧紧抓住《公开信》，直接指名苏共领导。对其他兄弟党的反华言论暂不置理。

3，擒贼先擒王，矛头对准赫鲁晓夫，他是急先锋，讲话也最多，最恶劣。

4，步骤上先发表苏共的反华言论，特别是赫鲁晓夫最近两篇讲话，其他的也可精选发表一些，挂一笔帐。

5，评论有严肃的辩论，也有抒情的讽刺，有中国风格和气派，刚柔相济，软硬结合，可以写得很精彩。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1、中苏两党的分歧，早在 1956 年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时已经开始了。那是苏共领导走上修正主义道路的第一步。

2、我党在斯大林问题上一贯不同意苏共领导的观点；苏共二十大引起的后果是严重的；1957 年兄弟党莫斯科会议期间，中苏两党争论很多，我们并没有公开。

3、苏共领导修正主义的发展，提出“三和”“三无”的修正主义路线；1958 年和 1959 年中苏关系的两大事件。

4、苏共中央 1960 年夏天在布加勒斯特会议上对中国共产党发动袭击。

5、1960 年冬莫斯科兄弟党会议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 6、 1962 年苏共 20 次代表大会通过新纲领，形成了完整的修正主义体系。
- 7、 苏共在 20 大以后发动“三反”运动（反马列主义、反国际共运、反华）
- 8、 两党分歧是由于苏共领导推行修正主义、分裂主义路线。

文章把中苏两党自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来的矛盾和分歧，及其发展、升级和扩大的过程，公之于众。

从这篇文章中，人们不难看到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所作所为，也不难领略到中国共产党敢于同苏共的老子党作风和大国沙文主义作斗争的风骨。

文章指名道姓地批评了赫鲁晓夫，并且指出，目前国际共运的大论战，是由苏共领导一手挑起和扩大起来的。论战已经开始，就必须把是非彻底地弄清楚。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毛泽东对《二评》先后修改了三次，提出一些重要意见。

第一次是对九月二日稿的修改，把原先的标题“为什么甘当斯大林的敌人”改为“关于斯大林问题”。在文章开头加写了一段话，这段话以后又作了修改，形成最后的文字是：“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派别，意见不同。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但是，在国际工人阶级和革命人民范围之内，多数人的意见其实是相同的，他们不赞成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越来越怀念斯大林。就是在苏联，也是如此。我们同苏共领导人的争论，是同一部分人的争论。我们希望说服这一部分人，以利于推进革命事业。这就是我们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在九月二日稿谈到斯大林的错误和他一生的评价的地方，毛泽东加写了一段话：“对于斯大林的只占第二位的一些错误方面，应当作为历史教训，使苏联共产党人和各国共产党人引以为戒，不再重犯，或者少犯一些，这也是有益的。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只要是总结得正确，合乎历史实际，而不加以任何歪曲，对于一切共产党人，都是有益的。”

在谈到中国共产党抵制斯大林对中国的某些错误的的影响的时候，九月二日稿写道：“早在三十年多以前，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的影响，并且逐步克服了‘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错

误路线，终于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对这句话作了重要修改，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写上了刘少奇的名字，把刘少奇同毛泽东并列为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代表。毛泽东修改后的文字是：“早在二十年代末期和整个三十年代，随后又在四十年代的初期和中期，以毛泽东同志和刘少奇同志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就在抵制斯大林的某些错误的影响……。”

谈到中国共产党人对待犯错误同志的态度，毛泽东补充了一个重要内容：

“对于犯错误的同志，只要改了就好了。如果他们不改，也可以等待他们在实践经验中逐步觉悟过来，只要他们不组织秘密集团，暗中进行破坏活动。”

在谈到斯大林做错了事能够做自我批评时，毛泽东加写了这样一段：“就是肃反错误，斯大林在一九三八年苏共第十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也是承认了的。”

九月六日，康生和吴冷西送上了修改后的九月五日稿。毛泽东作第二次修改，这次修改不多，主要是在谈到马克思主义者对待虽然犯过错误仍不失为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人物如卢森堡、倍倍尔等人采取的态度时，增写了两句话：“倍倍尔、卢森堡等人在历史上所起的作用，远不能同斯大林相比。斯大林是一个历史时代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伟大的领导人，对他的评价，应当更加慎重些。”

九月十一日，毛泽东对《二评》作最后一次修改。在讲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的否定之处，加写了一段话：“绝大多数苏联人，不赞成这样谩骂斯大林。他们越来越怀念斯大林。苏共领导人严重地脱离了群众。他们时时刻刻感觉到斯大林的阴魂不散，在威胁着他们，其实是广大人民群众对于全盘否定斯大林表示非常不满意。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至今不敢拿出来同苏联人民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各国人民见面，其原因就在于这个报告是一个见不得人的报告，是一个严重脱离群众的报告。”在文章的结尾，又补写了这样一句：“我们劝告赫鲁晓夫同志一句诚恳的话，希望你迷途知返，从完全错误的道路，回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道路上来。”

《关于斯大林问题》的要点：

1，斯大林问题是一个世界范围内的大问题，曾经引起了世界各国一切阶级的反响，至今还在议论纷纷。各个不同的阶级，代表各个不同阶级的政党或政治

派别，都发表了种种不相同的意见。估计在本世纪内，这个问题还不可能作出定论。

2，必须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按照历史的本来面目，全面地、客观地、科学地分析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而不应该用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任意歪曲和篡改历史，主观地、粗暴地全盘否定斯大林。

3，斯大林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一生，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也确实犯了一些错误：他在党内和党外的斗争中，有些时候，在有的问题上，混淆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和处理这两类矛盾的不同方法；他领导的肃清反革命的工作中，正确地惩办了很多必须惩办的反革命分子，但是也错判了一些好人，造成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他在党和国家组织中部分地违反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他在处理兄弟党、兄弟国家的关系方面，也出过一些错误的主意。

4，在赫鲁晓夫歪曲历史、全盘否定斯大林的情况下，我们为斯大林辩护，是为斯大林的正确方面辩护，为十月革命创造的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和苏联共产党的光荣历史辩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全世界劳动人民中的声誉辩护。

5，赫鲁晓夫等人对斯大林采取全盘否定的错误态度。

6，赫鲁晓夫咒骂斯大林，用尽了一切恶毒的语言。

7，赫鲁晓夫在过去曾经称赞斯大林。

8，苏共领导反对斯大林，是为他们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全面地推行修正主义的路线开辟道路。

《关于斯大林问题》发表，进一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一贯立场、中苏两党在斯大林问题上的原则分歧，对赫鲁晓夫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行所作的揭露和批驳，可以说是淋漓尽致。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一日，苏联政府发表了一个声明。法新社评论说，这个声明“使中苏争论进入一个新阶段”。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五日，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给中央发来一个对苏联政府声明的分析报告。

毛泽东先让杨尚昆当场念了这个报告。报告认为，苏联政府的声明，除了答

复我九月一日的声明外，还企图回答我最近对它的揭露。对我公布内部文件非常害怕，流露了其立场虚弱、怕我党揭底的心情。报告还认为，苏联领导人近来比较集中地攻击我制造分裂，是在为全面分裂作准备。目前，苏联方面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造成一种要求“停火”、“谈判”的舆论，企图阻止我新的反修攻势，并想“找借口嫁祸于我”。毛泽东说：

“大使馆他们在前线，这个分析很近乎事实。大家担心的是形势问题，尤其是国际形势。有些同志担心苏、美合作对我们不利。我总相信《红楼梦》上王熙凤说的那句话，‘大有大的难处’。现在，美、苏两国都很困难。美国政策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曾发表一篇文章，基调是说美、苏都碰到了许多困难，而且是没法解决的。我也不认识这个人，他同我的某些想法不谋而合，差不多。美国不论国内、国际到处都碰钉子；赫鲁晓夫也是这样。不要忘记这一点。还是《红楼梦》上冷子兴说的，‘百脚之虫，死而不僵’。美国《锤与钢》杂志也说：美国像一株空了的大树，里边已被虫子咬空了，外边还枝叶茂盛。”

“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一个是亚、非、拉，一个是欧洲。日本、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以戴高乐为代表的，有六国共同市场，都是些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东方的日本，是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不满意，对苏联也不满意。东欧各国对苏联赫鲁晓夫就那么满意？我不相信。情况还在发展，矛盾还在暴露。过去几年法国人闹独立性，但没有闹到今天这样的程度。苏联与东欧各国的矛盾也有明显发展，关系紧张得很。什么缓和国际形势，不要信那一套。苏、美达成协议，我看不那么容易。大西洋许多国家也不会赞成美国。戴高乐到处说法国不当卫星国，他们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赫鲁晓夫说我们同戴高乐站在一条战线上，其实我们同戴高乐也没有见过面。我们无论国内、国外，主要靠人民，不靠大国领袖。靠人民靠得住。”

“我们的方针是确定的。去年在这个地方少奇同志讲了一篇话，今年小平同志讲了一篇，刚才总理又讲了一篇。还是这个方针，叫做坚持原则，坚持团结，坚决斗争，留有余地，后发制人，反对分裂。我们按照这样几句话去做。每一篇文章总是留有余地。现在苏联也学我们，它也是留有余地。凡是气势汹汹的，你不要看它气势汹汹，其中有问题，外强中干。它不敢发表我们的东西。只看这一条，就知道它怕。究竟我们怕修正主义厉害些，还是修正主义怕我们厉害些？我

看，它怕我们怕得厉害些。它有三怕，就是那一天小平同志讲的，一怕帝国主义，二怕‘教条主义’（就是我们），三怕人民、老百姓。”

毛泽东的讲话中，对中苏论战开始以来的情况作了分析，对今后将继续坚持的方针作了阐发，反映出他对当时国际形势的一些基本估计和看法。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1，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因素在发展（1961年南联邦预算收入的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

2，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

3，赫鲁晓夫以南斯拉夫为楷模，推行他的修正主义路线。

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批驳苏共领导为被压迫民族开的四个药方：第一，用和平共处、和平竞赛来代替民族解放运动；第二，由美苏两国合作来援助落后国家；第三，把裁军省下来的钱支援拉丁美洲、非洲、亚洲的落后国家；第四，通过联合国来消灭殖民主义。

这篇文章，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在对待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解放运动上的政策。文章重申，民族解放运动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是当代两大革命潮流。亚非拉是当代世界各种矛盾集中的地区，是帝国主义统治最薄弱的地区，是目前直接打击帝国主义的世界革命风暴的主要地区。这是中共中央六月十四日复信中提出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毛泽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一个基本观点，他在会见外国客人，特别是众多的亚非拉国家的外国客人时，总是讲这个观点。

《四评》认为苏共领导对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实行的政策是：以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代替民族解放运动；主张由苏美两国合作援助落后国家；通过裁军来消灭殖民主义；通过联合国消灭殖民主义。文章对苏共领导散布的所谓“黄祸论”

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毛泽东提出，讲战争与和平的文章要有新意：一要指出当前美苏是假和平、真备战，主要揭露美国的扩军备战；二要说明我一贯努力执行和平外交政策。问题在于如何真正制止战争、真正维护和平，而且讲究策略。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在加勒比海危机中采取的那样先犯冒险主义，后犯投降主义的方针。

毛泽东审阅这篇文章时，加写了一个名句：“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毛泽东对真理标准问题所作的完备表述，现在已被人们普遍认为是一个经典的概括。

《五评》共分六个部分。

第一部分“历史的教训”，回顾了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主要论点，以及列宁对这些论点的揭露，指出赫鲁晓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观点是第二国际修正主义的翻版；

第二部分“最大的骗局”，揭露了赫鲁晓夫对于美国所抱的种种幻想，指出美国是当代侵略和战争的主要力量，以及他们推行“和平战略”的企图；

第三部分“关于防止新的世界战争的可能性问题”，详细阐明了毛泽东关于新的世界战争可能防止的论点，同时又强调要消灭战争就必须消灭帝国主义的观点；

第四部分“核迷信、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着重批驳苏共领导关于“核武器改变了以前关于战争的概念”的种种论点；

第五部分“是斗争还是投降”，阐明了毛泽东关于针锋相对的斗争策略，指出只有依靠人民群众，同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才能有效地保卫和平；

第六部分“保卫和平的道路和导致战争的道路”，是对全文的总结，试图说明中苏两党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是既取得革命胜利又赢得世界和平的路线同适应美国“全球战略”、助长战争危险的路线的对立。

文章指出，核迷信和核讹诈是现代修正主义在战争与和平上的理论基础和政策指南。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三日下午，苏联驻华大使契尔沃年科向杨尚昆和伍修权递交了一封由赫鲁晓夫署名致毛泽东的信。这封信所署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九日。

这一天下午，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正在举行闭幕会议，毛泽东让邓小平在人大会议上宣读了这封信。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要求停止公开论战，并表示希望改善中苏两国关系，包括加强经济、科技合作联系，可以提供成套设备，可以派苏联专家到中国帮助建设，在制定新的五年计划时，两国能够互助合作，对中苏边界的某些地段可以通过谈判解决分歧。还表示：“苏联报刊已经停止发表论战性的材料。”

对苏共中央的这封信如何答复？要不要继续发表评苏共中央公开信的文章？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说：

考虑到我们对他们七月十四日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他们发表的两千多篇反华文章还没有开始答复，还有四十几个兄弟党发表的攻击我们的决议、声明，我们也都没有答复。在这种情况下，对于他们呼吁停止公开论战，我们不忙答复，还是继续写我们的评论。关于贸易问题，关于五年计划问题，无非是想做生意，现在也没有完全断绝贸易往来，无非想增加一些。关于边界问题，可能他们也想谈一谈，摸摸我们的底。至于专家问题，那真是岂有此理，他们要撤就一下子全部撤走，现在又想派人来，我们并不是傻子。

下一篇和平共处的文章，要说明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我们首创的，是一贯坚持的方针并身体力行。要把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同列宁在苏联建国初期主张的和平共处加以比较，说明赫鲁晓夫篡改列宁的学说。我同苏共领导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本质是：和平共处是否是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全部，是否是总路线，是否只有退让才是和平共处，还要不要同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扩张作斗争；能不能因为和平共处而放弃进行或支持民族独立运动和各国人民革命斗争。要引用杜勒斯的话，戳穿美国所谓和平共处是搞和平演变。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这篇文章就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写的，说明两种不同的和平共处。

文章概述了列宁和斯大林的和平共处政策，把列宁关于和平共处政策的基本

思想概括为五条，强调同帝国主义国家和平共处是靠斗争得来的，强调列宁所说的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根本原则不是和平共处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强调被压迫阶级同压迫阶级、被压迫民族同压迫民族不能和平共处。

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丰富了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国际事务中，对于不同类型的国家，对于同一类型国家的不同情况，采取区别对待的方针：把社会主义国家同资本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新获得独立的民族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把一般资本主义国家同帝国主义国家加以区别，以及对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也区别对待。

文章指出，中国政府坚持和平外交政策，一九五四年倡议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以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无产阶级为核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统一战线”。

文章逐条批驳了苏共领导人关于和平共处问题的主要观点，认为这些观点同列宁的和平共处政策在三个问题上存在原则性分歧：（一）实现和平共处，能不能消除社会主义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和斗争？（二）和平共处能不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总路线？（三）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共处政策能不能作为所有共产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能不能代替各国人民的革命？文章认为，“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适应美帝国主义的需要”，“苏美合作是苏共领导的‘和平共处’总路线的灵魂”。

一九六四年一月元旦过后，在中央政治局两次讨论苏共来信的常委会上，毛泽东指出：

赫鲁晓夫这封信是逼出来的，是公开论战的结果，是斗争的结果。赫鲁晓夫本来就一怕革命人民、二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三怕帝国主义，现在又增加一个怕，即怕公开论战。但是，也应该看到，他的这个做法有两面性，一方面固然是表明他要应付那些过去跟他一起走而现在对他不满的人；另一方面他采取这么一个步骤还包含嫁祸于我的企图，说中苏关系恶化，在于中国不赞成停止公开论战。

现在总的形势是赫鲁晓夫一天不如一天，作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发展的最高峰是苏共“22大”，那是他走到顶点，从此以后就走下坡路。我们虽然在1962年底、1963年初写了七篇文章，进行反击，但是一直到1963年6月14日我们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的答复信，在表面上似乎我们是处

于被动地位，实际上是诱敌深入，等待时机。我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总路线的建议的提出以后，我们形式上也转入主动，摆开全面出击的阵势。从那以后，我们又抓住苏共《公开信》转入战略反攻。现在正是转入全面反攻的时候，正像国内解放战争时期，1947年7月刘邓大军南渡黄河、逐鹿中原，我军战略反攻开始那样。因为有《苏共中央给苏共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的公开信》这个靶子，我们就可以放开手脚，堂堂正正地进行公开大论战了。

现在的情况对我们非常有利。我们不急于答复他们这封来信，更不同意停止公开论战，召开国际会议更谈不上。我们还要继续写文章，现在已经写了六评，还要写七评、八评、九评、十评。但是，我们也要认真地准备回答他们的来信。

现在对兄弟党可以既往不咎。豺狼当道，焉问狐狸。要集中攻赫鲁晓夫，因为他爱讲话，逞英雄，冲到第一线，说话最多，也最粗野，辫子一抓就是一大把。其他可以放在一边，网开一面。

我们要做一个10年计划，因为文章太多，决议也很多，答复起来很费时间。我们现在才发表了六篇文章，七评、八评、九评、十评还没有发表。平均起来，大概一个月发表一篇。因为我们是采取认真的态度，严肃的态度，是摆事实、讲道理，所以要费一些时间。做一个10年计划差不多。如果他们继续发表攻击我们的文章，我们奉陪到底，也许不止10年，还要更长一点时间。这点道理，我们要向兄弟党讲清楚，对左派要讲清楚，对中间派要讲清楚，甚至对一些跟着赫鲁晓夫跑的兄弟党也要讲清楚。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在修改过程中，毛泽东指出：

讲兄弟党的关系要从辩证法讲起。世间事物都是对立统一，一分为二。《三国演义》开篇就说天下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是在分分合合过程中发展的。从第一国际到第二国际都是如此。要把这个规律结合当前实际，大批赫鲁晓夫搞分裂活动。党的分裂是从思想分裂开始的，然后才有组织分裂。修正主义是思想分歧，长久下去，势必导致组织分裂，修正主义就是分裂主义。然后讲清楚各国党不论大小，都是平等的，独立自主，联合是斗争的需要，相互关系应有准则。搞大党主义就会损害团结，制造分裂。

《七评》搞了两个多月，修改了十八次，我们在文章发表的前两个星期才想出了一个题目《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这篇文章原定是讲兄弟党关系的，多次改变题目，改变结构，写得比较吃力。”“此稿前后一共修改了十八遍，比我们过去的几篇文章花的力气都大，时间也最长。”

文章从总结一百多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特别是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历史教训中破题，提出三个论点：

第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里来，不可避免地产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分裂活动，马列主义和国际工人运动正是在这种对立面的斗争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的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质上是马列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是分裂主义的政治和思想根源。

第三，无产阶级的团结是在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中巩固和发展起来的。文章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运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

文章揭露了苏共强加于人的老子党作风和把本国利益凌驾于兄弟国家利益之上的大国沙文主义，并驳斥了加给中共的种种罪名，如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的意志”、“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等。文章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加强国际共运团结的主张。

《七评》发表前，毛泽东在审定一月二十八日稿时，有两处增补。

一处是在“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部分，加写了“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

另一处是在“目前的公开论战”部分，加写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科学是不怕论战的，怕论战的不是科学”。

前者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后者表达了他对这场论战的充分自信和将这场论战进行到底的决心。

文章分三部分：

1、总结 1848 年起到 1919 年第三国际成立这一段的历史教训：第一，国际

工人运动同世界任何事物一样，总是一分为二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共产主义队伍中来，不可避免地发生机会主义以及由此而发生的分裂活动。第二，在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各个不同历史时期，维护团结同制造分裂的斗争，实际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斗争。

2、指出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已经成为现代修正主义的主要代表，也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大的分裂主义者。从苏共“20大”到苏共“22大”，修正主义逐步形成完整的体系，同时也逐步形成最大的分裂主义。苏共领导提出的所谓“反苏”、“争夺领导权”、“抗拒多数意志”、“破坏国际纪律”、“支持兄弟党的反党集团”等谬论，都是错误的。

3、我们要的是真团结，不是假团结。

三、就给苏共复信同兄弟党商量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三日和二十四日，毛泽东两次审阅复信稿，并要康生、陈伯达邀几个人开会再讨论一下复信稿。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邓小平率代表团访问河内与越南代表团会谈，征求对复信稿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六日至三月五日，毛泽东率代表团在北京与金日成率领的朝鲜代表团会谈，征求对复信稿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同金日成会谈中，毛泽东说：

苏共中央在去年 11 月 29 日给我们来了一封信，我们对他们过去 7 月 14 日发表的那个《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所以我们当时决定不急于答复，拖了近三个月。最近我们中央决定，要答复他们。因为这封信关系比较大，提出了比较重要的问题。有一些是中苏两国、两党之间的问题，有一些关系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问题。所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商量一下，在内容上、步骤上想听听你们的意见。从内容上讲，去年 11 月 29 日苏共中央的来信连中苏两党继续会谈的问题都没有提，而我们这次复信准备郑重其事地答复他们，提出一个积极的谋求团结的建议。我们想在这封信里提出三点建议：第一，重新举行中苏两党会议，作为 1963 年 7 月那次没有结果的会谈的继续。第二，召开 17 国的共产党会议，也可以叫做起草委员会，为召开全世界的共产党会议做准备。第三，召开全世界 81 个或者 100 多个党的代表会议。我们提出这三点积极的建议，请你

们考虑，妥当不妥当。按照我们的设想，中苏两党会谈的时间，原来想在 7 月举行，现在已是 2 月底，准备来不及，拟改在 10 月。这样，苏联方面可能说太迟。我们想，如果他们觉得太迟，可以提前到 9 月，如果他们觉得还是太迟也可以提前到 8 月，但 7 月不能举行，太仓促了。我们是这样考虑的，也请你们考虑一下，妥当不妥当。因为如果现在就举行中苏两党会谈，毫无准备，肯定谈不好。要谈就要先有文件草案，起草文件需要花时间，所以 7 月来不及。过去 1957 年和 1960 年召开的两次兄弟党会议，文件都是他们起草的，我们只在他们的基础上修修补补。这一次，我们想提出一个纲领性的文件，或者是一个宣言草案。这次要开全世界兄弟党代表会议，总要开得比 1960 年 81 党会议要好一点，不能退步。很可能是他们提一个草案，我们也提一个草案。我们希望，这两个草案在中苏两党会谈中能够通过协商形成一个共同的文件草案，然后提到 17 党起草委员会上去，这样最好。如果不行，就把中苏两方的文件一同提到 17 党会议上去。如果 17 党会议达不成协议，那就休会一个时期，再来开第二次会议，反正起草委员会要达成共同的协议以后，才能召开全世界共产党代表会议。这个月发生的两件事值得注意。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开了中央全会，并作出了决议，说要对我们进行“坚决反击”。再一件事情是，苏共中央在 2 月 12 日写信给兄弟党。内容是什么？不外乎是要对中国党采取所谓“集体措施”。对于这封信，我们在 2 月 20 日曾经写信给苏共中央，要求他们把这封信也给我们。但是过了两天，2 月 22 日他们来信说，我们的信说“要求”而不是请求他们，他们不给。我们又在 2 月 27 日写了一封信，在信里说，过去我们说“要求”，你们不给，那么现在我们就根据你们的说法，我们“请求”你们把这封信给我们。估计他们也可能不给，也可能给，不给的可能性大一些。看来苏共领导现在搞两手：一手是他们开中央全会说要“坚决反击”，给兄弟党的信说要采取“集体措施”。这是采取高压办法，甚至可能采取公开分裂的步骤。另一手是要罗马尼亚派代表团到中国来，由罗马尼亚出面调停。罗方本来说很决就来的，可是在我们同意他们以后，他们又拖了半个月，将在三月一日动身，2 日到北京，而且还放空气说谈不好不走。罗马尼亚党代表团要达到什么目的？无非是调停，无非是要我们让步。但是，我们怎么好答复他们呢，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苏的“坚决反击”、“集体措施”是什么，我

们

让什么步呢？现在要跟朝鲜同志商量一下，我们对罗马尼亚同志采取什么样的方针。估计他们是为调停而来，首先是为要求停止公开论战而来的。当然，为着照顾罗马尼亚，公开论战稍停一下是可以的。这个问题我们中央还要讨论，也想听听你们的意见。（金日成说，稍微停一下论战是可以的，条件应该是我们停止论战以后，如果赫鲁晓夫再攻击中国党，那么罗马尼亚同志要站在我们一边反对赫鲁晓夫。）你提的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不知道罗马尼亚同志愿意不愿意。看来赫鲁晓夫现在是搬走石头打自己的脚了。他原先设想公开论战对他有好处，结果公开论战起来了他又怕，怕我们揭他的底，怕我们戳穿他的修正主义面目。但是，这个人很难捉摸，他很可能恼羞成怒。我们有过这样的经验，1960年他撤专家，撕毁一切合同、协定，就是一个例子。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八日，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归纳大家的意见说：和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的方针中：

第一，在停止公开论战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所有发表过文章、做过决议攻击我们党的，公开承认错误，宣布撤销它的决议。如果做不到就不能停。但是，为着对罗马尼亚表示礼貌，在中罗两党会谈期间，我们不发表批评赫鲁晓夫的文章。只是在这个期间不发表，过了这个期间我们继续发表。

第二，我们答复苏共中央去年11月29日来信的复信，要在罗马尼亚代表团到达中国之前发出。因为我们的答复信提出了积极的建议，是我们早就决定了的，同罗党无关，这样我们更加主动。

第三，对罗马尼亚党和国家应该继续采取加强友好合作的方针，要体谅他们所处的困难地位，要争取同他们共同行动，抵抗赫鲁晓夫的大国沙文主义。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在同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作过一首诗，是讲解放南京的。这首诗里有这么两句：“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现在我们对赫鲁晓夫还是要追穷寇，而不是莫追穷寇，跟那时对待蒋介石一样，但不是真刀真枪，而是笔墨官司。在去年他们发表7月14日的苏共中央给全体党员的公开信之前，我们很难公开指名批评他们。我们在去年6月14日给他们的那个关于总路线的建议的信里都没有指名。一直到那个时候，我们都没有指名批评苏共和赫鲁晓夫。只是在他们发表《公开信》以后，那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

了。过去很难指名，因为他没有指我们的名。而他们公开发表《公开信》公开指名攻击我们，那样我们就可以公开指名答复他们。现在看起来，我们6月14日讲总路线的那封信，我们的论点是同他们针锋相对的，那样刺绣他一下有好处。他忍不住了，他公开跳出来大骂我们了，那样我们就解放了，我们也可以公开指名批评他们了。原来他们（指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是要早来的，后来又推迟了半个月。看来他们来华之前要跟苏共方面交换意见。

一九六四年二月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正式通过了这封复信。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的复信送交苏共中央。

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复信的最后，对停止公开论战提出了四点建议：（一）必须经过中苏两党和其他有关兄弟党，进行各种双边的和多边的会谈，通过协商，找出一个能为各方所接受的公平合理的办法，达成共同的协议；（二）在举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之前，应当做好准备工作，使这个会议成为在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原则的基础上团结的大会；（三）中苏两党继续举行会谈是开好兄弟党会议的必要准备步骤，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到十五日在北京继续举行两党会谈；

（四）在中苏两党会谈之后，举行阿尔巴尼亚等十七国^⑥兄弟党代表参加的会议，为各国兄弟党代表会议作进一步的准备。

四、就停止论战与罗马尼亚党交锋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四、五日，刘少奇率代表团与罗马尼亚代表团会谈三次。

一九六四年三月五日，毛泽东与金日成会谈。毛泽东说：罗马尼亚党现在和过去相比是有些不同。他们与赫鲁晓夫有矛盾，但在思想上也有许多共同点。他们的地理位置没有东方国家好，这对他们不利。他们的贸易百分之四十要靠苏联，这种情况对罗马尼亚是有影响的，这是根本问题。他们对许多问题不清楚，但他们想说服胡志明，说服你们，还想说服我们。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六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

罗马尼亚这个党，在思想上和赫鲁晓夫相同的东西很多。他们这次来调停完全是一种实用主义，不讲是非，只要停下来就行。但是它跟苏共还存在相当多的矛盾，它的民族情绪比较强烈，反抗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我们坚持原来的方针不变，要继续对罗马尼亚做说服工作，口气不妨缓和一些，但是问题要提得尖锐，要指出他们不公平。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

我们的方针照旧不变，没有协议就不能停，把罗马尼亚的要求顶回去。他们的代表团一走，我们就继续发表反修文章。

一九六四年三月七日，苏共中央又复信中共中央，对二月二十九日的信提出的各点内容逐条批驳，并指责中共“只是为了让自己占有‘老子党’的地位”。复信同意在北京举行两党会谈，但要求把会谈的时间从十月提前到五月；同意举行有部分兄弟党参加的筹备会议，并建议在一九六四年六、七月间召开，但不赞成中共提出的十七国名单，坚持要由参加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起草委员会的所有二十六国⑦兄弟党组成筹备会议；同意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召开的时间为一九六四年秋。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中罗两党继续会谈。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他们（指我党代表团同志）这些人都是好战分子，而且包括我在内。我是“好战”出了名的。联合国叫我是“侵略者”，说我们“侵略”了朝鲜。赫鲁晓夫又封了我们“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分裂主义”、“民族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等，还有“假革命”、“跟帝国主义站在一起”，说我们这么坏。如果我们真是这么坏，那他们应该攻击，应该批评。如果他们不批评，那他们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苏共中央的2月全会做了决议。你们罗马尼亚同志说不让他们发表，我看办不到。他们中央委员会开会有6000多人参加，在会上批评我们一通，并且做出决议。你们要把它压下来，要他们不批评我们，这能办得到吗？

做了决议而且公开发表的，一共有40多个党，现在我看他们这些人下不得

台阶，你们说他们怎么办？要下台阶可以，那他们得公开承认错误，撤销决议。否则总有一天我们是要回答的。礼尚往来，来而不往非礼也。其实，你们也不用那么着急，这不过是打笔墨官司，有什么要紧呢，写写文章，讲讲话，有什么要紧呢。

我们这些人也不是那么好战。我当过小学教员，从来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在座的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彭真同志这些人，都没有进过军事学校，原来都没有想要打仗。是谁要我们打仗呢？那就是我们过去的那个朋友，叫蒋介石，是他教我们打仗的。他的背后还站着美帝国主义。他用杀人的办法，逼得我们没有办法，只有照他的办，只好打仗。这叫逼上梁山，官逼民反。这么一打，就打了 25 年，因此我成为“好战分子”，成了“侵略者”。这是讲的打武仗。现在不是打武仗，现在是打文仗，打笔墨官司，写文章。这件事情还轻松愉快。你看，打了这么几年，没有死一个人。武仗可以打，文仗为什么不可以打？其实，你们知道我们也是不想打的，我们对打这个文仗也没有精神准备，谁想跟苏联闹翻呢？

闹翻的是开始于 1958 年，还不是 1960 年在你们布加勒斯特召开的那个会议。在 1958 年赫鲁晓夫要搞所谓中苏舰队，要占领我们全部海岸线。那个时候，赫鲁晓夫为建立中苏共同舰队到中国来。我对他讲，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都交给你，要么是中国全部海岸线由我管，要么就是划一部分给你，这三条随便你选择。赫鲁晓夫说，要是全部交给苏联那你们干什么呀？我说，我总有工作做，我可以去打游击。他说现代战争中打游击不顶事。我说，那把一部分海岸线交给你，你们再回到旅顺、大连去好不好？他说已经撤了，再回去影响不好。我说，那中国的海岸线还是全部由中国管，苏联帮助我们建立海军。赫鲁晓夫不干，他认为还是搞共同舰队好。我说，不行，要么全部交给你，要么是全部由我管。这就闹翻了。他是想控制中国。

在这之后还有 1959 年的事。赫鲁晓夫到美国之前，先发表一个塔斯社声明，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站在印度那一方面，反对中国。到了美联社国之后，他又跑到中国来，劝我们放弃台湾，还劝我们释放一批被我们关起来的美国犯罪分子。我说这都不行。他说，他离开美国到中国来的时候，艾逊豪威尔跟他讲，你到北京去是白跑一趟。那次赫鲁晓夫确是白跑了一趟。你们这回是不是又白跑一趟？

请你们去告诉赫鲁晓夫，中国人就是这样顽固的，叫做寸步不让，寸土必争，

针锋相对。赫鲁晓夫给我们来信，说他不跟中国搞针锋相对。他搞针锋相对也好，不搞针锋相对也好，反正我们是要搞的。苏联的两千多篇文章，每一篇都要答复的。还有 40 多个党做出的决议，我们也要答复的。无论做决议也好，没有做决议也好，每一篇文章，每一个决议统统要答复。中国人就是“顽固分子”，“顽固分子”不只是邓小平他们这些人，首先是我。有时候我比他们更“顽固”一些，更“好战”一些，更“侵略”一些，但也有时候他们比我更厉害一些就是了。刚才我讲过，我们也不是愿意公开论战的，公开争论是赫鲁晓夫他们挑起来的。既然已经挑起来，就需要有一个公平合理的解决办法。而且我认为，这种公开争论不要紧，不要那么紧张。第一条不杀人，第二条天不会塌下来，第三条山上的树木照样长，第四条河里的鱼照样游，第五条女同志照样生孩子。这五条，除了公开论战不杀人这一点以外，后边四条我都跟苏联大使讲了，他们在去年 11 月 29 日的那个信里面也承认我讲的这些话是正确的。所以我们认为公开论战还要继续下去，我们还要答辩，大概还要十年才能答复完。因为他们有两千多篇文章。他们还要采取什么措施随他去。火是包不住的。我不相信他不发表。他发表更好。如不发表，那个病毒不发作，病就好不了。他是否已经说够了呢？反正我们还没有说够，因为我们对两千多篇文章只答复了 7 篇，还差 1993 篇。这还不讲其他四十几个党的，只是苏联的就有两千多篇。

我说赫鲁晓夫闯了个大祸，他把妖魔怪统统放出来了。这些妖魔鬼怪，我们中国党算一个，现在不只我们一个，还有十几个、二十几个党都是妖魔鬼怪，都反对他，都是他放出来的。我们原先并不想争论，不知道在内部谈了多少次，少奇同志也谈了几次，周恩来同志又谈了几次，小平同志谈的更多，劝他们不要搞公开论战，但是他们一定要搞，这一搞，好了，天下大乱。

我们中国人没有什么阴谋，我们搞的就是阳谋。过去一个星期里面谈的都是真心话。我们代表团跟你们谈了一个星期。今天我们又谈，我又讲了这么大一篇。我不装和事佬，装着我自己好像还文明一点，没有我们代表团其他同志那样野蛮。我跟我们代表团的其他同志一样，有时候比他们更不文明一点，这叫做公鸡好斗。赫鲁晓夫说我是公鸡，他自己是母鸡吗？其实斗也不是我们要斗。是赫鲁晓夫先斗起来的。这次你们来得好。我们的共同观点比较多。你们跟赫鲁晓夫不同，你们可以跟我们发展友好合作关系。

（对齐奥塞斯库说）你讲要想到工人阶级、各国人民的利益，那么，他们过去是不是想到这些呢？是不是因为想到这些，他们才公开批评我们呢？如果过去没有想到，现在才真正想到，那么他们应该公开发表声明承认错误。只要他们不做到这点，我们就要回答。不是我们欠了他们的债，而是他们欠了我们的债。你说他们有困难，他们有损失。他们现在知道有困难了，现在知道有损失了，现在就这么讲了，但当初批评我们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没感到困难，没感到会有损失呢？现在我们还没有回答他们，还来不及。只有几个党我们回答了，大多数党没有回答。我们只批评了美国党一篇、法国党一篇、意大利党两篇，一共只有四篇。我们还没有批评他们中的大多数，他们有什么困难呢？他们过去讲，是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要公开批评我们；现在我们讲，我们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就要回答他们，只是现在还来不及回答他们就是了。因为时间来不及，写不出那么多文章来，要做十年规划。我们现在也只是写文章，就是那些秀才们，一个报纸叫《人民日报》，一个杂志叫《红旗》，由他们写文章来回答。我们中央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没有做过决议，我们地方党委也没有做过决议。而苏联呢，他们从中央到地方组织都通过决议，攻击我们。要讲平等，我们要废除不平等条约。要讲对等关系，兄弟党之间应该讲平等。

我们可以达成协议，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要控制别国的那些人。在东欧，你们的朋友还不够多，你们还要做别人的工作。我看人民是会逐步觉悟起来的。包括波兰，也许还有匈牙利，甚至保加利亚这些国家，你们都可以去做工作，使他们跟你们的观点接近。我讲的所谓接近的观点是什么观点呢？不是讲停止公开论战这个观点，而是讲反对那些狂妄自大、挥舞指挥棒、干涉别人内政的人这一点，在这一点上，我们是跟你们接近的。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三年下半年，在反帝、反修斗争中，出现了两件大事：

一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发表《给苏联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的公开信》，逐条批驳我党六月十四日的建议，并直接点名攻击毛泽东以及中央其他领导同志。

另一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二十五日，苏、美、英三方签署了《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这是美苏勾结企图进行核垄断、阻止中国拥有核武器的骗局。中国、法国都拒绝在这个条约上签字。这件事，毫无疑问也为急剧恶化的中苏关系蒙上了一层厚重的阴影。

中共中央决定：抓住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进行评论：

一九六三年九月六日，发表《苏共领导同我们的分歧的由来和发展》（简称“一评”）；

一九六三年九月十三日，发表《关于斯大林问题》（简称“二评”）；

一九六三年九月二十六日，发表《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简称“三评”）；

一九六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发表《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简称“四评”）；

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发表《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简称“五评”）；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十二日，发表《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简称“六评”）；

一九六四年二月四日，发表《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简称“七评”）。

一九六四年三月一日，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的公开信给予回复。复信共分五个部分：第一，关于中苏边界问题；第二，关于援助问题；第三，关于苏联专家问题；第四，关于中苏贸易问题；第五，关于停止公开论战问题。答复措词严厉，实际上是正在进行的论战的继续。这些问题已经超出中苏两党关系的范围，特别是已经涉及日益敏感的中苏边界问题。迹象表明，中苏论战远远超出了党与党的关系，已全面影响到了中苏之间的国家关系。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日，毛雷尔率罗马尼亚代表团抵达中国。公开发表评论才暂时停止。

学习这些文章仍有现实意义。

2011年5月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节 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壹、本节概述

一、苏共中央三月七日的信暴露“坚决反击”的预谋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六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讨论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是非常粗暴、非常性急的，估计等不到我们的八评、九评、十评发表，他就会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会发起一个反华运动。因为他看到罗马尼亚的停战要求被拒绝，我们的立场很坚定，毫不妥协，只有他认错才能停止公开论战。他能认错吗？他不会认错的。这次公开论战，我们已下决心继续下去，而赫鲁晓夫、苏共中央，这个大概也下了。苏共中央这样急如星火，就是要开国际会议，对我采取集体措施。这似乎是下决心准备破裂。信中提出中苏两党会谈，开起草委员会、开国际会议、从 5 月到秋天（可能在十月革命节）办完这几件大事，显然是要走过场。我们上次在复信中提出了这个会，他不好不提，但并非要解决分歧。看来赫鲁晓夫如意算盘一是应付我，也敷衍反对分裂的兄弟党；二是为公开分裂做准备，把分裂责任推给我；三是转移国内对他的不满。苏共 3 月 7 日的信要答复，但是只是简单地答复就行了。主要讲，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文件没公布，苏共给兄弟党的信也没有给我们看，我们不知道你们怎样的“坚决反击”，要采取什么“集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怎么会谈呢？看来，中苏两党会谈定在今年 10 月也不行，要推迟到明年 5 月。来信不是说要在今年 5 月会谈吗，我们就推迟到明年 5 月。至于起草委员会，要到明年秋天才能开，后年再开全世界兄弟党会议。他越急，我们越要慢吞吞地踱方步。中国人是从来有耐心的。这个意思可以写到复信里边去。

两党往来的信件要考虑发表，但是要看看赫鲁晓夫对我们这次复信有什么反应，然后再考虑发表。我们目前还要继续评论苏共的《公开信》。现在已经发表七篇文章，再有三篇就十篇，也就差不多了。以后继续写文章，除了写过去已经定的题目以外，还要就一些根本理论问题，对苏共的错误提出批评。比方说，现代修正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问题、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的问题，这两个是大题

目，可以写文章。还有，在最近召开的国际民主组织的会议里，苏联跟我们的争论越来越频繁。在这些会议上他们占多数，但是亚非拉一些国家是赞成我们的，所以争论很激烈。这表现了两条路线的斗争。在国际工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都是这样，世界和平大会也是这样。所以怎么样说清楚在国际民主组织里面的两条路线斗争，也可以写文章。

二、用拖的办法推迟分裂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中央常委开会，毛泽东说：

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哥穆尔卡 3 月中旬来信中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我们复信里面，要表示欣赏他说我们有权利答辩这一点。至于他呼吁我们停止论战的问题，我们可以把我们跟罗马尼亚党谈了些什么告诉他，用这个办法来答复他。就是说，我们跟罗马尼亚党是这样讲的，跟你哥穆尔卡也是这样讲的。今年 4 月是赫鲁晓夫的 70 岁寿辰，我们可致电祝贺。电报不能是完全礼节性的，应该讲点实质问题。赫鲁晓夫越要大反华，我们越要采取同他相反的姿态，他要坚决反击，我要坚决友好，他要分裂，我要团结。这样我们就处于主动地位，争取国际同情。进可攻，退可守。这样他可能发表，也可能不发表，我们要争取他发表，让苏联人民和全世界知道我们的态度。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七日，中央连续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毛泽东说：

我所以提议要发一个给赫鲁晓夫祝寿的贺电，还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依我看，赫鲁晓夫还不是最坏的人，有比他更坏的，比他搞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的。赫鲁晓夫搞大国沙文主义毛手毛脚，引起强烈反抗。搞上一个人来，可能比他谨慎一点，但也可能搞的更凶一些，更厉害一些。要估计到两种可能性。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致电祝贺赫鲁晓夫 70 大寿，要考虑对赫鲁晓夫本人表现一点友好之意。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赫鲁晓夫在 3 月 7 日的信里表示，要在秋天开国际会议。看起来也可能是一种讹诈，估计不至于马上公开破裂。我们力争推迟就是了。我们常委里没有直接跟赫

鲁晓夫交锋的人还占多数。我是交过锋的，但是内部谈话，公开的没有跟他交过锋。少奇同志是交过锋的，在莫斯科会议上交锋的，但是也没有公开地在报纸上跟他交锋。恩来嘛，我们的总理是交过锋的，赫鲁晓夫耿耿于怀，说我们总理给他上大课。总理在“22大”上致词时也不指名地批评了他。还有我们的小平同志，我们常委里面，主要是小平同志出面跟赫鲁晓夫吵。我们都是妖魔鬼怪。但是现在这个洪太尉赫鲁晓夫混不下去了，日子不好过了。我们还得感谢他把我们放出来，可以跟他进行公开论战，因此要给他发个贺电。我们讲过，赫鲁晓夫现在在内外交困，有可能被人推翻。但推翻他之后，一个是可能出来一个比他好一点的，还有一个可能是出来一个比他更坏的。从现在情况看，出来比他坏的这种可能性更大，所以我们现在我们还要拉赫鲁晓夫一把，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用拖的办法。现在中苏会谈没有什么好谈的，是谈不拢的。与其谈得破裂，还不如推迟谈判。今年不谈，明年再谈，明年谈不拢再推迟，尽量推迟分裂。但是我们思想上也得准备，准备赫鲁晓夫贸然搞分裂，不分裂最好，看起来也比较困难，但推迟分裂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一九六四年三月三十一日，发表《无产阶级革命和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简称“八评”）

《八评》的第一段话，是毛泽东加写的，说明为什么要写这篇文章。“本文想讨论一个大家都熟悉的、很出名的问题，这就是所谓‘和平过渡’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出名，弄得大家都注意起来，是由于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了出来，在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上用纲领的形式加以系统化，以其修正主义的观点，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又重弹这个老调。”

文章起草班子还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八评》最末一段增加以下的一些话：“我们愿意奉劝苏共领导同志，过去有多少机会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都被丢进历史垃圾堆，你们何必一定要跟着他们的脚印走呢？”“‘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冒牌的社会主义是死亡了，但是，科学社会主义却充满着青春的活力，它正在以更加宽阔的步伐向前迈进。”

文章从苏共二十大讲起，由此联系到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第二国际的修正主义，联系到列宁对伯恩斯坦和考茨基的批判，联系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共

运内部主张“和平过渡”的一些代表人物，着重批驳赫鲁晓夫的“议会道路”和“和平过渡”的观点。文章重申了关于暴力革命的思想，阐述从苏共二十大以来中苏两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

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名道姓地给赫鲁晓夫戴上了修正主义者的帽子，批驳的言词也愈加尖锐，用毛泽东的话说：“以比过去更加清楚的语言，回答修正主义者。”

据吴冷西回忆，在《八评》发表之前由毛泽东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大家估计，我们发表《八评》以后，苏共很可能要发表他们二月全会的决议。毛主席说，如果《八评》发表以后，苏共发表二月全会的决议，掀起一个反华运动，那我们要考虑把过去几个月以来没有发表的我们同苏共来往的双方信件公开发表，而且要求他们也这样做。”毛泽东还把赫鲁晓夫比作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中的洪太尉，说：赫鲁晓夫就是洪太尉。他发动公开论战，就是揭开石板，把下面镇着的“一百零八个妖魔”放出来，天下大乱了。一百零八将就是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我们就是赫鲁晓夫这个“洪太尉”放出来的“妖魔鬼怪”。

三、赫鲁晓夫发动新的反华运动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日，苏共中央公布二月中央全会的决议和苏斯洛夫的反华报告，《真理报》还配发了一篇反华社论。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决议声称：“苏共中央认为，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共产主义运动和维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纯洁性的根本利益，要求从思想上揭露中共领导的反列宁主义的立场和坚决反击他们的分裂行动。”

这是苏共采取的一个使论战升级的重要步骤。

中共中央按照预先商定的方针，决心一面继续写《九评》给予还击；一面采取拖的办法，尽量推迟中苏分裂的时间。一个重要措施，就是以毛泽东等的名义给赫鲁晓夫七十寿辰发贺电。

一九六四年四月五日、六日，赫鲁晓夫在匈牙利发表讲话中放肆攻击中国：中国认为斯大林好，攻击赫本人在苏共“22大”全盘表否定斯大林。有人认为斯大林时期好，想复活斯大林，那么想复活斯大林的人就把斯大林搬走，和他一起生活吧。中国人没有裤子穿，他们说一个人有一条裤子就够了，就是说，他们觉得把自己羞耻的部分掩盖起来了就够了。也许在一些炎热的国家里，有一条裤

子就够了，可是我们这些北方国家，需要更厚实的衣服。否则，我们身体的某些部分可能会冻僵的。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二日，毛泽东关于修改给赫鲁晓夫的贺电稿的意见：

1、这个贺电应争取苏联发表使他能够发表写的内容要从这么一个设想出发。因此不能多谈分歧和争论的问题，什么公开论战不能停呀，要达成公平的协议才能停呀，等等，这些问题不要多谈。但可以说尽管我们还有分歧，我们还是要加强团结之类的话。要点出这么一个意思：说尽管我们有分歧，但是一旦有事，我们两党会团结起来。这个“一旦有事”是指对赫鲁晓夫不利的东西，而不是讲别的。就是说，你遇到麻烦的时候，我们还可以帮你的。要含有这么一个意思，但不要说得那么露，可以意会，不可言传。我在北京说过，赫鲁晓夫在苏联领导集团里边，还不是最右。与其让比他更右的人上台，还不如现在我们同赫鲁晓夫建立某种形式的统一战线。我们同赫鲁晓夫打交道十年，对他比较熟悉，也比较容易对付。他搞的那一套，我们的估计八九不离十。所以我们在贺电里面要暗含这么一个意思，一旦有事，我们还是能够团结起来对付的。

2、赫鲁晓夫是怕争论的，从世界工联北京会议起，他们就怕，现在是越来越怕。“22大”的时候，他到了顶峰，他发起对阿尔巴尼亚的公开论战，从此以后走下坡路，气势一年不如一年。

这次他们发表的二月全会的报告、决议，看起来形式上似乎气壮如牛，但内容很虚，没有什么新东西，真是色厉内荏。我们要准备发表，中央一级报纸全文发表，省级报纸则要压缩一下，摘其要点，约为十分之一，还要向国外广播。摘要要摘其精彩的。我们不怕他放毒。让大家看一看他究竟有什么货色，让国内群众干部都了解赫鲁晓夫究竟放了什么屁。

3、我们原来在北京定稿的那封复信，少奇同志建议要推迟发表。这个意见好。因为他们二月全会的文件公布了，情况变了，所以要改写后才能发。发出这封复信以后，我们就可以把从去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们那封来信起，一直到我们将要给他们的复信，这中间双方几次来往的信件，全部公开发表。

4、《九评》、《十评》要抓紧。之后还要组织一批文章。

5、中苏贸易谈判，要减少进口苏联的东西，要坚持顺差，否则我们只还帐，用我们出口的物资来还帐。如果他们不要，那就把帐挂起来。但是，我想他们还

是要我们东西的，这是还帐。不进口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要的你不给，我不要的你给，我何必要进口呢。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三日至十八日，赫鲁晓夫在接待波兰代表团的四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恶毒地攻击中国，他说：在中国是小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的潮流占上风，中国党要分裂全世界白种人和其他有色人种，中国人说，白种人永远不会理解黑种人和黄种人，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的利益是不同的。中国人要我们不要搞经济建设，不要改善人民生活。中国人说我们太胖，要防止资产阶级蜕化，要我们的工业转向生产腰带，以便把裤带勒得更紧一些，要我们向坟墓前进。中国人说我们是资产者，这就是指我们的肚皮。有一条蛀虫，爬到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集团的那个地方去了，蛀虫乱爬乱转，于是蛀虫竟以为它是真正指导世界的发展了。中国现在什么也没得吃了，中国人把鸡蛋都吃光了，把鸡都杀光了，也没有鸡来下蛋了。中国经济一片混乱，国内发生了饥荒。中国调整经济是放弃工业化。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四日，贺电经毛泽东修改后定稿，毛泽东说：

贺电发出以后，在一个星期内，我们不发表反修文章，任何反修文章都不发表，以表示友好，也满足一下那些说我们老是好斗的人的愿望，中国不是那么好斗，也不是永远斗下去。我们还是讲团结的，就看对方怎么样了。这个贺电不仅对赫鲁晓夫有这么一个作用，而且对各兄弟党，不管是中间派，不管是右派，也有这个作用就是告诉他们，我们还是坚持团结的。

这个贺电甚至连越南这样的左派，看了也会高兴的。因为分裂总不是好事，我们尽量推迟分裂也是这个原因。能够维持某种即使是表面的上的团结，也是有好处的，比起公开的、完全的分裂好。

要准备赫鲁晓夫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一切要从坏的方面准备。最坏的准备是他们片面地召开国际会议。不管中苏两党会谈是否达成协议，不管筹备会议是否达成协议，他硬是秋天召开国际会议，对我们采取“集体措施”，开除我们，公开分裂。所谓公开分裂就是公开把我们开除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像过去情报局对南斯拉夫那样，像赫鲁晓夫对阿尔巴尼亚那样。我们要做这个准备。

如果赫鲁晓夫要召开国际会议，我们要考虑坚决不参加，但同时也要准备另一手，万一需要参加怎么办。我们说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五月，还提出两三

年以后再开国际会议。万一他不顾是否达成协议硬要开，我们要考虑参加会议同他们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准备一个纲领草案，提交国际会议讨论，同他针锋相对。让各国共产党看看，他的纲领是什么纲领，我们的纲领是什么纲领，要货比两家。这样，即使会议破裂，对我们也有利。因此我们要准备两手。

一九六四年四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联名发出贺电。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七日，《人民日报》发表有关苏共中央二月全会的三个文件。

一九六四年四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赫鲁晓夫十二篇公开讲话中有关反华部分。

一九六四年四月三十日，关于对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复信问题，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现在步调乱了，指挥棒不灵了，不仅意大利、波兰这些党不赞成开会，还有瑞典、挪威一些西欧、北欧的小党也不赞成开会。现在赞成开会的不到十家。看起来赫鲁晓夫这个国际会议开不成，他可能也看到开会对他不利。对这个国际会议我们要坚决反对开。不开好中苏两党会谈，达不成协议，就不能开十七国筹备会即起草委员会。没有开筹备会，就不能开国际会议。这个立场绝不能动摇。因此这个复信里原来提出召开国际会议的时间需要两三年的准备，现在看来两三年不行，要四五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

毛泽东在复信中加了一段话：“请问，在这种情况下，中苏两党会谈和各兄弟党国际会议怎么能够开始呢？有什么话好说呢？还不是吵架一场，无结果而散吗？或者是从此各方分裂各走各的路吗？难道你们决心要今天分裂吗？”

一九六四年五月三日，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对赫鲁晓夫这样的人，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晓以利害。要着重讲明，在目前这种没有充分准备好、没有达成协议的情况下，召开国际会议不是导致团结，而是导致分裂。这个道理要反复地讲清楚。要指出：如果不是急于公开分裂，苏共领导就不应当急于要今年秋天召开国际会议。要劝他们平心静气地想一想，还是迟开比早开好，甚至不开比开好。因为开起来就要分裂，不开还能维持某种形式的团结，不至于完全破裂，这比公开破裂好。

毛泽东在复信中加了一段话：“如果你们违反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原则，片面

地决定召开全世界一切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那么，这样做是非法的，是完全错误的，会引起严重后果的。你们愿意走这样的绝路吗？我们现在把这种诚心诚意的、利害昭然的话讲在这里，勿谓言之不预也。”

毛泽东在给康生、吴冷西并告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批语中写道：“在这个开会时间问题上，苏共领导的章法乱了，因此指挥棒也不灵了，因为大多数党都怕开分裂主义的会。实际上苏共领导自己也怕开这种会，因为分裂对他们没有好处。这种会实际上是开不成的。”后来这个会真的没有开成。

一九六四年五月七日，发出复苏共中央三月七日来信的信。

五月七日的复信，在以下几个问题上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一是关于停止论战问题，复信表示：在对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还没有答复完以前，不可能放弃公开答辩的权利。二是关于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兄弟党代表筹备会和兄弟党国际会议的问题，复信表示：从现在的情况看，中苏两党会谈推迟到明年上半年（如五月）较为适宜。至于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要看两党会谈的结果而定。三是关于反对单方面召开国际会议，复信表示：如果苏共中央急急忙忙地要开一个这样的会议，就必须承担分裂的责任。

这封复信的要点，是在预见到有分裂危险的情况下，采取了拖的策略，力图避免苏共把分裂的责任嫁祸于人。其中，第二、第三点是关键。这两点都是毛泽东修改定稿时加上的。

一九六四年六月，越南劳动党在《学习》杂志上发表社论指出，现代修正主义在准备分裂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谁也无权把十三个社会主义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开除出社会主义阵营。谁也无权在他认为对他有利的时候，就下令公开论战，而在形势对他不利的时候，就停止公开论战。必须在各兄弟党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召开各国共产党、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任何人和任何政党都无权决定召开这样的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六日，新西兰共产党和印度尼西亚共产党发表联合声明：国际会议应当综合研究双边会谈，解决有关各党的意见分歧，做出适当准备之后再召开，不允许强行召开或匆促召开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来信，要在最短期间内同兄弟党商定召开筹备会的具体日期；在短期内商定召开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六月二十日，日本共产党发表声明：坚决反对用那种企图把共产主义运动的不团结导向无可挽回的分裂的做法来举行国际会议。

贰、本节简论

一九六四年三月十七日，毛泽东提出：近一年我的主要精力花在同赫鲁晓夫斗争中，现在应该再转到国内问题上来，联系国内反修防修问题。随之，一个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全国展开。

一九六四年三月二十六、七日，毛泽东说：考虑到这么一种可能，就是在赫鲁晓夫内外交困、大家对他很不满的情况下，他有可能被宫廷政变推翻。要考虑到这个可能。而推翻以后，上来的人可能比赫鲁晓夫好一些，但应从坏处着想，即也可能比赫鲁晓夫更坏，大国沙文主义更厉害一些。毛主席的这些预见，很快为事实所证明。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一节 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壹、 本节概述

一九六四年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十七日，召开中央工作会议。

一九六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中央常委会讨论决定把第三个五年计划的重点放在建立第三线国防工业基地，在改进常规武器的同时，着重加紧研制核武器和导弹，这就是要加强备战；还正式决定在农村展开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反修防修。也就是说，加强战备和反修防修双管齐下。

毛泽东在会议上指出：

这两大问题是同赫鲁晓夫的多年斗争中引起的。从赫鲁晓夫大反华的趋势看，我们要考虑到万一他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竟然把战争强加到我们头上。因此我们必须下大力气加强抵抗武装入侵的准备。同时，赫鲁晓夫从苏共“20大”以来的行径表明，社会主义国家会产生修正主义，甚至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因此，我们必须在我们党内、国内反修防修。鉴于上述情况，我们对苏共中央《公开信》的评论，要认真总结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经验教训。《九评》总结苏修的教训时，可以考虑：第一，从十月革命讲起，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首次变为实践；第二，分析苏联社会状况，分析其矛盾、阶级和阶级斗争；第三，剖析苏共领导集团的变化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第四，批驳全民党、全民国家的谬论，这是赫鲁晓夫篡改马列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学说的核心；第五，论证赫鲁晓夫搞的是假共产主义。

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是惯于搞政变的人。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搞了五次政变，一次又一次把同他意见不同的人打下去。先搞掉贝利亚，接着又搞掉所谓莫洛托夫、马林科夫“反党集团”，接着又搞掉朱可夫，还有伏罗希洛夫、布尔加宁等一批人，都

被他打下去了。这个教训值得重视。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在北京近郊昌平县的十三陵水库管理处会议室召开一次会议，发表了关于培养接班人问题的讲话。他说：

“苏联出了修正主义，我们也有可能出修正主义。如何防止出修正主义，怎样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我看有五条：

第一条，要教育干部懂得一些马列主义，懂得多一些更好。就是说，要搞马列主义，不搞修正主义。

第二条，要为大多数人民谋利益，为中国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为世界人民大多数谋利益，不是为少数人，不是为剥削阶级，不是为资产阶级，不是为地、富、反、坏、右。没有这一条，不能当支部书记，更不能当中央委员。赫鲁晓夫是为少数人的利益，我们是为大多数人的利益。

第三条，要能够团结大多数人。所谓团结大多数人，包括从前反对自己反对错了的人，不管他是哪个山头的，不要记仇，不能“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们的经验证明，如果不是‘七大’的正确的团结方针，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胜利。对于搞阴谋诡计的人要注意，如中央就出了高、饶、彭、黄等人。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有的人就是要搞阴谋，他要搞，有什么办法，现在还有要搞的嘛！搞阴谋的人，是客观存在，不是我们喜欢不喜欢的问题。

一切事物都是对立的统一。五个指头，四个指头向一边，大拇指向另一边，这才捏得拢。

完全的纯是没有的，这个道理许多人没有想通。不纯才成其为自然界，成其为社会。完全的纯就不成其为自然界，不成其为社会，不合乎辩证规律。不纯是

绝对的，纯是相对的，这就是对立的统一。扫地，一天到晚扫二十四个钟头，还是有尘土。你们看，我们党的历史上哪年纯过吗？但是却没有把我们搞垮。帝国主义也好，我们党里冒出来的修正主义也好，都没有把我们搞垮。解放以后出了高岗、饶漱石、彭德怀，搞垮了我们没有？没有。搞垮我们是不容易的，这是历史经验。

人是可以改变的。有少数人变不了，吃了饭就骂人，各省都有一点，是极少数，不变也可以，让他们去骂。对那些犯错误的人，要劝他们改好。要帮助人家改正。只要他认真改正了，就不要老是批评没完。

要团结广大群众，团结广大干部，团结这两个百分之九十五。

第四条，有事要跟同志们商量，要充分酝酿，要听各种意见，反对的意见也可以让他讲出来。要讲民主，不要‘一言堂’，一开会就自己讲几个钟头，不让人家讲话。不要开会时赞成，会后又翻案，又说不赞成。共产党人要搞民主作风，不能搞家长作风。

第五条，自己有了错误，要作自我批评。一个指挥员指挥打仗，三个仗，胜二个，败一个，就可以当下去。打主意，对的多，错的少一点，就行了。不要总是以为自己对，好像真理都在自己手里。不要总是认为只有自己才行，别人什么都不行，好像世界上没有自己，地球就不转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前进的。无产阶级的大人物，像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不是都逝世了吗？世界革命还是在前进。

但是，接班人的问题还是要部署一下。要准备好接班人。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总是要在大风大浪中成长的。”

经过近一年的中苏公开论战，随着国内“四清”、“五反”运动的进行，毛泽东愈来愈担心中国出修正主义的危险性。为防止中国出修正主义，毛泽东把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接班人作为防修的一项战略措施提上日程。

一九六四年七月五日起，召开几次会议讨论《九评》修改稿，毛泽东说：

在讲到苏共领导集团一步一步走向修正主义时，还要补充说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伟大业绩和功勋。还要讲到，甚至在赫鲁晓夫集团的统治下，苏联共产党的广大党员和苏联人民，是不满赫鲁晓夫为非作歹的，莫洛托夫等人只是反

抗的冰山之巅。必须明确表达我们坚决相信列宁创造的苏联共产党绝大多数和苏联人民中间的绝大多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还要讲清楚民主的阶级性，“有资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无产阶级的民主，有无产阶级的民主，就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一个消灭另一个，只能如此，不能妥协。更多地、更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的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就会大为扩张，这种情况在资产阶级看来，就叫做这个国家没有民主。实际上这是兴无产阶级民主，灭资产阶级民主，无产阶级的民主兴起来了，资产阶级的民主就被灭掉了。”还要指出，一切新生事物，无产阶级专政也一样，都要经过长期的、反复的、曲折的过程，中间有成功，也有失败。我们现在讲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既要看到那种遭受到资产阶级武装镇压和失败的无产阶级专政，像巴黎公社、匈牙利苏维埃那时的样子，又要看到另一种形式的资本主义复辟，而这是更应该值得我们注意的，更值得引起我们警惕的危险，这就是和平演变。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明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分析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形成的原因时，着重讲内因，列宁、斯大林领导时，外部情况比赫鲁晓夫时代严峻得多，但都顶住了。赫鲁晓夫受内外因素相互影响，发生了质变，外因（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政策）通过内因（新资产阶级分子的产生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蚀）起作用。特殊地说这又同赫鲁晓夫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有关。必然性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二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九评》。

毛泽东把《九评》的标题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毛泽东并亲自改写了十五条中的第二条：

“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

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包括七个部分：

第一部分，说明社会主义社会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它不可避免地带有资本主义社会遗留下来的痕迹。由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因此需要无产阶级专政。

第二部分，赫鲁晓夫掌握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以后，推行了一系列的修正主义政策，变本加厉地助长了资本主义势力的发展，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苏联重新尖锐起来。

第三部分，由于赫鲁晓夫实行修正主义路线，现在在苏联的新资产阶级分子不仅在数量上空前的增长，而且在社会地位上也有了根本的变化。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前，他们在苏联社会上并不占统治地位，而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随着赫鲁晓夫逐步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新资产阶级分子在苏联党、政、经济、文化等部门占据了统治的地位，形成了苏联社会上的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就是苏联资产阶级的主要组成部分，就是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的主要社会基础。由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伟大的苏联人民用血汗创立的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正面临着空前严重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

第四部分，只要阶级还存在，国家不可能是超阶级的，不可能是全民的。如果阶级不存在、全民一致了，国家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消亡了，无产阶级民主也就消亡了。

第五部分，如果像赫鲁晓夫集团所宣传的那样，苏联党之所以变成为全民党，

是由于苏联党代表全民的利益，是由于苏联全体人民接受了共产主义目标，是由于苏共的队伍是由工人、集体农民和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组成的，是由于苏联党的活动是采取民主的方式、是符合全民性质的。如果这四条理由是正确的，那么，苏联共产党从它成立的第一天开始就应该称为全民党了。可见这些理由没有一条是站得住脚的。苏共当前的问题，根本不是什么全民党的问题，而是苏联共产党面临着从无产阶级政党蜕化为资产阶级政党，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蜕化为修正主义政党的严重危险。

第六部分，赫鲁晓夫所说的共产主义，实质上就是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一个变种。

第七部分，说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说：《九评》发表以后又看了一遍。里边讲到社会主义社会里边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是长期的、复杂的、反复的。但是不能说这个斗争越来越尖锐，不能像斯大林过去曾经提的那样。而应该看到，这个斗争是高一阵低一阵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有时又比较缓和，总之是波浪式的。这一点应该明白。

贰、本节简论

《九评》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评论文章的最后一篇，也是九篇评论文章中分量最重的一篇。原先还准备写《十评》，由于赫鲁晓夫的下台，《十评》没有发表。

《九评》是全面论述无产阶级专政学说，驳斥“全民国家”、“全民党”的，所以原先的题目是“无产阶级专政和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毛泽东把题目改为“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

《九评》从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怎样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问题破题，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认识，强调“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很长的历史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中，贯穿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谁战胜谁’的问题，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这是全篇立论的基础，源于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公报。文章分

析了苏联的社会状况，认为苏联存在着敌对阶级和阶级斗争，认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夺了苏联党和国家的领导，在苏联社会上出现了一个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苏联人民同他们之间的矛盾，是目前苏联国内的主要矛盾，是不可调和的对抗性的阶级矛盾”。文章批驳了“全民国家”和“全民党”的观点。

文章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主要是回答怎样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样才能防止和平演变。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一文最重要的理论成果，就是把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 and 政策，加以系统地概括和阐述，其要点是：

第一，必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运动和变化。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两类社会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

第二，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

第三，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对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分子实行专政。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大鸣、大放、大辩论，是依靠人民群众，解决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的一种重要的革命斗争形式。

第五，无产阶级和它的先锋队必须依靠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真正可靠的力量，争取一切可能争取的同盟者，团结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民群众，共同对付社会主义的敌人。

第六，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这个运动中，要向那些敌视社会主义的资本主义势力和封建势力，向那些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那些贪污盗窃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进行尖

锐的针锋相对的斗争。

第七，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努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逐步实现工业、农业、科学技术和国防的现代化。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第八，全民所有制经济，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从集体所有制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从两种所有制过渡到单一的全民所有制，需要有一个相当长的发展过程。集体所有制本身也有一个由低级向高级、由小到大的发展过程。中国人民创造的人民公社，就是解决这个过渡问题的一种适宜的组织形式。

第九，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人民要知识化，知识分子要劳动化。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

第十，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我们党和国家的干部是普通劳动者，而不是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干部通过参加集体生产劳动，同劳动人民保持最广泛的、经常的、密切的联系。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一件带根本性的大事，它有助于克服官僚主义，防止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

第十一，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第十二，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坚持军官当兵的制度。枪杆子要永远掌握在党和人民手里，绝不能让它成为个人野心家的工具。

第十三，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在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和人民利益的斗争中，要实行依靠广大人民群众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针，不放过一个坏人，不冤枉一个好人。有反必肃，有错必纠。

第十四，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独立自主、完全平等和

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相互支持和相互援助的原则的基础上。

第十五，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的密切联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第十六，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必须具备五个条件：1，必须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2，必须是全心全意为中国和世界的绝大多数人服务的革命者；3，必须是能够团结绝大多数人一道工作的无产阶级政治家；4，必须是党的民主集中制的模范执行者；5，必须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富于自我批评精神，勇于改正自己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应当在长期的群众斗争中，考察和识别干部，挑选和培养接班人。

毛泽东在主持讨论“九评”修改稿时曾说，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在苏联搞和平演变，是向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包括我们中国在内，向所有共产党，包括我们中国共产党在内，敲响了警钟。帝国主义对我们第一代、第二代大概没有指望了，但他们寄希望于第三代、第四代和平演变，杜勒斯辈就是这么公开说的。因此我们要准备后事，要培养革命接班人。所以，“九评”将毛泽东六月十六日讲话中关于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应具备的条件全文发表，并强调指出培养革命接班人的重大战略意义：“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这是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万年大计。帝国主义的预言家们根据苏联发生的变化，也把‘和平演变’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或者第四代身上。我们一定要使帝国主义的这种预言彻底破产。”

《九评》关于国际共运历史经验教训的论述，是针对苏共二十二大提出的一些突出论点，同时直接引申到中国国内的反修防修问题上。

2011年5月1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二节 赫鲁晓夫下台

壹、本节概述

一、中共中央给苏共中央的复信

一九六四年六月十五日，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一封来信。这封信是对中共中央五月七日信的答复。信中认为中共中央放弃了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建议，并申明他们要尽快召开由二十六国组成的筹备会议，“关于召开这个筹备会的具体日期，我们认为必须在最短期间内就同兄弟党商定”。信中虽然说了“仍旧愿意在取得协议的任何日期举行苏共和中共代表的双边会谈”，但实际上已把两党会谈同召开国际会议脱钩了。

一九六四年七月十五日以后，中共中央着手起草对苏共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常委会上提出修改复信稿的意见：

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正在加剧论战，公开论战停不下来。现在正是论战的大好时机，我们不要提停止公开论战的条件，根本不提这个问题。我们只要求他同我们发表他们的反华文件、文章一样，发表我们的文章。我们已刊登了他们许多反华文章，彼此对等，他也应当发表我们的答辩。只提这个问题。估计他是不会发表的。但是，我们的复信发出后，估计赫鲁晓夫会非常恼火。因为我们发表《九评》，挖了他的老底。现在我们再把复信发出去，估计他会跳起来，赫鲁晓夫个沉不住气的人，一触即跳，很可能他会铤而走险。但是，复信定稿以前，要请少奇同志、小平同志回来开会讨论。关于可否考虑左派各党在一起交换意见？这个问题关系比较大。现在要慎重考虑。因为国际会议开不开，还是未知数。苏共现在把中苏两党会谈同筹备会议、国际会议脱钩了。如果不是为着筹备国际会议，那么举行中苏两党会谈干什么呢？没有什么好谈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中苏两党不会谈，大家到筹备会议里去争论。他们拿出一个纲领草案，我们拿出一个纲领草案，双方对着干，这样的话，估计筹备会议也开不好，也就是说国际会议也开不成。所以这个问题要多考虑考虑，再想想看。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常委扩大会议上说：

现在要对反修斗争的形势作通盘考虑。我们的方针原来就是豺狼当道，焉问狐狸，集中批判赫鲁晓夫。现在形势对我们采取这样一个方针更为有利。对于国际会议，我们现在要采取激将法，激他开会，激他承担公开分裂的责任。但是，估计赫鲁晓夫不敢开，至少最近不敢开，也可能只开筹备会，不开国际会议。我们可以用点儿激将法，让他犯错误，犯下去，犯到底。这样他就更加暴露，更加被动，更加遭到反对，会有更多的人反对他。

苏共中央在来信中坚持认为，“在召集国际会议问题上，兄弟党赋予它以特殊的责任”。复信稿对此作了批驳，毛泽东认为分量还不够，提出：“还要多讲几句，以剥夺他的什么召集权。”“另外要写一段自共产国际解散以后，十多年没有国际会议，而各国革命却胜利了，各国共产党却发展了。”

毛泽东针对苏共坚持要把二十大和二十二大通过的纲领写进兄弟党国际会议文件的做法，在复信稿中加写了一连串的质问：“为什么一个党的决定，硬要一切党都服从呢？为什么不服从就算犯了大罪呢？请问这是什么逻辑，什么兄弟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准则呢？”

在复信的最后部分，毛泽东加写了几段话，正告苏共领导人不要召开分裂性质的兄弟党国际会议。其中一段，描绘了赫鲁晓夫等人在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问题上“骑虎难下”、“欲罢不能”的尴尬处境。话是这样写的：“你们既然下定了决心，大概就得开会吧。如果不开，说了话不算数，岂不贻笑千古吗？这叫做骑虎难下，实逼处此，欲罢不能，自己设了陷阱自己滚下去，落得个一命呜呼。不开吧，人们会说你们听了中国人和各个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的劝告，显得你们面上无光。要是开吧，从此走入绝境，再无回旋的余地。这就是你们修正主义者在现在这个历史关节上自己造成的绝大危机。你们还不感觉到吗？我们坚信，你们的所谓大会召开之日，就是你们进入坟墓之时。”“那时我们只好说：‘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⑩”

一九六四年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这个复信。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一日，这封复信连同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的来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这以后，围绕着召开兄弟党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的问题，继续展开你来我往的“信件战”。

二、赫鲁晓夫要召开分裂会议遭到许多党拒绝

一九六四年七月三十日，苏共中央再次致信中共中央，说他们已经把前一封信发给所有的兄弟党，“绝大多数兄弟党都表示必须采取集体行动来克服我们队伍中产生的困难”，“而且许多党都坚持这种会议的召开不能长期拖延”。信中还说：苏共中央已经邀请二十六国（包括中国在内）兄弟党的代表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前到达莫斯科参加筹备会议，“即使二十六个共产党中任何一个党，在上述期限之前不派出自己的代表，委员会也应该开始工作”。

这封信表明，赫鲁晓夫已下决心孤注一掷，不论中共同意与否，都要召开筹备会议和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八月四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我们估计对了，赫鲁晓夫一触即跳。我们二十八日发出的信，他三十日就来信答复了，把文章做绝了，效率很高，是早就准备好的预谋。现在既没有中苏会谈可谈，也没有什么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需要考虑了。因为他下命令开会，是下决心要分裂了。所以，我们现在只要对的来信简单地答复就行了。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是下决心要开分裂会议了，因此我们要考虑，在他开分裂会议之前，我们和朝鲜、越南等左派各党用不着商量，也不搞什么纲领草案。因为我们决不参加这样的会，他开什么会我们都不参加。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黎笋时说：等你们两家（朝鲜和越南）发表声明以后，我们也发表声明，支持你们两家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二十六党筹备会。

一九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毛泽东在会议上说：关于把我们拒绝参加分裂会议的立场通报有关的左派党问题，恐怕要政治局正式讨论一下再决定，现在还不忙，等到回北京在政治局会上正式做决定。

一九六四年八月二十九日，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并通过了给苏共中央的复信。经过中央政治局多次研究，决定不参加苏共中央召集的二十六国筹备会议。

一九六四年八月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复信中把这个决定正式通知了苏共中央。

一九六四年九月初，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苏共定在十二月召开筹备会议，是让它开成好，还是开不成好？有些同志觉得，要使他们开不成，要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来反对开会。依我看，还是要他们开成好，因为他手里拿着这么一张王牌，经常用来吓唬我们，那个会议一开，他们手里就没有什么牌了。大概现在中国、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日本、印尼这几个党反对召开国际会议是不成问题的。再加上新西兰，一共有七个党。

还值得注意的是，意大利共产党也不赞成开会。据说，陶里亚蒂为这件事专门到苏联去。当然他身体也不好，要在苏联克里米亚休养。他先是跟苏共中央的一些同志会谈，是跟苏斯洛夫还是谁，不大清楚。他表示不赞成开这个会。后来他说要跟赫鲁晓夫直接谈，而且他还准备了一个谈话提纲。这个提纲后来发表时叫做备忘录。在这个备忘录里，意大利党的意见是不赞成开会。大概一方面因为这个事情跟苏方吵得很厉害，一方面身体也不大好，陶里亚蒂很快在苏联去世了。现在意大利党还是坚持陶里亚蒂的方针，不赞成开会。这就引起了本区一些党重新考虑他们的立场，因为陶里亚蒂在本区的影响比较大。北欧一些党虽然在这个问题上有动摇，不那么坚决反对，但是也提出要开就开一个团结的会。欧洲党的这种情况对我们有利，这可以使赫鲁晓夫在决定是否开会时不得不加以考虑。

我的意见还是让赫鲁晓夫召开会议好，那样他最后一张牌就打出来了，再也没有什么牌好打了。因为开会无非是开除中国党，像斯大林主持情报局开除南斯拉夫那样，这是公开分裂，责任完全由赫鲁晓夫承担。现在中苏关系陷入僵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社会主义阵营保持形式上的团结，但实际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分歧，距离分裂只隔一层纸。我们的方针就是让赫鲁晓夫自己去戳穿这层纸。

关于何时爆炸一个核装置的问题，主要看准备情况，不要勉强，要一切都准备好，万无一失，然后爆炸。不要抢时间，宁可在国庆节之后，甚至推迟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可以，不要匆促行事。

一九六四年十月一日，一共有八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三千多外国贵宾，来北京参加庆祝活动。其中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了代表，一些兄弟党也派了代表。

一九六四年十月八日，毛泽东会见以毛雷尔为首的罗马尼亚代表团。

毛雷尔说：这次来华时，路过莫斯科同赫鲁晓夫辩论了五个钟头。赫鲁晓夫还是坚持要开国际会议，坚持要在十二月开筹备会。到北京以后，跟朝鲜、越南和波兰代表团都谈了话，都谈得不错。跟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党的谈话比较困难，

德国党同志劝我们参加十二月的二十六党会议，结果吵了起来。

毛泽东说：跟德国党同志可以平心静气地跟他们谈，跟他们争吵不好。乌布利希处在第一线，对面是西德，东柏林对面就是西柏林，他们受到很大的压力。苏联要跟西德谈判，乌布利希不高兴。我们支持乌布利希。现在赫鲁晓夫的日子不好过，硬要二十六国党代表在十二月十五日以前报到，这种事情简直是以老子党自居，发号司令了。我们说，你开吧，我们不到，会议是非法的。

毛雷尔说：我们党已经通知苏共，路过莫斯科也告诉赫鲁晓夫，我们不参加十二月十五日的会议。

毛泽东说：赫鲁晓夫是一个软体动物，许多人起来反对他，他会软下来的。几次都是这样子。一九六〇年莫斯科会议就是这样子。他也有这一面，蛮干的一面。比方说，我们劝他不要公开论战，他不听，他说这是列宁的方法，他硬干了，公开论战了。我们不知道劝了他多少次，他不听，还是干，还是公开论战。他认为这样对他有利。你看，适得其反，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九日，毛泽东会见以巴卢库为首的阿尔巴尼亚代表团。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这个人，这几年来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走得越来越远了。从一九六〇年开始是很凶的，特别是在“22大”上，那时达到顶峰了。他在那次大会上公开攻击你们阿尔巴尼亚，发动了公开论战，这是他的顶点。“22大”以后，他就走下坡路了。虽然现在还有几十个党跟他走，但他们内部不一致，四分五裂。反动的国家、党派和集团，他们内部的矛盾会导致他们垮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比如希特勒，还有日本帝国主义，还有墨索里尼，他们和英、美、法这三个帝国主义之间，是矛盾重重的。他们都大喊大叫反苏，但最后他们先打谁呢？是不是先打苏联呢？当然，希特勒是打了苏联，意大利也跟着打了苏联，但是他们首先打的是英国和法国，日本首先打的是美国。这三个国家在第二世界大战中都垮台了。所以帝国主义内部的矛盾可以导致它们之间打仗，可以导致一批帝国主义垮台。依我看，赫鲁晓夫的情况也不妙。他要十二月开筹备会，可能开成，也可能开不成，但是两种可能性对赫鲁晓夫来讲，都是灾难。开不成当然脸上无光，讲了话不算数，这当然是灾难了。如果他开成了，依我看，这个灾难更大一些。十二月会议开成之日，就是赫鲁晓夫走进坟墓之时。我们的方针就是等他开，激

他开，激他抛出一切法宝来，比方说“集体措施”呀，断交呀，撕毁中苏同盟条约呀，以至出兵呀。让他把所有的法宝都抛出来，那时他就跌到阴沟里去了，垮台了。当然，现在要大规模出兵打中国还不可能，但是搞点摩擦，制造一些边境事件，是完全可能的。一九六二年他就在新疆把我们几万人胁迫到苏联去了。在边境挑起冲突可能不可能呢？那是完全可能的。这一切我们都准备着，准备他使尽一切法宝，自己一步步走向坟墓。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一日，人民日报发表秘鲁共产党政治委员会声明，批评苏共领导拒绝耐心准备世界共产党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人民日报发表印尼共产党和锡兰共产党联合声明：反对召开导致分裂的国际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日本《赤旗报》反对召开分裂会议的社论。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人民日报发表朝鲜劳动党《劳动新闻》号召所有共产党员反对召开分裂会议，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社论。

三、赫鲁晓夫下台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四日，深夜，苏联驻中国大使根据苏共中央批示通知中共中央：今天苏共中央决定撤销赫鲁晓夫的领导职务，由勃列日涅夫接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由柯西金接任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米高扬仍然是最高苏维埃主席。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个核装置试爆成功。同时，苏联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向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发出贺电。

贰、本节简论

中共中央对苏共中央六月十五日来信的复信，可以看作是对苏共中央公开信九篇评论文章的继续，借着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这个话题，着重批驳苏共领导人惯于对兄弟党发号施令、指手划脚的老子党作风，揭穿赫鲁晓夫等人以兄弟党国际会议作为“指挥棒”，让兄弟党服从于自己，把自己党的纲领强加于人的大国

沙文主义作风。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各兄弟党之间确立正常的平等协商的关系，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六日，我国第一个核装置试爆成功。同时，苏联公布赫鲁晓夫下台的消息。

2011 年 5 月 1 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三节 对待苏共新领导的方针

壹、本节概述

一、从“一肯二看”到“一推二看”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五日至二十九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连续召开会议，讨论赫鲁晓夫下台问题。毛泽东在会上说：

赫鲁晓夫下台是表示要变，如果不变，那为什么要他下台呢？这是很明显的道理。所以今后苏共领导会有一些改变，这是可能的。但是，也不可能很快就变，更不可能大幅度地变。因为赫鲁晓夫上台搞倒贝利亚以至莫洛托夫，有好几年了。搞掉贝利亚比较早，是一九五三年斯大林去世后不久。搞掉莫洛托夫是一九五七年。从一九五七年到现在，有七年了。如果从斯大林去世算到现在，那么也有十一年了。他搞了十一年，而且撤换了大批干部，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干部都大换班。他的内外政策，虽然带有个人的特色，但也代表苏联一定阶层的利益，反映这些阶层的意向，这种情况说明，要很快改变这个局面的可能性不大。至于怎样改变，变到什么程度，这还得看一看。

有三种可能：

第一种，从修正主义变成马克思列宁主义，在目前这种可能性小。

第二种，变得比赫鲁晓夫更坏，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赫鲁晓夫够坏了，再坏到哪里去呢？比如跟中国的关系已经坏到只剩下开除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这一着了，这是赫鲁晓夫准备今年十二月做的；还有就是断绝外交关系、宣布废除中苏同盟条约；还有一条就是打仗了。就是这么几手。所以，要比赫鲁晓夫做得更绝，不是没有可能，但是在目前情况下，这种可能也比较小。

第三种可能性是中间状态，就是说还搞修正主义路线但做法上、策略上有某些改变。这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要他根本改变修正主义路线、大国沙文主义路线不可能，但是策略上、做法上可能有一些变化，有可能比较灵活一点。

在这三种可能性中，第三种可能性比较大。

我们可以这样估计，但是究竟如何还得看一看。因为从十五日以后陆陆续续收到的西方传出的消息和苏联报纸的反应看，还看不出赫鲁晓夫下台的内情如

何，将来究竟有什么变化。我们现在的方针还是“静观”两个字，就是说要看一看，不采取什么行动，不采取什么措施，看一看各方面的情况怎么样，看一看苏共方面究竟有什么变化，然后我们再考虑相应的对策。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静观已经十天，现在是需要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因为苏共公布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从欧洲方面的反应看，比较重要的兄弟党都表示了态度。有些党拥护苏共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有些党说这是正常的事情，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有些党表示要推迟开国际会议，也有些党提出还是要开国际会议；有些党虽然不那么明确，但是也隐约地表示还是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有些党则要求有所改变。

我们也应该采取行动，可以考虑主动向苏共提出，我们派代表团去参加他们庆祝十月革命节的纪念活动。按照惯例，不是逢五逢十的十月革命节，我们虽然也派代表团去，但不是派有分量的代表团去。我们可以考虑这次派出由周恩来当团长的党政代表团去，再加上贺龙同志这位老师跟总理一起去。

这个意见请大家考虑一下，今天先不做决定。在过去十天里，我们的方针是“一肯二看”。肯就是肯定、赞赏，这无非是发了一个贺电。主要是看。已经看了十天，现在的方针应是“一推二看”。看还是要看，不过要做点推动的工作推他们往前走。就是要把推放在第一位，争取苏共领导往好的方面变。

但是这也不能寄予过分的希望，也不能急于求成。因为积累的问题很多，很可能他们首先还是着重解决他们国内的问题，比如什么农业问题、工业问题，什么组织制度问题、干部制度问题、作风问题，等等。老百姓和苏共党内干部对赫鲁晓夫的不满，首先是不满他把国内问题搞得一团糟。因此苏共新领导可能首先要抓这些国内问题。至于对外政策方面的问题，我们希望他们往好的方面变，也可以为此做一点工作，但是不要寄予过大的希望。因为苏共领导的这批人，还是在赫鲁晓夫当第一把手的时候提拔起来的，是跟他一起工作的。过去很多决定也是他们主席团集体做出的。但是变好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我们可以对他们做工作，推着他们往前走，往好的方面发展。从大局看，这比较有利。现在是到推的时候了。

一九六四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现在看来，我们主动派代表团去还不够。我跟恩来同志商量，可以考虑建议

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派代表团去，参加十月革命节。

为什么要十二个社会主义国家都去呢？因为我们一家去太孤单，而且从这次初步反应来看，过去一贯跟随苏共走的那些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都希望苏共维持原来的路线不变，至少多数是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可以提出建议请朝鲜考虑去，请越南考虑去，请罗马尼亚考虑去，还要请阿尔巴尼亚考虑去。我们可以一方面向苏联方面提出这个建议，请他们邀请社会主义国家派代表团去；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跟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驻中国的大使通气，请他们报告国内。说中国党建议大家一起去莫斯科庆祝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一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现在的方针就是“一推二看”，这个推也不想有多大作为，也不要期待他很快会有什么变化。所以看还是很重要。过去十多天我们是看，到莫斯科去也是看，同各方面接触，看看有什么动向，了解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搞下台，他们以后准备怎么办。但是也不要太认真了。

我们这样做，主要是做出一个友好的姿态。我们这种友好的姿态，不但我们国家的人民，而且苏联人民，以至于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都会高兴的。因为吵架吵了这么久，老吵下去也是人心惶惶。这次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可以摸摸情况，比方说，问问他们为什么把赫鲁晓夫打倒，他们认为赫鲁晓夫究竟有那些错误。

关于具体问题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不可能。他不会答应什么东西，主要还是注意多观察、多了解情况。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三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如果他们主动提出来推迟召开筹备会议，我们可以表示还是推迟好，但是具体日期不要跟他们敲定，而应提出要征求所有兄弟党的意见，要协商一致。筹备会议的成员也要同所有兄弟党协商一致。要坚持这个原则。如果苏联提出中苏两党会谈，我们可以原则同意，但日期另行商议。这个问题我们不要主动提出。因为苏共上一次来信就没有提这个问题，而且苏共过去提的中苏两党会谈，不是同准备国际会议挂钩。所以我们艰苦既不主动提，也不确定日期。

我们这样做的目的，就是要观察一下，看看他们究竟有什么打算、有什么想法。我们此行最重要的任务就是现场观察，看看苏方有什么动静，他们可能往哪

方面走。

军事上有个术语，叫做火力侦察，意思是在前线上用炮火射击，使敌人作出反应，以便侦察敌人的虚实和兵力、火力配置。我们派出总理和贺老总去，就是射出炮火。你们到莫斯科，就是看看对方的反应。

总而言之，这次我们不带什么方案去，也不准备在莫斯科达成什么协议，敲定一个什么方案，中苏两党会谈如此，国际会议也是如此。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四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赫鲁晓夫垮台，形势发生变化，我们的策略也要相应改变。现在我们对苏共领导后退一步，就是暂停公开论战，看他们怎么样。如果他们再反华，那我们就有理由再跟他们论战。如果现在继续公开论战，就不得人心。如果现在我们对他们还是采取敌对的态度，而不是采取我们现在派代表团到莫斯科去这种表示友好的姿态，也是不得人心的。现在不仅两国人民，而且社会主义阵营人民，还有像苏加诺、西哈努克这些民族主义国家的领导人，他们也都主张和好。所以我们举着和好的旗帜到莫斯科去是得人心的。赫鲁晓夫垮台以后，我们需要积累资本，看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一样呢还是不一样呢。如果他们跟赫鲁晓夫一样反华，那我们就有充足理由再跟他们公开论战了。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拒绝去参加苏联十月革命节是有理由的，但是它现在还继续公开论战，这就不策略了。斗争应该有理有利有节，现在要节制一下，要退一下，看一看，暂时不忙公开论战。

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共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呢？那是在一九四九年底到一九五〇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七十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

他还把我看做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赫鲁晓夫上台以后，我们跟他是什么时候吵起来的呢？是一九五八年七月底大吵了一顿。为什么呢？是因为他要控制中国，要搞共同舰队，要搞长波电台，就是想把中国所有海岸控制在苏联海军手里。那个时候我们没有什么舰队，所谓中苏共同舰队实际上就是苏联的舰队，这还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在这之前，一九五六年赫鲁晓夫跟波兰吵的时候，我们批评他什么呢？也是批评他的大国沙文主义，支持波兰。后来一九五九年，赫鲁晓夫又跟艾逊豪威尔搞戴维营会谈，要中国服从他联合美国的外交路线，要中国释放美国罪犯，要中国让台湾独立，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这些都让我们顶回去了。

那里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一九六〇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一九六〇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20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是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20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切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

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

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一百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就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当然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的同情。

总理这次带代表团去，不是同苏方进行公开论战，也不要同苏方达成什么协议，而是想对苏方促进一下，但也不寄予过大希望。着重是到现场观察一下这次赫鲁晓夫下台的背景、原因，以及苏共新领导今后动向的迹象。主要是这样的目的。这也就是主动中带有被动，被动中带有主动，这么一个辩证法。友好的姿态，但又不过分热情；希望他们有所进步，又不寄予不切实际的希望；要了解苏共领导在上面说的几个重大问题上的态度，又不主动提出询问和方案，静以观之。总之，既要积极主动，又谨慎持重。代表团可以根据中央这几次讨论的方针相机行事，有什么重要的、紧急的情况可以打电报回来请示。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联名发贺电庆祝苏联十月革命节。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五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在同罗马尼亚和匈牙利党政代表团的会谈中，周恩来透露了来意：赫鲁晓夫下台是好事，会使苏联党和政府的政策有一些变化。我们想做一点推动工作，推动他们向好的方面变化。

二、抗议苏修集团的新挑衅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六日，苏联举行庆祝十月革命节大会，勃列日涅夫作报告。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从这个报告（勃的报告）的摘要可以看到，苏共领导是虚弱的，是胆怯的。所以对一些重大问题不敢采取鲜明的态度，不敢同赫鲁晓夫划清界线，也不敢公开宣布按原定计划召开国际会议。他只讲必要性成熟，但没有讲要在十二月十五

日召开筹备会，当然也没有讲筹备会议有哪些人参加，也没有讲苏共过去提出的明年年中要开国际会议，也没讲中苏两党会谈，这些都没有讲，含糊过去了。看来，他们扳倒赫鲁晓夫，是由于长期积累的不满，最后仓促做出决定的，并没有清理赫鲁晓夫一系列错误更不是因为反对赫鲁晓夫的路线而把他赶下台。

苏共领导现在处于惶惶无主，究竟下一步怎么样做，看来还没有明确的、大家一致赞成的意见，甚至在主席团内部也没有一个有纲领、有步骤、有方法的意见。

我们过去讨论过究竟这次扳倒赫鲁晓夫的核心人物是谁，现在还搞不清楚，要看代表团在莫斯科现场观察怎么样。当然，人的问题不是唯一重要的，重要的是要看他们主席团这个集体是执行怎么样的路线。看来他们现在惶惶然，六神无主。赫鲁晓夫是拉下马了，那么他们自己当家怎么办呢？还没有一套办法。因此，不可作这样的估计，即苏共新领导可能变好，也可能变坏，这两种可能性都存在，稍有改变，但基本路线不变，这种可能性也存在。我们要继续看。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七日晚，在莫斯科的庆祝招待会上，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对贺龙说：“不要在政治上耍魔术，不要让任何的毛、任何的赫鲁晓夫再妨碍我们。”“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贺龙当即气愤地回答说：我们党的情况和你们党的情况完全不同，根本不能相提并论。你们的想法是错误的，是根本不会实现的。当时在场的苏联将领崔可夫元帅对马利诺夫斯基说：我跟你的看法不一样。

贺龙马上向周恩来报告了苏方的这一严重挑衅。周恩来当即严正地向勃列日涅夫、苏斯洛夫和米高扬指出：马利诺夫斯基这么讲是严重的挑衅，我们决不能同意。为什么在这种友好的庆祝会上竟然发生这样的事件？勃列日涅夫说：这件事不是我们中央的意见，马利诺夫斯基不能代表我们中央。他喝醉酒了，酒后失言，请中国代表团不必介意。周恩来回答说：中国代表团认为这是一个严重的挑衅事件，请苏共中央认真对待我们的意见。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八日，在常委会上讨论代表团的急电时，毛泽东说：

现在好了，他们有辫子在我们手里了。我们可以抓住此事采取攻势，不要把这个事情搁到以后再说。代表团现在在莫斯科就采取攻势，不怕大吵，不怕闹僵，不怕不欢而散。要抓住这件事放手进攻，因为理在我们这边，他们公然要干涉我

们内政，这不是大国沙文主义又是什么？

对了，（颠倒敌我）这个问题是一个根本问题。究竟对敌我关系怎么处理，对帝国主义国家怎么样，对社会主义国家怎么样，这是赫鲁晓夫的根本问题。看来苏联相当一部分人对这个问题还弄不清楚。他们一心要搞美苏合作、主宰世界。苏共领导集团还仍然抱有这样的幻想。马利诺夫斯基作为一个国防部长，他说的话正说明他颠倒了敌我关系。以后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可以狠批他们颠倒敌我关系。

既然发生了马利诺夫斯基事件，那么，即使苏共新领导表示道歉，我们也不能跟他们谈其他问题，这件事情至少表明苏共领导目前还无意改变赫鲁晓夫的路线，赫鲁晓夫下台了，他们还继续搞赫鲁晓夫的路线，概括地讲，他们搞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因此，什么召开兄弟党会议就无从谈起，中苏两党会谈现在更不要提了。公开论战也不能停了。十月革命节一过，代表团一回来，我们就开始发表论战文章。

三、新的情况新的方针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日，周恩来等同苏联新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等的会谈。苏方表示：过去苏共是集体领导的，在同中共中央分歧的问题上，苏共中央内部甚至在细节上也是没有分歧的。苏共中央七月三十日信中关于十二月十五日召开二十六国筹备会议一事仍然有效。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日，在常委会讨论中苏代表团第一次会谈的情况时，毛泽东说：

苏共领导集团像法国的拿破仑王朝一样，一代不如一代，最厉害的是拿破仑第一，拿破仑第二就不行了，拿破仑第三更不行了。

看来苏共领导处境比较困难。在东欧几个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过去除了阿尔巴尼亚以外，原来只有一个罗马尼亚出来反对他，不赞成开会。现在又出来一个哥穆尔卡，他主张开会就要开团结的会，也就是不赞成开过去赫鲁晓夫主张开的那种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的会。不仅有哥穆尔卡，还有乌布利希，他认为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应该团结一致，对付西德的复仇主义。他话里有话，因为不久前赫鲁晓夫跟西德搞得很热乎，甚至派他的女婿阿朱别伊去西德，乌布利希对此非常不满，所以提出共同对付西德。

这样算起来还有三个国家，就是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还没有对召开兄弟党会议表态。但是，可以肯定，我们在一九五六年劝告苏联不要从匈牙利撤军，应该支持匈牙利的卡达尔政权，对这一点，匈牙利同志是不会忘记的。所以说，要反华，要把中国开除出去，估计匈牙利是不会赞成的。这样看来，积极支持苏共领导搞分裂的只有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亚。也可能还有蒙古会支持他们，但也不一定，因为蒙古跟我们比较近，中苏关系紧张对蒙古也不利，不会对反华采取积极态度。所以苏领导处境比较孤立。

我们没有料到赫鲁晓夫这么快就垮台。看来我们在三月间跟罗马尼亚代表团谈判过程中，采取寸步不让、一点也不松口、坚持公开论战的方针是做对了。赫鲁晓夫就是害怕公开论战。因为他已经感觉到坐不稳了。想通过罗马尼亚来骗我们停止公开论战，想抓救命稻草。现在回过头来看，那个时候赫鲁晓夫处境很困难，我们采取强硬的态度做对了。如果那个时候松一下，即使同意暂停公开论战，就救了赫鲁晓夫。我们一硬，他们内部反对他的人就更多，他垮台就更快了。但是，当时我们谁都没有想到他这么快垮台。我们七月底发表《九评》，八月，九月，十月，只有三个月，他就垮台了。我们不过发表九篇文章嘛！他们连篇累牍几千篇文章，也不见得对我们有什么损害。因为真理不在他们那边，真理在我们这边。你文章再多，也动不了我们一根毫毛，而我们只有九篇文章，就把赫鲁晓夫打倒了。可见修正主义的基础是脆弱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就可以取得胜利。现在证明，三月间我们坚持一下，还是继续批评苏共《公开信》，赫鲁晓夫抵挡不住，倒下来了。世界上出现过许多类似的情况，在紧要的关头，就看你坚定不坚定、坚持不坚持。你咬紧牙关坚持一下，就可以取得胜利。对方熬不下去，挺不住了，他就失败了。我自己就经历过许多次这样的情况。

现在我们的方针是，继续公开论战这一点绝对不受约束。这当然不是马上就要发表文章，还要看看什么时候发表合适。要抓新的辫子。你不抓新的，老翻赫鲁晓夫的陈帐，那就不行。我们要抓苏共新领导新的反华议论和行动，抓住他们的要害，继续论战，促使他们内部起变化。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我们还是坚持过去那个立场，这在我们八月底的信里讲了。至于中苏两党会谈，如果苏方提出，我们完全拒绝也不好，这个问题要斟酌。

一九六四年十月十二日，在中苏最后一次会谈中，苏方表示：苏共二十大至

二十二大通过的路线和纲领都是正确的，不可动摇的。

这就紧紧地封闭了调整中苏两党关系的大门。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四日，毛泽东到机场迎接周恩来率领的代表团回到北京。在交谈中，毛泽东说：

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和它的筹备会议要封死，就是反对召开，拒绝参加，坚决抵制，召开了我们还要加以谴责。停止公开论战也要封死。我们不受任何约束，继续公开论战，这个原则绝不让步。当然，以后公开论战一定要抓住苏共新领导新的错误，否则别人不会同情。因此我们要积累资本，采取后发制人的方针，他骂了我们之后，我们才反击。我们不为人先，不先骂他。但是，兄弟党评论赫鲁晓夫下台时谈及赫鲁晓夫的错误的文章，我们还可以转载。因为赫鲁晓夫下台，是事件，发表议论完全应该。何况赫鲁晓夫攻击了这么多兄弟党，人家当然有权回答。对赫鲁晓夫下台，我们也要准备一篇文章，不是批评苏共新领导，而是讲赫鲁晓夫犯了种种错误，做了种种坏事，导致他下台，说明他的路线破产。

总的来说，我们还是要看。推，我们已走了一步，我们到莫斯科去就是想推动苏共新领导往好的方面变。但是，结果他们竟然要在我们党内搞颠覆活动，我们还是要看，要继续观察。该做的我们都已经做了，莫斯科已经去过了，也向他们表示友好了，总不能说我们僵化吧。你看，我们派了总理率领这么大的代表团去，又发表了贺电。不仅勃列日夫、柯西金他们上台时我们发了贺电，而且十月革命节也发了贺电，这两个贺电都比较热情，比较友好，是讲团结的。我们已经做到仁至义尽。我们已尽到责任。我们这次去，推一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表示我们希望团结，这样一个姿态是应该的，是做得对的。虽然没有取得什么具体成果，但这不能靠我们这边单相思，要两方面努力才行。我们努一下力，他们却打官腔，含含糊糊，甚至还挑衅，那是他们的责任，于我无损。代表团此行至少可以使我们了解到，苏共新领导跟赫鲁晓夫之间的分歧并不是路线上的分歧。现在看来最大的可能性就是他们要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现在我们还不把话说死，只是说这种可能性最大。至少，我们走这步棋可以得到这么一点收获。试探是必要的，没有达成什么协议是不奇怪的，有一点收获也就够了。

赫鲁晓夫的垮台和苏共新领导的趋向，很可能像中国古代词人所形容的那样：“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六日，在与金日成会谈时，毛泽东说：

现在情况很复杂，对苏共新领导的动向还不那么清楚，谁是主要人物也不清楚。西方宣传报道说，现在苏共新领导是三架马车，就是勃列日涅夫、柯西金和米高扬这三架马车。

公开论战可能暂停一下。他们害怕我们不停。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不受约束，不宣布我们停止公开论战。什么时候需要公开批判他们的错误，就什么时候公开批评，我们有这个自由选择的权利，至于召开兄弟党会议，看来他们所说的“集体措施”就是要在会上做反华决议。

现在的情况是，他们说连细小的问题都同赫鲁晓夫一致，既然如此，那同他们会谈有什么共同的语言。中苏两党会谈，苏方原来说五月就开，我们不同意，说改在十月开。现在看来明年五月也太早。究竟要推迟几个月或几年，还要看一看。

亚洲兄弟党已公开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十二月筹备会议，可以到那时看他们怎样动作再说。

阿尔巴尼亚党是决不参加十二月筹备会议的。罗马尼亚党表示，他们也不参加，也不赞成我们参加。这两个党的态度很值得我们重视。

我们是强硬派，我们不怕苏共召开十二月会议。最好他们开，最好他们如期在十二月十五日开，离现在只有一个月。看来到那时他们可能开不起来。

我们的方针也是坚决反对，而且我们已经公开宣布。我们不能像赫鲁晓夫那样说了话不算，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

我们现在不要大张旗鼓地反对苏共新领导，这样做不得人心。我们要等苏共新领导发表像一九六三年七月《公开信》那样的文告，或者做出公开反对中国的决议、报告，像苏共中央今年二月全会那样，我们才给予公开答复。我们现在要偃旗息鼓，像打仗那样，两个战役之间要有一段时间休整。而且他们自己内部也还在争论不休。所以亚洲兄弟党要继续观察，看苏共新领导怎样变化。

现在是不是可以肯定这样几点：

第一，我们已经采取了步骤，派了代表团到莫斯科去庆祝十月革命节，表示了友好和团结的愿望。

第二，暂时不发表批评苏共新领导的文章。这是指我们自己写的文章。至于

其他兄弟党的文章，我们考虑还是要发表，因为还有一批评论赫鲁晓夫下台的文章还没有发表。

第三，我们还要看一看苏共新领导的表现，至少在苏共召开十二月会议之前要继续看。

第四，对十二月会议，我们的方针不变，坚决反对他们召开。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讨论定稿《赫鲁晓夫是怎样下台的？》一文，并于二十一日以红旗杂志社论的形式发表，为中苏大论战划上了句号。

贰、本节简论

这里借用红旗杂志社论的一段话：

我们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这个时代赋予我们的历史使命，是按照各国的具体条件，经过各国人民自己的手，逐步实现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完全胜利，建立一个没有帝国主义、没有资本主义、没有剥削制度的新世界。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是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共同要求。这种历史趋势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任何力量所不能抗拒的。但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这个当代政治舞台上的丑角偏偏要倒行逆施，妄想把历史的车轮拉回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为垂死的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延长寿命。

人们尽可以列举千百条罪状来说明苏联现代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垮台的原因，但是，千条万条，最根本的一条，是它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所指出的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违背了苏联人民和世界人民的革命意志，妄图阻碍历史的前进。在人民前进的道路上，是石头，就得搬开。不管赫鲁晓夫之流愿意还是不愿意，人民总是要把他抛弃的。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覆灭，正是苏联人民和世界革命人民坚持反对修正主义斗争的必然结果。

同理，其他的修正主义、社会帝国主义也必将步其后尘。

2011年5月4日修改

第四章第十四节 走向分而不裂

壹、本节概述

一、不参加莫斯科三月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收到苏共中央来信，他们规定：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召开筹备会议。

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常委会决定：仍然坚持过去我们对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的一贯立场，坚决反对他们违反协商一致原则召开这样的会议。因此不必答复他们，也不发表声明。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由苏共策动的拉丁美洲九个党（古巴、乌拉圭、委内瑞拉、阿根廷、墨西哥、哥伦比亚、哥斯达黎加、玻利维亚和危地马拉）组成一个代表团到达北京。他们此行的目的主要是劝说中国停止公开论战。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四日，在会见拉丁美洲各党代表团时，毛泽东说：

世界上那么多党骂了我们，骂了那么多，我们现在只回答苏共的《公开信》，而且才写了九篇文章。苏共还有许多重要的决议、讲话也都是反华的，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回答。所以公开论战不能停。过去，你们好些党也跟着苏共骂我们，我们也有权利来回答。你们骂了那么多，那么久，但我们一直没有回答。你们不是讲言论自由吗？你们可以自由骂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给我们一点自由呢？为什么要剥夺我们自由辩论的权利呢？

停止公开论战就是不行。我们要答辩，而答辩这么多的指责时，一天不够，一个月也不够，一年也不够，一百年也不够，一千年也不够，索性讲得彻底一点，九千年我们都回答不完，要回答一万年。凡是批评过我们的，我们都要回答，包括你们在座的批评过我们的这些党。我们都要给你们回答。

你们说公开论战无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那么我们要问，你们公开批评我们的时候，为什么说是有利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你们那个时候为什么没有考虑到你们对我们的公开批评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呢？现在我们来回答你们的批评，你们却说我们有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有这个道理吗？

关于召开兄弟党国际会议，不管开二十六个党会也好，开六十个党的会也好，八十多个党的会也好，我们统统不参加。因为这是苏共片面决定的，没有跟我们商量。苏共新领导决定的东西，跟赫鲁晓夫不同的只是改头换面。召开那样的会议，就是分裂的会议，我们决不参加。我们怀疑你们是受了苏共的委托到中国来做说客的。我们欢迎你们来，但是你们的话我们不能接受。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日，毛泽东在北京参加有三百万人参加的集会，抗议美国轰炸越南，声援越南的抗美救国战争。

一九六五年二月十一日，在会见路过北京的柯西金时，毛泽东说：

一九六二年我跟契尔沃年科夫讲过两党领导人会谈。当时我讲的是赞成你们公开论战的做法。我说，公开论战：第一，天不会塌一下来；第二，树木照样长；第三，河里的鱼照样游；第四，女人照样生孩子。那个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主张论战，而是你们开始发动公开论战，那我们就有权利来回答你们。但是，公开论战无非是笔墨官司，一个人也没有死。所以我们赞成你们这样的做法。至于现在提到要停止公开论战，那我们就不赞成了。天晓得那一天才能停止呀！去年罗马尼亚同志到中国来，劝我们停止公开论战。这个事情大概你们是知道的。我跟他们说，可以论战二十五年，二十五年以后再说。后来又有人说，不但要停止公开论战，还不能支持所谓派别活动，于是我就提高价钱。我说要公开论战一万年，少了不行。

我们赞成你们搞公开论战，赞成你们一九六三年七月十四日发表《公开信》那种论战，也赞成去年二月苏共中央全会作报告和做决议那种论战。不要搞那些不痛不痒的论战，不痛不痒没有什么味道。

我们赞成公平合理的公开论战。你们骂我们的文章，我们都在报上发表了；而我们答复你们的文章，你们就很少发表。

对你们的公开信，我们才答复了九篇文章；而对你们二月会议的报告和决议，我们还没有答复。你们还有许多东西，我们也都还没有答复，这样就停止公开论战，那是不行的。可能帝国主义会使我们停止公开论战。对于某些人，马克思主义可能不起什么作用，但帝国主义可能使他们清醒过来，这些人需要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才行。

你们说你们自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我们不是，我们是“教条主义

者”。如果既反对修正主义，又反对教条主义，那这个问题就没有争论了。对于这两个东西，什么时候都要反，有多少就反多少，要多少时间就多少时间。如果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有一万年，我们就要反一万年。可以减少一点时间，可以减少一千年，从一万年减少到九千年，这是我们最大的让步了。争论总是会有的，但是也会讲和的。我们同住在一个地球上，你看吧，不要多少年，我们的关系也可能会改善。说一万年、九千年是讲得凶一点，“教条主义”就会说这些话，而你们是不会说这些话的。

我非常欣赏这个词（指教条主义），这顶帽子戴定了，脱不了了。这是别人给我戴的。其实我冬天出去，到室外都不戴帽子，也不穿大衣。昨天我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群众大会，也没有戴帽子，也没有穿大衣。

你在五日、六日路过北京的时候，我们周总理同你谈过，他劝你们不要开三月一日那个会。我倒赞成你们开，我跟少奇同志、小平同志这些人叫做“教条主义”，顽固不化。赞成你们开会，但我们不参加，而贺龙、彭真、罗瑞卿等，他们老劝你们不要开，我则劝你们不要改期。你们原来自己定的日期是十二月十五日开，就应该这个时候开，开完就完了。现在你们又说要改在今年三月一日开。如果你们再改期，或者说不开，对你们不利，丧失威信。改个名称，不叫起草委员会，叫协商会晤，也不必。你们索性召开起草委员会吧。这个会一开，那就有文章好做了。你们老是不开，老是延期，这样做，对苏共这个形象不好，对一个伟大的列宁的党的形象不好。我是顺着你们的，我是赞成你们开会的。

过去我们讲过要迟四年五年再开，现在看来不行，还要往后推迟，加一倍吧，要过八年十年再看。现在时机不成熟，因为问题还没有展开争论，要把是非讲清楚才能开会，这得有准备时间。现在你们不同我们商量，单方面地发表通知，要三月一日开会。既然这样，我们只好赞成你们开，不要改期，也不要改称什么“协商会晤”，三月一日开就行了。有几个党不到也没有什么要紧，你们就开吧。

起草委员会那个名字也不要改。你们制定纲领也好，不制定也好，你们就去开会吧。我们完全赞成。但是，我们不参加就是了。

你们去年七月三十日的那封信里面就是那么说的，说有些党不参加也不要紧。你们十一月二十四日给我们的要在今年三月一日开会的那封信也是这样写

的。这不是你们干的事吗？这两封信不是你们写的吗？十一月二十四日的信，不是赫鲁晓夫干的，是赫鲁晓夫下台以后，你们现在的领导写的。

还有一个问题，你们跟阿尔巴尼亚的关系搞得这么紧张，搞得那么绝，这个问题不解决，什么会都不能开。这个问题只有你们跟阿尔巴尼亚去解决，解决了就可以开会，不解决什么会也不能开，你们要开我们就不参加。我建议你们取消过去对付阿尔巴尼亚那一套。如果你们真的要开会的话，就取消那一套，说那一套错了，只要说这么一句就行了。如果你们要我们去参加开会，你们就得取消前年七月十四日攻击我们的那个《公开信》和去年二月你们中央全会上的那个报告和那个决议。只要你们说这些都是错误的，因此取消，那么我们就可以合作。

过去你们把赫鲁晓夫说得那么好，说他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知道你们怎么搞的，怎么把他这个这样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撤职了呢？这位赫鲁晓夫同志有什么不对的么？

我们现在就发出邀请，邀请赫鲁晓夫到北京来。你们主席团能不能答应让赫鲁晓夫到北京来？我跟赫鲁晓夫辩论，行不行？他不代表你们党吗？他过去代表你们党，做了许多好事情，这都是你们过去说的，您们“20大”这么说，“21大”这么说，“22大”也是这么说的。

你们去开会好了。你们是多数，又很有理由。你们是“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而我们不过是“教条主义者”。“教条主义”就是一点马克思主义也没有，我们去干什么？而且我们又是“好战分子”。第一是“教条主义者”，第二是“好战分子，我这个人名誉不好。全世界都骂我们这两条。我们这些“教条主义者”、这些“好战分子”怎么能够去开会，怎么能够团结？你们自己开好了。

大概十年以后我们两党可能团结起来，客观的情况会逼迫我们团结起来，帝国主义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不但不饶我们，也不会饶你们的。

这个问题不要一千年，大概十年、十五年以后形势可能紧张起来，世界上没有什么缓和。我们天天说争取缓和国际局势，实际上国际局势天天都在紧张。如果能争取到十年至十五年的和平时间就好了。我们双方到十年、十五年以后会团结的。只要帝国主义动刀枪，对着你们也好，对着我们也好，我们就会团结起来。现在为什么争吵呢？就是因为在和平时期帝国主义耍软的一手，把你们提的口号统统接过去了。

我们两党的关系、中苏的团结，可能还得请帝国主义帮忙，时间可能在十年、十五年以后，也许它更帮忙，那就是七年、八年以后，我们可能团结起来。现在我们还没有完全分裂。要是完全分裂，我们还能招待你吗？我们不招待美帝国主义，我也不接见英国的什么贸易大臣、什么英国代办之类，我一概不见。中苏两党、两国的关系要真正达到消除分歧、团结一致，就要采取适当的步骤。各有不同是可以的，略有区别也是可以的，有重大区别也可以。世界上共产党不是一个样子，帝国主义也不是一个样子。

一九六五年三月一日至五日，苏共召开了“协商会晤”，总共只有十六个党的代表和观察员参加。三月十日才发表会议公报。

一九六五年三月二十三日，发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

二、不参加苏共“23大”

一九六六年一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邀请我党派代表团参加将在四月间召开的“23大”。

一九六六年二月八日，在一个小型会议上，毛泽东说：

苏共新领导上台以后，讲了许多重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话。在召开三月分裂会议之后，他们更是不指名的攻击我们党。这些都表明他们实行的是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主义。但是，这并不是因为他们理直气壮，只是说明他们内部有困难需要这样做。他们那么怕我们，是成不了气候的。我们暂时可以置之不理，把子弹储存起来，对于他们老一套的修正主义的反华言论，我们采取评《公开信》的形式已发表了九篇评论。对苏共其他决议、报告、讲话、文章，我们还没有答复，我们已声明保留答复的权利。现在苏共新领导，讲的都是陈腔滥调，毫无新意，值不得浪费笔墨。现在不必管它，过一个时期再看，如果有些新东西，才考虑答复。那时不但要答复，而且还要把他们的东西加以转载。

还有一个月他们才开“23大”，还有时间从容考虑，我们如果不去参加，是不是要通知其他兄弟党，到时候再说。现在我们已经知道，越南党已答应参加，估计朝鲜党也会去的。如果我们决定不参加，可以通知他们，也可以不通知他们，这个问题还有时间考虑。

一九六六年三月十八日，在常委会上，毛泽东说：

我们去不去参加苏共“23大”，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去参加是一个重

大步骤，不去参加也是一个重大步骤，都关系我们对中苏关系采取的方针。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也同右派分不清了。我

们不去参加，无非他们在会上大反华，这正合我们的需要。右派去参加是不成问题的。处于中间状态的党，有的是想去的，有的想去又不大愿意，还在犹豫不决。左派兄弟党中，估计越南党是会去的，因为他们需要苏联援助。朝鲜党怎么样？可能去也可能不去，看来他们还在考虑这个问题。因此，在去参加或不去参加这个问题上，有些党在动摇不定。要使人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不参加就行了。此事可以告诉阿尔巴尼亚，也可以告诉朝鲜和越南。对其他兄弟党是否通知，大家可以议一下。至于十月革命节，那是苏联国庆，中苏之间还有国家关系，可以照过去一样发贺电。对受苏共影响较大的群众团体比如国际妇联、国际青联、国际学联以及国际工联，还有世界和平会议等等，是否还参加它们的活动，也要区别对待。

贰、本节简论

当时的党中央，特别是政治局在反对苏联的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斗争中，是高度一致的，并且充分发挥了集体领导的作用。特别是邓小平当时作为总书记，具体负责领导撰写批修文章的工作，并且多次参加、率领中共代表团与苏共代表团谈判，受到毛泽东的赞扬。

可是，就是这个邓小平，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与戈尔巴乔夫的会谈中居然说：从 1957 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 60 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回过头来看，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他还说：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现在我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按照邓小平的说法，那些意识形态的你是非，不过是双方说了一大堆空话。字里行间透出对当年论点中的教条主义的反思。今天视之为空话的那些东西，恰恰是那一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执着认识。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正是在这一时期，中苏两党，或者说毛泽

东与赫鲁晓夫之间相互激怒的事件频繁发生。其中又有四件大事……在这些事件的分歧中，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总是纠缠在一起。究竟是由于国家利益的矛盾加深了意识形态冲突？还是意识形态分歧恶化了国家利益的矛盾？或许兼而有之。”

这些话说得貌似公允，实质是也是攻击毛泽东维护社会主义国家利益和反对修正主义的正义性，为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和修正主义开脱罪责。

肖冬连的《文革前十年史》说：中共也对其他党，尤其是南斯拉夫和苏联国内外政策，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和全盘否定基于一些传统的社会主义观念，对于南斯拉夫率先冲破斯大林模式，对于苏联东欧国家刚刚露出来的改革趋向，对于西欧共产党寻求非暴力的社会主义道路尝试，进行了猛烈的抨击，视之为修正主义。

利用中苏论战问题攻击毛泽东最猖狂的，还是那个辛子陵。他在《全卷》中说：“毛泽东发现，高举反帝反修的旗帜，可以转移全党全国人民对经济困难的注意力，把全党和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从积极方面说，树立自己世界革命领袖的形象。”这场大论战是“毛泽东与赫鲁晓夫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互争领袖地位的大论战”。（下册，第 458-459 页）

《毛泽东传（1949-1976）》在这个问题上也有不少错误论断：

该书说《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这篇“文章把中苏两党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的分歧摆了出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当时的看法。通过对南斯拉夫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分析，从经济、政治、外交等方面，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这些认识，对于当时毛泽东对国内社会情况和党内状况的观察影响很大，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

关于这篇文章，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说：“《三评》根据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做了分析，同时根据南斯拉夫和西方国家的经济关系（1961 年南斯拉夫联邦预算收入的 67.6%是来自西方国家的援助和贷款），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三评》提出一个很重要的论点是，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从南斯拉夫的情况来看，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的。”“现在看来，《三评》对南斯拉夫实际情况的分析不准确，有些提法是过

分了，不过评论中所提出的国家性质和平演变的论点，还是很有意义的。”

吴的这本书完成于一九九九年，离《三评》的发表已经有三十六年了，因此，有了一些新的认识。现在，离《十年论战》的出版又有近六年了，对这个问题究竟应该怎么看？

现在争论的焦点在于：对南斯拉夫的城市经济和农村经济所做分析，指出南斯拉夫无论在城市或者在农村，资本主义的因素在发展，这一点是否正确？国家性质是否改变决定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有没有改变，一个国家政权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途径蜕化变质，这个论点是否正确？该书对这些论点都是否定的：说它们“勾画了当时所称的“资本主义复辟”的基本轮廓和标志”；而且认为它们“使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一系列论断，朝着“左”的方面进一步发展了。”但是，今天的历史实践告诉人们什么呢？南斯拉夫联邦还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吗？作为一个国家它还存在吗？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和变质，原因当然很复杂，其中，经济中资本主义因素的发展和国家政权的和平演变，不能不说是两个最根本的原因。实践再一次证明，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理论和路线是正确的。

该书说：“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这里包含两个问题：其一是，“苏共领导的修正主义和分裂主义，是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起来的产物”，代表了毛泽东通过对苏联变化的观察和中苏论战得出的一个认识，这个认识是否正确？表面上看，该书并没有作出进一步的判断，实际上，对这个认识是有保留的，甚至认为是不正确的，这一点，从下面接着的一句话就可以看出来。其二是，他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从而由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样做是否正确？这句话也非常含糊。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毛泽东用这个观点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些都是错误的。另一种解释是：毛泽东用这个观点在国内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是正确的；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是错误的。实际上，在该书的作者们看来，至少，毛泽东同样用这个观点观察中国国内的问题，是错了，因为在中国

内根本就不存在“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由此也就根本不存在它的产物——修正主义，由此也就根本用不着提出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任务，也就不会最后演变成“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当然，应该承认，与现在比较起来，当时国内资产阶级因素泛滥和增长，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了，但是，谁也不能否认，在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下，国内的资产阶级因素确实是在泛滥和增长。

该书说：但是，这十五条也比较系统地体现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把八届十中全会以来迅速发展着的关于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继续进行阶级斗争的一系列思想系统化了。又说：由于对国内形势过分严重的估计，在“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指导下，《九评》把中苏论战中得出的一些结论运用到对国内政治生活状况的观察，又进一步加速和加深了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条件下阶级斗争的“左”倾理论和政策的发展。

这里说的“十五条”指的就是一九六四年七月十四日发表的《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简称《九评》）一文的最后部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训，一共归纳为十五条。该书对这十五条，虽然也承认其中包含有合理因素，说这十五条，包括了毛泽东在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中的一些正确的思考，如关于正确区分和处理社会主义社会两类社会矛盾的思想，关于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总方针和逐步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思想，关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关于人民军队必须永远置于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等等。但是，从整体上对这十五条加以否定。下面具体看一下，它肯定了什么，否定了什么：

第一条，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立统一的规律来观察社会主义社会。文章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处理的方法也不同。如果不能正确处理好这两类矛盾，就不能够正确地处理无产阶级专政。

这一条，它是肯定了的。 第二条，“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社会主义社会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单有在经济战线上、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够的，并且是不巩固的，必须还有一个政治战线上和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彻底的社会

主义革命。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谁胜谁负的斗争，需要一个很长的时间才能解决，几十年内是不行的，需要一百年到几百年的时间才能成功。在时间问题上，与其准备短些，宁可准备长些；在工作问题上，与其看得容易些，宁可看得困难些。这样想、这样做，较为有益，而较少受害。如果对于这种形势认识不足，或者根本不认识，那就要犯绝大的错误。” 还指出，在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中，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才能够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为过渡到共产主义准备条件。

这一条，它是坚决彻底否定的，认为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指导思想。人们希望看到，这些“理论家”们，对上述观点作出具体的批驳，究竟它错在哪里？ 第三条，无产阶级专政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专政。这个专政是对反动派进行专政，对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这种民主，是任何资产阶级国家所不能有的最广大的民主。

这一条，它也是否定的。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这些人为什么对无产阶级专政也加以反对？ 第四条，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发动群众，大搞群众运动。

这一条，它当然也是否定的。他们从来就反对“大搞群众运动”。 第五条，不论在社会主义革命中，或者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都必须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社会主义社会既然已经不存在阶级了，为什么还要强调解决依靠谁、争取谁、反对谁的问题呢？！

第六条，必须在城市和乡村中普遍地、反复地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进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贯彻以阶级斗争为纲！

第七条，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任务之一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地、普遍地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

这一条，它是肯定的。而且还认为说得不够。 第八条，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两种形式。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没有强调发展私有经济。 第九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的方针。我们要经过文化革命，经过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的革命实践，建立一支广大的、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又红又专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队伍。

这一条，它肯定了前一句话，否定了后一句话。 第十条，必须坚持干部参加集体生产劳动的制度。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干部是管理者，为什么还要参加集体生产劳动？而且还要形成一种制度？ 第十一条，绝不要实行少数人的高薪制度。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不实行高薪制度就是搞平均主义、大锅饭。 第十二条，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武装部队，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永远保持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

这一条，它是肯定的。军队不置于党的领导下，这个党还怎么执政呢？ 第十三条，人民公安机关，必须永远置于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和人民群众的监督之下。

这一条，它没有明确肯定。大概也不至于否定吧？ 第十四条，在对外政策方面，必须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反对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利己主义，必须真正实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和全世界无产者同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的战斗口号，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和各国反动派的反共、反人民、反革命的政策，援助全世界被压迫阶级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要三和一少嘛！ 第十五条，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同无产阶级专政一起存在，在一切部门中都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制度。党必须保持和发展它同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联系，保持和发扬它的生气勃勃的革命风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坚持反对修正主义、反对教条主义和反对一切机会主义的斗争。

这一条，它是否定的。应该始终贯彻反左。

通过以上的具体分析，人们对该书作者们的政治立场就更加清楚了。

吴冷西在《十年论战》中仍然坚持这样的看法：

“以上 15 条是在当时激烈的公开论战中间提出来的。虽然其中某些观点还有一定的片面性，但是，总的来看，毛主席的这些观点是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特别是他提到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谁战胜谁的问题要一百年到几百年才能解决。他还提到，在这中间要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防止和

平演变。如果我们不注意反修防修，那么少则几年、十几年，多则几十年，就不可避免地出现全国性的反革命复辟。这些观点有着深远意义。”

“他提出的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反修防修，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等问题，都是根据苏共“20大”以来，而且不仅是苏共“20大”以来，还包括斯大林时期的经验教训提出来的。”

“如果说在 1956 年毛主席根据苏共“20大”、苏波关系、匈牙利事件的教训，主持写出了《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那么，可以说这次发表的《九评》，即《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这篇文章，是 1956 年以来的反修斗争中积累的经验教训的总结，是第三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不仅包含了前两篇文章的观点，而且加以发展了。特别是跟苏共公开论战开始以后，赫鲁晓夫沿着修正主义的道路越走越远，总结怎么样防止和平演变这个重大问题的确是非常重要的。”

“这篇文章挖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的根，揭了他的底，在国际上震动很大。从积极意义上讲，它在全世界共产党人面前，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人面前，提出了怎么样防修，怎么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怎么样防止社会主义和平演变成资本主义这么一个重大的、历史性的理论和实践的问题。”

这些看法，人们很难抗拒。

勿须讳言，吴冷西也说过：“当然，这些观点中，有的是他在谈到中国会不会改变颜色的问题时提出来的。他当时对中国的形势估计得过分严重，囿于“以阶级斗争为纲”，这种“左”的观点后来导致“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

这只能说明，像吴冷西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大家，也难于摆脱历史的局限！

2006 年 8 月 18 日初稿

2011 年 5 月 4 日修改

第五章 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侵略

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第五章第一节 美国以联合国的名义侵略朝鲜，扼杀新中国

壹、本节概述

一、艰难决策

一九五〇年四月间，金日成到北京，中国就告诉他，“要严重地注意外国反动军队侵略朝鲜的可能性。”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朝鲜战争爆发。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决定派出海军和空军入侵朝鲜领海、领空，进攻朝鲜人民军，对朝鲜城市狂轰滥炸。

同时命令第七舰队向台湾海峡出动，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阻挠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既定部署。

美国总统杜鲁门在六月二十七日发表的声明中宣称：“对朝鲜的攻击已无可怀疑地说明，共产主义已不限于使用颠覆手段来征服独立国家，现在要使用武装的侵犯与战争。……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部队的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及在该地区执行合法与必要职务的美国部队。”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八次会议上庄严宣告：“全国和全世界的人民团结起来，进行充分的准备，打败美帝国主义的任何挑衅。”他还说：“杜鲁门在今年一月五日还声明说美国不干涉台湾，现在他自己证明了那是假的，并且同时撕毁了美国关于不干涉中国内政的一切国际协议。”

一九五〇年六月三十日，美国总统命令美国陆军在朝鲜参战。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联合国安理会在苏联缺席的情况下通过成立“联合国军司令部”（八日任命麦克阿瑟为“联合国军”总司令）。

一九五〇年七月七日和十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由周恩来主持召开两次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

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三日，中央军委作出《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

毛泽东当天批示：“同意，照此执行。”

随后，立即将驻河南等地的战略预备队第十三兵团（下辖第三十八军、第三

十九军、第四十军），加上第四十二军（原在东北）和炮兵第一师、第二师、第八师等，共二十五万五千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往安东（今丹东）、辑安（今集安）、本溪。

一九五〇年八月上旬，东北边防军完成集结，并开始整训。

一九五〇年九月六日，第五十军又编入东北边防军。

这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决策。隔了六年以后，毛泽东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说：“战争开始后，我们先调去三个军，后来又增加了两个军，总共有五个军，摆在鸭绿江边。所以，到后来当帝国主义过三八线后，我们才有可能出兵。否则，毫无准备，敌人很快就要过来了。”

后来，毛泽东还不无惋惜地表示过：“可惜那时候只有五个军，那五个军火力也不强，应该有七个军就好了。”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对事态的发展曾经作过各种可能的设想，估计到出现最坏的局面——美军在朝鲜人民军侧后的海岸登陆。一九五〇年八月，朝鲜人民军在朝鲜半岛南端洛东江同美军和南朝鲜军打成胶着状态，这时毛泽东预见到，战争转入持久和美国扩大战争规模的可能性日益增大。“七月中旬，七月下旬和九月上旬，我们又三次告诉朝鲜同志，要他们注意敌人有从海上向仁川、汉城前进切断人民军后路的危险，人民军应当作充分准备，适时地向北面撤退，保存主力，从长期战争中争取胜利。”

一九五〇年八月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如美帝得胜，就会得意，就会威胁我。对朝鲜不能不帮，必须帮助，用志愿军的形式，时机当然还要适当选择，我们不能不有所准备。

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审阅了代总参谋长聂荣臻的一个报告。报告提出，准备派出部分高炮部队进入朝方一侧，以确保鸭绿江大桥的安全。

毛泽东当即批示“同意”。

这对日后确保中国人民志愿军顺利出兵来说，是一个重要决定。

一九五〇年八月五日，毛泽东致电东北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高岗，要求东北边防军在月内完成一切准备工作，准备九月上旬能作战。

一九五〇年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又电高岗，要边防军务必在九月三十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工作。

随后，根据聂荣臻的建议，决定将第九兵团和第十九兵团分别调到津浦、陇海铁路沿线地区，策应东北边防军。

一九五〇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九次会议上指出：“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朝鲜战争持久化的可能性正在逐渐增大。”

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判断。

毛泽东还分析了美国在军事上的长处和短处，概括起来是“一长三短”。他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尽管如此，毛泽东并没有轻敌和大意。他在讲话中提出要防备美帝国主义乱来，打第三次世界大战。他说：“所谓那样干，无非是打第三次世界大战，而且打原子弹，长期地打，要比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打得长。我们中国人民是打惯了仗的，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这些话，反映了毛泽东毫不畏惧任何敌人和任何困难的革命气势。毛泽东已经作出最坏可能性的准备，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准备同美国这个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直接较量。

但是，中国出不出兵，毛泽东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过去打。”

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五日，朝鲜战局发生急剧变化。美军七万余人在仁川港登陆，二十八日占领汉城，切断位于朝鲜半岛南部洛东江边的朝鲜人民军主力的退路，使之腹背受敌，朝鲜人民军被迫实行战略退却。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日，周恩来复电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要他向金日成转告中共中央对目前朝鲜战局的意见。毛泽东审阅并修改了这个电报。复电说：“我们认为你（指金日成。——引者注）的长期作战思想是正确的。朝鲜军民的英勇是令人感佩的。估计敌人在仁川方面尚有增加可能，其目的在于向东延伸占领，切断朝鲜南北交通，并向三八线进逼。而人民军必须力争保住三八线以北，进行持久战方有可能。因此，请考虑在坚持自力更生长期奋斗的总方针下如何保

存主力便于各个歼灭敌人的问题。”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夜，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报告：“美帝国主义已在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从倪志亮二十七日电看来，三八线北已无防守部队，似此情况甚为严重，敌人有直趋平壤可能。

一九五〇年九月三十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为了保卫和平，从不也永不害怕反抗侵略战争。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

这是对美国当局发出的十分有力的严正警告。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南朝鲜军越过三八线。

同日，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此刻，“联合国军”在南朝鲜已经集结三十三万兵力。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深夜，金日成紧急召见中国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

同时，金日成与朴宪永（当时任朝鲜政府副首相兼外务相）联名致信毛泽东，要求中国给予军事支援。

一九五〇年十月一日，斯大林来电要求中国立即派出至少五六个师到三八线，以便让朝鲜组织起保卫三八线以北地区的战斗。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凌晨二时，毛泽东立即致电高岗、邓华：“（一）请高岗同志接电后即行动身来京开会；（二）请邓华同志令边防军提前结束准备工作，随时待命出动，按原定计划与新的敌人作战。”

他还在周恩来给驻朝鲜大使倪志亮的电报稿中加写了一段话，要他转告金日成：“尽可能将被敌切断的军队分路北撤外，凡无法撤退的军队应在原地坚持打游击，切勿恐慌动摇。如此就有希望，就会胜利。”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毛泽东起草的给斯大林的电报。毛泽东起草的电文主要内容：

“（一）我们决定用志愿军名义派一部分军队至朝鲜境内和美国及其走狗李承晚的军队作战，援助朝鲜同志。我们认为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如果让整个朝鲜被美国人占去了，朝鲜革命力量受到根本的失败，则美国侵略者将更为猖獗，于

整个东方都是不利的。

（二）我们认为既然决定出动中国军队到朝鲜和美国人作战，第一，就要能解决问题，即要准备在朝鲜境内歼灭和驱逐美国及其他国家的侵略军；第二，既然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和美国军队打起来（虽然我们用的是志愿军名义），就要准备美国宣布和中国进入战争状态，就要准备美国至少可能使用其空军轰炸中国许多大城市及工业基地，使用其海军攻击沿海地带。

（三）这两个问题中，首先的问题是中国的军队能否在朝鲜境内歼灭美国军队，有效地解决朝鲜问题。只要我军能在朝境内歼灭美国军队，主要地是歼灭其第八军（美国的一个有战斗力的老军），则第二个问题（美国和中国宣战）的严重性虽然依然存在，但是，那时的形势就变为了革命阵线和中国都是有利的了。这就是说，朝鲜问题既以战胜美军的结果而在事实上结束了（在形式上可能还未结束，美国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承认朝鲜的胜利），那末，即使美国已和中国公开作战，这个战争也就可能规模不会很大，时间不会很长了。我们认为最不利的情况是中国军队在朝鲜境内不能大量歼灭美国军队，两军相持成为僵局，而美国又已和中国公开进入战争状态，使中国现在已经开始的经济建设计划归于破坏，并引起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一部分人民对我们不满（他们很怕战争）。

（四）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决定将预先调至南满洲的十二个师（五六个不够）于十月十五日开始出动，位于北朝鲜的适当地区（不一定到三八线），一面和敢于进攻三八线以北的敌人作战，第一个时期只打防御战，歼灭小股敌人，弄清各方面情况；一面等候苏联武器到达，并将我军装备起来，然后配合朝鲜同志举行反攻，歼灭美国侵略军。

（五）根据我们所知的材料，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七公分至二十四公分口径的各种炮一千五百门，而我们的一个军（三个师）只有这样的炮三十六门。敌有制空权，而我们开始训练的一批空军要到一九五一年二月才有三百多架飞机可以用于作战。因此，我军目前尚无一次歼灭一个美国军的把握。而既已决定和美国人作战，就应准备当着美国统帅部在一个战役作战的战场上集中它的一个军和我军作战的时候，我军能够有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即用我们的四个军对付敌人的一个军）和一倍半至两倍于敌人的火力（即用二千二百门至三千门七公分口径以上的各种炮对付敌人同样口

径的一千五百门炮），而有把握地干净地彻底地歼灭敌人的一个军。

（六）除上述十二个师外，我们还正在从长江以南及陕甘区域调动二十四师位于陇海、津浦、北宁诸线，作为援助朝鲜的第二批及第三批兵力，预计在明年的春季及夏季，按照当时的情况逐步使用上去。”

这份电报没有发出，但它非常详尽地反映了毛泽东个人当时对出兵朝鲜的基本态度和各种考虑，因而是一份具有很高价值的文献。根据有关情况判断，毛泽东这个电报很有可能是在十月二日下午召开书记处会议之前起草的，原准备在书记处会议作出出兵决定后发给斯大林。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日下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半岛局势和中国出兵问题。毛泽东认为出兵朝鲜已是万分火急。在这次会议上，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毛泽东只能把这份电报搁置下来，而将多数人的意见，通过苏联驻华大使罗申转告斯大林。在转告斯大林的意见中，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表示：“关于这个问题还没有做出最后决定”，“我们将举行一次中央会议，中央各部门的主要同志都将出席”。这说明，毛泽东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为这个问题最终而正确的解决，留下了回旋余地。会议决定十月四日召开扩大的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志愿军入朝作战问题。毛泽东要周恩来派飞机到西安，将彭德怀接到北京参加会议。

一九五〇年十月三日凌晨一时，周恩来紧急约见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再次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

一九五〇年十月四日下午，在毛泽东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中南海颐年堂召开。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彭真、陈云、张闻天、彭德怀（会议中间赶到）、高岗。列席会议的有罗荣桓、林彪、邓小平、饶漱石、薄一波、聂荣臻、邓子恢、李富春、胡乔木、杨尚昆。

派志愿军出国同美军作战，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牵动全局的大事。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个新的重大抉择：出兵，或者不出兵。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首先让大家讲讲出兵的不利情况。

与会者各抒己见。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或者对出兵存有种种疑虑。理由主要是中国刚刚结束战争，经济十分困难，亟待恢复；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土匪、特务还没有肃清；我军的武器装备远远落后于美军，更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在一些干部和战士中间存在着和平厌战思想；担心战争长期拖下去，我们负担不起等等。

听到大家的发言后，毛泽东讲了这样一段话：“你们说的都有理由，但是别人处于国家危急时刻，我们站在旁边看，不论怎样说，心里也难过。”

一九五〇年十月五日上午，彭德怀从北京饭店到中南海毛泽东办公室。彭德怀表示拥护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当毛泽东把挂帅出兵的重任交给彭德怀的时候，彭德怀说：“我服从中央的决定。”毛泽东略带感慨地说：“这我就放心了。现在美军已分路向三八线冒进，我们要尽快出兵，争取主动。今天下午政治局继续开会，请你摆摆你的看法。”

下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仍然有两种意见。在别人发言之后，彭德怀讲述了自己的观点。他说：“出兵援朝是必要的，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

会议最后作出决定，由彭德怀率志愿军入朝作战。

从十月二日到五日，中央开了三天会议。会上充分发扬民主，毛泽东尽管有了自己的主张，仍然认真听取各种不同意见，让大家把出兵的不利方面和困难方面充分地说出来，然后再说服大家。其实，对于打不打的问题，毛泽东也是左思右想，想了很久。如聂荣臻所说，毛泽东对这件事确实是思之再三，煞费心血的。不是毛泽东好战，问题是美国已经打到我们的国境线上了，不打怎么办？后来毛泽东对金日成讲起这件事，说：“我们虽然摆了五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这是毛泽东对当年中央政治局关于出兵援朝决策过程的一个形象的描述。这是一个何等艰难的决策啊！

一九五〇年十月六日，周恩来在中南海居仁堂主持召开包括各地区负责人在内的党政军高级干部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根据五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决定，讨论入朝作战方案和布置有关方面的工作。

一九五〇年十月七日，美军在开城地区越过三八线，向北推进。

同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一个“统一”朝鲜的提案。

与此同时，美国将战火从鸭绿江边烧到中国东北，派出 B—29 重型轰炸机和其他作战飞机，对中国东北边境城市安东、辑安等地进行频繁的轰炸和扫射，炸毁建筑物、工厂及车辆，炸死炸伤中国平民，袭击正常行驶的商轮。从十月起，美国还派飞机袭扰山东半岛的青岛、烟台等地，大有将战火从中朝边境进一步扩大之势。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在美军已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以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发布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命令：

“为了援助朝鲜人民解放战争，反对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们的进攻，借以保卫朝鲜人民、中国人民及东方各国人民的利益，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

“任命彭德怀同志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我中国人民志愿军进入朝鲜境内，必须对朝鲜人民、朝鲜人民军、朝鲜民主政府、朝鲜劳动党（即共产党）、其他民主党派及朝鲜人民的领袖金日成同志表示友爱和尊重，严格地遵守军事纪律和政治纪律，这是保证完成军事任务的一个极重要的政治基础。”

同日，毛泽东将这一历史性的决定电告金日成，并请他派朝鲜政府内务相朴一禹到沈阳，与彭德怀、高岗会商志愿军入朝作战的有关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上午，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命令，立即与高岗率领临时指挥人员飞往沈阳。次日上午，彭、高召集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中央出兵援朝的决定，要求各部在十天内作好一切出国作战的准备。

一九五〇年十月八日，周恩来和林彪代表中共中央，秘密飞往苏联，同斯大林商谈抗美援朝和苏联给予军事物资支援特别是提供空军掩护问题。尽管中国共产党已经决定出兵，但周恩来还是带着两种意见，出兵或者不出兵，去同斯大林商讨的。如果中国出兵，那就要求苏联给予武器装备和提供空中支援。

双方谈得并不很顺利。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斯大林和周恩来联名致电毛泽东，其中说到，苏联可以完全满足中国提出的飞机、坦克、大炮等项装备，但是苏联空军尚未准备好，

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才能出动空军。事实上，斯大林担心如果出动苏联空军在朝鲜境内同美国交战，将造成严重后果。

这样，在中国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又出现一个波折。毛泽东认为需要与政治局的同志再次讨论此事，以作定夺。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二日，他致电彭德怀、高岗，要求：“（一）十月九日^⑧命令暂不实行，十三兵团各部仍就原地进行训练，不要出动。（二）请高岗、德怀二同志明日或后日来京一谈。”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就出兵问题，与彭德怀、高岗和其他政治局委员再一次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即使苏联不出空军支援，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大举北进的情况下，我们仍应出兵援朝不变。

当天，毛泽东把这个决定电告周恩来：

“（一）与高岗、彭德怀二同志及其他政治局同志商量结果，一致认为我军还是出动到朝鲜为有利。在第一时期可以专打伪军，我军对付伪军是有把握的，可以在元山、平壤线以北大块山区打开朝鲜的根据地，可以振奋朝鲜人民重组人民军。两个月后，苏联志愿空军就可以到达。六个月后可以收到苏联给我们的炮火及坦克装备，训练完毕即可攻击美军。在第一时期，只要能歼灭几个伪军的师团，朝鲜局势即可起一个对我们有利的变化。

（二）我们采取上述积极政策，对中国、对朝鲜、对东方、对世界都极为有利；而我们不出兵让敌人压至鸭绿江边，国内国际反动气焰增高，则对各方都不利，首先是对东北更不利，整个东北边防军将被吸住，南满电力将被控制。

（三）真日菲里波夫和你联名电上说，苏可以完全满足我们的飞机、大炮、坦克等项装备，不知它是用租借办法，还是要用钱买，只要能用租借办法，保持二十万万美元预算用于经济、文化等项建设及一般军政费用，则我军可以放心进入朝鲜进行长期战争，并能保持国内大多数人的团结。

（四）只要苏联能于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除出动志愿空军帮助我们在朝鲜作战外，又能出动掩护空军到京、津、沈、沪、宁、青等地，则我们也不怕整个的空袭，只是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内如遇美军空袭则要忍受一些损失。

（五）总之，我们认为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害极大。”

当时，毛泽东关注又担心的是两点：第一，苏联提供武器装备，是用租借办法，还是用钱买。这是关系到用于国内建设和一般军费的资金能否保证，从而影响国内经济是否稳定的问题。第二，苏联能否真正做到在两个月或两个半月之内提供空军支援。为此，毛泽东要周恩来在莫斯科再留几天，与苏联就上述问题重新商定。

周恩来将毛泽东此电内容通过莫洛托夫转达斯大林。斯大林作出了这样的回答：苏联将只派空军到中国境内驻防，两个月或两个半月后也不准备进入朝鲜境内作战。

斯大林这个决定，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但没有动摇毛泽东的决心。

此时，正值平壤告急。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五日凌晨一时，毛泽东以周恩来的名义起草了一份电报，要倪志亮大使转交金日成。电报说：“请即派一位熟悉道路的同志于十月十六日到安东接引彭德怀同志和金日成同志会面。如倪大使找不到金日成同志，则请倪大使派人去安东接引。”

同一天，金日成派副首相兼外务相朴宪永到沈阳，会见刚刚从北京返回的彭德怀，要求中国尽快出兵。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六日，彭德怀和高岗赶到鸭绿江北岸的安东，召开志愿军师以上干部大会，宣布中央的决定。严阵以待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如箭在弦上，只待最高统帅部一声令下，立即跨过鸭绿江。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下午五时，毛泽东电告彭德怀、高岗，要他们十八日来京，并说：“对出兵时间，以待周(恩来)十八日回京向中央报告后确定为宜。”

一九五〇年十月十八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会议，在听取了周恩来和彭德怀的汇报后，把志愿军渡江作战和渡江时间最后敲定下来。遂于当晚二十一时，电令第十三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等：“四个军及三个炮师决按预定计划进入朝北作战，自明十九晚从安东和辑安线开始渡鸭绿江，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河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

从十月一日晚金日成要求中国出兵，到十九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仅仅十八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一个漫长的路程。在这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的困难出现在他面前。他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

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要能应付自如，迅速作出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耐心地去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这是多么不容易！

二十年以后，一九七〇年十月十日，毛泽东、周恩来会见金日成时，共同回忆了这段曲折的历史过程：

毛泽东：“事情总是这么弯弯曲曲的。在那个时候，因为中国动动摇摇，斯大林也就泄了气了，说：算了吧！后头不是总理去了吗？是带了不出兵的意见去的吧？”

周恩来：“两种意见，要他选择。我们出兵就要他的空军支持我们。”

毛泽东：“我们只要他们空军帮忙，但他们不干。”

周恩来：“开始的时候，莫洛托夫赞成了，以后斯大林又给他打电话说，不能用空军支援，空军只能到鸭绿江边。”

毛泽东：“最后才决定了，国内去了电报，不管苏联出不出空军，我们去。我看也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算半价。还有汽车队呀。”

对毛泽东出兵援朝的决策，彭德怀曾作过这样的评价：“这个决心不容易定下，这不仅要有非凡的胆略和魄力，最主要的是具有对复杂事物的卓越洞察力和判断力。历史进程证明了毛主席的英明正确。”

二、五大战役

还在志愿军出兵前夕，毛泽东和彭德怀等研究敌情后商定：利用敌人东西对进的时机，志愿军和平壤、元山铁路线以北，德川、宁远公路线以南地区，也就是朝鲜半岛细腰部（又称蜂腰部）地区以北，构筑两道至三道防御阵线。如果敌来攻，则在阵地前面分割歼灭之；如果平壤美军、元山南朝鲜军两路来攻，则打孤立较薄弱之一路。在六个月内，如敌人固守平壤、元山不出，则我军也不打平壤、元山。在我军装备训练完毕，空中和地上均对敌人具有压倒的优势条件之后，再去攻平壤、元山等处。这就是说，六个月以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第一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至十一月四日。

志愿军渡江后，麦克阿瑟改变了东西对进的计划。美军和南朝鲜军分为东西两路，大举北进，速度甚快，直向中朝边境逼近。

根据敌情的变化，毛泽东迅速改变作战部署。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凌晨二时三十分，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正式下达第一次战役的部署。他看出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伪均未料到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他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过了一个小时，毛泽东又电告邓华等：“现在是争取战机问题，是在几天之内完成战役部署以便几天之后开始作战的问题，而不是先有一个时期部署防御然后再谈攻击的问题。”

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指导第一次战役部署中，对于如何打开朝鲜战局，指导方针逐步考虑成熟。他在复彭德怀的电报中指出：

朝鲜战局，就军事方面来说，决定于三点。

第一，目前正在部署的战役是否能利用敌人完全没有料到的突然性全歼两个、三个甚至四个伪军师。此战如果是一个大胜仗，则敌人将被迫作重新部署，立即处于被动地位；如果这次突然性的作战胜利不大，使我不得不于阵前撤退，则形势将改为了敌有利。

第二，敌人飞机杀伤我之人员、妨碍我之活动究竟有多大。如果我能利用夜间行军作战做到很熟练的程度，则我军可以继续野战及打许多孤立据点，如此便有迫使美国和我进行外交谈判之可能；如果敌人飞机对我的伤亡和妨碍大得使我无法进行有利的作战，则在我飞机条件尚未具备的半年至一年内，我军将处于很困难的地位。

第三，如果美国再调五个至十个师来朝鲜，而在这以前我军又未能在运动战中及打孤立据点的作战中歼灭几个美军师及几个伪军师，则形势也将于我不利；如果相反，则于我有利。

以上这几点，均可于此次战役及尔后几个月内获得经验和证明。总之，我们应在稳当可靠的基础上争取一切可能的胜利。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战略的和战役的指导思想，对于志愿军取得第一次战役以及以后几次战役的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结束第一次战役。

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经过十三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一万五千余人，把敌人

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十三日，周恩来起草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电报。

毛泽东审阅这份电报时加写了一段话，说：“据我的观察，朝鲜的战局，是可以转变的。现在我志愿军十六个师在朝鲜西北战线方面，已给了敌人第一个打击，已经初步地立稳了脚跟，只要能再给该线敌人（八个师）以一个至二个较大的打击，就能将该线的防御局面改变为进攻局面，而这是有可能的。东北战线方面，我志愿军仅有两个师，敌人（五个师）还很猖獗，现正增派八个师去，准备给敌人一个打击，转变该线的战局。”

第二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至十二月二十四日。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西线敌军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于是，志愿军立即发起第二次战役。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日，毛泽东在会见金日成时，对朝鲜战局发展前途曾作出两种可能的估计。他说：“战事有可能迅速解决，但也可能拖长，我们准备至少打一年，朝鲜方面也应作长期打算。”

这表明，毛泽东把重点放在准备长期作战的基点上。

他还对金日成说：“你们现在比从前是更强了，不是更弱了。当你们越过三八线直向大丘进攻不计后方空虚的时候，你们是最弱了。现在你们既懂得胜利又懂得失败，有了经验，你们就更强了。”“敌人有可能要求停战，我们认为必须敌人承认撤出朝鲜而首先撤至三八线以南，方能谈判停战。最好我们不仅拿下平壤，而且拿下汉城，主要是消灭敌人首先是全歼伪军，对促进美帝撤兵会更有力量。”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六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收复平壤。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三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里又强调指出：“目前美英各国正要求我军停止于三八线以北，以利其整军再战。因此，我军必须越过三八线。如到三八线以北即停止，将给政治上以很大的不利。”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的情况下，美国操纵联合国非法通过成立“朝鲜停战三人委员会”的决议，要求“立即停火”。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六日，将西线之敌全部赶到三八线以南。在东线，人民军于九日收复元山，切断敌人陆上退路。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十七日，志愿军占领咸兴，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总理就此发表声明，揭露美国政府在其侵略军遭到失败的今天，提出先停战后谈判，这“显然是为着美国可以取得喘息时间，准备再战，至少可以保持现有侵略阵地，准备再战”。“因此，在没有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及朝鲜内政由朝鲜人民自己解决作基础，来讨论停战谈判，都将是虚伪的，都将适合美国政府的意图，而不可能达到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善良愿望”。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志愿军收复兴南。

至此，除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第二次战役胜利结束，共歼敌三万六千余人，其中美军二万四千余人。志愿军和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第二次战役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两次战役的经验，并听取了彭德怀等人的意见，对朝鲜战局的发展前途作出明确判断：“战争仍然要做长期打算，要估计到今后许多困难情况。要懂得不经过严重的斗争，不歼灭伪军全部至少是其大部，不再歼灭美英军至少四五万人，朝鲜问题是不能解决的，速胜的观点是有害的。”

第三次战役：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至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十七时，中朝军队全线发起进攻，在约二百公里的宽大正面上—举突破“联合国军”防线纵深十五至二十公里。“联合国军”怕中朝军队从右翼迂回包围，使其十余万兵力在汉江北岸陷入绝境，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日全线撤退。

一九五一年一月四日，中朝军队进占汉城。

一九五一年一月五日，中朝军队渡过汉江，

一九五一年一月八日，中朝军队收复仁川。

“联合国军”退守“三七线”附近。中朝军队以凌厉的攻势，攻城夺地，但却未能大量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敌人则有诱我深入、在侧后登陆、对中朝军队夹击的企图。

第四次战役：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至四月二十一日。

从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五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人民军尚未得到充

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一九五一年一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分析说：“第四次战役后敌人可能和我们进行解决朝鲜问题的和平谈判，那时谈判将于中朝两国都有利。而敌人则想于现时恢复仁川及汉城两岸桥头堡垒，封锁汉江使汉城处于敌人威胁之下，即和我们停战议和，使中朝两国处于不利地位。而这是我们决不允许的。”

一九五一年二月七日，中央军委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作出决定，实行轮番作战。这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向彭德怀提出：“朝鲜战争能速胜则速胜，不能速胜则缓胜，不要急于求成。”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五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和彭德怀共同召集军委各总部负责人开会，讨论各大军区部队轮番入朝参战和如何保障志愿军物资供应问题。

就在这一天，杨得志为司令员的第十九兵团作为第二番兵力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陈赓为司令员的第三兵团，也入朝参战。

一九五一年三月一日，周恩来就朝鲜战局和志愿军采取轮番作战方针问题为毛泽东起草了一封给斯大林的电报，经毛泽东修改后发出。电报说：

“从目前朝鲜战场最近进行的战役（指第四次战役。——引者注）中可以看出，敌人不被大部消灭，是不会退出朝鲜的，而要大部消灭这些敌人，则需要时间，因此，朝鲜战争有长期化的可能，至少我应作两年的准备。”“为粉碎敌人意图，坚持长期作战，达到逐步歼灭敌人之目的，我中国志愿军拟采取轮番作战的方针。”“总之，在美国坚持继续作战，美军继续获得大量补充并准备和我军作长期消耗战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准备长期作战，以几年时间，消耗美国几十万人，使其知难而退，才能解决朝鲜问题。”

这最后一段，是毛泽东加写的。

电报还说，彭德怀希望苏联尽快派空军掩护中朝军队后方线。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日，斯大林复电，同意派苏联空军两个驱逐机师进入朝鲜境内作战，掩护中朝军队的后方。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联合国军”集中二十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三日，主动撤离汉城。

到三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但是由于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敌人再也难以前进。

一九五一年四月二十一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这次战役历时八十七天，歼敌七万八千余人，把“联合国军”阻止在三八线附近。

第五次战役：四月二十二日至六月十日。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就在策划在朝鲜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四月二十二日发起第五次战役。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六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九个军，共有十五个军约一百万兵力。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六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

毛泽东在电报中要求，目前打美英军只实行战术的小包围，打小歼灭战，经过打小歼灭战进到打大歼灭战。

一九五一年五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召见志愿军参谋长解方和第三兵团司令员陈赓（六月一日被任命为志愿军第二副司令员）时，又重申了这个作战方针，把它叫做“零敲牛皮糖”，“每军一次以彻底干脆歼敌一个营为目标”。

毛泽东还嘱咐说：要“将朝鲜战局的长期性、艰苦性使全体干部和战士有充分认识与思想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在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毛泽东的这个作战方针以及对战局的估量，表述得更为明确。他说：

“因为我军技术条件比敌人差得很远，无法迅速解决朝鲜问题，而决定用长期战争的方针去解决它，则需要有一个逐步削弱敌人的阶段，然后转到最后解决问题的阶段。

敌人现在不但火力很强，战斗意志也还未衰落。我军过去总想用大包围的方法，企图一次解决敌人一个至几个整师，结果没有达到目的，而包围和歼灭敌军的几个连至一二个营的机会则较多。因此，不要做现在我军还不能做到的事，不要企图打大规模的歼灭战，而应精心设计，寻找机会，多打小规模歼灭战。

我军每次进攻时，只能由战斗员自己携带七天的粮食和弹药。用完了，停下来，等候补给。如果没有解决敌人，只好撤回来。这是因为敌人用大量空军封锁我军战线的近后方，我们的车辆大部被击毁，粮弹送不上去。敌人已经完全明了我军的这种情况。当我军前进时，它就全线后撤。等候我军粮弹用完，它就举行反攻。”

以上论述，反映出毛泽东把抗美援朝战争的总结上升到规律性的认识。毛泽东对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认识，用了十年的时间。他对抗美援朝战争的特殊规律的认识，用了不到一年的时间。

第五次战役六月十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八万二千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三、边打边谈

互相摸底

一九五一年五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

一九五一年五月三十一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地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为即将来临的停战谈判作好多方面的准备。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日，毛泽东会见从朝鲜前线专程到北京的金日成，同他商谈如何应对可能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及方案。

一九五一年六月五日，毛泽东致电斯大林，提出了目前需要同他商量解决的一些问题：“我们感觉我们在朝鲜进行的战争，在财政方面，在正面作战方面，在敌人从后方海岸线有登陆可能性的威胁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问题。我们想派高岗同志于日内乘飞机去莫斯科向您作报告，并向您请示解决各项重要问题。同时，金日成同志现来北京，他愿意偕高岗同志一道去和您商量这些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九日，毛泽东给斯大林的电报里，提出要商谈增加订购武器及其他军事物资的货单、和战问题、志愿军聘请苏联军事顾问等问题。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日，高岗和金日成乘斯大林派来的专机飞往莫斯科。

一九五一年六月十一日，第五次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天，毛泽东致电彭德怀说：“六、七两个月内如不发生意外变化(即登陆)，我们必须完成下列各事：甲、以积极防御的方法坚持铁原、平康、伊川三道防线，不使敌人超过伊川线；乙、迅速补充三兵团及十九兵团至每军四万五千人，并有相当训练；丙、十三兵团各军休整完毕；丁、加强各军师火力，特别是反坦克反空军炮火；戊、迅速修通熙川至宁远至德川的公路至少一条，最好有两条，并于熙川、德川、孟山地区屯积相当数量的粮食，以备万一之用。”

一九五一年六月一九五一年十三日，斯大林同高岗、金日成举行会谈。

毛泽东当天致电高岗、金日成，谈了他对如何提出停战谈判建议问题的一些设想。电报说：“和谈如何提法，我们觉得在目前两个月内朝中军队取守势的时候，不宜由朝中两国提出，而宜用下列方式：（一）等待敌人提出；（二）由苏联根据凯南对马立克的谈话向美国有所表示。以上方式可以同时做，即一方面有苏联有所表示，另一方面如果敌人提出时，朝中两国可以表示自己的态度。究以何种方式为宜，请你们和菲里波夫同志商量决定。”

不久，斯大林采纳了毛泽东的后一个建议，由苏联出面对美国的试探作出反应。

一九五一年六月中旬，一种新的指导方针在毛泽东的头脑里酝酿成熟，被及时地提了出来，这就是：“充分准备持久作战和争取和谈，达到结束战争”。在军事上进一步概括出“持久作战、积极防御”的方针。利用朝鲜的有利地形，构筑坚固的防御阵地，一面以积极防御的手段大量杀伤敌人有生力量，一面积极改善装备和加强训练，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逐步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最后战胜

敌人，或迫敌知难而退。

毛泽东提出的这个方针，使中朝军队能够在即将到来的长达两年之久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相互交错、边打边谈、又谈又打的局面下，牢牢掌握主动权。

公开倡议阶段。

一九五一年六月二十三日，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提出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主张交战双方谈判停火与休战，把军队撤离三八线。

一九五一年六月三十日，“联合国军”总司令李奇微奉美国政府之命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还提出会谈地点在停泊在元山港的一艘丹麦伤兵船上。

一九五一年七月一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

一九五一年七月五日，由李克农率领的停战谈判工作组从北京启程，前往朝鲜。行前，毛泽东同李克农、乔冠华作了长时间谈话，分析了停战谈判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并对组织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提出意见。

一九五一年七月九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的前一天，毛泽东还在仔细审阅南日、邓华准备在首次会议上的发言稿。他在给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南日、邓华两个发言稿均可用。惟南日稿内称‘愿意接受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先生的提议并准备举行停战谈判’，改为‘愿意举行停战谈判’，将‘接受苏联’以下二十一个字删去，因为李奇微的声明在文字上并无愿意接受马立克提议的表示，如果南日这样说，可能引起对方的无谓的批评。邓华发言稿中所说马立克提议一段则是好的，不会引起批评的。如果你们认为南日发言稿中应有提到马立克提议的话，应在另外的地方去说。”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日停战谈判正式开始，进入会议议程谈判阶段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毛泽东致电李克农并金日成、彭德怀：“李奇微的通知是以划中立区为主题，来掩盖他因记者这个小问题而引起会议停顿的不妥当

行动。我方为取得主动起见，决定同意他划中立区的提议，也同意他将新闻记者作为他代表团工作人员一部分的办法，以取消敌方的一切借口。”

同一天，毛泽东重新起草朝中方面给李奇微的复信。全文如下：

“李奇微将军：

你的七月十三日的来信收到了。为了扫除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的误会和争论，使和平谈判工作得以顺利进行起见，我们同意你所提的将开城地区划为在会议进行期间的中立区，在此区域内双方停止任何敌对活动，及将武装人员完全摒除于会址区域及你我代表团通往会址区域的通路之外的建议。至于这个会址区域的大小及其他有关的具体问题，我们建议交给双方代表团在一次会议上去解决。

关于引起这次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和划中立区的问题无关的。后一个问题自从七月八日贵方联络官提过一次之外，贵方的代表团再也没有提出过。而联络员的任务是讨论细节问题的，无权讨论像划中立区这样性质的问题。

此次引起停会的原因的新闻记者问题是一个小问题，值不得为这个问题引起停会，更加值不得为这个问题而引起会议的破裂。贵方代表团曾经在会议上提出这个问题，我方代表团当时认为在会议还没有任何成就，并且连议程也没有通过的时候，各国新闻记者来到开城是不适宜的，这个问题因而没有取得协议。

我们坚持一切问题必须由双方协议才能执行的原则，我们认为这个原则是公平的，无可辩驳的。新闻记者问题既然没有达成协议，就不应当由贵方一方片面地强制执行。

为了不因这件小事而使会议陷于长期停顿或破裂起见，我们现在同意你的建议，即将贵方新闻记者代表二十人作为你的代表团工作人员的一部分。我们已命令我方代表团在这个问题上也给贵方以便利。

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金日成

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 彭德怀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四日”

这个复信，将问题说得透透彻彻，把对方的借口驳得干干净净，心平气和，入情入理，表现出朝中方面对停战谈判的诚意，又显露了毛泽东的外交斗争策略和斗争艺术。这使得朝中方面在第一个斗争会合上赢得了主动。

一九五一年七月十七日，周恩来以毛泽东的名义起草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

彭德怀电，经毛泽东审阅修改后发出。

电报指出：“这几天来，我们在中立区及新闻记者问题上，在议程中的军事分界线及监察和停战的机构问题上，都已做了让步，有可能使他们发生错觉，以为在他们继续拒绝讨论的情况下，我们仍会继续让步。因此，你们必须在撤退外国军队问题上，不要顾虑对方拒绝讨论，要继续驳斥对方拒绝讨论之非，而且不要去争论这是军事问题或是政治问题，而应着重说明这是保证停战的必要条件，以免掉入敌人故设的逻辑陷阱。”还说：“我们不提议休会，不表示破裂，但也不怕他们破裂。”

毛泽东在审阅此电时，加了一段话：“我们提此条（指撤退外国军队。——引者注）是有充分理由的（各国派兵到朝鲜是来作战的，不是来旅行的，为什么停战会议有权讨论停战，却无权讨论撤兵呢？显然这种理由是不能成立的。因此，我方坚持会议既然有权讨论停战，也就有权讨论撤兵）”。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毛泽东起草电报，致李克农并告金日成、彭德怀说：“在谈判过程中，我们已经很好地利用了撤兵问题，一方面表明了我们的爱好和平，另一方面又揭露了敌人是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又说：“现在我们可以确定：此次停战谈判，仍应以争取从三八线上撤兵停战为中心，来实现和平解决朝鲜问题的第一步，至于从朝鲜撤退外国军队问题，可以同意留待停战后的另一个会议去解决而不将其列入此次会议的议程之内。关于此点，已取得金首相的同意。”

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六日，双方通过谈判议程，共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从一九五一年七月二十七日起，朝鲜停战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进入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朝中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无理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一万二千平方公里的土地。美方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一九五一年十月二十三日，美军的秋季攻势刚刚被粉碎，毛泽东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上，向美国政府，向全世界郑重声明：

“抗美援朝的伟大斗争现在还在继续进行，并且必须继续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我们不要去侵犯任何国家，我们只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对于我国的侵略。大家都明白，如果不是美国军队占领我国的台湾、侵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和打到了我国的东北边疆，中国人民是不会和美国军队作战的。但是既然美国侵略者已经向我们进攻了，我们就不能不举起反侵略的旗帜，这是完全必要的和完全正义的，全国人民都已明白这种必要性和正义性。”

“我们很早就表示：朝鲜问题应当用和平方法予以解决，现在还是这样。只要美国政府愿意在公平合理的基础上解决问题，不再如过去那样用种种可耻的方法破坏和阻挠谈判的进行，则朝鲜的停战谈判是可能成功的，否则就不可能成功。”

“我们的敌人认为：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面前摆着重重的困难，他们又用侵略战争来反对我们，我们不可能克服自己的困难，不可能反击侵略者。出于敌人的意料之外，我们居然能够克服自己的困难，居然能够反击侵略者，并获得伟大的胜利。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双方就第二项议程达成协议，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到一九五二年五月，朝鲜停战谈判取得重要进展。在第三和第五项议程上，双方达成了协议。

第四项议程即关于战俘问题的谈判，从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一日就开始了。双方争论的关键在于，朝中方面主张依照日内瓦公约的规定遣返全部战俘，美国则借口所谓“自愿遣返原则”，拒绝全部遣返。

一九五二年七月十五日，经毛泽东审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致斯大林的电报，指出：“在这种形势下，我们认为绝对不应接受敌人这种具有挑衅性和引诱

性的方案，而且在敌人压力之下屈服，对我极为不利。”“如果敌人拒不让步，继续拖延，我们即扩大宣传，揭破敌人企图破坏停战谈判、扩大侵略战争的阴谋，动员世界人民舆论，并配合我们在朝鲜前线的坚持，使敌人不断损伤，以逼使敌人最后让步。如敌人竟敢于破裂谈判，扩大战争，我们亦有所准备。因为这个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不但对朝中两国，而且对整个革命阵营都有影响。”

同一天，毛泽东还审定发出了周恩来起草的致金日成并李克农的电报，明确表示：“接受敌人十三日方案，对我极为不利。不接受并准备敌人破裂，我们具此决心，敌人倒不一定破裂。如果敌人不让步，或使谈判破裂，我应与敌战下去。”

一九五二年九月十八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发起全线性战术反击作战，至十月三十一日结束，历时四十四天，歼敌两万五千余人，志愿军伤亡一万零五百余人，敌我伤亡为二点五比一。

毛泽东对这次反击作战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

“此种作战，在若干个被选定的战术要点上，集中我军优势的兵力火力，采取突然动作，对成排成连成营的敌军，给以全部或大部歼灭的打击；然后在敌人向我军举行反击的时机，又在反复作战中给敌以大量的杀伤；然后依情况，对于被我攻克的据点，凡可以守住者固守之，不能守住者放弃之，保持自己的主动，准备以后的反击。此种作战方法，继续实行下去，必能制敌死命，必能迫使敌人采取妥协办法结束朝鲜战争。自从去年七月我军采取坚强的阵地作战以来，给予敌军损失的数量，远远地超过去年七月以前在各次运动战中给予敌军的损失数量。而我军的损失则大为减少，其中人员损失，单就志愿军来说，从去年七月以来的十五个月中，比较以前的八个月，平均每月减少三分之二以上（前八个月平均每月为二万五千人，后十五个月平均每月为八千人），这种情况，就是依靠阵地实行上述作战方法的结果。而在九月十八日开始的这一段期间内，则此种作战方法表现为更有组织性和更带全线性，所以特别值得重视。”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四日，美国在上甘岭地区发动了空前激烈的“金化攻势”。至十一月二十五日，志愿军收复全部失地。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四日，志愿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邓华向毛泽东报送关于朝鲜战局形势与明年方针任务的报告，提出美国在我侧后登陆以及登陆的几种可能性。毛泽东立即对报告写了三段批示：

（一）“应肯定敌以五至七个师在汉川鸭绿江线大举登陆，并在我后方空降，时间应准备在春季，也可能更早些，我应十分加强地堡和坑道，部署五个军于这一线，其中要有四个有经验的军，划定防区，坚决阻敌登陆，不可有误。”

（二）“第二个登陆危险区是通川元山线，第三个危险区是镇南浦汉川线”。

（三）“决不能许敌在西海岸登陆，尤其不能许其在汉川鸭绿江线登陆。”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七日晚十时，毛泽东单独约见邓华谈话。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八日下午四时，毛泽东在颐年堂主持召开有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毛泽东致信邓华：“应估计敌已决策在汉川至清川江线登陆，并在积极准备中，我方必须火急准备对敌，粉碎其登陆计划。”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九日下午，聂荣臻召集有关负责人会议。根据毛泽东对朝鲜战局发展的判断和决心，研究防敌于朝鲜我军侧后登陆的各项准备工作。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日晚十一时，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有高岗、聂荣臻、邓华列席的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问题。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一日晚十时，毛泽东约聂荣臻谈话。当天，毛泽东审阅批准了聂荣臻关于防敌在侧后登陆及各项战备工作的报告，并批示：“抓紧检查，务必完成任务。”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十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并正式下达关于准备一切必要条件坚决粉碎敌人登陆冒险的指示。指示要求：“尽一切可能的力量去极大地增强海岸及其纵深的坚固防御工事；同时增强三八线正面的纵深防御工事以为配合。”并任命邓华兼任西海岸的指挥部司令员和政治委员，梁兴初为副司令员。

这表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严重危险，毛泽东决心将志愿军的主要指挥重心，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转向沿海纵深的侧后反登陆作战，并全力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部署和交通运输。

毛泽东在指示中最后指出：“两年多以来，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在对美帝国主义及其帮凶军的英勇顽强的战斗中，取得了伟大的辉煌的胜利，已经摸清了敌人的底子，克服了很多的困难，积蓄了丰富的经验。美帝国主义采用了很多办法和我们斗争，没有一样不遭到失败。现在剩下从我侧后冒险登陆的一手，它想用这一手来打击我们。只要我们能把它这一手打下去，使它的冒险归于失败，

它的最后失败的局面就确定下来了。中央坚决相信我志愿军协同朝鲜人民军是能够粉碎敌人的冒险计划的。希望同志们小心谨慎，坚忍沉着，动员全力，争取时间，完成一切对敌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只要准备好了，胜利就是我们的了。”

一九五三年二月，美国的军事冒险活动又有新的升级趋势。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就职不久，在一九五三年二月二日发表国情咨文，宣布取消台湾海峡“中立化”，作出放蒋出笼以配合美军在朝鲜军事冒险的姿态。第二天，他又同参加“联合国军”的十六国代表会谈，说服他们支持对中国实行封锁。

不坚决制止美国的这种冒险行动，恢复停战谈判是不可能的。毛泽东代表中国政府表明了严正立场。

一九五三年二月七日，毛泽东在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上说：

“我们是要和平的，但是，只要美帝国主义一天不放弃它那种横蛮无理的要求和扩大侵略的阴谋，中国人民的决心就是只有同朝鲜人民一起，一直战斗下去。这不是因为我们好战，我们愿意立即停战，剩下的问题待将来去解决。但美帝国主义不愿意这样做，那么好罢，就打下去，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一直打到美帝国主义愿意罢手的时候为止，一直打到中朝人民完全胜利的时候为止。”

在毛泽东的具体而周密的指导下，一场大规模的反登陆作战的准备工作，争分夺秒地加紧进行。到一九五三年四月底，各项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从三八线附近的正面防御阵地，到东西海岸，直到中国东北境内，构成了大纵深的严密的防御体系，使敌人无隙可乘。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二日，“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致函朝中方面，提议在停战前先交换伤病战俘，试图借机恢复从一九五二年十月八日起由“联合国军”单方面中断了近五个月的停战谈判。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九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告诉他：“关于克拉克于二月二十二日要求双方先交换重伤病而能行走的俘虏问题，我方尚未答复。乔冠华根据你的意见已拟好一个采取驳斥态度的谈话稿，在我处压下来未发，等你回来商量后再办。美方此次要求可能是杜勒斯上台后的一种试探做法。我方对策有二。一种是驳斥，一种是表示可以商谈，在商谈中看情形决定最后对策。你在和苏联同志谈话时，请将此事提出询问他们的意见。”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一日，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从布拉格返回莫斯科。当晚，他在电报里说：“苏方提议的中心思想，即是准备在战俘问题上求得妥协，以掌握和平的主动权。解决方案，是利用克拉克的文件，由金、彭出面答以同意根据日内瓦公约一〇九条，双方先行交换重伤病战俘，其不愿回者暂交中立国，并恢复板门店谈判解决具体问题。然后即由中朝双方当局分别发表声明，主张战俘按分类办法实行遣返，要求遣返者立即遣返，其余则交由指定的中立国（如印度或其他国，视情况再定），保证其得到公正解决。苏联外长跟着发表赞助声明，然后苏联在联合国代表即作同样活动。”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在复电里对苏方的提议表示赞同，并说：“这实际上即是去年九月上旬我们向谢明诺夫同志（指斯大林。——引者注）所提三个方案中的一个方案”，“后来因美国在板门店采取横蛮态度，这个方案未能提出。现在提出这个方案是适合时机的。惟我方声明中应将俘虏分为达成协议者和未达成协议者，而不称为愿回家者和不愿回家者，以免和我们历来反对所谓‘自愿遣返’原则相冲突。具体步骤待你回来酌处。”

一九五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毛泽东在给丁国钰并告金日成、彭德怀的复电里，明确表示：“关于克拉克二月二十二日建议先行交换可以行走的重伤病俘虏一事，我方准备同意讨论此事，复文尚须数日才能拟好，暂时不要向外边透露。”

毛泽东在复电中，还提醒朝中代表团充分注意美方在停战谈判问题上的态度变化，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他说：“对方最近在板门店的行动，带有明显的挑衅和威胁的性质，因此应该提高警惕，设想坏的情况，并作必要准备，但另一方面，对方这些行动的目的则显然是逼我谈有关停战的课题，实质上表示对方着急。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在亚洲采取一系列措施，企图从杜鲁门造成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争取主动，其建议交换伤病俘可能是对方有意在板门店转弯的一个试探行动。在分析对方具体行动时，必须注意问题的这两个侧面。”“对于违反协议事件，过去我们采取不分轻重一事一抗的方针，本已有些被动。最近一星期内，如无重大事件，望不要向对方送抗议。”

毛泽东并没有因停战谈判的恢复而放松警惕。他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

四月中旬，毛泽东向邓华提出谈判期间志愿军行动的指导方针，即“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一九五三年五月十三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前发起夏季反击作战，迫使美国在五月二十五日基本接受了朝中方面的提案。作为夏季反击作战的第一阶段基本结束。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七日，志愿军发起夏季反击作战第二阶段攻势，并及时调整部署，由原定的以打击美军为主，改为以打击南朝鲜军为主，取得了歼敌四万一千余人的战绩。歼敌数几乎是第一阶段的十倍。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五日，停战谈判的各项议程全部达成协议。按照双方实际控制线划定军事分界线的工作即将完成。朝鲜停战谈判就要圆满完成历史使命。

一九五三年六月十六日，李承晚复函艾森豪威尔，拒绝接受停战协议。十八日，又强行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两万七千余人劫往南朝鲜军队训练中心，公然破坏协议，引起世界公愤。

一九五三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泽东紧急复电给刚从北京到平壤准备参加停战协定签字仪式的彭德怀，指出：“停战签字必须推迟，推迟至何时为适宜，要看情况发展方能作决定。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

根据这个决策，中朝军队积极准备发起规模空前的金城战役，集中力量打击南朝鲜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三日二十一时，阴云密布，大雨欲来。中朝军队突然发起进攻。一千余门火炮齐发，敌军阵地顿时笼罩在火海之中。不到一个小时，中朝军队即突破南朝鲜军的全部前沿阵地。

这次战役，中朝军队在强大的炮火支持下，如猛虎下山，一直打到停战协定签字时为止，共歼灭南朝鲜军七万八千余人，收复失地一百六十七平方公里。

中朝军队在三八线上迅速推进。

一九五三年七月十九日，美方发表声明，保证实施停战，并向南朝鲜施压。随后，南朝鲜政府被迫发表声明，接受停战协议。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签字，结束了历时三年的朝鲜战争。

（这部分内容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

贰、本节简论、

抗美援朝胜利的伟大意义

一九五三年九月十二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了总结：

“抗美援朝，经过三年，取得了伟大胜利，现在已经告一个段落。

抗美援朝的胜利是靠什么得来的呢？刚才各位先生说，是由于领导的正确。领导是一个因素，没有正确的领导，事情是做不好的。但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战争是人民战争，全国人民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

我们同美帝国主义这样的敌人作战，他们的武器比我们强许多倍，而我们能够打胜，迫使他们不能不和下来。为什么能够和下来呢？

第一，军事方面，美国侵略者处于不利状态，挨打状态。如果不和，它的整个战线就要被打破，汉城就可能落入朝鲜人民之手。这种形势，去年夏季就已经开始看出来。

作战的双方，都把自己的战线称为铜墙铁壁。在我们这方面，确实是铜墙铁壁。我们的战士和干部机智，勇敢，不怕死。而美国侵略军却怕死，他们的军官也比较呆板，不那么灵活。他们的战线不巩固，并不是铜墙铁壁。

我们方面发生的问题，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是能不能保证给养，最后是能不能打破细菌战。这四个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今年夏天，我们已经能够在一小时内打破敌人正面二十一公里的阵地，能够集中发射几十万发炮弹，能够打进去十八公里。如果照这样打下去，再打它两次、三次、四次，敌人的整个战线就会被打破。

第二，政治方面，敌人内部有许多不能解决的矛盾，全世界人民要求和下来。

第三，经济方面，敌人在侵朝战争中用钱很多，它的预算收支不平衡。

这几个原因合起来，使敌人不得不和。而第一个原因是主要的原因，没有这一条，同他们讲和是不容易的。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在朝鲜战争中，敌人伤亡了一百零九万人。当然，我们也付了代价。但是我们的伤亡比原来预料的要少得多，有了坑道以后，伤亡就更少了。我们越打越强。美国人攻不动我们的阵地，相反，他们总是被我们吃掉。

刚才大家讲到领导这个因素，我说领导是一个因素，而最主要的因素是群众想办法。我们的干部和战士想出了各种打仗的办法。我讲一个例子。战争的头一个月，我们的汽车损失很大。怎么办呢？除了领导想办法以外，主要是靠群众想办法。在汽车路两旁用一万多人站岗，飞机来了就打信号枪，司机听到就躲着走，或者找个地方把汽车藏起来。同时，把汽车路加宽，又修了许多新汽车路，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畅行无阻。这样，汽车的损失就由开始时的百分之四十，减少到百分之零点几。后来，地下仓库修起来了，地下礼堂也修起来了，敌人在上面丢炸弹，我们在下面开大会。我们住在北京的一些人，一想到朝鲜战场，就感到相当危险。当然，危险是有的，但只要大家想办法，并不是那么了不起。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是伟大的，是有很重要意义的。

第一，和朝鲜人民一起，打回到三八线，守住了三八线。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不打回三八线，前线仍在鸭绿江和图们江，沈阳、鞍山、抚顺这些地方的人民就不能安心生产。

第二，取得了军事经验。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陆军、空军、海军，步兵、炮兵、工兵、坦克兵、铁道兵、防空兵、通信兵，还有卫生部队、后勤部队等等，取得了对美国侵略军队实际作战的经验。这一次，我们摸了一下美国军队的底。对美国军队，如果不接触它，就会怕它。我们跟它打了三十三个月，把它的底摸熟了。美帝国主义并不可怕，就是那么一回事。我们取得了这一条经验，这是一条了不起的经验。

第三，提高了全国人民的政治觉悟。

由于以上三条，就产生了第四条：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毛泽东在事先拟的讲话提纲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件事不做则已，做则必做到底，做到最后胜利。”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又一次实践了这句话。

抗美援朝战争，是毛泽东一生最为艰难的一次决策，但同时又是毛泽东军事艺术、国际战略乃至治国方略中的绝妙之笔。

抗美援朝战争之初，中国人民志愿军能不能打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爱好和平的人们都捏着一把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打破了美国军队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世界的人们，包括中国的敌人和朋友，对新中国都刮目相看。一个刚刚从战争废墟中走出来的新中国，经济还那么困难，军队装备又很落后，居然能把世界一流强国的、具有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打败，这不是奇迹吗？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们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不负朝鲜人民和世界一切爱好和平人民的期望，完成了“保卫中国，支援朝鲜”的历史使命。这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是毛泽东最亲爱的一支人民英雄军队。

长期积弱的中国，能不能支持得起现代化战争的大量消耗？这是人们普遍担心的又一个问题。通过支援抗美援朝战争，最大限度地把全国人民动员起来，投入到支援前方，恢复经济，开始新的建设的伟大斗争中去。中国人民不但有能力支撑现代化战争的消耗，而且有办法把战争对经济建设的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实现“边打、边稳、边建”的战略方针。全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像这样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斗志昂扬，过去那种一盘散沙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使中国的经济建设获得了有利的国际和平环境。这对于长期处于战乱的中国人民来说，是极其宝贵的。以一九五三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为标志，中国开始了长时期的、大规模的工业化建设。这为新中国日后的经济腾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人间奇迹。如果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新中国创造了有利的国际环境；那末，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则大大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地位。这两件事，都是和毛泽东的名字分不开的。

2011年6月8日修改

第五章第二节 反对美国干涉我国解放台湾

壹、本节概述

解放台湾，完成祖国统一大业，一直是毛泽东的一个夙愿，也是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决定由粟裕负责解放台湾的筹划准备工作。

一、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五日，爆发朝鲜战争。

一九五〇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派第七舰队入侵台湾海峡。

一九五三年七月，朝鲜停战协定签字后，中共中央军委考虑准备攻打金门，彭德怀责成中央军委总参谋部在一九五三年十月制定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的准备工作计划，并报毛泽东审阅。计划提出，要在一九五五年一月底以前完成解放金门的一切准备工作。

毛泽东请有关部门负责人认真考虑攻打金门的问题，多方征求意见。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十九日，毛泽东看了由彭德怀转来的华东军区参谋长张震上报中央军委的来信。

信中列举了目前攻打金门的各种不利因素，并提出两条建议：一、在攻打金门之前，可以先攻克上下大陈岛，使兵力可以集中使用；二、将攻打金门的战费节约下来，先修通福建铁路，便于攻取金门、台湾时保证供应，即就经济意义而言，也可使物资得到交流。

毛泽东将这封信退给彭德怀，批了一句话：“此意见可注意。”

这时，有关部门已作出关于攻击金门作战费用的概算。陈毅对此提出不同意见。概算上报毛泽东时，彭德怀也提出了意见：“预算甚大，无十分把握，宜暂缓准备，待侦察后看情况再决。”

一九五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毛泽东审阅了这个概算，批语写道：“陈毅同志意见，目前不打金门为有利，否则很被动，且无攻克的充分把握。我同意此项意见。需费近五万亿元，无法支出，至少一九五四年不应动用如此大笔经费。”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前后，出现了美国进一步插手台湾事务、美蒋联手阻

止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严重事态。

一九五四年七月七日，毛泽东专门讲到台湾问题

他说：“现在美国同我们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台湾问题，这个问题是个长时间的问题。我们要破坏美国跟台湾订条约的可能，还要想一些办法，并且要作宣传。我们要组织一些宣传，要大骂美国搞台湾，蒋介石继续卖国。另外，在外交方面要有一种适当的表示，比如在侨民问题上的接触，其目的就是迫使美国跟台湾不要订条约。我看，美国跟台湾订条约，英国也怕，也反对，法国也可能是反对的，对于它们也没有什么好处，这就会成为很长期的僵局嘛。”

一九五四年七月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一定要解放台湾”的决定。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将这个决定昭告全世界。社论列举美国企图长期侵占台湾、提出所谓“台湾交联合国托管”的方案、正在同蒋介石谈判签订所谓“共同安全双边协定”等严重事态，表达了全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决心：“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不达目的，决不休止。”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就解放台湾问题，致电当时正在国外访问的周恩来，指出：“在朝鲜战争结束之后我们没有及时（约迟了半年时间）地向全国人民提出这个任务，没有及时地根据这个任务在军事方面、外交方面和宣传方面采取必要措施和进行有效的工作，这是不妥当的，如果我们现在还不提出这个任务，还不进行工作，那我们将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

电报所针对的，正是美国策划的“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使台湾问题国际化的阴谋。

一九五四年八月十一日，周恩来重申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原则立场。

一九五四年八月二十二日，第一届全国政协常委会第五十八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为解放台湾联合宣言》，提出“解放台湾、反对美国干涉”的响亮口号。

一九五五年一月十八日，人民解放军陆海空军协同作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举解放了位于大陈岛外围的一江山岛。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日，人民解放军下达准备进攻大陈岛的命令。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得知美军将掩护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立即给

主持军委工作的彭德怀写了一段批复：“在蒋军撤退时，无论有无美舰均不向港口及靠近港口一带射击，即是说，让敌人安全撤走，不要贪这点小便宜。”

一九五五年二月十一日，国民党军撤离大陈岛。

一九五五年二月下旬，人民解放军连续作战，收复了浙江沿海的全部岛屿。

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四日，毛泽东再次指示彭德怀：“马祖及其他任何岛屿敌人撤走时，我均应让其撤走，不要加以任何攻击或阻碍。此点请予考虑酌定，指示华东及福建。”

一九五五年三月三日，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生效以后，美国加强在台湾的军事指挥系统，派出美军协防台湾司令，美军驻台军事顾问团扩大到两千六百人，美空军第十三特种航空队进驻台湾。

二、中美大使级会谈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三日，周恩来总理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郑重宣布：“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和缓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1955年4月24日《人民日报》。）这个声明，在全世界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广泛欢迎，使中国赢得了主动。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在北京会见巴基斯坦驻华大使苏尔丹乌丁·阿哈默德时，也表达了中国愿意同一切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和平共处，愿意同美国人坐下来谈判的意愿。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六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发表声明，表示不排除同中国进行双边谈判。

美国一直拒绝承认中国政府，也始终拒绝同中国进行外交谈判。但在国际舆论的压力下，也不得不做出某种表示。

一九五五年七月十三日，美国通过英国向中国政府转达以下口信：中美双方各派一名大使级代表，在日内瓦举行会谈。

中美大使级会谈的举行，是由国际上各种复杂因素促成的，也是一九五四年以来东南沿海斗争的一个成果。

一九五五年八月一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正式开始，起初进行得比较顺利。

一九五五年九月十日，在第十四次会谈中就两国平民返回本国的问题达成协议，发表了有关协议的声明。

一九五六年一月，中国政府公布日内瓦会谈情况，并通过印度向美国表示，如果再不解决问题，中国将另作打算。

一九五六年八月，中国政府宣布一项重大决定：取消不让美国记者进入中国的禁令，并向美国十五家新闻机构发出邀请，请它们派记者来华作一个月的访问。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二日，在第七十三次中美大使级会谈中，美方代表、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通知中方说，他已经调任驻泰国大使，美国政府已经委任他的副手马丁参赞为美方代表。这是美国设置的一个障碍，想通过单方面降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级别，使会谈陷于停顿。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四日，中方催促美国政府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方再次催促美国政府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

一九五八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公布了大使级会谈长期陷于停顿的经过。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

提出：“中国政府要求美国政府在从今天起的十五日以内派出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否则，中国政府就不能不认为美国已经决心破裂中美大使级会谈。”

一九五八年六月三十一日，杜勒斯就中国政府声明发表谈话。他宣布，如果中国同意改变会谈地点，美国将指派它的驻波兰大使参加会谈。但他又说，美国不会向中国限期指派大使级代表恢复会谈的“最后通牒”低头。

三、美国纵容国民党当局向中国大陆和沿海骚扰破坏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一定情况下我们将会去防守沿海岛屿；那就是，如果这些岛屿的防守看来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守有关。”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二日，杜勒斯在一次演说中提出：要让社会主义阵营的人民知道，“他们并没有被忘记，我们永远不会做出任何牺牲他们的利益的政治协议，随着他们进一步获得自由，衷心的欢迎和新的机会在等待着他们”。

一九五七年五月，美军公开宣布在台湾部署了可携带核弹头的斗牛士导弹和电导导弹。

一九五七年六月二十八日，杜勒斯在旧金山发表对华政策演说，声称：“我们可以有信心地把这样一种假设作为我们的政策的根据：国际共产主义的强求一致的统治，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是一种要消逝的，而不是一种永久的现象。我们认为，尽一切可能使这种现象消逝，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盟国和中国人民的责任。”

一九五七年，台湾海峡局势重新紧张起来。在美国对华政策的鼓励下，国民党军的飞机深入大陆内地达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空投特务，散发传单，甚至出动飞机到福建沿海轰炸。蒋介石还在金门、马祖一线增加兵力，

四、炮击金门的决策过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泽东作出批示：“请考虑我空军一九五八年进入福建的问题。”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由铁道兵承建的鹰(潭)厦(门)铁路正式通车，极大地提高了福建前线的国防运输能力。

一九五八年夏季，金门、马祖的国民党军达到十万人，占其地面部队总数的三分之一。

一九五八年六月十六日，毛泽东说：和美国接触的问题，在日内瓦会议时我也说过，可以有所接触。事实上美国也不一定愿意接触。同美国闹成僵局二十年，对我们有利。一定要美国梳妆打扮后送上门来，使他们对中国感到出乎意外。你不承认，总有一天你会承认的。一百零一年你一定会承认的。

一九五八年六月，毛泽东说：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搞一些人吃饭不干别的，五年不行，十年，总是可以搞出来的，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它什么国。管它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西方资产阶级有的，东方无产阶级要有，西方资产阶级没有的，东方无产阶级也要有。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四日，中央军委命令组建福州军区空军司令部，由原志愿军空军司令员聂凤智担任福州军区空军司令员。七月下旬，尽管连降暴雨，空军部队仍然顺利完成了人闽转场任务。国民党军得到情报，立即派飞机频繁骚扰，企图趁我空军立足未稳，先发制人。人闽空军果断迎击，在七月二十九日到八月

十四日击落击伤美制国民党军飞机九架，取得了福建沿海地区的制空权。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发生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附近登陆的事件。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四日，伊拉克爆发革命。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美国对黎巴嫩进行武装干涉，同时宣布在远东的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美国的行径成为众矢之的，在世界舆论中激起一片反对声。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七日，蒋介石宣布国民党军处于特别戒备状态。同时加紧军事演习和空中侦察，摆出反攻大陆的姿态。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五日到十八日，毛泽东连续四个下午召集会议，分析情况，研究对策。在认真分析中东事件和国际动向的基础上，中共中央正式作出炮击金门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七月十八日晚，毛泽东召集军事部门各有关单位负责人，对炮击金门作出明确指示。他说：金门炮战，意在击美。支援阿拉伯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不能仅限于道义上的，还要有实际行动的支援。他说：金门、马祖是中国领土，打金门、马祖，惩罚国民党军，是中国的内政，敌人找不到借口，但对美帝国主义有牵制作用。

他设想，以地面炮兵实施主要打击，准备打两三个月；以两个空军师于炮击的同时或者稍后，转场南下，分别进驻汕头、连城。

当晚，中央军委召开会议，对炮击金门作战作出部署。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日，毛泽东在游泳池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国际形势和我军准备问题。

一九五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上午，他写信给彭德怀、黄克诚，说：“睡不着觉，想了一下。打金门停止若干天似较适宜。目前不打，看一看形势。”“中东解决，要有时间，我们是有时间的，何必急呢？暂时不打，总有打之一日。彼方如攻漳、汕、福州、杭州，那就最妙了。这个主意，你看如何？找几个同志议一议如何？政治挂帅，反复推敲，极为有益。一鼓作气，往往想得不周，我就往往如此，有时难免失算。你意如何？如彼来攻，等几天，考虑明白，再作攻击。以上种种，是不是算得运筹帷幄之中，制敌千里之外，我战则克，较有把握呢？不打无把握之仗这个原则，必须坚持。如你同意，将此信电告叶飞，过细考虑一下，以其意

见见告。”

促使毛泽东推迟炮击金门，有各种因素。其中一个因素，是“长波电台”和“共同核潜艇舰队”的事件。毛泽东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不能不分出精力，来处理中苏关系中的这一重大事件。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得到确切情报，中共想对沿海岛屿再次发起攻击。他很自然地把这一情况同赫鲁晓夫秘密访华联系在一起。

一九五八年八月六日，台湾当局宣布，台澎金马进入紧急备战状态。

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日，杜勒斯发表措词严厉的声明，关于伊拉克新政权，表示“要不遗余力地促使这一短暂政权的完结”。

美国国务院还向驻外使团发出《关于不承认共产党政府的备忘录》，并提出要警惕苏中联盟的危险性。

一九五八年八月八日和二十二日，美国国务院两次召开会议，研究台湾海峡局势，作出三项决定：一、增派航空母舰和战斗机，向台湾提供登陆艇、响尾蛇导弹、火炮和军需。这是“武”的一手。二、通过杜勒斯复函美国众议院外委会主席摩根，向中国施压。这是“文”的一手。三、授权驻台大使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换文加以“澄清”，如中国大举进攻外岛，可以进行报复，但小型攻击不在其列。

一九五八年八月十八日，凌晨一时，毛泽东看了广州军区十三日关于在深圳方向进行演习的部署给中央军委的报告，写批语给彭德怀：

“准备打金门，直接对蒋，间接对美。因此不要在广州深圳方面进行演习了，不要去惊动英国人。”

还说：“请叫空司注意：台湾方面可能出动大编队空军(例如几十架至百多架)向我反击，夺回金、马制空权。因此，我应迅即准备以大编队击败之。追击不要越过金、马线。”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日下午，毛泽东在北戴河住处召集周恩来、邓小平、林彪、黄克诚、叶飞、萧劲光、陈锡联、王秉璋、王尚荣、陶勇开会，具体部署炮击金门作战。

毛泽东决定，暂时不打马祖，集中火力炮击金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毛主席约见叶飞，汇报了炮击的准备情况。

毛泽东提出一个问题：你们用这么多的炮打，会不会把美国人打死啊？（国民党军中的美国顾问一直配备到营一级）。

叶说：那是打得到的。听我这样一说，

主席又考虑了十多分钟没有说话。后来又问：能不能避免不打到美国人？

叶说：避免不了。

主席听后，再也不问其他问题，也不给指示，就宣布休息。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继续开会。毛泽东下决心了，说：那好，按计划打。并要叶飞在北戴河指挥。

当时调入福建前线参战的陆海空部队，共有四百五十九门大炮、八十多艘舰艇和二百多架飞机。一声令下，各路部队在八月二十一日晚全部进入阵地或指定位置。

五、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召开的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说：我们的要求是美军从台湾撤退，蒋军从金门、马祖撤退。你不撤我就打。台湾太远打不到，我就打金、马。这肯定会引起国际震动，不仅美国人震动，亚洲人震动，欧洲人也震动。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五时三十分，炮击金门作战正式开始。大规模的炮击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发射炮弹近三万发，击毙击伤国民党军中将以下官兵六百余人，两名美军顾问也在炮击中丧生。岛上的大批军用设施被摧毁，通信系统被严重破坏。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四日，又进行了炮兵和海军的联合打击，重创国民党军“中海”号大型运输舰，击沉由大型坦克登陆舰改装的“台生”号货轮（前一天已被击伤）。

这两次打击，对金门地区形成了严密封锁，金门岛的军需补给只相当于炮击前的百分之五点五。储存在金门地区的军需物资，只能维持三十天。国民党守军情绪低落。

随后几天的炮击，巩固了“万炮轰金门”的战果，基本上实现了对金门的封锁。

炮击金门使美国慌了手脚，急忙调太平洋第七舰队主力和第六舰队一部前往台湾海峡。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五日，毛泽东在另一次政治局常委会上说：

从这几天的反应看，美国人很怕我们不仅要登陆金门、马祖，而且准备解放台湾。其实，我们向金门打了几万发炮弹，是火力侦察。我们不说一定登陆金门，也不说不登陆。我们相机行事，慎之又慎，三思而行。因为登陆金门不是一件小事，而是关系重大。问题不在于那里有九万五千蒋军，这个好办，而在于美国政府的態度。美国同国民党订了共同防御条约，防御范围是否包括金门、马祖在内，没有明确规定。美国人是否把这两个包袱也背上，还得观察。打炮的主要目的不是要侦察蒋军的防御，而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考验美国人的决心。

他还说：我们宣传上目前暂不直接联系金门打炮。现在要养精蓄锐，引而不发。

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七日起，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用福建前线指挥所的名义，连续播发了一篇广播稿，敦促防守金门的国民党军官兵放下武器，其中提到“对金门的登陆进攻已经迫在眉睫”，引起外电的关注。

一九五八年九月一日前后，毛泽东从外电报道中得知这一情况，严厉批评这是违反集中统一原则。他责成中央军委起草了《对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军事斗争的指示》稿。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日经他审阅修改后下发。

这个指示指出：“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是目前国际阶级斗争中最严重最复杂的焦点之一。”“解放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虽然属于我国内政问题，但实际上已变成一种复杂严重的国际斗争，我们不要把这个斗争简单化，而要把它看作是包括军事、政治、外交、经济、宣传上的错综复杂的斗争。台湾和沿海蒋占岛屿问题的全部、彻底解决，不是短时间的事，而是一种持久的斗争，我们必须有长期的打算”。

指示对包括炮击金门在内的沿海斗争的方针作了四点规定：一、继续炮击封锁金门，但目前不宜进行登陆作战。二、炮击封锁金门的活动，必须有节奏，打打看看，看看打打。三、海军、空军不得进入公海作战。蒋机不轰炸大陆，我也不轰炸金、马；蒋军轰炸大陆，我轰炸金、马，但不轰炸台湾。四、我军不准主

动攻击美军。如果美军侵入我领海、领空，我必须坚决打击。

指示还指出：一切重要的行动和宣传(文告、谈话、口号、社论、新闻、广播)都必须遵守集中统一的原则，不得自作主张。

一九五八年九月四日，中国政府发表《关于领海的声明》，宣布中国的领海宽度为十二海里。“一切外国飞机和军用船舶，未经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许可，不得进入中国的领海和领海上空。”声明重申：“台湾和澎湖地区现在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台湾和澎湖等地尚待收复，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收复这些地区，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外国干涉。”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上讲话，国际形势，我们历来有个观点，总是乐观的。后来总结为一个“东风压倒西风”。

美国人现在在我们这里来了个“大包干”制度，索性把金门、马祖，还有什么大担岛、二担岛、东碇岛一切包括进去，我看他就舒服了。他上了我们的绞索，美国人的颈吊在我们中国人的铁的绞索上面。台湾也是一个绞索，不过要隔得远一点。他要把金门这一套包括进去，那他的头更接近我们。我哪一天踢他一脚，他走不掉，因为他被一根索子绞住了。

第一条，谁怕谁多一点。据我的看法，是杜勒斯怕我们怕得多一点，是英美德法那些西方国家怕我们怕得多一点。

第二条，美帝国主义他们结成军事团体，我看现在是向民族主义进攻，就是向埃及、黎巴嫩和中东那些弱的进攻。

第三条，关于紧张局势。这个紧张局势，对我们并不是纯害无益，也有有利的一面。

第四条，中东的撤兵问题。英美侵略军迟迟不撤退，总起来看对人民也不见得那么纯害无利，因为这样人民每天就可以催他走。

第五条，戴高乐登台好，还是不登台好？对外，这个人喜欢跟英美闹别扭，很有益处。对内，为教育法国无产阶级不可少之教员，等于我们中国的“蒋委员长”一样。

第六条，禁运。不跟我们作生意。禁运对我们的衣食住行以及建设(炼钢

炼铁)有极大的好处。一禁运,我们得自己想办法。

第七条,不承认问题。是承认比较有利,还是不承认比较有利?我说,帝国主义国家不承认我们比较承认我们是更有利一些。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继续举行。在这次会上,讨论并通过了周恩来总理针对四日杜勒斯声明发表的《关于台湾海峡地区局势的声明》。重申中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一贯立场,并强调以下几点:

第一,申明中国人民解放自己的领土台湾和澎湖列岛的决心是不可动摇的。中国人民尤其不能容忍在自己的大陆内海中存在着像金门、马祖这些沿海岛屿的直接威胁。美国的任何战争挑衅都绝对吓不倒中国人民,相反地,只会激起六万万人民更大的愤怒和更坚强的同美国侵略者斗争到底的决心。

第二,鉴于美国政府表示愿意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两国在中国台湾地区的争端,中国政府准备恢复两国大使级会谈。但是美国在中国台湾地区所造成的战争危险并未因此减轻。

第三,中国和美国在台湾海峡地区的国际争端和中国人民解放自己领土的内政问题,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件事。中国人民完全有权采取一切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自己的领土,不容许任何外国干涉。如果美国政府悍然不顾中国人民的再三警告和世界人民的和平愿望,继续对中国进行侵略和干涉,把战争强加在中国人民的头上,美国政府必须承担由此而产生的一切严重后果。

一九五八年九月五日晚,赫鲁晓夫让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苏达利柯夫面见周恩来,周恩来向他表示:中国炮击金门、马祖,如果打出乱子,中国自己承担后果,不会拖苏联下水。这使赫鲁晓夫放了心。

一九五八年九月六日,苏联外长葛罗米柯受赫鲁晓夫委派来到北京,先后同周恩来、毛泽东会谈,进一步了解中国炮击金门的真实意图。毛泽东会见葛罗米柯时,葛罗米柯表示:苏共中央完全赞同周总理昨晚向苏达利柯夫谈到的中国方面的立场、策略和做法;同时赫鲁晓夫也准备给艾森豪威尔写信,对美国和英国政府所执行的政策提出警告。他还通报了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信的主要内容。葛罗米柯对毛泽东说:周恩来的声明“是一个十分及时和很好的声明。我相信,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和赫鲁晓夫同志致艾森豪威尔的信,都会起到十分重要和应有的效果”。

毛泽东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比较满意。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清早，毛泽东给周恩来写了一个批语，要他本日上午约五六个人，对赫鲁晓夫致艾森豪威尔的信稿认真研究一次。“如可能的话，写出一个意见书交葛外长带去。肯定正确部分占百分之九十，可商量部分只占少数。”并提出：“赫文中应对中美新声明有所评论。”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致信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呼吁美国政府要慎重行事，否则会带来不可收拾的后果。并且强调：中国有着忠实的朋友，这些朋友在中国遭到侵略时会随时援助它。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北京举行百万人游行，各民主党派负责人纷纷发表谈话，支持周恩来总理的声明。

一九五八年九月七日，美国军舰为国民党海军护航，在金门料罗湾港口附近，国民党海军舰只遇到人民解放军猛烈炮击时，美舰掉头就走，撤离了金门海域。

这时，美蒋在防御外岛问题上的矛盾已开始显露出来，美国人也已经看出蒋介石的意图。美国当局也看到，继续扩大事态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连忙对周恩来总理的声明做出回应。

一九五八年九月八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五次会议继续举行。毛泽东在会上再次讲话。

还是谈一谈老话，关于绞索，上一次不是谈过吗？现在我要讲对杜勒斯、艾森豪威尔，对那些战争贩子使用绞刑。对他们使用绞刑的地方很多。据我看，凡是搞了军事基地的，就是一条绞索绞住了。东方，南朝鲜、日本、菲律宾、台湾；西方，西德、意大利、英国；中东，土耳其、伊朗；非洲，摩洛哥等等。每一个地方美国有许多军事基地，比如土耳其，有二十几个基地，日本听说有八百个基地。还有些地方没有基地，但是有军队占领，比如美国在黎巴嫩，英国在约旦。

“美国人不整是不行的。但是所谓‘整’，请同志们放心，双方都是谨慎小心的。我们已经公布了十二海里，你到了七海里我都不打。我专打国民党军，我就不打你那个美国军舰，七打八打，你也得跑。”

毛泽东提议把“绞索政策”发表一下。他说：“讲清楚这个问题，对人民有好处，对世界各国也有好处，对美国人也有好处。我说过，美国军队在黎巴嫩、

约旦，早一点退好，还是迟一点退好呢？它把军队退了，一身干净，又是好人了。它不退，还不是侵略者？众矢之的。金门、马祖这十一万人，你不退，我就有文章可做。今天打一炮，明天打一炮，有时打几万发，总是使得你不安宁就是了。”

一九五八年九月九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人民日报》以“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论目前形势，美国侵略者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为题，摘要发表了毛泽东的讲话。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日，毛泽东回复胡志明八日来电：

我认为：（甲）美国人怕打仗，就目前说，很少可能大打起来；（乙）贵国似可以照常工作。”

对于炮击金门会不会引发中美战争，毛泽东有清醒的估计。

六、打打停停——炮击金门的实施过程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一日，美国国防部长麦克尔罗伊告诉艾森豪威尔，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国民党军应当撤出金门、马祖，或者作为前哨，仅部署少量人员。他认为，“蒋希望促成美国与中国之间的战争作为中国国民党进攻大陆的序幕”。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三日，在武昌写信给周恩来、黄克诚，嘱咐说：“华沙谈判，三四天或者一周以内，实行侦察战，不要和盘托出。彼方亦似不会和盘托出，先要对我们进行侦察。”

按照毛泽东原先的设想，中方的这个方案，应当是一个争取主动并使美国陷入被动的方案。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五日，中断了九个月的中美大使级会谈重新恢复。斗争从福建前线转移到了谈判桌前。会谈地点由日内瓦改为波兰首都华沙。中方的代表没有变，仍然是驻波兰大使王炳南，美方的代表换为驻波兰大使雅各布·比姆。

在会谈第一次的会议上，美方代表没有提出方案。王炳南提出中方的方案，建议双方共同发表声明，保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中美之间在台湾和远东其他地区的争端，并就以下五点达成协议：

第一，中国政府声明，台湾和澎湖列岛是中国的领土，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是中国大陆的内海岛屿。中国政府有权采取一些适当的方法，在适当的时候，解放中国的这些领土，这是中国的内政，不容许外国干涉。

第二，美国政府保证从台湾、澎湖列岛和台湾海峡撤出它的一切武装力量。

第三，中国政府声明，直接威胁厦门、福州两海口的，为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必须收复。如果国民党军队愿意主动从这些岛屿撤走，中国政府将不予追击。

第四，中国政府声明，在收复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以后，将争取用和平方法解放台湾和澎湖列岛，并且在一定的时期内避免使用武力实现台湾和澎湖列岛的解放。

第五，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一致认为，在台湾海峡公海和公海上空的航行和飞行的自由和安全，必须受到保证。

然而，中方代表过早地提出自己的方案，给美方代表产生一个错觉，误以为中国政府急于解放金门、马祖，便想趁机抬高要价，态度再次强硬起来。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美方正式提出一个“停火”方案，要中国“放弃对金门和马祖群岛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

同一天，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在联合国大会发言，也提出要尽快“停火”。美国还动员北欧国家和印度等国，向联合国提出所谓“停火”方案。

谈判再一次陷入僵局。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安徽合肥得知这一消息，立即写信给周恩来，对谈判的指导提出建议。

周恩来收到毛泽东来信，立刻召集陈云、彭真、张闻天、黄克诚、廖承志、章汉夫、乔冠华开会研究，于当天夜间致信毛泽东：

“我方方案提得过早，给了对方一个错觉，以为我们急于求成，因而杜勒斯今日在联大讲话便强调停火，但也提到了消除挑衅行为。同时，彼此都露了底，美国知道我们目前不会扩大战事到台湾，我们知道美国不愿卷入金马战争。蒋介石希望金门战争扩大，拖美国下水；美国想压我们停火，摆脱它的被动地位。

根据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针对美国的停火要求，我们应该从各方面扩大要求美军停止挑衅和从台湾和台湾海峡撤退的活动。”

周恩来提出了五条具体措施：一、准备一个驳斥杜勒斯联大演说的外长声明；二、声明发表后，动员各地报纸、各党派、各人民团体广泛响应；三、将我们的斗争策略分告苏联代办和刘晓转告赫鲁晓夫和葛罗米柯，以便苏联和兄弟国家配

合我们行动；四、以我名义致电西哈努克，感谢他支持我们，向他解释美国所谓的停火的阴谋，说明我国收复沿海岛屿的决心和解放台湾的神圣权利，这些不容美国干涉；五、将上述同样内容以外交备忘录形式递交社会主义国家、亚非和北欧国家政府，唤起它们注意。

一九五八年九月十九日凌晨，毛泽东收到周恩来的来信，晨四时，即复信周恩来：“十八日夜来信收到，极好，有了主动了，读完后很高兴，即照办。你来信及我这封复信，请即转发王炳南、叶飞二同志，使他们明白我们这种新方针，新策略，是主动的、攻势的和有理的。高屋建瓴，势如破竹，是我们外交斗争的必须形态。”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日，中国外交部长陈毅发表声明，驳斥杜勒斯在联大的发言，指出：中国在金门、马祖并未同美国打仗，根本谈不上“停火”。中国惩罚金门、马祖蒋介石军队，属于中国内政，外人不能干涉。解决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关键是美国撤军。

与此同时，中国还积极做一些国家的工作，劝这些国家不要上美国“停火”建议的当。

福建前线部队再次猛烈炮击金门、马祖，加大了对国民党的军事压力。

一九五八年九月二十二日，周恩来致信毛泽东，对金门作战方针提出建议，特别重申了“打而不登，断而不死”。

毛泽东当天回复：“你九月二十二日三时对金门作战方针问题上的批语是很对的，即照此办理，使我们完全立于不败之地，完全立于主动地位。”

一九五八年九月三十日，杜勒斯在记者招待会上表示，如果在台湾地区“有了可靠的停火”，在金门、马祖保持大量部队就是“愚蠢的”，“不明智的”，“也是不慎重的”。他还说，美国“没有保卫沿海岛屿的任何法律义务”。

美国人见中国政府态度十分强硬，便又想主动摆脱僵局。

一九五八年十月一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说：“我认为所有这些军队驻在那里并不是一件好事情。”

这些迹象表明，美国开始总结前一段的教训，调整对台政策，企图在中国沿海岛屿地区从“战争边缘”政策转变为“脱身”政策。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毛泽东在会见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蒙

古、苏联、波兰六国代表团时说：“杜勒斯现在很不好办，他搞得很被动。人们责问他，为什么管到金门去呢？……全世界除了杜勒斯，都说金门是中国的岛屿，金门问题是中国的内政。所以他现在搞得很不好办事啦！我们还要继续使他难办，使他继续处于困难地位。不要轻易饶他！不要轻易让他溜掉！在这个地方大概他一时也相当难溜。” “不要轻易让他溜掉！”

这是针对美国当局的“脱身”政策而作出的一个重要决断。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日，蒋介石在对美联社记者的谈话中急忙宣布：九月三十日杜勒斯的讲话只是“美国单方面的声明”，国民党当局“没有任何义务来遵守它”。

一九五八年十月五日早上八时，毛泽东给彭德怀和黄克诚写了一封信，要求福建前线部队暂停炮击，观察两天再说。他写道：“不管有无美机美舰护航，十月六、七两日，我军一炮不发；敌方向我炮击，我也一炮不还。偃旗息鼓，观察两天，再作道理。空军必须防卫，但不出海。还有一事：两天中，不要发表公开声明，因为情况如何，尚待看清。”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凌晨二时，毛泽东又给彭德怀、黄克诚等写了一封信，说：“昨天我说不发声明，看两天再说。随后想了一下，还是先作声明为好，所以有告台湾同胞书。此件即将发出，请福建前线广播电台多播几次，为盼！”

一九五八年十月六日，《人民日报》发表《告台湾同胞书》

台、澎、金、马是中国的领土。这一点你们是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确实不是美国的领土。台、澎、金、马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是另一个国家。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也是你们同意的。见之于你们领导人的文告。你们领导人与美国人订立军事协定，是片面的，我们不承认，应予废除。美国人总有一天肯定要抛弃你们的，你们不信吗？历史的巨人会要做出证明的。杜勒斯九月三十日的谈话，端倪已见。站在你们的地位，能不寒心？归根结底，美帝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你们与我们之间的战争，三十余年了，尚未结束，这是不好的。建议举行谈判，实行和平解决。这一点，周总理已在几年前告诉你们了。这是中国内部贵我两方有关问题，不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

美国侵略台、澎、与台湾海峡，这是中美两国有关问题，应当由两国谈判解

决，目前正在华沙举行。美国人总是要走的，不走是不行的。早走于美国有利，因为他们可以取得主动。迟走不利，因为他老是被动。一个东太平洋国家，为什么跑到西太平洋来了呢？西太平洋是西太平洋人的西太平洋，正如东太平洋是东太平洋人的东太平洋一样，这一点是常识，美国人应当懂得。中华人民共和国与美国之间并无战争，无所谓停火。无火而谈停火，岂非废话了？

台湾的朋友们，我们之间是有战火的，应当停止，并予熄灭。这就需要谈判。当然。再打三十年，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究竟以早日和平解决为妥善。何去何从，请你们酌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起草了一项命令

金门击炮，从本日起，再停止两星期。借以观察敌方动态，并使金门军民同胞得到充分补给，包括粮食和军事装备在内，以利他们固守。

兵不厌诈，这就是诈。这是为了对付美国人的。这是民族大义。必须把中美界限划得清清楚楚。

呆在台湾和台湾海峡的美国人，必须滚出去。他们赖在这里是没有理由的，不走是不行的。

台、澎、金、马的中国人中爱国的多，卖国的少，因此要做政治工作，使那里大多数中国人逐步觉悟起来，孤立少数卖国贼。积以时日，成效自见。在台湾国民党没有同我们举行和平谈判并且获得合理解决以前，内战依然存在。

美国人想在我国的内战问题上插进一只手来，他们叫做停火，令人忍俊不禁。美国人有什么资格谈这个问题呢？请问他们代表什么人？什么也不代表。他们代表美国人吗？中美两国又没有开战，无火可停。他们代表台湾人民吗？台湾当局没有发给他们委任状，国民党领袖根本反对中美会议。美国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其人民是善良的。他们不要战争，欢迎和平，但是美国政府的工作人员，有一部分，例如杜勒斯之流，实在太不高明。例如所谓停火一说，岂非缺乏常识？台、澎、金、马整个地收复回来，完成祖国的统一，这是我们六亿五千万人民的神圣任务。这是中国内政，外人无权过问，联合国也无权过问。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统统都要被埋葬掉。为期不会很远。他们一定逃不掉的，他们想躲到月球里去也不行。寇能往，我亦能往，总是可以抓回来的。一句话。胜利是全世界人民的。

金门海域，美国人不能护航。如果护航，立即开炮。切切令。

毛泽东同时还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后来没有发表。

他写道：“自从美帝国主义占据台湾以来，形势已经改变了。美帝国主义成了我们的共同敌人。国民党已经不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我们和你们还是敌对的，但这种敌对，较之民族矛盾，已经降到第二位。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即向你们建议和谈，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和谈胜利妥洽成功，则我们两党又可以化敌为友。我们建议：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全体军民同胞团结起来，采取坚定而又灵活的政策，减少你们内部的磨擦，一致对付民族敌人。”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三日，毛泽东会见了定居香港的新加坡《南洋商报》撰稿人曹聚仁。作陪的有周恩来、李济深、张治中、程潜、章士钊。

毛泽东告诉他：“只要蒋氏父子能抵制美国，我们可以同他合作。我们赞成蒋介石保住金、马的方针，如蒋撤退金、马，大势已去，人心动摇，很可能垮。只要不同美国搞在一起，台、澎、金、马都可由蒋管，可管多少年，但要让通航，不要来大陆搞特务活动。台、澎、金、马要整个回来”。

毛泽东说：“我们的方针是孤立美国。他只有走路一条，不走只有被动。要告诉台湾，我们在华沙根本不谈台湾问题，只谈要美国人走路。蒋不要怕我们同美国人一起整他。”“他们同美国的连理枝解散，同大陆连起来，枝连起来，根还是你的，可以活下去，可以搞你的一套。”

章士钊插话说：“这样，美援会断绝。”

毛泽东说：“我们全部供应。他的军队可以保存，我不压迫他裁兵，不要他简政，让他搞三民主义，反共在他那里反，但不要派飞机、派特务来捣乱。他不来白色特务，我也不去红色特务。”

曹聚仁问：“台湾有人问生活方式怎样？”

毛泽东说：“照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

一九五八年十月十九日夜，美国军舰又恢复了金门海域的护航行动。

这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中午，周恩来给毛泽东送来一个书面报告。报告说：“警告美国在金门海域护航的新闻已于今日十二时半起广播，连续二次，中外文相同。”“厦门前线，一切准备好了，已分别以电话和文字命令下达，由克诚签

发，并告以炮击只限于金门各岛的工事、阵地和滩头船只，不打民村、兵房和指挥机关，更不要误击美国船只，我空海军均不出动。国防部命令拟三时广播，以口头广播读完后，立即开炮，中外文语同时广播。”

毛泽东当即批复：“照办。”“口头广播后，隔一小时，或半小时，开始炮击，较为适宜。”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日下午三时，发布了国防部长彭德怀为恢复炮击给福建前线部队的命令。四时，人民解放军再次给金门国民党守军以惩罚性炮击。这次恢复炮击，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评论说，“中国共产党恢复炮击金门的明显原因是要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表明，只要他们喜欢这样做，他们就能够这样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二日，《苏格兰人报》发表社论，认为：中国人重新恢复炮轰金门一事表明“他们大概会停停打打。对他们来说，把金门作为一个使蒋和美国人发生纠纷和使台湾问题一直搞得火热的手段，要比金门落入他们手中更为有价值”。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杜勒斯到台湾访问，同蒋介石多次举行会谈。这次访问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在世界面前进一步暴露了美蒋的矛盾。他们在会谈结束后发表的公报中也承认：“这次磋商是安排在中国共产党人宣布他们要对金门实行停火的两个星期中举行的。本来希望，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可以主要考虑那些原可有助于稳定一种实际的非战局面的措施。但是，在磋商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人违反了他们的宣言，恢复了对金门的炮击。鉴于这些事态发展，这些磋商当然着重讨论了局势的军事方面。”杜蒋会谈公报宣称：“在目前情况下，金门连同马祖的防务，是同台湾和澎湖的防务密切相关的。”

美国的脱身计划就此破产。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下午，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上指出：这次杜勒斯跑到台湾去，是要蒋介石从金、马撤兵，以换取我承诺不解放台湾，让美国把台湾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蒋介石不答应，反而要美国承担“共同防御”金、马的义务。两人吵了起来，结果各说各的，不欢而散。

他还说：美蒋关系存在着矛盾。美国人力图把蒋介石的“中华民国”变成附

庸国甚至托管地，蒋介石拼死也要保持自己的半独立性，这就发生矛盾。我们不登陆金门，但又不答应美国人的所谓“停火”，这更可以使美蒋吵起架来。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了隔日炮击的决定。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五日，毛泽东以国防部长彭德怀的名义又起草了一个《再告台湾同胞书》，公开发表。

美国的政治掮客杜勒斯，爱管闲事，想从国共两党的历史纠纷这件事情中间插进一只手来，命令中国人做这样做那样，损害中国人的利益，适合美国人的利益。就是说，第一步，孤立台湾，第二步，托管台湾。如不遂意，最毒辣的手段，都可以拿出来。

蒋杜会谈，你们吃了一点亏，你们只有代表“自由中国”发言的权利了，再加上少部分华侨，还许你们代表他们。美国人把你们封为一个小中国。十月二十三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十月十六日杜勒斯预制的同英国一家广播公司所派记者的谈话，杜勒斯从台湾一起飞，谈话就发出来。他说，他看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中国，并且说，这个国家确实存在，愿意同他打交道，云云。谢天谢地，我们这个国家，算是被一位美国老爷看见了。这是一个大中国。美国人迫于形势。改变了政策。把你们当作一个“事实上存在的政治单位”，在目前开始的第一个阶段，美国人还是需要的。这就是孤立台湾。第二个阶段，就要托管台湾了。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没有两个中国。这一点我们是一致的。美国人强迫制造两个中国的伎俩，全中国人民，包括你们和海外侨胞在内，是绝对不容许其实现的。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毛泽东对宦乡《帝国主义矛盾重重，主动权操我们手里》的批示

四分五裂，这就是西方世界的形势。目前正在逐步的破裂过程中，还没有最后破裂，但是向着最后破裂前进，最后破裂是不可避免的。过程时间，可能有相当长，非一朝一夕。所谓西方团结是一句空话。团结也是有的，杜勒斯正在努力。但是要求“团结”在美国的控制之下，在原子弹下要求他的大小伙伴们向美国靠拢；交纳贡物，磕响头称臣，这就是美国人的所谓团结。这种形势，势必走向团结的反面。四分五裂。同志们，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一日，毛泽东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

问题

这里我想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不是真老虎，为什么要重视它呢？看来还有一些人不通，我们还得做些解释工作。

同世界上一切事物无不具有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一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也有两重性，它们是真老虎又是纸老虎。历史上奴隶主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在它们取得统治权力以前和取得统治权力以后的一段时间内，它们是生气勃勃的，是革命者，是先进者，是真老虎。在随后的一段时间，由于它们的对立面，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逐步壮大，并同它们进行斗争，越来越厉害，它们就逐步向反面转化，化为反动派，化为落后的人们，化为纸老虎，终究被或者将被人民所推翻。反动的、落后的、腐朽的阶级，在面临人民的决死斗争的时候，也还有这样的两重性。一面，真老虎，吃人，成百万人成千万人地吃。人民斗争事业处在艰难困苦的时代，出现许多弯弯曲曲的道路。中国人民为了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的统治，花了一百多年时间，死了大概几千万人之多，才取得一九四九年的胜利。你看，这不是活老虎，铁老虎，真老虎吗？但是，它们终究转化成了纸老虎，死老虎，豆腐老虎。这是历史的事实。人们难道没有看见听说过这些吗？真是成千成万！成千成万！所以，从本质上看，从长期上看，从战略上看，必须如实地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看成纸老虎。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战略思想。另一方面，它们又是活的铁的真老虎，它们会吃人的。从这点上，建立我们的策略思想和战术思想。

（这部分内容根据《毛泽东传（1949-1976）》编写）

贰、本节简论

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签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于 1954 年 12 月 2

日签订，1955年3月3日生效。) 显露出美国长期霸占台湾的企图，引起国际社会的普遍关注。希望中美两国坐下来谈判以和缓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呼声越来越强烈。

作出炮击金门决策的，正是毛泽东。这一决策绝非心血来潮，是经过长时期的考虑、酝酿和斟酌的。

炮击金门一役有一个发展的过程，毛泽东的决策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

一九五七年十二月起，美国先是中断中美大使级会谈，继而纵容台湾蒋介石集团对大陆沿海骚扰破坏，使台湾海峡再次出现紧张局势。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抓住时机决心发动炮击金门的斗争。

炮击金门是一种特殊的作战形式。按照毛泽东的最初预想，是要通过炮击来封锁金门，最终迫使蒋介石集团放弃金门，达到收复金门的作战目的。这是充分估计到美国插手阻挠解放台湾的可能性，利用美蒋在协防金门、马祖等沿海岛屿问题上的矛盾，不给美国以武力干涉的借口，而采取的一种非常措施。

随着金门炮击的进一步发展，美蒋在金门、马祖撤军问题上发生了分歧，美国企图逼迫蒋介石接受“划峡而治”，实现“一中一台”的图谋。在这个关头，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作出继续将金门、马祖留在蒋介石集团手上、金马台澎最终一起解决的决策，利用美蒋矛盾，挫败了美国搞“一中一台”或“两个中国”的阴谋。在这个过程中，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后来被周恩来概括为“一纲四目”的祖国统一构想，对海峡两岸关系产生了深远而重大的影响。

根据中共中央的分析，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手里有三张牌。一张是保卫金马，另一张是搞“两个中国”，第三张是冻结台湾海峡。经过前一段的斗争，美国人收回了第二张牌。对第二张牌，中国政府坚决反对，蒋介石也不接受。至于第三张牌，由于蒋介石的强烈不满，美国人还不会马上打出来。中央原先的方针是准备分两步走：先收复包括金门、马祖在内的沿海岛屿，再争取解放台湾。现根据目前的局势变化，决定还是把蒋介石继续留在金门、马祖沿海岛屿上，暂时不收回，今后争取一下子收回这些沿海岛屿、澎湖列岛和台湾。

从“两步走”改变为“一揽子”解决，这是对台湾海峡关系产生长远影响的重大决策。

后来，毛泽东在回顾炮打金门这段历史时，对于这个重大决策是怎样改变的

和为什么要改变，作了很详细很生动的说明：

“那个时候，我们跟张文白，还有许多朋友，都是一致的，要把金门、马祖搞回来。后头一到武昌，我不是跟你（指张治中。——记录者注）一道吗？形势不对了，金门、马祖还是留给蒋委员长比较好，金、马、台、澎都给他。因为美国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这么一个方针，如果我们只搞回金、马来，恰好我们变成执行杜勒斯的路线了。所以，十月间回到北京的时候就改变了，金、马、台、澎是一起的，现在统统归蒋介石管，将来要解放一起解放，中国之大，何必急于搞金、马？这样，我们就不会变成杜勒斯的部下了，不然他就是我们的领导者，就是以金、马换台、澎，蒋介石不做总统。蒋介石不做总统，这个我们也不赞成的。美国人压迫他，不要他做总统，要陈诚做，讲好了的。蒋介石答应了的，陈诚也答应了的。后头我们这个信息使他知道了，他就有劲了，共产党支持嘛，（笑声）他现在决定做总统了，是蒋介石做总统比较好，还是别人做比较好？在目前看，还是蒋介石比较好。他这个人亲美派，但是亲美亲到要把他那点东西搞垮，他就不赞成。”

炮击金门，是毛泽东纯熟地运用政治斗争、军事斗争、外交斗争和舆论宣传攻势，并将它们交融于一体的一次重大行动，尽管炮击金门未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台湾问题和中美关系问题，但对于蒋介石反攻大陆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对于美国搞“两个中国”的企图，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在这场斗争中，毛泽东适时地改变和调整部署，灵活运用策略方针，迫使美国不能不继续保持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一外交对话渠道。事实证明，这场斗争对确保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2011年6月12日修改

第五章第三节 美国推行和平演变社会主义国家的策略

壹、本节概述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一日，在中印边境西段空喀山口发生了武装冲突

这是继八月间在中印边界东段朗久发生边境冲突以后的又一次边境冲突。

一九五八年十月三十一日，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作了一个很长的报告。报告中宣扬赫鲁晓夫和艾森豪威尔的会谈；对政府首脑会议（又称最高会议）寄以特别的期望；强调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要互相让步、互相迁就、彼此迎合；宣扬战争恐怖；对中印边境最近发生的事情表示“非常遗憾”，等等。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三日，周恩来、彭真、王稼祥、胡乔木飞抵杭州，向毛泽东请示。

周恩来一行中午到杭州，当天晚上就向毛泽东汇报。首先详细介绍了赫鲁晓夫讲话的主要内容，然后就讲话中涉及的国际问题进行讨论，主要集中在艾森豪威尔的对外策略问题以及赫鲁晓夫对这个问题的态度。

王稼祥说，他和中联部的同志研究了一下，认为美国政府、艾森豪威尔，他们的原则没有变，战略没有变，策略上有了变化，现在重点是讲和平，讲缓和国际形势，同苏联搞好关系，对付中国。他们说这是对苏联的绥靖政策。然后麻痹世界人民的觉悟，麻痹民族独立运动，对于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整个潮流，用缓和的办法，不是用镇压的办法。

毛泽东说：“现在看来，所说的和平浪潮，就是西方垄断资产阶级跟拉丁美洲、亚洲的这些反动的民族主义者，跟苏联结合起来，打击的对象就是共产党，工人运动，中国。杜勒斯这一派，他们的策略一直执行到杜勒斯死为止。杜勒斯一死，策略要变。”我们“要有两手。一手跟艾森豪威尔讲和平，开大国会议，国际问题用和平方法解决比较好。另外一手就是美国共产党、美国人民，他们还是应该斗争的，各国共产党、各国人民还是应该斗争的，不要把这方面的气泄下来，要按照具体环境办。艾森豪威尔这种人物，他不只是有讲和平的一面，还有战争的一面，比如他要分化中苏，要打击美国共产党，向工人进攻，把全世界的反帝国主义浪潮压下来。……他们这种策略，第一是对于保护资产阶级有好处，

第二是对于破坏社会主义有好处。破坏社会主义，比如破坏中国，你苏联他就不
要破坏呀？他还是要破坏嘛。”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毛泽东为印发杜勒斯演说重拟的标题，提要
杜勒斯对国际形势的全面分析

唱低调

自己认输，说是在理论方面，组织纪律方面，西方不行

招呼我们说：只要你们共产党埋头去办家里事，不出远门，西方就
放心了。

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十二日，他在与华东各省市委书记谈话时，第一次明
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问题。他说：

“找出杜勒斯几个文件来。这个注释是林克，我的那个秘书注的，新华社原
先就有，没有注完全。杜勒斯的路线，在他在世的时候就有了。比如他在今年一
月二十八日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作证时说：‘基本上我们希望果然苏联世界内部
起变化。’这个所谓苏联世界，并不讲苏联一个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是我们
内部起变化。‘从而使苏联世界不再成为对世界的自由的威胁，只管他们自己的
事情，而不去设想实行共产主义化的目标和野心。’他在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另一
次发言中讲：‘决不结束冷战。’看来，冷战全部结束，对他们是不利的。还是
这次演说，他说：‘用正义和法律代替武力。’仗不打，要搞法律同正义。他又
说：‘在这方面极为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在这种情况下放弃使用武力并不意味
着维持现状，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转变。’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转变我们这些国家，
搞颠覆活动，内部转到合乎他的那个思想。……就是说，他那个秩序要维持，不
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三日起，杭州会议讨论国际问题。这天凌晨三时，毛泽东

致信刘少奇、周恩来、彭真：“为了讨论国际形势及我们的对策，拟请林彪、陈毅、康生、稼祥、贺龙、谭政、陈伯达七同志到此一谈。十二月三日（即今日）下午到杭州。林彪、陈毅四日到杭。请酌处。”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四日晚，毛泽东专就国际形势问题发表讲话。这次讲话没有正式记录，但有毛泽东亲笔写的一份讲话提纲。

“敌人的策略是什么？”

（1）和平旗子，大造导弹，大搞基地，准备用战争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一手。

（2）和平旗子，文化往来，人员往来，准备用腐蚀、演变方法消灭社会主义。这是第二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基本原则。

有时和解，有时紧张；这里和解，那里紧张；欧洲和解，亚洲紧张；争取机会主义，孤立马列主义。

一九五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毛泽东接见参加全军政工会议的各军区负责同志时的谈话

美国的事情是杜勒斯在办。杜勒斯是美国政府的政治主任，政治委员、或者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如果在座的哪位去当美国的国务秘书，就好办了。我们把杜勒斯的职务翻译成“国务卿”不对，实际上是国务秘书。不在乎名称如何，实际上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的政委，是艾的灵魂。杜勒斯这个人是个“好人”，办了不少“好事”，对无产阶级团结和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很有益。他不从黎巴嫩登陆哪有活材料教育世界人民？我们一打炮，他从各处把海军舰队调来了，“在一个地方集中了很多的舰队”，这是杜勒斯在巴黎会议上说的。我们也没有料到，金门一打炮，全世界这么动。

贰、本节简论

毛泽东提出防止和平演变问题，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和平演变是帝国主义国家在看到不可能以武力征服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下，提出的新战略。首倡者就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此后便成为帝国主义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

采取的一项长期不变的战略方针。毛泽东敏锐地抓住这个问题，提出防止和平演变，此后便成为中国共产党长期坚持的一个战略方针，以保证国不变色，党不变质。这是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贡献。历史证明，这是一个极富远见的思想。

2011 年 6 月 13 日修改

第五章第四节 反对美国侵略越南包围中国

壹、本节概述

一、越南人民赶走法国侵略者

法国在在印度支那地区进行了多年的殖民战争,越南等国人民进行了坚决斗争.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毛泽东致电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劳动党主席胡志明,全面分析越南局势

认为:“目前法国人民要求经过和谈结束越南战争的压力愈来愈大,法国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也认为侵越战争得不偿失,主张和谈,拉尼埃也两次正式表示愿意谈判;但是美帝从朝鲜停战后便企图使侵越战争扩大化,胁迫法帝打到底。在这个时候,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正式表示愿意用和平协商方式解决越南战争,是需要的,合时宜的。只有这样,才能把和平旗帜抓在我们手里,更进一步鼓励法国及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积极斗争,揭穿法国反动派说越南不要和平,把战争责任推在越南身上的阴谋。也只有这样,才能利用和扩大法美之间的矛盾。”

毛泽东还说:“和帝国主义者和谈,同战争一样,也是一种长时间的尖锐的斗争。”“朝鲜停战的经验证明,只有我们力量强大,在战场上给敌人的打击愈多愈痛的时候,和谈才有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应当边打边谈、谈谈打打,两者不可偏废。决不可因为和谈而稍为放松自己在军事上打击敌人的努力。”

一九五四年四月三日,毛泽东关于帮助越南建立炮兵团、工兵团问题给彭德怀的信

越南必须增建四个炮兵团、两个工兵团,限期六个月内组成装备并训练成功。此两个炮兵师建成,连前一个炮兵师,再集中五个步兵师,共步炮八个师,就可攻击河内、西贡了。奠边府必须坚决攻克,如机动顺利,确有把握,应提早总攻。休整一个半月至多两个月即打琅勃拉邦和越曾(如无真正不可克服的困难,夏秋两季务必完成),冬季至迟明年初春即打河内。日内瓦和谈即使成功,上述炮兵建设不变。

一九五四年四月十七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军事部署的批语

估计到越南有停战可能，新建炮兵训练不宜在我国境内，并宜将炮等早日运入越境。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日，毛泽东关于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的电报

在日内瓦会议有进展并可能在七月达成停战协议的情况下，越南人民军的作战规模以不要扩大也不要缩小即保持现在的规模似较适宜。

一九五四年七月二十三日，毛泽东祝贺日内瓦会议达成印度支那停战协议给胡志明的电报

越南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在日内瓦会议上，代表着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英勇斗争并已取得辉煌胜利的越南人民的和平愿望，努力争取恢复印度支那和平，终于达成协议，这是越南人民的又一重大胜利，这一胜利有助于促进亚洲的集体和平与安全，有助于进一步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全中国的人民将与越南人民一道为保证与争取协议的彻底实现，为维护和巩固亚洲及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而努力。

一九五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关于揭露美国拼凑“东南亚防御集团”的批语
周总理阅。你的报告（1）和各党派联合声明（2），均应就此问题（3）加以批评。

一九五四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九周年的电报
越南人民多年来争取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的英勇斗争已获得重大的成果。我深信：越南人民在巩固和平、实现统一、完成独立和民主的事业中必将获得更大的胜利。在这个事业中越南人民将得到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深切关怀和积极支持。

一九五四年十一月十九日，毛泽东对越南要求救济灾民的电报的批语

1954年10月27日，越南劳动党中央由越南驻中国大使黄文欢转给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提出，由于天灾连续发生和敌人长期破坏的影响，部分地区已面临饥荒，要求中国方面迅速救济一万吨大米，同时还要求救济五百万米粗厚布匹，解决今冬一百万人的穿着问题。

毛泽东批示：此件是否已处理，似宜满足越方要求。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毛泽东、周恩来祝贺越南政府还都河内的电报
越南政府还都河内，是由于英勇的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领导下八年艰苦抗战获得辉煌胜利的结果，是由于越南政府一贯执行和平政策的结

果。祝越南人民在新的一年里，在巩固和平，实现全国统一、独立和民主的斗争中和在恢复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成就。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协议法国从印度支那三国撤军，并确认三国的民族权利；在越南，以北纬十七度为界，越南北方归越南人民共和国管辖。

二、发展中越两国人民的友谊

一九五五年，法国军队撤出印度支那，美国乘机取代法国，用军事援助扶植亲美势力，特别是积极支持统治越南的吴庭艳集团，残酷迫害前据人员和其他爱国人士。

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关于越南奠边府作战应注意事项给彭德怀、黄克诚的电报

目前越南最大可能发生的危险，似乎不在奠边府以南，而在我军的后方交通线。如敌以两个伞兵营降落在在我后方交通线上最扼要的地点，筑堡据守起来，整个交通将为之切断，如我军不能迅速歼灭此敌，旷日持久，奠边府我军即有被迫撤退之可能。军委去电已估计到敌有袭占交通线可能，但强调不够，并以之与琅勃拉邦方向并列。请你们再加考虑，叫越方迅调必要兵力位于适当地区，专门对付此种意外事变，以免奠边府作战功亏一篑。

一九五五年五月十九日，毛泽东祝贺胡志明六十五岁寿辰的电报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您的卓越领导下，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自由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并已经取得了重大的胜利。您数十年来所作出的光辉贡献，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也受到中国人民的敬爱。

谨祝您在争取越南的和平、独立、统一、民主及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光荣事业中，获得更大的成就。

一九五五年六月二十八日，毛泽东在黄文欢为胡志明访华举行的宴会上的祝酒词

我提议：

为了中越人民亲密的友谊，

为了亚洲和世界的和平，

为了胡志明主席和他所率领的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代表团的访问中国，

为了胡志明主席的健康，

为今天宴会的主人——黄文欢大使的健康干杯！

一九五五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电报

十年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领导下，为反对殖民主义侵略和争取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进行了英勇和艰苦的斗争，并获得了重大的胜利。这些胜利不但鼓舞了一切为民族独立和自由而斗争的人民，并且对保卫亚洲和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无限的欢欣和敬佩。

一九五四年日内瓦会议达成了恢复印度支那和平和通过全国选举实现越南统一的协议，但目前和平的敌人却又在阴谋破坏日内瓦协议的实施，这是一切正义的人们所绝对不能容许的。中国人民对越南人民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召开南北双方协商会议以准备全国自由选举所作的不断努力，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

祝越南人民在为争取和平、独立、统一和民主的斗争中获得更大的胜利！

祝你们在巩固民主政权、医治战争创伤并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事业中获得进一步的成就！

一九五五年十月十六日，毛泽东关于与越南商谈的我方代表团组成问题的批语

已与彭商定，由彭德怀、陈赓、韦国清三同志组织我方代表团为适宜，不要太多的人参加。粟裕同志有病也可不参加。彭为团长，陈为副团长。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六日，毛泽东接受越南大使阮康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越南人民为了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坚持了八年的艰苦抗战，取得了伟大的胜利。和平恢复两年多以来，越南人民又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经济恢复和建设事业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我相信，越南人民在今后发展国民经济及和平统一祖国的事业中定将取得新的更大的胜利。

诚如大使同志所说，很久以来，中、越两国人民就在兄弟般的真诚的友谊和合作中紧密地相互联结在一起。几年来，我们两国人民和政府之间的关系日益密切，经济和文化合作和各种形式的接触往来日益扩大和发展。我深信，中越两国人民的兄弟般的友谊将会进一步巩固和发展。这不仅有利于增进我们两国人民的繁荣和幸福，而且也有利于增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团结以及亚洲和

世界和平。

一九五七年八月三十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二周年的电报

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一年来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为此感到欢欣鼓舞。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争取彻底实现日内瓦协议所作的不懈努力，不仅为越南人民所拥护，而且获得了中国和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为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所作的贡献，特别是最近胡志明主席对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友好访问，以及越南民主共和国为发展同邻邦和其他亚洲爱好和平国家的友好关系所获得的新的成果，必将有利于维护亚洲和世界和平。

一九五九年四月十五日，毛泽东接受越南新任驻华大使陈子平呈递国书时的答词

毛泽东主席致答词说：

“越南和平恢复以来，越南人民在越南劳动党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的领导下，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以及其他各方面的工作中，获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国人民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这一切成就感到极大的高兴。

“越南人民非常渴望祖国统一。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为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曾经并且正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我深信，越南人民统一祖国的正当愿望一定会得到实现。

“越南民主共和国是社会主义阵营大家庭中的一员，它一贯为不断巩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亲密团结进行着巨大的努力，为维护和彻底实施日内瓦协议，为保卫印度支那地区和世界的和平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近年来，中越两国人民在争取和平和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相互支援，亲密合作，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国家间兄弟般的团结和牢不可破的友谊。中国人民十分珍贵同越南人民的友谊，并且将继续尽一切力量加强和发展我们两国之间友谊和互助合作关系。”

一九六〇年五月十八日，毛泽东等祝贺胡志明七十寿辰的电报

欣逢你七十寿辰之际，我们谨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你——越南劳动党的创始者和领导者、越南人民最敬爱的领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杰出的战士和中国人民最亲密的朋友致热忱的、兄弟般的祝贺。

数十年来，你以自己的全部精力和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为越南劳动人民的彻底解放，为越南和平、统一、独立和民主的事业进行了长期的英勇不屈的斗争，并且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你对越南人民革命事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以及世界和平所作的卓越贡献，使你不仅受到越南人民，而且受到中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敬爱。

我们衷心地祝贺你健康和长寿。祝你在领导越南人民建设社会主义、争取越南和平统一、反对帝国主义的战争政策和侵略政策和保卫远东和世界和平的斗争中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一九六〇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的电报

英雄的越南人民，在以胡志明主席为首的越南劳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艰苦的斗争，在 1945 年 8 月推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了民族的独立。但是，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还不到一个月，又遭到法帝国主义的武装进攻。越南人民紧密地团结在越南劳动党和胡志明主席的周围，进行了九年英勇抗战，终于打退了帝国主义的侵略，赢得了越南北方的解放。越南人民的胜利为被压迫民族

争取解放的斗争树立了一个光辉的榜样。

解放之后，越南北方人民展开了规模巨大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并且取得了重大的成就。现在越南北方人民正在为完成和超额完成 1958—1960 三年计划所规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指标而奋斗。我们深信，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一定能够出色地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和越南人民一贯维护日内瓦协议，为和平统一自己的祖国进行着坚持不懈的努力。尽管美帝国主义一直控制着越南南方，竭力阻挠越南的和平统一，但是它的这些罪恶活动正在激起越南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越南人民和平统一祖国的愿望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越南人民的正义斗争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执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维护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印度支那和亚洲的和平，并且大力支持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积极发展同亚非和平中立国家的友好关系。这一切赢得了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和国家的赞扬和支持。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邻邦，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亲密兄弟。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是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之上的，是牢不可破的。中国人民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庆祝光荣的越南民主共和国建国十五周年，庆祝越南人民在十五年中取得的辉煌的成就。我们衷心地预祝同志们，并且通过你们预祝兄弟的越南人民在建设社会主义、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的和平统一、加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团结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中获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三、中国人民支持越南南方人民的斗争

一九六〇年，越南南方人民被迫拿起武器反抗美吴集团的反动统治。

一九六一年，美国派遣特种部队进入南越，

一九六二年，美国成立驻越南军事援助司令部。加强对越南南方人民的镇压，并且准备袭击越南北方。

为支援越南人民抗击美国侵略，中国向越南民主共和国无偿提供大量军事装备。

一九六二年九月一日，毛泽东等祝贺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的电报十七年来，勤劳勇敢的越南人民在胡志明主席和越南劳动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现在，越南人民正以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展开爱国竞赛运动，进行着忘我的劳动，斗志昂扬地执行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人民对此感到欢欣鼓舞，并祝越南人民取得更大更新的成就。

越南民主共和国政府始终不渝地为履行 1954 年日内瓦协议和争取祖国和平统一而进行坚决的斗争。美帝国主义对越南南方明目张胆的武装干涉和侵略，已经激起全体越南人民的无比义愤，并且遭到越南南方人民越来越强烈的反抗。我们再次重申，越南人民反对美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南越、争取祖国和平统一的爱国正义斗争，将永远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支持。

越南民主共和国一贯奉行和平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积极支持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为捍卫社会主义阵营的安全和维护印度支那和东南亚的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一九六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毛泽东主席发表反对美国—吴庭艳集团侵略越南南方和屠杀越南南方人民的声明：

最近，南越吴庭艳反动集团加紧对越南南方的佛教徒、大中学校的学生、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中国人民对此表示极大愤慨，并且强烈谴责吴庭艳集团的这一滔天罪行。胡志明主席已经发表声明，对于美、吴集团的罪恶行为，表示强烈抗议。我们中国人民，热烈支持胡主席的声明。

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吴庭艳，采取了变越南南方为美国殖民地的政策、发动反革命战争的政策和加强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政策。这就迫使越南南方各阶层人民广泛地团结起来，同美国—吴庭艳集团进行坚决的斗争。

美帝国主义破坏了第一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阻挠越南的统一，对越南南方公开地进行武装侵略，打了多年的所谓特种战争。美帝国主义又破坏了第二次日内瓦会议的协议，对老挝进行了露骨的干涉，企图在老挝重新挑起内战。除了存心欺骗的人们或者十分天真的人们以外，谁也不会相信，一纸条约会使美帝国主义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或者变得稍为规矩些。

四、中国人民支持越南北方人民的抗美斗争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毛泽东对中国政府抗议美国侵犯越南的声明稿的批语 汪东兴同志阅后，即交江青阅。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一九六四年八月六日，美国开始轰炸越南北方。

中国政府声明：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轰炸，就是对中国的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

一九六五年三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越北部岘港登陆，准备随时北犯。美国飞机不断侵入中国云南、广西和海南岛上空。在这种形势下，中央号召全国军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并且应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开始向越南派出地空导弹、高炮、工程铁道、扫雷后勤保障等支援部队。美国约翰逊政府逐步扩大侵越战争，公然宣布把中国当作主要敌人，声称“存在着同中国发生战争的危险”，阴谋在亚洲发动一场更大规模的、世界性的战争。

一九六五年四月十日，周恩来请巴基斯坦总统阿尤布·汗向约翰逊转告中国对美国的政策。（1966年4月10日他同巴基斯坦《黎明报》记者伊查兹·侯赛因谈话时，重申了这个政策，并说明这几句话是不能割裂的整体。同年5月10日在《人民日报》公布。）

周恩来关于中国对美国政策的四句话：

（一）中国不会主动挑起对美国的战争。中国没有派兵去夏威夷，是美国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省。尽管这样，中国仍然努力通过谈判要求美国从台湾省和台湾海峡地区撤走它的一切武装力量，并且已经先后在日内瓦和华沙同美国就这个决不能让步的原则问题谈了十多年。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

(二) 中国人说话是算数的。那就是，如果亚洲、非洲或世界上任何国家遭到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是一定要给以支持和援助的。如果由于这种正义行动引起美国侵犯中国，我们将毫不犹豫地奋起抵抗，战斗到底。

(三) 中国是做了准备的。如果美国把战争强加于中国，不论它来多少人，用什么武器，包括核子武器在内，可以肯定说，它将进得来，出不去。既然一千四百万越南南方人民对付得了二十几万美军，那么六亿五千万中国人民也肯定对付得了一千万美军。美国侵略者不管来多少，必将被消灭在中国。

(四) 战争打起来，就没有界限。美国有些军事家想依靠海空优势轰炸中国，而不打地面战争。这是一厢情愿。战争既然以空战或海战开始，那么，战争如何进行，就由不得美国一方做主了。你能从空中来，难道我们不能从陆上去吗？因此，我们说，战争一旦打起来，就再没有什么界限。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毛泽东对越南南方领导人接见我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的批语

外交部办公厅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六日印发的文件《越南南方领导同志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这个纪要有三件：一、越南南方中央局书记长山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二、越南南方中央局副书记、中部地区书记武至公一九六五年三月和四月两次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纪要；三、武至公接见我赴南越新闻工作队的谈话全文（一九六五年六月整理）。这个谈话全文包括十二个问题和两个附件：（一）南方革命的目标和基本方向；（二）人民武装力量情况。最后是记者附注的情况，其中讲了部队的编制、装备、战斗力和供应情况等。

毛泽东阅后批示：江青阅，退毛存。

记者附注中说：中部山区主力部队供应比较困难，山区地广人稀，当地少数民族生活不富裕，很少副食品，不种蔬菜，战士们一般没有副食吃，白饭加盐巴（盐每月每人供应半公斤，从平原运盐进山全靠人力背，很困难），有时吃些野菜（因为人多，野生东西也很快吃光了），营养不足。战士们常年露营森林，雨多潮湿，日夜温差大，没有房屋、吊床、雨布过夜，蚊子特别多，许多战士没有蚊帐。由于营养不良，蚊虫猖獗，战士们发疟疾很多，预防和医治的药品又

很少。按规定战士每年供应一套衣服，但有些部队不能保证。这样，使战士们的健康受到了一定影响。

毛泽东阅后批示：要送蚊帐、布匹、罐头、肉松、药品、雨布、吊床等物资去。并要大量地送。

贰、本节简论

中越两国是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我们两国人民无论在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中，或者在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中，一向同甘苦，共患难，相互支持，紧密合作。中国人民十分珍视我们两国人民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基础上的深厚友谊，并且将继续同越南人民一道，为加强中越两国之间兄弟般的友好合作互助关系和伟大团结，进行不懈的努力。

2006 年 8 月 28 日初稿

2011 年 6 月 21 日修改

第五章第五节 处理中印边界及新疆台湾问题

壹、本节概述

一、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居民越境前往苏联事件

一九六二年初，地处中苏边境的新疆伊宁、霍城、塔城、裕民等地，出现了少量居民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

一九六二年三月中旬至五月，逐渐发展成为大量居民成群结队越境前往苏联的严重事件，越境居民累计达到六万余人。特别是在伊宁市，还演变成为冲击自治州政府机关、抢劫州政府档案的暴力事件。有确凿证据表明，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等机构卷入了这一事件，苏联边防部队还为中国居民越境提供了方便。

一九六二年四月下旬，毛泽东看到中央统战部报来的一份材料，反映赛福鼎对解决这一问题的意见。

赛福鼎表示，必要时可派他回新疆工作，对处理这个问题会有帮助。

一九六二年四月二十七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

“赛福鼎是否以回去工作为宜，请酌定。”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四月三十日，周恩来同赛福鼎谈话，就如何处理这一事件做了明确指示。随后，赛福鼎紧急赶赴新疆，协助中央处理这一事件。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处置新疆外逃和外逃回来人员的指示》、《关于封锁新疆地区中苏边境问题的规定》等文件。

一九六二年六月底，发布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委员会命令》和关于向群众解释这个命令的宣传要点。

边民越境外流事件发生后，中国方面查封了参与这一事件的伊犁、塔城地区的一些苏联“侨民协会”。苏联方面关闭了苏联驻乌鲁木齐总领事馆和驻伊宁领事馆。这一事件迅速平息。

这次事件，使得毛泽东等人得出了一个新的认识，认为由于修正主义者搞颠覆活动，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已经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兄弟国家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性质上的变化。

一九六二年八月三日，毛泽东在听取西北地区负责人的汇报时，明确提出：

新疆的主要危险来自苏联现代修正主义，新疆斗争的主要方面是苏联现代修正主义。

二、中印边界问题

一九六二年初起，印度当局在中印边境加紧推行“前进政策”，不断蚕食中国领土，向中国境内纵深进逼，在中印边境西端更为突出。

一九六二年七月，印度在中印边界西段中国境内加紧增设据点，侵占中国领土。印军有些据点干脆设在中国边防哨所之间甚至侧后，与中国边防哨所形成了犬牙交错的局面，冲突一触即发。

一九六二年二月二十六日、三月二十二日，中国政府两次照会印度政府，指出印度方面用片面行动来改变中印边界现状的做法是危险的，表示“就中国方面来说，谈判之门总是开着的”，希望印度政府回到和平解决边界问题的途径上来。

一九六二年四月十二日，中国外交部就印军在中国境内占地设点等问题向印度政府提出严正抗议，指出：“中国政府有理由认为，印度方面上述侵犯中国领土的活动是它蓄意在这一地段破坏边界现状的信号。”

一九六二年四月三十日，中国外交部再次照会印度政府，抗议印军连续侵入中国新疆地区并设立军事据点，进行挑衅活动，郑重声明：两年来，中国政府一直单方面地停止向边界自己这一边的二十公里以内派出巡逻队。在印军步步侵占中国领土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已命令边防部队在印军最近一再侵扰的地段恢复边境巡逻。（1962年5月3日《人民日报》。）

一九六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又一次提出严正抗议，并重申：“如果印度方面不从中国领土上撤走侵略据点和入侵军队，并且继续进行挑衅活动，中国边防部队将不得不实行自卫”。

中国政府的这些外交努力，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印度当局拒绝。他们反而错误地认为，通过这几个月的蚕食行动，尼赫鲁的“判断和胆略已胜利地得到了证明，‘前进政策’的基本前提也从而得到了证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印军在中印边界西段继续增兵，并扩大蚕食范围。

一九六二年七月五日，印度军队侵入加勒万河谷地区。

这一地区，是印度进入中国阿克赛钦地区的通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中国外交部向印度政府提出强烈抗议。

印度政府在复照中拒不撤出侵入加勒万河谷的印军。

随后，中国边防军在这一地区同印军展开了艰苦的反蚕食斗争。印军入侵加勒万河谷，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证实了中央军委早在五月间作出的判断，印方的主要企图是逐步侵占阿克赛钦地区。

一九六二年七月七日和十一日，周恩来接连听取中印边界情况汇报，十一日向毛泽东作了汇报。

一九六二年七月十四日，中央军委派总参作战部负责人专程赶到新疆，向新疆军区和西线边防部队传达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中印边界西段开展反蚕食斗争的指示，并具体指导这一斗争。

毛泽东的意见是：印度在我境内设点，我们完全有理由打，但是现在还要克制，不能急于打。一是要进一步揭露尼赫鲁的真面目；二是要争取国际上正确认识中印边境斗争的是非问题。有些国家想利用我们国内存在暂时困难的机会，推我们上阵，整我们一下，但我们不上他们的圈套。我们现在坚持不打第一枪。我们的方针是八个字：“决不退让，避免流血。”紧接着，毛泽东又补充了八个字：“武装共处，犬牙交错。”在毛泽东上述意见的基础上，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概括出了“二十字方针”，即“决不退让，力争避免流血；犬牙交错，长期武装共处”的反蚕食斗争的总方针。

一九六二年七月二十三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同梅农继续会谈中印边界问题的指示，发给正在率代表团出席解决老挝问题的日内瓦会议的陈毅等。指示陈毅利用这次日内瓦会议的机会，约见印度国防部长梅农，向他说明中国政府历来主张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并商谈恢复谈判的有关事宜。

但是，中国政府一切和平解决边界冲突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后来，印度军队终于在中印边界的东段和西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犯，中国军队不得不实行自卫反击。

三、在台湾的蒋介石叫嚣“反攻大陆”

一九六二年四月间，中央军委注意到蒋介石有派军队窜犯大陆的迹象。

一九六二年五月中旬，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备战。

一九六二年六月六日，刘少奇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听取林彪关于东南沿海军事准备问题的报告。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进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

六月八日下午，毛泽东在杭州约见杨成武、许世友等。杨、许向毛泽东汇报蒋介石最近可能在东南沿海进行军事冒险的动向，并谈了六日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讨论情况。

毛泽东对汇报表示满意，说：“现在对于整个敌我情况，有了个清楚的概念。”

他完全同意中央、中央军委确定的各种方针和措施，说：“部署很好。完全是积极的方针。”

对蒋介石能动员多少兵力“反攻大陆”，他估计：“敌人最多来十五万人，再多也不可能。”

他赞成对进犯之敌采取顶的方针。“必要时，可以把敌人进攻的作战计划公布。”

关于军工生产，毛泽东赞成政治局扩大会议确定的方针，利用这个机会把军工搞起来。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对于揭露蒋介石进犯东南沿海阴谋的新华社电讯稿，毛泽东说，他还要看一看，时间还来得及。

1962年6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蒋军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指示》。《指示》说，据判断，盘踞在台湾的国民党军队很可能在最近期间，即台风季节前后，对我福建省和闽粤、闽浙接合部地区发起一次登陆行动，妄图在大陆建立一个反革命根据地；美帝国主义也想利用蒋匪帮的这次军事冒险，对我进行试探。《指示》要求，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提高警惕，加强备战，从各个方面做好准备，决不让蒋军的阴谋得逞。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一日，毛泽东审阅修改电讯稿，加写了一段话：“蒋匪军多数人是被强迫来送命的，但也有一部分反革命死党是想到大陆来拼命的，或者是为了到大陆沿海地区进行抢劫，想发横财的。因为台湾人少，兵员不足，匪帮头子们则想到大陆沿海各地抓一批青壮年补充部队。”

随后，他要秘书林克转告刘少奇，请刘少奇召集常委及彭真、罗瑞卿、萧华、陆定一、吴冷西开会通读一遍，加以斟酌，再行定稿。

一九六二年六月十八日，他为中央起草了在内部印发这个电讯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委根据这个电讯稿“在干部及人民群众中用口头讲明，使人民普遍有所准备”。

在进行思想动员、舆论准备的同时，毛泽东指示军委认真做好必要的防范准备。中央军委先后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四日，《人民日报》以《全国军民要提高警惕准备粉碎蒋匪帮军事冒险》为题，发表了毛泽东审阅定稿的新华社电讯稿，揭露蒋介石“反攻大陆”的阴谋。

这篇电讯立即引起国际舆论的关注，连美国人也感到蒋介石底气不足，连忙向蒋施加压力，劝阻他放弃所谓的“反攻大陆”计划。

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台湾海峡局势发表声明，表示不支持蒋介石进攻中国大陆。

贰、本节简论

关于这一段历史，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周恩来对毛泽东关于国际战略的考虑，作过回顾。他说：“在这个问题上，生动地表明毛主席抓住了国内外形势中的主要矛盾。当时的形势是：西北边境上，有苏联修正主义者在新疆的少数民族中进行颠覆活动，搞了一部分人跑到苏联去；在西南的边境上，有尼赫鲁挑起的中印边境冲突。那时候，我们很多同志都很注意这两方面的问题。从社会主义阵营的内部关系来说，从我国同民族独立国家的关系来说，这两个方面都是主要矛盾。可是，从全盘的国际关系来说，我们同美帝国主义之间的斗争是主要矛盾。所以毛主席说，更重要的还是要抓住美蒋窜犯大陆的阴谋，加以揭露，进行动员，这就有可能推迟或者制止他们的阴谋。毛主席抓住了这个中心环节，就调动了全局。好像下棋一样，一个子走活了，全局就活了。首先，当然是把军队动员了，军事工业动员了。然后，我们的干部、基本群众，动员起来了。最后，六月二十三日新华社公开揭露美蒋阴谋。这一来，全世界都被调动了。首先是台湾，到处来打听消息，英国是不是牵线呀？中美是不是妥协呀？中苏关系如何呀？紧张得很。美蒋矛盾尖锐了。接着，肯尼迪在六月二十七日就发表声明，说他不支持进犯大陆。

实际上，早在二十三日的华沙中美两国大使会谈中，美国人就作了保证。英国跟着说，它不参加台湾海峡的战斗。法国也说，这对它没有任何义务。甚至连日本也出来说，这件事是对东亚不利的。最后才是赫鲁晓夫，他摸准了，得到了美国的内部通知了，才在七月三日来一个马后炮，廉价的保证。虽然他的保证是被迫的，装样子的，假的，但也有一点表面价值，至少叫群众看到不能反对中国。美蒋的阴谋被揭露后，全世界都指责美蒋。” “总之，敌、我、友这三方面在这个斗争中都调动起来了。”

（本篇根据《毛泽东传》编写）

2011年6月21日初稿